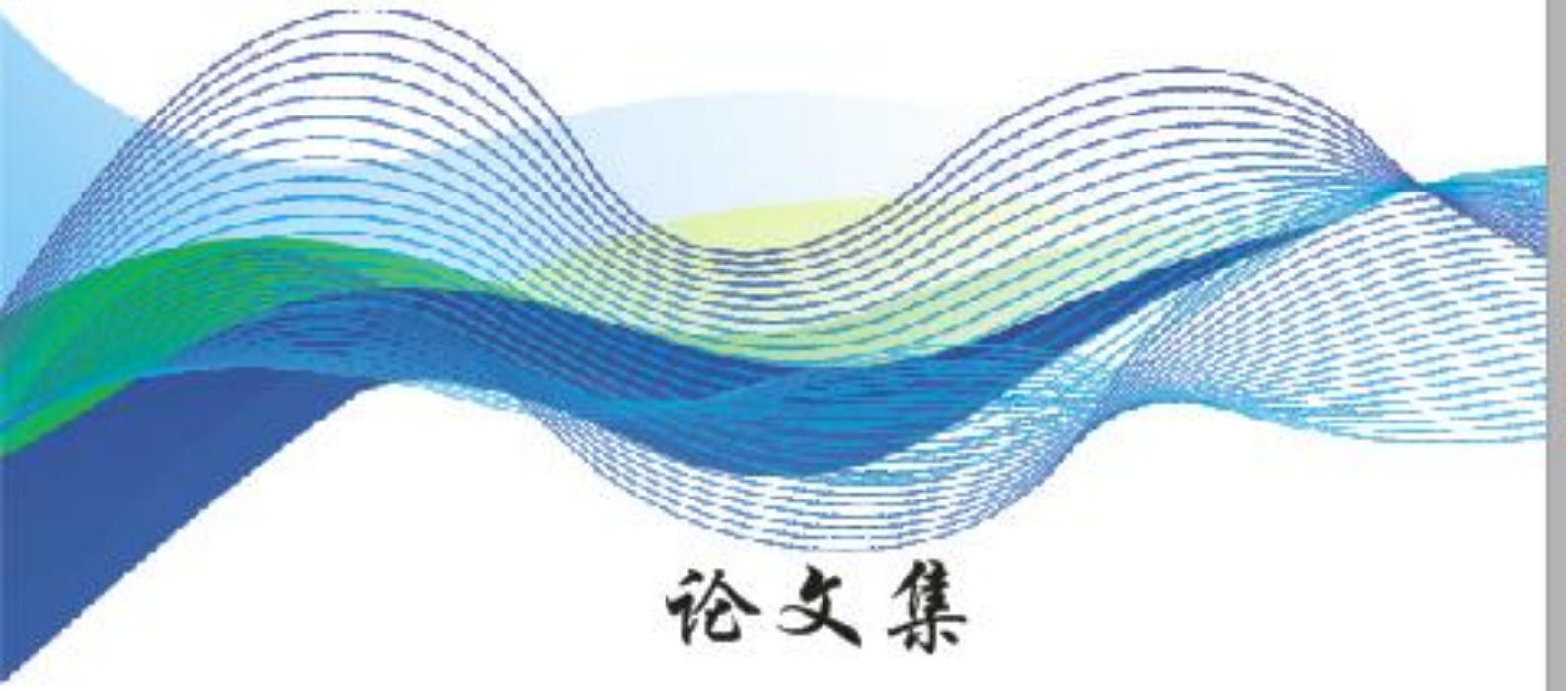
西北大学
NORTHWEST UNIVERSITY

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五届（2021）学术年会分场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建设暨纪念西安事变85周年”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中国现代史学会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2021.11

目　录

做“新中国的小主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工作和儿童节 1
为抗日救亡鼓与呼：延安时期《新中华报》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的宣传报道 15
从简政到整政：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再研究* 25
租佃关系、减租动员与乡村权力：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减租运动”（1940—1944）
..... 40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 61
抗战时期日军无差别轰炸陕西述略* 73
1939 年中条山“六·六战役”陕军跳黄河人数考 85
民族象征物：抗战文化动员背景中的华山叙事（提纲） 90
大历史视角下的西安事变研究刍论 91
魏野畴与杨虎城关系探究 100
由一则报道看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 108
工具化与去工具化：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的实践逻辑 111
抗战时期陕甘边区妇女后方参战问题探析 123
中共南方局对职业妇女的革命话语建构：以《职业妇女》为中心 131
延安时期中共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研究：基于陕北公学的历史考察 143
“开发大西北”中西北人的因应与自觉：以抗战前卫生建设为例 154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探析 167
抗战时期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的塑造与诠释 177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探析 186
舆论与政治：1945 年国共两党围绕“胡世合事件”的博弈 198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建党纪念仪式与党的形象塑造 211
论述我党“双十二事变”后的“西安”情报与抗日统一战线 225
论“双十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的活动 245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 38 军成为统一战线的典范 250
王志廉与西安八办秘密物资的运输和情报工作 271
表里之间：抗战时期蒋介石日记所见之中共 274
抗战时期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285
立法程序正义与权力边界维护：以战时《省粮政局组织大纲》为中心 292
李济深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提纲） 308
互证 求真：哈里森·福曼著作《北行漫记》考析 309
东北军将领的“各自为义”与分道扬镳：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探讨 332
爱乡爱国：杨虎城主陕时期的行动逻辑 343
从“汉中密约”到“西安事变”：杨虎城对中共统战的特殊贡献 351
不对称的角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博弈 357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与西安事变关系之探讨 370

做“新中国的小主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工作和儿童节

洪艺华

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少年儿童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无论是儿童保育、儿童教育还是对于儿童节的纪念都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同时，对于儿童问题的基本认识也体现了中共对儿童工作的重视。[1]朱德曾在纪念儿童节的会议上强调，中国原来是个什么都有的好地方，为啥我们现在没好得穿又没好得吃？就是因为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面对这样的处境，儿童要吃苦耐劳，做农人、做工人，才是一个模范儿童。同时还要把身体锻炼好，念死书，死念书，斯斯文文，这是毫没有用处的，大家要把身体锻炼得像铁一样的强健。[2]正是如此，中共将儿童工作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而且在儿童工作基础上又将儿童节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活动持之以恒的推进。在笔者看来，儿童节纪念活动的策划和开展则是中共对一个阶段儿童工作的总结以及下一阶段儿童工作方案部署的开端，其往往具有指导意义，是中共对儿童问题的高阶认识。

本文将陕甘宁边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具体地域划分，是由于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在中共各项政策的执行实施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因而笔者本文结合抗战时期边区政府的相关文件及根据地主流报刊《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的报道，对陕甘宁边区儿童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儿童节活动进行分析，更好地认识在中共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少年儿童群体改造与形塑的过程。

目前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的研究多集中在陕甘宁边区保育工作研究[3]，而以陕甘宁边区儿童节为内容的研究则较少，且基本停留在史实介绍层面。除此之外，围绕国统区的四四儿童节的研究也有部分成果。[4]基于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

1　抗战时期少年儿童具体的年龄划分没有统一表述，对此笔者结合多份历史文献进行梳理。1939 年 7 月 1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一次颁布的《抗战损失查报须知》所附表式二《县市人口汇报表》的“说明”中便将儿童定义为 16 岁以下。（转引自卞修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研究 1937-1945》，北京：华龄出版社，2012 年，第 433 页。）1940 年晋西北抗日儿童团组织简章中规定，“7 岁以上 13 岁以下儿童，愿意参加儿童团的都可以成为儿童团员。”（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等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15 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第 34 页。）而 1941 年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及县、乡调查提纲》中也提到要对儿童团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其中就指出少年儿童的年龄为 7 至 14 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等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 15 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第 706 页。）也正是借助以上文献对少年儿童的论述，所以笔者本文所讨论的少年儿童年龄范围确定为 7 岁至 16 岁。

2　《延市千余小朋友热烈纪念儿童节》，延安《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3　如于美丽：《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中共中央党校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吕芳：《陕甘宁边区幼儿保教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4　如冉思尧:《陕甘宁边区的“四四”儿童节》，《文史月刊》2013 年第 3 期，第 15 页，不过对于儿童节有一些研究探讨此问题如孙霞：《国家·社会·儿童：南京国民政府四四儿童节述评》，华中师范大学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军全：《节日与教育:中共儿童节纪念述论（1937-1949）》，《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68—74 页；吕志茹、王龙腾：《抗战前　申报　对“四四”儿童节报道述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87—93 页；杨焕鹏：《革命动员视野下中共的“四四”儿童节研究——以山东根据地为主的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 年第 2 期，第 38—49 页 等文章都

工作和儿童节进行梳理研究，进而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知，从而展现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更为真实的生活面貌。

一、历练中成长：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工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际上掀起一股重视儿童的热潮，各国日益注重对儿童权益的保障，儿童地位也日渐得到提高，越发受到格外重视。1925 年 8 月，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儿童幸福国家大会，并在会议中发布了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该发言中便提到，“须研究各种必要的方法，使儿童的身心上的都正规的发展。儿童之冻饿者须给以衣食，疾病者须加以看护，劣儿童应予以辅导，不良儿童应予以感化，至于孤儿弃儿应设法予以救护。凡遇危险的时候，儿童应最先予以救护。须设法使儿童获得谋生之必要能力，并须庇护一切被虐待的儿童。须教育儿童，使其以全部能力，为人类幸福做贡献。”1受此影响对国内的儿童工作也有指导意义，并推行了一系列相关措施。

国民政府自 1931 年 4 月 4 日起开始举办“四四”儿童节，还曾在 1935 年至 1936 年间举办儿童年，对少年儿童群体给予充分重视。中共方面也认识到了儿童工作的重要性并施行相应的措施。1938 年 7 月 4 日在延安市举行的抗战一周年及中国共产党成立 17 周年纪念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简称保育分会）。[2]同年 10 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1945 年又成立了第二保育院。保育院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特别重视。此外，在制度等各方面保障措施中都对儿童有所关照。1941 年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其中就保障妇女及少年儿童的生活提出诸多具体措施，对如何优待产妇、保育婴儿、设立托儿所、保姆问题、费用保障等问题做出了细致的规定。3

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因为将少年儿童视为边区革命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而儿童工作作为使儿童“时刻准备着”补充到革命队伍中去的“事业”，所以通过“从文化、思想、政治、组织、工作、劳动等斗争中加强对儿童的教育锻炼”无疑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对少年儿童工作安排的基本方。4在此基础上，陕甘宁边区针对少年儿童工作提出要倡导一种“教学与训导”相结合的方式。如在边区政府管理之下的各小学，“教育厅除原则的指导外，在具体运用与实施上，概由各校灵活的发挥创造，一般的教学方式；启发，参观，实习，实验，讨论，漫谈，互助，竞赛，在学校可能条件下，均可活用。至于训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倡导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初小为儿童团），训练学生对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运用，使儿童在实际活动中，自己管理自己，自觉的遵守纪律，严格取缔了有害儿童心身发展旧教育的体罚制度。”[5]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少年儿童将自身的学习与革命事业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也是在

对“四四”儿童节问题进行了讨论，对笔者本文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1 《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儿童教育》1930 年第 2 卷第 5 期，第 40 页。

2 《陕甘宁边区设立战时儿童保育分会》，选自陕甘宁三省区妇联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内部资料，1987 年，第 23 页。

3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选自《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第 33—36 页。

4 《纪念四四儿童节（社论）》，《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 年 4 月 3 日，转引自吴媛媛：《红星照耀童年——1927-1949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运动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90 页。

5 《陕甘宁边区国民教育概况》，选自《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89 页。

这样的情况下少年儿童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建设陕甘宁边区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进而在边区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正如少先队队歌中所描述，“我们是抗日的好男儿，拿起锄头去生产，扛起刀枪保家园。学政治，学军事，文武本领要双全。”[1]生动地反映出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在各个方面提升和各项事务中的参与度。

（一）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念的养成

学校教育是塑造少年儿童的行为和思想，培养其启蒙意识的重要环节。通过学校教育能提升少年儿童在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理论知识素养以及培养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早在 1938 年 8 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小学法》其中便提到，“边区小学应依照边区国防教育宗旨及实施原则，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革命精神及抗战建国所需要的基本知识技能。”[2]而至 939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便确立了“以适合抗战需要，实现三民主义，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启发儿童爱国思想与发扬民族精神，养成儿童独立精神为主”[3]的教育工作目标，开始重视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体现在学校教育层面，则制定了一些层次分明的具体教育方案。比如在少年儿童当中根据年龄、自身知识储备等情况，对少年儿童进行分班教育。不同班级采用不同的课程和课时安排，如对年龄较小的婴幼儿教他们走路、说话等，并格外注意感官功能的训练。少年儿童则开设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谈话、（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识字，识数等课程。而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少年儿童开设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劳作、美术、体育等课程。[4]这些课程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即将学校教育中教授的知识能力与少年儿童的个人成长相结合，也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更多理论知识素养的支撑。同时，为了应对当时的形式，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也加强了抗战政治的教育，使少年儿童对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工作有简单了解，熟悉战时的基本情况。总的来讲，这些基础知识能力的养成教育，一方面帮助少年儿童全面发展，能够更加快乐地生活、成长；另一方面，也与抗战时期中共的战略方针有密切联系，更为明确地培养陕甘宁边区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在这样一系列知识能力的学习过程中，少年儿童通过知识的学习来实现基础素养的提高，为其他技能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并且借助课堂学习，提高少年儿童的知识涵养，也对其价值观念树立有重要的帮助。而且少年儿童在这一过程中个人能力提高，也为之后军事方面素养训练以及生产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数量以及小学就读人数的数据资料表明。1938 年春季有小学 705 所，在校学生 13799 人；秋季有学校 733 所，在校学生 15438 人；1939 年春季有学校 890 所，在校学生 20401 人；1939 年秋季有学校 883 所，在校学生 23089 人；1940 年春季有学校 1341 所，在校学生 41458 人；1940 年秋季有学校 1341 所，在校学

1 《陕甘宁边区少先队队员歌》，选自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编《延安鲁艺师生歌曲集（抗战篇）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9 年，第 438—439 页。

2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 小学教育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1 页。

3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第一战时保育院概况》，《新中华报》1939 年 3 月 10 日第 4 版。

4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第一战时保育院概况》，《新中华报》1939 年 3 月 10 日第 4 版。

生 43625 人。[1]三年间，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均有较大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在少年儿童学校教育方面做出相关的成效。此外，陕甘宁边区的少年儿童也利用自身学到的知识发挥作用，如在边区识字运动过程中开展的“小先生制”便是典型表现，边区的少年儿童教授身边的群众学习汉字，发扬少年儿童的积极性，让文化真正被群众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所重视。

（二）军事素养和侦察技能的训练

少年儿童作为战时队伍的后备力量和生力军，其基本素养和战斗能力的养成是少年儿童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部分。陕甘宁边区的学校教育在这方面便制定了特别措施。“我们的小学校也应该配合着抗战动员，适应着战时的环境和需要，更具体更紧张的把应教的课、应做的工作推动起来，这样才能和群众的抗战运动与儿童的战时活动取得密切的联系，使国防教育在任何环境下可以继续发展，不至受丝毫的妨碍。”[2]并且从“学校军事化”“课程重心的转移”等几个方面做出具体安排。因而在实践中，讲求日常学习的军事化培养，“第一，要行动军事化。就是在上课时不一定采取课室形式，可以在山野中随时随地上课。学生的文具用品经常随身携带，一遇警变立即移动；教员授课不要黑板，以石板代替，所有日用教具由教员自己携带。所谓露天学校，这种办法虽很简单，但最适用于战时环境。第二，要锻炼爬山野战。就是每天爬山一次，学习山战的简单办法，使学生在某种环境下，可以配合游击队行动。第三，团体纪律。就是要照军队班排的编制来组织学生，在行动上和少先队取得一致，取得联络，养成儿童团体生活的习惯，并能遵守一定的军事纪律，使成为有训练有纪律的儿童组织，教员要负一切指导的责任。第四，要教学劳动化。就是要学会作侦探传消息，做慰劳等的劳动工作，使学生成为战时很有作用的小部队，同时要使学生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和克服困难的能力。”[3]正是在这样的训练中一大批少年儿童有实力去参与真正的战斗工作，而且成效明显。如 1938 年延安县在汇总少先队员的工作时，有 500 名少先队员积极加入了自卫军，[4]参与日常保卫工作和临时战斗。

将重要信件和情报及时传递给边区政府和部队也是少年儿童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经常借助放羊、运送农用产品等各类物资的掩护方式，巧妙伪装，突破敌人的岗哨封锁线，将重要情报传递至在敌占区的中共地下联络站，完成送信、送情报的任务。而且有时还会携带信件和重要情报，爬山越岭，长途行军，送到八路军的前沿阵地去。[5]这些来自儿童团团员获取的宝贵情报，为八路军及地方民兵组织进行作战部署、制定相应的作战计划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消息。

1　资料来源为刘宪曾，刘端棻编：《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66 页，转引自赵娜：《陕甘宁边区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政策及其实施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4 页。

2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小学应该注意的几个工作的通告》，选自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年，第 117 页。

3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小学应该注意的几个工作的通告》，选自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年，第 117 页。

4　舒群编著：《西北特区抗战动员记》，解放出版社，1938 年，第 3 页。

5　罗存康：《少年儿童与抗日战争》，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年，第 46 页。

另外，保卫边区大后方也是少年儿童日常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方面协助武装部队进行清剿土匪，另一方面要积极维持后方的治安，进行戒严盘查行人，侦探土匪行动等工作。”同时，少年儿童在日常治安管理中也非常认真，侦察能力十分敏锐。“他们按时上岗，认真执勤，对没有路条的行人坚决不予通行。他们手持红缨枪，到村口站岗、放哨、查行人。他们检查路条，非常认真，没有通行证或通行证有疑点，绝不放过。这种举动对敌特、汉奸造成很大的威胁。”[1]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日常工作，少年儿童逐渐融入了边区社会的治安管理体系，成为了边区社会安全保障的重要一环，且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了基本的实践能力。

（三）生产活动和宣传工作的参与

在战斗素养的提升外，日常的农事生产技能也是少年儿童能力提高的重要一环。陕甘宁边区在国防教育方针中就明确指出，“国防教育应注意生产劳动，如每周规定一定时间分学生种瓜种菜等，一以增加抗战物力，一以养成儿童青年的劳动习性。”[2]如完小的小学生就自主动手，完成了相关的生产任务。“由于全校儿童课余的努力，今年生产十万元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他们在纺织、农业、屠宰及手工作坊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些小朋友劳作的结果，创造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使学校伙食大大改善。” 这些生产活动对于儿童来讲掌握了生存技能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必要生活必需品。

在全国积极抗战的大背景下，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支持革命、坚决与日寇侵略者做斗争，让全民都来参与抗战。在这种情况便需要将相关政策在边区进行广泛宣传，少年儿童便成为承担这一角色的主力。“儿童可以担任许多宣传工作，如分发传单，组织歌咏队，在家里向他们的父母宣传，在村里向他们的四邻宣传。教育方面，我们在战时要实行小先生训，如去冬边区教育厅的四项要求——会认，会用，会写五百个字，了解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抗战形势，这项工作，能力强的儿童可以担负起来的。”[3]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陕甘宁边区的少年儿童在青救会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了儿童剧团、歌咏队、舞蹈队等组织，利用唱歌、演剧、舞蹈、集会演讲、分发传单等多样宣传方式向边区群众讲解中共的抗日方针，宣扬八路军、新四军奋勇抗敌的战斗英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将抗日救亡的理念广泛在群众中推广。而在日常的学习教育中也致力于对少年儿童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小学应积极参加每个抗战动员工作的布量（如目前的反托除奸工作及战时的春耕动员），特别是战争形势的报告，小学应负很大责任，利用早晚农民休息时间去报告（如读报等），必须使学校周围的村庄，都了解目前抗战形势。”[4]

除了对群众宣传外，少年儿童往往也参与到鼓舞军队抗战士气的拥军工作。正如边区的习语所言，“大八路保卫咱小八路，小八路理应来犒劳大八路。”一方面，少年儿童组成的儿

1　李加斌：《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少年儿童工作》，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 2 辑）》，内部资料，1985 年，第 123 页。

2　《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的实施原则》，选自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年，第 116 页。

3　齐语：《起来，边区的儿童们》，《新中华报》1938 年 3 月 30 日第 4 版。

4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小学应该注意的几个工作的通告》，选自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年，第 118 页。

童团等演出队伍，经常前往部队，通过演出活动的形式，拉近军民之间的关系，为八路军战士们带来欢声笑语。另一方面，儿童团的孩子们，还会主动去帮助部队战士的家属，帮助他们完成一些生产生活劳动，让他们感受到边区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怀。

总的来讲，陕甘宁边区的少年儿童全方位的深入了边区日常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一些在陕甘宁边区流行的儿童歌谣还生动地记录了这些情景。如《勇敢的小娃娃》就将少年儿童游戏活动情况与救亡爱国相结合起来，“小娃娃，小娃娃，大家拉起手来做套小戏法！小娃娃，小娃娃，大家拉起手来做套小戏法！谁是勇敢的小娃娃，是我啦，是我啦！让我来问你们几句话！你问吧你问吧！强盗来打不打？打打打，打打打，一个不够有大家，对！一个不够有大家！好！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好！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救国家！”[1]又如《边区儿童团歌》中便记述了少年儿童参与边区事务各方面的内容，“我们生活在边区，爱边区好象爱自己，岗位放哨捉拿汉奸，嘿嘿！巩固我们的模范抗日根据地。儿童团是我们的学校，我们团结起来工作呵，学习呵！”2这些歌谣一方面体现了边区少年儿童在边区社会中参与各项事务，为当时的群众所熟知、认可，另一方面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少年儿童在当时边区社会所起的作用。

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工作的开展有一个自在的逻辑。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共对边区少年儿童的正确引导，在日常的政治教育学习和宣传动员相结合的情况下，充分调动了少年儿童参与革命事业的热情，使得陕甘宁边区的少年儿童正确积极地投身于边区的建设事业中，并且其展现得有条不紊、纪律严明的形象，也是中共领导下边区社会风貌的真实体现。其次，富有朝气的少年儿童也展现了边区的蓬勃生命力，在日常生活的工作实践中，少年儿童也得到了充分的历练和成长。最后，在具体的实践行动中少年儿童也展现出边区小主人的责任和担当，为未来真正成为“新中国的小主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汇聚欢声：陕甘宁边区的儿童节

在中共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工作与日俱进。1942 年，访延记者赵超构曾记录了其所观察的陕甘宁边区儿童生活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当时儿童工作的初步成效。他记述到，“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叫作儿童沟。那真是儿童之沟，两岁到六岁的小孩像牛羊一样，在空气和阳光下嬉戏。这些儿童活泼肥壮，逗人欢喜。延安人的生活虽然那么节约，对于儿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啬: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气的,这些小孩子的衣服样式却是十分摩登，个个穿得像洋娃娃。”[3] 同时，孩子们的伙食也比较丰富，“每个孩子每月可吃到鸡 1 只、

1 《勇敢的小娃娃》，选自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编《延安鲁艺师生歌曲集（抗战篇）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9 年，第 154 页。

2 《边区儿童团歌》，选自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编《延安鲁艺师生歌曲集（抗战篇）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9 年，第 95 页。

3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第 175 页。

肉 2 斤、油 1 斤、蛋 30 个、小菜 2 斤、枣子 2 斤、饼干 1 斤、青菜 30 斤、大米 1 斤、麦 20 斤。”[1]这些都反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重视儿童群体所做出的努力。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少年儿童工作的成绩便需要通过一个有效途径全方位呈现，并同时将生活在陕甘宁边区下的少年儿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进行展现，如通过集会活动、宣讲展演等形式。而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与集会密切关联着的便是各类节日的庆典。有学者指出，“节日之所以对民众意义非凡，还在于它发展出一套与文化、传说、神话、仪式活动乃至食物等相关的信仰和生活体系，使参与其中的人在感到身心满足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成为千百年来，节日被民众所遵循、传承的重要原因。”[2]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在儿童工作日渐常态化的同时，也通过一些宣传途径来展示陕甘宁边区儿童教育工作的成效，其中儿童节纪念活动便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一）“四四”儿童节的由来与中共的反应

1931 年上海中华慈幼协会以应该“唤起社会同情、造成强有力之慈幼舆论”为由，向上海市政府提议设置儿童节，以此来凸显对于国家未来的新主人少年儿童的重视。同时，因为儿童节“名曰‘四四’与古时‘三三’‘五五’‘七七’‘九九’与今之‘十十’国庆节各节、名称相辉映、而不冲突、又在春时、南北气候、均当和暖、且与植树节相近、正合国家树木树人之大计”[3]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选择了四月四日作为儿童节。此外，因为由蒋介石担任上海中华慈幼协会的名誉会长，孔祥熙担任理事长并负责管理工作，所以该协会的相关呼吁和主张得到国民政府的极大支持。同时，该协会以坚持为少年儿童谋福利和幸福为协会的工作宗旨。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协会提倡设立儿童节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后各地都组织开展了相应的纪念活动。

在精神层面给予儿童的鼓励以及对儿童群体的重视是举办儿童节及其相关活动最重要的目的。如在 1932 年儿童节的致辞中就强调，“儿童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儿童的前途即是社会的前途，人类的前途。我们应该发扬儿童们的生命力，使其成为新时代的创造者，绝不容加以桎梏，使其成为旧时代的承继者。……我们在今日切盼政府不止于颁布儿童节，而更进一步地为儿童谋健康与教育上种种幸福之增进。发扬儿童的生命力，养成未来时代健全的主人。”[4]再如 1933 年的儿童节致辞中又提出了“拯救儿童”的口号，强调国内的儿童目前生存现状差异巨大，一部分儿童生活安稳，而还有一部分儿童则处在饥饿交迫的流浪状态，生活状况艰难。以至于在致辞中痛心疾首的呼吁，“儿童是国家的基础。是民族的生命。儿童的毁灭。即无异于民族的毁灭。我们能够对儿童忽视吗。我们能坐视其毁灭吗。”[5]足见在某种意义上儿童节更像是一个发声呼吁的渠道，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来唤醒全民族抗战意识的觉醒。

1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年，第 176 页。
2　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1 页。
3　《“四四”为儿童节》，《申报》1931 年 3 月 7 日。
4　《第一届儿童节献辞》，《申报》1932 年 4 月 4 日第 1 版。
5　《儿童节献词》，《申报》1933 年 4 月 4 日第 7 版。

对于中共而言，关于儿童节的纪念活动，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开始。不过当时中共所纪念的儿童节不是“四四”儿童节而是时间为四月一日的共产主义儿童节。如 1933 年 4 月 1 日，在苏区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期间进行了儿童团大检阅，这一检阅活动也有着深层次的意义，即纪念军事反围剿行动的胜利。“这一盛大检阅的举行是正在我们百战百胜，英勇无敌的红军得到空前大胜利。开始全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与四次围剿的时候，具有着极伟大的意义。”[1]这些纪念活动饱含着鲜明的战斗性，激发人们奋勇战斗的信心和意志。因此在活动报道中还提到，“中国共产党须用一切力量去保证无产阶级在国民党中国为群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为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加强苏维埃运动，巩固与加强苏维埃红军。把苏维埃运动与国民党统治下群众反帝斗争的联系起来。”[2]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所纪念的儿童节是一种自身政党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儿童节，并且在其认识中不再强调少年儿童是弱小、需要保护的对象，而是将少年儿童群体作为反帝运动的重要有生力量，给予少年儿童更多责任担当，呼吁少年儿童积极投身革命战斗，了解当时的国情形势以及清晰认识自身在反帝运动中的地位。诸如此类的儿童节纪念活动其本质来讲是一种政党话语的宣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了二次合作，中共在这样的背景下放弃了对原有儿童节的纪念，开始弱化自身政治体系中的节日，转而选择与全国各地相一致，公开纪念“四四”儿童节。同时，中共也对新时期如何关心少年儿童群体以及如何开展儿童工作有了新的认识。1940 年刊发的《纪念儿童节和儿童工作的新任务》对其进行了细致说明：

> 首先，我们要把已有的儿童团体扩大和普遍，加强其组织，促进其独立活动，使它们能够积极地参加抗战动员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将会锻炼出千百万优秀的青年战士。为了使儿童团体广泛发展，为了使儿童工作迅速展开，应当注重培养大批儿童工作干部，使他们成为这新的革命一代的有力骨干。
>
> 其次，要求政府和各界人士扩大抢救难童和保育儿童的工作，并把这工作深入到战区，沦陷区及一切乡村角落去。全国保育会应更加强自己的工作，使它成为一切颠沛失所的儿童的温暖怀抱。
>
> 最后，全国男女同胞应有一坚决转变。过去对儿童工作的冷淡漠视态度应该扫除，某些对儿童打骂压迫的旧习应该根绝。特别是妇女同胞和女共产党员应把保育儿童培养民族革命后代看成自己神圣的职责。儿童教育尤应当注意，加强他们仇恨和反对日寇汉奸，争取民族解放的决心。
>
> ……
>
> 把每一个儿童都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每一个儿童都解除了旧时代的枷锁。全中国各地都应该以此为模范，发展儿童的抗日思想和天才。[3]

从中不难看出，中共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儿童工作有着自身的认识，这些无疑都得

1　爱萍：《“时刻的准备着!”——关于儿童团第一次大检阅的通信》，《红色中华》1933 年 4 月 8 日第 5 版。
2　爱萍：《“时刻的准备着!”——关于儿童团第一次大检阅的通信》，《红色中华》1933 年 4 月 8 日第 5 版。
3　《纪念儿童节和儿童工作的新任务》，《新中华报》1940 年 4 月 2 日第 1 版。

益于一段时间以来以陕甘宁边区为主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在儿童工作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中共从组织建设到干部培养，再到儿童福利的设计，一项项安排中体现出对少年儿童的日益重视。一方面体现了中共对少年儿童的关心关怀，使其在少年儿童心中构建起中共的光辉形象，加深了对中共的情感认同；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培养少年儿童，使其成为革命的新生力量。

（二）陕甘宁边区儿童节的发展历程

陕甘宁边区的儿童节也并非一蹴而就，其真正体系完善发挥带动辐射功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中共领导下，社会治安不断稳定，各项保障措施逐渐健全，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提升。尤其是针对少年儿童的保育工作日趋完备，使得少年儿童的成长环境有了极大地改善。为了增强少年儿童的幸福感，并且使得少年儿童得到特别重视，故此中共以儿童节为契机，举办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集会活动，让少年儿童拥有一个意义特殊的欢愉时刻。每年时值“四四”儿童节临近之际，边区各地纷纷安排专门人员来筹备儿童节事宜，并且在临近儿童节之时，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通过分析多年的报道，可以明显看出中共对儿童节活动的筹备，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来讨论。

1.初级阶段

最初关于儿童节的相关纪念活动以纪念大会为主，辅之以运动会、电影放映等文娱活动。如1939年在安塞白家坪举行了儿童节纪念活动，与会的儿童和受邀嘉宾共有数百人。而且在纪念活动举行时，还举办了儿童运动会，开展了游艺演出活动，场面非常热闹。[1] 1940年的儿童节纪念活动，除了常规的运动会、节目表演之外，还举办了政治测验与座谈会，并且在活动最后进行了电影展映。

从中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在最初纪念举行儿童节纪念活动时，活动整体较为常规，以儿童集会为主。其目的在笔者看来明显是为了增进儿童之间的情谊，如《新中华报》的报道便提到，“这是边区各地孩子们的大汇合——为过去所没有的，他们彼此以生疏的孔、却握着最亲切的纯真的孩子的热爱的小手，亲密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几百颗小小的心灵被溶化到一个大的团结的怀抱里。”[2]就基本情况而言，这一阶段的陕甘宁边区儿童节更多的是在强调节日本身对于少年儿童的价值，呼吁对少年儿童这一群体应给予专门的关注。

2.成熟阶段

1941 年后，中共对儿童节及儿童的重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动员少年儿童这一群体非常符合中共广泛动员群众的政治宣传策略，所以把儿童节纪念活动作为重要的展示渠道。并且在此基础上，儿童节纪念日趋规范并且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活动组织方面，与早期的儿童节纪念活动较为随意不同，1941 年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儿童节进行相关活动时，均会对机关、学校等各级组织做出相应的要求，以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活动安排方面，儿童节除了一些常规活动之外，陕甘宁边区政府会根据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形势安排对应的措施来体现当年度儿童节纪念活动的特色，发布一些指导性质的措施，来整体引导边区政府儿

1 《安塞白家坪儿童节纪念大会》，《新中华报》1939 年 4 月 16 日第 3 版。
2 叶澜：《四四儿童节纪念大会特写成立了儿童营》，《新中华报》1940 年 4 月 12 日第 4 版。

童工作的基本方向。活动内容方面，如“军事训练演习”、“选举模范勤务员”、“提倡劳动美德”等都是对中共制定的儿童发展方针的稳步推进，从这一点也看出陕甘宁边区儿童工作的稳步有序发展。

1941 年，在筹备第十届儿童节时，筹委会从组织建立到优待儿童等多方面制定了详实的措施。“（1）请求边区政府通信各机关，学校，部队，以及其他团体，国营企业商店，于四月四日一天给儿童休假一天，送儿童礼物及饭餐，领导全国儿童参加儿童大会和儿童晚会；（2）请各公营企业，合作社，商店于四月四日对儿童购买东西一律优待；（3）举行纪念大会，儿童军事演习，体育游戏表演；（4）延安儿童团总团，亦于‘四四’正式成立，并发表告全团小朋友书，号召新少年；（5）建议各类学校、部队、工厂，于四月四日赠送儿童礼物，并派人领导儿童参加纪念大会及儿童晚会。”[1]从中可以看出，陕甘宁边区的儿童节纪念活动在执行力度上的坚决，以政治机关、国营企业、学校、部队、工厂等发挥带头效应来拥护儿童节及其相关活动。纪念活动日趋规范，一些关乎少年儿童切身利益的优待也更为实际，甚至还有诸如对儿童自主购买物品的专门优待，这一举动明显是在锻炼少年儿童自主生活能力，为其日后成为“新中国的小主人”做准备。

1942 年的儿童节纪念活动筹备时，同样也确立了一些工作内容，不过除了常规的纪念晚会及运动会之外，本年度的儿童节活动重点在于围绕少年儿童的各类展览活动。如“（2）举行四四展览会，有儿童照片、刊物、剧作等；（4）群众婴儿健康比赛；（5）选举模范勤务员。又延安少年团准备在儿童节检阅队伍并举行讲演比赛。最后并决定参加蒋夫人在重庆举行的‘四四’全国儿童作品展览会。”[2]此外，在 1942 年的儿童节庆祝大会上，还为边区的儿童图书馆、儿童之家等进行了揭幕，还在八路军大礼堂内观看了苏联电影揭幕《马戏团》及边区儿童生活。很明显的是，1942 年的儿童节活动突出对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面貌的展示，不仅有展览会等静物成果，还有诸如演讲比赛、健康比赛等动态的展示，总的来看，该年度儿童节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显得活泼，也正是这样丰富多彩的儿童节纪念活动聚集了近千名少年儿童来参加。[3]在笔者看来，本年度儿童节纪念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中共在筹备儿童节时逐渐从儿童的出发点去开展相关活动，通过展示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的生活状况，来真切反映边区政府优待儿童的基本态度。

再到 1943 年儿童节纪念活动愈发突出保障少年儿童的基本权益，更加强调陕甘宁边区儿童的自主能力。筹备会议决定当年的儿童节纪念活动时就安排，“（1）发动儿童普遍种牛痘；（2）进行儿童生产教育，提倡劳动美德；（3）组织学生劝学；（4）在‘四四’召开儿童杂物交换大会及娱乐会。”[4]至 1944 年，儿童节纪念活动期间，边区儿童还向广大群众展示功课、游戏、劳动等多项技能成果。[5]无论是生产教育、杂物交换大会、或是功课、游戏、劳动等技能的展示，其实质是少年儿童自主生活、工作能力的养成，在儿童节纪念活动中对

1 《纪念儿童节筹备会决定五项工作》，《新中华报》1941 年 3 月 31 日第 3 版。
2 《“四四”儿童节——延市各界筹备纪念》，《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18 日第 4 版。
3 《延市千余小朋友，热烈纪念儿童节》，《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5 日第 2 版。
4 《本市筹备纪念儿童节》，《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21 日第 2 版。
5 《延安市机关 筹备纪念儿童节》，《解放日报》1944 年 3 月 29 日第 2 版。

此进行专门强调也是在有意识地培养少年儿童各项技能的养成。这也是儿童节设立的真正意图，不是为了纪念而过节，而在于通过节日的庆祝进行引领宣传，培养少年儿童在未来成为“新中国的新主人”的能力。

在持续儿童节纪念活动举办多年后，1946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则答读者问，即对“儿童节的历史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这在笔者看来是对陕甘宁边区长期以来积极筹备举办儿童节的一个很好的诠释。“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原由中华慈幼协会所发起。该会于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七日是请当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转呈国民政府批准，由国民政府筹令教育部设定纪念办法，通令各地施行。该节日的意义，据发起者说是为了鼓舞儿童兴趣，启发儿童爱国爱家属的心理，并唤起社会关注慈幼事业。近几年来，我们解放区也举行儿童节，不过其意义已经和一般的不同，在我国解放区以外的各地，很多儿童贫苦没有依靠，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至于解放区，在民主政府的抚育下，则大多数儿童都已经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都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其意义不仅在我们把儿童保育工作、儿童教育工作做得更好，还要广泛宣传解放区儿童的生活，要求在全国实行民主，使全国儿童都能像解放区儿童一样过着愉快幸福的生活。”[1]这一回答，一方面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围绕儿童节活动开展，多年来所做出的各项努力，另一方面也留下一个愿景，即希望全国的少年儿童也能够向陕甘宁边区的少年儿童一样茁壮成长，成为新中国的生力军。

总体而言，陕甘宁边区对儿童节纪念活动的重视，在一定意义上也展现了中共对少年儿童作为“新中国的小主人”的身份认可以及在培养少年儿童不断成长过程中，所付出的积极努力。

三、新少年的养成：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事业

1938 年 6 月，为了帮助少年儿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茁壮成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儿童》报。毛泽东亲自为创刊号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2]其中不难看出中共领导层对少年儿童问题的深刻认识。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少年儿童工作以及在其日趋成熟完善时，积极举办的儿童节纪念活动，从一个发展视角而言，便是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事业的基本呈现。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对少年儿童寄予了殷切期盼，并且将其作为抗战动员力量的重要组成和构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生力军。因而在这一脉络中探究中共领导下少年儿童事业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便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

（一）“新少年”意识的养成

对于中共而言，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支持和鼓励儿童参与日常工作事务，还是积极筹备“四四”儿童节各类纪念活动，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通过对少年儿童给予充分重视，使得少年儿童能够在历练中成长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有意识地促进其“新少年”意识的养成。如在 1941 年儿童节纪念大会的发言中，就阐释了少年儿童的使命和担当，“我们是纯洁天真的儿

1 《儿童节》，《解放日报》1946 年 4 月 1 日第 4 版。

2 中央团校少年工作干部训练部编：《论少年儿童和少年儿童工作，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年，第 43 页。

童，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们要努力学习。努力锻炼身体，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斗争，我们共同高呼。”[1]“革命的后代”的身份定位以及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斗争”的奋斗目标，反映了少年儿童扮演的历史角色，这也对少年儿童提出颇高的要求。而“新少年”意识养成的途径最主要的是解决少年儿童的思想问题，让少年儿童在思想层面彻底进行转变，从而达到真正的解放，并且以“新少年”的身份参与陕甘宁边区的各项建设事务。

（二）“新中国小主人”的培养

除了帮助促进少年儿童“新少年”意识的自觉养成，中共重视儿童节纪念活动以及儿童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在抗战的总体背景下对少年儿童群体的整体思考。中共对革命事业的前景充满信心，所以在很早就开始考虑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任务，这是陕甘宁边区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重要原因，而且不满足于让少年儿童能够健康生活，中共方面有意识地培养少年儿童逐步成为“小主人”角色，以便其能够在未来担起革命事业的接力棒。所以中共在整体布局中为儿童创造极大的便利条件。如《解放日报》就刊载文章强调，“我们是不愿想像在新社会里，还是一批身体和我们一般孱弱的主人翁。……儿童保育和儿童教育这两个工作应该进行科学的研究及分配有经验的，有学识的，有能力的干部去领导。同时，为儿童而工作应成为每一个革命者不可卸却的责任，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工作，就是为着后一代儿童的幸福。特别是希望优秀的医药工作者，文化人，教育家能拿出一部分来为儿童而工作，即使是只医治一两个小孩，只写作一两本儿童读物，只创办一所好的学校，对儿童，也就是对革命，那是贡献了应尽的力量！”[2]其中强调将儿童工作的重要性与革命者的责任相结合，为后代儿童谋幸福，积极培养“小主人”。

而且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儿童工作实践中，也将少年儿童放置在一个极高的政治定位。“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志注意我们的后一代，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态度，不注意后一代是我们的罪过，一个不注意后一代的社会是快要死亡的社会。”[3]足见其在中共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中共也始终对陕甘宁边区儿童事业的发展充满信心，展现出克服困难的坚定决心。何其芳在为儿童事业积极工作时曾深情地讲到，“虽说处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之下，许多问题难于得到很圆满的解决，我们是革命者，我们应该能够使那些原来不存在的出现，弯曲的变直，萌芽的开花。”[4]这或许是中共在儿童事业实践过程中最真实的写照和认识。

（三）时代的感召：对全国青年朋友的召唤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在少年儿童工作以及少年儿童福利保障方面有了明显的成效，使得陕甘宁边区少年儿童的生存发展环境有了较大改善。而且经过多年的持续影响下，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根据地的标杆对全国都有辐射影响。1947 年，国民党情报部门多次反映国统区青年出现私自前往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事件。中共在重庆的职业青年社进行

1 《延安纪念第十届中国儿童节告全国小朋友书》，《新中华报》1941 年 4 月 13 日第 4 版。
2 童大林：《纪念儿童节》，《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4 日第 4 版。
3 柳湜：《注意我们的后一代——纪念四四儿童节》，《解放日报》1943 年 4 月 4 日第 4 版。
4 何其芳：《为孩子们工作》，《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4 日第 4 版。

活动，“出版《职业青年》刊物，并调查失业及职业青年，着重争取失业者，诱引赴延安受训。该社社长为王贲良，副社长李翼之，经理为冯万一。现正受中共四川省委会之指示，办理‘延安大学’重庆招生事宜。王、李二人连日皆至各校联络中共学生.准备在各校挑选左倾青年五十八人，由该社出函介绍并由中共省委会发给旅费，由各生利用自己私人关系选择路线设法赴延云。”[1]在北平天津地区则也出现了青年想尽办法前往解放区的事件，“平津一带青年原希望和平迅速到来，能有安定生活可过。不料国民党竟准备长期战争下去，且关闭和平之门，直置华北人民死活于不顾，青年学生激于义愤，纷纷准备向中共区投效，以打击国民党之坏政府。”而且仅仅在暑假期间前往解放区的青年便有五千余人。[2]借助这些材料，可以通过国统区青年的选择从一个侧面了解到陕甘宁边区为主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少年儿童事业的深远影响，中共领导下长达十年的儿童事业对青年的选择起到了宣传、吸引、动员的实际作用。

此外，陕甘宁边区的少年儿童事业对于建国后的少年儿童工作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参考的作用。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斌在建国后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在最近这个时期内，我们培养教育新的一代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无论在老解放区和新解放的地区，在少年儿童工作上，进行了新知识的教育，推动了小朋友们思想的进步。”[3]在本次大会上，青年团中央少年儿童部部长何礼也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国少年儿童的组织，在党和团的领导下，曾经积极参加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起着一定的配合作用。在大革命时代、土地革命时代、抗日战争中及人民解放战争中，劳动童子团、儿童团、青抗先等少年儿童组织都会担负一定的政治、军事及生产任务，如站岗、放哨、送信、除奸防谍、查禁烟赌、破除迷信及进行宣传活动辅助生产等，协助苏区、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农村的人民，进行对敌斗争和生产斗争，得了广大人民的赞许。”[4]在其工作总结中，不难看出对陕甘宁边区等老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下少年儿童事业的充分认可，这也是建国后儿童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要基石。

总之，中共在开展的少年儿童工作和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儿童节纪念活动其本质都是中共革命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革命力量培养及革命宣传方式扩大的积极探索，更是对自身革命实践道路的坚定自信。

余论

邓颖超曾撰文写到，“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续，是我们下一代的国民。所以，

1 《教育部关于中共在渝组织“职业青年社”争取各校青年学生赴延安应依法取缔代电》，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3编 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7—168页。

2 《詹明远关于苏联驻天津领事多洛非也夫向驻华大使馆报告平津将有大批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密报》，选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3编 教育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3 冯文斌:《培养教育新的一代——在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选自中国少年儿童社编:《培养教育新的一代 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文献》，北京：青年出版社，1950 年，第1页。

4 何礼:《少年儿童队工作报告》，选自中国少年儿童社编:《培养教育新的一代 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文献》，北京：青年出版社，1950年，第7页。

儿童的问题，是一个有关社会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应该得到社会与国家极大的关怀和重视，是需要及时采取一些必要的设施的。”[1]这一论述可以说是抗战时期中共积极重视少年儿童原因的高度总结。自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进入稳定发展期后，以少年儿童工作及儿童节纪念活动为主的少年儿童事业便一直是中共的重点工作，在各个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结合少年儿童日常生活，开展对少年儿童的积极动员策略，达到培养少年儿童政治人格、强化少年儿童对中共政权的政治认同、进一步稳固政权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动员更广泛的群众群体参与到抗战实际行动中来，从而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实现。

同时，少年儿童参与陕甘宁边区相关工作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因此无论是陕甘宁边区的儿童教育、日常生活还是儿童节的各种纪念活动，都被赋予了诸多政治内涵。也正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一批旧社会出生的少年儿童经历了思想与实践的双重改造，逐步完成了“新少年”“小主人”的身份蜕变，最终成长为“新中国的小主人”，成为了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作者简介】洪艺华，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抗战社会史、陕甘宁边区文化史。
电话：18829286235
邮箱：2225017203@qq.com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 620 号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音乐文化建设及其历史贡献研究”（编号：19BD050）阶段性成果；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陕甘宁边区日常生活研究”（编号：20XZS024）阶段性成果】

1　邓颖超：《保护儿童》，选自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内部资料，1985 年，第 345 页。

为抗日救亡鼓与呼：延安时期《新中华报》对民众抗日救亡活动的宣传报道

杨江南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目前学界对《新中华报》展开过一些研究，但对于从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报道的角度来研究《新中华报》的文章却很少，因此研究《新中华报》是如何宣传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些学术成果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研究方向：第一，对《新中华报》的创立过程、背景介绍、发展沿革等内容进行研究；第二，对《新中华报》报道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某一类别着重精细研究；第三，对《新中华报》与某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关联研究。本文尝试在学界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新中华报》中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报道进行探讨。

一、“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一）在艰难中前行，在曲折中生存

1931 年 12 月 11 日，《红色中华》创刊于江西瑞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西安事变后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7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向仲华任社长，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博古任社长。一开始，《新中华报》的编辑部设在延安南门外西山上的三孔窑洞里，后搬迁至清凉山上一孔大石窟，此时，日军多次出动飞机野蛮轰炸编辑部驻地，曾一度炸平编辑部前一座大庙，每次轰炸前，向仲华带领工作人员将设备转至大石窑洞，就其阴谋并未得逞。初始时，编辑只有向仲华一人，后来，毛泽东批准由中央组织部调张林生、岳虹、王发泰、陈英等人到新华社搞外文译电工作，新华社的组织才略具雏形，具有翻译部门、编辑采访部门、通讯网和分社组织，以及保证需要的印刷机构。[1]

《新中华报》初始还是沿用白报纸、油印，油墨来自延安石油厂油矿的废渣油燃烧提取出的烟灰，后与国民党合作成功，得到国民政府的经济资助，所以正式改用铅印。[2]1937 年 1 月 29 日至 1941 年 5 月 15 日期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愈加强烈，全国抗战形势也随之高涨。《新中华报》的改革在抗战新时期，为中共中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长期合作和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应尽天职。

1 向仲华：《对越自卫还击战最高指挥官》[N]，《中华网》2016 年 1 月 26 日。

2 林绪武：《<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N]，《人民政协报》，2021 年 5 月 20 日。

（二）抗日救亡宣传的特点

《新中华报》在其存续的四年多时间里始终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使命，鼓舞社会各阶层抗日救亡运动，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中华报》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时效性、内容重点层面及目的性三个方面。

注重宣传报道的及时性。1940 年 8 月 20 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有 105 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8 月 30 日“这一‘百团大战’的战役还正在开始，它还要向着原来计划的方向大大地展开起来。我们庆祝已得的伟大的初步胜利，我们盼望着全国的将士们积极动作起来，配合这战役的进行，争取各线上战役战斗的胜利，粉碎日寇新进攻的企图。”[1]9 月 8 日“我军百团大战展开，连日敌自豫北抽兵北上，交通络绎不绝，同时各地敌军接获失利消息后，大起恐慌，伪政权之汉奸大多逃亡，敌伪组织多数瓦解”[2]紧追时局动态，注重宣传的时效性。

重点突出中共中央政策宣传。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告知社会。1939 年 8 月 25 日，“中共今天只有一个目标：团结一切抗日党派和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绝没有什么‘阴谋野心气中国共产党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实于民族的利益，是举世皆知的事实’。”[3]又如，《新中华报》不断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反共行径，1939 年 2 月 25 日第 6 号专论《防共即是助敌灭华》，1939 年 3 月 31 日第 17 号第一版社论《破坏团结的份子应当受到处分》，1939 年 8 月 25 日第 58 号《要求明令取消“防制异党办法”》，1939 年 12 月 30 日第 93 号第一版《朱彭总副司令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1040 年 2 月 14 日第 104 号第一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40 年 2 月 17 日第 105 号《郧县的大暗杀案》，1940 年 4 月 8 日第 120 号第一版社论《加紧团结反对枪口对内》，1941 年 1 月 31 日第 200 号第一版社论《拥护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1941 年 3 月 20 日至 30 日，第 214 号、215 号、216 号、217 号连续 4 期报道《十年来何应钦卖国通敌破坏抗战罪行的总清算》，1941 年 4 月 17 日第 223 号《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

广泛团结社会各阶级。《新中华报》本着中共中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全民族抗战力量努力积极的动员尽绵薄之力。“去团结一切坚决抗日党派军队团体和个人，同时对于凡非坚决投降与非坚决反共反人民的人都要争取和团结他们”[4]。《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共产党的十大任务第四条“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律的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的自卫原则[5]。《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

1《新中华报》[N]，1940 年 8 月 30 日头版。
2《百团大战展开迅速敌大起恐慌》[N]，《新中华报》1940 年 9 月 8 日。
3《要求明令取消“防制异党办法”》[N]，《新中华报》1939 年 8 月 25 日。
4《团结抗战》[N]，《新中华报》1940 年 7 月 16 日。
5《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N]，《新中华报》1940 年 2 月 3 日。

军民为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克服这些危险与困难而斗争”[1]。《新中华报》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以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发展共产党组织，尽可能地发动革命的民众运动，大力建立进步团体，争取广大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而广泛团结社会各阶级。

（三）“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新中华报》主要改版的目的在于“以期有利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伟业，以期有助于增加抗战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的大计，以期在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华民国的伟大斗争中，贡献绵薄的力量。”[2]

1937 年 1 月 29 日到 1938 年 12 月 25 日，改版后的《新中华报》服务服从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局，积极宣传报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报道抗日战场军事情况，宣传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等。第一版集中于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陕甘宁边区具体行动纲领，以战局动态、战局形势、政情、社论等为主；第二版主要报道国际形势，以国际内容、专载专论、边区短讯等内容为主；第三版集中于战地内容、小评、延安短讯等内容；第四版为副刊，边区文艺、边区文化，青年呼声，工人之路，经济建设等内容。[3]

1939 年 2 月 7 日《新中华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毛泽东评价《新中华报》“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其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二，在民主政治下创办。《新中华报》的“好”体现在内容上的充实，紧跟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形式上的灵活性、多样性、大众性，更体现在与宣传对象的直接交流。[4]1939 年 2 月至 1941 年 5 月，《新中华报》除延续前期的办报风格外，报道内容逐步增多，主要内容为：第一版阐述中共中央政策主张的社论、代论和专论，国共两党及其他抗日组织战绩；第二版“三日国际”主要报道有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专论或消息；第三、四版介绍宣传陕甘宁边区政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情况。“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 1939 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毛泽东认为，《新中华报》1940 年的政治方向是强调团结与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二、“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与提升民众抗日救亡思想意识

《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之一，同时，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新中华报》详细宣传报道各阶级民众抗日救亡活动，青年救国会、边区抗敌后援会、文艺届、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其他阶级民众抗日救亡活动报道。

1《纠正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N]，《新中华报》1940 年 8 月 13 日。

2《新中华报改革的意义》[N]，《新中华报》1939 年 2 月 7 日。

3 杨小川：《<新中华报>介绍》[J]，《抗日战争研究》，1997 年第 1 期。

4 林绪武：《<新中华报>：“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N]，《人民政协报》，2021 年 5 月 20 日。

时间: 年 月 日	文　章
1937.02.03	延安市青年救国会开代表大会
1937.02.13	召集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决定
1937.02.13	召集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宣告
1937.02.16	召集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口号
1937.04.13	西北青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1937.04.16	陕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开幕
1937.02.09	合水县抗日救国团体抗日武装迅速扩大
1937.03.03	西救办事处成立
1937.03.23	救亡宣传队工作经过
1937.04.09	盛况空前的淳化抗日代表大会
1937.05.23	在提高苏区文化教育声中延安市新文字促进会成立
1937.05.26	延安市抗日救国会召开指委会
1937.06.23	谁不念书就要做亡国奴
1937.08.02	八一抗战动员大会开幕
1937.09.19	定边回民百余人自动成立救国会
1937.10.09	延长市抗敌后援会成立
1937.11.24	特区文协成立大会记（徐行白）
1937.11.29	延安各界妇联会正式宣布成立
1938.01.10	边区音救协会将成立 合水学生成立抗战团
1938.02.05	边区抗敌后援会成立
1938.02.20	边区抗敌后援会举行第一次执委会
1938.03.10	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意义与工作
1938.03.30	边区青救会各级的紧急指示信
1938.04.15	青救与统一战线 纪念西北青救成立一周年
1938.06.15	迎接边区青救代表大会 关于十三团体被解散
1938.07.10	延安市各界民众抗战周年纪念大会宣言
1938.07.30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为召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通电
1938.08.10	西北青年救国会告全体会员书
1938.09.20	陕甘宁边区教育通令-关于冬学问题 我们的“文联”成立了（林茫）
1938.09.30	祝边区青救代表大会开幕
1938.10.20	被拘青年的呼声
1938.11.10	祝青记学会延安分会成立
1938.11.10	纪念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
1939.02.13	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宣告成立 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正式成立
1939.03.13	文协组织创作生产委员会
1939.03.19	西青救组织 战地工作考察团出发
1939.03.25	延安文化界举行座谈会
1939.03.25	老百姓和军队
1939.03.31	边区文协召开文化团体联席会
1939.04.13	西北青救会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的决定

1939.04.25 介绍几个边区妇女故事
1939.04.28 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
1939.05.07 延安各界青年万余人举行纪念五四廾周年纪念
1939.05.13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关于颁发荣誉奖章的决定
1939.05.16 鲁迅艺术学院热烈庆祝周年纪念
1939.05.30 西北青年救国会举行模范青年大会
1939.05.30 抗大三周年特辑
1939.06.02 延安青记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
1939.06.02 边区少先队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9.06.02 农村文化改进会
1939.06.06 模范青年给奖大会
1939.06.09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
1939.06.30 边区青救会召开第二次指委会
1939.06.30 青联与西青救设立共同军事部
1939.07.21 西青救等函世界学联举行三全代会
1939.07.25 西青救设立延安工委会社会服务部
1939.08.18 加强边区学生团结统一全国学运边区学联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9.09.01 国际青联的历史与意义（刘光） 张伯伦慌了（邓洁）
1939.09.08 延安市国际青年节纪念大会给日本青年的信
1939.09.15 本市召开国际青年座谈会
1939.09.26 本市特开欢迎晚会国共两党同济一堂举行文化界座谈会
1939.10.17 各地军民团体纷纷讨汪 军民合作互助警备团冬衣解决了
1939.10.20 起来全边区的同胞们！援助香港反汪工友
1939.11.18 加强边区文化工作文协将召开代表大会
1939.11.29 各县民众激烈缴纳救国公债
1939.12.09 抗战剧团全体成员加入宪政促进会 山脉文学社定期召集社员大会
1940.01.10 庆祝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开幕
1940.01.13 本市各界回民发起组织回民救国协会
1940.01.17 社论-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成就
1940.01.20 文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莅临致辞
1940.01.31 边区各工厂工友发起出版“中国工人”
1940.02.03 万众振臂怒吼声中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
1940.02.07 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庆祝“中国工人”出版（康生）
1940.02.14 延安青记开会员大会 青记学会延安分会反对“日汪密约”通电 泽东干部学校不日开课
1940.03.05 延安回民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
1940.03.12 西北青救会电国民政府讨汪
1940.03.19 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
1940.04.02 鲁迅艺术学院积极筹备二周年纪念
1940.04.19 边区各民族代表欢聚一堂—蒙古文化促进会正式成立
1940.05.14 绥德剧协成立
1940.05.17 西青救等十团体上蒋委员长书

1940.06.18　　晋西文联会发表宣言
1940.06.28　　陕甘宁边区剧协分会召开代表会议
1940.06.28　　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
1940.07.12　　延安各界纪念抗战三周年
1940.07.19　　信仰了，还不是如此（南飞）
1940.07.23　　西青救常委会通过模范青年优待条例
1940.08.06　　延安各界悼念张自忠将军
1940.08.16　　边区学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1940.08.23　　边青救成立工作团深入农村工作
1940.09.08　　全世界青年联合起来
1940.09.12　　留延华侨成立救国联合会
1940.09.22　　西青救致美国青年、法国青年电 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成立
1940.09.22　　延安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
1940.10.03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即将成立
1940.10.10　　陕甘宁边区回民代表大会闭幕
1940.10.20　　回救边区分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同时闭幕
1940.10.24　　青记延安分会贺信百团胜利
1940.10.24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关于扩大延安市青救的决定
1939.10.31　　新教育学会成立 延安县讨论冬学工作
1940.11.17　　新文字协会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关中分区筹备成立文协分会 青联共组团下乡工作
1940.11.20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盛况
1940.11.28　　本市青联正式成立
1940.12.05　　延安青年运动新阶段
1940.12.15　　边青救组织文化工作团建立农村文化支点
1941.01.09　　文抗延安分会举行年会
1941.01.23　　陕甘宁边区文字协会关中分会成立大会
1941.02.20　　西青救、青联、民先电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
1941.03.09　　老百姓不答应（邓洁）
1941.03.23　　西青救民先等团体电贺美国青年大会
1941.04.20　　人间地狱-西北青年劳动营
1941.05.01　　五一劳动节纪念特刊
1941.05.08　　延安各界举行纪念五一五四群众大会
1941.05.08　　今年的五四与中国青年
1941.05.11　　延安各界五一五四纪念大会盛况

（一）青年救国会抗日救亡运动

1937 年 2 月 3 日，延安市召开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同年 4 月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全国青年救国纲领》，制定《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全国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前，为全国各地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1938 年 10 月西青救在延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和影响下，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西北青救会抗日救亡运动在愈演愈烈。“西北青救会两

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的决定，关于本会两周年纪念与动员周工作有以下决定：（一）在今年本会两周年纪念之日，正是我国抗战进入更艰难斗争的时候，敌寇开始大规模的‘扫荡’华北游击队，残酷的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大批敌机每日不断的狂炸西北各地，准备进攻西北，鄂中突告紧张，更剧烈的战斗已迫在眼前了。同时，从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青年运动虽受某些无理的限制。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但，由于抗战的坚持和广大青年的努力，中国青年运动仍然向前发展……”。[1]并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领导全国青年救国运动的机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救会动员和团结广大青年参战，支援前线，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开展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推行文化教育等工作。

（二）边区抗敌后援会抗日救亡运动

1938 年 1 月，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成员包括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会、边区农民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等 26 个群众团体。代表大会选举毛齐华、马豫章、任耀国等 21 人为执行委员，吕骥、朱光为候补执行委员。下设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农民部、职工部、青年部、妇女部、武装动员部、锄奸部、商民部。[2]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先后受陕甘宁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西北局领导，下辖三边分区、陇东分区、神府特区抗敌后援会和直属县的抗敌后援会。毛齐华、唐洪澄先后任主任。1943 年，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1939 年 6 月 6 日，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致电《边区党政军民联合致电慰问贺师长》，表达亲切慰问，并表示为他们做好后盾。1939 年 7 月 11 日《边区抗敌后援会致林主席蒋委员长电》“惟汪逆党徒，仍在各地进行活动，或倡言反共，以破坏团结，或隐主妥协，以危害国策，尽种种方法，为汪逆内应。甚至少数人士，亦为谬论所惑，日以制造摩擦……”以表示对汪伪政权大肆破坏团结而愤。

在抗战动员方面，边区抗敌后援会代表各群众团体出面进行统一的组织领导，开展活动。第一，抗战动员工作，动员群众参加自卫军与少年先锋队、帮助组织战时组织、交纳救国公粮、募捐慰劳前方将士、组织拥军及优待抗属；第二，宣传教育工作，奔赴各村镇深入宣传，指出宣传工作的中心是提高群众对抗敌的认识，积极参加各种动员工作；第三，推动战时经济建设，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政府关于战时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号召；第四，改善人民生活，保护群众利益。[3]

（三）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1939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第一，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下的妇女部与妇女运动委员会；第三，动员全党女干部与女党员担任妇女工作；第四，注意女党员的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第五，根据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关于“三八妇女节”及一般妇女工作的指示，做好妇

1《西北青救会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的决定》[N]，《新中华报》1939 年 4 月 30 日。

2《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 年。

3《延安时期大事记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

女工作。[1]“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自一九三九年三八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转变妇女工作以来，前年在全党内造成了对妇女工作从忽视到重视的思想转变，并奠定了关于妇女工作的组织基础，去年一年的主要成绩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及陕甘宁边区内妇女组织已扩大成包括广大妇女的群众团体；在抗日动员、生产、学习、工作各条战线上涌现出许多新的妇女干部；在保护母亲儿童工作方面，已引起一般的注意并得到初步的成绩……”[2]1940 年 2 月 14 日，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电蒋议长致敬，表示愿追随全国妇女先进和全国同胞之后，促进宪政实施和保障妇女在宪政中特殊权利而奋斗。

《新中华报》中报道边区妇女运动甚多，基本任务在于：第一，使妇女运动和整个民族救亡运动统一起来，成为整个民族运动的一部分，配合各种救亡团体，坚决为保卫边区、西北、全中国而奋斗；第二，发动边区妇女群众积极开展紧急的抗战动员工作，使边区的妇女运动成为全国的先进地区，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助推机。

三、“民族呼声日益高涨”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

《新中华报》1937 年 1 月 29 日至 1941 年 5 月 15 日期间，中日矛盾日益加剧，《新中华报》及时报道各阶级同胞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除此之外，《新中华报》连续不断地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呼吁各党派各团体联合抗日，并在这一时期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它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价值意义显得尤其重要。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民族呼声日益高涨

1939 年 4 月 25 日，苏联列宁格勒真理报论报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统一成线的强大人民的团结定能获得光明与完全之解放，“广大民众之有力各阶层，所以能一致起来与日本强盗奋斗者，不能不归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创立也。中国人民依靠其自身力量，及进步人类之援助，确信必能获得最后胜利”[3]；中国共产党对待抗日救亡的宣传，可谓尽心竭力。1939 年 4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一文中提到“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生息休养创造奋斗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日寇侵犯我国，就是要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百分之九十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我们民族需要生存，需要繁荣，需要独立自由和幸福，我们民族首先需要从日寇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不以绝大数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幸福，就决不是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4]“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5]为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充分利用民族革命典型，那些为国捐躯，英勇抗战、勇往直前的壮士，向国内外、前线及大后方，大力宣传；第二，揭露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N]，《新中华报》1939 年 3 月 6 日。
2《西北青救会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的决定》[N]，《新中华报》1941 年 2 月 9 日。
3《中国抗战应归功于统一战线》[N]，《新中华报》1939 年 4 月 25 日。
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N]，《新中华报》1939 年 4 月 28 日。
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N]，《新中华报》1939 年 4 月 28 日。

消极性，例如：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第三，将敌人一切残暴行为公之于众，面向全世界，以提高民族觉悟。

（二）提升民众抗日思想意识，全体民众积极动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最重要的主体就是广大的爱国民众。《新中华报》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使得更广大的民众加入抗日救亡的工作中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救亡宣传工作添砖加瓦。

1939 年 5 月 4 日延安市全体青年庆祝首届青年节大会，这是首次中国青年节，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到 1939 年中国青年节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各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五四的抗日救国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的抗战了。“中国青年节恰巧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两周年。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是西北最大的青年团体，也是最早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团体。它两年来所领导和进行的一切工作，在抗战中间和青年统一运动中间表现了重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延安青年在庆祝中国青年节的时候，更要庆祝我们自己的组织力量的增长！”[1]1939 年 7 月 20 日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话，孟庆树主持。“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2]

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以前，就已向全国同胞号召全民族力量的总动员，以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的总动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根据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上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民族的潜力，“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果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敝，团结一致，以抵抗外寇，则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3]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们党在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我们党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有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最大的努力动员各方面力量，包括对全国人民精神上的动员。1938 年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十五条，第一条就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三）中国共产党威望的提升，为国为民族为人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民主选举，严格推行“三三制”。这不仅实现巩固根据地政权，调动了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榜样”来建设的，边区在全国被称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对全国政治

1《延安市全体青年庆祝首届青年节大会宣言》[N]，《新中华报》1939 年 5 月 10 日。
2《万人庆祝中庄严热烈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N]，《新中华报》1939 年 7 月 25 日。
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N]，《新中华报》1939 年 4 月 28 日。

上的进步来说，起到先锋的推动作用。陕甘宁边区民意机关的健全改选，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模范的树立，将会更加巩固了边区，推动了全国宪政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全国民主政治的基石。“一切工作依照人民的利益和意见去执行，这就须要宣传解释，说服教育，须要真正民主的会议，须要和蔼的态度，须要深入工作，亲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尊重人民的利益和意见。”[1]《新中华报》1940 年 7 月 16 日（146 号）第四版专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2]一文中，对民意机关的重要性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制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阐述怎样进行选举和如何实践。

又如，1941 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成功召开，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3]，为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为目的，出台军事政策，优抗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洁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及外国人政策等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不仅是在陕甘宁边区可以施行，而且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都可施行。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中国共产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正是全边区人民全国人民所深切渴望的”。[4]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颁布指示着全国人民如何抗战建国的道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宝贵的重要的历史政治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之更具体的应用。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民主，把各阶级力量动员组织起来，既赢得了民心，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威望。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要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5]因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新中华报》作为抗战时期民众抗日救亡宣传的喉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爱国主义色彩，渗透着它一种浓郁的民族特质。《新中华报》号召和团结各阶级民众支援抗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扩大，遏制日寇势力的渗透，鼓舞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杰出的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中璀璨生辉。

作者简介:

杨江南（1996.03-），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邮箱：1006324000@qq.com，电话：18992155560

1《改变不民主的工作方式》[N],《新中华报》1940 年 9 月 15 日。
2《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N],《新中华报》1940 年 7 月 16 日。
3《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N],《新中华报》1941 年 5 月 1 日。
4《拥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N],《新中华报》1941 年 5 月 8 日。
5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N],《光明日报》2016 年 2 月 19 日。

从简政到整政：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再研究*

胡杨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941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等 11 人提交的提案是：“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编号为第 81 案）。[1]该提案首先得到毛泽东的首肯。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时，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财政经济方针必须实行“精兵简政，调整人员”和“扩大收支，发展事业”的原则，由此确定了中共“精兵简政”的方针。[2]第二天（即 11 月 18 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审查提案时以 165 票的高票“通过审查意见”。“精兵简政”由此成为中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关于“精兵简政”的问题，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对此政策重要意义的评价和“省思”。第二方面是对该项政策实施过程的剖析。把增强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讨论了该项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普适性问题，如思想的抵触、编余人员安置等等。臧运祜在对陕甘宁“精兵简政”的再研究中讨论了军队精简的问题。[3]笔者在此基础上，从基层政权变化的角度考察“精兵简政”政策，试图厘清该政策在改变基层行政机制，加强基层政权过程中的复杂形态，从而探讨“精兵简政”如何实现从纵向领导到双重领导的变革。

一、双重困难：边区经济问题及政治问题

一般认为精兵简政是要解决边区“鱼大水小”的经济问题，该问题在边区的确存在，尤其 1939 年随着国共军事摩擦的升级和边区党政军机关的扩大与健全，非生产人员所占比例越来越高。1937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 1.4 万人，1938 年也只有 1.6 万人，1939 年因国民党在边区发动摩擦事件和日军进攻黄河，中共中央将八路军 359 旅调回边区，非生产人员突然增加，1939 年上升到 3.9 万人，1940 年 6.1 万人，1941 年达到 7.3 万人。[4]胡乔木把这种非生产人员膨胀的现象称之为“鱼大水小”。与人员增加相反的是，边区的财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骤然减少。其原因一是国民政府不但完全中断了对中共的抗战经费，而且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边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二是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使根据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陕甘宁边区制度史研究”（15ZDB0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副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集》，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43—144 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41 页。

3 把增强的一系列文章包括：《鉴往知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兵简政研究之省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 3 期）、《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中存在普适性问题及其应对》（《史学集刊》2014 年第 2 期）、《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中的编余人员安置——以华北抗日根据地政权简政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3 年第 4 期）等。霍雅琴：《对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的再认识》（《理论导刊》2010 年第 12 期），臧运祜：《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冉启明：《效能——陕甘宁边区简政的突破口》（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7 年第 4 期），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

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00 页。

地的面积日渐缩小，造成“当时正在缩小而且还可能继续缩小的抗日根据地，已经难以维持适应过去敌后抗战猛烈发展的情况而建立的庞大的战争机构”。[1]

面对“鱼大水小”的问题，边区只能通过增加救国公粮的征收来解决非生产人员吃饭的问题。据统计，1937 年征收救国公粮 1.4 万石（每石 300 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 1.27%；以后逐年增加，1938 年 1.5 万石，占粮食总产量 1.32%；1939 年征粮 5 万石，占粮食总产 2.98%；1940 年征粮 9 万石，占粮食总产量 6.38%；1941 年征粮 20 万石，占粮食总产量 13.85%。[2]可见，救国公粮大幅度上升，从每年征收 1 万余石增加到 20 万石，从占粮食总产量 1.27%上升到 13.85%。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说：“这个二十万石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第一，它说明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比一九三七年只占百分之一点二八，增加了十多倍。第二，它说明每人平均负担已达一斗四升，比一九三七年只负担一升，也增加了十多倍”。[3]

从全面抗战初期缴纳少量的救国公粮到将收获粮食的 13.85%缴纳救国公粮，一方面，在经济上的确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在农民心里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曲子县报告：“本县八珠区三年歉收……老百姓生活痛苦不堪。全区七五七家，五六四八口之众，仅有一二〇家，一三九六口暂能维持，余皆目无办法，粒粮不存，每天仅食两顿榆皮、草根稍合米面之饭，每天仅食两顿榆皮草根稍合米面之饭。其中有一八一家，八九四口，家徒四壁，束手无策，尽食树皮草根，离家乞丐者二十三人，全家搬走者五家。此种情状，牲畜农具尽都出卖。更痛心的是出卖人口度用……赵满寿一儿一女换粮一石二斗，现在又仍无粮吃。此种情形，已成普遍现象”。[4]安定县“有很多群众对公家买粮尚缴不出来，很多区有三分之一人民只吃糠、野菜、稀饭，而公债、收羊毛税又快开始。解释工作不好[做]，有些抱怨公家”。[5]一些从国统区移来的难民也因边区负担过重，又搬离了边区。群众中蔓延着对中共的不满情绪，庆阳县在购粮时，城内出现了“无名揭帖”，发出对中共的极端不满。[6]特别严重的不满发生在边区的政治中心延安。1941 年 6 月 3 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中身亡。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一九四一年征二十万担，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7]此事对中共领导人触动极大，毛泽东后来对边区不顾人民生活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他说：“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与军队的需要，

1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6 页。
2 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历年农业负担基本总结》1949 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文简称“史料摘编”）》第 6 编《财政》，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5 页。
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501 页。
4 《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令减发曲子县公债募集数额》1941 年 5 月 16 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3 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1 页。
5 安定县督运分会、边府运盐工作团：《安定县政府第一次运盐总结报告（节选）》1941 年 7 月 1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4 辑，第 72 页。
6 《王维舟给边区政府林主席、高书记等的信函》1942 年 1 月 2 日，甘肃省档案馆藏，档案号：陕 2-5-54。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3-304 页。

竭泽而渔，诛求无己。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1]因此，如何解决财政问题，减轻群众负担，消弭群众的不满情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边区政府很快制定了“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政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给财政和行政上带来了“极端混乱的局面”，[2]造成各机关各自为阵，上下级关系混乱的局面。可见，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边区在行政工作上的问题暴露无遗。对此，边区政府有明确的认识并做了切中要害的总结：“把目前边区政府的各级机构检讨起来，有如下两大弱点：第一，是头重脚轻，上级的组织庞大，有分工太过琐碎或人浮于事的现象，以致周转过多，太不灵活。下级则感到人员缺乏，质量又差，而事务却非常繁重，常有不能完全或彻底执行的现象。第二，是正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各级机关常有因突击工作而松懈了经常工作，而经常工作也常常因某些分工太不明确，责任的划分太不严格，以致在某些关系上显得紊乱。”[3]上述问题的形成与边区行政机关在“正规化”过程中的扩张有关，边区一级许多部门人浮于事，基层县乡机关有事无人去做。区乡机关工作效率低下，而且缺乏主动性，这已经影响到边区政府各项政策的执行，如何解决边区行政工作中“头重脚轻”的政治问题，也成为中共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摆在边区政府面前的双重困难，对此，中共一直在摸索解决困境之办法。比如民众对于救国公粮的抵制和不断有民众搬离边区，边区政府认为“这主要是我们的教育解释工作不够，如群众能了解此乃政府正确之设施，实系边区人民在抗战建国中必要应有之任务，只有如此，才能保卫与巩固边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并非我民主政府不恤民困，不顾民艰，故意巧立名目抽税之意。事先应有正确宣传，事后应更详加解释，则人民自会了解政府之深意，自愿输将以利抗战，庶不致引起移居之举。”并指出只要“向老百姓解释，想民怨可以消解矣”。[4]边区政府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解释来消弭民众的不满情绪。对军事层面和政权建设方面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指示。如 1940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节省人力、武力坚持长期抗战的指示》，规定了脱产军政人员与所在地总人口的比例。[5]1941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召开会议时也讨论了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并决定“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其组织以精干为原则”，“中央各部委之组织，须按上述原则，重新编制”[6]。毛泽东对此双重困难也有清醒的认识。“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

1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新民主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4 页。
2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 年 2 月 18 日，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 7 册，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2、63 页。
3 《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各厅处院速拟各机关编制表和建立正规制度计划送审》1941 年 12 月 3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4 辑，第 219 页。
4 《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复甘泉县民众对抗战动员与负担的呼声》1941 年 5 月 28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3 辑，第 293、294 页。
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0）》第 1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70 页。
6 刘益涛编著：《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 页。

作。”[1]这样看来，边区面临的政治问题不再仅仅是政治工作，它和经济问题成为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行政工作的问题，财政经济各项政策才能顺利推行，这成为事关边区政府生存的重大议题。依照此思路，解决困局的“治病良方”正如毛泽东在后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所总结的：“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因而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2]

可见当时虽然没有归纳出明晰的一项政策，但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共中央的解困摸索，都已经在走向“精兵简政”。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召开。在此次会议上，著名绅士李鼎铭等 11 人向参议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其内容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是：“在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态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3]此政策的提出者虽似单纯解决财政经济困难，但这与中共所摸索出解决双重困难的思路不谋而合，因而很快被中共领导人所接受，成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解放日报》很快发表社论表示此政策是解决当前抗战与生存所面临困局的一剂良药，“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时宜的主张”“陕甘宁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不同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在这里应该有它独特的内容和意义”。[4]

二、“简政”的理想与困局

所谓陕甘宁边区的环境和条件，“一方面，它是人民抗战的总后方，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民众制度；另方面，从 1940 年下半年以后，遇到了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而能否克服这一困难，直接关系着边区的存亡乃至全国抗战的胜败。”[5]因此，第一次、第二次的“精兵简政”在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其实只有“简政”。“简政”的目标又有两项，其一是缩小规模、减少开支并提高行政效率。其二是加强基层政府，特别是区、乡政府的力量。但作为新生事物的“精兵简政”该如何实施？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并没有现成的方案。

1.首次“简政”的顶层设计

作为“精兵简政”主要提案人李鼎铭，因该提案获得毛泽东的首肯而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他无疑是边区实施该项政策的主角。边区参议会结束后，11 月 27 日，新一届边区政府召开了第一次政务会议，李鼎铭再次阐述了“精兵简政”意义，他说：“我们以谦逊态度，实事求是将我们收支计划订出，按我们的力量，办我们的事，总而言之军政各界提高质量减少数量”。依此方向，为实施精兵简政政策，会议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并计划在 12 月 15 日前做出编制计

1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7 页。
2 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83 页。
3《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案》1941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4 《精兵简政》（社论），《解放日报社》1941 年 12 月 6 日，第 1 版。
5 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9 页。

划。[1]12 月 3 日，政务会议讨论“加强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就已经提出精简方案，“确定边区一级各机关应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对于编余人员由整编委员会统一安置，“需休养的，需学习的，需参加生产事业的，都给以合理的解决”。要求边府各机关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第一，在精兵简政的原则下，按照以上调整人员的比率把各机关加以重新编制，如有骈枝机关或骈枝部门的，应加以裁减归并，列出编制表，并附上编制意见，陷于本月五日送交民政厅编整委员会审查。第二，各机关的编制表，对于各部门的名称应斟酌的修改，如‘部’改为‘科’，‘总务科’改为‘庶务科’，‘勤务员’改为‘公差’等等，提出意见。第三，各机关应在编制表后，附上今后的各机关建立正规制度的计划”。[2]这是边区政府根据“精兵简政”提案做的一次细致的工作布置，可以视为精兵简政工作开始实施。

在如何精简的实践中，边区政府对“精兵简政”做了两项顶层设计。第一项就是合并裁撤机构、定编制和减人员。12 月上旬，边区政府召开了第二次政务会议再次讨论精简方案。政务会议上对如何精简进行了充分讨论，如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认为工作人员的精简应以工作需要为主，如县级检查员取消，职能应由保安处兼任；法院人员本身比较少，应该得到加强。边区政府副秘书长谢觉哉认为边区各级政府组织法律不完备，县、乡应具体规定；边区政府是“头大脚小”，“乡政府只有一乡长，有的年长有资格而不识字”，应该配备文书；精简要以各机关具体情形办理，将“人放在适当地位，发挥其能力”。谢觉哉还提出了担忧，大部分人是为了革命而来的，还有的人动员而来的，编余人员安置需要慎重。政府主席林伯渠表示赞同谢觉哉加强乡政府工作的建议，并要求简政主要是“加强下级工作”。最终会议确定的基本内容是：“①调整行政机构。②缩紧组织，一面紧缩，一面加强工作，数量减少，提高质量，加强领导。③对干部适当的调换配备。④与各单位负责同志商量编制，各县由民政厅负责编制，与各负责人商量。⑤对整编人员处理办法：a.编余人尽量放在下面，加强下面工作（专署、县、区）。b.无论上下编余之人员大部分转到生产机关，加强生产机关。另外，将下面脱离生产人员可回家，抽出一部分人送入学校（文化程度差的），老弱病残尽量给予适当安置。c.军队的□□要精兵也是重质量，也要减一部分人参加生产。”根据以上内容，民政厅重新划分了边区各机关、县区各机关和留守兵团的编制数额。并要求在精简的过程中，“（1）机关、部队、学校确实调查一次所有工作人员，以 12 月底被安置好。（2）建立制度问题，各机关应在工作中研究。（3）组织统一问题，最好由整编委员会将边区一级组织条例规定。（4）组织确定后决定预算。”[3]为了做到准确精简，边区政府之后又对专员公署和所属各县划定行政等级，以便确定编制。[4]

第二项设计就是合署办公。12 月 29 日，边区政府召开第六次政务会议，主要讨论合署办公的问题。认为“合署办公，事情可以办得快，同时可以减少一些文件”，[5]可以提高效率。并在 1942 年 1 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合署办公办法》中详细列出执行细则。并入合署办公厅的

1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记录》，1941 年 11 月 27 日，手抄本，藏延安革命纪念管。
2 《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各厅处院速拟各机关编制表和建立正规制度计划送审》1941 年 12 月 3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4 辑，第 318-319 页。
3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记录》，1941 年 12 月 x 日，手抄本，藏延安革命纪念馆。
4 《边府健全行政机构，厘定各行政区登记，确定工作人员编制名额》《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11 日，第 4 版。
5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六次政务会议记录》，1941 年 12 月 29 日，手抄本，藏延安革命纪念馆。

有“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民族事务委员会；审判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保安处、高等法院等机关，因情形特殊，可暂缓并入，但须派负责人员一人参加合署办公厅办公，以资联系。”[1]在边区政府合署办公后，边区政府各机关、县政府也开始合署办公或集体办公，以提高行政效率。

《解放日报》同时展现了合署办公的理想效果，“凡各厅相互间文件，当时即用谈话、签条、公文移转簿解决之。这样每件例行公文所需时间，节省三分之二。隔日即可发出，不但增加行政效率，纸张、人力亦大为节省”。[2]通过边区政府合署办公，总结出三大好处：“第一，可以减少在边府与各厅、处间公文来往批阅、划行等时间上的浪费，也就是说，可以使政令更能迅速下达，真正做到‘今日事，今日毕’。第二，可以免除边府以下各级呈报公文上的同样内容缮写多份、人力物力（纸张笔墨）的浪费。也就是说，更能节约以促进自力更生，坚持长期抗战。第三，可以防止敷衍、因循、遇难灰心的现象发生。也就是说，‘合署办公’能够在集体办公中，遇难即释，发扬工作热忱；也能够在集体地按时上下班公中，真正做到相互监督、砥砺的效果，因此工作效率提高，质量也必会加强”。[3]

2.双重领导的设想和困境

经过四个月的精简工作，“共裁减合并机关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计一千五百九十八人。”[4]边区一级机关“派了三百余人加强下级，其余则送学习，或转入生产。”[5]但是这样的结果显然和设计时的期待相差甚远，只是做到“编”，还未做到切实的“整”，机构并未完善，人员也未达到充分合理的调剂，区、乡政府的质量也还未提高。即“精兵简政并没有彻底的贯彻到全部工作中去，因此在组织机构上还显得头重脚轻，干部没有适当调整，工作制度尚未正规，政令尚繁而又有些不切合实际的情形，在工作联系上，是上级领导不够具体，检查不够深入，下面是不完全了解政策法令，有些工作方式是与指示相反的一套，形成了上下不通气和工作脱节疲塌的现象”。[6]究其原因：第一，精兵简政在根据地是个新生事物，没有做试点，提出来就立即变为政策实施，不免存在各种问题，如边区政府在做顶层设计时只做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合署办公，一个是裁撤机构。第二，不管是高层领导人还是基层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对精兵简政认识不清，把“精简”混同与“精减”，简单地认为“简政”就是“减政”。

因而在1942年4月10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就已决定进一步实施整编，并在会议的决议中提出：“一、加强下级，提高县、区、乡政府的质量，上级人员往下移；二、以半年为期，做出比较详细的计划，把各级政府机构再加以更完善的调整；三、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团、调查团等等；四、由动员委员会切实负责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动员，必要的动员也要很好的去调整，使人民真正感到‘政简’”。[7]同时，这一次的整编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军

1 《陕甘宁边区政府合署办公办法（草案）》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110页。
2 《边府实行合署办公》《解放日报》1942年1月10日，第4版。
3 《小言论：合署办公》《解放日报》1942年1月17日，第4版。
4 本书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页。
5 《陕甘宁边区政府五个月工作报告》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294页。
6 《边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的决议》《解放日报》1942年4月10日，第1版。
7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执行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决议案的命令（战字第二八四号）》1942年4月15日，《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第28页。

委共同组织扩大的编整委员会，之后很快成立以林伯渠、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的整编委员会，并在党政军系统成立分会，领导第二次简政，并要求在一个月内各系统做出编整方案交总会讨论。[1]

鉴于第一次“减政”的经验教训，从提出决议到第二次精简方案的出台，是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调研。比如在延长二区一乡的 43 户家庭访问中，70%的农民认为“尔个政府的花样多，头目多，工作人员苦”；并且感觉“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多，共产党的会议多”，派一顿饭也开个会，平均不到四天就有一次会。[2]在乡区政府工作效能的调查表明：“平常不调查人口、土地、人民经济状况，到征粮时，临时匆忙调查一下……一次调查，填表，不留底子（存根），不确实，再调查，再填来，再不留底子；三次五次，到底仍然不确实。”[3]因而在边区政府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上，明确宣布将有 50%的干部分配至县级、区级及其他机关工作，其意义“乃在克服‘头重脚轻’之现象，加强下级行政效率，汇合老、新干部的经验学识，借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及边府的政策法令，能更进一步的贯彻执行”。林伯渠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干部如多数均集中边府一级，不把县区的工作做得更好些，那实际上还是等于都空着样”，并希望“下乡”的干部做到：“（一）紧紧掌握二十二个文件和政府政策，深入群众，聆听群众呼声，为群众及时解决问题；（二）团结地方干部，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三）加强调查研究；（四）不是‘钦差大臣’，要有做‘小学生’向人学习的态度”。[4]6 月 30 日，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提出了五个方向性的原则：要求建立适合边区实际的行政工作制度；提高干部水平与适当配备干部；增加县政府权限；密切党、政、民的工作配合；实行合署办公。[5]由此可见第二次精简中包含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制定出较为详细的办法，如在配备干部方面，逐渐做到每个县政府有两个（区政府有一个）文化程度较高，能力较强的秘书，帮助县长（区长）理解上级指示；在增加县权限方面，建立县财政，使县府负起责任，并有自由调处余地，一县之中应兴应革，干部培养等县政府有权调处；在党政民工作上，党重在推动政府与民众团体的工作，政府重在研究执行办法，群众团体重在组织民众。[6]

到第二次“精兵简政”时，因为有了实际调研，避免了想象效果的主观主义，健全乡政权机构、增强下级政府效能的设计比第一次精简所设计的缩减人员、合署办公更为深化。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最核心的目标，成为真正实现“简政”的一次行政改革。与第一次精简裁撤冗员、减少开支的初衷相比较，政府的结构和观念的变化成为更深层的意义，增加县政府权限、加强基层力量是这场行政改革的重点。因为中共领导已认识到“县是直接领导区乡政权，具体执行政府一切政策、决定和法令的行政单位。”理想的行政体系应该包含：第一，县政府对本县内的事业兴革，有完全决定权；第二，边区政府的工作团或干部只可提意见，无权不经过县政府而

1 《边区政府贯彻精兵简政》《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4 日，第 2 版。
2 《健全乡政权机构》《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29 日，第 2 版。
3 《增强下级政府工作效能》《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15 日，第 2 版。
4 《深入群众到县区去，边府开干部动员大会》《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21 日，第 1 版。
5 《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1942 年 6 月 30 日，《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第 42-45 页。
6《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1942 年 6 月 30 日，《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第 43-45 页。

自行决定；第三，县长对全部县政工作负责，边区各厅对县的指示，或县对区乡的指示，均要经县长下发，各科无权自行发文；第四，需发挥县参议会在县政上的创制与监督之用。[1]可见，在第二次精兵简政时，已形成“增加县政府权限”的纵向双重领导的初步设想。

第二次精简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从县和区中指派一些干部到村里去担任一些职务，县区级人员有所减少。如延川县“八个区原有职员五十五人，减为三十八人。裁去十七人，四人将分配为乡长，回家生产者十一人，到延安学习者二人。”与此同时，“为加强乡政府工作，须各增加文书一人”[2]，这项工作不仅在延川县，从延安、绥德、安塞等县的情况可见全边区都基本完成了“每乡配一名秘书的工作”。但是第二次“充实基层力量”的精兵简政陷入另一种困境，除了地方武装、母婴外，边区政府吃公粮的人员尚有 11500 名，[3]各级政府及其附属机关 8200 名，各中等学校及保小 3300 名。[4]同时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行政机构的变革并没有什么进展，设想的行政体系并未实践。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第二次精简的核心目标是健全乡政权、加强基层力量，因而在实施原则中提出“这些事业机关有的是很重要，须得加强（如通讯战、粮食局等）”，实施办法中也出现“起初不是减少多少人，甚至还得临时增加必需的人员”[5]，但在实践中只实现了“加强”而没有或少有“调整”。

另一方面原因是执行者对精兵简政的认识问题。一是没有认识到这是首要的工作。比如边区银行的报告中提出“因为许多地方的干部不够，改组未能及时进行（有的现在仍未进行）。有的地方工作堆下许多，无人清理，新的工作更无从建立了。”[6]这其中编余人员无处安置是客观原因，如“有些女干部裁减后不替好好安插，有的人有病无办法；工会内有些干部裁减回家地方上对这照顾未周，有些干部说‘要时就提拔出来，不要时就打回家去’，这种说法会影响今后农村干部尤其妇女干部的提拔”[7]。二是对该政策的消极甚至抵触。精兵简政势必会触及被精简者的利益，需要当下的“牺牲”。“近视眼”的观点认为“我这里情况还不如你们所估计的那样严重，还可以过去，照旧维持吧，环境严重时再说，何必着急呢？”“远视眼”的观点认为“今天有些头重脚轻，上层庞大下层不充实的现象，但是你应该看到将来呀！将来它是要发展的！”[8]总之，均表现出不愿意的抵触思想。

精兵简政理想的设计如何实现？如何化解这股抵触的力量？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并未像开始设想的那样做出一个模范的样式，反而陷入无从下手的困境。8 月 19 日《解放日报》上一篇《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文章，让这项政策有了可参照的模范。“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工作，是有比较周密、精详而切合实际的办法。在纵的关系上，它从政治动员、工作的布置

1 《第二次“精兵简政”与增加县政府权限》《解放日报》1942 年 7 月 9 日，第 1 版。
2 《延川实行简政：县区级人员分别减少，各乡增设文书加强工作》《解放日报》1942 年 6 月 20 日，第 2 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02 页。
4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公布简政实施纲要的命令（战字第六八〇号）》1943 年 3 月 3 日，《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第 101 页。
5 《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第 48 页。
6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边区银行整编工作报告的批答》，《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第 167 页。
7 《西北局关于精简工作的总结》1943 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 年）（二），第 102 页。
8 《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解放日报》1942 年 8 月 23 日，第 1 版。

计划、工作的执行以及总结检查，都能有条不紊，依次进行；在横的关系上，它能把精兵简政的总方针贯彻于各个方面的工作，它对政权工作、军事工作、财政工作等等的精简工作，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1]毛泽东因而对这项政策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直接参与并大力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中共中央也继续总结经验教训，酝酿第三次的精简，可见对于这项极其复杂，遭遇曲折困境的政策之执行，非能切实见效不可。

三、切实的“精简”：一元化双重领导

毛泽东的直接参与让边区的精兵简政产生了两方面变化。一是要“来一个大举”，将该政策发展成为如整风一样的一场运动，也就是要自上而下，从边区到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推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幕会上，对实行精兵简政的办法完整表述为“七整”，即“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进行大整顿、大检查。二是增加了新的目标，赋予精兵简政更深刻的内涵。毛泽东在给谢觉哉、陈正人的信中说：“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完全可以仿效？”[2]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负担，影响人民的生活”。[3]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有更高的期望，即够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的要求，精兵简政才算是彻底的和合格的。

1.整风中简政：李维汉与《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

面对边区政府工作的各种问题与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李维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毛泽东在与李维汉谈话时专门强调要他做好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4]李维汉到边区政府任职后就开始为第三次精兵简政做准备。这次酝酿的时间很久，目标也很明确，一是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因为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阻碍精兵简政的各种混乱思想归根结底是政务人员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思想，以及自成系统的独立主义思想；是政务机关存在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残余；是领导作风的主观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5]这些思想问题在大检查中也被得到证实，“过去政府两次简政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最近政府各厅处院为简政所进行的检查工作又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如果不先在思想上贯彻对简政的认识，那末，在实际上就无法使简政工作贯

1 《精兵简政的模范》《解放日报》1942 年 8 月 24 日，第 1 版。
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9 页。
3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 年 12 月，《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95 页。
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499 页。
5 《简政整政问题》1942 年 11 月 4 日，《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7-288 页。

彻”[1]。二是解决政权组织问题，形成可操作的精简方案。毛泽东认为欠缺精密的顶层设计也是前两次精简无法彻底有效的直接原因，正如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时所说：“究竟今天能够简多少？政府系统、党的系统、民众团体系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精密的分析。不能那样糊里糊涂，说现在要‘精兵简政’了，就简。以前简过好几次都没有简彻底，就带了一点糊里糊涂，没有加以周密地分析。”[2]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边区将精兵简政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精兵简政在党、政、军、群系统全面展开，成为一场自上而下的行政改革运动。首先，把简政与整风运动相结合开展了大检查、大整顿，为第三次彻底精简的干部调整做准备，也是对干部思想观念的洗礼。其内容包括“机构设置是否合适，人员配备有无余缺，职责分工是否明确，行政、用人和总务工作有无制度、是否完整，干部使用、领导作风、目前工作存在什么问题等。”[3]在大检查的过程中，一方面将精兵简政作为整风运动的实践看待，另一方面将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作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强调的是干部对党组织的绝对服从。比如边区“刘堡”团在召开精兵简政干部动员大会时特别指出“整编是整风学习的实际测验，每个干部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上级分配的工作，哪怕比原来工作范围小些，也应完全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4]关中分区在大检查中除进行干部登记外，还进行了干部对工作意见的搜集。分区党委在给各县委的指示中强调“精简后每个干部都会给予适当的工作位置，应强调绝对服从组织，听从组织的调动和分配，不为个人打算，严格肃清个人主义的观点。”[5]与此同时，边区将干部教育作为政府工作中要集中力量完成的两大基本任务之一。不仅大力宣传“人尽其材，材尽其用”的观念，还采取单独谈话的方式与干部交流思想。比如延安县在处理干部调动的问题时“一个一个和他们谈，一方面说明‘精兵简政’的意义，另一方面使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内心的话讲出来，若有什么困难，必须具体解决。”[6]边区民政厅副厅长唐洪澄认为民政厅获得精简成绩的原因就在于思想认识的变化，他说“一方面由于同志们对‘精兵简政’政策有较深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同志们学习文件后思想意识进步的表现。”[7]边府保安处的情况同样可以看出干部教育对思想观念变化之影响，“有些干部在整风之前，对于工作是不安心的，但在整风之后，就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说明了经过教育的过程，不正确的观念是可以克服的。”[8]可见在学习、检查、教育三者相互配合下，边区干部的思想得到很大改观，这不仅为彻底精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也在对精简统一认识的过程中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现扫除了思想障碍。

其次，边府简政委员会详细研究各分区专署以及县、区、乡级的组织机构、工作制度等问题。九月下旬，边府“专门召集分区专员，延安、安塞、甘泉等县县长，以及其他一部分县、

1 《简政要从思想上贯彻》《解放日报》1942 年 10 月 7 日，第 1 版。
2 刘益涛编著：《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第 148 页。
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503 页。
4 刘益涛编著：《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精兵简政》，第 120 页。
5 《关中积极准备彻底实行精简》《解放日报》1942 年 12 月 25 日，第 1 版。
6 《精兵简政中关于处理干部的两个问题》，《解放日报》1942 年 11 月 22 日，第 2 版。
7《边区政府一级机构，将以合署办公为核心，简委初步研究简政制度》，《解放日报》1942 年 9 月 18 日，第 2 版。
8 《边区政府将进行研究下级简政问题，边区一级工作检查日内完毕》，《解放日报》194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区、乡干部，举行简政座谈会，研究专员公署以下各级政府的简政问题”。[1]座谈会同样是在整风精神指导下进行的，前后讨论时间共计一周。在座谈中对各级政府的职能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如专署的性质，县政府的权限，乡政权的任务都有讨论和划分。明确职能的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各级领导对基层组织是乡政权有了统一认识，“陕甘宁边区的乡级政府，是政权的最下层组织，是和人民最接近的。它对于政府法令政策的执行和乡村建设工作的推进，是负担着直接的责任的。”[2]另一方面对于各厅之间无联系，政策不统一，政令不统一，制度不统一的情况，比如“关于公盐代金的指示，建设厅和财政厅各发了一个指示，但是开始征收的日期一个是八月，一个是九月……”[3]或是党政工作关系不明，党对工作一把抓的情况，明确各级政府职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加强乡政权方面，座谈的各级领导对每乡增添文书的工作有一致的认可。延安县长刘秉温还提出合理的计算来说明此举并未增加很多人，完全具有可行性：按该县为甲等县，共 10 个区 54 个乡，现在县级干部共 29 人，每区干部 6 人至 7 人，目前共约 90 余人，如每乡添一文书（有文化的乡长暂时不需要文书），则区上配备干部 3 人，县上配备 20 人即够，合约 100 人。[4]漫谈结束后，不仅加强乡政权成为共识，坚持民主集中制，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义也再次得到突显。可见政府职能的明确和认识的统一为在组织机构与制度系统贯彻简政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两项工作都已完成的基础上，1942 年 12 月初，边区政府召开第三次政务会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总结过去精兵简政时说，边区政府过去工作存在缺点的主要原因在于“精兵简政政策没有贯彻，并申述简政之任务在于继续过去成绩，纠正现存缺点，以达统一、精干、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之目的”。[5]此次会议通过了李维汉主持制定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纲要整体架构包括目的、任务、机构、人员、制度、作风等方面，详细对精兵简政要做的十一个问题均做了规定。“纲要”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精兵简政是为“政权工作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官僚主义的目的”。该“纲要”首先要求“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集中力量办“急要和首要的任务”。什么是急要与首要的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生产；第二是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与军队教育的增强”。这些内容确定了第三次精兵简政的基本原则。其次根据各级政府机关（包括专员公署、区公署）的业务，规定了其职权和基本任务。并指出边区政府系统的特点是“愈往上看，愈见庞大，形成了头重脚轻，一级代替一级的严重毛病，这又是同精兵简政政策相违背的”。提出“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的共同原则，就是少而精。精简机构，就是要裁撤不急需的机构，合并性质相近的机构，缩小庞大的机构；精简人员就是要减不急需的人员，精选称职的人员……这样来实行精简，不但不致减低工作效能，反会提高工作效能”。精简是为了增强基层政权的能力，而“乡政权的能力还不强，效能还不高，加强乡政权，便成了当前的急务”。因此，在制定精简办法时，主要是区公署以上的，包括县政府、专员公署和边区政府进行精简。各级人员的精简，采取自上而下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 499 页。
2 《乡级政权的基本任务》《解放日报》1942 年 9 月 19 日，第 1 版。
3 《边区政府将进行研究下级简政问题，边区一级工作检查日内完毕》《解放日报》194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4 《边区政府简政座谈会，续谈县级简政》《解放日报》1942 年 9 月 22 日，第 1 版。
5 《边区政府委员会议通过简政实施纲要，李副主席报告政府八个月工作与简政方案》《解放日报》1942 年 12 月 13 日，第 1 版。

的步骤进行，“所有编余人员，须慎重处理，务期各得其所”。此外还指出精简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了政策问题，制度问题，业务问题，机构问题，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领导作风问题，以及拥军问题，三三制问题等等。由此可以明白，简政工作是一序列的组织问题，又是一序列的思想问题，而且许多的组织问题，从里面来看也是许多的思想问题……精兵简政是一个重要政策，不对这个政策有清楚的认识，就无法着手精简。我们是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精简，如果不把这个政策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统一起来研究明白，也就无法实行精简”。最后提出实施精兵简政的最好办法是：“一方面把简政工作同整风学习沟通起来，用对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观点，来从事简政；又一方面把简政工作同检查工作统一起来，同政务人员的思想检查和政府系统的工作检查统一起来进行”。[1]该“纲要”是一个全面体现精兵简政精神和要求的“很好的文件”，最突出的特点是把简政与整风相结合，即以整风精神对待精兵简政，是整风精神在简政方面的具体表现。

与前两次相比较，和整风运动相结合的第三次精兵简政不仅仅是人员、机构的裁剪和调整，它首先成为了一场干部教育运动。《纲要》中专门强调“要坚持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政令，统一的制度，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政纪——上上下下一律遵守政府的纪律。”[2]随着精兵简政运动的深入发展，“统一领导”这个新目标逐渐跃居为中心地位，即党的一元化领导被提到重要位置。

2.政权组织：一元化双重领导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的设计可谓充分理解了毛泽东所赋予精兵简政的深刻内涵，完全贯彻了毛泽东的精兵简政思想。因为翔实的调查和精密的分析，这个纲要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作为政务人员的整风文件，在 1943 年至 1944 年的第三次精兵简政中得到了较好的执行。首先，基本上实现了“精简”上级，各级政府部门机构和人员减少。“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 35 个减至 22 个，分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从精简人员方面说，边区政府的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物资局等 6 个单位，原有 469 人，减为 279 人，减少 40%”。[3]专员公署、县级也做了精简，以陇东分区为例，分区专署通过裁处设科，精简后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粮食、保安、人武（兼人民自卫军团部）等 7 科和保安大队，贸易、税局、银行等则“由专署就近督导与指挥”，民政科下设通讯站、卫生所，“统一军政的卫生部门，以补人力、物力之靡费现象”。县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粮食、保安等 6 科，人民武装、司法处及保安队直属县长领导。[4]精简机构后，分区干部减至 22 人，所属 6 县原有干部 147 人，精简后有 113 人。[5]延属分区延川县通过精简将原有干部减掉三分之一，[6]志丹县在精简过程中，机构有原来的 6 科裁并为 3 科 1 处，人员由 36 人减少至 24 人。

1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6 日，第 1 版。
2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 年 2 月 24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第 65-66 页
3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 148 页。
4 《陇东分区专员公署对分区政权工作意见书》1942 年 9 月 25 日，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75 页。
5 《陇东分区 1943 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总结报告（节录）》，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 383—384 页。
6 《延川县级人员减少三分之一》《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10 日，第 2 版。

[1]

其次，充实了基层政权和生产部门。第三次精简中人员精简的政策是“加强下级，加强生产部门，降级使用干部”。在加强基层方面，绥德分区抽调两名县委书记任县务委员会主任，有22名地委、县委的干部调任政府科长、区长、助理员、乡长、文书等。特别是区乡政权得到加强，绥德分区有21人下放担任区长，党政民部门55人到乡政权工作；三边分区有8人到区级工作，15人到乡级工作；延属分区的鄜县等四县有37人到区级工作，25人到乡级工作。在充实生产部门方面，“各分区各县均有大批人员到生产部门”。[2]陇东分区“克服了政权机关头重脚轻的毛病，如过去一个县政府就有将近30名干部，天天在下命令，作指示，而在乡上做实际工作的只有乡长1人。简政后每乡增设1个文书，大批知识分子及一些强干部派到区乡，下属增强了力量”。[3]第三次精简基本实现了加强基层的初衷。

再次，改革与建立比较规范的行政制度。为彻底贯彻精兵简政，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明确规定“各下级政府服从各该直辖上级政府，各级政府一律服从边区政府”，规范了边区政府、行政公署、县政府、区公署和乡政府的职能与上下级关系。规定了政务人员的工作纪律，形成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了党的“领导一元化”，要求“各级政务人员不得擅离职守，不得发布与边区政府政策法令相抵触的文字或谈话，对全边区性的事件，在边区政府未曾发布主张前，各下级政府及政务人员不得向外发布意见”。[4]此外，通过精兵简政，修正了《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条例》《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等，规范各级政权及派出机关的职能、构成和任务等，尤其是明确了各级领导的职责范围，使责权明确，减少了“政出多门”的现象。“许多政策、法令和主要指示的决定，事先都经过酝酿、协商、讨论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统一，就是自觉的，就不致发生阳奉阴违的恶劣现象，而是大家一条心，身体力行”。在组织上，“各厅、处、院、局过去直接指挥下级各科，不经过专员县长的现象，或者彼此对立，互不相让的现象，大体上也已经改正了”。[5]

从以上几方面的成果可以看出，在边区彻底实现精简的过程中，边府依照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理想模式，对权力关系作了重新的安排，构建出新型政府权力结构。一方面县级政权成为真正的权力的枢纽，双重领导取代之前的纵向领导成为边区政府主要行政方式。边区政府层面无论机构还是人员都大规模减少，同时加强了县长及各委员会对各部门的控制权，“使县长和县政府委员会有统一领导本县民、财、建、教、保、法的权力”[6]，从而削弱了政府各部门间的独立性。这种双重领导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协调领导方式：“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

1 《志丹实行精简，县府六科并为三科，裁减三分之一加强乡区》《解放日报》1943年3月13日，第2版。
2 《西北局关于精简工作的总结》1943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二），第94—95页。
3 《陇东地委关于整风运动训练班师大政策讨论整理（节录）》1944年2月，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389页。
4 《边府遵照<简政纲要>方针，领导一元化整饬政纪》《解放日报》1943年5月16日，第1版。
5 李鼎铭：《边区政府简政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第3版。
6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年2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七辑），第63页。

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1]这既能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又能发挥双重政权的活力。

再者，权力的下移和规范行政制度的建立成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党对基层政权的领导变得更加有效。在第三次精简中，“纲要”对乡政权的职能清楚的界定为“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是人民直接的政权机关”，可见它直接决定了政府所有政策的执行性。强调乡政府和乡参议会的权力显然是反对乡村精英或士绅阶层对乡村权力的垄断，“下乡”的领导干部们对解决此问题起到很大的作用。每个乡长都会有上面派来的秘书，文化水平较低的县、区也会有秘书。这些“下乡”充实基层政权的外来干部不会受到地方关系网的束缚，他们更加服从上级政府的领导，并且将新思想带入农村，尤其是整风运动中所提倡的新思想新作风。而转入基层生产部门的领导人员同样在执行上级政策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发挥带头作用。

中共“精兵简政”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减轻民众负担，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遭遇很大阻碍，经过摸索和调整的精兵简政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随着精兵简政运动的深入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彻底精简，不仅解决了眼前的财政经济困难，也推动了边区政权组织的变化，加强了党对行政的领导，即建立起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政府的双重政权结构，边区的行政运作向正规化方向发展，向建立现代国家与地方行政运作模式，实现理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四、结语

精兵简政是中共在抗日战争财政经济最困难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在当时是一项临时性、救急性的措施，从它提出到 1944 年结束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在“精兵简政”问题上摸索、调整和实践的过程也是对其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精兵简政提出的初衷只是因为边区非生产人员过多，民众不堪重负，想通过精兵简政减少非生产人员，减轻民众负担，解决边区面临的财政经济困境。而在该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暴露出边区很大的政治体制问题，政策的推行也遭遇巨大阻力陷入困局。经过大检查、大整顿的调查和摸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找到应对困局的“药方”，将精兵简政和整风运动结合起来，给精兵简政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使精兵简政和边区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因此，精兵简政不仅成为一场深刻的干部教育运动，强化了干部对党忠诚和服从的信仰，也成为政府权力重组的政治革命，在党政体制中形成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政权的双重结构。这使边区政治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从行政系统而言，通过颁布条例和法规，规范了各级政府的权责，加强基层，不仅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而且通过规范政府运作机制使行政系统上通下达，政令畅通，工作效率有较大提升；从干部教育而言，通过颁布政纪总则和政务人员十条公约，严明了干部纪律，

1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00 页。

使干部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就为边区大生产运动，合作运动及双拥运动等一系列工作在基层的落实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在减轻民众负担的同时也解决了经济困境，亦改善了党政军和群众的关系，从而使中共政权再次获得民众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抗战时期边区救急性的“精兵简政”是成功的，也为中共以后执政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精兵简政，均有抗战时期精兵简政的影子。

租佃关系、减租动员与乡村权力：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减租运动”（1940—1944）

冯峰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减租减息”政策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相比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和解放战争时期“土改”的研究成果，国内抗战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研究，则相对有所欠缺。即使有一些研究，也大都将“减租”与“减息”两种不同的政策放在一起论述，而忽略了地租与高利贷在乡村经济中的重要区别。[1]还有一些研究虽然集中于“减租”政策，却将整个“根据地”作为研究“单位”（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2]，而对根据地内部复杂的土地占有状况缺乏深入的分析（如已完成土地革命、未完成土地革命地区政治经济背景的不同，未完成土地革命的不同地区之间租佃关系的差异等），从而对根据地内不同地区在推行减租运动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减租政策的复杂性与多样化，缺乏深入的研究。[3]

因此，有必要对减租运动的研究“单位”做进一步的考量，从而深入探讨中共推行“减租”运动的地域差异与复杂过程。本文以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减租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绥德分区属于边区未完成土地革命的地区，其土地政策与已完成土地革命的地区，差别很大。第二、绥德分区“地少人多”，存在着激烈的租佃矛盾，因此在这里推行“减租”遇到的阻力最大，而中共政策的灵活与多样，也在绥德分区的减租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三、“减租运动”深刻改变了绥德乡村的权力结构。一般认为“减租减息”政策较土地革命路线温和许多，然而绥德分区“减租运动”中所体现出的动员强度，及其对乡村阶级结构变动的影响，使我们有理由重新审视这一看法。

一、绥德分区的租佃关系

（一）租佃关系的基本特点

民国时期陕西的租佃关系究竟如何？根据一份北洋政府时期（1918 年）的调查，陕西佃农占农户总数比为 22.2%，高于北方直隶、山东等省，低于河南，而低于南方各省平均水

1 李金铮是一个例外。他关注了华北乡村的借贷问题，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关系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 陕甘宁边区减租运动的相关研究，主要可见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 2 期。陈舜卿：《试论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 年第 4 期。李建国：《陕甘宁边区已土改地区减租减息工作问题探析》，《延安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6 年第 3 期。林淼：《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研究》，延安大学硕士论文，2011 年。晋察冀边区的减租运动，见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档案出版社，1990 年，第 95—107 页。

3 澳州学者纪保宁的研究是一个例外，她将陕甘宁边区分为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的两种类型。见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平；以租地面积与可耕地面积比来看，陕西的33.6%甚至低于西北甘肃，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1]可见，陕西的租佃率在北方各省中并不突出，更远低于南方各省的平均水平。国民政府1930年代的陕西农村调查还显示，渭南、凤翔、绥德三县的租佃率分别为6%、6%、40%，绥德几乎是渭南、凤翔的7倍。[2]秦晖关于封建土地关系的“关中模式”指出，陕西的关中地区自古以自耕农为主体，地主很少，因此租佃关系并不紧张。1930 年代渭南、凤翔的租佃比之低，印证了秦晖的结论。[3]不过，绥德的高租佃率说明，说明陕北与关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

即使同属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与绥德分区的租佃关系也呈现不同特点。延属分区地广人稀，而绥德分区则地少人多。1942 年延属分区 10 县人口 381,972，绥德分区 6 县人口 491,258。据西北局的调查数字，延属分区人均耕地 11 亩，而绥德分区仅为 8.1 亩。[4]柴树藩的调查则显示，绥德县人均耕地仅为 2 垧（3 亩为 1 垧）[5]，而米脂县为 1.7 垧。[6]从清同治年间至1920年代，战乱与瘟疫使延属分区人口锐减，而绥德分区受战乱影响较小，人口数量较为稳定，并拥有相对发达的商业文化与基础设施，因此保留了强大的以土地牟利的“地主—士绅”阶级，从而存在着较为紧张的租佃关系。[7]

是否经过了“土地革命”是延属分区与绥德分区租佃关系截然有别的另一个原因。经过了土地的“再分配”，延属分区地主、富农数量骤减，中农和贫农成为了乡村的主力。由此形成的租佃关系，大多出于自耕农之间的土地调配。如农户把离家距离远的土地出租，而租入离家近的土地。因此既出租土地，也租入土地，兼具“主—佃”双重身份。另外，如抗属、鳏寡孤独等特殊群体，由于缺乏劳动力，不得已将土地出租给别人，但显然并非靠土地盈利的“剥削者”。[8]不论自耕农之间的土地调剂，还是抗属、孤寡等特殊群体的土地出租，都与以地租为剥削手段的“地主制”有着根本区别，不是减租运动的主要目标。

绥德分区的租佃关系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绥德、米脂的土地调查资料，双湖峪九乡占人口 3%的地主占有 33%的土地，27%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占有 40%的土地，49.2%的贫农占有 21%的土地。双湖峪并无大地主，阶级分布较为平均，但也有 24%的农户户均土地不足 1 垧，41.8%的土地不足 10 垧（10 垧可维持一户最低生活水平），大约 65.8%的农户需要通过租地来维持家庭生活。而在拥有大地主的米脂印斗乡九堡，超过 1，000 垧土地的地主有 1

1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册 ），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843—845 页。
2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 年。D H.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年，第 119—121 页。
3 秦晖：《“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年，第 5、10—11 页。
5 垧本义是“堆”的意思。为计量方便，一般以 3 亩为 1 垧。但在陕北，一垧究竟等于多少亩，不同地方的规定是不同的。
6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 页。
7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pp15-25.
8 如经过了土地革命的吴堡五区，出租土地的 174 户中，贫农占 50.2%，中农占 28%，富农占 15%，其他占 6.8%。出租土地的贫农、中农数量都超过了富农，其租佃关系可见一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164 页。

户，2%的地主占有 63.7%的土地，10.9%的中农占有 7.2%的土地，而 67%的贫农仅占有 9.6%的土地（每户平均不足 3 垧），无地农户亦占到 27.4%。高达 81.3%的农户只有不足十垧土地，以“租佃”为生。总体来看，绥、米乡村土地集中于地主、富农（不同地方比例从 37%至 75%不等）之手，中农没有发展（人数和土地数都不占优势），占人口多数（50%至 67%）的贫农每户占有土地（平均从 2.8 垧到 5 垧）不足以糊口，雇农只有 1 到 2 垧甚至没有土地。少数地主依靠土地为剥削手段，而乡村其他各阶层——雇农、贫农、中农——都要通过租种土地，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1]因此，乡村租佃关系极为紧张。这从绥德分区远高于其他分区的地租额可为佐证，绥德地租一般占收获量的 40%—50%，关中、陇东是 10%—30%，清涧、固临、延安是 10%—15%，安塞、保安、环县在 10%以下，绥德几乎是安塞等地的六、七倍。[2]

虽然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地主，但是其使用权却呈现出非常分散的状态。在绥、米一带，有 500 垧土地的地主一般都把地租给了 100 多个租户。如印斗九堡地主常彦成的 700 垧地租给了 150 个租户，每户平均 4.7 垧，常友文的 1,300 垧地租给了 250 个租户，每户平均 5.2 垧。[3]这说明，农村的各个阶层都要通过租种土地，来弥补土地占有量的普遍不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使用权分散，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并不严重，“主—佃”矛盾并不突出。以著名的米脂杨家沟马氏家族为例。到马维新时，其家族的 1174.5 垧土地，共分为 208 块，平均每块 5.5 垧，最大土地不过 27 垧，土地之分散可见一斑。除了 145.5 垧在杨家沟，其余的 1,029 垧土地都在外乡，占到马氏家族土地的 88%。这 1,029 垧土地，被分为 180 块，散布在 22 个村子。其中最近的距离杨家沟 6 里，最远的 70 里。在 10 里以外的李家寺，马氏拥有家族最多的土地 302.5 垧，是本村土地的两倍多。[4]由于大量土地分布在距离不算太近的外村，对于当地佃户来说，马氏都是“不在乡地主”的典型代表。由于不能时时刻刻监督佃户的一举一动，双方产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绥、米一带存在着发达的土地买卖市场。马氏家族主要是通过典地、买地的方式积累财富。马氏土地积累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其经营的高利贷业务。作为马氏旗下的重要商号——“崇德厚”的业务遍布各种借贷领域，每年盈利都在几百吊至几千吊钱，其原始股本 5,600 吊钱，在 20 余年间盈利已达到 8 倍，利润十分丰厚。与其高利贷业务相联系的，既有各种“字号”203 家，“堂号”29 家，也有一般农户 1,277 家。[5]这些普通农户为了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补贴婚丧、节庆、过年时的家庭开销，都会通过高利贷借钱。“典地”是马氏一项非常重要的与土地相关的借贷业务。农户将自己的名下的土地“典”给“崇德厚”，换取相应的“典价”，待日后筹得钱款，再“赎回”土地。马氏家族非常重视“典地”业务，从民初到 1941 年之前，家族“现存典地”[6]最少都在 300 垧以上，1933 年最多时达到 537.7 垧。虽然有赎回权，但是当许多农户债台高筑，又无力“赎回”典地之时，

1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36—40 页。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188 页。
3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40 页。
4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 149—150 页。
5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 172—174 页。
6 所谓“现存典地”，指典地总量减去被赎回的土地之后的剩余。每年都有土地被赎回。

就不得不将土地卖给马氏了。1911 年之前，马氏拥有的典地中 26%变为了“卖地”，1912—1921 这一数字为 23.64%，1922—1931 年为 49.63%，1938 年为 33.33%，1939 年为 51.24%，虽有波动但大体呈不断升高的趋势。从 1884 年至 1940 年，由典地变为卖地的数量，占到马氏所有土地的 74.72%。[1]由此可见，土地典买在马氏家族的土地积累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二）地租的主要形式

不同于南方（尤其江南）商业发达地区，货币地租较为流行，在陕甘宁边区，除了某些宗族祭田（瓜菜地、“坟会地”）以现金收租，其他多以实物地租为主。[2]实物地租主要形式有租种（定租和活租）、伙种、安庄稼等。最为常见的是租种。所谓租种，地主只提供土地，其余全由佃户承担。租种又分为“定租”与“活租”。“定租”规定一定数量的土地，缴纳一定的收获物（一般为粮食），无论丰歉，地主可以不必关心佃户的生产，因此民间称“死租”，又称“指地分粮”。“活租”由主佃双方约定好一个比例（一般对半或四六），到庄稼成熟时按照比例分配收获物。这种租佃形式主方比较关注产量，常监督佃户的生产状况。“伙种”的租佃形式，主方不仅出租土地，还需要提供畜力、肥料、种子等一种或几种生产资料，根据所提供生产资料的数量，对收获物进行“分成”（对半或四六，除了粮食，主方还分得其他副产品，如柴草），而佃方则要在主方需要时提供无偿的劳动，因此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安庄稼”则要求出租人不仅提供土地，还要提供畜力、肥料、农具、饲料、种子等生产资料，并安排承租人及其家属的口粮和住房。因为佃户与地主住在一起，人身依附关系最为强烈。[3]

在绥德分区，三种租佃形式所占比例大致如表一所示：

表一　绥德分区三个乡的租佃形式占比

米脂印斗乡九保			绥德义合三乡			双湖峪九乡		
租种土地	1，846 垧	86%	租种土地	570 垧	66%	租种土地	328 垧	84%
伙种土地	121 垧	6%	伙种土地	297 垧	34%	伙种及安庄稼地	63 垧	16%
安庄稼地	188 垧	8%						
总计	2，155 垧	100%	总计	867 垧	100%	总计	391 垧	100%

资料来源：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51—52 页。

显然，租种是绥德分区的主要租佃形式。在米脂印斗乡九堡、双湖峪九乡，租种土地达到 86%和 84%，绥德义合三乡也达 66%，均超过另外两种租佃形式之和。绥德义合三乡缺乏大地主，甚至没有“安庄稼”这种形式，而“伙种”比例较高，说明租佃关系普遍存在于自耕农之间。而印斗乡九堡“安庄稼”比例超过了伙种，则因为其乡拥有大地主，仅高庙山的

1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 152—153 页。
2 一般认为，实物地租比货币地租具有更多的“封建性”。关于两种地租形式，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册 ），第 812—822 页。
3 《边区的土地租佃形式》，《解放日报》1943 年 1 月 23 日，4 版。

五家大地主，每家都雇有几个“伙子”（“安庄稼”对佃农的称呼）。

由于相对紧张的租佃关系，土地收益的最大化往往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究竟选择何种租种形式，都是主佃双方经过理性计算的结果。就以租种和伙种的选择来说：

表二　绥德义合一乡九个村租种、伙种统计

	上中地	下地	总计	上中地占土地总数百分比	下地占土地总数百分比
租种	91	479	570	16%	84%
伙种	285	12	297	96%	4%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194 页。

在租种地中 84%都是下地，只有 16%是上中地，而在伙种地中 96%是上中地，只有 4%是下地。在租种（主要是定租）形式下，地主不需要关心生产，因此更愿意将“下地”、距离远的土地出租，少投入精力即可获取最大利益。而在伙种形式之下，为增加产量，以便在收获分成时，获取最多的好处，主方要监督佃方的生产与劳动，因此更愿意将上等地、离家近的地出租。[1]

在绥德分区，民间基于习俗的各种租佃形式，与中共对农村租佃关系的认识有着不小的差距。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租种”与“伙种”的区别。在陕北一些乡村，民间习惯把“活租”称之为“伙种”（实际上主方除了土地，并未出任何生产工具）从而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租佃形式。甚至一些地方干部亦不清楚两者的区别，工作报告中所谓“租种改为伙种”、“改租为伙”，其实都是定租改为活租，而非伙种。按照减租条例，伙种地主可获益 40%，租种在经过减租后最多获益为 25%，通过混淆两种租佃形式，地主能获取不小的利益，从而给边区政府领导的减租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2]中共在 1943 年通过修改减租条例，要求下级干部注意区分“租种”与“伙种”（详见下文）。另一例子是对于“伙种”的态度。“伙种”由于出租方要提供一定的生产资料，而承租方则要保障收获时不隐瞒产量，因此更容易在亲戚、朋友、宗族、邻里等有直接关系的人之间达成，以便建立主佃双方的信任。在陕北，“伙种”是自耕农之间调配生产资料的一种重要租佃形式，除了大地主，在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间都可能形成“伙种”关系，因此中共在减租初期，明显规定了伙种与定租在减租额度上的不同，以避免损害农村中、贫农的利益。至于对“安庄稼”的态度，则充分体现了中共减租政策的灵活性。在这种租佃形式下，佃户吃、住都在主家，作为回报，需要为地主提供无偿劳役，从而具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一种剥削性较强的租佃形式，因此在绥德分区，“安庄稼”遭到边区政府的激烈反对。但是在延属分区，“安庄稼”却受到了边区政府的鼓励。“安庄稼”能让地主解决新来移民缺乏生产资料和住房的问题，这对于地广人稀，急

1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48 页。
2 《边区的土地租佃形式》，《解放日报》1943 年 1 月 23 日，4 版。

需移民垦荒，又不希望增加负担的边区政府来说，是极为有利的。[1]

二、初次减租与地主的反抗（1940—1942 年）

绥德分区土地问题的复杂性，与中共在该地区建立政权的曲折过程相关。早在 1934 年，清涧已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分配了土地，绥德东区的一些联保也分配了土地，米脂成立过米东、米西革命委员会。但 1936 年由于国民党的“围剿”，上述分过土地的地方和游击区，相继失守，农民分得的土地多数回到了地主、富农之手。1937 年 11 月，八路军进驻警备区，与国民党二区专员何绍南联合发布“土地维持现状”布告。然而，随着 1938 年双方摩擦升级，何绍南组织富农同盟会、哥老会，发动地主、富农收回农民土地。而中共的地方党组织，在八路军的支持下，亦动员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地，尤其 1939 年 9 月八路军占据上风后，许多 1938 年被地主、富农夺去的土地又回到农民手中。[2]双方的角逐导致政治局面的动荡，一些地主与农民甚至私下达成默契，对何绍南称土地已归地主，对中共则称土地已归农民。[3]

1940 年 2 月，何绍南被赶走，绥德结束了长达数年的双重政权。随之，绥德特委发布了一个“土地问题暂行调整办法”的指示。首先，承认 1937 年“土地维持现状”公告有效，1936 年以前被地主收回的土地归地主，未收回的归农民；1937 年后被地主、富农收回的土地，应归还农民。其次，兼顾各方的土地权益。如规定已分得土地的农民，1937 年之后再典进土地，足够耕种者，应让出部分土地给无地农民；1936 年收回土地的地主、富农，应出租土地给无地农民；因土地革命完全失去土地的地主、富农，政府应从公田或分得土地的农民手中调剂予其部分土地。第三，维持现有租佃关系。如承认 1937 年之后土地典卖关系有效；在未经土地革命地区维持土地现状，但地主不得随意抬高地租或转租他人；租种、伙种土地多的地主、富农应将部分土地，以活租形式让给无地的农民。[4]但是，对地主、农民双方的要求，以“自愿”为原则，而不许强迫，所以该“办法”的实施很难产生实际的效果。

这时期的土地争端主要表现为地权归属问题。一是“归地”问题。“归地”在不同地区执行效果差异很大。[5]有的地方（如吴堡）将土地革命时期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部“归”给农民；有的地方只是“归”了部分土地，农民要就“归”，不要的不“归”；有的农民因为过去国共政权的角逐，地归来归去，害怕麻烦，或担心何绍南卷土重来，干脆放弃；有的地主不敢不交地，农民又不敢明要，所以私下达成协议，搁置地权归属问题；还有的地方，农民、地主都不来要地，导致土地荒芜。[6]二是“拼地”问题。所谓“拼地”，即在未完成土地革命的地区，农民要求地主“欢迎”（献出）点土地给农会，租给无地的农民，称为“农会地”。

---

1 《边区的土地租佃形式》，《解放日报》1943 年 1 月 23 日，4 版。关于政府对“安庄稼”在延属与绥德分区的不同态度，见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pp98-104.

2 1939 年绥德特委的报告称，“关于土地问题在下层方面大半都归回来了”，“被富农要的土地，现要回到群众手里的，是解家沟联保，土地大部在群众手中……东区枣林坪联保大部归回……葭县第四区为土地双方激烈争论中”。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28 页。

3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23—28 页。

4 这份文件，收于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28—30 页。

5 如义和三乡石堆山土地革命时分地 150 垧，只归了 68 垧，40 垧庙产和 40.5 垧地主、富农的地未归。义和区委书记说，该区九个乡，“一乡归了 3/4，九乡全归，七乡差不多，五乡归了一半，其余大体都归了。”见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31 页。

6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31 页。

有的农民误把“拼地”当做土地革命时期的“分地”，致使“分地”、“拼地”、“归地”三者混淆不清，为以后的地权争议埋下了伏笔。[1]

1940 年 7 月，绥德警备区进行了临时参议会选举，通过了《减租减息暂行办法》，正式将“减租减息”工作提上日程。《办法》规定了根据收成进行“减租”的基本原则，丰年按约定租额减 25%，平年减 40%，歉年减 55%，若收成在三斗以下，则免租；规定伙种的分成标准为“主四佃六”，安庄稼为“主四成五，佃五成五”；严禁押租、转租，地主无故不得退租、更换租户。[2]但初次减租的效果并不明显。1941 年米脂印斗乡九堡三个行政村租种交租情况是：

表三　米脂印斗乡九堡三个行政村的租种交租情况

交租成数	租佃件数	百分比
未成	20	6.2%
三成以下	34	10.5%
三成至四成五	72	22.3%
四成五	47	14.6%
四成五以上	150	46.4%
总计	323	100%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31 页。

1941 年该堡经政府鉴定为“歉年”，按照规定应在四成五以下交租，而实际交租超过规定的占到了 61%。印斗乡十一堡（为“平年”）三家地主，大半向租户收租七八成，而非规定的六成。绥德沙滩坪二乡二行政村（为“平年”），14 家租户按规定交六成只有 1 家，其余都未减租。[3]而“伙种”的减租效果更差。沙滩坪 26 户伙种都按对半分，未减租；双湖峪三乡三行政村 16 户，按规定四六分仅 2 户，其余 14 户对半分；有的地主借口佃户耕作不努力，以倒四六（主六佃四）分；绥德周家硷三乡地主郭怀玉甚至和佃户六五（主）、三五分（佃）；有的地主把分粮雇的工人工资也算到佃户头上。[4]

地主以各种形式抵抗减租。最常见的是变“租种”为“伙种”。《办法》规定了“租种”按收成情况减租，而“伙种”则主四佃六。租种最少减租为 25%，一般按对半分，地主最多获益为 37.5%，而“伙种”形式下最少获益在 40%，再加上能分得柴草和占有伙子的劳动，显然伙种对地主要有利得多。[5]因此，在《办法》出台前后，地主把许多土地变为了“伙种”。葭县乌镇区高家寨 1934 年前没有伙种，而 1942 年 807 垧地，租种减少到 449 垧，伙种增加

1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31—32 页。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17、218—219 页。
3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57 页。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31—232 页。
5 《二五减租与千分之三七五的区别在哪里？》，《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30 日，4 版。“伙种”比“租种”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按当地习俗，“租种”一般租期在十年以上，而“伙种”租期灵活，可以一年一议。《租种变为伙种》，《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19 日，2 版。

到 358 垧。绥德沙滩坪区郝家桥，1940 年前伙种地只有 20 垧，1941 年增加到 105.5 垧，1942 年增加到 277.5 垧。米脂李健侯把石桑坪租种地中的 300 多垧变为了伙种。绥德新店区二乡，1935 年之前“伙种”寥寥无几，而 1935 之后除了外村土地，本村土地大都变为了“伙种”。[1]

《办法》规定了主方在收回自种或典地、卖地的情况下可以收回土地，这给地主利用“漏洞”，夺取佃权提供了条件。典地、卖地的情况因此明显增加了。米脂县地主杜良保租给佃户冯子驹、冯子驶 29 垧地，借口交租太少，将地典出。一些地主甚至公开以土地竞价，谁出价高就卖给谁。米脂印斗区地主常彦丞因为租金太少，将佃户王生枝卖给他的 16 垧土地（仍由王租种）投标，结果同村常维业以每垧 80 元法币竞得。[2]“假典假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为了从佃户手中收回土地，葭县刘木瓜沟地主刘争先，将 10 垧地“假典”给同姓刘进宗。[3]而绥德市地主柳钱氏，典给应德的 15 垧地，被发现是“假典”。[4]地主也以“收回自种”为由变更佃权。如米脂地主高子其，把租给佃户艾克勤的 25 垧地收回自种，但转手就把 29 垧地租给了冯来辅。[5]为了规避减租，地主往往以“自种”为由，收回要求减租佃户的地，转手租给出价更高的佃户。

地主能够对抗减租政策，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佃户的人身支配权。斯科特研究东南亚农民的反叛，提出了“道义经济学”的解释，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恩庇—侍从”（client-patron）的关系。[6]这决定了“主佃”关系一方面体现为“互惠”的特征。如在许多地方，地域习俗约定了地主对农民负有一些基本的义务，比如提供劳动的保险、介绍外出务工的机会、生病时加以救治、节日庆典提供娱乐节目（如唱戏）、歉收时减租等。[7]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绥德分区的一些农民就信奉地主是“恩德财主”[8]，基于主佃“恩—从”关系，不愿意公开减租。有些农民还积极配合地主，对抗减租。米脂刘家卯地主姜保齐的伙子李生元四处宣传，“穷人总是沾有钱人的光”，分庄稼时，李说，“什么公家规定，我就按停（半）分。”[9]地主也主动加强“主佃”之间的“情感”联系。如刘争先对交租的佃户说，“我们几年的交情了，你看的装去。多装多吃两颗，少装少吃两颗。”伙子碍于“情面”都多装。双湖峪三乡地主马德庵讨租时，带上四个果馅或烧饼，使伙子“不好意思”减租。1942 年 2 月，米脂县政府委员会上，地主代表就强调，伙种“对半分”是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93 页。《租种变为伙种》，《解放日报》1942 年 5 月 19 日，2 版。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32—233 页。
3 《刘木瓜沟减租斗争》，《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16 日，2 版。
4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59—60 页。
5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60 页。
6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 年。
7 Ralph Thaxton, Tenant in Revolution, Tenacity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Modern China, 1(3), pp323-358.
8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41 页。
9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51 页。

出于“主—佃”多年形成的“感情”纽带。[1]因此，在主佃“恩—从”关系下，各种“明减暗不减”的情况大量存在。米脂印斗区三乡地主常国维命令伙子将减了的租子还回，对外称是伙子“借了他的粮”。绥德义合思家沟的富农，对照旧交租的佃户说，“我们对减租只是袖里来，袖里去（不明说，暗地通融）。”[2]甚至有的公开与政府减租令对抗。绥德黄刘氏租给佃户 8 垧地，租额四斗及洋芋、南瓜若干，超出减租规定，还声明“与政府法令无关”，“要地就退”。政府念其为寡妇，未予惩罚，但责令其将多收的一斗一升租、一驮炭退给租户。[3]

地主与佃户的“恩—从”关系，尤其体现在“欠租”问题上。按照绥、米农村的传统习惯，遇到荒年歉收，农民可以缓交、少交地租，虽然农民应该在丰年补上欠租，但一般来说，旧租未偿，又欠新租，日积月累，“积欠”很难还得上。因此，“欠租”非常普遍。如地主常彦丞的三个佃户，种地不过 20 垧，欠租达 75 石、65 石、61 石，有的是从清末开始欠下的，已无偿还可能。如果说，清季地方习俗还不允许地主“催账”，农民对于“积欠”尚能蒙混过关的话，那么民国以来随着绥、米一代商业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地主开始撕下脉脉温情的面纱，利用各种手段催收“欠租”了。[4]一是搜刮余粮，即一旦遇到收成稍好，就催交“欠租”，毫不顾及“不可催收”的旧俗。二是以欠租为由而收地。比如地主故意把一些土地典给农民，取得“典价”，第二年就通知租户，该地已从租户“欠租”中拨充典价由地主赎回了，这样农民既损失了钱，又失去了土地。有的农民将地典给了地主，仍由其租种，而一旦向地主赎回时，地主就索要欠租，农民无力偿还，不得不变典地为卖地。[5]“欠租”也成为地主对抗减租的强有力手段。在减租令实行之前，农民还可以拖欠度日，而农民一旦提出按照政府规定减租的时候，地主就会和农民清算“积欠”，结果农民损失得更多，减还不如不减。

地主在乡村的支配权未受到根本挑战的情况下，减租很难推行下去。1940 年后中共在绥德分区实行“三三制”原则，组织政权，将大量地主、富农吸收入参议会和政府，更为地主利用“公职”，对抗减租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葭县，距离减租模范区乌镇政府仅五、六里地的石板村，自 1940 年以来居然六年未减租，就因为村内办事人员全为地主、富农所把持。[6]在另一些地方，当地干部屈从于强大的地主势力，敷衍减租工作。绥德辛店区延家岔乡是征粮试验区，区、乡干部全集中在这里。参议会推选延培支、延文梅（乡小学校长）负责减租，效果不好，区上干部下来检查工作，代为“包办”，一下午就退完了粮，见农民都说，“按公家定了”，实际则明减暗不减。西北局调查组到该村时，农民三缄其口，“见了公家少

1 《刘木瓜沟减租斗争》，《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16 日，2 版。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60 页。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42 页。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61 页。
3 《黄刘氏违法重租》，《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24 日，2 版。
4 关于“商业化”对乡村传统“互惠”关系的冲击，见 Ralph Thaxton, On Peasant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sistance: Towards a Theory of Peasant Mobilization and Revolutionary War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odern China , World Politics,(30)1 , pp24-57.
5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64—65 页。
6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27 页。

话”，延文梅开始还积极配合调查组的工作，但在儿孙的劝阻下，闭口不言。[1]一些低级别的乡村干部还不得不忍受地主的欺凌，如前述常彦丞将佃户王生枝的地收回卖给常维业的例子。王生枝是该乡的“锄奸委员”，号称四阎王的常彦丞却轻蔑地对王说，“叫你舍（住）不定滚南路，看你狗日的还办不办公啦？”[2]葭县城区二乡保长公开宣传减租，私底下却屈服于该乡地主（拥有一千多垧地）的权威，主动多交租子。[3]地主还利用担任公职的便利，垄断信息，加强其在乡村的权力。刘争先利用在“区”上工作过的优势，四处造谣说，“八路军快走呀！八十六师快来呀”，吓得农民不敢减租。[4]

因为推行“三三制”的缘故，一些地方干部成为了地主的保护人。葭县城南关区小石桥的高拐子，租了三保屈家庄尚见高的 5 垧地，尚转手将地“假典”给高道五，高不服上告到保、区政府，保长、区长偏袒地主，判地归尚，使高失去了租佃权。[5]地方干部偏向地主的事情看来非常普遍。贾拓夫在检讨这时期党的工作时指出，“（干部）到处和地主拉关系，搞三三制，没有把减租当中心”，即使一些地方减了租，“大多还是采取行政和干部去强迫减租的，或者是恩赐的观点出发”，不敢发动群众，甚至有的地方取消了农会，“给群众头上泼了冷水，限制了群众斗争。”[6]到 1942 年底，中共已经意识到，是时候放弃“恩赐”的减租方法，应该将群众动员起来，向地主在乡村的权力发起全面进攻，才能将减租运动真正推行下去。

三、群众动员与二次减租（1943 年—1944 年）

1942 年 1 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承认农民是抗战的基本力量，但大多数地主有抗日的要求，资产阶级是现时中国比较先进的社会成分，因此要求地主“减租减息”的同时，农民“交租交息”，保护地主和富农的人权、地权和财权。以“三三制”政权为调节各抗日阶级内部关系“合理的政治形式”。[7]但是，正如上文所揭示的，在实际运行中，“三三制”和减租减息，成为地方政权两个相互矛盾的任务。由于地主对减租减息的反抗，以及地方干部为了推行“三三制”而迁就地主的利益，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反过来影响了农民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因此，这个土地政策虽然影响很大（今日讲抗战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恐怕都绕不过这个文件），但仅仅执行了不到一年，中共就不得不改弦易张，进行土地政策的重大调整，开始“二次减租”。[8]

---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40—241 页。《绥德延家岔减租调查》，《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26 日，4 版。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32—233 页。

3 《在减租斗争中》，《解放日报》1942 年 12 月 9 日，2 版。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67 页。

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94 页。

6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168—169 页。

7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196—202 页。

8 1942 年 1 月中央土地政策在绥德分区的影响并不大。这是因为：其一，之前已有 1940 年《减租减息暂行办法》，《办法》与中央文件精神基本一致，而且中央文件规定各地可以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因此《办法》在绥德分区仍然有效。其二，1942 年 10 月西北局关于减租减息的指示，很快改变了边区土地政策的风向，绥德减租政策亦随之转变。

“二次减租”的纲领性文件是1942年12月边区政府通过的《边区土地租佃条例》。《条例》根据西北局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而形成。“指示”首先就指出“三三制”实行后，有些地方过于迁就地主，怕与地主闹翻，“未认真实行减租”，从而存在着大量“明减暗不减”的情况，总体租种减的多，伙种减得少。地主通过收回租地、假典假卖、提高租额、重量土地、租种改伙种、定租改活租、粗粮交租改细粮交租、预租现租、大斗收租、逼收欠租、额外索取（杂租、送礼、无偿劳役）等手段，抵抗减租。[1]有鉴于此，首先要保障农民的“佃权”，严格收回租地的条件，严惩假典假卖、转租牟利、预租、额外需索等现象。其次，对民间各种租佃形式做出了明确的说明，以便地方干部更好地执行减租，如明确区分了租种与伙种。[2]最重要的是，指示要求转变减租的工作方法，不能“单凭政府减租法令的公布”，而要全力发动群众，推动减租工作的深入开展。[3]

绥德分区从1943年开始进入了减租的第二阶段。由于强大的地主势力和紧张的租佃关系，绥德“二次减租”经历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动员，从而成为陕甘宁边区减租的重点区。最初，葭县“自下而上”的群众减租运动风起云涌，中共适时地支持和领导了葭县的减租斗争，并将其经验逐步推广到绥德、米脂一带，从而在绥德分区全面清算了地主在乡村的势力。

群众动员的“减租运动”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调查阶段。在这一阶段，上级政府（区、乡）派出调查组，深入乡村就政府减租执行情况进行调查。第二，动员阶段。在调查清楚减租情况后，上级派出的干部配合地方干部，发动积极分子，对农民进行减租动员。第三，召开减租大会。在农民动员起来后，即召开减租大会，由于主佃双方直接冲突，减租运动在这一阶段达到高潮。第四，巩固减租成果。在成功迫使地主减租之后，还要保卫减租胜利成果，因此减租斗争之后一般都成立“减租会”（或称伙子会、减租保地会、租户会），保障佃权，发展生产，并取代了部分基层政府的职能。

（一）葭县犊牛沟的减租——对同村中小地主的斗争

葭县镇店区犊牛沟村，有地主富农12家，土地最多的张慕宽有105.7垧土地，其余都在80垧以下，是典型的中小地主居多的村子。地主的土地大多都在本村，很少出租给别村或在外村拥有土地，“主—佃”双方多是同族人（张氏是大姓）。[4]这使得减租斗争必须借助外来力量才能开展。

1943年2月，县委决定配合春耕任务，在犊牛沟打响减租工作的头炮。于是，派了两个干部，指导区乡干部，宣传“分柴能烧火，分粮能吃，分草能卖钱”，调查减租。开始分两组，一组调查地主，一组调查佃户，结果佃户不说实话，因此调整策略，集中精力调查佃户，查出未按规定减租的八家。2月13日，召开“租户会”，40多家伙子和地主都到场。乡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202—203页。

2 鉴于减租令公布后，大量租种变为伙种的实例，《解放日报》用较大篇幅对“活租”与“伙种”进行了区分，强调“边区内对地主只出土地的‘伙种’，今后应当一律称为活租。”（《边区的土地租佃形式》，《解放日报》1943年1月23日，4版）这一认识写进了《边区土地租佃条例》。

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204、207—212页。

4 《犊牛沟减租斗争》，《解放日报》1943年10月7日，2版。

长张慕裕主持会议，“多分的要退，还要给一至五倍的处罚”，经群众决议，罚张慕宽粮八石一斗（张多收了一石七斗），张慕敏九石五斗，张慕谦两石。租户郭树枝自愿多给张慕敏交租，隐瞒不报，引起了“公愤”，因此决定把郭多交的一石粮，分给大家，还抽了郭的 12 垧地租给别人。这时，区上干部觉得群众罚粮有些“过火”，于是出面调和，提出向地主“借粮”：张慕信五石，张德禄二石，张国标一石，张慕永（中农）自愿出一石。张慕信被查出私藏粮食之后，改借粮为罚粮。共计退粮 15 石，罚粮 30.15 石，借粮 4 石。为了庆祝减租斗争的胜利，杀了一口 39 斤半的猪，做了 4 斗小米饭，一百多人大吃了两顿。[1]

为了巩固减租成果，决定成立“减租会”。选出张慕裕、阎鹏耀、张德有、张慕汉、张慕弟五人为委员，一人领导变工队，一人管账、借粮，一人管开老坟地，一人管清理户口，乡长总理全局。“减租会”最大职权是调配土地。1943 年春就调剂了 121.5 垧地给 18 家没有土地的农民。此外，将罚粮所得用于开展村里各项事务，除减租大会开销之外，卖驴两头用法币 4,500 元，卖棉花给贫农纺纱用 5,909 元，招待费 150 元，学校费 150 元，送礼 200 元，共用去 14,455 元，结余 22,679 元。犊牛沟“减租会”不仅保障了农民的佃权，而且已经将乡政府的一些职能取而代之了。[2]

（二）葭县木头峪减租——对“不在乡地主”的集中打击

由于犊牛沟村土地大都在本村，缺乏“不在乡地主”，因此其减租动员的关键在于区乡干部介入，打破熟人社会，然后再由本村积极分子组成减租会，保卫减租成果。然而，在拥有“不在乡地主”的木头峪，这种动员模式并不适用。木头峪是店镇区五乡的行政村，虽然村子内部土地租佃关系较为简单（多为伙种、活租），但是地主苗庆宝、苗庆涯在外村拥有大量土地，周围几个乡的几十家佃户租着两家的地。苗庆宝还将一部分土地出卖，在榆林投资生意，全家都住在城里，属于典型的“不在乡地主”。

因此，如何将分布在不同乡的佃户组织起来，成为木头峪减租的关键。受到犊牛沟减租斗争的鼓舞，六乡的“积极分子”先行动起来，准备到木头峪“退租”。为了打消一些佃户的疑虑，“积极分子”号召组织“减租会”团结佃户，“要一起去，一起回来”。但分布各乡佃户的动员并非一帆风顺。七乡张顺家沟村，由区长陈昌林亲自出面，动员佃户到木头峪减租，效果却不明显。该村有 32 家木头峪的佃户，只有 6 户表现积极，7 户怕惹事，3 户动摇，有 16 户未响应。但是，在各乡乡长的动员下，还是有一、二、三、五、六、七乡的佃户 100 余人，由每村选出一个组长带领，先后到达木头峪，开始“退粮”。

佃户们成立了各乡租户联合大会，选出马支福、乔增明、高凤详等五人为减租委员，登记、“退粮”、算账，查出苗庆涯多装了二石一斗七升，苗庆宝多装了四石多，群情激奋，要求罚两人各二十石粮。怕地主将粮食转移，减租会连夜分粮，到次日早晨，罚了苗庆涯二十石粮，由于苗庆宝全家都不在，将其院子十石麦子和卖地的五万余元，折合成粮，全部分了。

1 《犊牛沟减租斗争》，《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7 日，2 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38 页。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38—239 页。

为了庆祝胜利，杀了一只 43 斤半重的猪，买了 120 斤白面，几十人从上午吃到下午。受到先头佃户成功减租的鼓励，此后有陆续到来的佃户要求“算旧账”，区上干部无论如何劝阻都不听。[1]

（三）葭县刘木瓜沟减租——斗争顽固地主刘争先

与犊牛沟和木头峪减租斗争对象是作为“群体”的地主所不同的是，刘木瓜沟的斗争对象是典型“个体”——顽固地主刘争先。刘中学肄业，当过村长，是国民党党员，在联保处任职数年。他利用当村长的便利，将各种赋税转嫁给村民，人送外号“活坏人”。刘木瓜沟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区，在中共建政之初，刘处处抵触新政权。边境形势紧张就说，“八路军快走了，住不成了”；诋毁变工队是“强权”；动员移民时就说，“移下去当兵去”；组织自卫军基干班就说，“抓兵哩!”待政府宣布减租令，他就通过倒佃“假典”、收回自种、大斗收租，结合威逼利诱、假装仁慈、散布谣言等方式，加强对佃户的控制，使佃户不敢响应政府号召减租。刘争先利用各种手段维护地主在乡村的支配权，具备了顽固地主的典型特征。

在犊牛沟和木头峪减租斗争的影响下，一些参加过土地革命的“积极分子”先组织了起来，找乡长作主，逼刘争先减租。刘起初试图蒙混过关。这时，村里的党员用木头峪减租的事例，教育佃户马海礼、马海良、马进业、马继业等人，尤其说服了被刘争先骂过的刘召先，约定召开减租会，斗争刘争先。大会选参加过木头峪减租的马支福为主席，痛诉刘争先三年来多收租三十石，刘丕先多收二十石九斗。刘召先率先发言，要求对二人加倍“罚粮”，以平民愤。而受刘争先庇护的李浩、马思来公开唱反调，“罚不罚管他，何必惹人呢”，被马支福大声呵斥，于是李、马二人被群众用绳子捆绑起来。刘争先见大势不妙，仍以其父是“行善散药”的恩德财主，为自己辩护，但淹没在一片群众的呼喊声中。最终，罚了刘争先粮三十石，先罚刘丕先二十石。接着，成立了六乡减租会，选出刘进先（刘木瓜沟人）、马得川（在山上人）、马支福（东山人）、马进昌（东山人）、刘召先（刘木瓜沟人）、马心亭（高窦家沟人）、马应田（七乡高家山人）为委员，连夜“退粮”，直到第二天刘争先退了二十石，仍欠十一石，刘丕先退了二十石，仍欠六石，都打了欠条。七八十人热闹了两天，吃了三顿饭，消耗三石多粮，宣告了减租的胜利。[2]

在中共领导的减租运动中，对典型顽固地主的斗争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刘争先拥有土地 368.25 垧，在绥德分区的地主中并不算突出，但他所在村子是过去的“游击区”，地主在乡村的势力很大。刘争先利用制造舆论（散布谣言）、扶持势力（如李、马等人）和强化“恩德地主”形象等手段，试图维护其在乡村的支配权，必然成为中共重点打击的对象。但在打倒了刘争先在乡村的权威之后，政府也通过理性教育，进行说服工作。西北调查局的人耐心地向刘争先算了地主和佃户投入产出的账，令刘最终心服口服，承认减租是对的。[3]

（四）米脂印斗区三乡的减租——说服与坦白

上述三个减租事例都发生在“村”一级，参与人数在七八十到一百人左右，减租斗争的

1 上述三段的叙述，均见《木头峪减租运动》，《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15 日，2 版。
2 上述两段均见《刘木瓜沟减租斗争》，《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16 日，2 版。
3 《刘木瓜沟减租斗争》，《解放日报》1943 年 10 月 16 日，2 版。

场所也是在村里或地主的家中，领导运动的区乡干部经常只有区区几人，斗争方式更多是主佃直接冲突。而“乡”一级的减租会参与人数更多，组织难度更大，不仅需要县区干部、积极分子的介入，而且更多地要通过“说服”与“坦白”，迫使主佃双方发生转变。

米脂印斗区（原称民丰区）三乡主佃“恩—从”关系比较牢固，县委来调查的时候，许多伙子因为和地主串通隐瞒，甚至不清楚自己交了多少租。打破这种“明减暗不减”局面的关键，在于打消伙子心中的疑虑，使他们敢于起来斗争地主。1943 年 9 月 29 日在吕家硷召开三乡群众大会，“积极分子”首先就对伙子们进行了“说服”工作：针对所谓“恩德财主”，指出财主并不恩德，否则就不能发财；针对伙子们被地主“抽佃”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明白只有起来斗争地主，才能“保障佃权”；揭露破坏分子的谣言，使群众相信边区是“安全的”。经过耐心的“说服”，伙子们的斗争热情被激发了出来。常金山的伙子吕占修是参议员，在农民中有“威信”，带头出来主动承认隐瞒的事，紧接着 14 个伙子纷纷出来坦白。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第二天杜聿明的掌柜高贵绅就表示愿意“退粮”。会后麻家渠常国维强迫伙子的事暴露，引起公愤，于是决定 10 月 5 日再开群众大会，斗争常国维。群众要求罚没常 18 垧地的地租，常不得不承认了错误，“老脑筋，想不开，愿意听候政府处罚。”在紧张的气氛下，乡里最有势力的大地主杜某某，向主席台递了条子，“我去年没按公家分粮，请求政府处罚。”主席当众宣布了条子，接着 8 个伙子和 10 家佃户揭发了地主的恶行，一些地主也主动“反省”了他们拉拢伙子、隐瞒政府的事实。三乡减租斗争，共揭发了 9 家地主隐瞒事件，涉及 22 家伙子，其中活租、伙种 16 家，安庄稼 6 家，共减土地 226.5 垧，退粮 12.755 石。会后，群众纷纷称赞，“公家整风（指彻底减租）实在好的厉害。”

三乡减租的另一个成果是改组了该年春“勾账”运动中成立的“租户会”。“租户会”会员很多，但只有一个主任，平时工作基本陷入停顿。改组后的吕家硷伙子会设一个主任，两个小组，每组有会员六七人。乡租户会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下分三组，分工合作，帮助政府处理问题。马家渠的伙子会订立六项公约：1、不违背政府减租法令；2、不受地主欺骗；3、不破坏会员利益；4、一致行动；5、要做生产变工的模范；6、在政府号召和公事中要做模范。[1]这表明在减租动员之后，租户会已经逐渐向正规化和体制化转型，成为乡级政权的重要补充形式。

（五）绥德市八个区的联合减租——协商与斗争

绥德是陕甘宁边区最大的商业文化中心，因为顾及到绅商阶层的利益，最初这里的减租运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展。1942 年 10 月，绥德县就已经在各区成立“减租减息检查会”，各乡参议会向居民小组，宣传减租条例。[2]该年底，绥德各区以下的减租运动，在各种减租会组织的领导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义合区就通过乡群众组织、参议会、群众大会、检查小组等形式，推行减租减息。[3]在减租检查会的活动中，“开明绅士”起了重要作用。如米脂河岔区（著名的杨家沟所在地）的马醒民、马光九，姚镇区的李凤雄、马聘三等人，

1 以上叙述均见《米脂民丰区三乡的减租斗争》，《解放日报》1943 年 12 月 6 日，2 版。
2 《绥德县各区成立减租减息检查会》，《解放日报》1942 年 10 月 27 日，2 版。
3 《绥德义合乡怎样实行减租交租》，《解放日报》1942 年 12 月 11 日，2 版。

都是减租检查会成员，积极参与减租宣传与教育；卧羊区三乡地主张善书主动宣传，“减租是为了大家有饭吃”；绥德辛店区一乡的地主王随合主动给佃户减租。[1]边区土地租佃条例公布后，著名士绅安文钦（分区参议会副议长）、刘绍庭、乔松山（司法院长，葭县有百余垧土地）等纷纷出面，向民众解释减租减息的好处。[2]地主中开明人士现身说法，注定了最初绥德的减租是“温和”的。

但是这种“温和”减租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将群众动员起来。减租检查会中大量士绅的身影，说明绥德 1942 年底的减租正是贾拓夫所批评的典型“恩赐”模式。1943 年春耕开始，绥德各地的“农会”逐渐得到恢复，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减租运动逐渐占据上风。[3]虽然“开明士绅”现身说法仍得到了保留，但群众斗争的方式，已经成为绥德 1943 年减租运动的主旋律。

1943 年 12 月召开的绥德市八个区租佃户和二三百地主的减租座谈会，就是群众斗争模式的显例。会上租佃户的发言非常积极。首先站起一个年轻伙子说，去年他的地让水推了，地主逼着要现租，并将地抽回，结果在政府的帮助下，地主退了租还还了地，“减租后，我更加油生产，今年的菜种的特别好，日子过好了，还娶了老婆。”继起发言的是一个佃户，他租了 8 垧地，去年地主收了十成租，今年按政府规定收五成，地主就威胁要把地抽回。群众呼喊道，“不行，地不能抽”，其中一个人说，“我的意见仍要他种，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回答道。这时一个老汉站起身，“我种了地主李××的地，从前那地是个下地，现在成了好地，……去年我们对半分，今年我依四六分，地主要抽地。”大家都反对抽地，并要求把去年多交的租子“退回”。伙子叶马栓也诉说了他的苦恼，“去年伙种了 4 垧地，被水推了，一满是石头，今年我好不容易把地做好了，地主却要抽地，并且还说他今年出了劳动要对半分，其实他并不是来劳动，只是来照看。”此时，地主站起来解释，说今年地是按公家法令减的，没让对半分，去年地不好，今年地好了当然要自己种。引来一片责难声。北门湾的一个人说，“那不行，地一定要叶马栓种，去年的地全是石头，今年成了好地，就要抽回，没有这个道理。”一个地主站起来调和道，“叶马栓是好劳动，何必为 4 垧地争论呢！只要有力气，哪怕没地种”，但立刻遭到众人驳斥。最后决定不准抽地，地仍由叶马栓种。宁少武要大家评评理，今年地主讨租，把旧帐算了，结果除了今年租子外，还欠地主六斗多粮，减还不如不减。这一番揭露使地主非常难堪，红着脸说，“应退的租子什么时候来拿，我什么时候给他。地仍要他种去。”在佃户们发言之后，士绅代表安文钦现身说法，他拿出一张盖有乡政府印章的租约和勾掉的一笔旧账，号召其他地主也要按政府要求勾账换约。最后，会议通过两项提议：1、阴历新年之前地主必须到乡政府勾账、换约。2、今后具体规定伙种之山、水、川地地主应摊的份数，不能随便给伙子两担了事。此外，地主吃菜要限制，要记账。[4]

---

1 《绥米各地成立检查委员会，开明地主自动减租》，《解放日报》1942 年 11 月 25 日，2 版。《一个赞成减租的地主》，《解放日报》1942 年 12 月 13 日，2 版。

2 《用群众的力量保证实行租佃条例》，《解放日报》1943 年 1 月 13 日，1 版。

3 《绥德农民组保地减租会》，《解放日报》1943 年 1 月 8 日，2 版。《绥德米脂恢复农会》，《解放日报》1943 年 5 月 10 日，1 版。

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43—244

不难看出，绥德的减租将群众斗争与典型地主的现身说法两者相结合，充分运用了“协商”和“斗争”的两种手段，在地主主动让步和群众积极斗争的互相配合下，拥有强大地主制的绥德打开了减租运动的新局面。

上述五个典型例子虽然不足以涵盖绥德分区减租运动的所有细节，但是已经能够凸显减租运动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区乡干部在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作用伴随着减租的全过程：区乡干部是发动减租的核心力量，在打破地方熟人社会的封闭性方面，作为“外来者”的上级干部具有优势；租户的动员与减租大会的召开，都需要区乡干部的介入，他们还要纠正可能出现的“过火”趋势，使大会不偏离正轨；最后大会结束后，区乡干部还必须监督“减租会”的运作，保障减租成果。第二，不同行政级别的减租运动应具有不同的动员模式。在“村”一级，由于主佃双方经常见面，直接的冲突与斗争不可避免，因此重罚地主、到地主家里“退粮”以及吃饭庆祝等，都是经常采取的方式。但是在“乡”一级，这种直接、激烈的斗争方式，则容易让地主望而却步，因此采取相对间接、温和的方式，如促使地主“反省”，让开明地主出来现身说法等，能够起到更好的动员效果。第三，减租运动的关键是摧毁地主在乡村的支配权。在运动中，区乡干部必须想法设法，打破主佃“恩—从”关系，将佃户动员起来，接受党的领导。这时，“积极分子”的作用就得到了凸显。积极分子可能是乡村的党员、受过地主压迫的典型佃户、有过土地革命经历的农民、村干部、参议员等，他们有号召力和斗争性，能积极向地主权威发起进攻，往往在减租动员遭遇僵局的时候能够打开局面。同时，为了摧毁地主势力，要树立典型地主作为斗争目标（如刘争先），这在那些接近“国统区”、地主势力顽固的地区尤显重要。为了打破乡村依附关系，还要严厉打击那些袒护地主的佃户（如刘木瓜沟的李浩、马思来）和可能形成的地主联盟（如绥市联合减租中的“帮腔”地主）。当群众动员使地主颜面扫地，乡村主佃“恩—从”关系土崩瓦解之后，乡村权力关系的根本改变已呈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中共在减租运动中最乐于见到的局面。

四、减租运动的成效——乡村权力结构的改变及其限度

当时中共的文件和出版物中，都普遍强调减租取得的巨大成效。一份文件中提到，仅根据绥德六个区、米脂三个区、子洲五个区、清涧三个半区和葭县个别村的不完全统计，1943年10到12月绥德减租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就勾欠粮食31732.82石，退租1842.73石。与此同时，大量土地易主，在绥德分区执行减租彻底的地区，据称50%至80%地主的土地转入农民之手。[1]在获得了粮食和土地之后，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积极投入农业生产活动之中，并且大力支持中共在乡村推行的大生产、反奸防奸等社会运动，成为中共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力量。

确实，减租首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退粮”使农民可以纾解基本的生存困境。绥德郝家桥贫农刘永山，家有4口人，仅有山地5垧，租种土地23垧。1943年共收粗粮12.9石，草2300斤。未减租前，须出租粟4.75石（占租地收入的50%以上），除去公粮负担和自家消费，欠粗粮0.09石。减租后，少交1.54石粮食（占租地收入的18.3%），除去公粮

页。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171页。

负担和自己消费，余粮 1.455 石。[1]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朝不保夕的农民来说，由欠粮到拥有余粮，是他们改善生活，来年投入生产的重要转折点。

除了生活的改善，对农民来说，更重要的是直接获取土地。在党的文件和出版物中，土地由地主流向农民的例子不胜枚举。佳县高家寨子 1943 年至 1944 年共减租 167 石。到 1944 年，全村中、贫农共买进土地 72 垧，卖出 9 垧，净进土地 63 垧，典进赎回 163 垧，典出抽走 101 垧，净进土地 62 垧。通过典、买地，中农、贫农共获得土地 125 垧。1940 年该村地主占有 71.66%的土地，中农仅占 8.02%，到了 1943 年地主下降为 66.27%，中农上升到 11.17%。绥德杨家塔，13 家地主 4 年中卖出土地 619 亩，占其土地总数的 37%，有的卖出高达 65%。在土地租佃矛盾较为突出的米脂印斗区，贫雇农成为买地、赎回典地的主力。该区三乡某村 41 户农民中，只有 3 户中农（共有土地 130 垧），其余 38 户都是佃户（共有土地 40 垧）。但在 1943、1944 两年，买入地 180 垧，每人土地增加了四到五倍。另一个村 32 户的 370 垧地，只有 1/10 属于自己，其余皆为租地，1944 年租地减少到了 70 垧，263 垧地被农民抽回。[2]米脂民丰区后吕家硷村，其土地大多集中于地主、富农之手，租佃关系非常紧张。全村土地 860 余垧，21 户地主、富农、中农就占了 500 余垧，一户本村大地主拥有 120 多垧地，而银城市、杨家沟、高庙山的“不在乡地主”也拥有 100 余垧土地。而 1941 年减租以来的三年，外村地主 70 余垧地转为本村农民所有，本村富农的 23 垧地也转到贫、中农之手。[3]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

农民增加土地的一个途径是“赎回典地”。绥德分区规定了典地的赎价：每元现洋折合边币三元，每两现银折合边币四元，法币一元等于边币一元。民间习惯以法币“抽赎”，由于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的幅度很大，比起农民原先“典地”的价格，现在实际只需要很少的钱就能拿回土地，从而造成了 1941 年“赎回典地”的热潮。如米脂杨家沟地主马新民，1941 年典出土地 165.5 垧，而其典地多在外村，60 余户外村农民趁机赎回了土地。[4]不过，“典地”的并非都是中、贫农，地主也会典出土地。米脂印斗九保地主典出土地 131 垧，富农典出 12 垧，而中农典出 12 垧，贫农典出 9 垧，地主、富农典出土地多于中、贫农。从土地回赎情况来看，地主赎进土地 58.5 垧，被赎去土地 62 垧，富农赎回 32 垧，被赎去 24 垧，中农被赎去 40 垧，贫农赎进 55 垧，被赎去 35 垧。地主土地进出基本相当，富农土地增加了 8 垧，贫农净进土地 20 垧，但中农也失去了土地 40 垧。[5]可见，印斗九保“赎回典地”中，贫农虽然获益，但中农利益受到了损害。还有中农、贫农利益皆受损的情况。印斗二保地主姜保齐利用边币和法币的差额进行土地投机。其中 158 垧有承典人资料的土地中，68 垧来自 5 户中农，35 垧来自 4 户贫农，中农、贫农都遭受了损失。[6]

虽然“赎回典地”的受益者并不总是中、贫农，但从总的土地变动来看，中、贫农仍是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59—260 页。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62 页。
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60 页。
4 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等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 155—156 页。
5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76、79 页。
6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81 页。

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仍以米脂印斗九保为例，地主通过买进、典进、赎回土地，共 58.5 垧，而同时卖出、典出、被赎回土地 777.5 垧，减少了 719 垧；富农进地 35 垧，出地 73 垧，减少 37 垧；中农进地 47.5 垧，出地 52.5 垧，减少 5 垧；贫农进地 116.5 垧，出地 50 垧，增加 66.5 垧。可见，地主流失的土地很多，而贫农土地增加了不少。[1]如果将买卖土地的数量计算在内，中、贫农仍然是获取土地的受益者。这大致是因为农民更倾向于“买进土地”而非“赎回典地”。

地主不得不卖出土地的主要原因是 1943 年开始实行的“统一累进税”，对他们持有土地非常不利。1944 年米脂银城市六个地主的调查资料显示，其拥有土地数量从 1942 年的 2197 垧，下降到 2092 垧，但是公粮负担却从 111.56 石上升到 154.3 石。公家负担（公粮及其他）占家庭收入比，都不同程度的上升，杜良宝高达 97.2%，冯华甫甚至达到 102.7%，即仅公家负担一项，就使冯的家庭入不敷出。[2]“统一累进税”的实施不倡导地主将资金投入土地盈利，而是鼓励地主出卖土地，投资于边区经济发展需要的工商业领域。在党的经典理论看来，以土地盈利带有落后的“封建性”，而将土地收回自种，或雇佣劳动进行生产，则是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的表现，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形式。向工商业领域的投资，更能促进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此税收政策的推动下，一些绥德分区的地主开始向工商业领域进军了。如米脂地主×××开办了造纸厂，杜量宝开办纺线厂。[3]拥有 200 垧地的绥德双湖峪地主刘万和，投资 2，000 元设立织布厂，有织布机三架，织袜机一架。[4]还有的地主卖了 50 垧地，入股合作社。[5]

地主在减租和税收政策的双重打击下，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米脂银城市六个地主的调查资料显示：冯华臣 1942 年家庭支出占其收入的 107.6%，1943 年上升到 122.8%，连续两年都入不敷出；杜良宝 1942 年是 66.66%，但 1943 年上升为 116.97%。米脂市地主周积堂 1940 年拥有土地 945 垧，此后每年典、卖土地，1944 年只剩 659 垧，其收入也从 1940 年的 103.5 石下降到 1943 年的 85 石，而同期他的抗战负担却从 15.6 石上升到 42.9 石。申日明 1941 年不得不典出土地 35 垧，以补偿入不敷出的家庭开支，1942 年借钱 20，000 元，典出五孔窑，得法币 2，000 元，弥补亏空，但 1943 年他的抗战负担，仍占其收入的 110%。高孝鸿 1943 年的抗战负担占收入的 123%，不得不靠出卖土地、变卖过去经商的存货，补贴家用。[6]绥德的 32 家地主 1943 年共收入 311 石，比前一年减少了 41 石，而支出则是 433 石，倒欠了 122 石。[7]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地主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如原先一顿饭两个菜、三天一顿肉的伙食，变为每天要吃一顿“切切饭”或捞饭；置办新衣服也少了，一些地主被迫参加

1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83—85 页。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63 页。
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59 页。
4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113 页。
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66 页。
6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63—266 页。
7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59 页。

劳动，自己动手纺线织布。[1]

地主地位的下降和中、贫农的上升，使得乡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以绥德两个乡的调查数字为例：

表四　　绥德分区乡村阶级变动表

绥德义合三乡各阶级户口增减

成分	革命前户数	现在户数	增减户数	增减率
地主	2	—	减 2	减 100%
富农	22	2	减 20	减 90%
中农	32	154	增 122	增 380%
贫农	139	114	减 25	减 18%
雇农	25	—	减 25	减 100%
其他	7	—	减 7	减 100%
共计	227	270	增 43	增 15%

绥德延家川三保各阶级户口增减

成分	革命前户数	现在户数	增减户数	增减率
地主	3	1	减 2	减 67%
富农	8	4	减 4	减 50%
中农	85	236	增 151	增 180%
贫农	178	125	减 53	减 30%
雇农	44	1	减 43	减 97.8%
其他	3	3	—	—
共计	321	370	增 49	增 15%

资料来源：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105 页。

由表中可见：第一、除中农外，其他各阶级都在下降。雇农几乎已经没有了，贫农减少了 18%到 30%。地主减少的也很快，义合三乡 2 户地主全部降为其他阶级，延家川也只剩 1 户地主。富农下降的也很快，义合三乡减少了 90%，延家川减少了 50%。第二、中农是各阶级中唯一数量猛增的阶级。义合三乡中农增加了近四倍，延家川增加了近两倍。中农数量的猛增，一方面是因为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后，下降为中农，另一方面是因为贫农买入土地后，上升为中农。第三、富农的减少一方面说明，由于减租运动推行得晚，中农多为近来获得土地，其上升为富农还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则与绥德分区对待富农的政策有关。在租佃关系较为紧张的绥德分区，中、贫农获得土地的紧迫感，促使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将富农，列为与地主一样的剥削阶级而打倒。延属分区那种相对宽松的鼓励富农经济发展，塑造典型“新富农”（如吴满友）的经济条件，在绥德分区并不存在。

以中农为主的乡村，有利于中共各项“社会工程”的推进。在减租运动告一段落之后，中共必须将动员起来的乡村农民阶级的政治热情，转移到增加生产上来。在中共的出版物和文件中，都强调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组织变工、扎工队，迅速投入到了除草、施肥、兴修水利、改良农田等生产活动中，积极参加合作社，掀起了轰轰烈

1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107、114 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 259 页。

烈的大生产运动。[1]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刚刚打倒地主威权、掌握了乡村权力的农民，希望群众动员继续下去，至少不要很快结束。在许多地方，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组织，甚至代替了基层政权，行使权力。掌握了基层权力的是积极分子（大多由贫农、雇农组成），他们更愿意看到地主、富农颜面扫地，永远不得翻身，于是不断地推动减租运动向激进的方向发展。在绥德分区的一些地方，地主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在减租会的强迫下，杨家沟公粮538石，其中523石由地主负担，其他阶层只负担15石。在一些地方，鳏寡孤独和抗属也成为了减租斗争的对象。[2]

中共意识到必须扭转群众组织的“左倾”做法。他们要求群众斗争的减租运动，要以政府法令为依据，“不能无限制地斗争下去”；不能将群众组织与乡村政权相混淆，强调群众组织应在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3]政府通过两个途径转变群众组织的职能：一是将其权力“常规化”。在减租高潮过后，政府希望通过司法审判，而不是群众斗争的方式，确立农民的“地权”。许多“减租会”很快投入到土地仲裁事务中去。据称，某些地方的减租会一天要处理50起租佃纠纷的案件。[4]二是强调区、乡干部对减租会的领导，以引导群众组织的过激行为。如西川瓜园区规定，伙子会和保地会可以处理土地纠纷问题，但一切土地买卖、典赎、倒租都需要乡长签名盖章才能有效。[5]上级区乡干部对减租会的领导，能够纠正积极分子因为是乡村社会的熟人，而屈从于农民过激行为的弊端。现在分区政府开始强调，将各种各样的减租会职能逐渐转移到生产和反奸防奸的任务上来。在一些地区，减租会被改造为变工队，投入到春耕生产中去了。

通过区乡干部代替积极分子，中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全面领导。减租运动之后乡村阶级关系的变化，显然有利于中共在乡村树立权威。首先，地主和富农的式微，使得原先建立在地主权威之上的“恩—从”关系彻底解体，在地主庇护之下的佃农敢于站出来，面对面地斗争地主，保护自己的“佃权”。这使得一大批原先依附于地主势力的农民，被解放出来，而接受党的领导。其次，以中农为主的乡村结构，更容易被中共政权力量所渗透。中农具有极大的独立性，他们不同于雇农，要时刻仰仗于地主的土地出租，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虽然在绥德分区，中农土地数量普遍不足，而不得不租入土地，但在减租运动后，中农的平均土地数量得到了明显增加，自给自足的能力显著提高。因此，中农更容易以“原子式”的独立个体而存在。一旦在地主的权威被打倒后，中共的组织力量，可以很容易地动员这些独立的“原子式”个体，加以整合，重组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

以政权在生产动员中的作用为例。地主是乡村雇佣劳动力的主要力量，而雇农是乡村出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254—255页。
2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253、275页。
3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214—215、252—253页。
4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pp174-175.
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农业），第298页。

卖劳动力的一方，减租后，地主地位的下降，雇农数量的明显减少，使得乡村农业劳动力市场萎缩。贫农由于缺乏土地和劳动力，在农忙的时候，急需劳动力的补充与调剂；而中农由于能够自给自足，若无外力的推动，他们宁愿满足于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调剂。在此背景下，政权在乡村劳动力调剂方面的组织作用就凸显出来。以推广变工队、扎工队的形式，区、乡干部将中农组织起来，促进了中农之间协作与沟通，同时也解决了贫农急需劳动力的困境。[1]可见，减租运动导致乡村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仅为下一步转向大生产运动准备了条件，而且为党的力量渗透到乡村，建立稳固的乡村政权，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
冯峰，（1977—）男，陕西人，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政治史
邮编：710064
EMAIL:yaxash@sina.com
电话：13572251951

1 关于减租运动造成乡村中地主、贫雇农的减少，中农的增加，及其对中共这一时期推进各项“社会运动”（如大生产运动）的积极影响，可见 Kathleen• Hartford, Step by Step: Refor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1937-1945)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204-228.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

梁严冰

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且独特的地位。它不仅在民族危亡之际支持了长期抗战，开创了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教学制度，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并对新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作用与影响。以往研究从解放区或根据地教育史的角度对边区高等教育的概况做了一些探讨，[1]但该领域的研究总体相对薄弱。本文力图在史料重建的基础上，希望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的建立、成就与特色做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考察，并指出其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意义。

一、边区高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

近代以降至抗战爆发前，西北地区虽然有一些高等教育的萌芽，但总体上讲时断时续，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体系。陕甘宁边区更是地瘠民贫、交通闭塞，加之长期以来的军阀混战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得这一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1936 年 7 月，边区首任教育厅长徐特立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当地教育状况时说：“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以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认识字。文盲几乎达到 95%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角落。”[2]1941 年 6 月 5 日，《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对该地区的这一情况再次进行了描述：“陕甘宁边区建立以前，几乎可以说是文化教育的荒原，小学校总共不过 120 处，学生只有 2000 人，一般县份每百人中难得找到两个识字的人。有些县份如华池、盐池等 200 人中才能找到一个识字的。”[3]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其中，建立与实施高等教育，给学生以较高级的专门教育，培养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人才，成为当时中共虽为重要的战略之一。

为此，从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到 1945 年 9 月抗日战争胜利，中共在陕甘宁边区陆续创办了 10 多所各类高等院校。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编年史（十三卷本）”（20&ZD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严冰（1970—），男，陕西延川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陈元晖主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刘宪曾、刘端棻：《陕甘宁边区教育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 年；（加）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年；栗洪武、霍涌泉：《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的办学经验及其意义》，《教育研究》，2002 年第 5 期；梁严冰：《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高等干部学校教育》，《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 年第 6 期等。

2（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第 2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年，第 217 页。

3 《边区四年来学校教育猛烈增加社会教育遍达农村山野》，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74 页。

早在 1937 年 1 月 20 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一、二科）即从志丹迁至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抗大的宗旨是“以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的领导干部为目的。”[1]3 月 2 日，抗大第二期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莅会讲话，勉励学员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以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伟大使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 年 8 月 1 日，抗大第三期开学，该期共招收学员 1372 人，编为三个大队。由于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和海外的爱国华侨，冲破敌人的封锁纷纷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故第一、二大队为红军干部，第三大队为知识青年。学员数量的增加使得学校的校舍成为当时的一个很大困难，于是学员自己动手，到山坡上开辟窑洞。他们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之内，就挖出了 175 孔坚固的窑洞，修筑了长达 3000 米的“抗大公路”，解决了近 2000 人的住宿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学校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奇迹，一个伟大的创举。[2]同月，毛泽东为抗大教员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3]1938 年，抗大的规模不断发展。4 月 16 日，第四期开学，人数剧增、规模空前。据统计本期共有学员 5562 人，其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 907 人，占 16.3％；知识分子 4655 人，占 83.7％。共编为八个大队，其中八大队为女生大队。令人值得注意的是，该期学员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不仅成分多样，而且来自除西藏与青海之外的全国各省市，甚至全家来校，叔侄同学，母女同校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中年龄最小的 14 岁，最大的 47 岁，18 岁至 28 岁的青年约占 85％。[4]之后，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党中央除了在边区以外举办抗大分校外，分别于 1939 年 1 月 28 日、1940 年 4 月 15 日、1941 年 1 月 28 日、1942 年 5 月 1 日举行了第五、六、七、八期开学典礼，招收了大批学员。当时，抗大的生活及办学情况十分艰苦，不仅缺乏粮食、燃料等基本生活用品；而且教学环境随时变化，有时在简陋的窑洞，有时在荒郊野外，有时在行军的路上及战壕里。但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抗大为民族解放而担负的重任，相反它是“中国的伟大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教育里没有一点陈腐的气息，没有一点旧教育的坏的残遗。这里的教育是应用着各种各类新的方式以期完满达到教育的效率和目的。这里的教育是抗战的教育，也是生活教育，也是科学教育。政治军事学习三种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综合的教育。”[5]

继“抗大”成立后，1937 年 7 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并委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等负责筹备工作。11 月 1 日，陕北公学在延安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莅会并发表《目前的时局》的演讲，号召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实现全民族抗战。陕公创办的目的是，在短时间内给大批进入延安的爱国青年以抗战的必要知识，以培养抗战的干部。课程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工作、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等。成仿吾任校党组书记兼校长。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

1 《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 页。
2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7 页。
3 刘宪曾、刘端棻等：《陕甘宁边区教育大事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 页。
4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9—30 页。
5 艾思奇：《救国教育的一个新贡献》，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35—137 页。

抗日先锋队的任务。”[1]1938 年 4 月 10 日，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延安成立。该院的宗旨是：“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研究正确的艺术理论；整理中国艺术遗产，建立中国新的艺术。”，从 1938 年 4 月到 1943 年 4 月并入延安大学为止，鲁艺共招收 4 期学员，毕业学生 502 人。[2]同年 5 月 5 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的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高等院校，张闻天兼任院长。课程设置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党的建设等。1939 年 7 月 10 日，中国女子大学经过数月筹备后在延安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出席并发表讲话。毛泽东指出：“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若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3]1940 年 5 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成立，其前身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主要任务是培养从事青年运动的干部。校长由陈云担任。全校分为六个班，1941 年 9 月并入延安大学。1940 年 7 月，培养与提高边区行政工作干部的学校——行政学院成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院长。其教育宗旨是：培养政治坚定、廉洁奉公的新民主主义的行政工作干部，提高干部的文化程度、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1942 年 3 月 29 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确定其教育方针所遵循的三原则为：一、学习课目要与政府工作沟通；二、学习课目要与社会现实沟通；三、学习程序由具体到理论。[4]1944 年 5 月，边区根据中共西北局的决定，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1940 年 9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农综合性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李富春代表党中央致辞，他指出：我们党必须培养和造就革命技术人员，靠革命的科学家建设抗日抗日根据地和建设将来的新中国。自然科学院的任务是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际统一的人才。[5]李富春任该院第一任院长，后由老教育家徐特立接任院长，校址在延安城南杜甫川。该院从成立至 1943 年延安审干运动之前，得到了全面建设和发展。1940 年 9 月 29 日，延安的八路军卫生学校，奉命改为中国医科大学。其前身是 1931 年在江西创办的红军卫生学校，后随红军达到陕北，抗战爆发后开赴华北，1940 年 3 月迁移延安。因此，它“是中共所领导的历史最长久的一个学校”。[6]医科大学的设备比较齐全，凡普通医学院中应有的各种仪器、图画、组织片，这里都有。校内设有生理卫生室、解剖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细菌检查室、X光室等 10 余间。

1《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87 页。
2 刘宪曾、刘端棻等：《陕甘宁边区教育大事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9 页。
3《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新中华报》报道摘录），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06 页。
4《西北局常委会确定行政学院教育方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27 页。
5刘宪曾、刘端棻等：《陕甘宁边区教育大事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91—92 页。
6 《医科大学——延安通讯》，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16 页。

[1]同时，为了培养各民族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干部，1941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族学院，校址在延安文化沟。这个学院包括了蒙、回、藏、苗、夷、汉等族的优秀青年，根据当时的统计：“蒙占 40%，回占 20%，藏占 4%，苗占 1%，夷占 4%；而内中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者，占 30%；女生 32 人。”[2]1941 年 11 月，抗大第三分校与军政学院三队和四队的高级干部合并组成军事学院。其任务主要是培养团级以上的中高级军事干部。院长由朱德兼任，副院长叶剑英。1943 年 2 月，徐向前接任院长，同年 3 月，军事学院与抗大总校、抗大二分校、七分校合并，仍称抗大总校。

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另外一件值得高度关注的事情是延安大学的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1941 年 8 月 28 日，《解放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3]9 月 22 日，延安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全校师生 500 多人参加。吴玉章发表讲话，他说：“延大成立了，这是教育上的很大转变，中共中央以及边区政府在延安推行新的教育。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即使在今天的大后方“教育仍然是无甚用处”，“目前我们要应付这个革命的时代，教学方法就感到不够，我党实行整顿学校，变成正规化，纠正不切实际习惯。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4]延大创办之初即确定明确的教育方针与目的：“本校以适应日益开展的西北形势需要，实施新型正规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大量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各项专业干部及普通干部。”[5]之后，1943 年 4 月，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1944 年 5 月，行政学院也并入延安大学。从此，延大改设三院一系，即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及医药系。

总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先后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行政学院、中央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泽东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军事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俄文学院、延安大学等十多所院校，这些学校不仅都是干部学校性质，而且是边区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边区高等教育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高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不仅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景象，丰富和创新了诸多教育经验，支持了长期抗战；而且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取得了辉煌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与制度。

在边区高等教育建立之前，如前所述这一地区文化教育十分落后，谈不上有发达的教育

1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0 页。
2《记民族学院　海燕》，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24 页。
3 《陕公、女大、青干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解放日报》1941 年 8 月 28 日。
4 《延大举行开学典礼 校长吴老宣布教育方针 徐老讲政治与技术并重》，《解放日报》1941 年 9 月 23 日。
5《延大教育方案（初稿）》，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28 页。

体系，高等教育更是一片空白。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创办与发展高等教育，不仅彻底改变了该地区文化教育整体状况与构成，而且在马克思主思想体系指导下，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与体系系统地植入陕甘宁边区，并对以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学科设置来看，边区高等教育涵盖了文、理、农、工、医、师范、艺术、军事等几乎全部现代高等教育门类。比如，1944 年 5 月后合并组建的延安大学高等教育体系完整、学科门类较齐全，学校分设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及医药系。其中行政学院分设行政、司法、财经、教育四系；自然科学院分设工学、农学、化学三系；鲁迅艺术文学院分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三系；医药系分设医生班、司药班、助产班、护士班、中医班、兽医班等。[1]从学制与课程来看，边区高等教育也在逐步正规化。比如，延安大学规定行政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制为两年，自然科学院为三年。但年限并非机械的规定，主要以学完规定之科目为标准。课程一般分为全校公共课与各院系专修课两种，另外也设补助课，以适应一部分人的特殊需要。课程的比例，全校公共课占 20%—30%，各院系专业课占 70%—80%；在各院系专业课中，理论政策课占 20%—30%，专业知识与技术课占 70%—80%。[2]从教育类型来看，边区高等教育既有普通教育，又有干部教育与成人教育；从学校类型来看，既有综合性大学，又有军事、艺术、外语、医学等专业性很强的专门学校。从学校的管理来看，集中体现出明显的民主精神。延安大学指出：本校民主精神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学生自治；（二）教学民主。在学生自治方面“提倡自学自治的精神与自觉的纪律，作为本校全体学员的自治组织，有同学会之成立。”“同学会是本校民主生活之集中的表现”。教学民主方面，教育计划的拟定，是先经过开调查会、谈话等征集学员意见后，作为修正补充的根据。[3]在教学过程中提倡自由辩论，质疑问难，自由批判，以达到真理的阐明。

第二，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1939 年 7 月 7 日，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一部分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后，随即向敌后挺进，三个月后到达晋察冀边区的阜平。截止抗日战争胜利，华北联合大学在晋察冀边区硝烟弥漫的敌后战场坚持进行教学和战斗，在 6 年时间里先后毕业的学生达 8000 人，共 80 多个班，连同培养一个时期即分配工作的干部，人数逾万。[4]抗战胜利后，1948 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194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等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0 年 2 月 19 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延安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0 月 3 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而其前身则可追溯到 1937 年 7 月底在延安成立的陕北公学。与此同时，1950 年在华北联大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央民族学

1 《延安大学概况》，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59—162 页。

2 《延安大学概况》，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59 页。

3 《延安大学概况》，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下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73 页。

4 《在斗争中成长的华北联合大学》，晋察冀边区教育阵地社编:《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上册，1946 年 5 月

院。1945 年 9 月 12 日，由艾青、江丰率领的延安大学鲁艺“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赴张家口市，全团并入“华北联大文艺部”，北平和平解放后该团随军入城，成为 1950 年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一直骨干队伍。[1]1945 年 10 月间，党中央决定：延安大学的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行政学院的大部分，除自然科学院大学部最老的两班毕业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各个解放区工作，行政学院和校部预科的陕籍学员留在延安外，其余全部迁徙到东北办学。学员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接见了学校教员和主要领导干部，指出学校向东北转移的目的在于创办“新型的东北大学”。[2]在具体迁移的过程中，自然科学院于 1948 年与晋察冀边区的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改为华北联大工学院，1949 年迁到北京，1952 年 1 月 1 日改称北京工学院。

1946 年春，去往东北道路打通，到达东北后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和东北大学合并改为文艺学院。1948 年沈阳解放后，将分散在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的几个文工团集中起来，在沈阳恢复建立了“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3]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在东北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基础上，分别建立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

1949 年 3、4 月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西安解放后，将延安大学从革命圣地延安迁往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4]6 月 10 日，学校整体顺利到达西安，6 月 25 日，迁至西安的延安大学总校与分校合并，正式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西北民大”），并开始招生。[5]1953 年 3 月 28 日，西北局决定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改名为西北政法干部学校，1958 年 9 月，改名为西北政法学院。1958 年，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延安恢复重建延安大学。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今天中国的许多高等学校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大学、中央音乐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延安大学、沈阳音乐学院等与边区高等院校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不少高校始建时期的主要领导、骨干教师、学科专业设置基础，都来自边区，来自延安。

第三、为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造就与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培养与造就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大批干部及各方面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在眉睫。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并强调：“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6]从而不仅强调了教育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且

1 王云风：《延安大学校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203 页。
2 王云风：《延安大学校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204 页。
3 王云风：《延安大学校史》，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205 页。
4 刘端芬：《从延安到西安》，《延安大学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17 页。
5 刘端芬：《从延安到西安》，《延安大学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519 页。
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 年 5 月 3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

规定了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的基本方针。5 月 8 日，他在该次会议上又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再一次强调：“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1]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必须要培养和造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与人才，这给全党发出了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号召。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对教育在抗战中的重大历史责任问题又进行了阐述，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必须“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2]1939 年 1 月，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包括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及意义又进行了论述与强调，指出：边区实行国防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增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而且要“培养抗战干部，供给抗战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后代，使成为将来新中国的优良建设者。”[3]

正是在党中央与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倡导下，如前所述边区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各高等院校通过创新教学制度、采取灵活办学方式、缩短学制学时以及“急用先学”等方法、措施，为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培养了成千成万分散在全国各抗日战线的干部。这是边区对中华民族伟大的贡献，是边区人民的光荣。”[4]

三、边区高等教育的特色

边区高等教育不仅开创了新的局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凝练与形成了自身非常鲜明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始终坚持“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干部教育与干部培养，早在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曾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5]党中央到达延安后，1937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在其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6]同年 5 月，刘少奇也呼吁：“我们要大批训练军事、政治干部。”[7]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有计划地培养与教育各方面急需的干部就成为当务之急。所以，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实质或宗旨就是“干部教育第一”，即“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

社，1991 年，第 256 页。

1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77 页。

2 毛泽东：《论新阶段》，延安：解放社，1944 年，第 74—75 页。

3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第 39 页。

4 林伯渠：《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47 页。

5 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8 页。

6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77 页。

7 刘少奇：《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78 页。

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1]其目的是“训练千百万优良的抗战干部，培养将来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建设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2]1939 年 1 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指出边区教育是“实行干部教育，培养抗战人才。”[3]1942 年 2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其开宗明义指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4]为了加强对各学校干部教育的领导，中央在领导体制上做了一些调整，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安大学、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并强调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中央还对各学校的干部教育作了具体而明确规定：“甲、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乙、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丙、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丁、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5]

第二，教育教学中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

与同时期国民政府所办的高等教育而言，边区高等教育最为明显的特质就是在教育教学中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因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6]1940 年 1 月 3 日，中央书记处在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首要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7]1940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在现时，毫

1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97 页。

2 《边区国防教育的方针与实施办法（报告提纲）》，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 页。

3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摘录）（1939 年 1 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60 页。

4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62 页。

5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49 页。

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32—533 页。

7 《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2 页。

无疑义，应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1]同年 3 月 9 日，中央书记处在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了各类干部教育中马列主义理论课程的重要性，并“决定 5 月 5 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今年‘五五’为第一届节日”。[2]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重申：“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3]

第三，突出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

边区高等教育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各院校都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到教育教学的突出地位。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方针内容之一即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求学员应遵守“团结、活波、紧张、严肃”的校风，并保持“精神上的革命传统”。[4]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其中“先锋分子”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具有政治远见，并且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5]医科大学培养与训练的是“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艰苦作风”的现代的革命医务技术人才。自然科学院提出“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为办学目标。延安大学制定的教育方针，首条即为：“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即革命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6]与此同时，各学校都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置于重要地位，并根据学员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与教学内容。如，对于有一定理论修养的中高级干部，重点是结合中国革命问题，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及哲学，课本以马列主义原著为主要参考书，这一任务主要由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来承担；对刚来边区的青年与知识分子，重点是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为抗日战争与党的事业奋斗。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是中高级干部还是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强调学与用的一致，而非空谈抽象理论。

第四，践行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理念 。

边区高等教育的另一个特点，也可称之为“中国教育上的一个新革命”，就是强调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中国旧式教育的基本缺点在于，学术与教育都很空虚、不切实际，不跟社会现实发生联系。毛泽东认为，边区必须推行新的教育，改变过去旧的教育方针与教育制度，因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就是用其理论来武装头脑及解决中国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706 页。

2 《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4—35 页。

3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02 页。

4 《抗大的教育方法》，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8 页。

5 《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干部学校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87 页。

6 《延安大学教育方针及暂行方案》，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年，第 119 页。

革命的实际问题，正确的方法与态度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事实求是的态度，“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1]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际联系的讲话精神，成为边区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并且这一指导思想通过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在各院校及广大学生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展现，从而逐步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意义与作用。如，抗大所发生的生产运动，在全校人员中风起云涌开展起来，“抗大每一个人特别是学员，深刻了解了生产运动的意义，它不只是经济上开源节流，帮助学校解决经费问题，改善各队自己的营养，使同学们自己多吃些可口的蔬菜与肥美的猪肉，而且更有伟大的意义，这教育着同学以刻苦耐劳的方法，锻炼同学艰苦卓绝的意志，它是由实践中去学习艰苦的工作作风的一种方法。”中国女子大学的同学们，“她们不但学习，而且从事生产劳动。”通过劳动“她们一样以不弱于男同志的英勇姿态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延安大学的学员“除了学习以外，还要参加生产劳动。一般是生产劳动占学习时间的百分之二十。”[2]总之，通过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逐渐养成了劳动习惯和劳动观念，纠正了“万般皆下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错误观念，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从事工作与学习，从而更好、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

四、边区高等教育的启示

在一定程度上讲，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石与雏形，它所形成的办学观念、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产生重要作用与影响。但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昔日边区高等教育旳经验是否依然对当下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理论指导与现实启示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并且笔者认为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等教育应紧扣时代脉搏、自觉服务国家战略。

20 世纪已经逝去，21 世纪即将走过它的第 15 个年头。抚今追昔，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面貌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相比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非昔比。但当今世界依然处于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各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不断加剧与激烈，而综合国力的竞争，自然高等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与重要力量，因为它关乎着民族命运与国家前途。抗战时期，边区高等教育之所以在条件异常艰苦、环境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创造出令人难以想象的辉煌成就与贡献，并为抗战胜利及民族解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各类人才，其中一

1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01 页。

2 《延安几所干部学校的生产劳动》，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年，第 208—210 页。

重要经验就是当时边区高等教育自觉服务国家抗战战略，自觉适应时代潮流，从而使教育紧扣时代脉搏。进入新世纪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如何面对机遇与挑战？具体怎么改革？它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走向未来？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想，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必须自觉把握时代脉搏、服务国家整体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持，培育民族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

第二，不断深化与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与责任，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中央要求全党同志积极地担负起领导抗日的历史重任，并规定了全国人民在抗战中的紧急任务。其中，文化教育方面，毛泽东于 1938 年 9 月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并对抗战时期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作出了具体指示，第一，改定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并强调“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1]按照党中央与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边区各高等院校不断创新教育体制、教学制度，通过多样而灵活的办学形式，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为民族解放服务。正是边区实行与贯彻了这样一种崭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机制，才使得它做出的成绩与贡献，“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教育家。”[2]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党和国家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为此，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历史是不容隔断的，我们认真总结与研究历史上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高等教育经验，发扬它的光荣传统，不断深化与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

第三，坚持党的领导，改革与完善管理体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党对高等教育领导的体制、机制，从而保证了其健康发展。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1940 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3]至此，在理论上确定了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机制。1941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规定边区各校分别由中央各有关部门来领导，并由中央宣传部协同各主管部门对各院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进行统一计划、检查与督促。另外，边区建立、合并的各类高等院校也都是

1 毛泽东：《论新阶段》，延安：解放社，1944 年，第 74—75 页。
2 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序》，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4 页。
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 1 月），《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90—692 页。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党的统一领导并没有影响各高校的独立、自主办学，相反，各高校都形成了民主自由的作风，都十分“注意养成学员的伟大品格”。从学校的管理来看，各校都体现出明显的民主精神，都十分重视学生自治及教学民主，并成立了学生自治组织及社团。而“教员在不破坏抗战，不破坏团结，不反共反人民的原则下，可以自由讲学。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争论，互相批评。”[1]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继承与发扬边区高等教育在管理体系与制度建设中的好做法、好传统，继续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改革与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其间最为重要的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学术环境。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从而建立起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中国气派的神圣学术殿堂。

联系方式：Email　liangyanbing89@sina.com
手 机：梁严冰　15991637539

1 曲士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01 页。

抗战时期日军无差别轰炸陕西述略*

袁文伟　李柏桦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抗战基础在东南，建国基础在西北”，陕西是西北桥头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华北华东成为抗日前线，陕西的战略大后方地位愈形重要。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自1937年11月7日轰炸潼关县到1945年7月15日轰炸西乡县止，长达7年9个月零10天。轰炸地区涉及西安、咸阳、宝鸡、渭南及关中诸县，还有延安、榆林、靖边、吴旗、汉中、安康、南郑、西乡等陕北陕南重镇，轰炸次数多达567架次，导致严重的损失。目前学界对于日军轰炸陕西还没有整体研究，只有西安、延安等地有所涉及，[1]本文将结合档案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梳理，以求深入了解日军无差别轰炸的暴行和陕西人民的反轰炸斗争。

一、日军轰炸陕西的战略考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在发动华北、华南战役的同时，为了打击和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配合侵华战争的顺利进展，遂将陕西列为无差别轰炸目标。无差别轰炸简而言之“就是一种违背国际法规、对于不具有军事性质的目标，以破坏、损毁私有财产、造成非战斗人员伤亡为目的的反人道的罪行。”[2]就是以恐怖为目标，以居民为对象的轰炸。1937年7月11日，日本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制定《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的航空协定》，其中明确规定了日本航空部队作战的地域和方式。[3]随后日本军令部确定《关于对华作战用兵秘密指示》，宣布编成“临时航空兵团”，主要任务是协助陆军作战。9月，日本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认为：“轰击无需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怖为着眼点。”[4]1938年2月16日，日本参谋部指示“应抓紧航空进攻作战”，随后日本大本营调整战略和政略，企图“单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5]正如日本军方在《航空部队使用法》103 条中规定的那样：“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的要地之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6]在华北执行这一任务的主要是日本航空兵团第一飞行

[1]* 基金项目：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地情丛书重大招标项目《陕西抗日战争志》（KY2018/9-132）、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西安民众抗战救亡活动研究》（19L70）阶段成果。

1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武亨伟：《抗战时期西安城墙防空洞若干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3期；陈子平：《日寇轰炸西安罪行录》，《陕西档案》2014年第4期；李宗海：《抗战时期西安的城市防空建设论述》，《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的第3期；王光荣：《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纪实》，《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2 [日]前田哲男著，王希亮译：《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M]，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3页。

3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M]，第1卷第1分册，田琪之译，中华书局1979年，第151页。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一）》[M]，朝日新闻社1974年，第405页。

5 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重庆大轰炸》[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19页。

6 谢世廉主编：《川渝大轰炸——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四川史实研究》[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有三个重轰炸机战队，一个战斗机战队。[1]日军对陕西的轰炸，主要有以下几个战略考量因素。

打击大后方政治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陕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中心地位日益增强。此后随着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的相继爆发，大批工厂内迁，人口急剧增多，抗战救亡团体纷纷成立，陕西成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西北大后方基地。1932 年 3 月，鉴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2]。1937 年 3 月，陇海铁路西宝段通车，大大方便了沿海大批工商企业的内迁，于是陕西逐渐成为支持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地区不断被日军占领，陕西的战略地位日益上升。除了西安是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外，延安也因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而成为人民抗战的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是一个重要的抗战圣地。就军事地理而言，日军要想进攻陕西，只有三条路可行：一由晋西渡河入陕北，二是溯汉水以攻陕南，三是正面强渡潼关。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担心“敌之企图在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3]，实际上日军对于陕西确实曾经有过三次的进攻作战计划，但是由于战局的变化都没有真正实行。[4]因此，日军轰炸陕西不是协同步兵作战的常规轰炸，而是带有战略性质的独立轰炸，主要目的就是削弱国民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战意志，制造恐慌情绪，打击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领导力。

破坏大后方经济基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之下，开发西北成为当时知识界精英分子的共识，南京国民政府也采取各种措施准备将陕西建设成为抗战和民族复兴的大后方基地。当时，上海、武汉、天津等沿海工厂内迁陕西，1941 年时候已达到 44 家，资本达到 1474.1 万元，工人 5409 人[5]。重工业发展迅速，农业投资也大量增加。由于省外农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农业科研人才纷纷流入，有效改良了小麦和棉花品种，优质粮棉耕种面积不断扩大，还有农业灌溉新技术的使用，有力提高了亩产量，使得陕西成为大后方的主要粮棉产区。同时，交通运输业在战时得到了很大改进，先后开通了 50 余条干支线公路，总里程达到 4300 多公里。[6]战时的商业也迎来短暂的繁荣，商号 1934 年有 4000 余家，而到 1940 年增加到 6509 家。对于这样的情况，日军当然急于摧毁，以便破坏大后方抗战的经济基础。

摧毁大后方抗战意志

第 14 页。

1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M]，第 2 卷第 2 分册，齐福林译，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187 页。

2 西京市档案局，西京市档案馆：《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5 页。

3《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巩固河防部署致朱德等电》[C]（1938 年 3 月 2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第 148 页。

4 参见张天社：《论抗战时期日本“西安作战计划”的制定及其终止》[J]，《抗日战争研究》2011 年第 1 期。

5 范宝信主编：《十年来之陕西经济》[M]，1942 年 10 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 C-20-53。

6 陕西省交通史志编辑部：《陕西公路运输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9 页。

随着抗战的进行，陕西成为西北大后方抗战的桥头堡，大批文化教育单位聚集一起，文人志士也纷纷来到陕西，蔚为大观。1937 年 9 月 10 日，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第 16696 号令，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三所院校联合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北联合大学，有学生 1472 人，高等教育在西北奠基。1941 年 1 月 19 日，西北师范学院在城固成立“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开展抗日宣传。抗日团体纷纷成立，例如西安先后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陕西组织、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陕西省妇女慰劳会，延安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战地服务团、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报刊纷纷创刊，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老百姓》《秦风日报》《学生呼声》《西北周刊》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政论、戏剧、漫画、小说、散文、诗歌等抗战作品，有力抨击了日军的暴行，极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战激情。为了摧毁陕西人民抗战意志，日军不仅仅轰炸西安、宝鸡、咸阳、延安等政治经济中心，就连洛南、三原、安康、大荔等县城和乡村也是狂轰滥炸，甚至 1940 年 5 月 1 日，不惜派遣 24 架战机专门轰炸安康西边的富家河的淘沙工人。[1]

二、日军轰炸陕西的阶段与特点

从 1937 年 11 月 7 日到 1945 年 7 月 15 日，日军对陕西进行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不加区分的无差别轰炸。日军轰炸的航线有五条，分别是运城、临汾、太原、武汉、宜昌，其中运城机场是日军轰炸陕西的主要阵地，日机从此地起飞越过黄河，西至宝鸡南到安康北至延安都可空袭。日军对陕西的战略轰炸就是无差别的恐怖行动，罪恶目的就是摧毁陕西人民的抗战意志。

（一）日军轰炸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辅助性轰炸（1937 年 11 月—1938 年 12 月）。

日军航空部队对陕西实施辅助性轰炸共达 84 次。这一时期，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打击中国航空力量，掌握制空权，配合华北地区平津、河北、察哈尔、山西等地面战役。日军以炸死炸伤陕西民众、摧毁物资、断绝交通、破坏生产等战争主要潜力作为轰炸目的。1937 年 11 月 7 日，日军首次轰炸潼关县城，接着在 13 日开始对西安进行试探性轰炸，“在郊外投小型弹九枚，我无损失，经我机驱逐枪炮射击仓皇逸去”[2]，从 11 月到 12 月底共轰炸西安 5 次，出动飞机 35 架。在日军轰炸西安的第一年里，由于是试探性和辅助性轰炸，加之投弹基本上落在郊外，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财产损失。1938 年春，为配合徐州作战，日军空袭陕西。2 月 28 日，日机轰炸潼关火车站、西关公路，3 月轰炸南郑县，11 月 20 日，首次轰炸延安“大轰炸持续了 1 个多小时”。[3]三天之后，20 余架日机空袭西安“统计敌机狂炸平民区死者 70 余人，伤者 180 余人，炸毁房屋 150 余间”[4]。

需要指出的是，日军对于西安和延安的轰炸有不同战略考虑。在全面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之前，日军的战略重点在于攻占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日军的临时航空兵团配合陆军对中

1 褚龙吟：《不要拿自己的血来换教训》[J]，《陕西防空月刊》第 2 卷。
2《敌机昨袭西安》，《西京日报》[N]，1937 年 11 月 14 日。
3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陕西抗战史料选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年，第 393 页。
4《敌机昨晨袭本市 在市区滥施轰炸》，《西京日报》[N]，1938 年 11 月 24 日。

国大后方重庆、兰州和西安进行轰炸，企图压迫国民政府屈服。此时，八路军正在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尚未引起日军的重视，直到1938年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指第345号”命令，决定采取新的作战方针，航空部队重点是单独进行战略轰炸，打击中国后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这样，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自然成为轰炸主要目标之一。

第二阶段：大规模轰炸（1939年1月——1941年12月）。

1939 年日军为了达到摧毁中国抗战意志的目的，开始了大规模轰炸阶段，这一阶段共轰炸327次，陕西受到很大损失。日军总共出动飞机1251架，投弹4417枚，致死3541人，致伤1388人。1939年3月7日，日军轰炸了天水行营西安驻地，12架飞机对着东厅门轰炸，一时间烈焰腾空，浓烟滚滚，共有中将李国良、少将张谞行和赵翔之等64人遇难，43人受伤，行营主任程潜幸免于难。[1]5月24日空袭桥梓口，防空洞被炸塌陷，导致1000余逃避居民死亡，造成空前惨案。[2]1939年日军轰炸延安最为猛烈，有飞机187架次进行10次轰炸，投弹1189枚，死伤229人，毁坏房屋和窑洞7882间，延安旧城被炸成废墟。[3]1940年日军为加强重庆轰炸，减少了陕西轰炸次数，但是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依然严重。1941年5月，日本为了压迫中国投降，开始了“第五次大规模空中攻击”，即“102”号作战计划，决定对陕西交通要道进行轰炸。对此，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指出这是日军在速战速决计划失败后“企图在我不设防城市乡镇滥施轰炸，以泄其泄愤”[4]。

第三阶段：袭扰性轰炸（1942年1月—1943年12月）。

1942年，由于太平洋战场战事紧张，日军对华大规模轰炸基本停止，这一时期轰炸77次。空袭减少的原因就像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分析的那样“敌寇自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特将其停驻在我国之飞机——尤其是长距离海军轰炸机，抽调一空，以应西南太平洋方面之需要，故其空军对我之策略，亦随之而改变，前此以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轰炸为副者，今则一变而为以战略轰炸为主政略轰炸为副矣。”[5]1942年的空袭，集中在2、3、4月，5月以后急剧减少。[6]这一阶段轰炸整体来看，日军的航空精锐尤其是零式战机其性能已经被最新的美国支援中国的飞机超越，制空权易手，加之陕西各地防空设施不断改良，防空技术日益进步，各个重要城市的人口和物资得到了有力疏散，因此日机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也大为为减轻。

第四阶段：轰炸尾声（1944年1月—1945年7月）。

1944年后，日军已呈现出强弩之末趋势，对陕西轰炸进入尾声，本阶段共轰炸79次。

---

1 王民权：《西安抗战时期鲜为人知的一页痛史》[M]，西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抗战风云》（内部资料），第280页。

2 赵明亮、王根元：《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西安及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实录》[M]，西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抗战风云》（内部资料），第266页。

3 肖银章、刘春兰：《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4 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民国三十年度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M]，北京：成城出版社承印，1941年，第41页。

5 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民国三十一年度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M]，北京：成城出版社承印，1942年，第1页。

6 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民国三十一年度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M]，北京：成城出版社承印，1942年，第45页。

为了解救被困在中南半岛的日军，日军发动豫湘桂大会战并积极诱降国民政府，同时发起对陕西最后的轰炸。1944 年日军共轰炸 74 次，出动飞机 331 架，投弹 925 枚。1945 年，随着抗战进入最后关头，日本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轰炸陕西只有 5 次，出动飞机 8 架，投弹 27 枚。

（二）日军轰炸的四个特点

纵观全面抗战时期，日军轰炸陕西具有轰炸时间长范围广、战术多变、无差别轰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放毒气弹等特点。

第一，轰炸时间长范围广。日军轰炸陕西始自 1937 年 11 月 7 日，最后一次是 1945 年 7 月 15 日，总共长达 7 年 9 个月零 10 天。其中，西安是联系西北五省的枢纽，也是通往甘宁青过巴蜀进西南的重要通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西安市成为日军轰炸的首要目标，轰炸的次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累计空袭 147 次，侦察 22 次，出动飞机 1232 次，投弹 3657 枚，致死 2719 人，致伤 1228 人，炸毁房间 7972 间[1]。在长达 7 年多的时间里，日机空袭陕西总共 567 次，出动飞机 3789 架，投弹 13610 枚，致死 9047 人，伤 7015 人，毁坏房屋 43825 间（见下表）。日军轰炸范围遍及陇海铁路和西宝、西兰、川陕、汉白、长坪公路沿线的 55 个市县。

日机轰炸陕西省造成民众伤亡房屋毁坏统计表

年份	飞机空袭次数	飞机架数	飞机投弹数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毁房间数	
1937	17	78	305	24	29	78	
1938	67	576	1460	316	686	12957	
1939	116	1251	4417	3541	1388	14211	
1940	59	362	2498	1968	3165	6033	
1941	152	962	3608	965	450	7526	
1942	62	92	50	34	21	180	
1943	15	129	320	158	193	710	
1944	74	331	925	2039	1073	1448	
1945	5	8	27	2	10	20	
合计	567	3789	13610	9047	7015	43163	43163

（资料来源：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第 26 页。）

第二，战术多变。日本空军所采用的战略战术，时常因为对策上的需要而有所变化。首先是先侦察后轰炸。敌机进袭我各后方重镇及我资源集中之地点，每于进袭前之数小时或一日，辄以一、二架侦察机先行窜入侦查，继即以大批进袭。1937 年 9 月起，日军飞机频频飞临西安上空侦察，随后正式轰炸西安[2]。在汉中也是一样的方式，据何仕俊在《日寇飞机

1 赵明亮、王根元：《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西安及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实录》[M]，西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抗战风云》（内部资料），第 264 页。
2 西安市军事志编纂委员会：《西安市军事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 975 页。

轰炸汉中目击记》中回忆："（日机）每次多则三四十架，少则几架，有时先来一二架侦察目标，尔后便有大批轰炸机飞来轰炸。"[1]其次是分批反复疲劳轰炸。日机袭击我后方重镇，每于一地投掷少量炸弹后，即分批续进或返航至相当距离后，复行迂回飞返原地作再度轰炸。西安、宝鸡、汉中、安康、延安等地轰炸经常受到这种方式的折磨。第三是大队机群分合进袭。敌机对接近战区之各重要城市及后方重镇，常以大队机群分批同时出动，或先后迂回进袭至一定地点各批再行会合，盘旋之后又复各批分开或集中一地投弹，或则分别各个目标轰炸。[2]第四是机动进袭。敌机由甲地起飞轰炸某地后，另至乙地降落。第五是低空投弹。敌机对我不设防之城市，每以低空投弹并用机枪扫射；如陕北之肤施绥德等地敌机轰炸时辄在一千公尺以下投弹并用机枪来回扫射。[3]"日机还超低空飞行，用机枪扫射无辜市民，百姓死伤无数，财产损失严重。"[4]第六是心理攻击。日军为了瓦解我国人民抗日斗志，利用飞机在大后方散发荒谬传单伪报，以期达到煽惑民心，动摇抗战意志的目的。但是正如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所言中国人民"意志坚决，认识清楚，对此种所谓心理攻击，举皆付诸一笑，而犹见日寇之心劳日拙也。"[5]

第三，无差别轰炸。日军为了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不惜违背国际通行的战争法则，实行恐怖的轰炸平民战术，这种无差别轰炸的暴行受到国联的强烈批判。鉴于对无防御城市空袭致使大多数妇孺惨遭炸死，国联在表示深挚悲痛之余，强烈谴责其无可原谅的暴行。[6]1938年7月22日《电巴黎世界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中提到："日机不断在远离战区之城市滥事轰炸，平民已习见习闻，凡红十字会救护队车站轮埠之难民，文化及教育机关慈善团体医院及渔船，皆成为轰炸之目标，种种暴行，罄竹难书。甚至外侨之生命财产，第三国之外交官员与保护侨民之兵舰，亦遭日机之轰炸。"[7]7月23日，国际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30个国家代表100余人参会，会议谴责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通过了《关于反对轰炸不设防城市的决议》和《关于援助中国的决议》。[8]面对国际舆论和社会团体的谴责，日军置若罔闻依旧肆无忌惮地轰炸陕西的民用工厂。1941年5月11日，轰炸导致西安大华纱厂"损失甚巨，已不堪支持。本月六日敌机又炸该厂，落弹二十余枚，现已全部停工。"[9]1941年5月到6月轰炸咸阳打包公司，所有存料仓库、职员宿舍、工警厨房等全被炸毁无遗，共计损失棉花约1000余包，机器全遭炸毁。[10]就连悬挂意大利旗帜的天主教堂也不例外遭到轰

1 汉中市史志办公室：《抗战后方重镇汉中》[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0页。
2 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民国二十八年度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M]，北京：成城出版社承印，1939年，第10页。
3 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民国二十八年度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M]，北京：成城出版社承印，1939年，第11页。
4 汉中市史志办公室：《抗战后方重镇汉中》[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5 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民国三十年度全国空袭状况之检讨》[M]，北京：成城出版社承印，1941年，第1-2页。
6 郭长禄：《论日机轰炸我国之违法》[M]，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第45页。
7 贝华：《抗战与革命》[M]，北京：文化编译馆，1939年，第63页。
8 参见：《国际反轰炸大会》，《世界知识》[J]，1938年第3-4期；《反轰炸大会》，《全民抗战》[J]，1938年第8期。
9《大华纱厂全部停工》，《西京日报》[N]，1941年5月11日。
10 咸阳打包公司：《咸阳中国打包公司呈报本公司五月六日、十一日、廿七日、六月廿三日轰炸情形及损失报告表伏祈鉴核备案由》，陕西省档案馆档案72—9—330。

炸。[1]

第四，投放毒气弹。日军在轰炸陕西的时候，为了达到罪恶目的，惨无人道地使用了毒气弹。1942 年 5 月 19 日的《西京日报》对此进行了揭露。报道说：“省防空司令部于本月 15 日，派工兵在本市北大街陕西国民教育师范训练所内掘出日机去年 9 月间所投未爆毒弹燃烧弹一枚，重一百公斤、长一公尺四寸、直径三七公分、入地半公尺。系因引信体内雷汞潮湿失效，未能爆炸。”[2]这一事件说明，日本毒气弹时时刻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陕西省防空司令部不得不反复提醒警示大家注意安全防范。

三、陕西各界反轰炸斗争

面对日军的残酷轰炸，陕西人民没有屈服，而是勇敢开展了积极广泛的反轰炸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按照国民政府的划分，全国有九个防空区，陕西属于第八防空区。[3]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积极投入防空建设，开展防空宣传，进行防空演习，修筑防空洞防空壕，实施人口物资疏散，筹措资金完善救济，极大鼓舞了陕西人民的抗战斗志，保障了陕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建立防空组织

陕西防空组织包括防空协会、防空司令部和防空部队。1935 年 1 月 31 日，“西京防空学会”成立，在基础上成立陕西防空协会，杨虎城任会长，邵力子和宋志先为副会长，宗旨是“促进防空建设，训练防空技能，普及防空知识，研究防空学术”。1937 年 2 月 3 日，省防空协会会长改为省主席孙蔚如，总干事为白西垣。8 月 23 日，陕西全省防空部队组建，共有 15 个区队，省会西安 10 个直辖大队，孙蔚如兼任总队长。[4]11 月 27 日，西安防空司令部成立，西安警备区司令董钊兼任司令，省会警察局长杭毅、保安处长张坤生任副司令，魏炳文为参谋长。司令部之下成立西安防护团（团长杭毅），负责警戒、警备、灯火管制、交通管制、消防、救护、防毒、避难指导、警报等工作。除此之外，宝鸡防护团也成立，还有三原、城固、凤翔、武功等 76 个县级防护团。

1938 年 6 月 1 日，陕西省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司令孙蔚如，何文鼎为副司令，徐经济为参谋长，下设秘书室、军防科、情报科、民防科，还监管西安防空司令部（西安防护团）和南郑防空司令部（南郑防护团）。军防科主管防空袭计划和方案的制定、高射部队的编组训练、改进防空袭的战略战术思想方案等。情报科主管防空情报网方案的制定完善、防空情报官兵的督导考核、空袭警报的拟定发布、防空机构的合理化建议等。民防科主管城市预防空袭的对策计划、防空避难设施的保管，交通、灯火和水电、救护、消防的管制、消除空袭后果维持社会治安等。1943 年西安防空司令由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兼任，下设西安防空处，处长冯升云少将。为了及早发现日机踪迹，布置防空措施，防空司令部下又设立西安防空监

1《本市浩劫敌机十四架昨狂炸市区》,《西京日报》[N]，1939 年 3 月 8 日。
2《敌机曾在本市投毒气弹》,《西京日报》[N]，1942 年 5 月 19 日。
3 全国 9 个防空区：第一区，苏浙皖；第二区，豫鲁；第三区，赣闽；第四区，晋绥；第五区，冀察；第六区，湘鄂；第七区，粤桂；第八区，陕甘；第九区，川滇黔，参见何应钦：《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年，第 578 页。
4《蒋令陕航建分会 组全省防空部队》,《西京日报》，1937 年 8 月 23 日。

视队，具体地点在韩城黄河边，分设有 6 个监视哨所，每个哨所有稍长 1 人，哨兵 15 人，主要监视从山西运城起飞的日机。[1]

1937 年 8 月 19 日，延安成立了边区防空协会（主任高岗），下设宣传、检查、设施各股。还划分延安市的东西南北四个区乡和城南区、城东区等 6 个防空区，负责防空防毒事宜。另外，延安还设立了防空警报所、防空掩蔽部。[2]随后，延安市成立防空委员会和防空司令部，负责人分别是高岗和滕代远。

开展防空宣传

为了提高民众的防空意识，减少日军空袭时候的损失，陕西省防空协会广泛开展宣讲会，进行防空演习，使民众掌握防空方法。1936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4 日，军事委员会西安防空处举办防空巡回展览，五个分会场包括革命公园、西安高中、莲湖公园、建国公园、南院门等处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白天发放《国民防空须知》，晚上播放防空防毒电影。西安市民近距离观看了各种防空兵器、炸弹、通信警报和消防器材等，每天参观者达超 3 万人次，总数近 20 万人次，以当时西安全市人口 208856 人来计算，约有 90%以上的市民都参观了防空展览。[3]展览的意义正如记者通讯《防展参观记》中所说的：“（面对日军的轰炸）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本着‘图存只有自救’的原则，当此紧急关头，同胞对于防空问题的重要的认识，以及防空常识的训练与修养，真是一件急不容缓的事。”[4]

1937 年 6 月 2 日，陕西省防空协会认为“无空防即无国防”，为了帮助人们防空常识的养成，特编印防空常识小册 12 种共 107 册，分送西安市机关、团体、学校传阅。[5]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唤起了民众对日本侵略者要对我实行残酷轰炸的警觉，采取各种防空措施，力争有效地使空袭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9 月 1 日，为了深入宣传刚颁布不久的《防空法》，陕西省防空协会再次举办防空宣传周活动，以便“增强防空意识，灌输防空知识，提高防空技能”[6]。还提出了很多通俗易懂的口号和标语，例如“万事莫如防空急”、“为国家民族争生存而防空”、“好男儿要在防空上努力”等，大力普及警报、消防、防毒、救护、避难等知识。《西京日报》发文呼吁人们减少娱乐生活，凡是“都市的萎靡生活，消耗意志与力量的生活，在这敌寇新的侵略企图下，新的残酷轰炸下，应该有一个彻底的猛省”[7]，应该为了繁荣农村而奋斗，为抗战大业而奋斗。

1940 年 11 月 21 日，首届防空节都在新城广场举行，参加者有各机关、团体、学校和防护团等 3 万余人。主要活动是各报纸刊发防空特刊，省主席检阅防空部队，防护团实战演习，参观防空武器展览，晚上进行火炬游行等。宣传的中心地点在陕西省立民众教育馆，还有各工厂、学校和军队。各街市的重要地点如城门、南院门、钟鼓楼、莲湖公园等都有固定宣传牌和标语。口头宣传的方式多样，有固定演讲、特约演讲、定期演讲、化妆演讲、广播

1 孙来玉：《西安防空点滴》，《莲湖文史资料》（第 8 辑），1995 年，第 95-97 页。
2《防止日本飞机袭击，延市各界成立防空协会》，《新中华报》[N]，1937 年 8 月 23 日。
3《防展七日届满已于昨日闭幕》，《西京日报》[N]，1936 年 6 月 5 日。
4《防展参观记（一）》，《西京日报》[N]，1936 年 5 月 31 日。
5 西安市档案馆：《西安抗战备忘》[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 年，第 294 页。
6 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陕西省防空志》[M]，2000 年，第 121 页。
7《新形势下我们应有的新准备》，《西京日报》，1941 年 5 月 11 日。

演讲等。从此直到1944年连续6年举办防空节。在延安，《新中华报》连续刊载防空文章为民众提供经验和方法，就如何跑警报、如何识别日机、如何自我防护等等作了详细介绍[1]。延安民众剧团也连续公演防空话剧，鼓舞人民斗志。从1936年起到抗战结束，全省共组织宣传队、站1350个，防空展览30次，宣传专栏11200次，放映电影150次，新闻报道270次，组织受教育民众1500万次[2]。有力的防空宣传极大唤起了民众的防空意识，提高了防空观念，为反击日军空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修筑防空工程

全面抗战爆发前，陕西防空司令部只在西安修筑了4处防空地下室，分别位于西安东西门、甜水井、大莲花池、桥梓口等，每处容纳160人，总共才有600人的容纳量。1937年8月，陕西省政府致电西京筹备委员会："时局紧张，敌机猖狂，西京为我国防重地，一切防空设施急不容缓。"[3]9月11日，日机侦察机飞到西安高空窥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速令西安防空司令部会同有关各机关，协助市民挖筑简易防空壕。此后，随着日机轰炸日益频繁，防空壕、防空洞、防空避难室等防空工程开始大量修筑。除了政府出资修筑之外，还有很多民众自发修筑。陕西省警察局督促市民和商户自己修筑防空壕和防空洞，"所需经费客主分担，并饬即日在可能范围内，自筑土洞，以免危险"[4]。1940年12月22日，陕西防空司令部在西安城墙下挖筑了总长达到5100多米的625个防空洞。据统计，截止1941年，全省相继修建防空设施51870处，总计175445平方米，共计可以容纳350890人[5]。总计西安公有市区地下室1902处，市区防空壕2300处，城墙防空洞650个，防空洞474个，郊外防空洞330个，郊外防空壕45500米。私有市区地下室607处，城墙防空洞107个，防空洞9050平方米。[6]著名的防空坑道是宝鸡十里铺申新纱厂的"窑洞工厂"，修筑在长乐塬山脚下，24孔窑洞，总长1793.77米，能够安装2万锭纱机和细纱机1.2万锭，成为当时国内之首。

进行防空演习

防空演习是强化民众防空意识的重要手段。1937年8月28日、29日，西安连续两天举行防空大演习，主要演习白天空袭时候的疏散和防空。9月14日，陕西省建设厅厅长雷宝华提出"现值全面抗敌，敌机时有来陕暗袭之虞，为预防避免无谓之牺牲起见，除所有各该机关在职人员自不得擅离外，其职员等之眷属应于可能范围内，迅速移住乡村，以防意外。"[7]此后，大荔、兴平、永寿、韩城等县先后举行了防空演习。1938年6月13日，在西安举行夜间防空演习，目的是演练灯火管制下的适应情况。1942年6月30日的防空大演习，邀请

1 从1937年8月起，《新中华报》连续发表防空普及文章，例如8月23日《持区防空简易须知》，8月26日《特区防空简易须知（续）》《防空防毒宣传大纲》《炸弹下几个血的教训》，1938年12月5日《加紧防空与锄奸》，12月20日《敌机空袭时应有的认识》等等。

2 肖银章、刘春兰：《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3《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关于防空疏散代电及省府所属机关办理疏散物资文件的文书》，1937年8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1-4-65。

4《防御敌机空袭警局督促商户自筑土洞》，《西京日报》[N]，1937年11月24日。

5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6 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陕西省防空志》[M]，2000年，第83页。

7 西安市档案馆：《西安抗战备忘》[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306页。

各机关团体代表参观，演练敌空降部队降落后军队的联合作战情况。由于陕西省防空力量落后，为了减少敌机轰炸伤亡和损失，防空疏散成为最有效的措施，包括人员疏散、学校疏散、物资疏散，疏散对象有居民、机关、商铺和工矿企业等。同年 12 月 29 日，西安又进行了一次“防火防毒防制伞兵侵入”的全市防空大演习，各种纠察队、担架队、消防队等纷纷出动，充分展示了陕西的防空力量。

实施防空疏散

防空疏散的重要前提是建立防空警报系统，加强防空预警法。1937 年 9 月，陕西省举办首届防空情报班，之后在西安、南郑、绥德、大荔、商县、安康、宝鸡等地纷纷设立防空情报所，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防空情报网。由于通讯设备落后，配置不足，准确性受到影响，但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1938 年 5 月，陕西防空疏散建设委员会成立，通告市民疏散，但是遵者寥寥。陕西防空司令部对此忧心忡忡，诚恳建议“老幼妇孺及整个团体之难民，无留居西安之必要应早早迁移疏散。”[1]为了尽快疏散民众和物资，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政治部决定由干训第四团全体学生组建 110 个宣传队，分赴城乡扩大宣传，印刷 5 万份宣传品，要求“大家要刻苦耐劳，沉毅勇敢，为爱护国家爱护自己，努力疏散撤退。”[2]在日机数次滥施轰炸后，市民开始按照政府要求有序疏散。

1939 年 5 月，西安市成立非常时期疏散建设委员会，负责具体落实各项疏散和建设任务。疏散学生尤为重要，陕西东部各县中学疏散到本县乡镇，而省立中学疏散到西府地区的乾县、宝鸡、凤翔、眉县、陇县等地。省立医专和商高专等疏散到陕南洋县、勉县。1940 年 7 月 27 日，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颁布实施《警局疏散人口办法》，就疏散人员、疏散步骤、疏散时间、工厂仓库疏散、娱乐场所的取缔与限制、旅馆客社之清除等做出详细规定，要求“老弱妇孺不需自谋生活者；居民之无职业者；虽有职业但与城市生活无关者；生活富裕而无固定职业者”等四类人都要疏散，规模不大的工厂、公私各类仓库也要疏散到安全地方[3]。11 月 30 日，陕西省政府发出通知，要求省直属机关疏散到西安南郊的樊南、杜曲、黄良、五权等地，并要求对疏散地村名、房子间数进行登一记，同时区分了办公区与眷属居住区等，做到保对厅（处），村对科，个人对户[4]。1941 年 5 月 10 日，陕西省疏散建设委员会发布《告市民书》，劝导市民自动疏散[5]。28 日，陕西省政府规定中学自即日起，限 20 日内完成疏散，小学自 6 月 1 日起，至 7 月前完成疏散。西安城内的中学都迁移疏散到南郊乡间办学。当时已经有三分之一的西安市民疏散到郊区农村。1944 年 5 月，日军围攻洛阳轰炸陕西，西安、宝鸡、咸阳的众多工厂被迫再次疏散到甘肃境内，而大华纱厂、西京修造厂则将一部分机器迁移到四川广元。

筹措防空献金

1《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关于防空疏散代电及省府所属机关办理疏散物资文件的文书》，1937 年 8 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 1-4-65。

2《疏散人口及防空 行营政治部定今扩大宣传》，《西京日报》[N]，1938 年 11 月 27 日。

3《本市迭遭空袭决即进行疏散》，《西京日报》[N]，1940 年 7 月 27 日。

4 肖银章、刘春兰：《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01 页。

5《为劝导自动疏散 疏建会发告市民书》，《西京日报》[N]，1941 年 5 月 11 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安、宝鸡、咸阳、南郑、三原、渭南、榆林、安康等地民众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表达抗同仇敌忾的决心。随后省政府和救亡团体纷纷发起“捐献一日所得”、“一元献金运动”、“鞋袜劳军运动”等活动。陕西人民纷纷捐款，包括中小学生也开始“一日一分“运动，支援前线将士抗日杀敌。在这中间，防空献金的缴纳尤其珍贵。1938年1月20日，西京防空征募委员会就征募到了50万元的防空设备费。1940年11月21日，举行防空献金的筹措大会，不到四天就收到献金4万多元，意外的是献金者多为贫苦大众，反而是有些富户一毛不拔。[1]1941年12月1日，第二次防空献金筹措，共筹措4万余元，其中商民参加者众多，例如源太军服庄经理寿汇泉捐献500元，国货公司200元，旅店分会760元。

完善防空救济

整个抗战期间日军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日益增多，在加强防空措施的同时，为了紧急解救因为空袭而受害的同胞，完善救济措施必不可少。1939年4月13日，陕西空袭救济处成立，由陕西省赈济委员会常委王典章为主任委员，民政厅长王德溥、警备司令董钊为副主任委员，下设总务、救护、医疗、救济、调查、稽核等6个组。[2]救济办法规定死亡者每人30元，重伤者每人20元，轻伤者每人10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费用开支。1941年7月22日，陕西省政府为解决被日机轰炸受害同胞的药、膳、棺木费，筹备临时救济费5000元，下令西安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遵照执行，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民众的抚恤和关心。

不容忽视的是在陕西反轰炸斗争中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表现之一就是战备水平低，防空武器极为薄弱。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空军表面数量是600多架，实际上能够作战的只有223架，而日本作战飞机是2300架，实力差距明显。[3]全面抗战爆发后，驻扎陕西的国民党空军驱逐机中队只呆了不到半年就调走，苏联援华飞机临时在西安机场协防领空，也很快撤到兰州。到1939年，就连仅有的高射炮队也调走，导致陕西面临无飞机无高射炮的尴尬局面，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日军轰炸陕西最严重的时期，损失也最为惨重。表现之二就是抗战初期防空意识淡漠。由于没有反击日军轰炸的飞机和高射炮，只有消极防空，在轰炸中只能及时疏散才能避免伤亡。在日军轰炸初期，很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理，不愿躲避，结果死伤惨重。直到后来大量的防空宣传以及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才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这就说明战前的防空宣传教育仍然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表现之三是防空机制不健全。虽然也成立了防空司令部、防空协会等，但是整体上防空机构没有做到全覆盖，机制也不健全，加上经费的极度短缺，影响了防空效果的发挥。

三、结语

陕西作为西北大后方的抗战基地，由于其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而成为日军无差别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军对陕西七年多的轰炸，造成了严重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因为空袭而伤亡的人数达到16062人，居民财产直接损失总计约有982.5亿元，社会财产直接损失总

1《防空献金第三日金额共计五千余元》,《西京日报》[N]，1940年11月22日。
2《空袭救济处今成立》,《西京日报》[N]，1939年4月13日。
3 李玉贞:《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和空战》[J],《百年潮》2005年第8期。

计达 7568.7 亿元，社会财产间接损失总值为 1945 年 8 月法币时值 3248.2 亿元。[1]即使如此，日军对陕西的轰炸始终没有实现战略目的，陕西人民没有屈服于日军的狂轰滥炸，而是积极地开展了反轰炸斗争。

反轰炸斗争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它极大凝聚了陕西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意志和决心，坚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胜的信心，表现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正如《西京日报》所总结的那样，“在战斗与轰炸中长成的我们，实在已养成了一种坚毅魄力与不怕轰炸的大无畏精神”，日军的轰炸“并未动摇我们伟大的战意于毫末，相反的且更帮助我复仇的决心。”[2]这充分说明，在艰苦的反日军轰炸斗争中，陕西人民表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反轰炸斗争的胜利，挫败了日军的战略图谋，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保障了陕西抗战潜力的稳定发挥，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源源不断输送到抗战前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简介：袁文伟（1974-），男，陕西省周至县人，汉族，历史学博士，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和政治史的研究。李柏桦（1994-）女，汉族，山东省高密市人，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 级研究生。

通讯地址：西安邮电大学新区马克思主义学院 456 信箱 710121

电话：13772541336

E-mail：yww1974393@sina.com

1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年，第 60 页。

2《新形势下我们应有的新准备》，《西京日报》[N]，1941 年 5 月 11 日。

1939 年中条山“六·六战役”陕军跳黄河人数考

葛天
西安博物院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十七路军遭到蒋介石分化瓦解，人数由 6 万余人减为 3 万余人，抗战爆发后相继被改编为第 38 军、第 31 军团、第 4 集团军等，东渡黄河对日作战。从 1938 年 6 月到 1940 年 10 月，陕军（第 4 集团军）驻防中条山西段，与其他友军配合，先后打退日军对中条山西段 11 次较大规模的进攻，被卫立煌称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其中，1939 年的“六·六战役”是陕军在中条山西段与日军作战最惨烈的一次战役，该战役持续 20 余天。6 月 6 日，日军攻占第 4 集团军 96 军芮城县陌南镇大营，此役故称“六·六战役”。其时，第 4 集团军 96 军和 38 军独立 46 旅被压缩在芮城县陌南镇到平陆县茅津渡之间数十公里的黄河沿岸，其中约有 3000 名陕军官兵弹尽援绝后，宁死不降，相继跳入黄河。突围成功的部队与第 4 集团军 38 军及其他友军配合，很快转入反攻，将日军击退，双方恢复到战前状态。“六·六战役”以陕军胜利告终，但这种胜利是惨胜。“六·六战役”后，第四集团军高层对跳河事件实况讳莫如深，没有公开宣布。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没有人愿意提起这件事。

车国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38军中尉机要参谋和译电员。作为一名译电员，车国光曾亲历中条山保卫战最惨烈的“六·六战役”，掌握不少电文信息，陕西兵娃“跳黄河”的惨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释怀。“文革”结束后，车国光被平反，成为垣曲县政协委员。上世纪八十年代，车国光认识了垣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华兴，两个人渐渐变成知己。车国光对王华兴讲起“六·六战役”和陕军“跳黄河”的事，他说，“过几十年形势变了，这件事可能会震动世人的。”王华兴家就住在黄河边，“六·六战役”的时候，他八、九岁，也听过大人们说“黄河上漂尸体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当一个可怕的传说，如今听车国光一讲，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黄河。震惊之余，王华兴鼓励车国光把抗日往事写下来。

1986年，车国光关于“六·六战役”的回忆载入《垣曲文史资料》第2辑：“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时许，进攻96军敌之主力将我177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一千五百余人。”[1]

2005年，张君祥和徐剑铭、郭义民共同出版纪实文学《立马中条》，首度全面披露“中条山抗战”细节，并记述了800名陕西官兵集体跳黄河的事件。[2]同年，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写了《一段几乎淹没的史实：中条山八百壮士血祭黄河》一文，重点记叙了800陕西官兵跳黄河的事件。[3]《立马中条》一书使陕军跳黄河一事迅速传播到全国，但和陈忠实的文章一样，文学性太强，面对一些质疑，没有回应，导致质疑的声音更加突显。

西北大学老师张恒从 1998 年开始到 2010 年，跑遍山西黄河边当年战场所在的村庄，寻访了上百位还在世的老人，并将访谈资料进行整理，于 2011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张恒先生的《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一书，以详实的访谈资料尽可能地还原了历史真实。但该书在统计跳河官兵人数时，较为粗糙，本文对各种资料进行严谨地统计并进行脚注。

1 中国人民在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垣曲县委员会：《垣曲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 年，第 146 页。
2 徐剑铭、郭义民、张君祥：《立马中条》，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
3 陈忠实：《一段几乎淹没的史实：中条山八百壮士血祭黄河》，《同舟共进》，2005 年 7 月。

本文根据部分官兵回忆及对部分村民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认为第四集团军官兵跳河的地段主要有四段：一、芮城县东垆乡方家村、许八坡、老庄村沿黄一带；二、芮城县陌南镇沙窝村、马家庄、曲里村、坑南村、道东村、大沟南村沿黄一带；三、平陆县张村镇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太阳渡村沿黄一带；四、平陆县圣人涧镇茅津村及其以西沿黄一带。

第一，对于芮城县东垆乡方家村、许八坡、老庄村一带跳河官兵的数字，据原第四集团军 38 军军部机要参谋、译电员车国光先生回忆，“进攻 96 军敌之主力将我 177 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一千五百余人。”[1]

第二，对于芮城县陌南镇沙窝村、马家庄、曲里村、坑南村、道东村、大沟南村沿黄一带跳河官兵的数字，根据访谈，在黄河边窑洞里躲避日军的沙窝村董俊威老人亲眼看到部分官兵跳河，“人几波呢，也没有去计算。我看到我们这边的大概有几十人吧，至少三、五十人。这些人都往黄河边跑，都扑到黄河里了。我看见这些人扑进黄河后开始是走，后来跌进深水连冒头都没有，就被黄河水卷走了，中间水太大太深。”[2]此处可约计 40 名官兵跳河。陌南镇马家庄马振山老人一家当时藏在黄河边的芦苇丛里，他回忆说，“我看到那时已经不到一连人了，大约三、五十人。”[3]此处可约计 40 名官兵跳河。原马家庄王振峰老人当时在黄河边土崖边的窑洞里与家人躲避日军，“从我们这个窑洞里可以看到面前的黄河，跳黄河的大约有成百人，枪都扔了砸了，有的还背着枪。扑到黄河里的人有的连头都没冒，有的只冒出来一下都毕（完）了。”[4]此处约计 100 名官兵跳河。陌南镇曲里村缺乏村民回忆数据。温好岭老人在马头崖西黄河岸边的窑洞里躲避日军，“黄河岸边坡大（长）了，我在那个南坡的窑洞里只能看到一部分，大约有百十来人吧。事后，听别人说其它地方还有跳黄河的人，这我就没看到了。”[5]此处跳河官兵可约计计 120 人。

陌南镇道东村张南娃、张锁娃老人听长辈说，该村沿黄一带有几百人跳河，计 300 人[6]。陌南镇大沟南村吕庆荣一家躲在黄河边的窑洞里，“跳黄河的人多了，在我家人和我面前有其中一支队伍，大概成百人吧。在我眼前最后跳到黄河在水里的有几十人。”[7]此处跳河官兵可约计 60 人。大沟南村靳钵斯老人听长辈说，该村沿黄一带有几百人跳河[8]。由于坑南村、大沟南村、道东村黄河沿岸有重叠之处，坑南村、道东村、大沟南村沿黄一带可约计 400 人。因此，在陌南镇沿黄一带跳河官兵的数字约计 660 人。

第三，对于平陆县张村镇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太阳渡村沿黄一带，东张峪村、窑头村缺乏村民回忆数据。原西张裕村陈玉珍老人回忆，“几百人不止，究竟多少谁也没数。我当时也小，记不得，应该有上千人吧！都是手托着手，一排排往河里走，走着走着慢慢就看不见了，都淹死在黄河里了。”[9]此处跳河官兵可约计 1000 人。

第 4 集团军 38 军独立 46 旅的战士李采勤随所在部队被逼退到黄河边，他们在太阳渡以西不远处跳进黄河，由于天渐渐黑下来，李采勤老人当时与独立 46 旅 738 团军需处的一个副官找到一根檩条跳到河里，得以生还。“那天很多部队都被日本军队压到平陆的黄河沿线，跳黄河的部队人太多了，而且人和马涌到一块，很乱根本无法看清有多少人。”李采勤与那个副

1 中国人民在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垣曲县委员会：《垣曲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 年，第 146 页。
2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6、167 页。
3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4 页。
4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9 页。
5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4、65 页。
6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50 页。
7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2 页。
8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4 页。
9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0 页。

官抱着椽游到了黄河南岸，由于南岸胡宗南部队开枪，不得已又向北游，到了北岸，天快亮了，日军已经撤走。“我看到黄河岸上到处丢的都是咱部队上人的衣物和东西，多得不行。还有被日本人打死的部队上的人，岸上死的人不太多，可见昨天晚上，有多少人扑了黄河。”此处跳黄河官兵可约计 200 人[1]。因此，在平陆县张村镇沿黄一带跳河官兵数字可约计 1200 人。

第四，对于平陆县圣人涧镇茅津村及其以西沿黄一带，据茅津村刘继福老人听回忆，“当时一个排住在我家房子里面，日本人从老县城打过来的时候，这个排守在我们茅津村的城墙上。那个排长在与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很勇敢，身上负了好多伤，最后牺牲在城墙上了。当时抗日部队打不过日本人就从城墙上撤了下来。听躲在河边的村里人说，这个排被包围在黄河滩上，都跳了黄河。”[2]此处跳河官兵可约计 50 人。

通过以上分析，西起山西省芮城县东垆乡老庄村，经芮城县陌南镇、平陆县常乐镇、平陆县张村镇，东到平陆县圣人涧镇茅津村数十公里的黄河沿岸。在曲里村、窑头村及整个常乐镇沿黄一带缺乏数据的情况下，根据部分官兵及村民的回忆，跳黄河官兵约为 3410 人。

三、黄河浮尸数量考

有多少官兵跳河，下游就有多少具浮尸，本文对跳河官兵遗体在下游漂浮的数量进行分析，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印证整个“六·六战役”期间跳河陕军官兵的数量。3000余陕军官兵跳入黄河而壮烈殉国，他们的遗体相继漂浮在河面，由于人数太多，且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跳入黄河，所以遗体在平陆县、垣曲县黄河沿岸漂浮的时间多达数天，震惊沿黄军民。

原第四集团军总部文工团团长胥继武，当时随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住在东延村。“六·六战役”的时候，胥继武没有在战场。“六·六战役”开战后几日，胥继武听到黄河边的老百姓告诉他们，黄河里漂了很多抗日军人的尸体。胥继武就和总部警卫连赶到黄河边，打捞尸体，“部队打捞出的尸体有八百人以上，说千余人也不过分。”[3]胥继武等在三门峡打捞烈士遗体，可约计一千余具。他也承认，很多遗体没有打捞上，漂到下游。

山西垣曲县黄河边的赵家岭村，时年 13 岁的村民赵长贵老人说，“六·六战役”时，他在地里干活，因为几天前听说抗日军与日军在西边打了起来，为了安全，赵长贵赶着牛在黄河边的石庵住了下来。石庵地处河岸高处，正前方下面就是黄河。赵长贵坐在石庵里，看到黄河上漂下很多死人。“由于好奇，我就坐在那里数。到了晚上，我回村里吃完东西，在家里睡了一觉，一大早又来到河边的石庵下，坐在那里数飘下来的尸体，数了三天。根据我白天数的速度和数目，加上漂下来尸体的间隔，白天加晚上的，大约每天黄河至少会漂下来三百多具尸体，这是比较准确地数字。当然，第四天、第五天还会有，也可能漂尸的时间还长，但漂下来的就很少了，我也没有在那里，也没有再数。”[4]可见，在老三门峡没有打捞上来的遗体依然很多，下游的垣曲县赵家岭村村民赵长贵亲自看到的漂尸可计千余。

还有一种情况需要重视，由于黄河浪较大，很多遗体被搁浅到了岸上。山西省垣曲县赵家岭村赵长贵老人回忆说，“黄河滩的尸体也不少，都是被水冲到河滩的，大多数尸体顺着河水漂到下游去了。”[5]赵长贵的老伴车素梅老人，娘家在垣曲县黄河边的云岭村，“六·六战役”的时候，炮声阵阵，父母很害怕，时年 8 岁的车素梅在家人的带领下，赶着牲口沿着黄河边向东逃难，“向东走的时候，在黄河滩及黄河里还没看到什么。几天后返回的时候，看见黄河边的水里和河滩上有很多尸体，有的漂在水里，有的被水冲到岸上。”[6]

1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3 页。
2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5 页。
3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5 页。
4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6 页。
5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7 页。
6 张恒：《黄河魂 中条抗日钩沉录》，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87 页。

由上述三位目击者可知，胥继武等官兵在老三门峡打捞的遗体有千余具，赵长贵老人在垣曲县赵家岭村黄河边亲眼看到黄河上的漂浮遗体有千余具。在老三门峡以西、以东的黄河滩，搁浅了大量的遗体，数量应有数百具。因此，仅根据三位目击者回忆可知，陕军官兵跳黄河后，在下游平陆县东部及垣曲县的黄河上漂浮的遗体数字为 3000 具左右。

前述跳河官兵的统计数字为 3410 人，下游黄河漂浮遗体的数量，据仅有的三位目击者所说，似乎没有 3410 具之多。跳河的官兵分四种情况，其中之一就是从土崖边跳下后没有掉进黄河，而是摔死或摔成重伤最终死在河滩上，后一种没有跳进黄河而牺牲在河滩上，也算是跳黄河，由于这部分官兵没有扑进或跳进黄河，他们的遗体也就不可能出现在下游。

四、“六·六战役”陕军阵亡官兵数量考

在综合分析统计陕军官兵跳河的具体数量后，对陕军官兵在“六·六战役”中总体阵亡数量进行考证，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数千官兵跳河的合理性。

对于“六·六战役”陕军的损失，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是役我伤亡六千余人，敌更倍之（据报敌在运城追悼士官以上阵亡者亦列灰罐一千七百余只），先后激战十昼夜，卒打破敌扫荡中条山之企图。”[1]第四集团军参谋长陈子坚回忆说，“是役是孙集团军在中条山最大的战役，前后经过约二十日，我各军共伤亡官兵约六七千人。”[2]“六·六战役”发生在 1939 年，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中国独力抵抗日本，国土不断沦丧，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军事及精神压力，国内悲观情绪始终不减。在这种情况下，以胜利来鼓舞民众对抗战的希望就显得格外重要。

“六·六战役”陕军将士的伤亡数字，孙蔚如、陈子坚、赵寿山等陕军高层认为是六七千，但第四集团军 38 军某班班长、后任咸阳军分区政委的姚杰回忆说，“此次战役，敌军积尸累累，第四集团军亦伤亡近 9000 人。其中 96 军伤亡 6900 多人，这给那些惯用国民党懒汉战术的保守势力以沉重打击和无情讽刺。”[3]时任第四集团军 38 军军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的于景祺回忆说，“ 此次战役敌人死伤甚众，高桥联队长被击毙。我第四集团军伤亡达 9000 余人：其中 96 军约占半数以上。”[4]

“六·六战役”我军伤亡主要是前期作战失利造成的，前期 96 军 177 师、独立 47 旅及 38 军独立 46 旅均一度被日军压缩在芮城、平陆沿黄凹地一带，各部虽然相机突围，但损失惨重，尤其是 96 军。原第四集团军 38 军军部机要参谋、译电员车国光先生回忆说，“96 军并未全军覆没，陈硕儒率领突围到敌后的 177 师部分主力，加上收容了独 47 旅被打散的人员约 5000 余人归队了。”[5]96 军只辖有 177 师和独立 47 旅，一万多人，仅剩 5000 多人。另据原 38 军军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于景祺回忆，96 军在中条山西段苦战，受到极大的损失，所属部队部分被压迫于黄河岸边，几遭覆没。仅独 46 旅守备平陆以北地区，损失几达 2 / 3。[6]可见，整个战役中，第四集团军伤亡 9000 人左右，阵亡 7000 人左右，而前期战斗失利跳黄河的陕军约 3000 人左右，也在合理范围内。

总之，通过对原作战官兵的回忆文章及沿黄群众访谈资料分析可知，陕军跳黄河的官兵约有 3410 人。下游军民目击黄河漂尸约有 3000 具，因黄河大浪冲击搁浅在岸上的遗体数百

1 刘琦：《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4 页。
2 刘琦：《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6 页。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 页。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1 页。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2 页。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0 页。

具，陕军官兵跳黄河后，下游河段漂尸至少有3000具。部分官兵从黄河岸边高崖跳下后，没有跳进黄河而落到崖底重摔而牺牲者众多，漂尸数量加上重摔而牺牲官兵数，与跳黄河官兵总数大约是一致的。保守估计，陕军官兵跳黄河的人数为3000左右。同时，在整个六·六战役”中，陕军官兵总体阵约7000余人，在约7000阵亡官兵中，因前期作战失利，96军及38军独立46旅全部被包围在黄河沿岸，除部分主力成功突围外，被迫跳黄河的官兵有3000人左右，也是一个合理的数字。

（葛天，男，1979年生，陕西武功人，西安博物院副研究员，西北大学中国史研究硕士毕业。手机、微信：13891951912，邮箱775219487@qq.com，邮址：西安市友谊西路72号西安博物院，710068）

民族象征物：抗战文化动员背景中的华山叙事（提纲）

杨 博

长安大学

景观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引出了认同形成、表征等景观研究议题。本文以抗战期间的华山作为研究对象，这一景观不仅被视为抗战动员的文化资源，而且也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物。此外，在华山抗战石刻中，记载了民族抗战的文化记忆。因此，华山的自然形象与民族景观的象征融合在一起，为现代民族国家塑造成可见表征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

作者联系方式：13991839116；邮箱：yangbo@chd.edu.cn

大历史视角下的西安事变研究刍论

胡勇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西安事变研究开展四十余年来西安事变取得了丰硕成果。[1]但总体而言，西安事变作为一项渐成体系的史学研究论域，目前的研究局限在事件史维度而相对忽视更为深层次的时空维度，缺少对事件人物本身与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的整体关注，大历史是梳理大尺度上历史的复杂性，从而更好把握历史规律。本文首先考察以往西安事变研究的方法并进行反思，进而引入大历史的观念结合西安事变研究做一些思考，着重从三个维度阐述大历史视角下西安事变研究有待深入拓展的课题，尝试从大历史视角审视西安事变的研究深层意义。

一、西安事变研究方法的简要回顾

长期以来西安事变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近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虽然与民国史其他研究相比不再成为热点问题，相关论著较十年、二十年前大为减少，仍然不乏新的重要创新性成果出现，尤其是最近十年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出现显著转变。

第一，西安事变实证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廓清变前后的历史细节，考察个人之间、派系之间复杂矛盾纠葛及各个政治派别尤其是地方实力派的反应、西安事变前后与外国如英美、苏联、日本的关系。西事变前后国内舆论的反应、档案资料，电文电稿、人物文集、回忆录、报告、文史资料、地方志资料，大量整理出版都奠定了研究的坚实基础。例如李云峰教授整理出版的资料汇编和文集、近年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的《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成为集大成的史料汇编。[2]近年海外及台湾大量相关资料公开、出版，例如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对西安事变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多国视角的史料，从多侧面多角度还原历史真相，澄清错误认识。[3]

还有学者通过分析西安事变中不同当事人的相关记述，揭示了时差和不同时间制度的存在及其对于西安事变史料所记述的时间信息和史实研究的影响。[4]

---

1 主要论著有：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 李云峰等：《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 年，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0 年，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美〕 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浙江大学 出 版 社，2013 年，李 义 彬：《西安事变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2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全 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

3 吴景平:《胡佛研究所藏宋子文档案概况及其学术价值》宋子文档案中值得关注的，便是西安事变的文献。关于 12 月 20 日宋子文第一次抵达西安之前，蒋介石对于解决事变的态度 。宋子文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时蒋的态度，宋子文再次抵达西安后，蒋介石向宋指示与周恩来谈判解决事变的条件。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较详细记载了宋子文本人对于事变的看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

4 田武雄：《时差与西安事变时间之谜》，《中共党史研究》 2018 年第 5 期。

第二，近年关于西安事变研究并不限定在 1936 年 10 月到 1937 年初的事变前后的历史，而是梳理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起到西安事变的善后乃至全面抗战爆发抗战以后的历史脉络。关注事变以后相关人物在西安事变后的相当长时期的命运及生活细节，从历史的长时段中分析事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深化对西安事变多维影响的思考。例如郭双林考证了《西安事变反省录》的成文经过及其影响。[1]郭双林还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张学良藏书目录考察了张学良幽禁期间的阅读史、指出其中有大量“红色”和偏左的书籍。发现张学良在当时不仅对马列主义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在自觉地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2]

第三，随着社会史、新闻传播学、记忆史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对象从政党与国家战略和政要层面转换为对参与事变的东北军、西北军及其附属群体和普通民众的研究，从民众史角度认识这场事变。例如张万杰研究了东北籍救亡群体中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东北军将领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表现。[3]胡勇则关注西安事变前后的民众心态。[4]指出西安事变前后的民众心态表现为抗日情绪高涨,但具有自发性、随意性的特点，不同阶层或群体也由于立场、知识素养的不同而表现出各异的心态，同时社会群体意识和凝聚力有所加强。胡勇还尝试用记忆史的方法对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势力对西安事变的历史记忆与诠释进行梳理和考察。[5]还有学者关注事变期间的谣言，指出尽管与事件的严重性和舆论信息的缺位休戚相关，但是民族情感与个人情感的混杂、派系斗争与国共政争的较量、国际社会与国内利益的纠葛，种种变量均构成了事变期间谣言散播的共同基础。[6]王春林用传播学方法考察国民政府在西安事变后的宣传善后，指出西安事变损害了蒋介石的领袖形象与国家权威。为维护政府纲纪,蒋介石延续了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叛变"认定,并策划了对张学良的军法审判。同时,蒋介石还发表了《对张杨训词》《西安半月记》以及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试图垄断对事变的话语权。[7]

综上所述，从学术价值而言，虽然以往研究成果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实施考证越来越细密化，多国史料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更新，但也存在较大缺憾，已有史学成果多采取各自单一视角，从事变的起因、经过意义及其影响、事变中的人物、善后处理的各个环节、各方政治势的态度、南京政府应对策略和政争出发，缺少共时性研究。对这些维度进行整合并展开基础性、历时性分析还较为少见。近年综合性研究仅见李义彬的《西安事变事略》一书围绕西安事变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以时间为线索，较为详细地介绍了

1 郭双林：《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再考察》,《中共党史研究》 2019 年第 3 期。
2 郭双林：《张学良被幽禁大陆期间对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研读》,《历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
3 张万杰： 《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年。
4 胡勇：《》略论西安事变前后的民众心态》,《史学集刊》. 2012 年第 6 期。
5 胡勇：《西安事变的历史记忆与诠释（1937-1956）》，西安事变研究会编：《纪念西安事变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6 杨东：《疯狂的谣言：西安事变期间的谣言及其变量》,《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7 年第 5 期。
7 王春林：《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宣传善后——以蒋介石、张学良为中心》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8 期。

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经过、处理过程以及其中各方的矛盾和态度、事变的影响等，依托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力图为读者呈现真实、全面的西安事变。[1]把握好研究中的整体性和宏观性，才有可能开拓新创新，这就需要更加宏大的视野重新审视其历史，挖掘其意义和价值。由于以往学术界对西安事变发动原因、经过、结果研究较多，但关于中国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与政策策略论述较少；关于国民政府相关交涉、斡旋谈论较多，中共这方面活动则研究较少；中间势力在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关注较少，这些都影响到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例如陕西绅士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态度就与西安当地军方很不相同，陕西各界代表组织代表团奔赴南京呼吁和平。南京军政大员叫嚣要讨伐陕西，一时战云密布，形势紧张，1937 年 1 月 6 日孙蔚如和东北军一位高级将领邀请西安地方士绅开会，商定组织呼吁和平代表团，奔赴南京呼吁和平，康寄遥、王典章、宋联奎、惠春波、张德枢、代表团抵达潼关，中央军将领不准代表团通过，代表团说，陕民何辜是非自有公论，张、杨有错，惩办只能涉及他们本人，大军坚持西进，势必玉石俱焚，代表团抵达南京、上海与国民政府中央大员见面，倍陈陕民希望和平的愿望。[2]陕西士绅这些做法虽然有保境安民的意蕴，但客观上推动了事变后和平解决的进程，避免了更大内战的爆发。这些都很值得关注。笔者提出从大历史的视角开拓西安事变研究的视野，或许能带来一些思念的思考。

二、从大历史视角审视西安事变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历史观的论述，对我们这方面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并强调“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3]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历史、运用历史的科学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为我们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善于把握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在浩如烟海的历史细节中去伪存真，运用大历史观学习党的历史注重运用宏观视野分析看待历史，全面系统地洞察把握历史演变规律，科学指导发展实践。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

海外史学界近年强调从大历史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其中也有不少方法和思路值得借鉴。美国华人学者黄仁宇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

1 李义彬 ：《西安事变事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2 康寄遥：《各界和平代表团奔赴南京呼吁和平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3 王广义：《大历史观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2021 年 7 月 6 日。
4高 翔 ：《 从历史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人民日报》 2021 年 10 月 13 日。

和事，黄仁宇认为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的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的尺度衡量。[1]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大历史是一种试图在所有可能的层面上理解过去 的历史，甚至涵盖整个宇宙。同时关注历中的偶然因素及细节和能够廓清细节的大的格局或可称之为一种全面、统一的关于已知世界或宇宙的历史。[2]荷兰学者雷蒙德·斯皮尔指出，不断提升的复杂性”的“能率密度” ，将“复杂性”作为大历史叙事的核心线索，将整个时空演进都纳入视野，大历史关注造成重大变迁或突出复杂程度增高的历史事件，关注复杂性实体不同类型的组块，自然、生命、文化等不同层次的组块。[3]大历史叙事要能够容纳多个尺度的小规模历史；而一旦出现大的偏差，则必须严肃深究，其结果可能是实证数据的重新解析或历史叙事本身的改变。这是学术研究的原理，大历史也不能例外。

本着上述思路，考察以往西安事变史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集中在有关资料整理、人物、各党派与西安事变的研究、事件本身细节的考证、事件与舆论的关系、事件爆发后个派系的反应与互动、西安事变与美国、苏联及共产国际、日本的关系、事变与各个群体之间的联系网络。大历史视角超出了传统史学的框架，超越了时下的政治事件史范畴。如果说以往的历史主要是关注事件本身的历史，那么从大历史视角审视西安事变，更关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背景—民族矛盾与政治斗争、思想文化的发展、社会结构演变以及参与者重要人物在其中的定位。如果说以往相关研究多注重探寻国际间、政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或人与人之间面对大危局、大变局下的发展轨迹，那么大历史视角下拷问的隐藏在这些现象之下的更深层问题。

三、 从大历史视角考察西安事变的三个维度

（一）第一个维度：作为事件史的西安事变

把历史事件视为独立研究对象而形成的 “事件史” ，极易形成一种封闭态势 ，从而束缚史学研究的视野 。最常见的情形是，事件史的研究对象往往从历史事件缩减为 “重大 事件”，又进一步化约为政治事件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 ，事件史蜕化成了政治史或者政治事件史。[4]大历史视角下的事件史不同，关注的是事件前后脉络和发展演化的规律，对西安事变来说，更需要关注事变前一系列事件的影响，西安事变前，是一个中日民族矛盾急剧激化，国共矛盾相对于中日民族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这一时期深刻的民族矛盾，导致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不断高涨。日本先是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侵略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整个华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2 大卫·克里斯蒂安著、晏可佳等译:《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年。
3 雷蒙德·斯皮尔著，孙岳译:《大历史与人类未来》，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 36 页、第 48-79 页。
4 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北危在旦夕。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1935 年 8 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逼蒋抗日仿真的确立。

1935 年下半年至 1936 年西安事变前日本侵华及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涨的情况列表如下：

1935 年 8 月 13 日	河北省香河县汉奸勾结日人闹事，欺骗农民发动暴动，中国政府与日军谈判解决，
1936 年 8 月 24 日	成都发生了日本记者被袭击的“成都事件”
1936 年 9 月 3 日	广东省北海市发生了日本商人被杀的“北海事件”
1936 年 9 月 18 日	“九一八”事变（日人称为“满洲事变”）的五周年，中日两国军队在北京近郊的丰台发生冲突。
1936 年 9 月 19 日	发生了汉口日本总领馆的巡查被杀的“汉口事件”
1936 年 9 月 23 日	发生了上海第 3 舰队特别陆战队成员在市内被枪杀事件，1 死 2 伤
1936 年 11 月 13 日	上海日本人纺织厂工人罢工
1936 年 11 月	晋军傅作义部在绥远抗战

许多事件发生之后，常常会诱发出一连串的次生事件，这种现象就称为事件的连发性。当然，各种事件相继发生，从外表看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所致，而其内在原因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但可初步认为，矛盾力量转化传递与发散是认识它的重要线索和依据。正如何干之所言：

> 日本要不费一兵一卒来征服中国。自从成都、北海、丰台、汉口、上海等事件相继发生以后，满洲、上海事变前的状态，又突然再现于今日。成都、北海二事件，还可说是中国人打死了日本人，而丰台事件，却是目中无人的日军，包围二十九军在当地驻防的部队所引起的。汉口日警吉岗被击毙命事件的出事地点，在日租界，上海虹口日水兵田港被击毙命的地点，也在公共租界。然而，日本竟不管是非曲直，只要有所借口，就立刻准备制造侵略的惨剧。所以自丰台事件后，中国驻丰台的军队被迫全部撤退还不够；汉口事件后，日本纷纷派舰来华示威还不够；虹口水兵事件后，虹口闸北一带布成如临大敌的战局也还不够；日本的霞关外交，更训令川越大使，向中国提出四条灭亡中国的强硬要求，日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又于 10 月 5 日携带外、海、陆三省的新训令，来华传达于川越，准备向中国的军政最高长官，要求最后的答复。这几天来，显然军事的布置表面上已经缓和不少，但外交交涉却已到了屈辱的瞬间。有田外相早已声明中日交涉不出二途：不是非常良好就是非常恶劣。所谓非常良好或非常恶劣，无疑是对日本

而言。日本认为良好，必定是中国五条件的屈辱；反之，若认为恶劣，一定中国拒绝它的要求。但在事实上，使日本感觉非常良好的倾向，是一天天明显的。眼看着日本要不费一兵一卒，单凭几个训令、几个外交大员的威胁，我们的政府就把整个中国拱手让给他人了。 然而，松室少将的估计，即是：“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远抗帝国”的估计，虽然是命中了；但四万万民众抗敌的决心和情绪，却是一天天坚固和高涨。[1]

一连串事件的演化表明，国民政府一再推迟战争爆发时间，采取隐忍态度进行交涉、害怕刺激日人，随着事态不断扩大，战争箭在弦上，时间越来越紧迫，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无异于自杀，建立抗日联盟早做总比迟做好，越来越成为国人的共识。 因此西安事变爆发不是偶然的，具有必然性，如其不发生，类似的事件也会发生，如果西安事变不成功，也会有另外类似事件取代之，事变如果不出现在西安，也会以其他形式出现在其他地方。西安事变前后中共正是准确把握社会心理的趋向 ，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引导、推动它走向成熟 ，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2] 。正如习仲勋在西安事变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所指出的：“在当时形势下，能否使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领导转到团结抗日的政策上来，这对能否顺利地实现全民抗战是关键性的问题。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3]“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才最终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民族统一战线进程中所面对的复杂局势和可能经历的困难强调得比较多。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可能也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不会对当前局势有这种判断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4]

（二）第二个维度作为思想文化史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作为一个思想文化事件的启蒙意义，长期由于其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的性质所遮蔽。五四运动后，随着大众传播的兴起和教育的普及，思想文化从学术精英层面向大众层面蔓延、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国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使各党各派能够真诚地团结起来。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而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长久的统一。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要求和目标。自鸦片战争以来，民主政治就一直被视为挽救民族危机的重要手段，争取民主政治与争取民族独立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众化的民主思想的启蒙、文化的复兴，在西安事变后达到了又一次高潮，知识界对九一八以后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反省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构成了五四运动后又一次思想文化高潮。

在西安事变前，汉奸文化，民族文化思想的激烈交锋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

1 何干之：《中国的军备问题题(1936 年 10 月)》，刘炼编,何干之纪念文集 1906-2006,北京出版社,2006 年，第 64 页。

2 参见樊美玲蒲晓业：《中共对当时社会心理的准确把握》,《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2010 年，第 5 期。

3 习仲勋：《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6 年 12 月 12 日）》,《《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第 489 页。

4 习仲勋：《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6 年 12 月 12 日）》,《《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第 489 页。

些知识分子容忍日本人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割走。同时反帝救亡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这种状况也促使文化界迅速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和汉奸文化不断的交锋，由于出版言论不自由。反而使汉奸文化大行其道，但是西安事变的爆发，文化界获得了出版、言论，集会的自由，西安事变以后有关抗日的出版物，相关的社团，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断的涌现，因此西安事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当中有里程碑的意义。知识界从而得以彰显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文化为武器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斗争，从而避免中国人民受到殖民地奴役的命运。

1936 年 9 月，陈伯达根据中共中央“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指示精神，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新启蒙”的概念。一个月后，又在《新世纪》杂志发表《论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强调“新启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强调此次运动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是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同年 10 月，同是中共党员的艾思奇，自称受陈伯达文章的启发，在《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一文。该文认为，由于二十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才致以今日的文化状况“庞杂而不平衡”。此种文化状况是不能够应对民族敌人疯狂进攻的严峻形势的。因此，艾思奇提出，这次新的文化运动，必须以“民主主义”为其性质，以“爱国主义”为其主要内容。 陈、艾两人的文章刊出后，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一些党派观念淡薄的民主人士，他们既不满意中共党内的“关门主义”，更反感蒋介石政府对自由思想的钳制，希望发扬“五四”自由讨论的传统，把思想文化统一到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这一时代主题上来。[1]

西安事变主要成果之一的出版言论集会自由和民族诉求，直接促进了以爱国主义为主旨的中国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壮大。

（三）第三个维度：作为社会结构变迁史的西安事变

1、西安事变与社会心理结构的重大变动。

社会心理结构的巨大变动突出表现在地方意识逐渐淡化、民族国家意识逐渐形成。随着社会重心下移动，上层少数精英阶层掌控政治的局面结束。随着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下层社会经过第一波五四运动、第二波国民革命，第三波“一二九运动”政治参与程度越来越高。下层推动上层一波一波，处于社会上层的张学良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感召，一方面考虑东北军集团利益。总体上政治经济集团利益为整体国家利益所取代，分离力量不断弱化。下层政治参与随着城市化受教育群体进入社会各界，推动社会民主化、社会自主能力大大提高。

据刘伟研究，在清人眼中，省没有独立地位和既得利益，只是行政区划概念，但到 20 世纪初，省的自主意识、认同意识悄悄出现，人们对省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新的省意识。20 世纪初省意识的变化是悄

1 启良：《,20 世纪中国思想史》，花城出版社 2009 年，第 142 页。参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7 年。

悄进行而又在民族运动中勃发的。它是三方面社会变迁的结果，其一，省地位发生变化。省有自主权，省与省争饷源、争利益。其二，各省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各省官员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自保利权，凝聚和动员了民众。其三，权利意识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三个因素促使省意识高涨并促使地方主义的发展。[1]上述原因促成了民国初年地方集团对抗中央、地方政府自保与扩张、地方利益高于一切的局势。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颠倒。有时不惜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甚至外敌入侵时，对整个民族存亡缺乏清醒的认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九一八”事变后，部分省份的民众面对日军对华北的蚕食对邻省的存亡漠不关心，如有些内地省份的人会认为东北的沦陷与自己没关系。西安事变发生时，这种情况得到明显改观，所以当时《申报》一篇时评的题目就叫《中国还是整个的中国》[2]该作者说，这一次西安的非常事变，是我国生死关头的问题，应付一不得当，就可以使国家重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给敌人以加紧侵略的绝好机会。因此时至今日，中央及地方军政当局固然用审慎而坚决的手段来收拾这空前困难的大局，全国民众也应该为国家为民族把意志统一起来，给政府做坚强有力的后盾。再如有论者指出“此次事变后，全国上下，都一致赤诚表示，拥护中央、信赖政府，不独对中央政府的措置，完全赞同，并坚信政府的办法，足以致胜，足以于内忧外患之中，达到民族复兴的大岸。这种国民心理的表现，较任何总投票，尤为确实。此为数十年来仅见的好现象，是负党国重任的诸公所应引为快慰的”。[3] 从当时民众表现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是拥护统一。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民众痛苦的增加，可以说，是国内分裂局面造成的，分裂的局面如果延长下去，会造成亡国甚至灭种。这一点，老百姓是认清了。任何分裂的举动都为民众所不容。第二，国民对此事变，已充分表现了民意的伟大力量。全国民意促成事变避免了流血。[4]尽管民众心理缺乏稳定性，摇摆不定，但群众的意愿会传染、重复，也会扩散到社会上层，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会以强大的力量在最上层扎根。

2.西安事变与历史时空结构的巨大变动。

首先空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历史运动过程中的系统与各个子系统，包括中国这个体系内部各区域的人群有着深刻的共生关系，西安事变的历史紧要关头中国内部政党、派系，出了国民党、共产党、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各个派系在历史紧要关头的反应及其相互作用、中国这一大系统与外部欧美、苏联、日本之间的关系。都值得从整体上综合梳理，研究其规律。其次是时间结构需要认真考察。事件发生时不同时间模式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维度，很少有人关注。。

此外，促成事变发生的适宜条件有哪些？大历史观认为复杂实体要存在，就必须具备相应的适宜条件。为何事变发生在西安，与各派政治力量聚焦于此有无关联，军事力量、知识界的力量配比？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1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 年第 5 期。
2 宜：《中国还是整个的中国》1936 年 12 月 14 日第 2 张第 5 版。
3杨恒：《西安事变的收获》西北论衡 1937 年第 5 卷第 1 期。
4普仁：《西安事变与民众心理》，《是非公论》（十日刊）36 年 12 月 25 日。

综上所述，大历史视野下西安事变研究可以开拓的一系列新的课题。对上述课题，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研究。在具体研究中，有以下两方面工作应先期进行：

第一，要下大力气整理相关史料，包括进一步挖掘 已有资料的新内容。 第二，加强西安事变与抗战动员与准备之间关系研究。物质准备、军事准备、心理准备、思想文化准备。第三。关注社会各阶层、组织、群体、个人的民族意识生成、抉择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并探讨这些互动对中国抗战史产生的效应。

在具体内容上，西安事变史研究可分为西安事变人物史、西安事变策略史、西安事变军事史、西安事变期间社会结构变迁史、西事变期间的党派史、西安事变期间的思想文化史、西安事变期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论题。跳出单一政治史、战争史研究的藩篱，走向多学科交叉、综合性研究的新境界。从而在新世纪百年大变局、中国人民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战略目标、全球化的历史情境中，以更加理性、客观、辩证的态度梳理西安事变史，处理好政治与外交、军事与政略、上层与下层、共时性与历时性、全局与局部的关系，融通多学科研究的开展上述课题的研究。在学界众多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史研究必将愈益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涌现大批创新成果。

魏野畴与杨虎城关系探究

贾建坤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1945 年 6 月 17 日，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人民代表，在延安隆重举行了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毛主席亲笔题了“死难烈士万岁”的挽词，并亲自宣读了祭文。祭文中写道，“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在二十四年里，单共产党人就死了几十万，革命民主主义者跟我们一道反对外国的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成百万的牺牲了。反动派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就采取杀人的办法，以为屠杀会使革命者退却，可以停止或者缩小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1]自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陕西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的英雄烈士，有共产党员，也有跟随共产党一起武装反抗反动势力的民主主义者，魏野畴和杨虎城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看过，写得有水平。他的学识是很渊博的。”[2]在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的启蒙运动中，魏野畴同志是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3]1919 年，魏野畴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小组的影响下参加了五四运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也坚定了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1920 年，魏野畴等陕籍旅京学生创办了进步刊物《秦钟》，激励学生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被青年学生誉为“学生司令”，[4]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 10 月，魏野畴和陕西旅京学生刘天章、杨钟健、李子洲等发起并创办了《共进》杂志，翌年 10 月，成立政治性社团共进社。该社不久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方针、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刊物。[5]1923 年，经李大钊介绍，魏野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受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邀请回到了榆林中学任教。同年，杨虎城在经历了靖国军失败以及孙中山遭陈炯明背叛被赶出广州等失败后，受到沉重打击。他开始思考革命的前途，对革命道路、革命方向感到迷茫，心情愈加苦闷，到榆林不久即大病一场。在榆林养病期间，经杜斌丞介绍，杨虎城结识了魏野畴。

一、 魏野畴对杨虎城革命思想的启蒙

1915 年，袁世凯窃国称帝，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陕西也同样掀起了反复辟的起义运动，矛头直指陕西将军陆建章。在蒲城同乡井勿幕等老同盟会会员的影响和推动下，杨在农村聚集起了几百人的队伍在陕西东部同袁军英勇作战，缴获了相当数量的枪支弹药以装备队伍，极大的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因反袁有功，1916 年，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王飞虎部第一营，杨任营长，进驻大荔县，成为参加革命的正规部队。

1 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33.
2 张焱.毛泽东的儿女亲家——孔从洲[J].海内与海外,2008(02):13-18.
3 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 传略·回忆·遗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37.
4 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 传略·回忆·遗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4.
5 刘玉川,李顺民.马列主义传播与陕西党组织的建立——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J].陕西档案,1996(04):10-11.

1917 年 7 月，孙中山抵达广州树起了护法大旗，就任大元帅，号召全国反对北洋军阀。陕西省以于右任、井勿幕为首的进步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在三原县建立了靖国军，于右任为总司令，与陕西督军陈树藩对抗。杨虎城率部加入靖国军，在这一时期，他迫切的感到学习文化的重要，开始有意的结识一些知识分子，丰富头脑，开阔眼界。最重要的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杨虎城不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并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邀请进步知识分子定期向部队讲解中国社会的形势以及孙中山的革命理论，逐渐成长为一名旧民主主义者。

1922 年，靖国军失败，杨虎城率部退至陕北，以保存西北的革命种子。他虽然暂时遭到了失败，但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不幸的是，1922 年 6 月 10 日，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陈炯明发动了武装叛乱，派兵袭击孙中山的总统府，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最惨重的失败，这对杨虎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惨痛的事实面前，他不能不开始思索，许多问题萦绕于他的头脑之中：自己不能说没有为革命努力，但为什么却一再失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救国的良策，为什么总也实现不了？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为什么也失败了？他感到困惑，并百思不得其解。[1]随后暂退到陕北榆林井岳秀防区。

榆林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榆林中学更集中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具有深刻的革命思想，因此杨虎城非常愿意同他们结识并时常讨论革命问题。经杜斌丞介绍结识了一个对他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的人—魏野畴。杨虎城之子杨拯民回忆道：“两人一见如故，交往甚密。在这期间，魏给杨详尽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诚恳的指出了我父亲屡遭失败的原因。”[2]魏野畴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洞见当时社会的矛盾以及国内形势，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的先进性深深的打动了杨虎城。榆林进步中学教师王森然 1982 年 5 月说：“他当时对革命形势，对中国革命的概况、方针了解不够，通过与杜斌丞、魏野畴等人的频繁接触，逐渐对中国前途有了认识，并总结了失败教训。这段时期，对杨虎城以后的思想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3]而魏野畴也认为，“杨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他出身很苦，富有革命的热情，在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很英勇也很坚决，并在地方上有较高的威信，因此应当积极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使其参加到更广泛的革命斗争中来。”[4]后来的革命历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杨虎城后来不仅积极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且暗中保护共产党员，允许并支持党组织和团组织在自己的部队中广泛发展，甚至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杨虎城派姚丹峰为代表参加会议，后来姚丹峰回忆说：“1924 年春，孙先生回到广东，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于 1924 年元月到达广东，会后，孙中山先生当面向我指

1 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1.
2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我所知道的杨虎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333
3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40.
4 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4.

示：曹锟贿选是倒行逆施，大背人心，可通函杨先生，在北方与张（作霖）、段(祺瑞)联系，共谋推翻曹锟。”[1]在接受了魏野畴等人新的革命思想影响之下，杨虎城转变成为了一名新民主主义者。

二、 皖北暴动魏野畴与杨虎城的合作

（一） 驱逐吴新田、创办三民军官学校的合作

1925 年 5 月 4 日，吴新田的第七师顾琢塘部与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因踢足球发生冲突，军人冲入学校，开枪打伤学生多人，激起了一中和西安各中小学师生的极大愤怒。魏野畴立即抓住这一时机，领导共青团，组织学生罢课、教师罢教以示威。一贯残害人民、鱼肉百姓的吴新田，竟然下令对西安学生进行镇压，全省青年学生愤起应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吴运动”。

5 月 30 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武装镇压进行反帝游行的中国工人和学生，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魏野畴遂领导各界群众召开大会，游行示威，趁此时机将反帝运动和驱吴运动结合起来，以壮大陕西革命运动声势，并发表通电：“沪捕迭次戕杀学生、工人，辱我国体，蔑我主权，消息传来，曷胜悲愤。同人等誓随同胞死力奋斗，务期收回租界，完我国权，存亡攸关，愿共策励。”[2]魏野畴又亲率驱吴请愿团奔赴耀县，吁请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城将军率部参加驱吴斗争，杨虎城欣然应允。6 月 20 日，《新秦日报》报道，耀县通讯云：此间驻扎之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氏，对于沪案异常愤慨，日前特电北京雪耻会，提出对内对外多条办法，请誓死力争，并谓愿率三军效死前驱，以为后盾。[3]在魏野畴等同志的领导下，陕西人民驱吴运动形势不断高涨，再上杨虎城率部出击，又有国民军第三军孙岳以豫陕甘剿匪总司令的名义派徐永昌进驻西安剿匪，吴新田遂率部向汉中撤退，在凤翔、岐山一代，遭到杨虎城部的截击。《新秦日报》刊登的《吴新田过眉县时之狼狈情形》云：“吴军终不能支，粉碎溃败，辎重枪弹委弃于道。吴于是日黄昏时拼命穿过眉县向西而去。总计吴军在眉血战两日，行李辎重损失大半，部下之死伤溃散及缴械者亦不下两千人。其狼狈情形亦可想而知云云。”[4]至此，驱吴运动取得了胜利。

1924 年 1 月 4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不久，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意见指出：“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我们确实有在国民党内竭诚的和国民党合作之必要。”[5]4 月 11 日出版的《团刊》第七期中刊登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指出，“本党为欲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于本届全国大会已经决议党员加入国民党，从种种方面，督促国民党实践其国民革命的工作。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在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加以努力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

1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我所知道的杨虎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13.
2 佚名.三原各界对沪案之愤激[N].新秦日报,1925-06-17.
3 耀县通讯.杨虎臣对于沪案之愤激[N].新秦日报,1926-06-20.
4 佚名.吴新田过眉县时之狼狈情形[N].新秦日报,1925-08-02.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1921 年至 1925 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15.

藐视的心理。”“我们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种机关内，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1]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当杨虎城创办三民军官学校，邀请魏野畴担任政治部长时，魏野畴便欣然应允了。杨拯民回忆说：“1925 年 7 月，我父亲仿照孙中山办黄埔军校的办法，在陕西耀县创办‘三民军官学校’，任命魏野畴为政治部长，延聘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担任政治教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军政人才（后来成为团、旅、师长的孔从州、刘威诚等，都曾是该校的学兵）这是魏和杨在学校里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2]

正是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使杨虎城部成为一支素质过硬，政治水平高的队伍，才能在西安围城八个月的情况下度过难关。

（二） 反围城斗争中的合作

1926 年 4 月 2 日，吴佩孚委任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纠集镇嵩军十万余人，向潼关进军。

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坚守西安，不仅关乎陕西全省人民的安危，也会对全国革命的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基于这种考虑，3 月 30 日，在刘镇华兵临西安之前，中共西安地委派魏野畴奔赴三原，帮助杨虎城部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坚守西安的策略。虽然李虎臣对坚守西安表现的信心不足，且在西安城内的士绅也准备迎接刘镇华进城。但是杨虎城在同魏野畴以及部下开会分析局势后，得出结论：“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正在筹划北伐，吴佩孚、张作霖派刘镇华入陕，目的在于肃清其侧背的于广东有联系的革命力量，以免除后顾之忧，全力迎击北伐军；陕西人民深受北洋军阀和镇嵩军横征暴敛的痛苦，有强烈的反北洋军阀的要求。因之，为了配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顺应陕西人民的革命要求，对刘镇华部予以迎头痛击，是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的。”[3]

刘镇华部陆续到达城郊后，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被切断，陷入完全的包围之中，守城军队多次进攻企图打通西面通向咸阳的大路，均遭到失败。刘镇华部为将全城军民困死城中，强征各县劳动力，挖掘了深约丈余的长堑，在堑后架设大炮，随时发动袭击，并且毁坏了绕城数十里的庄稼。刘镇华部计划挖地道穿过护城河，悄悄地进城，在施工过程中被城中军民发现，在坑道内点燃柴草和辣椒，并用鼓风机向坑道内猛吹，见到敌人就用机枪扫射，逼的敌军连连后退，从此作罢。西安当时居民约 10 余万，围城后李、杨、卫 3 部守军共计 9000 余人，马 1200 匹。时设总粮台，调查储粮，统筹分配。由于西安被围前两年，关中连年丰收，西安粮商借谷贱购囤粮食甚多，估计约敷 5 个月之用。但因战争开始后，城外及各县居民蜂拥入城避难，人口骤增数万，粮食开始出现拮据现象。总部初设收容所及粥厂，计口授粮，耗粮甚巨，未届秋令，粮已告竭，自 7 月起士兵均已隔年杂粮混合粉减量充饥。7 月后，难民即有饿毙者，慈善机关初犹竭力救济，时间一长亦筹措无方，粮价飞涨，小麦由每斗 30 多元涨至 150 余元，青菜如萝卜之类每个售钱 1500 多文。9、10 月之交饿毙者日多，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1921 年至 1925 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22.
2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我所知道的杨虎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333.
3 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21.

“贫人为减口计，不惜以爱女与人换粮数升，暂度朝夕。”[1]

在反围城斗争的艰难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共度难关。时任中共西安地委组织委员、共青团西安地委书记的吴化之后来说：“西安城被围期间，我们的党、团组织是半公开的，一些进步人士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共青团，在社会上并未公开。在整个反围城期间，党、团组织是以“国民党”和“青年社”、“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开展工作的。第一，支持杨虎城、李虎臣坚守西安，抗击刘镇华围城，支援配合北伐战争。以“国民党临时陕西省党部”的名义和“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的口号，团结杨虎城、李虎臣。第二，办暑期学校，对学生、青年进行革命理论教育，宣传北伐的意义，实际上是党、团训练班，为西安解围后的陕西大革命高潮培养了不少骨干。第三，开展救济饥民的工作。第四，还派了一些人突围出城，到渭北、陕东一些地方搞农运和学运，支持守城。西安的党团组织在西安城被围、与外界失去联系长达八个月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有效的组织，发动群众和学生支持反围城的斗争并同守城军队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一是因为大革命下国共合作的背景，二则是由于守城将领李虎臣和杨虎城都是国民军中的左派人士，杨虎城在同魏野畴等共产党人的接触中，与共产党形成了亲密的关系。

三、 杨虎城拒不清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拒不清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委会发出通电，愤怒声讨蒋介石：“似此拥兵自卫，残民以逞之反动行为，何异于万恶军阀。本会誓与此叛党之徒奋斗到底，肃清反侧用奠党纪。”[2]

7 月上旬，冯玉祥致电留守陕西的总参谋长石敬亭，提出反共三原则，即：“一、现各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声明，在本军范围内作为顾问不许兼他职务；二、跨党共产党员即声明脱离共产党；三、在本军范围内不许有反三民主义宣传。”[3]同时，冯玉祥命令所属部队进行清党，缉捕共产党员。杨虎城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对冯玉祥的命令极为不满，且部队由于参加对直鲁联军的战争而远在豫东，因此拒绝执行“清党命令”。此时中共陕西区委接党中央命令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魏野畴任省委军委书记，在陕西成为国民党迫害名单中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陕西的革命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魏野畴东渡黄河，来到了河南归德附近马牧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受到杨虎城的热烈欢迎。这一时期，众多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纷纷来到了杨虎城的第十军，如南汉宸、将听松等，给杨虎城部带来了新鲜血液，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杨虎城部的政治素质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在豫东陇海线上同直鲁联军作战的杨虎城部由于双方兵力相差较大而伤亡惨重，冯玉祥增援迟迟不到，使部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杨虎城同刚刚来到部队的魏野畴商议对策，最终决定将部队开向皖北的太和县以作休整。

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冯玉祥叛变革命，使杨虎城逐渐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为了加强同共

1 李振民.陕西通史.民国卷 8[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9.
2 李振民.陕西通史.民国卷 8[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58.
3 同上

产党的合作，杨虎城任命了一批中共党员担任要职：蒋听松为军政秘书长、魏野畴为政治处长、寇子严为第一师参谋长、曹力如为第二师政治处长，并且筹办了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南汉宸为校长、魏野畴为政治指导员。在第十军内，魏野畴整顿了军内党组织，并建立了以他为书记的中共第十军军委会。以中共第十军军委会为基础，以魏野畴、南汉宸为领导的中共皖北特委成立了，组织上隶属于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二）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皖北休整期间，杨虎城正式向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拯民回忆道：“据南汉宸说，在这期间，我父亲与共产党员谢葆真结婚，对他与共产党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党组织的帮助和谢葆真的影响下，我父亲的思想进步很快。他不仅多次向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表示与共产党合作到底的坚定信念，还进一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希望能做‘第二个贺龙’，要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魏野畴等特委负责人对杨虎城思想的转变感到非常兴奋，魏当即表示愿做杨虎城的入党介绍人，并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信说：‘杨虎城是一位革命将军，他是绝对被掌握在我们手中。’南汉宸则报告河南省委。”[1]

魏野畴之前就对杨虎城有很高的评价，据米暂沉回忆：“魏先生盛赞杨将军的革命热情，并指出应积极争取杨与我们合作。他说杨先生不是一个简单军人，而是一个有政治见解与抱负的军人，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2]此外，还有数位陕西党组织的同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杨虎城及其革命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27 年 11 月 2 日，中共陕西省委陈家珍在给中共中央关于陕西政治军事情况的报告中说：“此外与我们表同情者，还有杨虎臣（城）部，中亦有我们同志。”12 月 23 日，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政治通讯》中说：“杨虎臣因在归德时冯不加援，玩弄把戏，败退安徽太和，屯兵养将。冯知杨不能为己用，口头上为杨大吹其牛，杨愈远离。魏野畴现为杨政治处长，蒋听松为杨秘书长。此外还有许多同志在该部工作。”12 月 19 日，时在高桂滋的第十九军内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胡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以上各部领袖，思想较好者，为杨虎城，有特立独行、好高骛远之气概，现刻彼虽十分困难，犹尚提起精神，锐意整顿部队，当其言语时，每每以政治为前提，时刻痛骂现时一般新军阀之非为，又常表示多找同学帮其工作。”[3]

关于中共皖北特委历次关于杨虎城部的相关工作报告，1927 年 12 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对杨虎城军队中的工作计划》指出：“杨现在表示左倾。有许多客观的条件：（1）趋于首领思想，不甘居于冯等之下；（2）愤恨冯牺牲杨军之阴谋；（3）饷粮军械无出路；（4）全国革命的潮流；（5）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已腐化。”[4]1928 年 1 月 9 日，中共河南省委就杨虎城部的情况以及杨虎城的入党要求向中央做了专题报告，报告称：“杨虎城部队情形及河南省委对该军工作方针在前已有报告。最近南同志由太和来访，报告该军目前状况如下：“ （1）

1 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 传略·回忆·遗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8.
2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我所知道的杨虎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334-335.
3 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 传略·回忆·遗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23.
4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94-95.

现有人数不到七千，枪支仅三千余，野炮、机枪、迫击共计十余架，但子弹非常缺乏；其编制共计两师及直隶于军部之七个小部队。（2）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于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人员，都欢迎。（3）杨军内部非常复杂，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观念很盛，此派和彼派亦常有冲突，不过都服从杨。（4）要他们实行土地革命，马上是不可能的。（5）我们在其中同志共16 人，多系政治人员，没有士兵工作。”“杨之倾向我们，投机的成分很多，在其中做工作的 同志，多没有按着党的政策去做，如没有发展下层组织和当地工农运动等等，特约在该军中做工作的负责同志详加讨论，结果定出比前更加详细的工作方针决议，督促去执行。”[1]“八七会议”之后，中共党内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左”的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因此，中共河南省委才会判断杨虎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投机行为而没有批准，把杨虎城这一支同情共产党并愿意加入共产党的革命力量拒之门外。

四、 魏野畴英勇就义、杨虎城东渡日本

“左”倾冒险主义是皖北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927 年 8 月 12 号，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一号——八七会议的意义及组织党员讨论该会决议问题》指出：“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且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现在农民的土地革命及农会的政权革命，既是民权革命最高形式的表演，无产阶级自然应当和农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领导他们去打倒土地革命之一切障碍：新旧军阀，豪绅地主，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虚伪的“左派”。“谁不赞成土地革命及真正的民权革命（农会政权）谁便是假左派，谁便不是左派。”[2]1927 年 11 月 1 日发布《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指出：“在这种总政策之下，中央已经决定各地应当实行领导工农民众起来暴动：——广东的农民暴动应当积极领导群众起来，叶贺的残部已经编成工农革命军，还要与农民群众中的农军合组起来，受当地农民政权的指挥，实行土地革命，摧天豪绅政权；广州的工人虽然又受李济琛张发奎的压迫，但是他们已经进到夺取政权的认识，应当领导他们准备暴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坚决的执行这一政策，各在当地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3]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各地在条件不甚成熟的情况下普遍掀起了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精神传到陕北，中共皖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皖北举行起义。中共河南省委没有同意杨虎城的入党申请，但是仍然要求杨虎城率部参加起义。皖北特委就起义问题同杨虎城进行了多次磋商，但一直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根据米暂沉的回忆，杨虎城之所以不同意立即参加起义，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一、对第十军内部的看法不同。从表面看，有不少进步、活跃的青年干部，但他们直接带的兵不多。部队实权从团、营以至连

1 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8[M].1984:16.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1921 年至 1925 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11.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 1921 年至 1925 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33.

级，还都掌握在保守分子手里。这些人对起义不会同意。二、对皖北地方封建势力的估计不同，他们曾和杨部队打过仗，力量不小，这对起义将会是一支劲敌。三、对周围国民党部队的情况了解不够。四、最难解决的是杨虎城申请入党问题。”[1]但是，杨虎城如果不参加起义而继续留在部队中，分属不同阵营的国共双方，必将对起义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使已经经营多年的杨虎城部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局面趋于破裂，在这样的尴尬状况下，杨虎城既不愿意轻易举行暴动，更不愿意离开共产党，因此他向特委表示：“可以丢开部队，而不愿使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归于破裂。”[2]

恰在此进退两难之时，由于第十军没有实行“清党”，仍然保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而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据王子义口述，“风声所播，不能不引起蒋之疑忌，乃派韩振声携款三万元，以劳军为名，来太和侦察实况。韩与南汉宸系山西同乡，且在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随着以鹿钟麟为首的赴苏参观团，同去苏联参观，自然稔知南的政治面貌。蒋听松、魏野畴的身份，在前些时候也是公开的。”[3]韩振声一方面要求将南汉宸等中共党员逮捕，押往南京，一方面又极力拉拢杨虎城去南京面见蒋介石，杨虎城与特委商议后，决定同韩振声一同去南京，一是离开太和这个矛盾之地，二是引开韩振声以免起义被发觉。1928 年 2 月初，特委的几位负责人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等都来到杨虎城的住所送行。在离开太和时，魏野畴命令米暂沉跟随杨虎城离开，强调说：“你跟他去，他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跟到底！我们对杨这个人不要失望，还要继续争取他和我们合作。”[4]

4 月 9 日，中共皖北特委组织的阜阳暴动爆发，成立了皖北苏维埃政府和皖北工农红军。暴动失败，魏野畴、昌绍先等领导人壮烈牺牲。4 月底，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秘书米暂沉，由上海乘“长崎丸”号东渡日本。

五、 结语

魏野畴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带到西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革命队伍、建立党团组织、积极领导工人、农民、学生的革命运动，代表着西北地区最先进的前进方向，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线领导革命。杨虎城则是地方旧式军阀，“第十军是陕西，更正确地说是关中东部的地方性集团，是以杨虎城为首的许多以弟兄合伙为组织形式的帮派组合，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意识。”[5]在魏野畴革命思想的启蒙下、在一批共产党员如南汉宸、蒋听松等的不断影响下、在中共党组织多次的帮助下，杨虎城成长为亲共的国民党左派将领，同时也实现了双方的良性互助，使中共党组织在皖北地区逐渐发展成熟。

1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100.
2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我所知道的杨虎城[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24.
3 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 传略·回忆·遗文[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27.
4 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27.
5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80.

由一则报道看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

胡安徽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甘宁边区由于历史时期经济、文化和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致使疫病肆虐，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传染病的死亡率高达 60%。[1]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采取多种措施防治传染病，取得了积极成效。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传染病的学术成果较多，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边区传染病发生的内部原因和具体应对措施等内容，[2]对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传染病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传染病产生的外部因素和防治中需改进之处仍有不少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间。在有关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传染病的材料中，《群众日报》刊登的时政报道《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3]（以下简称“当前急务”）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值得深究，但学界对其鲜有关注。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时期和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时段，仔细品读“当前急务”，深入研究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传染病及其相关问题，既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边区政府应对疫情的方法举措，为时下的防疫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又有助于相关部门进一步提高治国理政的水平，还能丰富和拓展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内容。

一、《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简介

二、边区的传染病种类及其发生原因

三、边区政府应对传染病的举措

四、余论

“当前急务”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对官僚主义的批评以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是一贯的、持之以恒的。1932 年初，江西富田和闽西地区传染病流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常委会，专门讨论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苏区防疫卫生运动”并“责成军委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以便迅速扑灭疫情[4]；为压实防疫的领导责任，1933 年 10 月，中革军委颁布《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对如何应对传染病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第十条强调：“凡不依条例规定之(者)，不依该管卫生机关所指定之期限内施行应办事项者，各级卫生机关得请各级首长以

1叶晓东：《陕甘宁边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历史经验》，《陕西党史》2020 年第 2 期。

2参见卢希谦、李忠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秦爱民《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宁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5 期）、温金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举措》（《抗日战争研究》2005 年第 3 期）、陈松友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疫病防治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6 期）、魏彩苹《从民生视角看延安时期的群众卫生宣传教育》（《陇东学院学报》2015 年第 4 期）、王楠《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疫病防治工作的研究》（吉林大学 2019 年博士学位论文）、马江《陕甘宁边区卫生防疫工作回眸》（《中国档案》2020 年第 2 期）、朱鸿召《延安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档案春秋》2020 年第 6、7 期）、吴云峰《陕甘宁边区应对重大疫情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新乡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等。

3佚名：《林主席指示各级政府扑灭病疫为当前急务》，《群众日报》1948 年 7 月 14 日，第 1、2 版。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标注。

4高恩显：《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14 页。

相当处罚。”[1]为加强对防疫工作的指导以保障工农大众的生命安全，临时中央政府于 1934 年 3 月 10 日又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16 日至 23 日即在疫区举行防疫运动周，领导干部和军民一起参加大扫除活动，洗通沟壑，深挖水井，灭蚊灭蝇，封塞鼠洞，修建土厕，掩埋死尸[2]。红军到达陕北后，大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发现传染病流行时，立即采取相关措施消灭疫情，防止蔓延，如 1941 年，甘泉县发生流行性瘟疫，民政厅便迅速派出医务人员，携带药品前往救治[3]；中央医院 1941 年至 1943 年收住了患有痢疾和伤寒的病人 101 人，由于积极治疗，患者很快返回了工作岗位[4]。除了积极救治，1945 年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还组织专家克服重重困难研制伤寒、副伤寒、牛痘等血清疫苗[5]，为防治传染病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领导率先垂范，既为防疫工作树立榜样，又对克服防疫中的官僚主义有着积极作用。1937 年 3 月 15 日至 21 日，延安开展卫生运动周活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大扫除，毛泽东还讲了话，他指出：“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卫生运动不是一个的人，要大家来做”[6]。毛泽东关于卫生运动的讲话和亲身实践，为抗日根据地领导干部高度重视和积极投身卫生防疫工作既明确了卫生的意义又提出了具体要求，还提供了卫生的榜样。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病疫防控同样高度重视，除了本文所列“紧急指示”“当前急务”外，还有很多此类实例，如 1948 年 6 月 1 日，中共西北局发出紧急救灾指示，要求各机关干部动员起来，全力救灾救死，对漠视灾情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予以纠正；6 月 14 日，《群众日报》发表题为《肃清官僚主义，迅速扑灭灾荒》的社论，要求各机关、部队、学校和各级政府坚决克服官僚主义，立即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7]。1948 年 2 月，边区政府在发现流行性病疫后立即要求各专署、县府把疫情防控作为救灾工作的重要任务，切实组织各级卫生机关参加各地的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的疫病防治工作；区县医务人员组成的防治工作组，要直接到农村去开展防治工作；各级政府和救灾工作组、土改工作组的同志，也要利用一切机会在群众中进行防治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总之，各位专员和县长就是要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同灾荒瘟疫作斗争，不仅要不饿死人，也要防止病死人[8]。新中国建立后，这种精神特质被继承和弘扬。1949 年 10 月初，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发生肺鼠疫并蔓延，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特别指示周恩来连夜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迅速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察北专区地委也迅速作出反应，要求全区干部党员要高度对人民生命负责，发扬沉着顽强精神，动员群众战胜灾难。在各方共同努力和苏联防疫队的协助下，疫情得以控制，11 月 5 日即无新增

1中革军委会：《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载高恩显等编《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937.6》，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0 页。
2翰文：《瑞金的防疫运动》，《红色中华》1934 年 3 月 22 日，第 1 版。
3林伯渠、高自立：《陕甘宁边区政府训令--令派医生前往甘泉救治瘟疫[特字第 407 号]》，载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3 辑）》，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2 页。
4刘亚利：《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医药卫生工作概况》，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延安文史资料（第 2 辑）》，内部资料 1985 年版，第 98 页。
5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3 辑）》，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6 页。
6毛泽东：《在延安大扫除时代的讲话》，《新中华报》1937 年 3 月 23 日，第 1 版。
7张俊南等：《陕甘宁边区大事记》，三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0 页。
8林伯渠、刘景范：《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切实组织好各地防疫治疗工作[新胜字第 84 号]》，载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12 辑）》，档案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29 页。

病例，12 月初，察北专区鼠疫彻底绝迹。[1]1951 年 9 月，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缺点时指出：“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毛泽东看到报告后，马上以中央名义指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2]大多数传染病是可以预防的，但为何未能预防？个中缘由应该很多，但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是重要原因。毛泽东的指示，正是对各级党委避免在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卫生工作中犯官僚主义错误而提出的明确要求。1958 年 11 月，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传染病时有发生，原因主要是某些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思想，只注意生产，忽略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群众吃不到热饭、睡不上好觉，身体抵抗力下降，导致传染病蔓延。毛泽东看到这个消息后批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3]毛泽东指出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显然是要求省、地、县主要领导要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像重视生产那样重视群众生活，让他们吃上热饭、睡上好觉，通过增强自身抵抗力以战胜伤寒、痢疾、肠胃炎等传染病。在 2003 年爆发的 SARS 和 2020 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一方面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的势头，一方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对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而应对疫情不力者问责，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防控第一线，为战胜疫情提供了重要的组织纪律保证。

“当前急务”说明官僚主义是疫情防控的大敌。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典型表现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官僚主义同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中国共产党与官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指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4]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习近平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5]疫情防控“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6]这和“当前急务”表述的观点高度一致。通过对“当前急务”的分析可知：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疫情防控中始终如一注意通过反对官僚主义来提高治国理政水平，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1陈辉：《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抗击鼠疫回眸》，《党史博览》2020 年第 3 期。
2中共中央：《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载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1951 年 1 月-1951 年 12 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46 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第 3 卷（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13 页。
4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 页。
5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0 年 2 月 4 日。
6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行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0 年 3 月 5 日。

工具化与去工具化：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的实践逻辑

陈正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妇女解放一直是中共十分重视的议题。延安时期，在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情境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赓续了五四时期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妇女人格的传统，一方面又对妇女在家庭与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新的研判。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是什么？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的重心是什么？前者的答案显而易见，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眼里，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具有着明显的同向逻辑，实现阶级解放是实现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同时在中华民族面临着侵略威胁时，实现民族解放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必然前提；而后者的答案却并不统一，这种不统一不仅表现在主体层面，即以丁玲为代表的延安文艺界人士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的不同意见，也表现在时间层面，即 1940 年前后，尤其是四三决定颁布前后的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的重心的转移。

在中国共产党处理妇女工作、推进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中，妇女常常作为“被解放”的对象，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妇女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女性，但是处于“被解放”地位的妇女本身在妇女解放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并不明显。即便如此，中共的妇女解放工作仍然使得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历史性地提高了。由此就引起了以下几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在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占女性人口基数最大的农村劳动妇女在妇女解放工作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如何看待与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妇女解放的历史成绩？

学界对这些问题已有过一些探讨。对于妇女的地位问题，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妇女是中共实现革命胜利的“工具”。如王涛（2015）提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特点就是它从来不是妇女群体自发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而是由一群先知先觉的男性知识分子出于国家富强的目的而推动的，带有很强的工具性色彩。”[1]由这一观点展开，学界学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或批判了延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其逻辑一般是：由于妇女在中共革命活动中的工具化使用，所以“抗战时期的妇女迎来了解放的重大机遇，也因为革命的复杂与残酷而备受身心的双重伤害”[2]，最终得出的结论为“表面上轰轰烈烈进行的‘妇女解放’实则是‘天塌不下来’前提下带着镣铐的跳舞。”[3]

虽然这些观点在理论逻辑上可以实现自洽，但值得思考的是，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

[1]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社会整合与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6BDJ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正辉（1994-），男，安徽桐城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迁。

1 王涛：《世界社会主义视阈下的中国妇女解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6 页。

2 张文灿：《解放的界限——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1921-194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4 页。

3 李振：《延安<解放日报>中的性别与文学》，南开大学 2010 年度博士论文。

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妇女工作的实践的角度看，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在抗日时期，中共“从经济独立为根本，求妇女的彻底解放，因而形成了一支妇女农业、工业生产的大军”[1]，妇女的社会地位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高度。具体来说，“党在延安时期通过制定正确的妇女政策，把妇女从封建思想的压抑下解放了出来，广大妇女无论在政治上、家庭婚姻上、社会经济上、社会权益上都翻身做了主人。”[2]所以简单地将妇女解放定性为“带着镣铐的跳舞”是有失偏颇的，或如王建华（2017）提出的那样，“革命情境下的妇女解放是目标更是手段，强调的是解放妇女投身革命”[3]，在中华民族已然面临存亡危机的情况下，妇女解放事业中妇女角色的工具化与去工具化之间存在着张力。

一、性别角色与革命环境的张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中的妇女与妇女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曾以肯定的口吻引用了傅立叶关于妇女解放的一句名言：“某一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4]在这里，马恩所言及的“妇女解放”之意涵即“走向自由”。《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指出，在“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时代，妇女解放之“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5]，所以在妇女解放，即妇女“走向自由”的进程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

从实践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探索如何实现妇女“走向自由”、进而实现全面发展的进程。然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7]，又如陈旭麓所言：“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又以客观事实限制了主观愿望。”[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使命的革命党，当然义不容辞地将妇女解放事业纳入到自己的革命事业中来，但是在民族危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惜一切努力发展与建设党、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成为了中共的第一要务，因此妇女解放事业必须服务于民族解放事业成为了中共必然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妇女必须要让渡乃至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来换取革命的胜利——一方面，在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不分性别地遭遇着侵略者和压迫者带来的严重苦难，每个有志于投身抗日战争活动的中国人都需要做出不同意义上的牺牲，另一方面，即使在中共发起了对妇女参加生产活动的广泛动员之后，妇女的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利等权利仍然受到着陕甘宁政府法案的保护。

---

1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4 页。
2 王纪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党的文献》2011 年第 2 期，第 73-79 页。
3 王建华：《权利抑或责任——革命情境下妇女解放的行动逻辑》，《江海学刊》2017 年第 4 期，第 160-170，239 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49-250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0 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4 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4-75 页。
8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379 页。

在革命环境中，延安道路中“隐约呈现的性别问题被搁置了”[1]这一论断是否准确？妇女的性别角色真的消解于妇女解放事业中了吗？抑或是说，妇女的性别角色在特殊的革命环境下虽然并不能表现为一般人所认知的那种温婉姣好的样态，却又形变成另一种特殊的姿态嵌入到了妇女解放工作的具体实践中？下文将着重探讨后一观点的理论依据。

一方面，妇女在妇女解放工作中表现出的姿态是具有深层次革命意义的“自主”而非纯粹权利意义上的“自由”。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语境中，“妇女”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性别群体，还包括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上的外延。妇女的第一属性是阶级性。妇女解放之所以可以成为衡量人类解放的尺度，就是因为妇女解放在阶级层面上意味着被压迫者的“翻身”，这与马克思主义者擘画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国家消亡、阶级不再的未来图景存在强烈的耦合关系。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概括出的农村妇女受到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种权力的支配[2]，就是对妇女作为阶级社会中的被压迫者身份的研判。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思想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并不以女性的性别特征及由此展开的独属于女性自身的权益保障问题作为自己的中心论点，“妇女解放”一词中，“妇女”是超性别化的被压迫阶级，“解放”才是最根本的价值与目标。在通往解放的道路上，妇女自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需要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待。

必须承认的是，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礼教文化传统不仅在道德上奉“三从四德”为圭臬，而且在掌握着宗族社会权力的男性耳中，女性渴望在符合“三从四德”铁律的前提下获得一定权利的呼声也极为微弱。革命——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实践，让广大劳动妇女有了说话的空间。遗憾的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尤其是在地形相对封闭、文化更为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农村妇女并不能马上就体悟到自己作为一个平等的、需要进步的人的价值所在，所以在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等妇女组织的引导与鼓励下，妇女在不能充分理解妇女解放的阶级意涵的情况下，以一种朴素的“翻身”逻辑，向着“恶婆婆”们发起了具有明显外在优势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妇女并非是自为地在心中构建起了自由理念，而是自主地选择接受妇女组织的保护，并最终投向了中共的政治动员。

另一方面，除了妇女的性别角色需要适应于革命环境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赋予了妇女以新的历史和社会意义，由此就形成了妇女的性别角色与妇女解放运动所处的革命环境之间的互动与张力。

被压迫者何以翻身，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艰辛探索的问题。妇女虽然是一种性别群体，但妇女在追求解放的道路上的对立面并不是另一类性别人群，而是压迫阶级。所以中国共产党认为，“以性的分别来代替阶级的分别，以单纯的‘妇女问题’来代替劳动妇女的阶级利益”，“对于劳动妇女不但不会有丝毫的解放，而且只有增加她们的锁链

1 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南开学报》2006 年第 6 期，第 16-22 页。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 页。

与痛苦。”[1]中国共产党尝试着以多种手段解开妇女身上的锁链，这些手段包括对妇女进行教育、立法保护妇女的婚姻权利、引导和鼓励妇女参加政治活动，以及最为关键的一步——动员妇女参加到生产活动中，等等。在这些举措下，“妇女解放”极容易被历史书写为“妇女被解放”，由此学界就有论调认为：“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这使我们无法断定享受着平等公民权的女性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意义上的自主和自由，女性是否是妇女解放中的‘主体’，她今天的一切究竟是她应该有的一份权利还是被强制规定的一种身份。”[2]这种论调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到压迫妇女的本质上并非是同样为被压迫阶级的农村男性，引导妇女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也并非等同于它那具有强烈男性化特征的、一个具象化的人格。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推动同样是无产阶级的妇女的解放时，党的角色一方面是先进的领路人，另一方面也是与妇女并肩作战的战友。所以中共在赋予妇女以超性别化的阶级解释时，也是在完成对自己本身定位的话语建构。正如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第一段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尤其是处于被压迫阶级的广大劳动妇女）的定位即是需要解放、需要加入到中国革命当中来的力量。

当然，妇女的性别角色并未完全消解于作为阶级革命的妇女解放事业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说，“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4]。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胜利需要妇女的支持，而保障妇女的特殊权利的效度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在革命进程中的成绩。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去看待延安时期的农村妇女的处境，否则将在讶异于妇女群体在家庭和革命中的双重压力时无法辨析当时的妇女群体在历史进程中的成长情况。且不必与封建王朝时代对比，只相比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们探讨“娜拉出走”时，广大劳动妇女与上层精英女性的强烈割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根据地范围内已经极大促进了妇女的觉醒，而妇救会对离婚案中的妇女的普遍偏袒就是明证——即使这种偏袒后来被指责为狭隘的“妇女主义”，但这种“妇女主义”着实对妇女旧有的“工具”属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纠偏作用。

二、五四传统的延续：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权利的保障及对其“工具”属性的纠偏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妇女解放思潮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5]。这一时期，虽然有不少对婚姻自由持反对态度的知识分子，如胡适在日记中说：“忽念吾国女子所处地位，实高于西方女子。吾国顾全女子之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是故，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68 页。
2 孟悦，戴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26 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一九四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5 页。
4 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9 页。
5 揭艾花：《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转型与重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3 期，第 56-61 页。

堕女子之人格，驱之使自献其身以钓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1]但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支持妇女的个性解放。如李大钊认为，“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在家族之中，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2]，对应的，“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受他们的权利。”[3]总的来看，五四时期，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发表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论断，还是《新青年》《妇女杂志》等杂志上刊载的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这些林林总总的观点是存在比较广泛的价值共识的，即认为妇女的个性解放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妇女解放问题，岂仅女界之福，亦世界前途之幸也”[4]。这一时期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论著颇丰，凡此对传统宗族社会及资本剥削环境下的妇女的“工具”属性都起到了理论上的矫枉之效。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五四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便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数次“围剿”的磨难，中国共产党也并未与五四传统相割裂。在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态度上也是如此。

在妇女的政治权利问题上，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批判过的国民政府不同，延安时期的中共在妇女参政问题上的态度并不犹豫，中共中央组织部在 1937 年 9 月颁布的《妇女工作大纲》将资产及小资产妇女、女工、农村妇女和城市贫民妇女等四个阶级的妇女的斗争纲领分类列出，并将寻求政治权利排在每个阶级的妇女要求的最前项。曾不一年，邓颖超发表《论女参政员的责任》一文，从此文或可管窥中共对妇女政治权利的看法。邓颖超提到，女参政员“不仅担负着一般参政员的责任，而且担负着对于妇女大众的特殊责任”，具体来说，一是要“不仅要代表全国人民将意见转达政府，尤其要注意与做到，替最受压迫、最受痛苦的各界妇女大众说话”，二是要“应注意关系到妇女的部分”的提案，三是要“时时关怀着妇女大众的问题，要亲切地和妇女大众建立经常的关系，要谦虚、诚挚、仔细地聆听各界妇女大众的意见”，四是要“发挥推进团结的力量与作用”[5]。邓文着重强调的是已经加入到政治生活中的女性的政治权利与政治责任所在，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经济条件更差的劳动妇女而言，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将保障她们的政治权利纳入到自己的工作任务中：“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的任务是动员妇女参加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工作”[6]。

在妇女的经济权利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曾说，“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经济问题”[7]，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路径是阶级解放。延安时期，中共创造性地将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和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联系了起来。农村妇女缘何没有经济地

1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册，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9 页。
2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8 页。
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4 页。
4 华林：《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新青年》第 5 卷第 2 号，1918 年 8 月 15 日，第 162 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 页。
6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8 页。
7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06 页。

位？其原因就在于妇女被认为是宗族或家庭的工具，其作用无非是生养子女和从事家务劳动。中共认为，要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就需要参与到劳动生产当中去。这里的“劳动生产”既包括以家庭供养为目的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也包括以支援革命为目的的组织化的生产活动。妇女的生产活动组织化始于 1938 年春，在中共的组织下，陕甘宁边区超过一半的劳动群众参加了劳动互助社，超过四分之一的妇女参加了生产学习小组。以妇女纺织运动为代表的组织化的生产活动既极大程度地对中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助力[1]，又推动妇女们逐步建立了作为劳动者的尊严感[2]，妇女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提高，经济权利随之得到了保障。

在妇女受教育权利上，中国共产党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对妇女需要教育的呼吁变成了行动。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后，在毛泽东的主要影响下，中共就格外重视农村与农民工作问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了实质上党的领导核心，因而陕甘宁边区更深入地延续了重视农民问题的革命传统。农村妇女大多是文盲，“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妇女大众的文化水准，在妇女中进行普遍的识字运动。”“在各界妇女联合会下，设有识字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3]从 1937 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在每年的 11 月底到次年 2 月初开展冬学运动，对劳动妇女进行了有效的文化教育。同时，中共还对妇女干部进行了针对性的教育活动。蔡畅、李富春等于 1937 年在延安发起了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对一批军属（女性居多）进行文化教育；1939 年，在毛泽东的倡议下，中共创办了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又创立了边区妇女职业干部学校。在中共的努力下，截至 1940 年，“除敌占区游击区外，凡年在 15 岁以上，30 岁以下者，不识一个字的也绝对是少数了。”[4]

除此之外，中共还特别重视对具有天然生理弱势的妇女的特殊照顾。如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就有规定，“孕妇生产时发生产费 50 元，小产 35 元，生产前后休养两个月，休养期发休养费 20 元”，“女公务员每月发生理纸 15 张，给生理假三天”，“带有婴儿及孕妇之女工作人员，每日工作时间至多六小时”，“有小孩或怀孕妇女，不得藉词简政整编，不管其生活”[5]。根据地妇女在生育时多不知道需要消毒，因此产妇常发生溽热、难产乃至死亡等现象，针对于此，陕甘宁边区在许多地方举办了助产训练班或接生班，培养了一批新法接生员。如 1945 年 5 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与边区卫生署合办助产训练班，招收学员 45 人，学员在下乡实习期间又创办接生班 6 处，培训接生员 367 人，到 1944 年，新法接生在 73%的地区得以推行[6]。

无论是对妇女各项作为“人”的权利的保障，还是对妇女作为一种弱势性别群体的特殊关照，都能体现出对妇女“工具”属性的纠偏。在旧社会中，封建纲常伦理从不重视妇女的

1 周锦涛：《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女性生产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 年第 2 期，第 44-51 页。
2 董丽敏：《组织起来：“新妇女”与“新社会”的构建——以延安时期的妇女纺织生产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6 期，第 10-22 页。
3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9 页。
4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4 页。
5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12 页。
6 周蕾：《抗战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研究（1931-1945）》，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89 页。

人格，并且以一种今天看来十分扭曲的价值观压迫和封锁着妇女的个人意志，妇女在这种环境下不仅没有“做人”的机会，而且常常以“认命”的心态接受了“工具”性的定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自由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并传入中国，封建纲常伦理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数千年的传统积淀之廓清并非五年十年可竟之功，即便是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后，仍然遭受着非人的待遇，难以逃脱“工具”化的命运。中共对妇女权利的保障，是对妇女“工具”属性纠偏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从对妇女权利的考量及其相关立法上，就可以看出来妇女是被视作了与男性平等的真正的“人”；另一方面，从对妇女的权利的保护举措来看，四三决定以前的“妇女主义”行动虽显矫枉过正，但却前无古人地使人口基数众多的农村妇女摆脱了“工具”化的身份。

三、家国的界限：四三决定颁布后妇女解放任务的双重使命

研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问题，一定离不开对四三决定及其给妇女带来的影响方面的讨论。面对同样的史料，学界对四三决定的研究却延伸出了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认为四三决定将妇女解放问题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是对妇女解放工作的接续探索。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妇女在小农家庭生产分工中的相对次要性”被发现后，中共“鼓励妇女在经济领域承担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妇女经济权能的提升逐渐消弭男女在政治上、文化上的差异”[1]。第二种态度是认为四三决定虽然使得中国共产党充分整合了妇女这一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妇女群体并没有受到预期的益处。如有学者提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实践在服务于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在推进妇女个性解放，促进女性性别主体意识觉醒等方面，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较大的退却”[2]。

学界之所以对四三决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原因就在于对革命环境下妇女解放的目的的视角不同。诚如张琴秋所言，“我们认为动员妇女参战，是奠定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的基础，保护妇女切身利益，又是深入广泛动员妇女参战的必要条件。”[3]以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宏大叙事的方法论看待和解读这一命题，是超越在妇女解放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叶障目情况的可行之举。

虽然四三决定标志着中共妇女工作重心的转向，但历史书写的转折并非只呈现突兀的直角形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重塑家庭模式的观点，早在 1937 年就已埋下了伏笔。中共中央组织部在 1937 年 9 月颁布的《妇女工作大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4]同月 13 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公布的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再次重申了这一任务。次年“三八”节，边区妇女代表大会的宣言指出：“我们要动员妇女加紧春耕运动，保障后方粮食的供给。”[5]在边区党委和妇女组织的动员下，仅计算 1938 年春耕运动的数据，女生产人员已超过 2 万人，开辟荒地 7 垧，植树一万棵。不

1 程文侠,李慧：《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 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社会》2019 年第 3 期，第 210-240 页。
2 揭爱花：《国家、组织与妇女：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运作机制研究》，学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2 页。
3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70 页。
4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5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8 页。

过，把这些数据放置到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妇女在生产上所做的贡献就并不突出了。邓颖超在 1939 年总结说，“没有发动各阶层的妇女，发挥她们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1]，种种问题由中国女子大学的代表反映到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处，得到的回复是：“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2]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朱德紧接着就在陕甘宁边区妇联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动员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的讲话，这次会议也做出了将妇女解放经常工作的中心放到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上来的决议。

1942 年，周恩来发表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一方面反对了“新贤妻良母”论者打着虚伪的男女平等口号作实际上的妇女回家论，一方面又对妇女解放前提下家庭中的妇女所应然承担的母职进行了正名。周恩来指出，提倡母职，“首先就要求家庭中尊重母性，尤其是当丈夫的更要尊重母职，帮助母职，而不应妨碍母职。”周恩来并非只重视妇女在家庭中的责任，他也同时强调：“我们提倡母职，绝非视妇女于尽过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相反地，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3]周恩来的观点可以被视作为四三决定精神的先声，在周恩来的文章中，可以管窥到中共中央领导层在 1942 年不仅接续继承了 1937 年以降的妇女须参加社会生产的观点，也开始同时看重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1943 年 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也就是“四三决定”）标志着革命环境下党的妇女解放任务的正式转向。四三决定颁布前，妇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妇女的生活境遇和推动妇女迈入政治生活的话，四三决定颁布后，妇女解放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活动。四三决定指出，“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4]毛泽东在审阅四三决定的稿件时，另外加写了一段话，他强调：“妇女工作者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5]所以，与中共妇女解放任务的转向相对应，妇女在一度被引导着走出乃至脱离家庭以达个性解放的旧路线到此为止，在革命与解放的双重场域下，妇女群体面临着维系家庭和谐和参加生产活动的双重责任。

在中国共产党推进妇女解放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鼓励妇女维系家庭和谐和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中共通过鼓励妇女维系家庭和谐实现了农村家庭伦理模式的重塑，去家长化的家庭组织模式在促进生产方面又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在妇女解放与革命胜利的双重目标导向下，妇女所生活的传统小家庭与革命大环境产生了息息相关的联系。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 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1 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10-611 页。
4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 14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 页。
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 页。

妇女解放任务的第一重使命，就是再塑农村家庭伦理模式。事实上，在四三决定颁布之前，中共就出台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中共中央通过根据地各级妇委组织工作条例》等政策以保障妇女的合理权益，当中共的妇女工作者进入乡村，为备受欺凌的家庭妇女“撑腰”时，无数的“娜拉”实现了从家庭工具到人格自由的“出走”。妇女不再受家庭制约，在身体、婚姻等层面拥有了相当大程度的自由，这是中共对农村家庭伦理模式的第一次重塑。所谓“再塑”，就是中共在四三决定颁布后不再偏向于鼓励“娜拉出走”式的家庭改造，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同中国乡村传统相结合，鼓励农村妇女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参加社会生产，从而打造了跨越而非远离家庭边界的妇女解放环境与民主而非家长制作风的家庭伦理样态。

这种民主制的家庭伦理模式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妇女的家庭地位的提升。在旧有的落后的乡村观念中，人们认为“妇女下地、上场就会少打或不打粮；妇女打井不出水，妇女会冲了风水财气”[1]。而当家庭不再成为妇女身体上的牢笼时，妇女的心灵也进入了更广阔的空间。当妇女跨越家庭后，“男人打女人、邻舍相骂的事情大大地减少了。从经济相当丰裕、经济可以自给的物质条件下，她们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了。勤劳生产、能挣钱的妇女，被人们特别尊敬。”[2]妇女的家庭地位得以历史性地提高了。

妇女解放任务的第二重使命，就是使妇女成为支援革命的重要力量。四三决定颁布后不久，“在 1943 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政府第一次将动员、培训和组织家庭纺织工人，特别是女工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从事家庭纺织的女工从年初的 13500 人激增到年底的 41540 人，产布 45000 匹，远远超过了纺织厂的产量。”[3]这些贡献也是毛泽东关于妇女是支援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的观点的明证。

因此，尽管四三决定强调以经济生产作为首要任务，明显带有性别利益以外的需求，但却不能否定共产党新政策对于农村女性权益的扩大带来的巨大好处[4]。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同时改造家庭使其民主化，实行公私两利、合理分工合理分配报酬，这些使得妇女获得平等权益，也充分发挥了妇女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是对父权制强烈的冲击和动摇[5]。

四、结论

延安时期，中共对妇女解放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任务实现了妇女在人格上的“去工具化”与支援革命上的“工具化”的统一。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称：“我们知道要争取妇女的彻底的自由解放，首先要争得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因为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6]将妇女问题放置到超性别化的社会语境中，将保障妇女的权益与发挥妇女的革命作用结合起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

1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烽火巾帼》，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 页。
2 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8 日，第 1 版。
3 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5 页。
4 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7 页。
5 周蕾：《冲突与融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家庭政策的变革》，《妇女研究论丛》2017 年第 3 期，第 40-48 页。
6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7 页。

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中国化运用。审视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的实践逻辑，可以得出下面几条结论。

第一，妇女解放离不开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共同作用。在审思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情况时，如果形而上学地将注意力放置到某个具体女性人物的个人命运变化上，即使能够管窥到中共妇女政策的现实影响，但却无法透视妇女群体的命运何以发生了种种历史性的变化的根本原因。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主题，概括起来，就是革命二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而妇女的解放问题，也需要与这两个矛盾的解决过程，即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过程联系起来。

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定时期，民族矛盾是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妇女解放任务所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来自于法西斯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各类"翻身"式的事业，唯有在民族国家摆脱危亡局面的基础上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解决民族矛盾、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是实现妇女解放的现实前提。同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除了民族矛盾外，阶级矛盾同样十分突出，而后者正是妇女不得解放的根本源由。中共的"妇女解放"话语的突出特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导，将"妇女"的概念进行了超越性别化的阶级性阐释。所以中共要使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在推动饱受阶级压迫的广大妇女实现其解放。看待妇女解放问题，必须要考虑革命的大环境的影响。"娜拉主义"的失败说明，倘若不能动摇和瓦解旧的文明形态这一造就女性悲剧命运的基石，任何女性解放都是空谈[2]。妇女解放任务的推进，只是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共同作用结果。

第二，中共对妇女在支援革命过程中的"工具化"动员是实现妇女人格层面的"去工具化"的必由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排斥"工具"的定位。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3]成为这样的"工具"，是为谋求革命胜利而做出的光荣选择。对于妇女而言，作为支援革命的"工具"和作为宗族或家庭的"工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前者是在中共政治动员下的一种具有强烈自主意识，并与自身解放相辅相成的自为选择，后者是在剥削者的强力压迫下的无奈境遇。正是因为这两种"工具"身份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共对妇女的政治动员，尤其是鼓励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以支援革命的动员活动，须有一个正面的历史评价。

既然妇女的解放需要以革命的胜利为前提，那么妇女以各种形式参与到革命当中也就成了寻求自身解放的应然选择。1938 年，邓颖超和孟庆树曾以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代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1 页。
2 赵学勇：《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延安女作家群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7 期，第 162-180，208 页。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73 页。

表的身份向庐山妇女谈话会递交了一份意见书，阐明了中共对抗日战争环境下妇女解放任务的看法：“中国妇女要想求得自身解放和实现新的妇女生活，就必须从积极参加抗战建国的实际斗争中去努力。”[1]事实也正如邓颖超等人所言，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群体通过纺织、种地、养猪等生产活动，为中共的革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这也对中共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崭新的政权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历史地看，这也是中共对妇女在抗战时期做出的伟大贡献的回报。当然，中共对妇女在支援革命过程中的“工具化”动员，并不意味着妇女解放进程在延安时期发生了倒退。纵观中国共产党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历史实践，保护女性的特殊利益与要求始终是延安妇运中的重要一环，中共从未借革命需要而否定女性自身的解放，性别与革命两者相辅相成[2]。

第三，四三决定的出台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于 1943 年开始正式调整妇女解放的政策，是与整风运动的开展紧密相关的。1941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3]在这一年的秋天，蔡畅接替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一职，并领导中央妇委和西北局一起组成了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乡村调查妇女运动实际情况，经过十余次调研，蔡畅写就了多篇关于妇女运动的调查报告，发现了根据地妇女解放工作存在着“妇女主义”、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简单地把开展妇女工作当成一味偏向妇女说话，把建设妇女组织理解成编制“花名册”和召开无用的会议，既不能推进妇女解放和有利于革命胜利，反而会导致妇女解放工作流于形式甚至异化为男女对立的现象。要纠正这些问题，就要“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出台后的第一个“三八节”，蔡畅发表了《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一文，她指出，以前的妇女工作，“还是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工作还不够深入与踏实。”[5]而中共出台四三决定正是为了纠正以往妇女工作出现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作风，以切实发掘妇女工作在促进妇女解放和支援革命方面的重要作用。四三决定立足中国妇女生存环境与民族革命环境的实际，对妇女工作的未来方向提出了多达七条的指导意见，其中的内容涵盖了妇女的生产工作、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要求各根据地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既有利于革命胜利、又能切实推进妇女解放进程的政策。四三决定的出台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在时间上具有较高的同步性，四三决定颁布后中共妇女政策的调整也正是中共整风运动使党内更加重视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体现。

延安时期，中共无论是在自身建设还是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改造方面都做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性探索。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工作是中共重塑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形态

1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 页。
2 崔琦：《延安妇运与性别乌托邦——重读丁玲延安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 年第 5 期，第 50-64 页。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2 页。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27-828 页。
5 全国妇联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0 页。

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保护妇女不受“工具化”的阶级压迫与利用，又通过政治动员和文化教育的手段鼓励和组织着广大劳动妇女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实现了民族革命、阶级革命与妇女解放之间的互动。妇女群体在参加生产运动时，实际上是以社会劳动的形式走向了“解放”活动的自主地位，最终完成了“去工具化”的人格定位。

抗战时期陕甘边区妇女后方参战问题探析

韩兵[1]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2]妇女在家庭劳动和生育抚育中所付出的贡献不言而喻，但又远不止于此。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就妇女地位作出阐述，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3]中国共产党历来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指导，重视妇女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陕甘边区的妇女在中共号召下，以追求自身解放和捍卫民族独立为己任，打破封建束缚，勇敢走出家门，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中，以独特方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一、陕甘边区妇女后方参战的原因

陕甘边区妇女参与抗战是内外因素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边区内部因素看，全面抗战爆发前，边区经济落后，妇女生活艰难；从外部因素看，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掳夺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进攻形成严峻的斗争形势；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动员促使妇女自身参战觉悟不断提高。

（一）受边区本身条件限制，妇女艰难生存。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内地，气候干燥，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全面抗战爆发前，边区“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苛捐杂税达八十余种，放债利息高到每元每月一角五分”[4]，普通百姓生活艰难，“吃没有菜的稀饭，穿褴褛的衣服，甚至冬天穿不上棉衣，一家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睡在一个炕上，全部家具财物有两个毛驴可以载完”[5]。妇女在社会中向来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她们既要为当地落后的经济、文化所压迫，又受浓厚的封建思想束缚，“大多数妇女缠足不识字，一般人民仍是重男轻女”[6]，边区甚至一度存在轻视妇女的旧习气，如“女人不是人，母猪不献神”[7]等荒谬的说法。

（二）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轮番进攻影响，妇女渴求参战。

邓颖超在《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一文中指出：“由于日寇的进击与压迫，使中

---

1 作者简介：韩兵（1997-），女，山东莱州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9 页。

3 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8 日。

4高岗：《抗战四年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解放》第 131、132 期，载《红藏：进步期刊汇总（1915-1949）：解放》第 7 册，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 页。

5《陕甘宁边区实录》，载《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 页。

6邓颖超、孟庆树：《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1938 年 5 月 18 日），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5 页。

7苏华：《获得民主权利的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载《中国妇女》第 1 卷第 7 期。

国妇女更加深切感觉到民族的压迫与蹂躏，大大提高了妇女的民族观念和民族仇恨。”[1]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惨绝人寰的行为令人愤恨，日军到处屠杀、焚烧、抢掠、奸淫，我国大片国土沦丧于敌人之手，人民财产尽数抢走。在陕西省境内，日军飞机在无选择性地进行狂轰滥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统计，从 1937 年 11 月至 1945 年 7 月，日军飞机轰炸和炮击共造成陕西省 16062 人伤亡，居民直接财产损失达 982 亿元[2]。除此之外，日军对待妇女、儿童、老人等毫无还手之力的弱势群体更是肆意妄为，被奸杀的妇女不计其数，尚未出世的婴孩与母体一同丧命的例子不胜枚举。眼看屹立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即将毁于一旦，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陕甘边区的妇女也不想坐以待毙，深知团结一致抗击敌人才是正理。正如林伯渠所言，“只有动员千百万妇女群众才能在全面抗战中驱逐日寇出中国。”[3]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的经济贸易封锁严重影响到边区军民生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一面“有计划的对边区大量输入土布、颜料及部分的日用品，如玻璃、毛巾、袜子之类。同时，用种种方法限制我们的特产与食盐向外推销”[4]，由此导致边区金融秩序混乱，物价高涨，严重干扰党政军人民的生活。因而，作为家庭支柱的妇女群众，迫切希望改善窘迫的生活困境。

（三）中国共产党发挥引导作用，动员边区妇女参战。

由于广大妇女长期处于农村封闭环境中，文化程度低，视野有限，团结意识和妇女工作认识程度不够深刻。对此，中共中央和边区党委反复强调妇女抗战的重要性，并为此制定相应政策，呼吁妇女参与抗战，推动妇女工作有序开展。

1.呼吁妇女参与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党中央和妇女组织即认识到动员妇女群众参与抗战的重要性。1937 年 7 月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面向全国广大妇女同胞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民族生存的最后关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做救护慰劳的工作。”[5]同年 9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布《妇女工作大纲》，其中第一条即明确该纲要“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6]，并对妇女阶级的斗争纲领、工作策略、组织策略、宣传教育和领导问题做出详细规定。1939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在妇女大会上提出：“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

1邓颖超：《对于现阶段妇女运动的意见》（1937 年 12 月 28 日），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 页。

2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0 页。

3林伯渠：《林伯渠同志对妇女工作的题词》，载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1985 年版，第 5 页。

4转引自：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 9 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 页

5《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1937 年 7 月 23 日），载《申报》1937 年 7 月 24 日。

6《妇女工作大纲》（1937 年 9 月），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1]大会激励妇女要具备团体意识，“齐整心意，集合力量，来进行伟大的斗争。”[2]同年 7 月，毛泽东在中华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又强调：“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3]

陕甘边区作为中共抗战的出发点，奔赴在呼吁妇女抗战的最前线。1937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其中指出：“怎样把边区各阶层的广大妇女群众更广泛地团结与组织起来，以便积极参加抗战动员的各方面，加强并扩大抗战的力量，是我们妇女运动当前的紧迫任务。”[4]该《决定》还列举出各界妇女联合会的任务和工作，对妇联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同样，在 1938 年的“妇女节”期间，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呼吁妇女投身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中。大会发布《宣言》号召全国的姊妹们“迅速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支持和拥护我们的政府和军队作持久的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5]这对于提高妇女参战觉悟，发挥了重要的督促作用。

2.推动妇女参与抗战

1937 年 11 月，“为了加强抗日军人家属妇女的文化政治教育”，蔡畅、李富春等人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第一所妇女学校——八路军外籍军人家属妇女学校，对妇女进行知识传授和生产技能（如纺织技术）培训。该校的建立，为女性求学提供了机会和平台，陕甘宁边区妇女的文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受新思想、新理念的熏陶，妇女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也逐渐加强，对抗战工作的自觉性、积极性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除此之外，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从抗战大局出发，很快认识到婚姻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恩格斯曾系统分析了男女之间的地位问题，从而帮助妇女寻求解放，他指出：“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6]因此，要想把妇女吸收到革命队伍中，首先要将妇女从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正视妇女的劳动以及对家庭、战争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从 1939 年起，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思想获得解放，以前从不出家门的妇女走了出来，融入到社会这个大家庭中，积极参与抗战工作。

3.指导妇女参与抗战

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中共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1942 年 3 月 8 日，蔡畅在《如何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团体成为更广泛的群众组织》中对妇女团体的会员成分、组织形式、领导机关问题上都给出修正意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发挥更大成效提供了宝贵指导建议。次年 3 月，蔡畅对抗战以来妇女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观主义、形

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9 页。
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8 页。
3毛泽东：《在中华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载《新中华报》1939 年 7 月 25 日。
4《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1937 年 9 月 13 日），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 页。
5《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1938 年 3 月 8 日），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8 页。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0 页。

式主义、没有群众观点的作风，使许多地区的妇女工作长期不能深入到妇女群众中去。”[1]她重点指出，妇救会组织要成为有广大群众基础的组织，并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了今后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新作风。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对妇女工作的重视程度耳目昭彰，陕甘边区不仅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对妇女工作的指示，并结合本地区妇女工作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指导，及时地纠错改正，动员妇女深入到抗战工作之中，并保障妇女在工作中的合法权益，尊重妇女的工作地位，为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增加了一把催化剂。

二、陕甘宁边区妇女的后方参战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以独特方式前所未有地参与了边区经济、军事等多领域的工作，这正如邓颖超所说，“战时妇女可以做的事很多，虽然她们不能如正规军一样载前线作战，但是有许多方面的参战工作，是妇女可以胜任的。”[2]

（一）边区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经济建设

与男性劳动力相比，妇女同样是一支浩浩荡荡的生产大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在总结妇女生产的重要性时指出：“边区二百万人，妇女占一半就有一百万，除了老的小的不能生产外，大约还有二十五万妇女劳动力，如果把这一劳动力都组织起来……那末，我们边区财富就会更多增加了！在这一点上看，组织全边区的劳动妇女是有很大意义的。”[3]

具体来看，一方面，边区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1938 年 3 月，在边区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边区妇女积极参加春耕运动的号召下，共发动两万多名妇女开荒种地。“1939 年全边区妇女开荒 31562 亩，植树 72135 棵，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达 12 万多人，占当时边区有劳动能力妇女的 50%。”[4]值得一提的是，区妇女合作社和抗属妇女工业合作社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它帮助解决生产的原料供给、成品推销、工具购置等难题；供给妇女儿童日常生活用品；组织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增加财富，完成边区党政的生产任务。此外，边区妇女积极生产粮食，保障前线供给，仅富县妇女在七天内就炒了 310 万斤干粮[5]。

另一方面，以妇女为主体的纺织业逐渐兴起。陕甘宁边区建立前，小纺织手工业受洋布充斥市场的干扰，加之军阀剥削，逐渐走向没落；边区政府建立后，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纺织业逐渐发展起来。1940 年 12 月，边区妇联第二次扩大执委会做出《关于动员边区妇女参加生产的决定》，纺织业逐渐恢复。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后，妇联干部深入农村，有计划地选择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接受技术培训，发动农村妇女纺织小组，互帮互助，开展纺织工作。数据统计显示，1943 年仅有 220 户妇女参加纺纱，到 1944 年，全边区纺妇数量猛增至 15 万余人，织妇达 6 万余人[6]。妇女通过纺织生产，为边区群众和前线战士提供

1蔡畅：《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1943 年 3 月 8 日），载《解放日报》1943 年 3 月 8 日。
2邓颖超、孟庆树：《我们对于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1938 年 5 月 18 日），载《新华日报》1938 年 6 月 7 日。
3高岗：《从生产战线上开展妇女运动》，载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编：《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续集）》，1985 年版，第 348 页。
4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5 页。
5参见：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1 页。
6参见：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4 页。

了穿衣保障，并用剩余的纺织品换取生活必需品，为抗战减轻民生负担，助推妇女自身生产地位的提高。

（二）边区广大妇女勇于担负军事任务

边区妇女在进行生产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承担军事任务，以切实行动支援前线军队。

1.警戒勤务，保卫边区。

抗战期间，大量妇女担任边区自卫军，“1938 年，边区女自卫军人数达 10212 人，其中延安一县有 1050 人。参加者多是年龄在 18 至 30 岁的放足、大足妇女”[1]。她们白天盘查放哨，晚上轮流查户口。当军队大批开往前线以后，女自卫军就成了保卫边区的主力，担负保卫群众、维持地治安的重任。例如，1938 年春，日军进攻神府一带河防，神府男女自卫军配合参战部队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侦察队和保安部队，抵御日军进攻。

2.医疗救护，掩护伤员。

医疗救护是边区妇女的日常工作之一。各乡各村都成立看护队，负责救护工作，每当八路军路过她们的村落，妇女就会主动将伤员送往军医院。除此之外，在 1939 年到 1943 年间，边区频频面临国民党的进攻，妇女们奋不顾身，尽全力掩护伤病员，她们通常将伤员藏在山洞等隐秘区域，倘若被敌人发现，就将其称作是自己的亲人，设置有人为了掩护八路军，甘愿牺牲自己。新正三区的王生财家寄养了三名伤员，他的母亲每天端茶送饭，还给重伤员端屎倒尿[2]；神木县的王补梅大娘，把两个儿子送上前线，她为住在家里的伤病员喂水喂饭，无微不至，在 1943 年劳模大会上获得了“军队人民的好母亲”的锦旗[3]。

3.宣传抗日，动员参军。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同样也不例外。陕甘边区的广大妇女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深入街头巷尾，宣传抗日主张。首先，她们召集和利用各种形式的宣传大会，例如在每年的“三·八”纪念大会上动员群众加入抗日队伍，团结一切力量支援抗日军队。其次，她们创办刊物，如《中国妇女》《妇女工作通讯》《西北妇女》等，这些刊物主要反映边区妇女状况和妇女运动的开展情况，受到广大妇女欢迎。最后，边区妇女为了抗日军队能够有充足的兵源，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掀起了母送子的参军热潮，许多地方的扩兵数字甚至大大超过原定计划。根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共计动员 3 万名青年开赴前线[4]，这与广大妇女热心响应政府号召，以模范行动“拥军”是密不可分的。

（三）边区广大妇女踊跃供应生活物资

1.纳鞋缝衣，保障后勤

为前线战士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也是妇女参与军事工作的任务之一。在这其中，妇女群体在做军鞋军衣方面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她们做的又多又快、而且缝制品质量高，受到干

1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7 页。
2参见：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9 页。
3参见：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8-289 页。
4参见：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0 页。

部战士的一致欢迎。1937 年至 1938 年，边区妇女为军队制作手套袜子 8 万双、鞋 2 万双[1]。1941 年佳县四区界牌乡 120 名妇女赶制军棉衣 1 万多套，保证驻军及时换装。1943 年冬，佳县城关区第三乡的 200 多名妇女聚在一起制棉衣，只用了五天时间完成了七天的任务[2]。但是只保证数量是远远不够的，一些地区为了让军鞋质量有保障，规定在收鞋时，让群众来对军鞋质量作出评价，再进行验收。同时，妇女成立专门的慰劳队，为军队举行文艺演出。安塞县真飞洞的群众把评鞋活动中的先进事迹编成《做军鞋》小剧，到各地宣传慰问[3]。妇女群众还给伤病员送去鸡鸭、蔬菜水果等慰问品， 这既给予驻扎在边区的军队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又有效地密切了军民关系。

2.保育孩童，抚育后代

据 1938 年 7 月的调查，陕甘宁边区的孩童主要来自于“抗日将士及其家属，以及为抗日救国而从各地走来的工作干部”，他们的父母因忙于抗战事业而“得不到良好的照顾和抚育，过着营养不良，缺乏教育的生活”。[4]因此，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儿童保育工作，将其看作是“整个抗战建国工作的一环，是全国人民的责任”[5]。边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抗日战士子女、战区难童及烈士遗孤。除了生活、食物上对难童有固定的保障，还制定了教育内容和方法，对不同年龄段的难童，采取不同的启发教育，为适应抗战的需要，教育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及儿童身心之发育，启发儿童的爱国思想。边区妇女照顾难童的日常起居，为他们缝制衣服、制作饭食，使得大部分难童都被收容并被教养成人，成为革命的后备力量。

三、陕甘边区妇女后方参战的启示

陕甘边区妇女参战具有重要作用，它既是妇女追求自身解放的行动，更是使其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组成力量。

（一）心藏爱国情怀 坚持党的领导

抗战时期妇女能够做出巨大贡献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在呼吁妇女团结参战时就提到：“女大同学，将来到各地方去，就要照延安这样办，照共产党中央的好办法去办。这样办他十年八年，那时候，全中国人民都能得到解放。”[6]。由此可见，边区妇女之所以能够参与到为争取自身解放和全国解放的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密不可分的。

时至今日，我国虽没有战火硝烟，人民不必再在枪林弹雨中谋生存，但是爱国主义仍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始终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

1参见：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9 页。
2参见：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9 页。
3参见：陕西省妇联志办编：《陕西省志·妇女志》第 62 卷（3），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9 页。
4参见：《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经过及其最近工作报告》（1938 年 7 月 22 日），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1 页。
5《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载《新中华报》1938 年 10 月 5 日。
6《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1 页。

（二）密切军民关系，巩固统一战线

军民关系是一切关系的核心所指。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妇女以实际行动热情参与其中，真正帮助部队解决问题。 “全延安市妇女的热情，已象火一样的燃烧着，她们正在以最积极的行动，来回答妇联的号召，把这一工作当作正确抗战胜利的重要工作之一。”[1]驻扎在边区的战士也十分亲切，中央领导亲自给百姓百年、召开军民联欢晚会、慰问抗日军属，形成了军民一心的强大力量。如今，仍有不畏艰险的解放军守护在我国边疆，军民关系亲如一家。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水电不通，大雪封山后，经常高度缺水。经过勘测，军民齐心协力指定打井计划，成功克服高原高寒地区水源难找，水量不稳等问题。

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弥补了中国抗日的困难与不足，从而取得了抗日胜利。当今社会，在全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中，我党始终将各民族一视同仁，各个民族都以主人翁的身份置身于国家建设之中。毛泽东有言：“心一齐，山可移。”[2]对于当代克服贫富差距、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艰巨任务，我国各族人民都应该统一战线，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三）解放妇女思想，参与乡村建设

恩格斯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3]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让大部分妇女参与到生产劳动中，从而使边区妇女迈出了思想解放的第一步。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将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婚姻自由和自主，人格得到了尊重和保障。边区妇女从此开始跳出家庭的禁锢，走入社会，参与政治，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不仅挑起了后方保障的大梁，还深入前线，担任力所能及的军事工作。在党的指导和教育下，大部分妇女在妇女运动和工作中得到启发，思想获得解放，真正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现如今，社会上尤其是在农村，仍有部分女性思想闭塞，在政治参与、精神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保持消极态度，止步不前，这不利于建立文明和谐的乡村风貌，也不利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执行。要通过学习宣传抗日战争时期妇女积极参战的事迹等方式，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传承巾帼不让须眉的红色精神，引导妇女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的阵营中来。

（四）重视妇女作用 发挥巾帼力量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更加积极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4]今天，国家的建设工作更为繁重复杂，我们的目标更加远大，这就愈加需要广大妇女的指挥和力量。马克思指出：“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作成立妇女支部”[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组织是维护妇女权益的依靠。在新形势下，要广泛地把妇女凝聚起来，就要善于利用妇联组织，使其在广大妇女中产生强大的感召力。正如毛

1《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号召写万封信慰问前线将士》，载《新中华报》1938 年 8 月 30 日。
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7 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0 页。
4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8 日。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65 页。

泽东诗云：“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1]

参考文献：

[1]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陕西省志第六十二卷（三）：妇女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 9 编 人民生活.[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4]王寅城. 陕甘宁边区.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09.

[5]李蕴慧.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视域下延安时期妇女动员研究[D].西安石油大学,2020.

韩兵

职务：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联系电话：18340090621

邮箱：1484195873@qq.com

1《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妇女>的题词》，载《中国妇女》1939 年 6 月 1 日。

中共南方局对职业妇女的革命话语建构：以《职业妇女》为中心

蒋欢[1]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职业妇女是指不依赖他人的供养，走出家庭、走进社会，通过自主劳动来取得经济上独立的女性，在抗战时期，大量男性上前线战斗，为妇女们创造了更多的就业空间，妇女在战争期间就业数量增加，就业规模扩大，就业领域拓宽。[2]与在深闺中的妇女们比较，职业妇女走出了家门与外部的经济、社会、政治发生了密切联系，开阔了眼界，逐渐觉醒了人格，在支援抗战中担起了与男性一样的保家卫国责任，是民族解放也是妇女解放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中共南方局成立了妇女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方局妇委），该会负责对广大妇女进行统战、动员、宣传，于是南方局妇委创办报刊，为妇女发声，争取男女平等、妇女职业福利、妇女政治权利等，为在抗战大后方树立中共尊重、重视、培养妇女的正面政党形象铺设媒体渠道。《职业妇女》作为渠道之一，1944 年 11 月至 1946 年 6 月由南方局妇委出版，由杜君慧、国瑜负责，是针对职业妇女群体发行的月刊，共两卷十一期，从内容上看，《职业妇女》关注妇女们的职业生活与困境，为职业妇女呼吁各项权益，介绍先进模范事例开阔职业妇女眼界，宣传民族解放、妇女解放思想，它反对歧视和排斥职业妇女的落后势力、思想、行为，是中共南方局为职业妇女打造的一片文化园地。[3] 学界目前对中共南方局的妇女工作研究较少，专门针对职业妇女群体的研究还有待扩展。[4]通过对该刊的研究，可考察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对职业妇女群体的革命话语建构，职业妇女社会主义奋斗前景以及转向农村工作的具体解放道路，有助于丰富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研究。

一、披露职业妇女的困境

中共南方局关心职业妇女群体的生活、工作情况，在《职业妇女》中对妇女进入职业领域所面临的社会刻板印象，战争下生活的艰苦，新旧女性角色冲突，有限的升职空间，职场性别歧视，机关单位腐败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披露与讨论；还做了大量的女职员、女工的职业经历采访，接收读者的来信并解答职业问题，对职业妇女们的困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报道。

---

1 蒋欢（1995—），女，重庆合川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2 徐明涛:《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职业妇女的职业状况考察》,《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5-16 页。

3 《创刊的话》,《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2 页。

4 相关研究参见户可英《南方局时期邓颖超妇女工作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 年第 5 期；夏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共党史研究》2009 第 8 期；林庭芳《中共南方局妇委与国统区妇女抗日支前运动》,《理论与改革》1995 年第 9 期；罗瑞芳《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档案与建设》2003 年第 6 期。

（一）被凝视的“性客体”[1]

在传统封建社会，公共领域由男性占据并排斥妇女的进入，妇女被禁锢在家庭私人领域，少数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也只是在社会边缘游走，对于封建社会的男性来讲，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外表容易吸引男性凝视，其他特质退居其次，这种凝视也延续在了妇女的职场角色中。女招待、女店员等被看作招揽生意的“活招牌”，机关女职员就算受过教育，具备一定的知识技术也难以逃过被人品评、凝视的 “花瓶”角色，“机关的主管人也要看她年轻不年轻，漂亮不漂亮，有做花瓶的资格没有…做一些轻薄的品尝的对象…要经常把一些猥琐的混账话当作没有听见或者不懂”[2]。单一地将容貌、年龄、外表作为妇女职场价值评价标准，对不具备这些优势的妇女造成人格歧视，“即使也侥幸找得到职业吧，你是去听听那些高贵的同事们怎样提起你呢：‘那老将黄忠！’……或者嗤之以鼻，或者吐一口口水，或者望望然而去之；好像她是很可耻的人”[3]。“花瓶”们仅仅通过打扮、应酬、交际这些较容易的方式就能获得报酬，而且有的是“主管人在‘情而难却’之下于以安排的，任用的原因既如此，自然在督导方面也就不肯过严”[4]，没有在竞争中、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工作能力不能提升，就不能获得男性同事的尊重、上司的器重，在安排工作任务时也会往“花瓶”功能上靠近，如此恶性循环，男性对职业妇女难免产生“花瓶”的刻板印象。一位女记者被报社欠薪几月，老板以薪资作为要挟，要求她去银行管理层中交际，帮助报社取得银行贷款[5]。除此之外，这位女记者进入男性职员为主的机关单位做采访时，投来了诧异与不解的目光，还遭到言语上的贬低与骚扰，“上面坐着两个工友，其中一个嬉皮笑脸地对另一个说：‘你去告诉××先生，他的女朋友来了。’”[6]

社会地位较高的智识职业妇女境遇尚且如此，没有受过教育，缺少一技之长的底层职业妇女，被凝视的处境使得她们更为无助。为工人洗衣缝补为生的洗衣妇，每天十多个小时的体力工作，每月低声下气上门去向工人收取洗衣费用，常被克扣工资，遭到骚扰、谩骂，备受欺辱，人身安全难以保证。“中下级的职员们常常晚间不讲礼地问到我的家里来。…他吊儿郎当地打着下流腔，一屁股坐到我的床上去。…这期间，只要你脸上略有笑纹，那无关的举动大概就会发生的，多难对付的局面啊！…恼羞成怒地走的时候，背里便会骂出：‘个婊子装什么干净！’”[7]职业妇女只身在外，被男性窥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在工厂男女纠纷事件中“被杀总是女的而不是男的”[8]，底层职业妇女设法寻求男性庇护，并获取物质的保障。这看似能避免外部的窥觑，但并没有改变凝视客体的被动地位，对于她们而言，婚姻稍一不慎就是一场绝望的赌博，所带来的厄运无力反抗。一位丈夫在前线牺牲的女工，为了养

1 西蒙娜 · 德 · 波伏瓦著，郑克鲁译：《第二性》（合卷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年 1 月，第 702-736 页。
2 绀弩：《关于职业妇女——一个笔记的摘录》，《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21 页。
3 绀弩：《关于职业妇女——一个笔记的摘录》，《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21 页。
4 筠：《妇女职业问题》，《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3 页。
5 冰：《记者生活的开始》，《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出版，第 33-34 页。
6 冰：《记者生活的开始》，《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出版，第 34 页。
7 凤：《这是什么职业》，《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五期，1945 年 6 月 20 日，第 21 页。
8 瑾：《一封信》，《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13 页。

活家里的老小，无条件地答应了与另一个男工同居，在怀孕后惨遭遗弃，男工推卸责任又害怕闹出事端，便诬陷其偷窃工厂财物，致使她被工厂开除失去了经济来源。[1]一些涉世未深的女工在城市里经不起物质诱惑，抛弃了自尊心和羞耻心，“穿起漂亮的衣服，涂起脂粉，一天天的堕落了”[2]。职业妇女身体受到男性目光的辖制，承受着被贬低为供人凝视、挑选的风险，稍一不慎误入歧途便失去了自由、大胆追求事业成就的机会，更失去了追求经济独立，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他人尊重的机会。

（二）薪金微薄，生活难以为继

在待遇上，男女薪资不平等，“在同一工厂或机关里，做同一劳动的男女工人或职员，其报酬或待遇有着显著的差别，就是男子总比女子优厚得多。”[3]职业妇女所得薪资只能维持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女职员来说，薪资所能支撑起的生活十分拮据，她们“经常地为几两平价油，几尺平数布而东奔西跑”[4]。随着战时通货膨胀愈发严重，薪金贬值，购买力下降，生活常常入不敷出，四处借债。一位邮局女职员“一个月，只能拿到六千几百元。…每个人就得付出至少三千元的伙食费，三百元的房租费。这是最起码的费用，另外，还有甚么灯油呀，日用品呀……若把这些都除开，所余的就已经无几了。…可教她们怎么生活呢！今天，绝大多数的姐妹，都是一月不敷一月的，在贫困和借债中度着日子！”[5]在不提供住宿的单位，租房也是一大难题，难民大量涌入大后方，城市遭到敌机轰炸，建筑损毁，房屋需求大于供给，“在重庆找房子，比找金子还要困难，她们费尽心力，才住到一间仅能安身的破屋里，却还要随时受到房东、二房东们的故意刁难，和摧残。”[6]社会底层的女工也面临着类似情况，她们其中有不少是抗属，丈夫出征或牺牲后，全家人的生活负担就落在了她们的肩上，本就微薄的工资常被厂方克扣，生活愈加困难，就算是包吃住的女工，生活开支也受到厂方严格控制与剥削，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我们吃的伙食，是坏极了，每天每人只有廿元的菜费，一碗菜蔬六个人共吃，见不到一点油，更不会有吃肉的希望，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瘦弱，生命只有一天天的缩短”[7]，再加上女工岗位技术含量低，涨薪困难，只好领着微薄的工资，被分配到“厂中最下层的工作”[8]。

贫苦的生活限制了眼界，将职业女性的生活局限在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上面，“她们都不大关心国事，谈起来，也总是穿吃、物价、或同事间的故事”[9]，在衣食住基本生存需求都难满足的情况下，精神享受、人生乐趣也就无从谈起，导致精神空虚。

---

1 瑾：《一封信》，《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13 页。
2 一方：《轻工业中的一支劲旅——大后方的纺织女工》，《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30-31 页。
3 卢兰：《论职业妇女》（一），《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13 页。
4 青苗：《从职业妇女谈到公务员》，《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10 页。
5 蓝明：《邮局里的姐妹们》，《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32 页。
6 蓝明：《邮局里的姐妹们》，《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32-33 页。
7 翁道源：《在工厂中》，《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20 页。
8 翁道源：《在工厂中》，《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20 页。
9 蓝明：《邮局里的姐妹们》，《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33 页

（三）工作劳累，损害身心健康

职业妇女们工作时间长，黑白颠倒，工作量大，氛围忙碌紧张，休息少。邮局女职员“每天八小时，在事务部门里，像总务股，会计股…从早上八点钟上班（中间两个小时休息），要到下午六点钟才下班。整天埋头在办公桌上，忙碌于公文和数字里。…在邮件部门里，更还有夜里，像快信组挂号组…姐妹们从晚上六点钟上班，…紧张的工作，一直要到深夜一、两点钟才带着满头尘埃，拖着一个疲惫的身子回去。就连该睡眠的时间，也给工作侵占了。白班的见不到太阳，晚班的见不到月亮；她们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每两礼拜才有一天休息的日子”[1]。受战事影响，军用品工厂的女工不论多么疲惫、憔悴，“每人每天要做一个半工，从早晨七点做到夜间十一点，两个夜工当一个日工。女工们拼命的干，弄得连饭都来不及吃。夜里回来就用开水泡冷饭下肚”[2]。

工作的繁忙让职业妇女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了重复、机械、繁杂的工作事务中，人被束缚在了狭小的工作场所中，工作的疲惫让她们没有余力去探索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生活失去活力，“一天天地麻木化和机械化，失却了一切的人生乐趣!”[3]学习进步机会少，工作单调苦闷，导致工作意志动摇，“就像一条蚕，把自己的丝吐了出去，而没有学习和获取新的生的知识的机会，慢慢的你自己会变得空虚，退步了”[4]。

过度的工作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损害职业妇女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工厂女工。她们支援抗战，加班加点地进行生产，为民族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身体却备受折磨，带来精神、情感的损害。她们有着“一张无血的脸儿；嵌在上面的是一双呆滞无光的眼睛…没有出自心底的豁朗的欢笑，只有深深的埋藏在心坎里的幽怨”[5]。充满灰尘的工作环境、过度劳动、作息时间不规律等原因造成女工们营养不良、疾病缠身，由于无钱治病，一些疾病发生后只能拖延直至死亡，“尤其是肺病，造成的女工中相当大的死亡率。一个面颊红红的女孩，进厂不几月，就会变成苍白，在她们之中，能够不得肺病，也就算得天独厚了！…由于站的时间过久，脚上生疮也成了最普通的病。所以能在一月之内不休一次工的人真是少有，这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支持不下来的！…她们悄悄地工作，工作，工作，在工作中断送了性命。”[6]《职业妇女》详细报道了女工们的悲惨遭遇。因湘桂战争，林仲英一家从桂林逃难，途中父母坠下火车而死，只剩她与哥哥相依为命，千辛万苦逃到重庆，年幼的林仲英为谋生进入工厂，“半年的工厂生活…每天站立在潮湿的车间里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她的腿和脚都肿起来了，脸上也睁得两个眼睛只有着一条缝，为了那十块钱一天的工资，她只得继续工作”[7]，病情加重后，厂方也不准请假，以致病情拖延，最终支持不住病倒了。她的哥哥也无可奈何，

1 蓝明：《邮局里的姐妹们》，《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32 页。
2 启明：《她们也在流血》，《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15 页。
3 卢兰：《论职业妇女》（一），《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10 页。
4 一平：《怎样做劳动妇女教育工作》，《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9 页。
5 一方：《轻工业中的一支劲旅——大后方的纺织女工》，《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30 页。
6 一方：《轻工业中的一支劲旅——大后方的纺织女工》，《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31 页。
7 瑾：《一封信》，《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12 页。

穷困潦倒让他们吃住都成问题，就医费用高昂更是无法负担，只能吃着厂里毫不见效的药以做心理安慰，眼睁睁看着病情拖延下去。就算受人资助有钱治病，当时的医疗水平与条件也难治愈致死率较高、女工们易得的肺病。女工朱珍患了肺病，由于肺病具有传染性，大部分医院不接收，工友几经周转找到了关照穷人并且可接收肺病患者的医院，但是送去后发现医院环境阴暗潮湿，臭气外溢，医疗水平无保障，护士们讨厌病重的人，故意减少食物和照料，让他们早点死去，将床位让给别人。朱珍被送到隔离病房，工友们探视困难，几天后去世，尸体被装在窄小的米袋里，放在门口等待认领，工友们打开布袋看到她“一身剥的精光”，毫无尊严，最后只得匆匆买来汗褂来给她穿上，草草抬去埋了。[1]不仅医院对待将死的女工缺少临终关怀，工厂方面对去世女工身后事的处理也没有给到死者应有的尊严，从万县来重庆做工的王爱珍，工作不满三年便得肺病死去，厂方没有通知家人便草草将她埋葬，“像埋掉一条没有主人的狗一样”[2]。

这些女工大多来自农村，因为逃难、家庭婚姻问题、生活贫困或其他不幸，背井离乡到工厂工作，本就成长在困苦中，加之工厂的压榨、生活的贫困、工友的去世，周围的这些悲惨遭遇使她们变得更加情感空虚、麻木不仁，“会为一点小事大吵大闹，来发泄她们内心的乡愁！对人往往是冷漠无情的，因为她们所遭到无情的遭遇太多了”[3]。工友病逝时，她们清楚类似的病症、相同的命运也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并无力反抗，不禁感叹到：“我们只是半个活人啦”[4]，躺在病床上的女工呻吟到：“病好一定不再回工厂，我情愿讨饭过生活！”[5]可是兵荒马乱、经济紧张的战争环境，对于没有知识文化、社会底层、经济困难的弱势妇女来说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四）两头为难，育儿与工作相矛盾

社会传统将家务劳动自动划分给女性，丈夫在家务中缺席，职业妇女在外是经济独立的新女性，但是回到家中还得继续扮演贤妻良母，进步与传统两种角色交错与拉扯，让职业妇女两头为难，负担沉重。 “母亲在办公室里还要刻刻惦着家里的孩子，下了班回家还要喂奶，替孩子撒尿擦鼻涕，当做丈夫的安然入睡之后，做母亲的还要为孩子缝衣补袜，常常直到更深人静才能睡觉，谁说一个家庭中职业的妻子的负担比丈夫轻些呢？”[6]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迫，压缩职业妇女的个人可支配时间、能力发展空间，将眼界限制在了工作赚钱和维持小家庭运转之中。“她们一面做着新中国的繁殖者，一面还做着家务的奴隶。…这结果，使一些职业妇女，终日在办公室和家庭两个小世界里忙得团团转，连气也透不过来，她们无暇过问国家大事，更无法顾及自身的进修和生活的改善。”[7]

1 启明：《她们也在流血》，《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15-18 页。
2 瑾：《一封信》，《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13 页。
3 一方：《轻工业中的一支劲旅——大后方的纺织女工》，《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30-31 页。
4 瑾：《一封信》，《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13 页。
5 许蓝：《纱妹》，《职业妇女》第一卷第六期，1945 年 10 月 31 日，第 40 页。
6 青苗：《从职业妇女谈到公务员》，《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10 页。
7 青苗：《从职业妇女谈到公务员》，《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7 页。

在男性占据单位话语权的情况下，妇女生育福利问题被忽视。由于缺少托儿所，缺乏对母性的保护，育儿分散了职业妇女大量精力。“邮局微薄的待遇，使职员们无力雇乳娘带小孩，但又不能将职务抛去；于是，就只好局里家里两头忙，每天，总是跑上好几趟”[1]。家务事的繁忙无可奈何地影响到职业妇女的工作表现时，“一切的责难便多集中在他们身上了”[2]，明文规定的妇女产假在实际操作中变相，休产假变成了被裁员的隐性原因。张兰馨怀孕后依然勤奋努力工作，工作成绩获得长官嘉奖，两个月产假结束回归工作岗位第四天，长官变卦，以工作不力为名将她撤职。[3] 家庭事务方面的困难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仅靠少部分有觉悟的职业妇女坚强支援着抗战事业，无法真正将广大职业妇女动员组织起来支持抗战。

（五）地位低微，职场边缘人

职业妇女在职场中因性别原因得不到认可与信任，工作机会少，她们的能力“没有得到社会的坦诚的公认，许多机关还是对妇女紧闭着大门”[4]，一些单位“暗中规定不再任用女职员”[5]，遇到经营不善需要裁减人员，女职员比男职员更容易失业，就业无保障。“如果某一个机关要裁员，那末第一批被裁去的就是没有显赫来历的女职员，女职员有因为生产告假而被辞退的，也有因为不会趋奉长官而被开除的，人常常用巧妙的名目阴险的手段把女职员一个个的裁掉了”[6]，中国茶叶公司重庆总部改组裁员，推广和运输两部门合计，共裁去职员二百余人，其中女职员有六七十人，该公司推广、运输两部原有人数约四百余，其中女职员不及百人，也就是说，女职员被裁的有三分之二，而男职员被裁的却不及二分之一，在这些被裁的女职员中，大半都有能力工作，更有在该公司服务六七年以上，历经加薪晋级。[7]妇女被辞退的原因模糊，流程不清，向上级反映无门。刘志宏初入职场，除了本职工作外，科长还将炒菜做饭的杂活安排给她，可是每次做好了饭后，饭菜都被同事领导们抢光，只能吃同事剩下的残羹剩饭，因为初来乍到只好忍气吞声，为了避开这项非本职工作，重新安排食堂吃饭席次时，她参加了另一个席次，三天后以“行为不检”为名被科长辞退，问及具体原因时，科长回答含糊不清，向上级反映困难重重，无果而终。[8]女性心软与忍让的习惯使职业妇女在裁员后也不敢为自身权益抗争，顾莉华为了在工厂重新开工后能被再次聘用，在被裁员后不敢要回工厂所欠薪金，不敢申怨，不敢向上级机关控告，苦苦等候工厂复工通知，生活逐步陷入贫困。[9]还有以工厂工人内部调动为借口，但接收部门又不接收调动人员，部门内互相推卸责任，使得工人两头为难，耽搁了工时，最后以工作成绩不好开除女工。[10]就算是在抗战胜利后，职业妇女被裁员的情况并未在胜利欢呼中好转，一位在重庆县城商业银

1 向静：《女职员在邮局》，《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五期，1946 年 6 月。第 14 页。
2 筠：《妇女职业问题》，《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3 页。
3 青苗：《从职业妇女谈到公务员》，《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9 页。
4 青苗：《从职业妇女谈到公务员》，《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9 页。
5 筠：《妇女职业问题》，《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3 页。
6 强华：《失业的一群》，《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41 页。
7 珠：《裁减女职员的新纪录》，《妇女之路》第 80 期，《新华日报》，1944 年 4 月 23 日。
8 强华：《失业的一群》，《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41-42 页。
9 强华：《失业的一群》，《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43 页。
10 一敬：《调动》，《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五期，1946 年 6 月，第 15 页。

行中工作了四年的女职员向《职业妇女》写信道，抗战胜利后，银行经营不善，内部改组，女职员们首先被裁，无端失业，裁员不是以工作成绩、能力为标准，而是性别，失业后经朋友介绍去国家银行工作，结果也同样以身为女性的原因而被拒用了。[1]

职业妇女在工作中多担任技术含量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妇女当医生、教师、律师、官吏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挑战了原有的社会规则，遭到男性反对，“不是说有伤风纪，无此前例，便是说妇女根性低劣，不能胜任此种高等职业”[2]。所从事职业范围的有限，职业妇女在实践中得不到锻炼、提升、成长，“机关负责人不信任女职员的能力，怀疑他们对于职务的专诚，不肯将较重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肩上，于是大多数女职员永远在较低职位的，事务的工作里打转”[3]，所以妇女局限在会计、抄写、出纳等替代性强、升职空间小，前景黯淡的工作种类中，“稍有才干或工作认真的，就要受到无情的鄙视与排挤，在处处“官腔”之下，人事比工作是百倍的难处。”[4]在银行工作十年的女职员也感叹道，“女人永远是受人轻视，不会允许有握权的机会的”[5]。在风气较为开放的教育界，女教师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高年级班次不给女先生教，教学能力强也得不到他人的信任，年轻女教师的私生活受人随意品评，对教学能力的关注反居于次要地位，如果是拖儿带女住在校内，就会被怀疑偷懒。[6]由于妇女从事着社会中大量无价值劳动，妇女形成了牺牲、奉献、忍耐的习惯，对不公平的工作分配也默默承受，汪铃初入职场，校长将其他老师不愿担任的课程推给她，对于不公平的工作任务分配，她虽觉不妥但还是接手下来，并安慰自己道，“我是新来的，应该忍耐些，所以把这功课接收过来了，为了下一代，愿意多牺牲些自己”[7]。

妇女走进社会从事职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早已形成的男性集体利益的挑战，遭到男性利益团体的排斥与压制。女会计师阮蘅工作三年，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坚守会计准则与会计工作人员的节操，她公正履行职权时威胁到机关长官们的私利，长官们发动其他同事对她内外施压，她不愿屈服，默默忍耐，恶势力激起了她的斗志，决定“要尝试尝试面向黑暗得来的所谓‘苦头’，…不过饿饿肚皮，而因这理由就让肚皮饿饿也是痛快的”[8]。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坚定意志去抵挡腐败的侵蚀，虽然妇女们刚进入工作的单纯、理想化、责任感，使其无法成为贪腐利益团体的一员，不愿接受男性之间对于利益与权力的运作方式，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打击后，职业妇女在工作中往往势单力薄，反抗无效。一位负责记账的女公务员发现单位主任利用职务之便偷卖公家棉花中饱私囊，便联名几位同事向上级递交告发书，不幸的是告发书最后落入“人脉宽广”的主任手里，去告发的所有人被其他同事领导针对，从此以后，该女公务员对于贪腐行为视而不见、默不作声，渐渐地也被拉进了贪腐利益团体中帮忙记假账，等清醒过来时，急忙辞退工作逃离贪腐成风的环境，但是贪腐行为慢

1 陈维芬：《信箱 我无端地失业了》，《职业妇女》第二卷第四期，1946 年 5 月，第 26 页。
2 卢兰：《论职业妇女》（一），《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13 页。
3 筠：《妇女职业问题》，《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3 页。
4 青苗：《从职业妇女谈到公务员》，《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9-10 页。
5 也丹：《茫茫的夜》，《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五期，1946 年 6 月，第 16 页。
6 嶺梅：《粉笔生活者的乐和苦》，《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二三期，1946 年 4 月，第 21 页。
7 汪铃：《我的教书生活》，《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五期，1945 年 6 月 20 日，第 31 页。
8 阮蘅：《一个会计师》，《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39 页。

慢侵蚀了她的思想，她过惯了物质生活的舒适，养成了敷衍工作的习惯，在之后的工作中，变得做事不认真，失去了为工作可以牺牲一切的宝贵精神。[1] 妇女做领导公正行使职权也会遭到男下属们的群起反对。戚铮音作为一家医院的总务主任，负责分配医院合作社的物资给社员们，她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保障全体人员的福利，试着革除种种积弊，这样一来，男医师们以前要多少就拿多少的特权被打破，便合起伙来想法设法欺辱她，甚至借口不多发蜡烛给他们去打牌，五六个医师各拿了手仗，在夜里雄赳赳地冲进她房里，打桌敲凳，向她问罪。[2]

通常的观点认为，工作让妇女获得了独立经济来源，而经济独立又是妇女解放的重要一环，然而在《职业妇女》中所披露的种种悲惨现实表明，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与不民主的政治环境下，职业妇女们深受资本主义剥削压榨，被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歧视，生活困苦劳累，权益无保障。对于大部分底层职业妇女来讲，与其说是主动积极走进社会，不如说是在战争年代为了养家糊口、生存下去，被逼无奈出卖劳动力，职业妇女受到的压迫大于解放。她们渴望着生活的改善、不受无理裁撤，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些愿望的实现，离不开和平的环境、政治的民主、社会风气的开放，职业妇女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

二、塑造革命的职业妇女

在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职业妇女大多无心关注民族国家命运，仅靠少部分先觉醒的职业妇女作散兵战又无法改变社会现状，必须让更多的妇女觉醒并团结起来，争取权益，参与政治，因此，在《职业妇女》中，中共南方局尝试将职业妇女塑造为革命妇女的“主力军和先锋队”[3]。

（一）职业妇女群体的社会主义奋斗前景

在常年的战争环境中，职业妇女们往往流离失所、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低廉地出卖劳动力，艰难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职业妇女》对她们的苦难原因进行了社会政治方面的解读。从职业妇女的产生来看，职业妇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封建家族经济破产，资本家需要廉价的妇女劳动，妇女人格自觉等原因促使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外出工作，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发展，使民众生活社会化，妇女所担负的家庭任务可转移至其他社会设施中；战争的频繁爆发，男子上前线，妇女接替男子在后方的工作岗位；再加上妇女的知识技能及文化水准提高，妇女人格自觉深化，在工作中与男子相比并不逊色。然而，职业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也意味着劳动力被剥削用作资本家利润的增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男性手中，妇女没有参加社会上有价值的生产劳动，地位低微，成为了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既然资产阶级的剥削是职业妇女的苦难来源之一，那么，职业妇女就有着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就要反对男权为中心的私有财

1 啸：《三年公务员生活的回忆》，《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34-40 页。
2 戚铮音：《工作在恩施》，《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出版，第 29-30 页。
3 《创刊的话》，《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1 页。

产制度，争取有价值生产劳动的权利。[1]

男权为中心的私有财产制度使妇女在经济上分配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职业妇女》借助 “胞兄惨杀胞妹”案件进行了讨论。家住四川梁山聚奎乡观音寨的孙楚珩，其妹孙玉章在重庆求精中学高中毕业后返家，发现孙楚珩日嗜吗啡、堕落不堪，遂提出分家，孙楚珩为了独吞家产，用手枪、毒酒、吗啡将孙玉章杀害。[2]《职业妇女》分析道，在财产的分配上，男性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少数职业妇女虽然有了独立收入与生活保障，但整个妇女地位的卑微地位仍带来烦恼，个别的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整个妇女界的男女平等，她们在物质上得到满足，可在精神上还是受制于男性，比如在家中听从男子意见，受男子指挥，社交生活受丈夫的社交范围所限定。为此，职业妇女们不应计较个人得失，局限在个人舒适区域，应该团结起来，为广大妇女争取工作权、政治权、救济权等等权利，改变男性统治、欺压女性的社会制度与大环境。[3]

改变大环境就要从政治上着手，首要的是要建立普遍的民主政治，清算旧政治制度，取缔过于张扬统治者个人权威的独裁政治，确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们看似获得了一些政治权利，但所争得的权利只是皮毛的、表面的、形式的，没有改变被剥削的处境，资本主义式民主制度无法彻底解放妇女。真正的解放要在生产工具不为私人把持，不为私人谋利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权普遍确立，每个人都是社会一份子，不存在剥削关系，每个人的生存权利与工作义务都是神圣的，有了这样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妇女在政治上的地位才有保障。因此职业妇女参与政治应与民主运动配合在一起，同时动员男性也参与到妇女解放中来，以达到全面的成功。[4]

在中共南方局的话语逻辑中，职业妇女群体被塑造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追求男女平等、为广大妇女争取权利的进步革命势力，并勾勒了社会主义社会妇女地位提升的美好前景，为职业妇女这股革命力量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

（二）职业妇女个人人生目标革命

如上文所述，职业妇女在工作中被边缘化，究其原因，除了妇女社会地位低，妇女习惯于无价值劳动，习惯于忍让外，还有在择业时以俸禄优厚、事务清闲为理想职业，在待遇优厚和工作清闲上计较，对于职业目标与人生抱负要求较低，难以跳出做男性附庸的思维方式。[5]实际上，以妇女的能力、智力来说，若肯吃苦，克服困难，有事业心，成就不会亚于男性，特别是职业妇女相比于传统妇女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更易觉醒女性意识。因此，中共南方局在《职业妇女》中呼吁到，职业妇女应该站在妇女运动的最前线，在个人的职业目标上有更高的追求。

职业妇女革命的个人目标在《职业妇女》对三八妇女节纪念报道中不断得到重申与强调，

1 卢兰：《论职业妇女》（二），《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二期，1945 年 1 月 20 日，第 3-6 页。
2 《为富不仁 胞兄惨杀胞妹 梁山孙楚珩被族人联名控告》，《新蜀报》，1944 年 4 月 22 日，第三页。
3 华严：《妇女与经济》，《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17-19 页。
4 徐仲航：《妇女与政治》，《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二三期，1946 年 4 月，第,2-3 页。
5 君柔：《职业妇女心理的暗礁》，《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一期，1946 年 1 月 25 日，第 19 页。

首先是职业妇女的个人思想精神上的革命。《职业妇女》提倡，从心底上反思妇女解放现实问题，立志在工作中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不被抓到缺点，找到借口，以工作成绩击碎性别歧视的谬论。在实际工作中，妇女问题虽然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国家政府层面的介入，但是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国家政府无暇兼顾时，妇女也要独立自主、尽自己所能地解决问题。在生活上，不能沉迷于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要为更多不幸的妇女争取人权，为国家或他人服务，尤其是有一定知识水平的职业妇女负有妇女解放“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1]因此，职业妇女中需要建立一种积极承担工作责任的新精神，抵抗传统的倚赖与虚荣心理，它将妇女的人生锁在时装、娱乐、丈夫、儿女的狭小范围中，与国家社会隔离，要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就要争取经济独立，从事劳动，紧跟国家社会的发展。[2]更进一步的说，职业妇女们对人生的追求应该转移到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上来，在人生目标上进行革命，跳出家庭的小圈子，与男性同样的心怀天下、关心国事，关心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参与政治，以政治行动争取妇女解放，成为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专注事业，为国奉献的革命者。这一点在 1946 年陪都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宣言中有所体现，宣言包括：巩固世界及国内的和平、参加三民主义新中国建设工作 、争取妇女本身的权利、切实团结合作。[3]可见，宣言内容将妇女对民族国家命运的责任提高到了与男性同样的高度。

总之，在中共南方局的革命话语体系中，职业妇女所负起的历史任务包括一般的民主任务、具体的妇女解放任务。在民主任务方面，要承担各部门的抗战工作，帮助甚至接替男性的工作，早日实现抗战胜利，为建立自由、民主、繁荣的新中国尽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同时积极推进妇女解放运动，以争取妇女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同时进行，相互促进。[4]

三、鼓励职业妇女转向农村工作

职业妇女要解放，必须取得抗战胜利、实现民主政治，具体的做法是从事一份有革命意义的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为创建民主自由的政治尽一份力。中共南方局鼓励职业妇女到农村去工作，把民主作风带到农村，更直接地为农村大众服务，切实去帮助、解除农村妇女的痛苦，特别是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被裁员、生活困苦、对机关单位贪污腐化失望的职业妇女们。[5]因为，在大后方的农民，政治上还没有发言权，受着种种压迫和剥削，他们在抗战中负担最大，出力最多，可是他们的生活悲惨、困苦，尤其是农村妇女，职业妇女应去农村帮助农民，争取民主，提高农民生产热忱，发挥农民潜在力量，以做学生的精神虚心下问，向农民群众学习，从细小的具体的事入手，随时随地关心农民的生活，以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利害得失为自己的利害得失，多照顾绝大数的贫农的利益，了解农村的土地、阶层关系等等。[6]

《职业妇女》讲述了在农村工作的职业妇女经历，提供了具象化的参考与可复制的经验。

1 岚英：《纪念三八》，《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二三期，1946 年 4 月，第 11 页。
2 音：《三八妇女节谈今后妇女界应有的新精神》，《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二三期，1946 年 4 月，第 12 页。
3 《陪都各界妇女三八节纪念大会宣言》，《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二三期， 1946 年 4 月，第 13 页。
4 《创刊的话》，《职业妇女》创刊号，1944 年 11 月 20 日，第 2 页。
5 《争取民主，走向农村，精通业务》，《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三四期，1945 年 4 月 20 日，第 1 页。
6 余为群：《谈农村工作——复一位朋友底信》，《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三四期，1945 年 4 月 20 日，第 11-16 页。

在农村做教育工作的曾小姐就是一个范例。农村中有着“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思想，在学校里具体表现为男女分班授课，女教师必须得为人母后才能给男生班级上课，曾小姐在还没有做母亲时，经县政府老教育科长介绍，去农村的一个中心学校任教，担任男生部的教师以“开通风气”，一段时间后，由于曾小姐的教学得当，学生成绩出众，各大学校争相下聘，曾小姐专门挑选了一家离城市数百公里、更为传统守旧的农村学校，为了推进男女合班，促进风气开放，曾小姐先是巧妙地提出只教女生班级，校方考虑到学校在全县的成绩排名也要求她教男生班级，几经磋商后，不得不接受曾小姐提出的男女合班。校方虽然同意了男女合班，但是在实际操作上还困难重重，合班上课，女生态度不自然，男生有贼头贼脑、嬉皮笑脸的轻薄行为，曾小姐没有放弃，一面鼓励女生尊重自己，一面和男生订立惩罚条规，同时与家长保持密切联系，说服家长接受男女合班，渐渐地破除了学校里的男女大防观念，在曾小姐的不懈努力之下，男女合班取得成功，校长将男女合班提到全县行政会议议程中并获得了通过，在农村工作中，曾小姐不仅为农村落后思想革命尽了一份力，为改善社会风气做出贡献，还收获了个人事业的成功，她成为了学校的首席教师，被推崇为品学兼优的知识妇女，打破了农村传统观念，和广大农村妇女建立了亲密友谊，当地人都以妻女接近她为光荣，在农村的锻炼中变得更坚强独立，学到了农村许多活生生的知识。[1]

除了知识职业妇女的经验外，中共南方局在《职业妇女》中详细介绍了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做革命工作，没有知识文化的农村妇女模范，在大后方宣传了中共对职业妇女的平等、尊重、帮扶的友好政策。清涧县官天河村的朱秀英是一个朴素、小脚、不识字的农妇，但她热心于革命工作，积极组织农村妇女，在革命工作中表现出众，工作能力受到村民们的肯定，得到了其他妇女拥护，推选她为妇女贫农会长，区妇女代表主任，抗敌后援会妇女干事等，1940 年在民主政府普选运动中，她当选为民主政府第一届参议会的县议员并在下一届改选中继续连任，得到这样的工作成就离不开边区民主政府的扶助与她自己不断追求进步的努力，在工作上，她主要负责组织发动妇女参加贫农会、洗衣队，做鞋慰劳抗日军，发动人民参加选举运动、生产运动等等，在工作之余她向别人学习认字，经过多年的锻炼可以阅读边区群众报并发表革命演讲，锻炼出了政治领导力，在边区政府鼓励生产的时候，她先锄别人的地，最后锄自家的地，组织识字小组分享知识，她这种不怕吃亏为众人谋利的革命工作精神还获得了边区政府奖予热心工作模范人物。[2]陕甘宁边区对职业妇女在工作学习上大力支持与培养，还体现在对职业妇女的生育福利的关照，怀孕的职业妇女得到应有的休息并照常享受着她应得的薪金及一切供给的待遇，在衣食的分配上尽力满足产妇的需求，为了不致妨碍母亲们工作学习，在母亲多的机关都附设有完全托儿所或日间托儿所，解决职业妇女的后顾之忧。[3]

中共南方局对农村工作模范事迹的报道与城市中职业妇女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方

1 符：《她在农村》，《职业妇女》第一卷第五期，1945 年 6 月 20 日，第 32 页。
2 沙平：《热心工作的农村妇女 ——介绍陕甘宁边区朱秀英》，《职业妇女》第二卷第五期，1946 年 6 月，第 6 页。
3 《延安的母亲们和他们的托儿所》，《职业妇女》第二卷第四期，1946 年 5 月，第 15-17 页。

面为城市中的职业妇女实现政治民主、妇女解放提供了农村道路，另一方面宣传了中共对于妇女从事各项工作的支持与帮助态度，在大后方国共两党博弈中争取了职业妇女的好感，有利于中共在大后方对职业妇女群体进行统战工作。总的来讲，中共南方局对于职业妇女群体的革命话语建构为大后方迷茫无助的职业妇女们指明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前进方向，并沿着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总方针，鼓励职业妇女走向农村，走向中共边区。

通讯作者：蒋欢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 400067

通信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19 号

联系方式：15223323184

电子邮箱：761084870@qq.com

QQ：761084870

延安时期中共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研究：基于陕北公学的历史考察

王艳荣 1 曾文芳 2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型高等教育空前发展，成为我国独立自主探索新型高等教育的开端。这一时期创办的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在 4 年时间里培养了一万一千多名学员，为抗日救国、民族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由于陕公在实践和探索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在民族危亡时刻担负起的办学使命，就其时代价值而言，早已超越教育本身，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面旗帜，1938 年毛泽东在《援助陕北公学》的宣传册上高度评价陕公：“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1]，陕北公学在抗战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这意义，首先在于陕北公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缩影，它的扩大与发展象征着中国的进步。这意义又在于陕北公学对抗战负起了它应负的责任，有了它辉煌的成绩。”[2]陕公是当时整个中国进步的缩影，其创办、发展、兴盛、合并的过程是党探索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是党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将中国具体国情与高等教育充分融合的过程，是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成功典范。可见以陕公为切入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下回顾党自主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对于深化认识党领导下的新型高等教育发展史，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高等教育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具有极强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体现

1938 年 9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后，一代又一代的先辈开始伟大探索，在这个长期的动态变化发展过程中，党创造性的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运用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建立起了符合时代需要，顺应马克思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一大批高校，陕公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体现。

反映了时代性特征

陕公是时代的历史产物，其创立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性特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率先认识到抗战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培养军政干部的教育需求，满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显得尤

[1]基金项目：西安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陕北公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贡献研究》（项目编号：50400/02135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21-7-15。

作者简介：1.王艳荣（1993-），女，西北政法大学 2019 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2.曾文芳(1973—)，女，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9).

2 李维汉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107).

为迫切。毛泽东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为了进一步培养党和人民所需的干部人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的30余所以“为革命培养各类人才干部”为目标的干部培训学院，适应了革命战争形式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这些干部学院就是我国新型高等教育的前身。随着全国各地的广大青年不断涌向圣地延安，培养军队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和训练高级党政干部的中央党校既无法契合各个群体不同的教育素质与求学需求，也无法完全为源源不断到来的爱国青年解决现实问题。在此种背景下，延安四老和张闻天、李富春、成仿吾等一批热心教育事业同志建议“创办一所全日制的国民性质普通大学——陕北大学”，这个定位是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开端，标志着我国开始独立自主探索高等教育，同时陕公的创立也映射出高等教育在革命时期发展的时代性特征。

陕公发展壮大的过程充分反映了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培养周期、培养目标和办学宗旨等方面，表现出时代性的特征。在培养周期上，陕公分为六个月一期和一年一期两种培训方案，甚至在人员极度短缺时压缩为三个月，培养周期普遍较短，这与在短时间内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及时输送军政干部的事实相符合，展现出革命年代抗战人才之短缺，人才培养之艰难的时代现实。培养目标和办学宗旨是“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方针，即帮助青年获得抗战中实际工作的方法和民族自卫战争的最低限度的理论基础。培养目标与时代背景相契合，学校各项工作均围绕这一目标和宗旨展开。

反映了灵活性和坚定性并存的特征

陕公的创立并非一帆风顺。起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地区创办一所大学”的申请被国民党驳回，陕公陷入孤立无援，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为避开蒋介石的钳制，中共决定仿照中国公学的经验和方式将“陕北大学”改名为“陕北公学”，将学校定位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院校。陕公名称和学校性质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根据实际问题灵活处理，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真正成为“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2]。

在课程及专业设置等方面，依着抗战发展的需要而变更，极具灵活性。陕公最初在《新中华报》刊登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学校暂设社会学、师范专修、医学、医防工程和日本研究5个系，而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各抗日根据地迫切需要补充大量抗日干部的现实使之变为“不分系”只开设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三门课程。后来又因抗战形势的需要，开设了专门的军事课程；为满足干部学习和实际需要，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课程的设置、增减、调整都与当时战时的需要密切相关，随时为抗战提供所需人才。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聘请专家、学者、中央领导等人为学员讲述全面抗战、保卫武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等中共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与时事政治紧密结合。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796).

在人才培养方面，在“不变”中依据学情“变”。无论资质、水平，陕公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都按照“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总原则，重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为培养具备政治素养和理论基础的抗战后备干部而服务，陕公“不变”的是军政并重，为抗战培养人才，一切为革命服务的原则，始终坚持抗日，为民族解放培养人才的初心和使命，而“变”的不仅是局势，还有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课时长、入学时间等具体事项，如在入学时间上，早期为普通班 3-4 个月和高级研究队 1 年，后期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调整为 3 个月甚至更短，这一点在成仿吾《陕北公学的新阶段》中得到证实，他说：“这些干部有的是训练了 4 个月，3 个月甚至 1 个月，完全是按照抗战形势的需要而订出我们的教育计划”。

陕公办学前期，教育资源极其匮乏，陕公学子在艰难的时光里点燃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1939 年陕公光荣完成历史使命，被正式改编为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后为华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联合大学被爱国人士李公仆先生称赞为“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1]。几个月后，革命形势不断变化，留在延安的少数原陕公干部、教员、学员，同中共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合并，又在杨家湾复校，在枸邑看花宫设分校，史称“后期陕公”，1941 年被并入延安大学，后多次辗转，现今为西北政法大学。无论是沿着“前期陕公”路径发展的华北联合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或是“后期陕公”所孕育的延安大学与西北政法大学，始终坚定党的领导，为国育人，为党育才，将学校的发展与国家、人民、社会的需要相挂钩，这一点从建校至今始终不改。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学校的课程内容、教学制度、科研模式等都在根据现实需要不断调整，灵活变动，基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领导保持一致。由于陕公及其后继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根本原则的坚定性和具体措施的灵活性，使其掌握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妙门，造就了未来的光辉事业。

反映了理论同实践辩证统一的特征

陕公在创立、发展、壮大、合并的过程中，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颇具中国特点、中国特色、中国风范的办学理念与教育方针。陕公十分重视军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制度中均以实战为导向，学员管理采取军事编制，“班-分队-学员队-区队”的设置让课堂上学习的行军作战等知识快速适应游击战等军事活动，提高学员的实战本领，而在培训的过程中，陕公要求学员们必须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一面将理论与战争需要相结合，适应战争需要。此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中国教育研究室，何干之领导的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室，陈唯实领导的哲学研究室等不仅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教研室制度的先河，而且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提供理论支撑，彰显出理论同实践辩证统一的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陕公作为党探索新型高等教育的先锋队，在实践中身先士卒，走稳第一步，为后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陕公自身以及围绕其所衍生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型高等教育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

1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95）

国化的生动案例，为后期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国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反映了民族性的特征

陕公是在革命战争的炮火中孕育发展壮大的学校，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缩影，充满着中国人的血性和志向，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征。正如毛泽东盛赞：“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首先，陕公展现了团结统一的民族特征。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以全民族根本利益为重，团结国民党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抗战服务，陕公作为党领导下的高等院校，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广阔胸怀，摒弃了阶级、民族以及敌对等关系，广泛招收了各地前来求学的大批爱国有志青年。陕公的招生简章上明确规定：“凡是十八岁‘有志参加抗战’的青年，身体健康，不拘文化程度……均可报考”。[1]在中共中央董必武、周恩来的致电中甚至表示对南方学生可不必举行考试，不必要介绍信，只要纯洁、坚决、吃苦的劳动者都可自动来陕北入学。其次，展现出和而不同的民族特征。在学员的招收上，不局限于汉族，满、回、蒙等少数民族均可入学，并特地设立少数民族班，根据民族特色，制定符合民族特点、时代特点的课程和实践内容，培养出了一批意志坚定，用得上，干得好的抗战人才。最后，展现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特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是一个生于忧患，多灾多难的民族，这造就了中国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性格特质。陕公创立初期一无干部，二无校舍，成仿吾称为“白手起家”，学员平时学习，课后劳动，用开学之初发放的铲子在黄土地上建起校舍。没有教员、教材紧张，资源有限，校长成仿吾联系名师，聘请一线实践者如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定期发表演讲，解决教师短缺问题，之后建设起新的研究室，培养新教师。在教材上，除了利用好现有的少量教材外，集体研究、创作，自编自写，灵活融入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随时充实更新。此外，陕公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何家山开荒 2100 多亩，自制草鞋肥皂，自种土豆、谷子、糜子、蔬菜等基本满足生活所需。陕公人奋力拼搏，自强不息，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教师队伍短缺的现实条件下，仍培养出大量综合素质高，理想信念坚定的学员，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特性。

二、陕北公学迸发的高等教育中国化星火

抗战时期，为满足现实需要创立的陕公，是一所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点的高等院校。陕公在创立、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根据现实情况形成了现实需要和学科逻辑并重的办学理念，坚持少数民族的教育平等，制定出完整的国防教育框架，形成了“三全育人”的思政特色，搭建了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框架。在这一过程中，陕公充分借鉴以往办学经验，吸纳西方所长，充分考虑中国具体的教育实情，迸发出高等教育中国化的点点星火。

因势而谋，造就现实需要和学科逻辑并重的新型办学理念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源头，一个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坚船利炮和科技发展的冲击下建立的如北洋学堂、南洋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一个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高校，这两大源流伴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成长为 2000 多所高等

1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19）

院校汇聚的滔滔大河，造就了势不可挡、汹涌波涛的中国新型高等教育事业新局面。如果说1985年创办的北洋学堂等是中国古代书院的“簇拥者”和西方大学的“模仿者”，那么48年后我党创办的以陕北公学为代表的一大批新院校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创新成果。

西方高等院校办学遵循学科逻辑，强调办大学就是办学科，而学科与知识的生产直接相关,因此学术产出成为衡量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的唯一标准。[1]而中国的办学逻辑不同于西方，它自古遵循社会需要逻辑，即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办学。纵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百年历史，虽在各个时期学习引入日本、德国、美国、苏联等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却始终未沦为西方的附庸，未跳出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逻辑。在延安时期，在中共的带领下，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地探索发展，最终形成迥异于各国，自成一体的中国高等教育新模式。

陕公坚持“教育长期为抗战服务”的方针，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践需要。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的“高等教育是一种社会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的教育目的。陕北公学是一所由中共创办，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建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办校的目的和宗旨正是围绕这一任务而展开。正如毛泽东说：“学习的人，教育的人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这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2]陕公围绕着这一目的紧跟时事，适时调整教育计划，在教学内容、教学环节、教学计划与教学措施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形成了一套革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在办校宗旨的指导下，陕公一方面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有信仰、有能力，用得上、干得好抗战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者，满足了对于抗日人才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在搭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出版了一大批质量较高、传播较广的知识成果，兼具了知识研究的学科逻辑，为后期形成兼具现实需要和学科逻辑的办学理念奠定良好的基础。

“旧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的，是不能适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的。”[3]陕公所创造的新型办学理念既非英美等西方模式，也非东方经典模式，而是本土化、中国化的探索和创新。这所非常时期创办的大学突破了以往高等教育建设的逻辑框架，围绕“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的办学宗旨，随时根据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对干部的实际要求调整教学内容和时间安排等，为民族培养紧缺的领导干部和高级人才；同时在学科建设、体系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充分借鉴西方办学经验，兼顾学科建设的专业性和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校长负责，学者治校，民主管理的基本框架，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想理念和办学模式，影响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因势而异，保障少数民族教育平等权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中提出，全中华民族当前最紧急的任务之一是“团

1 郝瑜等. 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J].高等教育研究.2017.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一九三六—一九三八)[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24).
3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5).

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1。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发挥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团结各族人民对于革命的重要性。

1940 年晋西事变爆发，陕公为迎接大青山革命根据地派出的 30 多名民族干部，特地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用文艺开路，教育各少数民族团结进步，共同抗日。1941 年成立民族部，人数从 30 人发展为 185 人，接收蒙古、回、藏、苗、满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学员。在教学过程中陕公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形成了民族教学特色，如按照学员文化程度高低分队，“文化程度高的以政治学习为主，文化程度低的队着重学习文化”2；重视时事政治和民族政策的教育和学习，开设党的政策民族课，注重马列主义和民族问题的学习；尊重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等，这些课程是中国民族教育的雏形，也使得陕公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雏形。“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3。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主要内容，陕公接收少数民族学员入学，并制定与之相匹配的课程内容、教学模式，让其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陕公接收少数民族学员这一举动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直接体现。

因势而动，制定国防教育框架

国防即国家防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将其定义为：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可见在这一概念中，“国防”的主体是国家，对象是“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因此作为国防的延伸概念“国防教育”担负着“国防”和“教育”的双重属性，是将国家安全与教育相结合，提高学生国防意识和国防能力的特殊教育。其实延安时期的大部分高校都具有国防教育的意识，并开设相应课程，而陕公作为全国首先实施国防教育的高等院校，在占据天时地利的条件下，形成了迥异于各国、各校的国防教育框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国防教育的典型院校。

1938 年 4 月 11 日，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闻天首次阐述了国防教育概念的三个要素，即民族自尊心、增进全民族的团结、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4]。同年毛泽东在《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为战争的前提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即实行抗战教育政策，让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陕公将教育方针确定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现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同年，时任陕公教务长的邵式平提出“实现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口号，力争将陕公建设成坚持彻底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学校。为此他带头制定了完整的教学框架。在计划安排上，以革命政治教育为主，坚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在教育内容上，特别注重抗战基本理论、抗战政策方法，指挥民众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以及

1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285).
2 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122).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9).
4 张培森．张闻天在 1935—1938(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303.

对目前时局的认识等教育；在教育原则上，坚持理论与实际联系、少而精、教学一致、计划与灵活相结合的原则；在学习方法上，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规律地学习，自动地、集体地学习，革命竞赛地、战斗地学习。[1]在该框架下，国防教育理论飞速发展，并在具体实践中得到检验，如在课堂上学习“指挥民众武装斗争”，在实践中利用“冬闲”时节，教当地民众识字，协助建立“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等群众团体，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凝聚思想意识，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陕公师生探索的国防教育体系在改革的炮灰和改革的春风中不断完善发展，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分支，为现代国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借鉴。

因势而进，探索“三全育人”教育模式

清凉山下，延河之滨，陕公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送来“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两件礼物，这既是毛泽东对陕公的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灵魂。陕公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视为贯彻教育方针、实现教育计划、完成培养抗战任务的重要保证，探索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教育模式。

在全员育人方面，紧抓思政工作队伍以及学生干部、党员骨干的关键少数，采取专兼结合的方式。在专职干部方面，陕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多由毕业学员选拔留校的学员担任，他们与学员同吃住、学习、娱乐、劳动，熟悉学员的思想问题，可敏锐察觉思想动向。此外，陕公全员，如教员、工作人员等，都是兼职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牵头、中央领导演讲、学生会鼎力开展活动，随处可见师生、生生之间欣欣向荣的全员育人景象。

在全过程育人方面，陕公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学校是政治部，区队是政治协理员，学院为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助理员。党总支负责全校的党务工作，每个学员队建立党支部，指导员、队长、政治助理员担任支部委员会委员，形成了党领导下，等级分明，管理严格的思政政治工作格局，将每一位学员纳入思政教育体系之中。陕公的思政教育从不是空洞的定期说教，而是贯穿于学习生活的全过程，针对学员入校初期、学习中期、临毕业后期不同阶段的思想状况，紧抓特点，有重点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参与，在生活过程中自我管理，为学生创造舞台和机会。纵向化的工作格局兼顾各个层次，横向化的育人工作从始而终，纵横交错间构建出网格化的育人格局，从上至下，从入学到毕业，实现全过程育人。

在全方位育人方面，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陕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提出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开展全员思想品德教育、加强党的建设、指导学员开展广泛的课外活动、引导学员进修必要的军事生活训练和体力劳动锻炼 5 条任务，其中开展课外活动和进行军事锻炼和体力劳动是直接将生产和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例证，而前 3 条任务的完成过程中也隐含了这一特色。如第 1 条任务，学校开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面向学生讲述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如何争取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等重要内容，不仅与当时实际情况接近，而且在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后可直接使用，充分满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规律。

---

1 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校史读物编委会编.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时期校史读物 中国不会亡 因为有陕公 陕北公学 1937-1939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42.

因势而成，构建新型高等教育基本框架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解放区高等干部教育的基础上，学习国统区高教经验，参考西方诸国高教模式，经过改造、调整、整合、组建而形成的新型高等教育模式。可以说，“延安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模式的真正源头和基本范式[1]，当代高教模式的源头和基本范式都能陕公中找到痕迹。

在组织框架上，陕公将学习放在首位，学习压倒一切，提出“学习第一”、“一切为了学习”的口号，行政机构也围绕“学习”设置。教务部为全校教学的最高领导机构，承担全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法研究等工作，下设教务科、学习指导科、军事教育科、各科研究室、图书馆等。指导科牵头成立学习指导委员会，学员队设专职人员组织共同学习，全面完整、层次多样的工作组织形式与“一切为了学习”的目标相契合，有效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形成了固定的工作组织结构，构建出当代高等教育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在具体教学环节，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理念、程序、方式和原则。教学上确立德育为先、学用一致的教育理念，“引言-预习-质疑-讲授-复习”的教学程序，自学为主、集体互助，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坚持教学一致、少而精、计划与灵活相结合的教学原则。管理上确立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基本体制。教学评估上制定了教学成果检查制度，以笔试的形式客观检测对课程的掌握程度，同时举办辩论会、学科展览会，组织撰写实习通讯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检查方法从侧面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陕公所形成的教学方法、原则、制度等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之中仍被广泛使用，并不断发展完善。

在生活管理上，一方面严格遵循“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则，发扬民主的精神。干部和学员、新生与老生上下一致、友爱互助，教员们忠于职守，从不请假缺课，遇大雨无法露天上课就主动找时间补课；老干部关心新学员，夜晚查铺为新学员盖被。生活管理上，班长、分队长等职均从学员中民主选举，若人职不符可二次选举。另一方面弘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即忠诚于人民、革命、组织，团结互助、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作风，紧张有序、纪律严明，在战斗中学习和生活，活泼积极、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反映学校风貌，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陕公校园生活丰富多彩，陕北公学剧团和合唱团，文工团、陕北公学流动剧团等有计划的定期组织举办了大合唱、拉歌晨练、纳凉晚会等文艺活动，放松学员紧张的学习生活。最负盛名的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在成仿吾校长的指导下坚持“流动到群众中去”的方向，以文艺为利器，自编自导自演话剧《生死关头》、《放下你的鞭子》、《送郎上前线》、《母亲》等剧目，走出一条文艺为工农服务、为抗战服务的革命道路。

三、陕北公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启示

党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始终与党和国家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相依。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1 郝瑜等.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及其当代价值[J].高等教育研究.2017.

必然要追根溯源，寻找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形成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关键角色，并从中汲取养分。

坚持党的领导，在高等教育事业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陕北公学的成功经验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但从前期陕公到华北联合大学，后期陕公到延安大学，直至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唯一没有改变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两个坚持”渗透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血液中，难以割裂。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党的一切工作之中。一方面，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导地位。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在党的指导下发展壮大的一所高等院校，办校宗旨、原则、方针、政策均与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统计，仅在 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8 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 9 次为陕北公学学院做形势教育，周恩来、董必武、任弼时、林彪等人不仅公开讲演，还担任教员，亲自授课。陕北公学将一切置于党的管理之下，学校党支部受上级党组织领导，但行政系统与之平级，保证了学校正确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1952 年院系调整，公立、私立、教会大学多元并举的体制改造为大一统的公立体制，所有高校都处于党的领导之下，这也是全国高校得以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陕北公学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正确性，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国高等教育才能集中力量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是党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高等院校在实际工作中都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个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照搬，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发展而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陕公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传播，是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教学安排，开设社会科学概念、辩证唯物主义等理论课程，设立研究室开展中国问题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新时代实现高等教育的创新性和内涵式发展必须立足本国国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好实践工作，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清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自我封闭的僵化的理论体系，而是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的思想体系，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向前。

坚持特色办学，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近年，“中国教育是失败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缺乏创新”等言论充斥于耳，造成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毫无建树、室徒四壁的错觉，这源于对我国教育发展认识不清晰。的确，从科研产出看，即使是我国重点高校，在科研方面与西方的知名大学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但从现实需要的逻辑来看，中国的重点高校为国家和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与西方高校相去甚远。当代中国的新型高等教育遵循的是现实需要与学科建设并重的办学逻辑，是在借鉴学习西方学科逻辑的基础上，使之适应于社会需求的办学逻辑，而非纯粹的西方附庸，自然不能简单用高水平论文的产出来衡量教育优劣。中国不仅要培养建设新中国所需的各项人才，同时肩负着学

术科研，输出知识成果的任务，且在时间和发展环境上均不占优势，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这种现实需求与学科逻辑并重的办学理念却具有较大的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1]。陕北公学所展现出的中西结合办学逻辑已经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中国现实的情况要求我们既不能完全接受西方的办学逻辑，更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当然，当今中国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如高校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难题，不同教育利益相关者博弈加剧，教育改革难度增加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现实，而要解决此类问题，就应该以史为鉴，从中国社会的文化基础、思想传统，尤其是已经成功的历史经验中为培养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寻找解决密码。

重视思想引领，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在高等院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程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特色与优势。陕北公学在短短数月内培养出革命先锋队，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高等院校提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范式。

首先，重视思想引领地位。陕北公学始终牢记“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高度重视思想在高等教育中的引领地位，探索出“三全育人”的教育模式，积极培养与党中央要求相一致，符合现实需要的抗战人才，使得在陕公培训仅 3 个月的学员也能够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远大的革命理想，高尚的革命情操，可见，在高等教育中思想引领对整个教育培训成果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思想工作深入人心，会增强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度和归属感。反之，学生思想觉悟提升，价值观和人生奋斗目标发生积极变化，其人生选择也会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同轨并行，相得益彰。

其次，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素养。陕公能够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德才兼备的抗日干部，与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密不可分。党内知名学者“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何思敬”、“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始终站在理论研究最前沿的何干之”，延安知名学者张如心、吕骥，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出的刘春、孙力余，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干部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一批实干的军事家和具有较高素养的学者担任全职或兼职教师。后期陕公挖掘优秀学员，以旧带新，教学相长，进行重点师资培养，自身培养教员，这些教员与名师间相互配合，上课、报告、讲演等多种穿插，有力的提高了学员的综合素质，综上可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陕公思政课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新时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中，必须加强教师队伍质量的建设。在教师队伍建设中，要善用人才，注重发挥出具有不同特长教师的能力，做到人尽其才。

最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之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我国高等教育在进行改革创新过

1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4(01).

程中必须坚持这一观点毫不动摇。我国高等教育起步发展较晚，环境也相对复杂。在高等教育中实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于为我国培养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高校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场所，必须遵循人的发展规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因材施教。

抓住办学根本，强化立德树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其中

陕公是党在延安时期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是该时期高校办学理念、方针、原则的缩影。首先，陕公在办校、合并、搬迁、重组中曲折前进，却始终未曾偏离“教育长期为抗战服务”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地发展，搭建国防教育框架，招收少数民族学员等措施都是为了培养出抗战所需的人才，正因为陕公抓住了“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解决了革命事业人才培养的方向问题，所以短短 4 年时间培养出大批抗日骨干力量，深刻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其次，陕公坚持以德育人，设置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教学安排，创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并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在所有工作之中，根本的目标就是“立德树人”，强化学员的思想意识，为党和民族培养人才。在艰苦的环境下，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并在短期培训后前赴后继奔赴抗战前线，主要原因是陕公培养出了一批以科学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实践者，为他们树立了为民族解放、国家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大德。正如 1937 毛泽东给陕公的题词中所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是胸怀坦白，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1]最后，陕公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系统化的政治理论课，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教育模式为学生转变思想观念，塑造理想信念、提升理论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毛泽东著,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41.

“开发大西北”中西北人的因应与自觉：以抗战前卫生建设为例

冯秋季

新乡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的研究热度渐高，西北学者的研究兴趣更浓。他们或重点研究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或深挖细究各项事业的发展状况[1]。这些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近代西北人努力的背影，以及西北地区近代化转型的历程。笔者认为，既有成果多为客观探讨，而少对西北人自身的主观愿望和实际努力进行专门研究。实际上，在南京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政策与西北发展之间，离不开西北地方人士的主动因应与自觉努力。在政府与社会上下掀起的“开发大西北”热潮中，西北人并未一味跟风或等待。对政府的援建，他们热切欢迎，但在因应中也有思考及自觉行动。对此，学界尚未有专文论及。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卫生建设为例进行尝试性探讨[2]。

一、西北人对政府“开发西北”的认知与要求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和强邻虎视眈眈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内“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声浪，甚嚣尘上，“上而当辅诸公，下至关心西北之黎庶，莫不大声疾呼，细心筹划。直有对西北之开发，刻不容缓，对西北之建设臾须促成之趋势”[3]。面对国内上下“开发西北”呼声，西北人士有自己的认知和要求。

首先，“大家庭”与“小兄弟”的家国体认。

这是民族危机面前西北人对家国的自我认同。对于社会上下开发大西北的声浪，绝大多数西北人士是欢迎的。他们认为西北地区有资源优势，但交通阻滞、人才短缺，百姓智识薄弱、能力有限，在长期战乱、灾荒与饥馑交迫下，“更谈不到拿出巨大资本，来修路开矿，发展实业。所以无论人力财力，都需要全国同胞来共同努力，绝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单独办到的”[4]。也有人称开发西北是明达之士“树不朽之基业，消衰弱之根源”的创举[1]。但同时，他们从

1据笔者陋见，近年来学者对南京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研究，主要有王荣华《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活动与西北开发》（《宁夏大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南京国民政府上层人士与“西北开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张用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取向》（《四川大学学报》2002 年第 5 期）；杨乙丹《“开发大西北”的创新意愿与效果约束——评 20 世纪 30 年代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古今农业》2007 年内第 4 期）等。从地方卫生事业发展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牛桂晓《边疆·卫生·抗战：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 年第 1 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海地区医疗卫生建设述论》，《民族史》2018 年第 1 期）；翟亮《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甘肃医疗卫生研究》，西北师范大学 2017 年硕士毕业论文；李雪勤《民国时期甘肃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西北师范大学 2013 年硕士毕业论文；凌富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甘肃省为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5 年第 4 期）。另外，刘进《为谁开发西北——抗战前西北人的地域意识与国家观念考察》（《宁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专文研究了西北人对开发大西北的利益诉求和建设主张。

2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在西北直接控制的区域主要是陕西、甘肃两省，宁夏、青海军阀也先后表示服从中央，但新疆局势始终不甚明朗。为便于集中论述，该文所言之西北，主要指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

3 张继：《国人宜注意西北问题》，《中央周报》1934 年 2 月第 298 期。

4希天：《开发西北声中西北人应有之觉悟》，《公道》1932 年第 4 期，第 11 页。

内心里不希望中央和其他地方人士把西北看作一个施舍或帮扶的对象，而是希望把他们视为一家人来对待："须知西北，是中国之西北，并非西北之西北，西北落后，是即中国落后！"[2]西北今天没落的现象，"是西北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3]。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的甘肃人郭维屏对即将赴西北参与调查的人士说："西北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他的进步与落后，和整个中国的国民、政府的国策有密切关系的，好像一个小家庭，小兄弟的懦弱无能，愚昧无知，不能专责备他自己，应先问老大父兄们，是否已尽完了教养的责任?自己责任没有尽到，是不应该说刻薄风凉话的。"[4]他的话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大部分西北人的内心感受，即希望西北不被另眼相看，而能与中国其他地区一同进步。

其次，为谁开发大西北？

这是西北人的利益之问。在开发西北的声浪中，大部分人都直陈开发西北是为了抵御外辱，为了给中国经济持续开发找到富矿，或为了找到民族的根文化等。1934 年 5 月，宋子文率团在陕西、甘肃、宁夏视察时直言："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注意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5]。面对西北诸公，他言语中虽把西北的地位抬得很高，但也袒露了开发西北的内心用意，那么，外敌入侵造成的危机过去之后呢？西北的建设是否还要"赶快注重"，他倒没有提及。戴季陶和邵元冲的谈话，更直指西北富饶的矿藏，有了西北"将来开发不尽的财富"[6]，我们将"大有希望,不必仰赖他国,不致受他国的牵制"[7]。开发西北以为"我"服务的内心表露无遗。更有人将西北开发与东北收复相联系，"即为收回东北失地计，西北之开发，亦为当务之急"。[8]虽然言者地位不同，看问题角度有别，目的也多是为鼓动国人尽快去开发西北。但他们开发西北之初衷，均是以"我者"为中心，把西北放置在一个"他者"的位置进行想象，而忽视了西北人自身的处境和感受——西北人在哪里，他们怎么想，他们该怎么做？少有人关注。

在为谁开发西北问题上，西北一些智识之士有自己的诉求。何挺杰在分析了西北人对开发者的"欢迎"和"敬谢"态度区别后指出，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西北人欢迎的开发者，除了应以国家利益、民族经济为怀外，还须"以西北民众利益为目标"[9]。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也指出："我们要为西北人之幸福而开发西北。不是为中央或其他省的人而开发西北。"

1张人鉴：《开发西北实业计划》，北平：著者书店，1934 年版，第 21 页。
2 旱：《读鲍希初西北旅行记后》，《生存》（兰州）1932 年第 19 期，第 4 页。
3 岚：《敬告服务西北的同志们》，《新青海》第二卷第六期//西安市档案馆编：《民国开发西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 2003 年，第 430 页。
4郭维屏：《如何考察西北》，《西北问题季刊》（上海），1935 年第 4 期，第 31 页。
5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秦孝仪：《革命文献》（第 88 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 年版，第 103 页。
6戴季陶：《向西北猛进的两大意义》//戴季陶：《西北.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3:6.
7邵元冲：《开发西北的重要》//秦孝仪：《革命文献》（第 88 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 年版，第 32 页。
8周宪文：《东北与西北》，《新中华》1933 年第 1 卷第 11 期，第 6 页。
9 何挺杰：《欢迎开发与敬谢开发》，《西北问题》第 2 卷第 1 期//西安市档案馆编：《民国开发西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 2003 年，第 433 页。

[1]这句话道出了西北人的心声。道理虽浅显，意蕴则深刻——发展西北，拯救民族危难是袞袞诸公的“豪言”或目标，但西北地方百姓的收获度和幸福感，才是其向心性和归属感的重要支撑；如若西北人自我不满意，还遑论其他？所以，一位署名“岚”的作者敬告服务西北者道：“一般有志的士，无论籍隶西北或生长东南，当力祛过去不良的印象与观念，勿高自身份亦勿妄自菲薄，而以互助共谅与服务的精神为西部建设事业，打出一条光明的出路”[2]。西京筹备委员会主任张继更直接道出了不开发西北、或西北人不满意的后果：“倘吾人有所顾虑，对于西北不早开发，或不能竭智尽忠以勇往直前之精神而开发之，则恐有代吾人而开发之者，起于不旋踵间矣！设不幸而竟有代吾人开发之者兴，则后之西北，将与今日之东北，同其命运，吾人虽欲开发之恐亦不可得矣!”[3]等等。

再次，由谁开发大西北？

这是西北人的主动权之求。在如何开发西北问题上，西北人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诉求。有人认为，“开发西北者,东南人之口头禅耳,谁都不愿意去,即有去者亦系受中央之命令,携中央之巨款，款尽人归，决无流连而忘返者”[4]，故一旦政府政策有变，款尽人归之后，西北的地方建设岂不再度陷入停顿？也有人从自我境遇出发，不希望完全由西北以外之人士主导和执行，认为这将不利于自身未来发展，也有人怕一些所谓的开发者“视西北为利薮立场、发财之源”，且“视西北人民蠢蠢然犹如鹿豕”[5]，更有人竟喊出“西北者西北人的西北，何劳东南人越俎代庖”[6]的话语，要求由西北人自己开发。后一声音未免过于偏激，且于事无补，所以随即有西北人士批评曰：开发西北，不应有地域观念杂糅，各地同胞，果有专门技能而愿意服务西北者，“西北民众，即备车迓迎”[7]。一位署名希天的论者则主张顺势而为：认为西北人应主动参与到政府的开发活动中，通过锻炼，成就自己；但他也设想，若没有西北人参与开发，西北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将“实在堪忧”，因为依西北人当下“这样没出息无能耐”,等开发好后,“至少要受到种种惩罚”,譬如扫院子，刷茅厕，吃冷饭，穿破衣，等等[8]。他的言论显然有些耸听，但却激发了部分西北人的内心神经，使其能从突然由“天”而降的开发热浪中及时冷静，思考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对此，有人提出：“移植内地文化程度较高之民众，开发西北，固所欢迎，但训练土人帮助开发，尤为必要”[9]。也就是说，他们要用好这批人才以“输血”，也要借机培养地方技术人员，增强自我“造血”功能。“无论如何,西北人在开发西北的一件事上，总应该觉悟到自己所处地位之重要,及自己所负使命之重大……能够自动

1邵力子：《怎样开发西北》//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 82 辑 81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版，第 7 页。
2岚：《敬告服务西北的同志们》,《新青海》第 2 卷第 6 期，第 1-2 页。
3张继：《国人应注意西北问题》//秦孝仪：《革命文献、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第 89 辑），台北中华印刷厂，1981 年版，第 91 页。
4陆亭林：《实际开发西北的初步》（内部资料），甘肃省图书馆藏，1936 年印，第 2 页。
5岚：《敬告服务西北的同志们》,《新青海》1934 年第 2 卷第 6 期，第 1- 2 页。
6岚：《敬告服务西北的同志们》,《新青海》1934 年第 2 卷第 6 期，第 1- 2 页。
7旱：《读鲍希初西北旅行记后》,《生存》（兰州）1932 年第 19 期，第 3 页。
8希天：《开发西北声中西北人应有之觉悟》,《公道》1932 第 4 期，第 11 页。
9鸣新：《西北各省应请中央协助教款》,《拓荒》，1933(创刊号)第 6 页。

担负此种工作,将来才不至于自己落空,才不至白作牺牲工具!”[1]能持此种见地的人在当时固然较少，但持论至为可贵。1933 年，曾经长期在西北从事实地调查研究、时任河南省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张人鉴，在其《开发西北实业计划》书中，也明确提出了类似的思考：由国家采取积极方式给予西北适当的政策支持,同时加强西北地区的人才培养 ，强化其“造血”功能，以与东南协调发展。[2]这才是开发西北的有效选择。

总之，对于为谁开发、如何开发和由谁开发大西北等问题上，西北人有自己的认知与诉求。正是这种认识，促使西北人士或顺势而为，主动因应，或主动求变，发展自我，拉开了西北大开发的帷幕。

二、西北各省对政府卫生援建的因应与自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地方卫生体系的初创时期，但政局动荡、制度初定，“中国各省卫生设备，已极不完全，但各省尚稍有规模，西北则规模也没有”[3]。南京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后，在其制定的一系列建设项目中，除开辟交通、振兴水利、发展畜牧、开采矿业、农业合作、棉产改进等外，医疗卫生也被列入其中。1934 年 2 月 24 日，全国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会”）[4]成立了西北卫生事业调查团，由医学博士姚寻源为主任，随同以国联名义派到中国的南斯拉夫卫生局长、管理农村卫生事务颇有成效的史丹巴（Dr.Stampar）博士、顾问邹舫，以及兽医教官爱勃倍克(Prof. Eberberk)等，赴陕西、甘肃、宁夏等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卫生状况调查。西北卫生条件极度落后和百姓死亡甚众的事实，令史丹巴等人感受到了卫生援建西北的急迫性。考察组在拟就的“举办西北卫生事业计划书”中道：西北百姓“自十七年来，死于鬼神、巫觋、疾病、生产者，数愈两百万。长此以往，人民生命，皆将不保，遑言开发其他？”[5]所以，1934 年 5 月，经委会在其卫生实验处下专门设立西北卫生组，驻地西安，“支配西北卫生经费为四十万元”[6]，以统筹陕甘青宁四省的卫生事宜[7]。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卫生援建，自此开始正式实施。

（一）西北各省对政府卫生援建的因应

所谓“因应”，是指对付、应对。依《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论》所言，则有顺应的含义，“谓因其所遇而应之，有随机应变之意”。西北各省对政府卫生政策的因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初步构建和健全地方卫生体系。国民政府开发西北之前，西北各省均没有独立的省卫生行政机关，对卫生、预防与医疗等事项，缺乏系统设计与持续建设。在经委会的统筹和西北卫生组的协助下，西北四省先后设立了专管卫生行政的省级机关——省卫生实验处，从而使人有专属，事有专管，卫生事业得以发展。

1希天：《开发西北声中西北人应有之觉悟》,《公道》1932 年第 4 其，第 11 页。
2张人鉴：《开发西北实业计划》，民国 23 年版，第 2 页。
3宋子文：《建设西北》《中央周报》第 309 期//西安档案馆资料丛编：《民国开发西北》，第 64 页。
4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于 1931 年 11 月,负责全面规划和指导全国经济建设,其下设立了一个卫生事业实验处,后改称卫生实验处，卫生署长刘瑞恒兼任处长。
5甘肃学院：《举办西北卫生事业计划书》,《拓荒》1934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65-66 页。
6《经委会对西北卫生设施计划》,《西北评论》1934 年第 1 卷第 5 期，第 30 页。
71934 年 7 月，西北卫生组改归西北办事处直辖，专员韩立民被任命为主任，专责办理卫生组事务。

附表 1：西北各省卫生实验处成立状况一览表

省份	省立时间	负责人	备注
陕西	1935.1	韩立民	1933 年陕成立卫生委员会，负责省卫生事宜
甘肃	1934.7	张祖棻	
青海	1934.11	王禹昌	
宁夏	1934.12	魁文山	

省立医院建设是地方卫生体系建设中的首要之事。西北各省中，有的虽已设有省级医疗机构，但因经济、人才等种种原因，“亦属因陋就简，殊少成效”[1]。此时，携政府开发西北之力，原有的青海省立中山医院、陕西省医院、甘肃的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等，纷纷扩建或修整医院，添购器皿，各方面资源得以较快发展。宁夏省立医院的筹备在 1934 年度“至少由本会协助卫生事业费三万元”[2]后，也得以尽快设置。

附表 2：各省省立医院一览表（1937 年 1 月调查）[3]

省别	医院名称	直属上级机关	成立年月	医师数	护士数	药师数	助产士数	床数	经费数	住院人数	初诊人数	复诊人数
河南	省立医院	民政厅	1934 年改组	10	35	15	12	120	34,735	680	29,387	61,751
湖北	省立医院	武昌市政处	1930	8	5	2	5	64	46,512	966	25,395	563155
甘肃	省立兰州医院	省政府	1936.07	4	5	1	1	52	46,500	660	5,079	9,109
江苏	省立医院	民政厅	1929.07	15	20	3	4	280	81,336	996	11,849	22,592
贵州	省立医院	民政厅	1921	4	16	1	2	30	30,000	254	4,000	9,000
宁夏	省立医院	卫生实验处	1935	4	4	1	1	40		296	6,415	5,589
陕西	省立医院	省政府	1931	12	4	1		120	30,000			
青海	省立中山医院	省政府	1929	2				16	23,760			
江	省立	全省卫	1934.0									

1《经委会推进甘卫生建设》,《开发西北》1934 年第 1 卷第 6 期，第 125 页。
2《西北卫生事业筹备经过报告》《卫生半月刊》1934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56-66 页。
3刘瑞恒：《十年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民国丛书》（第五编）第 69 辑《十年来的中国》，第 430 页。

西	医院	生处	7									

注：表中的经费数、住院人数、初诊与复诊人数均为1936年的统计数字

由附表2可知，至1937年，国民党统治区共有9个省份建立了省级医疗卫生机构，而陕西、青海、宁夏、甘肃四省即列于其中。透过上表数据也可看出，西北四省立医院的医疗条件在当时还是比较差的，但这则恰说明了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的政策倾斜和人力物力鼎助，西北地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建成拥有一定规模和医疗条件的省立医院是困难的。

在地方，西北各省尝试创建县级医疗卫生组织。1934年，西北卫生组“在陕选定三原、华县、榆林三县，协助地方设立西医卫生院各一所。”[1]各卫生院设院长一人，由省卫生实验处委派，“秉持院长之命，综理全院事物，并监督管理其附属机关。”[2]在甘肃，卫生实验处在1936年9月划定皋兰县所属的陈管营等二十村为乡村建设实验区，由卫生实验处主办，选派2名护士（朱国钧、谭瑞秀）参加，组成工作队[3]。工作队还根据西北地区人少地广的实际，以巡回医疗的形式巡回各县，办理防疫救护治疗，为此，卫生实验处专门购置巡回医疗车2辆，到实验区各村开展调查。虽然甘肃省其他地区的县卫生院成立较慢，但在前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到1943年，合计全省共有市县卫生院41所，乡镇卫生所7所。[4]宁夏和青海的县乡卫生院也收到了一定成效。

兽疫防治也得到了发展。为发展西北畜牧业，1935年，国民政府在兰州成立兽医门诊部，采用新的兽医技术给牲畜治病；在甘、宁、青三省先后成立门源、洪广营、临洮、临潭、夏河、湟源、共和、西宁八地的“兽疫防治所”，派人主持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宁夏的孟培元和青海的张逢旭，他们担任两省牲畜兽医工作的顾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5]。

其次，加大省筹力度，借势发展地方卫生事业。长期以来，由于统治者对西北地区疏于治理，西北各灾相乘，百姓生存艰难；更兼战乱，遂生大疫。但因地方经济穷困，再加上新兴的卫生行政归属于警政，各省财政中或根本无专门的卫生行政支出，或数额寥寥。政府开发大西北之后，按照原卫生部颁布的卫生行政大纲规定，在经委会及卫生署的人力、物力支援下，西北各省财政预算中不仅划拨了专门的卫生经费，而且与全国各地相比，占比之高，令人感慨（详见附表3）：

附表3：1931-1936年部分省分卫生行政经费情况（万）[6]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江苏	5.4	5.2	5.2	20.4	24.3	22.9
浙江	10.4	9.8	22.9	23.8	32.9	10.7

1《 陕西省卫生事业概况——二十三年五月至二十四年六月》,《公共卫生月刊》，第635页。
2《陕西三县县卫生院之工作》,《公共卫生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第99-103页。
3《国内要闻：全国经委会推进西北卫生建设》,《海外月刊》1934年第25期，第123-125页。
4《甘肃省政府三年来重要工作报告》，甘肃省政府编印，1944年，第53页，甘肃省图书馆藏。
5齐长庆:《解放前西北防疫处与中央医院西北分院纪实》,《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出版信息不详，第88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卫生部统计室卫生统计图表。转引，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第121-122页。

江西				4.6	23.1	59.9
湖北	34.7	17.3	15.6	19.5	5.7	6.7
湖南	16.7	16.8	15.8	30.0	19.5	13.8
福建						16.1
山西		10.3	8.1	8.1	8.1	
河南		4.1	3.7	3.5	3.5	4.5
河北		0.3	0.3	0.2	0.2	4.8
陕西					31.2	28.1
广西			1.9	6.0	9.3	5.9
云南	1.1	1.2				
贵州		1.5	2.1	2.1	2.9	6.2
甘肃				4.7	5.3	8.3
青海		3.6	3.6	2.5	3.6	3.9
宁夏						7.4
绥远						1.2
察哈尔	2.6		2.6	5.0	5.2	2.4

附表 4：二十五年度各省卫生费占总支出之百分数[1]

省别	岁出总数（元）	卫生费	
		数目（元）	占岁出总数之百分数
江苏省	27,889,938	229,542	0.82
浙江省	28,938,578	106,864	0.37
安徽省	15,422,906	——	
江西省	26,625,295	599,613	2.25
湖北省	19,828,613	67,174	0.34
湖南省	19,882,919	133,588	0.70
山东省	26,735,170	——	
河南省	23,226,244	45,369	0.20
河北省	20,457,445	48,000	0.23
陕西省	15,191,659	281,466	1.85
福建省	19,424,317	161,920	0.83
广东省	34,198,518	——	
广西省	43,736,544	592,106	1.35

1内政部编印：《卫生统计》，1938 年 9 月印，第 24 页。

贵州省	7,030,914	62,248	0.89
甘肃省	5,353,740	83,774	1.56
青海省	1,125,048	39,600	3.52
宁夏省	4,386,623	74,820	1.71
绥远省	3,101,857	12,516	0.40
察哈尔省	3,218,750	24,000	0.75
合计	345,775,078	2,567,600	0.74

对比附表 3、4 可见，从绝对数值上看，西部四省卫生行政经费预算额比不上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也与作为国家卫生建设实验区的江西省相比，相差太多，但若细数省卫生事业经费占比，则不得不承认西北各省的重视度之高：青海省卫生费占该省总支出的 3.52%，为全国之冠，陕西（1.85%）、宁夏（1.71%）、甘肃（1.56%）的卫生投入在全省财政支出的占比，在全国也位居前列。

总之，正是由于西北各地因应中央卫生政策，借势而为，加快投入，才使四省在短短一、二年时间内初步搭建了地方卫生体系，各省的医疗工作、疾病预防、妇婴卫生、兽医工作、农村卫生、卫生教育、环境改善等各项医疗卫生工作，得以渐次展开。

三、西北各省对卫生建设的自觉努力

“自觉”，指自己有所认识而觉悟，是人的内在自我发现、外在创新的自我解放意识。西北各省对政府“开发西北”政策的自觉，不仅表现在他们敢于提出结合自我实际的意见和建议，还表现在能不断激发和开发自我，以求长远发展。

（一）结合地方需求实际，提出西北人对卫生援建方案设计的建议。

1.人、畜两医，不能偏重。在南京国民政府最初的西北卫生计划中，畜牧业经济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援建范围“着重兽医及防疫二问题”[1]。故与姚寻源一道前往西北考察的，有专门的兽医教官爱勃倍克(Prof. Eberberk)；调查团在西北的行动，目的也“重在兽医；将来设施，拟以三分之二的财力，集中于兽医方面，而以三分之一办理普通卫生事业”[2]。这对地广人稀、人畜两疫均难控制的西北来说，难称十分满意。对政府的这种设计，西北人有自己的打算。姚寻源一行到西北时，甘肃省政府即专门派甘肃学院医专教授及其附属医院院长王景槐陪同调查，一方面是“以备译述咨询”，另一方面也是要自我掌握调查结果，“以为将来卫生设施之根据”[3]。可见这是一次“有准备”的陪同。也正因此，在考察活动结束时，甘肃省当局在专门召开的欢送上，适时向当局提出了“此预定原则，是否适合西北实际需要？”的疑问。他说：“西北固然需要兽医，而需要人医则更迫切。就甘宁青三省而论，九百万人中每年死于疾疫符录者约在八万以上。最足惊人者为婴孩死亡率之高……恐世界任何国家之县分死亡率未有高于此者。长此以往，恐西北人民，尽登鬼录；试诘教谁医兽？为谁医兽？！

1《一月来之西北：卫生署注重西北卫生事业》，文萱编：《开发西北》1934 年第 1 卷第 3 期，第 111 页。
2鸣新：《欢送西北卫生事业调查团》，《拓荒》1934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3-5 页。
3鸣新：《欢送西北卫生事业调查团》，《拓荒》1934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3-5 页。

故愚以为在西北现状之下，与其注重兽医，毋宁注重人医！至少人兽两医，应该并重”[1]。

甘肃省政府的努力和建议，得到了经委会的积极回应。西北视察团 1934 年 3 月返回南京后，在其“拟具西北卫生事业实施之各种计划”中，卫生事业的第一步即“协助及举办陕甘两省及西宁之卫生医疗暨兽疫预防事宜”，开始制定实施人、兽两医的卫生援建计划。

2.开发西北应全面，不能因偏远而废。按照经委会的最初设计，西北卫生计划拟定援助经费是三十万元，援建对象是陕西和甘肃两省。对此，甘肃、宁夏、青海等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时贤盛昌开发西北，多主张由陕西作起，以为该省交通较便，容易着手，此实为吾人所万万不敢苟同者！盖惟其不便不易！所以倡开倡发，否则何贵乎开发，又何劳东南人士倡开发耶？！苟俟甘宁青新具备陕西条件，然后再言开发，则恐十数年后，西北版图将另变颜色，即使不变，亦将了无人烟，又何足贵？！”[2]这些话语软中有硬，却极有见地；明言十数年后的“担心”，也击中政府的软肋。在此基础上，甘肃省又向代表细说了甘肃学院医学专修科及其附属医院的优势，而且指明他们正在拟具西北卫生事业计划书，表明以兰州为中心，推广到甘宁青省，会有诸多便利。1934 年 4、5 月间，宋子文赴西北考察，宁夏、青海两省也多方游说，使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最后动心。

由于西北人的努力，在南京国民政府最后的援建中心选定中，西北卫生防疫处被设在甘肃，并指定以该处为依托，向外辐射，“在青海、西宁设立卫生院，分掌各该省及西宁卫生医疗及兽疫预防事务，于必要时次第推广”。[3]另外，青海、西宁两省也被允准设立各省卫生实验处，并获得经委会的援助[4]。

（二）多措并举，培养和训练地方卫生人才。

卫生技术人才是开发西北的核心要素，也是开发中的最大难题。长期以来，西北百姓多为单纯的农民生活，朴茂有余，而知识不足，因而人才匮乏，卫生技术人员更少。现在要救灾恤溺，加快西北建设，培植地方人才就显得尤为迫切。为援建西北卫生建设，经委会与卫生署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向西北各省派驻专家和技术人员[5]。但的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技术人员更少。虽许多人士呼吁到边疆去，或主张移民边疆，但真正实施则难处多多。由上文可知，面对国内上下的“开发西北”热，西北人最担心的也是人才，因而，在培养熟知当地情况的地方人才方面，西北人表现出了最大的自觉。而且，与内地许多省份相比，他们的培养方式是因时就势、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的。

1.开办助产士学校和接生婆培训班，加强妇婴卫生工作。开发西北的一项迫切事项是当地人口增殖问题。“边疆民众智识落后，迷信神道，妇女生产时，将本人及婴儿之生命，置于

1鸣新：《欢送西北卫生事业调查团》，《拓荒》1934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3-5 页。
2鸣新：《欢送西北卫生事业调查团》，《拓荒》1934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3-5 页。
3《西北卫生事项之举办》，《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4 年第 4 期，第 182 页。
4 原本，西北卫生计划拟定援助经费是三十万元，宁青设卫生实验处后，这个经费被增加到四十万元。
51934 年 6 月，姚寻源、赵光钺、陈文贵、马光礼等即抵达兰州，与陕西政府接洽，商议设立省卫生实验处等事宜 。西北防疫处开始筹备之时，技正陈文贵，即率同张祖棻、王荣槐、刘蔚森等 12 人，到甘肃开展筹备工作。卫生署还特派兽医专家 6 人，赴甘从事于调查及防治工作。同时，为稳定这支卫生技术人才队伍，按照经委会的规定，这些人员在西北工作时的薪俸，均由经委会拨付，且额度不菲，此由 1937 年的薪俸预算可见一斑：该年度西北防疫处的 50,000 元支出预算经费中，薪俸费额为 25,800 元。

危险之境地，不独受科学训练之助产人员绝无仅有，即职业化之接生婆亦如凤毛麟角”[1]，因而婴儿死亡率非常之高，有的地方儿童死亡率高达 20%，更有青海贵德一地，儿童死亡率竟占 50%多。产妇生产的风险也很大，即便未死于生产过程，也“比害一次重病还要危险”[2]。因此，西北的助产士、接生婆培训是一项非常现实的任务。卫生援建西北之初，留美妇婴卫生专家杨崇瑞技正即来到西北，指导妇婴人才培训工作。西北地方对该项业务开展给予了积极配合，决定“先由培植人材着手，渐次推及于事业机关之扩展”[3]。除各省设立妇婴医院外，陕西将原来的西京助产学校改名为省立助产学校，原有的学生与新生合班授课，“并改毕业时期为三年，以符部颁法令”[4]。对于接生婆，陕西省同时采用“日授”、“实习”“监视接生”三种形式，多方训练旧式产婆[5]，推广新法接生。甘肃助产学校在房舍还未修建完毕时，培训工作即已开始，他们先筹办产婆训练班，训练旧式产婆，第一期训练的产婆 37 人“均能按时到班受训，情形良好”[6]。1936 年，甘肃助产学校共招生 3 个班，计 28 名学员[7]。总之，在卫生署的协助下，到 1935 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助产学校和助产婆训练班均已成立[8]，他们培养的妇婴保健人才，“当地人士希望甚殷”[9]。可见这种行动在社会产生的效果。

2.开办种痘员训练班，推广疾病预防工作。种痘以预防天花，这是当时全国各省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西北各省更显紧迫。1936 年春，甘肃种痘员训练班先后招收 2 班学员，毕业学员 22 人[10]。青海种痘传习所第一批即招收 46 人[11]。这些学员经过三个月培训后，派至各学校、机关等处工作，“颇受各处欢迎”[12]。1936 年时，青海的西宁、共和、民和、贵德、湟源、乐都、大通、循化等县都已成立了牛痘局[13]。总之，新法种痘在西北取得了较广传播和运用。

3.开办畜牧兽医推广人员训练班，稳固畜牧也发展。兽疫是困扰西北牧区百姓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甘肃、青海、兰州农民的生活来源大都依赖畜牧业，但苦于兽医人才及医疗设备匮乏，“畜类一有病疫，即无法治疗”[14]。1935 年初，甘肃卫生实验处即与西北防疫处、西北畜牧改良场筹备合办畜牧兽医训练班。训练班“在甘、宁、青三省同时招生，汇齐试卷，计录取正取二十名，备取四名，于九月十四日入校”[15]。为突出社会各界对该种培训班的重视，校址设于西北防疫处内，并在 9 月 15 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仪式，“参加者有该省朱主席、

1顾学箕：《边疆妇婴卫生》，《社会卫生》第二卷，第三期，第 16 页。
2顾学箕：《边疆妇婴卫生》，《社会卫生》第二卷，第三期，第 16 页。
3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专员办公处编：《二十五年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之西北建设事业概况》，第 39 页。
4《西北卫生建设之近讯》《新医药刊》1935 年第 28 期，第 126-127 页。
5《西北卫生事项之继续办理》，《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 年第 2 期，第 175 页。
6《西北卫生事项之继续办理》，《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 年第 5 期，第 171-172 页。
7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专员办公处编：《二十五年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之西北建设事业概况》，第 43 页。
8刘瑞恒：《十年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民国丛书》（第五编）第 69 辑 1《十年来的中国》，第 435 页。
9《西北卫生事项之继续办理》，《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 年第 4 期，第 173 页。
10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专员办公处编：《二十五年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之西北建设事业概况》，第 46 页。
11《西北卫生事项之继续办理》，《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 年第 5 期，第 172 页。
12《西北卫生事项之继续办理》，《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 年第 4 期，第 173 页。
13《西北卫生事项之继续办理》，《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6 年第 3 期，第 170 页。
14《一月来之西北：经委会推进甘省卫生建设》，文萱编：《开发西北》1934 年第 1 卷第 6 期，125 页。
15《甘肃省卫生实验处工作概况》，《公共卫生月刊》1935 年第 1 卷第 5 期，第 63-65 页。

省府各厅长、省党委，青海马主席、戴监察使，及各机关领袖四千余人”[1]。可见各界重视之程度。培训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在兰州授课六个月，主讲授兽医与卫生课程，随后赴牧场授课两个月，再实习四个月。1936 年 8 月，第一批学员训练期满，毕业 19 名[2]。青海还根据省情实际，设立巡回医疗队，同时组织兽疫调查团，与西北卫生防疫处合作，分五路调查各地兽疫情况[3]，在实践中增进兽医的各项技能，也促进了西北防疫工作的开展，对稳固牧业经济有促进作用。

另外，在卫生援建过程中，西北各省除与全国各地一样，也在省立医院开办附属护士学校，训练护理人员外，还通过开办各类卫生人才培训班，积累地方人才力量。

总之，西北人充分利用政府援建这一契机，运用正规教育、培训等手段，培养各类人才，强化自我“造血”功能，为西北长远发展培植根基。

（三）多方动员地方人士参与卫生活动，提高卫生普及度。

在政府“开发西北”活动中，西北人的自觉努力还表现采取各种卫生合作手段，充分调动各界人士参与卫生工作，以普遍提升人们的现代卫生理念。在甘肃，1935 年 4 月，省卫生实验处与民教馆合办儿童健康比赛[4]；1935 年 5 月，与社会各界合作举行省卫生运动大会，印发各种宣传品，分散民众，并邀请该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等担任特约演讲；他们还利用各中学校力量，组织宣传队、游艺会等，宣传卫生知识；5 月初，利用兰垣五泉山庙会之期，与社会教育推广处合办演讲会，宣传卫生常识；利用暑期学校放假时间，为学校校员暑期补习班讲授卫生课程，以“补充教育上之卫生学识”[5]。宁夏的卫生教育也与教育厅商妥实施；环境卫生工作“则会同公安局实地办理”[6]，等等。这些合作开办卫生活动的方法，不仅使卫生宣传、教育等事项推进顺利，也扩大了卫生宣传面，同时又使参与者在具体的活动中增长了卫生知识，提高卫生防疫意识，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三、余论

反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政府对西北卫生事业的援建过程，有以下三点值得思考：

其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开发大西北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西北地区民族庞杂，羌藏杂居，风俗信仰各异，语言行动，亦多不同，“平居毫无联络，有事自难团结”[7]；政府之于百姓，“实则除纳税义务外，几与政府不相连属”[8]。但政府的援建活动，用大家都离不开的医疗卫生工作，拉近了西北各民族与汉族技术人员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互助、交流和交融，也稳固和强化了西北这一战略棋子的作用。在卫生建设方面，抗日战争期间，当中央防疫处被日军封锁后，设在兰州的西北防疫分处制造的疫苗、分离的血清发挥了

1《甘肃省卫生实验处工作概况》，《公共卫生月刊》1935 年第 1 卷第 5 期，第 63-65 页。
2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专员办公处编：《二十五年份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之西北建设事业概况》，第 46 页。
3《西北卫生事业之近讯》，《新医药杂志》1935 年第 12 期，第 1081-1082 页。
4《西北卫生事项之继续办理》，《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 年第 4 期，第 173 页。
5《西北卫生建设》，《内政消息》1934 年第 3 期，第 232 页。
6《西北卫生事项之继续办理》，《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5 年第 3 期，第 176 页。
7 郭维屏：《开发西北谭》《新西北》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西安市档案馆编：《民国开发西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第 25 页。
8 张人鉴：《开发西北实业计划》//西安市档案馆编：《民国开发西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第 30 页。

重要作用，有力支援了我国的抗日战争。

其二，西北人的主动因应与自觉努力，促进了西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转型。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过程中，西北人的因应与自觉并非截然二分的。从上文可以看出，他们在因应政府政策中，有着自觉设计；他们的自觉，也是在执行政府政策的过程，结合自我进行的努力。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次开发西北虽因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而一度中断，但由于西北人的因应与自觉，他们在开发西北的过程中体现出了由教育到践行、由被动到主动、由借才到育才的行为特征，才最终实现了西北近代化转型的启动。也正是由于西北人的因应和自觉努力，1943 年国民政府第二次喊出“开发大西北”时，对西北人而言，只是再度注入经费和设法派员问题，因而西北地区的卫生事业虽然各地“成效大有参差”，但总体上都得到了较快发展。

其三，南京国民政府把卫生援建与政治势力渗透相表里，使援建成效大打折扣。开发边疆，需要“真感情、大资金”，更需要“好眼光”，要能因地制宜，着力选择既符合地方特色优势，又能大量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如何开发大西北，宋子文实际早有打算，因为西北之病,不在一端,“西北建设是极大的题目,应该办的事很多”[1],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问题,均需面面顾及,通盘筹划,平衡发展，否则很难真正达到开发之目的。但是，宋子文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估计是虽有所感但无法明言的，即西北各省地方势力与中央的“精诚”合作。西北开发的背后，隐藏着一场政治较量，在当时蒋介石政权内部派系纷轧、军阀盘踞的现实面前，西北各省首脑对政府的经费投入和人才输送自然热诚欢迎，但对中央在地方插入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则另有盘算，因而对政府政策的“因应”力度各有差异。就卫生而论，甘肃省在这场卫生建设中表现最为活跃，除却其他原因外，与军人出身的朱绍良第一次主政甘肃不无关系：面对蒋介石的“信任”，环视甘肃省内外诸路军阀的情况，他一方面用拉拢或震慑等手段，逐步使省内其他势力顺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政府援建行动，将其势力向基层延伸，笼络地方士绅，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因应政府卫生建设的积极性高，执行力度相对较强。而其他省份则难言心口合一；青海、宁夏与中央的卫生合作，尽管有推推搡搡之嫌，却仍能按原计划进行；而在西北重镇、援建中心之陕西，杨虎城将军却不愿意看到中央势力过多渗透，因而先是“以陕西省情形稍有特殊，对于原有各卫生机关之统辖，尚待商榷讨论”为由，延缓了陕西省卫生实验处的成立[2]，后又在 1935 年 5 月，规定自 7 月 1 日起，脱离西北卫生组的领导，“将各协办之卫生机关，完全交由陕省政府接办，经济委员会仍协助技术人员之一部分”[3]。杨虎城要的是技术人员和经费，不要行政支配。他对蒋介石的戒备之心，可见一斑。所以，当一种援助政策不是真心为百姓谋福利，而是带有深深的政治动机时，其成效必然会打折扣。

1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秦孝仪：《革命文献》（第 88 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 年版，第 103 页。
2姚寻源：《西北卫生事业筹备经过报告》,《卫生半月刊》1934 年第 1 卷第 4 期，第 56-66 页。
3《陕西省卫生事业概况——二十三年五月至二十四年六月》,《公共卫生月刊》，第 635 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探析

李贵兵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吸纳是政治系统对外在政治资源诸如政治组织、政治思想、专门人才、政策建议等进行吸收的一种主动行为，政治吸纳在方向上是自上而下的具有自主性的政治行为。[1]目前国内关于政治吸纳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以及党和政府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吸纳的视角来进行的，缺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延安知识分子的政治吸纳的相关研究[1]。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的对大批汇聚延安的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吸纳，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有必要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理论与实践。

一、抗战时期中共对延安知识分子政治吸纳的外在压力

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指出：“系统要加强自己的成员的支持态度，由此出发来处理反馈反应，就要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具有足够智慧和教养的人们吸收到当局者的位置上来。”[2]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有一定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历来都是各类政权积极争取的对象。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当时国内的其他党派在同中国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3]这在客观上对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后来也成为中共积极吸纳知识分子的重要动力。

（一）国民党对知识分子的积极吸纳

国民党在对知识分子的吸纳方面相比中共优势明显。“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阵营，都在号召抗日，爱国的青少年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哪个阵营。当时国民党大，共产党小；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近在身边，共产党远在陕北。”[4]国民党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国民政府有比较完备的教育体系，能够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颁布了《考试院组织法》《公务员任用法》《文官官等条例》等法律法规，设置了考试院负责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工作。1932 年 11 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积极拉拢当时社会上有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傅斯年等均在其列。“九一八”事变后抗战救亡的大背景之下，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以往特别注意与政府保持距离以保持自身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也选择了与政府合作，他们认为国难当头，“此时中国政治

1 国内关于政治吸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从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谈政治吸纳，包括政治吸纳的功能运行模式与运行机制（如常欣欣，2010；肖存良，2014；王华华，2018），政治吸纳与执政地位（如唐睿，2017），政治吸纳与基层党组织建设（舒全峰、王军，2017），政治吸纳与社会组织（如王华华，2017；郭道久，2017；肖存良，2019），政治吸纳与边疆治理（如袁明旭，2014）。（2）分析党和政府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政治吸纳，包括先富群体（如郎友兴，2009），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主）群体（如黄金辉等，2017），新社会阶层人士（如冯海波，2016），海外留学人员（金更兴，2017），城市边缘群体（王华华，2017），自由职业者（张洪松，2019），科技工作者（梁红军，2020）。（3）民国时期的政治吸纳，包括政治吸纳与北洋政府宪政（章永乐，2012），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吴锦旗，2019）。

要离了国民党便没有政府”，“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5]翁文灏、蒋廷黻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书，胡适出任驻华盛顿的大使，其他人也在重庆任职。[6]。1939 年 11 月，有着“政学两栖背景”的朱家骅接替 CC 系干将张厉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担任组织部长后，积极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推进校园，因其在知识界朋友众多，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7]在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吸收方面，1938 年 4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的决定，三青团积极利用青年知识分子的抗战爱国热情，采用欺骗、威胁、利诱、举办夏令营和冬令营等方式大量吸收大中学生入团。据统计，三青团中的学生人数从 1939 年的 7200 人，约占团员总数的 8.1%，增加到 1946 年的 61.5 万人，约占团员总数的 46%[1]。三青团还积极在海外进行拓展，并在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地的华侨中发展团员建立团队。同时，国民党还积极迫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等青年组织，1938 年 9 月，当时兼任三青团团长的蒋介石签署了限期归并青年救国团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手令，强行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青年组织。

（二）国内其他党派对知识分子的积极吸纳

当时国内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党派，包括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学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也在积极吸纳知识分子。这些党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些党派的领袖如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本身就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因而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加入。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党派或与共产党有联系，或与国民党有联系，或与国共两党都有联系。抗战时期，全国的党派之间暂时搁置了相互之间的分歧，以期集中力量共同抗日。1941 年，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党派还联合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这些受到当时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如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的影响而成立的党派，他们在核心政治主张上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本质不同，他们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改造中国，而在于如何改造中国。这其中的一些党派无意参与争夺国家政权，这些党派的领袖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相比之下，称他们为“思想家”或者“评论者”似乎更贴切，他们更多的是想为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出路，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比如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梁漱溟在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中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六种革命观点，指出“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早掩盖了其他问题”。[8]他认为中国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苏俄道路，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乡村建设。还有个别党派如中国青年党一直是持反共态度的，其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见国际共产主义，因有党的组织，在国内外皆得青年知识分子暗中趋赴，如不及早起而与之对抗，将令史太林的赤化中国诡计更易成功”。[9]156 中国青年党将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其主要发展对象，在高校中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到 1948 年，中国青年党共有党员 30 万人，[10]其中主

1 数据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干事会工作报告》，第 158 页。转引自马烈.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统区学生运动[J].民国档案，2003（3）：81-86.

要是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国国家社会党同样也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抗战爆发初期，其党魁张君劢在该党党刊《再生》上公开发文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党派中的大部分还成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专门负责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发展自己的组织成员。因此，这些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吸纳在客观上还是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股的压力。

（三）汪伪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吸纳

1940 年，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与重庆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名义上接管了原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的辖地，一度与国统区、解放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汪伪政权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一方面严厉打击沦陷区内的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拉拢知识分子尤其是学校的师生。一是积极拉拢知识分子“落水”担任伪职。北大教授周作人担任了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褚民谊担任了汪伪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上海神州大学诸青来先后担任了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二是成立新的高校和接收沦陷区内的高校。1940 年汪伪政权成立了伪中央大学，“为吸引学生，学校对正式录取的学生，一律免收学费、杂费和住宿费，教育学院和农学院、农业专修科学生还免收膳食费，其他院系学生每月补助膳费 7 元，对试读生、旁听生和特别生也免收学费和杂费。学校还设有甲、乙、丙等奖学金。”[11]同时，汪伪政权还接收了当时未迁入到后方而留在沦陷区办学的高校，并通过各种方式吸收这些高校中的知识分子担任伪职，如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在担任院长的同时还兼任了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汪伪财政部中央储蓄监理委员会监理事等职。三是成立了中央青年干部学校等伪干部训练机构。1943 年 2 月，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并在武汉建立分校，积极拉拢青年进入学校学习，为伪政权培养青年干部。

二、抗战时期中共对延安知识分子政治吸纳的现实基础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中共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深入批判，中共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了积极转变，再次关注并积极吸纳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形成了对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初步认同。这些都为中共对延安知识分子的政治吸纳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积极转变

1928 年中共六大召开，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但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错误的认为革命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12]，将广大知识分子排除革命队伍在外。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认为除了工农和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外，其他阶级和阶层都是革命的对象。这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让中共的革命工作蒙受了损失。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1935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要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把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首要任务，并要求纠正共产国际

六大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呼吁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并开会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相关问题，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1935 年 11 月，张浩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明确指出“革命的智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13]，“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14]。同时会议还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问题，认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14]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形成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局面，加上中共自身面临的人才匮乏困境，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或自发或在中共的组织下来到延安。面对大量涌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指示凡是“革命青年”就来者不拒。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交际处负责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后的接待安置工作，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所需全部由边区政府解决，每个月有生活津贴，还有稿费、课时费等收入来源，部分知识分子还安排了警卫员。当然，此时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策略性的，还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进行的，还不完全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关门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受关门主义影响，似乎也还未想到接受大批知识青年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重要性。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安吴青训班，一批一批地接待学生，三个月毕业，又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像是办‘流水席’。当时一批先进的学生向共产党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却被挡在门外‘十万八千里’”[4]。但是这些转变为后来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吸纳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

随着知识分子的大量涌入，该如何从政治上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渐渐被提上议程，能不能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如果能，又该怎样吸收？1938 年 3 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要“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15]。1939 年 12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深刻分析了中共党内轻视、怀疑、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根源，指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3]同时他又强调应当对知识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3]，最终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从根本上否定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为中共积极吸纳知识分子的实践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民族危机之下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认同

由于个人经历不同，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形成了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的认同，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中国共产党可以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列宁特别强调：“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6]这种认同为之后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吸纳奠定了基础。

1.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感召所形成的认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东三省，1932 年淞沪战争爆发，1935 年又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消极抗日，遵循“攘外必先安内”的路线，残酷镇压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发的要求政府抗日的爱国行为，引发了这一群体的强烈不满。与此相反，1935 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5 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批判了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中共积极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中共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的认同。当刘少奇同志询问一位青年来延安的原因时，他回答说：“我听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抗日救国最坚决、最正确，为抗日救国，我就来这里了。”[17]

2.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所形成的认同

一个党要获得全社会的认同，仅仅有鲜明的纲领与政策主张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富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他们的言行是其纲领与政策主张的具体化。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但凡接触到中共领导人的，无不为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个人魅力所折服。首先，中共的领导人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很多人在回忆录中都写到毛泽东经常穿着一身打补丁的衣服，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也写到：“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18]没有任何人搞特殊。其次，中共的领导人平易近人，礼贤下士。1936 年，丁玲初到陕北，当时党的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晚会，让丁玲感动不已；面对桀骜不驯的萧军的拒绝，毛泽东竟然亲自登门拜访，让萧军很是感动。最后，中共的领导人有知识、有教养。中共本身就是由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创立的，其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其中一些还有国外留学背景，他们举止谈吐斯文儒雅，给知识分子一种同类人的亲近感。政党领导人的形象代表的是一个政党的形象，知识分子透过中共领导人身上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感受到了一个中共的独特魅力，促使他们由对中共领导人的亲近和认同转化为对中共的亲近和认同。

3.基于“场”的感染所形成的认同

延安地处偏远的陕北，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普通人眼中的不毛之地在一些知识分子心中却是革命圣地。当穿过敌人的封锁看到根据地手持红缨枪的妇女儿童时，“东北籍画家张仃

忍不住扑在黄土地上打几个滚，高唱起《国际歌》”。[19]“一位来自四川的教师激动地伏到地上亲吻泥土，兴奋地高喊着：‘啊，自由的土地，我来了！我属于你了！’”[20]而初到延安的他们发现在延安人们之间互相称呼“同志”，“同志”这个称呼在当时是革命的代名词，标志的身份是革命者，而当他们也被叫作“同志”时，那种归属感、自豪感会不自觉的激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同志”这一称呼可以化解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焦虑，并为后面向真正的革命者过渡亦即阶级身份的重构提供积极暗示。随着称呼改变的还有自己的姓名，当时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还流行改名字，改名字“意味着改头换面，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是与过去决裂，是迎接新的生活的开始”[19]，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重构。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延安这个革命圣地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富有感染力和塑造力的时空环境——“场”，几乎每一个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这个“场”的感染，这种感染从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的变化一直延伸到精神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最终让他们形成了对于中共的认同。

三、抗战时期中共对延安知识分子政治吸纳的实践进路

政治吸纳的主体是政治系统，吸纳的方向看是政治系统从外部吸纳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因而是一种由外向内、从上到下的行为，带有一定的主动性。为了实现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吸纳，中共首先从政治上界定了知识分子的属性和作用，并对他们进行了充分的教育改造，然后在党内及其领导的政府、军队和其他组织中大量使用知识分子，积极将知识分子吸纳到中共的组织中来，在壮大自身力量的同时，增强了知识分子对党的归属感，重构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身份，最后通过“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与“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的方式缓解了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实现了新老干部之间的有机融合，最终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吸纳。

（一）政治上重新定性与思想上教育改造

认为知识分子是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等剥削阶级服务的观点在当时中共内部还比较普遍，一些人对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是存在顾虑甚至反对的，因此，如何从政治上对知识分子进行定性是中共实现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对此，毛泽东指出要“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要“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3]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些人是拥护革命的，是可以和工农一起并肩战斗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也强调“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不正确的”，“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21]因此，将知识分子吸纳到革命队伍中来是在政治上完全正确的。

与此同时，中共清醒的意识到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无产阶级化，于是，中共积极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文艺座谈会后艾青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前线，毛泽东回信给他说目前还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

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22]中共通过在学校开设政治理论课等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灌输到知识分子中去。“当时，学习马列主义，对一般学员来说是新鲜事，有的虽然入了党，但还没有正式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学习，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启蒙教育”。[23]这种理论学习对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有了精神支柱，眼界开阔了，目标明确了，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而且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推翻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24]1938 年，延安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院，专门负责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以供学习之用。通过理论学习武装头脑，深化了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帮助他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组织上积极吸纳与工作上大胆任用

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同时，中共通过在工作上充分信任并大胆使用的方式，积极将知识分子吸纳进自身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人民军队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之中。1939 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3]据统计，抗大第 4 期于 1938 年 4 月开学，招收的 5562 名学员中有知识青年党员 530 人，占总人数的 11%，到 12 月结业时，知识青年党员已经发展到 3304 人，占总人数的 70%。陕北公学从 1937 年至 1938 年共招收学生 6000 多名，发展的新党员有 3000 多名。延安各学校发展的党员在结业后大多被派往全国各地，成为各地党组织的骨干力量。[25]在中共的领导之下，延安还先后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成立了“文协”、“剧协”等等文艺团体，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历史研究会、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成立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十余所学校，有效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学习问题。在工作上大胆任用知识分子，一批知识分子进入到中共领导的政府机关中工作，鲁之俊、金茂岳等等一批知识分子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赵一峰担任了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局局长一职。

这种组织吸纳和大胆使用对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转变或者身份重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来到延安之后，他们之前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等构筑的共同体消失了，他们基于这些共同体所建构的身份也随之消失了，他们需要通过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与新的环境建立联系。身份是区分我者和他者的重要标志，通过被吸纳进中共及其领导的各类组织机构，他们也成为组织中的一份子，这样这些知识分子身份不再是或者不仅仅再是一个学者、学生，更是一个革命者，他们与中共之间不再是“我们”和“他们”，而变成“我们”的关系。同时，通过对知识分子的积极吸纳，进一步向外界展示了中共这一组织的开放性、包容性，增强了其吸引力。

（三）“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与“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

随着大量的知识分子补充到中共党政军的各个部门，干部队伍的结构从主要由工农干部

变成由工农干部（老干部）和抗日战争时期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干部（新干部）两部分组成，到 1940 年，中下级干部当中，百分之八十五是新干部，在中级干部中，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21]新干部的加入在充实干部队伍的同时也产生了新老干部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新老双方互相瞧不起，老干部“总是说，你才参加革命几天，有什么了不起，我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而新干部将老干部看成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土包子”，[21]文艺界也出现了“亭子间”和“山顶上”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能否处理好，不仅关系到党内的团结，更关系到此前中共的政治分子政治吸纳工作能否持续的问题，关系到革命事业发展的大局。如果处理不好，将直接阻塞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向中国共产党流动的渠道，导致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信心，进而影响整个革命事业的成功。

从新老干部之间的“口水战”中可以窥见，二者虽各有优势，但又都是一种单向度的优势，这一单向度的优势又产生了单向度优越的心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采取了“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与“知识分子的群众化”的办法。

1.“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

强调工农干部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要求老干部加强学习。1939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上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26]。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将党员干部学习知识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强调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文化的提高，要提高政治水平是不可能的”，“干部没有文化，没有知识，革命是革不成功的”。[21]根据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对各级行政领导干部职责作了明确的要求，同时聘请延安相关学校的教师担任干部学习的教员。这相当于是间接代表老干部们承认他们与知识分子新干部之间在知识上的差距，并且需要向他们学习。但是与此同时，又强调老干部是党的骨干，“老干部……具备新干部所缺乏或没有的东西——政治的坚定性与对革命的忠诚性”，[27]在政治上对老干部给予了最高的肯定。在职务安排上，党政方面地委书记、专员以上等中上级干部都是老干部，除山东及华中等新建立的部队外，军队中的“中级干部主要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21]。知识分子新干部主要是被充实到基层，且主要从事宣传教育、文字秘书等方面的工作。

2.“知识分子的群众化”

“知识分子新干部读书多，会说会写”，[21]大量知识分子被补充到党政军的各个部门。同时又强调知识分子新干部缺乏革命实践，缺乏党的生活锻炼，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邓发认为知识分子至少要参加两到三年的劳动才能算是工人[28]。这实际上是说知识分子虽然有自身的优势，但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革命者还必须重构自己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1939 年 5 月，毛泽东在撰文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3]理论学习所获得的仅仅是一种符号性的话语，“私有制”“阶级”“剥削”等话语只有落到的现实的中国社会中才能真正为人所理解，因为“学者是在图书馆内了解思想而不是在实际环境中。

书本向研究者展现了他无法直接接触的环境，因此书本就创造了一种错误的参与感，这是一种分享了他人生活却无需知晓甘苦的幻觉。”[29]通过让知识分子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把他们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符号化的革命信仰具象化，给他们一种的强烈的“在场感”，让他们真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价值追求与社会现实的契合性，感受到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和说服力。介入政治生活要求参与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习性，通过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习性得到塑造，重构了他们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让他们成为有理论指导、有价值信仰的政治行动者，他们不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进行政治活动，成为一支强大的文化军队。

由此，中共“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3]。这一过程中中共对于双方都采取了一扬一抑的策略，既突出优点，又强调缺点，更强调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和一致性，让双方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磨合，逐渐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有效缓解了二者之间的矛盾，避免了两股力量之间的相互消耗，保持了整个政治系统的稳定，增强了政治系统的功能。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为治国理政进行预演的时期。[30]中共在抗日时期对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工作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工作尤其是人才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做好知识分子工作，要深刻理解“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做好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工作。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坚持党管人才，“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31]，构建人才发展治理体系框架，实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和人才安全。

参考文献：

[1]吴锦旗：《南京国民政府对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机制研究》，《学术探索》，2019 年第 1 期。

[2]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23 页。

[3]《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59-620 页。

[4]王仲方：《沸腾的古城 我心中的延安》，任文：《我要去延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年，第 10、12 页。

[5]孟真：《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1932 年 6 月 19 日，第 5 号。

[6]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 年》（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68 页。

[7]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事业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242-243 页。

[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325 页。

[9]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 年，第 156 页。

[10]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307 页。

[11]曹必宏：《汪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央大学》，《钟山风雨》，2005 年第 5 期。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300 页。

[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665 页。

[14]《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72、77 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466-467 页。

[16]《列宁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255 页。

[17]平浪：《难忘的征程》，任文：《我要去延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年，第 68 页。

[1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14 页。

[19]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5、46 页。

[20]艾克恩：《延安文艺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52 页。

[21]《陈云文选》（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77-178、180-181、212 页。

[22]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66 页。

[2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第 391 页。

[24]吴介民：《我的一段风雨历程》，任文：《我要去延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年，第 101 页。

[2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 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507-508 页。

[26]《毛泽东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77-178 页。

[27]《李富春选集》，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年，第 25 页。

[28]邓发：《知识份子做工多久才算工人？》，《中国青年》，1940 年 11 月。

[29]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23-224 页。

[30]石仲泉:《中共百年视阈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 年第 1 期。

[3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3 页。

作者简介：李贵兵（1987-）男，安徽宣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党史与党建研究。
通讯联系人 E-mail：903091377@qq.com，电话：18111537520

抗战时期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的塑造与诠释

王龙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简介：王龙，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梅南路 5800 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公寓 1 号楼 522 室；邮编：200241

电话：17393163918　　邮箱：tmsszty@163.com

“党性”是中共建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其最早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建党学说。虽然“党性”一词最早是由恩格斯和马克思提出的，其强调的是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学说都具有阶级性观点，即“党性”亦体现出政党的“阶级立场”。[1]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对“党性”概念作出定义。列宁基于马恩对“党性”概念认知的基础上，认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2]而依据列宁相关论著可知：列宁所强调的“党性”，意指一个政党固有的阶级属性，即党性具有阶级性的特征。[3]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党性”概念引入党内教育之中。此后，“加强党性”成为中共加强自我建设，保持干部队伍纯洁性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共党建理论中特有的政治概念。学界现有研究对“党性”概念的研究多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党性”概念的讨论，鲜有学者从中共的视角对“党性”概念的阶段性变化进行深入研究。[4]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中共文献中“党性”概念表述的梳理，从动态视角来考察抗战时期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生成逻辑与内涵变化，进一步准确把握中共在革命实践中，是如何对“党性”概念进行塑造与诠释的。

一、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生成的历史背景

概念史认为：“一个概念也系于一个词语，但与此同时，它又不仅仅是一个词语：一旦一种丰富的、事关意义和经验的政治 - 社会语境——正是这种语境中，一个词语才得以被使用——进入到一个词语，那么这个词语就变成了一个概念。”[5]换言之，不同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赋予不同的政治内涵与历史语义，其所具备的概念语用功能亦不尽相同。亦有论者指出：考察词语概念演进的历史，是链接文本、语言原始材料与政治、社会现实的关节。

1 王大发、张国祥 等著：《党性教育学新论》，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 页。

2 《列宁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73 页。

3 参见时玉柱：《论列宁的党性观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 1 期。

4 学界关于“党性”概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牛玉山：《党性、党性原则与党性锻炼》；《社会科学》1986 年第 3 期；谢启庆：《关于党性概念的几种观点》，《党校科研信息》1991 年第 16 期；刘险峰：《应重新界定党性的含义》，《长白学刊》1993 年第 2 期；李冉、邹汉阳：《党性、人民性的话语起源于行动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 5 期；牛安生：《党性概念的传统内涵及现实思考》，《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 年第 8 卷第 4 期；龚少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性概念的再认识》，《社会主义研究》2016 年第 4 期；李永杰、王凤：《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性概念的百年建构》，《兰州学刊》2021 年第 5 期。

5 [英]伊安·汉普歇尔 ·蒙克著，《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36 页。

[1] 从这个意义而言，理解“党性”概念的历史演进，应将其置于具体历史语境当中。随着中共革命实践的需要，“党性”概念被引入到党内教育当中。因此，在中共的历史文献中，“党性”概念往往是在开展党内教育时被运用的，其内涵与党内教育面临的具体问题又关系密切；依据不同阶段党内教育的内容不同，“党性”概念的具体内涵亦发生改变。换言之，考察中共对“党性”概念的内涵认知亦能反映其加强党内教育的主题与策略。

中共成立之初，其建党理论并不成熟，也未能对“党性”概念作出具体诠释。至全面抗战时期，一方面由于中共在党员发展中出现片面追求数目字现象，导致党内部分党员干部纪律性不强、组织涣散；甚至出现逃跑、叛党等恶性事件。另一方面，随着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中共迎来了党内整顿的时机。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凝聚党的组织力，巩固党的权威成为中共加强党建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外，这一时期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运用更加娴熟，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想。[2]综合上述因素，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的部分概念进行重新塑造与诠释，“党性”概念便是其中之一。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共提出了“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方针。与之相对的是，国民党主张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组织了多次对中共的围剿。1934 年 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主力红军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战略转移。1935 年 10 月，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3]随后中共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中共 13 年的延安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共完成自我建设的重要阶段，其一系列革命理论也成熟于该时期。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同胞倡议：“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要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中共提出团结抗战的各项政策，并建立和依靠抗战联合阵线；同时积极呼吁“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4]在中共的号召之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其时中共急需在各地建立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培养干部，以领导群众抗日运动。加之，长征后中共党员人数锐减，组织力量十分薄弱，“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5]

鉴于此，1938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下发《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指出：“把发展党员成为每一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6]短时间内中共各地的党组织得到了极大扩充，党员数量从 4 万人增加至 80 万人。[7]党员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充实和完善了党组织，壮大了革命队伍；

---

1 Reinhart Koselleck，“Begriffsgechichtliche Probleme der Verfassungsgeschichts-scheribung”，in：Helmut Quaritsch （Red），Gegenstand und Begriffe der Verfassungsgeshreibung，Berlin：Duncker&Humblot，1983,S.（7-46）45.

2 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3 参见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4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8 页。

5 冯文彬等：《中国共产党建设全书 1921-1991》 第 4 卷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2 页。

6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467—468 页。

7 房成祥主编：《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 页。

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1]这种单纯“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的发展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党员质量的良莠不齐。因此，中共中央特别指出：“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使得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2]

此外，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在中共党内出现了各种错误的思想认识。1939 年，毛泽东分析当时党内存在问题时，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与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3]因此，这一时期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与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发事变，而在可能的突发事变中，不使党与群众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4]如何克服党内“对日投降”“国内分裂”和“思想倒退”的倾向，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最迫切的任务。[5]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成为中共极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如何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建设？中共认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使党员认识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民族统一战争与阶级斗争、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正确关系。”[6]而要加强对党内党员干部的教育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概念进行解释，以便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事实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必须解决的问题。”[7]因此，在党员干部教育理论中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中的理论概念、政治术语使之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也是中共党建工作之一。有鉴于此，中共对建党理论中的诸多概念术语进行了重新诠释与运用，其中“党性”概念亦成为被诠释的对象之一。

二、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的塑造与诠释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8]面对革命形势，毛指出：“只有打倒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

1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80 页。
2 《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5 页。
3 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 年第 1 页。
4 毛泽东：《发刊词》，第 1 页。
5 毛泽东：《发刊词》，第 1 页。
6 《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65 页。
7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0 页。

不完全。”[1]不难看出，毛泽东这里强调“党性”是指：党员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紧接着，毛泽东指出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周围的环境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而“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2]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党性”具体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论述的，其意图在于纠正个别党员干部的思想方法，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态度认识现实问题。

在中共党内，刘少奇多次对“党性”做出过系统论述。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论者单引《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一书中刘少奇论述“党性”的内容，而往往忽视了其对“党性”概念诠释的原始文本。“而概念史研究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前提和特定目的”；[3]其更注重对文本生成与历史语境的考辨。通过对原始文本的梳理分析，其时刘少奇对“党性”概念的论述涉及共产党员的美德、利益观、个人作风、本位主义、家长制作风、对待群众态度等话题，且均系其在党员干部教育会议上的发言。具体而言刘少奇对“党性”概念的诠释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刘少奇指出：“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党性，无产阶级的党性等。”[4]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5]。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要具备无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进步特性。对每个党员而言，需要对照这一切特性来实现自我改造，从而使自己具备这一切的优良的特性。依照刘的观点，这样才是对党员本质的改造。[6]可见，刘少奇是站在阶级立场上对党性进行解释的。在他看来，党员的党性来源于政党的阶级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表现。同时，他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要具备无产阶级的进步性，不断锻炼、改造自己，使之具备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

二是“党性”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刘少奇认为一个党员，在任何条件下、任何问题上，都应将党的利益放在首位，个人问题、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每个党员在思想意识中应该坚强的建立这个观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7]此外，共产党员不能违背“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服从党的利益”这个原则；“而共产党的党性，也特别表现在对这个原则的完全执行上”。[8]依据刘少奇的表述，“党性”概念中包含了个人的利益观，而共产党员所具备“党性”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否将党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

---

1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8 页。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第 9 页。
3 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年版，第 22 页。
4 刘少奇：《人的阶级性》，《真理》1941 年第 2 期，第 52 页。
5 刘少奇：《人的阶级性》，《真理》，第 52 页。
6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5 页。
7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1939 年第 82 期，第 14 页。
8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第 14 页。

三是“党性”是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为纠正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促使党员服从、尊重党和组织，抵制党内无原则纠纷与不团结的倾向。1941 年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讲演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只表现在他最高的最明确的原则上，而且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上。”[1]他接着进一步论到：“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尊重组织的绝对性上，表现在对一切党员党的组织，对于党的一切决议、命令、文件，对于党的一切东西尊重、执行与爱护上。”[2]在刘少奇看来，考察一个党员干部是否具备“党性”，其先决条件是对党的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在党内特别要注重个人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培养。

四是“党性”是一种思想品质。对中共党员来讲这种思想品质包括：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勇于对党内党外各种错误倾向开展斗争。刘少奇坦言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对于党内一切缺点与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上。并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他对革命群众的无条件的帮助及亲密的联系上，另一方面又表现在他对异己分子及其他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区别之严格性上。”[3]此外，刘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不独表现在对党外的敌人有坚决顽强的斗争性上，而且表现在对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各种错误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有不调和的斗争性上。”[4]

综上，依据刘少奇对“党性”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阶级立场、党的利益、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良好的思想品质构成了刘少奇“党性”概念的主要意涵。事实上，这些要素可将其归属于党员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范畴。与毛泽东“党性”概念相比，刘对“党性”概念的诠释更聚焦于党员个人思想品质，更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侧重于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的内在规定性。

实际上，中共对“党性”概念的内涵诠释，不单局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中共其他理论工作者亦对“党性”做出过解释。1942 年，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在《什么是党性》一文中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态度就是党性，没有这种科学态度，就是没有党性”。[5]杨氏的论述是引用毛泽东关于“党性”的解释，与毛强调的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同时杨献珍认为：“少奇同志所阐释的‘党性’，是从共产党员的品德方面来说的。”[6]而毛泽东“又从思想方法方面来阐释党性，把思想方法提高到党性标准上来，认为主观主义就是没有党性，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标准”。[7]杨献珍的分析和定位是准确的。

三、中共话语体系中“人性”、“党性”、“个性”的辩证关系

1941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提出在全

1 刘少奇：《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真理》1941 年第 3 期，第 20 页。
2 刘少奇：《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真理》，第 22 页。
3 刘少奇：《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真理》，第 23 页。
4 刘少奇：《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真理》，第 23 页。
5 杨献珍：《论党性》，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 页。
6 杨献珍：《论党性》，第 138 页。
7 杨献珍：《论党性》，第 139 页。

党开展“增强党性运动”。[1]此举引发了国内诸多人士的关注。1944 年中外记者赴延安视察后，针对中共“增强党性”运动，有人在《大公报》上撰文指出：“所谓增强党性，相对就是减弱个性，以至消灭个性，是要党性支配一切，主持一切。民主政治植基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精义，剥茧抽丝，其核心是尊重个人，尊重个性。……民主是尊重人性的，坦率一句话，与其增强党性，何如增强人性。”[2]同时亦有论者抨击中共“增强党性运动”，并认为其增强党性无疑是增强党的权威和主张，而“所谓党的权威，党的主张是毛泽东的权威和主张，党就是毛泽东的化身，实实在在是毛泽东支配着‘党’。党高于一切是毛泽东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是一切服从毛泽东。增强党性运动是增强毛泽东集中统治威信的运动”。[3]该文作者亦认为增强党性固然是消失了个人的‘人性’，更重要的是降低了‘民族性’。[4]

面对国内舆论的质疑与抨击，中共又一次对“党性”概念进行了诠释，不过这次是聚焦“人性”“个性”与“党性”三者的辩证关系。1945 年 4 月，毛泽东指出：“有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了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5]紧接着，毛论述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而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重的。”[6]在毛泽东看来，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人的个性独立的前提。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首要任务是打败侵略者，实现民族独立；而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广大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只有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才能获得个性解放。

此外，毛泽东又从哲学层面阐述了“个性”与“党性”的关系。其指出：“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7]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党性与个性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强调党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个性，凸显个性是彰显党性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毛泽东的诠释中“个性”与“党性”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因此，其指出在中共的革命实践中任何一项“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8]而要实现“党性”与“个性”的相统一，其前提是实现民族

1 《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共产党人》1941 年第 19 期，第 1 页。
2 《延安视察感想》，《大公报》1944 年 8 月 5 日，第 2 版。
3《关于中共的“增强党性运动”》，《新潮》，1945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16 页。
4《关于中共的“增强党性运动”》，《新潮》，第 16 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1 页。
6《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36 页。
7《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40—341 页。
8《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384 页。

解放和国家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论述“个性”与“党性”的关系后，中共其他理论家也积极诠释这一关系，并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建构起了“党性”概念话语。特别是将“人性”引入到“党性”“个性”的关系当中，这一变化使得中共对“党性”概念内涵的诠释更加丰富。1944年7月，陈伯达在《新华日报》发表名为《人性·党性·个性》一文，以此来反击国内舆论对中共党性运动的抨击。该文对“人性”、“党性”与“个性”三者关系作了详细阐释。

首先，陈氏认为：“人性是社会的，历史的东西”，“人性”包括“善”与“恶”两个方面。而不同时代的人对“人性”的善恶的认知不尽相同。析其原因，是由于“每一个社会阶级都站在自己的角落来看人性的差别”。因而，地主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对“人性”的认知亦有所区别。因此，“人性与阶级性一致，各种人性观的矛盾，反映各种阶级性和阶级观的矛盾”。在他看来，人性是历史的，人性的善恶也是历史的，而“无产阶级的人性，就是有历史以来最善良，最优秀的人性，因为，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代表历史最前进的革命的阶级”。[1]

其次，陈指出：“党性是与阶级性是一致的党性，同时党性又是阶级性集中的东西，党性是集中的阶级性”，一个阶级不存在了“那么党性也就不存在了，党性也是历史的东西，社会的东西”；而无产阶级不隐瞒自己的党性，“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利益是整个人类解放的利益，是和人类大多数利益相一致的利益”。[2]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关于无产阶级最大的利益，其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利益，“党性”的体现与其阶级立场密不可分，即“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反映。

最后，陈伯达强调“承认阶级性和党性的存在，并不是否认个性的存在”，“任何人的个性，在阶级社会中，都是有一定的阶级性的个性。……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个性的多样性”。虽然人们的个性有所差异，但是“中国共产党党性是党的一切优美个性的统一体、集合体。作为共产党员的个性，只能以党性为基础，……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在革命的锻炼中，放弃自己与党不合的、反动的旧个性，创造与党性相合的、革命的新个性”。因此，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个性，必须与党一致，必须在党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自己的多才多能”。[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段中共对“人性”“党性”“个性”三者的关系做了具体论证分析。概而言之，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党性”与“人性”“个性”并不是相悖而存在的，而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即实现人性的解放、个性独立，其前提是推翻压迫，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要完成上述任务，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而“坚持党性”是中共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完成革命、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条件。而在中共的诠释逻辑中，人的个性与人性是依附于党性之上的。可见，相较之前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对“党性”概念的诠释，通过这次诠释使得“党性”概念内涵愈加丰富、完整。

1 陈伯达：《人性·党性·个性》，《新华日报》1944年7月22日，第4版。
2 陈伯达：《人性·党性·个性》，第4版。
3 陈伯达：《人性·党性·个性》，第4版。

四、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的内涵表征

纵观抗战时期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无论是强调党员个人思想方法的改造，还是注重组织、纪律、品性道德的锻造，其出发点都是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保持中共革命队伍的纯洁性，进而为加强党的建设。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概念既然成为了历史的载体，那么对概念内含的考察自然也就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1]而对中共在抗战时期“党性”概念内涵的理解要将其置于中共的革命实践中，置于中共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实践中，以此来蠡测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的塑造与运用。由此，我们可以结合中共的革命实践与建党实践，将其话语体系中对“党性”概念的特征塑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与价值取向。“党性”概念诞生于马克思列宁的党建理论，也是开展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概念。因是之故，在共产主义政党教育史中，“党性”是“共产主义教育最重要的原则”;“是本阶级利益最自觉最完整的体现，其表现是为本阶级利益而奋斗，自觉地为这些利益而奋斗，自觉地为这些利益服务。党性集中体现在党的政策中”。[2]1945 年中共七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3]这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

其次，“党性”概念具有可操作性。中共对“党性”概念的认识并不是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将其与实践紧密结合。一方面，党员干部可以对照“党性”的概念、原则来检讨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另一方面，“党性”概念是中共加强党的建设、净化革命队伍的实践中产生的，亦是为了满足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实际需要。因此，“党性”概念的实践价值是其特点之一，而实践价值需要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如 1941 年中共中央认为纠正党内“反党性”倾向，应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在党内更加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二是更要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容错误继续发展；四是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五是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与革命的需要；六是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支部的负责领导，都要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4]可见，中共提出加强党性的措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成为中共全党进行党性教育和加强党建的行动指南。

其三，“党性”概念具有时代性。中共对“党性”概念的内涵诠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

1 李宏图、周保巍、孙云龙、张智、谈丽：《概念史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 期。

2 [苏]Л·Н·波诺马廖夫，Ж·Т·托辛科主编，《共产主义教育辞典》，谢洪恩，陈宗骥，钱树德，赵树义译，四川省社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2 页。

3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4 页。

4《党的建设教学参考资料》（供校内学习），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编印 1980 年版，第 2—3 页。

是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即“党性”的内涵根据中共所处的斗争环境不同、革命任务不同的时代特点，内涵不断丰富。换言之，党性概念意涵服膺于中共各个时期的基本路线，它的内容和形式必然打上中共革命实践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革命战争年代中共肩负的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党性”概念特别强调组织性与纪律性，这正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淬炼忠诚于革命的党员干部，锻造能肩负时代使命的革命政党。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共对“党性”概念的诠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其内涵必将不同。因此，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的诠释必定将反映社会现实中各种客观矛盾，具有时代性特征。

第四，强调“人性”“党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在中共的革命逻辑中，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其革命的宗旨与使命，而要实现这一宏图其首要条件是坚持党的领导。而“党性教育”作为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组织、开展党内教育的重要方式，必将为中共所青睐。面对舆论对“增强党性运动”的质疑，中共将“人性”、“个性”、“党性”三者关系予以诠释。在中共诠释逻辑中，强调“党性”是“人性”、“个性”的高度统一；同时，“人性”、“个性”、“党性”这“三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质言之，人性是个性的基础，人性又是党性的基础，有人性才可能有个性，有人性才可能有党性；个性的修为便是人性，人性的升华便是党性；同时，淬炼党性有利于提升人性，涵养个性有益于修养党性。三者相互促进，层层递进，相得益彰，修身正性，共同塑造党员干部的思想品格。因而加强党性修养，是凝聚党的组织力，提升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五、结 语

抗战时期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经历了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强调的“阶级立场”、“政党属性”到强调“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态度”、“认识现实问题的思想标准” 、“阶级立场”、“维护党的利益”、“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良好的思想品质”。概而言之，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党性”概念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的政治和精神属性。其表现为政党的阶级属性、宗旨原则和党员的道德、品质、立场、作风、修养；同时，强调“人性”“党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共革命实践的需要，其对党性概念诠释意涵愈加丰富。特别是，中共在党内教育中加入“党性教育”内容，使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接受和理解这一概念。加之，配合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使得“党性”一词成为中共党内的日常术语。而是否具备党性成为中共检验干部是否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的标准之一，也是抗战时期中共管控干部、加强组织建设的主要策略。其后“党性”一词逐渐成为中共日常话语中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并渗透到中共革命文化当中，成为其独有的政治术语。对中共革命话语中相关概念内涵的历史考察，亦是理解其革命理论的另一路径。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探析

王凤青

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

话语建构能力是政党“扩大和强化”社会影响力，借以赢得民众认同、实现政治领导力的重要保证。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凝聚全民族力量进行抗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抗战动员任务，并围绕完成这一任务分别在核心内容和手段路径两大层面积极进行话语建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和形塑了当时的话语方向，成为鼓舞民众坚定抗战胜利信心，积极进行抗战救亡活动的重要精神支柱。然而，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关于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动员话语建构问题的专门研究[1]。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考察与梳理，以期为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升话语建构能力提供历史借鉴。

一、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面临的严峻形势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而言，要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关键在于“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2]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民众发表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呼吁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3]。8 月 25 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指出，只有动员民众，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4]，才能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会议据此提出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任务，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国民政府政治机构、实施有钱出钱的战时财经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救国的教育政策、实行抗战的民族团结政策等一系列动员民众进行的主张。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形势却是纷繁复杂甚至是异常严峻的。

首先是“恐日病”等对抗战胜利信心不足心理的消极影响。中日战争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的中国与亚洲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日本之间的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由于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社会舆论就存在着“恐日病”。这种论调认为中国是

1 目前学术界关于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动员话语建构的研究还比较分散，主要散见于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等相关论著中，其中，李永进《合并抑或合作：抗战初期国共关于合作形式的话语论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和《抗战时期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话语重构———基于国共争夺中国革命话语权的再考察》（《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 年第 3 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不过，它们主要着眼于从国共视角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建构问题，不能完整体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逻辑进路，因此，该问题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6 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4-275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4 页。

一个弱国，人力、物力、财力、武器都不如日本，主张对日妥协投降。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与遭遇的巨大困难，这种论调甚至一度甚嚣尘上。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论调极不利于进行抗战动员。7 月 15 日，朱德指出，在全国人民奔向抗日洪流的时候，还有“许多人被恐日病苦恼着，恫吓着”，“匍匐于恐日病的恫吓下战栗着，坚持着中国不能与日寇抗战”，“应继续妥协、退让下去”[1]。9 月 8 日，张闻天认为，在各种抗战困难的条件下，“张皇失措、悲观失望、动摇妥协以及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思想”，“如毒菌般的发生起来，啮噬着少数不坚定的人的心灵，消磨着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与勇气。”[2]10 月，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在军事上暂时的失利，“使抗日派内部一部分发生动摇与失望，觉得抗战的无办法与无处路”，这成为抗战时局“最大的危险”[3]。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指出，全国抗战爆发后，唯武器论依然“暗中流行”，“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4]“恐日病”等言论直接指向抗战动员的有效性，严重削弱了建构抗战动员话语的根基。

其次是国民党单纯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路线的严重干扰。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承诺要“举国一致”，“和日寇死拼”[5]，但“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和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同人民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6]，对于民众救亡运动采取“统制”“包办”“限制”与“压迫”等措施，导致民众不能在抗战中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多次指出，国民党的抗战“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包含着严重的危险性。”[7]他认为，“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和武装起来。”[8]张闻天也指出，国民政府基本上“还惧怕民众参加抗战，不愿意给民众以参战的民主权利，不肯发动与武装民众，不肯改善民众的生活，甚至到处控制与压制民众的参战运动”；“军队还是拿过去压迫者的态度与方法去对付人民，人民对于军队的恐怖依然存在着。”[9]周恩来也认为，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仍然“固执其统制民运的政策”，“包而不办是普遍现象”，“许多大城市民运反不如过去局部抗战时活跃，前线得不到民众的援助，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民众武装不能组织。”[10]彭德怀也指出，全国抗战爆发后，“民众依然没有取得参加抗战的各种机会，也没有采取适当的政策去动员全民族的力量”，以致于使中国的抗战，“始终停止在单纯军事防御的阶段，而并未能掀起全面的与全民族的抗战。”[11]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统制限制民众运动的政策，极大地压缩了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

1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2 期，1937 年 7 月 26 日。
2 张闻天：《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7 期，1937 年 9 月 25 日。
3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 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8 页。
5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 5 册，台北：“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 2015 年版，第 359 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5 页。
7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 页。
8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6 页。
9 张闻天：《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7 期，1937 年 9 月 25 日。
10 周恩来：《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群众》周刊第 1 卷第 2 期，1937 年 12 月 18 日。
11 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条件》，《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25 期，1937 年 11 月 27 日。

空间。

最后是日本以“和平谈判”为诱饵分裂中国抗战阵营的阴谋阻挠。全国抗战爆发后，日本一方面倾其全力对中国进行军事进攻，一方面大肆释放所谓“和平谈判”“和平解决”的烟幕弹，借以掩饰其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受此影响，一些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暗中与它唱和，主张接受议和条件，妥协投降。国民党内二号人物汪精卫即是其中的代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他发表所谓“最后关头”的讲话，指出中国“抗战必亡”，“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他还含沙射影攻击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战是“不负责任”，“不说老实话”[1]。南京失守前，他提出了依靠德意的“国际和平路线”外交方针。广州失守前后，他又提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意在为降日寻找借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欧美派，在日寇和平烟幕弹的引诱下，也表现出动摇妥协的倾向，企图以妥协退让方式结束中日战争。毛泽东指出，日本以“议和”为诱饵，“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期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2]他认为中国抗战阵营中的民族投降主义论调，是“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3]张闻天也指出，日本一方面飞机到处轰炸，一方面到处散播和平谈判的烟幕，目的是“引诱中国当局放弃坚决抗战的房展，分裂与挑拨中国内部开始巩固的团结，以重新遂行它‘以华制华’的老方法。”[4]日本分裂中国抗战阵营的阴谋，在相当程度上混淆了部分人的视听，不利于抗战动员话语的建构。

二、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核心内容

话语建构不能无的放矢，它需要有核心内容，要求话语主体抓住最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建构“一种知识体系”[5]，以引导社会舆论，形成社会共识，产生社会影响力。要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必须“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6]，这成为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核心内容。

（一）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话语愿景

所谓愿景，就是希望在未来看到的景象、情景。面对日本制造的一系列野蛮残暴的侵华罪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自由解放成为中国民众的普遍愿望。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一个是坚决抗战的方针、动员民众的办法、“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不动员民众的办法、“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

1 章伯峰、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抗日战争》（六），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第 796-797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1 页。
3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5 页。
4 张闻天：《转变中的时局》，《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22 期，1937 年 11 月 6 日。
5 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第 29 页。
6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81 页。

马奴隶的前途。”他主张“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1]“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提出，说出了中国民众的共同心声，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

1937 年 9 月 1 日，张闻天指出，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间的决死战争”，“这一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日两国的命运”；中国抗战的目的，“是在打倒世界上最反动最侵略与最野蛮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他还热情洋溢地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华民族万岁！”[2]11 月 27 日，彭德怀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高度的文化，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有着无量的蕴藏着的资源，有着充分的条件，只要在抗战中能够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为优势地位，“必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3]，求得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12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对时局宣言，指出只要全民族力量更加团结，中国一定能够“战胜内受人民仇恨外遭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4]。1938 年 1 月 7 日，周恩来指出，只要全国同胞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反对一切动摇，反对一切妥协、屈服、投降的思想”，“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进攻必然会遭受到最后的惨败，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必然会达到最后的成功”[5]。10 月 12 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6]。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7]

这些话语富有感染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指出了中国坚决抗战、抗战到底的光明前景，有利于广大民众拥护抗战，支持抗战，为抗战积极贡献力量。

（二）指出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中国终将取得抗战胜利

全国抗战爆发后，对于中日战争的大体走向、演变趋势，中日两国各自的优劣因素及其相互转化以及中日战争的最终结局等问题，部分民众并不是很清楚，这极大地阻碍了抗战动员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着重分析了影响中日战争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极端艰苦的持久战，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会速胜，中国终将取得最后胜利，从而澄清了“亡国论”与“速胜论”对抗战动员的不利影响，使国人对抗战进程有了清晰客观的认识。

1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0 页。
2 张闻天：《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7 期，1937 年 9 月 25 日。
3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5 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3 页。
5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 2 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3 页。
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74 页。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51 页。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朱德对中日两国的国力进行了客观分析，他认为中国在战争中的劣势地位是暂时的，日本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从日本方面看，它经济基础薄弱，自然资源贫乏，农业是“最弱的一环”；军事工业不能“持久下去”；国债“急剧地增加”，日本人民“除了承受重大的战费负担与充当炮灰的作用之外，一无所得”，将会推动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动摇日本军队的军心”。从中国方面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国已经结束了内战实现了和平，国民政府的政治路线也开始向抗战方向转换，这些都是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利条件。他同时指出，中国国力落后，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1]11 月 27 日，彭德怀经过比较影响中日战争的诸多因素，指出在部分民众中流行的“恐日病”没有根据，因为中国将在实行民主正在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高度地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形成钢铁一般的力量”，中国军队的质量、战术素养、武器装备虽然暂时落后，但已经在努力改进；而日本“国内的天然资源极其缺乏，农民不够自给，重工业亦不十分发达，加以战争的需要，集中一切企业，生产军需品与杀人武器，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必将愈益增多”，困难将会与日俱增；不仅如此，日本因侵略中国已引起了不少国家的反对，中国则取得了国际上爱好和平国家的同情与帮助等。不过，中国抗战存在很多困难，“要想拒止敌人于国门之外，固不可能；就是一下子把入侵的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也是一个极艰苦的斗争”，“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成为唯一的公论了。”[2]

1938 年 5、6 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原理指出，中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第一，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同，而且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自己也不同，正处于“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多数人民利害相关，日本侵略中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第二，中国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但“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第三，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他同时指出“速胜论”也是不对的。“速胜论”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对中日战事的“估计不符合真相”，如果“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的抗战是持久战。“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但由于“敌强我弱的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

1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2 期，1937 年 7 月 26 日。
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38 页。

出现”，中日战争“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因此造成了敌我“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只要中国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1]

这种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多种因素统筹起来进行动态分析的话语阐释方法，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最终胜利属于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没有客观依据，从而引领了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正确方向。

（三）主张通过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民众支持抗战

纲领是政党对时代难题的诠释，是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政治纲领，动员民众就是一句空话。但是，纲领制定出来后，必须把它“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2]，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于事无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动员民众抗战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因此主张实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重要内容。

要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执政党国民党的认同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有共同之处，从而找到了国民党接受《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话语基础，缩小了国共因政见分歧造成的话语隔阂。1937 年 8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提纲中指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是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要向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3]9 月 29 日，他就国共合作实现后的迫切任务再次指出，自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策方针一直“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它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是彻底的民族主义，领导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领导实行土地革命是彻底的民生主义。全国抗战爆发后，它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他，才能挽救中国”。他还强调指出：“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4]

除了认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孙中山三民主义有共同之处外，中国共产党认为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三民主义，“需要实行的工具”。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统制和压制民众运动造成了军事上的严重失利现象，它特别强调要“把民众加进去”，把国民政府改造成为民族的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要以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为原则改革国民党军队，

1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1-460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81 页。
3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4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9 页。

发挥官兵抗战的积极性。10 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以抗日的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帮助建立统一的国防军”的任务[1]。他还认为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民众的要求，国民党内部新生力量的增长等因素，有助于形成“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基础。”[2]12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在改造国民政府方面，要“吸收坚决参加抗战的各党派各团体的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在改革军队方面，要“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的进行征募兵役运动”[3]。它还要求国民党“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4]。这些建议对国民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38 年 3 月底 4 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提出了“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改革各级政府机构”、“发动全国民众”等方针。[5]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动员民众抗战的主张，部分的体现在了国民党的施政方针中。

三、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手段路径

话语内容产生出来后，还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方式进行诠释、传播。只有这样，承载话语主体思想的话语内容主张才能被话语客体所了解、知晓，进而产生话语主体所期待的效果。

（一）发表通电宣言表明话语立场

通电宣言等文本话语既可以“防止因传递环节过多而发生变形和转义现象，也可以防止解释的随意性”[6]，又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保存时间久等特点，是话语建构的重要方式。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围绕抗战动员发表了很多通电宣言。据大略统计，从全国抗战爆发到武汉失守，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的较为重要的宣言通电有，1937 年 7 月 8 日的《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7 月 15 日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 月 23 日的《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12 月 25 日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 年 7 月 6 日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致蒋介石及全国抗战将士电》、11 月 5 日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蒋介石电》《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八路军、新四军电》、11 月 16 日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等。这些宣言通电基本上围绕号召民众“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援助前线，一切服从抗战，为民族国家之最后解放奋斗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7]等内容展开，语言简洁明了，铿锵有力，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战动员的话语立场，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的影响力。

（二）领袖谈话演讲凸显话语魅力

1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55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0 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1-412 页。
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9 页。
5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5-487 页。
6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第 2 版），中国人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3 页。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谈话演讲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等特点，它将手势、表情、眼神、动作等体态与语言有机结合，能够提高话语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通过与记者谈话、在重要场合演讲等方式，赋予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以强烈的时代气息，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话语建构的效果。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先后接受了英国记者贝特莱、《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合众报记者王公达的采访，并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同世界学联代表谈话。毛泽东还与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过多次交谈。这些谈话或论述民众对抗战的伟大作用，或指出动员民众抗战的具体方法，或指出中国抗战一定会胜利以坚定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或剖析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或主张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或强调要发扬“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1]他在延安抗日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说，在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基础上，更是全面客观地阐释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中国胜利的必然性，指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最终战争结局。这些话语直抵人心，成为动员抗战的有力武器，对中国共产党建构抗战动员话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创办报纸刊物开拓话语阵地

报纸刊物是舆论形成的“最重要推动力”[2]，是话语传播的重要媒介。1937 年 8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形式首先在上海创办了《救国日报》，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介绍前线情况，号召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胡绳主编的《救中国》（周刊）、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半月刊）、田汉等主编的《抗战戏剧》等相继创刊。这些刊物围绕抗战到底、保卫家乡、保卫田园等内容进行民众动员，同时以不同方式揭露日寇暴行，激发民众对日寇的仇恨，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抗战的重要舆论讲坛。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先后创办了《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它们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影响最大的报刊，以宣传鼓动“坚持抗战到底”“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为宗旨，发表了不少有助于动员民众维护抗战、推动抗战的言论。如《群众》周刊在创刊号发表的社论指出，民族失败主义者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只是证明需要“改变抗战方法”，“在内政外交上都有一个改变”，并不代表中国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3]。后来它发表的《加强民族抗日力量的团结》、《巩固团结反对分裂》、《怎样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战》等同样围绕如何动员民众问题展开。《新华日报》在其发刊词中，针对全国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现象，指出“欲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欲求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实现，其在今天和将来，均舍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别无方法与途径。”[4]它发表的《团结救国》《反对诱降巩固团结》《肃清汉奸与巩固团结》《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等一系列社论，

1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1-113 页。
2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9 页。
3 《由失败到胜利的枢纽——肃清民族失败主义》，《群众周刊》创刊号，1937 年 12 月 11 日。
4 《发刊词》，《新华日报》1938 年 1 月 11 日。

把维护国共合作抗战、民众团结抗战作为重要内容。它还开设了“大众报箱”“读者来信”等栏目，就读者在抗战中遇到的问题进行释疑解惑。在延安，创刊于 1937 年 4 月 24 日的《解放》周刊，虽没有发表创刊词，但把自身定位为“人民大众之刊物”[1]，把动员民众抗战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予以刊载。这些报刊组成舆论方阵，互相支持，互相援引，互为补充，围绕抗战动员问题进行“鼓”与“呼”，从而引领了当时的话语方向，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的传播。

（四）创新文艺形式提升话语热度

文学艺术是团结群众，启发群众觉悟的有力武器，它虽不像宣言通电那样直接了当表明话语主体的真实态度和鲜明立场，但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功能，能够使民众不知不觉中受到浸润感染。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虽因人力物力财力所限，不能大规模开展文学艺术活动，但还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通过创新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不断提升抗战动员话语的热度。举凡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文学报告、音乐、舞蹈、电影、戏曲、木刻、漫画、美术、雕刻等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动员的有效载体。如艾青的《旷野》《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等诗集，号召中华民族“必须从敌人的死亡，夺回自己的生存”，表现出诗人对民族存亡的关注和必胜的抗战信心。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江定仙的《打杀汉奸》等音乐以明快有力的曲风，鼓舞起全民族抗战救亡的斗志。《保卫我们的国土》《八百壮士》《热血忠魂》等抗战故事片、《抗战特辑》《姚营长血溅宝山城》等纪录片塑造了为国捐躯的英烈的光辉形象，成为“抗战八年电影创作最有成就的时期。”[2]丁玲的《一颗没有出膛的子弹》、邱东平的《第七连》、张庆泰的《在西战场》、周立波的《战地日报》等以文学艺术形式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英勇抗战事迹和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这些作品形象生动，具有联动效应，极易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映，唤起民众觉悟，成为民众反抗日本侵略的精神动力，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五）加强党派交往拓展话语空间

党派交往属于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既具有即时性、易逝性等特点，也具有灵活性、话语客体易受感染影响等特点，容易引起话语共鸣，产生影响力。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利用取得合法地位的有利时机，向不同党派重要代表任务宣传抗战的重要性，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传播的空间。

一是重视与中间党派及其重要人物的交往。周恩来在抗战大后方时积极向中间党派宣传、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纲领政策[3]。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也非常注重与中间党派及其重要人物的交往，职教社的黄炎培在日记中对此多有记载。如 1937 年 12 月 28 日，徐特立访问黄炎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到底，拥蒋到底”的立场[4]。1938 年

1 《解放》周刊创刊号的刊启示，《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 期，1937 年 4 月 24 日。
2 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1937-1945)，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8 页。
3 洪富忠：《抗战期间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建构——以周恩来的人际网络为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 5 卷，华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9 页。

3 月 5 日，“共产党第八路军特派员邓县人郭子化来谈。郭在徐属极得民众信仰，藉连庄会发动民众，其吸引力远出国民党之上。”[1]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利用各种时机，加强与中间党派的沟通、协商[2]。毛泽东亲自致电国民参政会表达对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的信心与决心。毛泽东等七参政员还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希望国民参政员围绕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保卫武汉、改革流弊百出的征兵制度代之以政治动员的征募办法、采取具体办法实现“有钱出钱”的目的、改良人民生活“使有力者可以出力”、普遍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保证各党派合法权利、真正有效的训练青年、改善政治机构等与动员民众息息相关的问题展开讨论[3]。这对于中间党派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主张，认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加强与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高官的交往。1937 年 7 月，朱德先后给四川实力派邓锡侯、云南的龙云和卢汉写信，解释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鼓励他们发扬民气，组织民力，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4]。11 月，卫立煌从忻口败退到太原后，周恩来鼓励他要在失败中看到光明，不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只要继续抗战，不动摇，不妥协，就能够在战场上取得主动地位。1938 年 4 月，毛泽东会见了卫立煌，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高官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主张，有的还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六）成立群众救亡组织扩大话语受众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动员民众支持参与抗战，迅速成立了一些群众救亡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抗战主张。1938 年 1 月，由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边区妇联会、边区农民会、边区民众抗敌互济会、国民外交协会、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边区体育委员会等 26 个团体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成立。该会以“团结巩固与扩大按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宗旨[5]，指出要“动员全国民族的力量，实行最坚决的自卫斗争，来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解放！”“不管我们现在战争中遭到暂时的部分的失利，不管敌人用来攻击我们的武器之多么优良，只要我们全民族能够进一步的紧密地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定会属于我们！”[6]西北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等也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相继建立了一些群众救亡组织。依托这些组织发挥联系群众面广、量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话语受众迅速扩大。

四、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历史启示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 5 卷，华文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9 页。
2 王凤青：《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7-222 页。
3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 2016 年版，第 30 页。
4 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4-305 页。
5 楚云著：《陕行纪实》，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8 年版，第 129 页。
6 《边区抗敌后援会成立》，《新中华报》1938 年 2 月 5 日。

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话语建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使团结抗战、合作抗战、抗战到底等成为当时的流行术语，从而得以引领抗战舆论，推动抗战向着有利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方向演进。应该看到，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合法地位，实力并不强硬，但它的抗战动员话语却能够在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脱颖而出，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启示。

第一，话语主体要有强烈的话语意识。所谓话语意识，就是对建构某种话语的自觉和主动追求，是话语建构取得成功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自觉认识，认为“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1]“四万万中国人民，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的源泉。只有依靠这一伟大力量，我们才能进行持久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2]“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3]“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个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叫唤也要把它吓一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4]基于此种认识，它把动员民众抗战作为抗战话语的重要内容予以建构，并使其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为抗战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二，需要高质量的话语内容。高质量是指话语内容要直面时代难题，回应民族关切，回答大众疑惑，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是话语建构成功的保证。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提炼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变为全民族的行动纲领”等话语，直接针对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统制压制民众救亡运动给抗战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出的“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动员与武装人民，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组织巩固的后方”；中国抗战虽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最终胜利属于中国，鲜明、有力指明了中日战争的最终结局，很容易深入人心，引领民众的心理期待。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已成为抗战动员话语议题的开创者、制造者、引领者和阐释者，以致于国民党也自觉不自觉的追随者和言说者。白崇禧在读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认为它是一部奇书，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向蒋介石积极推荐。国民党还破例出版了该文，每个士兵人手一册，成为当时国民党部队中的一大奇迹。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建构能力远超国民党，双方高下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需要创新话语载体。形式多样的话语载体是话语建构的物质形式，没有话语载体，承载话语主体思想的文本就无法传递，建构问题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一般而言，书面话语是

1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2 期，1937 年 7 月 26 日。
2 张闻天：《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7 期，1937 年 9 月 25 日。
3 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条件》，《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25 期，1937 年 11 月 27 日。
4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1-512 页。

传递话语信息的主要载体，它能够明白、方便、快捷的表达话语建构者的思想。不过书面话语亦有不足之处，不像口头话语通俗易懂，不易为话语客体接受。中国共产党在建构抗战动员话语的过程中，既使用通电宣言等较为严肃正式的书面话语，也采用领袖谈话演讲等易于沟通的口头话语、态势话语；既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严谨正式的政治话语，也在群众救亡组织中使用浅显易懂的大众话语；既注意发挥报刊作为话语传播主阵地的作用，也注意创新文学艺术形式提升话语的传播热度；既通过不同阶层、不同党派的人际传播，拓展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广度和深度，也注意将抗战动员话语的核心内容和概念范畴转化为社会通用话语，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话语在当时的抗战话语中独树一帜，高出一筹，在不同群体中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

第四，需要采取灵活的话语策略。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建构的对象既有文化水平低下的劳动群众，也有像地方实力派、国民党高官等那样的高层人士；既有坚决主张抗战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同意民族民主革命的分子，也有对日动摇妥协的大地主、亲日派汉奸、买办资产阶级等民族失败主义者、民族投降主义者，还有在和战之间动摇的所谓中间分子。话语受众的巨大差异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不同阶层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话语策略。如在话语内容上，对于工人农民，中国共产党把抗战动员话语的建构与改良他们的生活水平联系起来，主张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废除苛捐杂税，救济失业，赈济灾荒等；对于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主张改变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的路线和统制民众运动的政策，提出了改革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成立国防政府，实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等话语；对于汉奸亲日派，则旗帜鲜明要求肃清汉奸亲日派，要“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1]等。通过与不同阶层的话语对象的实际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动员话语有了具体的能指和所指，有了更强的针对性。在话语传播方式上，中国共产党注意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拓展话语传播渠道。如既利用宣言通电等文字话语，也运用领袖谈话演讲、歌曲戏曲等声乐话语，还利用漫画、雕刻等直观话语，视觉符号和声音符号共同运用，形式多样，这些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战动员话语产生影响力的重要保证。

“语言使用的方式及人类的普遍认知能力塑造语言。”[2]全国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面对极为不利的抗战动员形势，抓住能够公开表达政见主张的有利机会，积极建构抗战动员话语。这段历史能够为当前我们围绕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磅礴力量提升话语建构能力提供诸多启发。

1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6 页。
2 胡壮麟主编：《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13 页。

舆论与政治：1945 年国共两党围绕“胡世合事件”的博弈

肖远琴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自 80 年代以来，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注意到现在的学术研究，包括学术刊物发表出来的文章，凸显出多个层次。据窃之观察，现在仍有很多研究实际上仍是对史料的罗列，或者说是对材料的一个梳理，这种文章其实是 80 至 90 年代以来就形成的一个大概路数。当然，这种路数有一个背景就是 80 年代以前的研究因为意识形态化，形成了以论代史或者是政治、观点先行的特点。以 1945 年“胡世合事件”为例，这种特点尤为凸显。目前学术界对该事件的研究尚停留在梳理层面，且在梳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疏漏，甚至谬误。[1]例如关于该事件的赔偿问题，以及无该事件后续及国民政府的应对。目前已有成果仅停留在梳理事件经过及中共对该事件的领导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中共如何利用社会舆论来替胡世合主持正义，国民政府如何迫于舆论的压力来妥善处置该事件。故本文拟从舆论与政治的角度出发，探讨 1945 年国共两党如何围绕“胡世合事件”进行博弈，并考证相关问题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对当前有关“胡世合事件”定论尚存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一、惨案的发生：胡世合被枪杀的前因及其经过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工厂倍增，人口迅速增加(由战前的 40 多万增加到 100 多万)，工业用电、照明用电均已供不应求，加之不断遭受日机轰炸，重庆电力公司损失很大，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电荒。电力公司虽一再呼吁，有关当局亦明令对偷电行为“严加取缔”，但少数特权者仍然置若罔闻，特别是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偷窃和浪费电力极为严重。[2]电力公司于 1944 年呈市政府的公函中称：“第一、三两厂机炉负荷超过拟定之轮流停电，且两厂负荷之重日甚一日，严重万分，如不设法减轻，已随时有发生整个危险之可能。公司损失固不足论，而影响所至何堪设想。” [3]此时，重庆各发电厂负荷已重至无法维持之地步，电力公司迫不得已拟定第一、三两厂分区轮流停电次序表，采取轮流停电。至

---

[1]投稿日期：

作者简介：肖远琴，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抗战大后方研究。

1以下著作零星介绍了 “胡世合事件”，均在该事件发生之时间书写上出现相同错误。如吉林省长春市总工会文教工作委员会编：《工会工作辞书》（吉林省新闻出版社,1988 年,第 513 页）；陈乐洋主编：《工会工作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年,第 127 页）；本社编：《工会工作手册》（工人出版社,1986 年,第 173 页）；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年,第 445 页）；王虹生等主编：《工青妇大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400 页）；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下）（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82 年,第 174 页）等。这些著作中对“胡世合运动”发生之时间书写均出现谬误，皆将胡世合事件发生的时间误写成 1945 年 3 月 20 日。经过耙梳相关档案、文献及资料，该事件发生之时间确为 1945 年 2 月 20 日。“胡世合事件”是全面抗战时期后方人民在中共领导下掀起的一场“打击国民党嚣张气焰”的民主运动，在近现代史上有重大意义及影响。因此，对于该事件发生之时间书写不应出现基本错误。

2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2 页。

3《关于检送分区轮流停电次序表的指令、代电（附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6700110002400000028,1944 年 12 月 21 日。

1945 年 2 月，第二厂机炉负荷亦过重，且到达无法维持正常运转之地步，故该厂仿第一、三两厂办法分区轮流停电，以策安全。然而，尽管实行区轮流停电办法后，仍未能解决机炉负荷过重的问题，电荒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如第三厂在“分区轮流停电”实施后，机炉负荷有增无减，原定 6 日轮流停一次仍不能继转正常汽压，电力极感不敷分配。[1]实际上，因重庆为陪都所在地，工厂林立，以致电力公司电流供不应求。期间，经济部通过核实电力公司所送报表，发现每月发电度数与售电度数相差约 30%，即每月损失电流约 200 万度。其中一部分虽系线路损失，其余部分则系被窃电流，为数殊属惊人。翁文灏认为“若不严加取缔，不仅影响正当市民用电，更是妨碍军工生产”。因此，经济部函请战时生产局会同有关机关及重庆电力公司商拟彻底取缔窃电办法。其中，关于盗窃电流相关法令及电气事业人处理窃电早经厘定规则公布实行，至取缔军、警、政、机关、部队及所居人户强用电流规则，经济部则于 1942 年 1 月呈准军事委员会布告取缔在案。[2]然此明令之下，偷用电的用户仍很多，故电力公司经常派人检查用户线路，一经发现既剪线断电。其中，中韩文化餐厅即属偷电大户之一，其有百多盏电灯，20 多个吊扇，其因有田凯[3]这块“牌子”保险，故而长期偷电未受干涉。[4]

1945 年 1 月 24 日，重庆大梁子的变压器因负荷太重被烧坏。[5]在公司将其撤回修理期间，邹容路用户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系大樑子变压器供电）私自在都邮街变压器上接线用电。电力公司认为此举致都邮街变压器超过负荷，情势危殆。便于 1945 年 2 月 19 日（星期一）上午派工前往该处一面劝告，一面将其私接线路剪除。而正当着手间，该饮食部楼下忽有一人呼使其楼上茶房人员一拥而下，将电力公司在场工作人员乱加扭打，并送往大阳沟派出所，经所长从中调停，员工委屈始行和解。然而，该饮食部竟于当晚复将线自行接上。电力公司以该饮食部不顾动力安全作此非法行为，以致影响战时生产至为严重， 20 日复派工前往剪线。[6]电力公司吸取此前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战时重庆“节省电流办法”第二条之规定：“严行制止窃电及强用电流以减少电力浪费，由战时生产局呈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缔，并函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市政府转知警察局、工务局协助电力公司依法办理”[7]，故电力公司此次敦请都邮街第二警察分局遣派警察同往，避免重蹈覆辙。然而，当电力公司剪线员工及

1《关于订定第三厂分区轮流停电次序表致顺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铁工厂的函（附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1980002000170000205,1945 年 3 月 31 日。

2《关于胡世合因剪除私接电线被中韩文化协会餐厅枪毙的公函、训令》，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0000-068-000,1945 年 2 月 24 日。

3战时重庆的治安很乱，地痞流氓横行无忌，常在餐厅、茶楼、酒店和娱乐场所寻衅生事，故这些场所皆寻求“交际经理”（保护人）庇护。并且“交际经理”并非一般人能胜任，而须是卫戍、警备、特高组、刑警处、警察局以及军统这些有权势的人才行。而田凯不仅是侦缉队的组长，还是袍哥仁字堂口的红旗管事，更是全川驰名仁字总社袍哥大爷田得胜的本家。因此，田凯上下能走得通，说得起话。这也是中韩文化协会餐厅选择田凯为“交际经理”的原因。参见郑蕴侠著：《中统秘闻：一个健在的中统少将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

4郑蕴侠著：《中统秘闻：一个健在的中统少将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32 页。

5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 6 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16 页。

6《重庆电力公司全体职工为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非法接电并公然聚众暴行，枪击本公司执行业务人员致死敬向社会人士吁请主持正义启事》，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042-000,1945 年 2 月 23。

7《关于请核定第一次电力监理委员会会议记录上翁文灏、彭开煦的呈（附会议记录）》，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670011000820000029,1945 年 2 月 19 日。

同往警察抵达该餐厅时，即见有警察局保安队长官数人在座首，即将二分局警察斥退，随即有武装保安队四处拥来。适时，该饮食部经理吴汉治即语出蛮横，来势汹涌，一声呼叫“打”，高呼“打死人有我经理负责”。于是，“万头蜂拥”将电力公司在场员工围住，横加暴打，继则武装保安队警亦一齐帮同动手不下数百人，或拿板凳、棒棍或拿刀枪将本公司在场人员分别包围，以七、八人打一个或五、六人打一个之绝对优势纵性乱打一时，喊声震天，秩序大乱。其中，尤以武装保安队警骄横之气，俨然临阵。最后，有两位武装保安队警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挟至民国路口附近，一面走，一面打，另一暴徒则掏出手枪向胡世合腹部开枪。此时，保安队警仍将该工及受伤工人吴兴方、刘振基、张光荣一并押至其队部拘留 2 小时后，始将胡世合送往宽仁医院，但不久即已毙命，此其肇事经过之梗概。[1]

实际上，重庆因长期处于电荒之中，导致窃电者众多。尽管电力公司“原则上严厉取缔，然困难不胜言状”。[2]从“胡世合惨案”之前因及其经过之梗概便可管窥要“严厉取缔”窃电用户，实属困难。尽管有法律条文规定严行制止窃电及强用电流，并规定警察局、工务局有协助电力公司依法办理此等违法事件之责任。然而，如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等窃电用户却依仗“特权”，即有卫戍司令部及警察局保安队等撑腰，罔顾法律条文之规定，一再挑衅电力公司底线。经过第一次冲突后，该饮食部当晚又接电，电力公司于次日再派胡世合等人前去剪线，又遇冲突。而胡世合等人在面临对方强势压迫之下并未退却，坚持完成任务，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窃曾苦思为何胡世合等人会硬拼，而不智取?经过耙梳相关档案及文献后，得出答案。原来重庆电力公司在建厂初期用人要求就已经相当严格，招揽的临时工都要通过“有智考智，无智考力”的方式来筛选，所谓“考力”即是两个人抬 400 斤重的条石从江边上坡，以不歇气、不喘大气算合格。而电厂建成后，又通过考“状元”的方式筛选人才，其淘汰率高达 66%以上，工人比喻到电力公司找工作之难是“雷都打不进去，风都吹得出来”。[3]即是说想进电力公司工作非常困难，但是却很容易遭到剪裁，且根据电力公司规定，若电力公司派遣的职员不能完成任务时，将会受到惩罚。[4]想见，倘若胡世合等人完不成任务受到惩罚，被扣工资事小，若因完不成任务被剪裁事大，有丢掉衣食饭碗之风险。这对于一个普通工人来说不仅是要了一个人的命，而是一家人的命。实际上，就曾有电力公司职工被裁后，一家 5 口流落街头的前车之鉴。[5]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谈何容易，故除了敬业之外，保住“衣食饭碗”是能解释其“拼命”的一个更好的理由。另外，智取的可能极低，因

1《重庆电力公司全体职工为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非法接电并公然聚众暴行，枪击本公司执行业务人员致死敬向社会人士吁请主持正义启事》，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042-000,1945 年 2 月 23。

2《经济部电业司关于定于 1941 年 4 月 8 日开会续上电流分配问题致重庆社会局的函（附电流分配表及会议记录）》，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600002019370000009,1941 年 4 月 5 日。

3重庆供电局编写组：《重庆供电局发展史（1903-1980 年）》（内部资料），重庆供电局编印，1981 年 10 月，第 15 页。

4《经济部电业司关于定于 1941 年 4 月 8 日开会续上电流分配问题致重庆社会局的函（附电流分配表及会议记录）》，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600002019370000009,1941 年 4 月 5 日。

5重庆供电局编写组：《重庆供电局发展史（1903-1980 年）》（内部资料），重庆供电局编印，1981 年 10 月，第 15 页。

为当时国民政府里里外外都充满腐败的气息。原本电力公司“取缔”非法窃电者实属有法、有据、有理者，而该饮食部却依仗“后台”对此法律条文视若无睹，宛若空文，官商勾结，以致酿成“胡世合惨案”。

当胡世合被杀害的噩耗传至大溪沟电力公司第一发电厂，该厂立即开三辆卡车载二百余工人到都邮街，会合用户股工人约共三百余人，前往中韩餐厅，打毁一切用具，并将胡世合的遗体安放在该饮食部的大厅里。工人们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杀人凶手，表示“不枪决特务，不让死者入棺”。消息传开，全市工人和一切善良的人们都对受害者寄予深切的同情，纷纷赶往肇事地点，支持电力工人的正义斗争，抗议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这一天，闻讯赶来的群众约有五万人，邹容路上人山人海。“杀人偿命”、“交出凶手来”的怒吼声连连不断。[1] “胡世合惨案”发生后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整个重庆舆论都抱不平，都要为胡世合申冤。[2]

二、舆论造势：中国共产党对胡世合事件的舆情领导

事件发生后，重庆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周力行立即向组织汇报了情况。斗争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共必须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3]王若飞得知该情况后，心知此事非同小可，便立即请示周恩来。随后，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当机立断，通过这次惨案，发动一场胜利的斗争，打击特务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根据这一指示，南方局成立了以王若飞为总领导的指挥机构，全面领导这一斗争的开展。[4]其中，以刘光为首的青年组具体负责组织行动；《新华日报》联络各报广为宣传，并通过报道传达南方局的决策，指导运动发展；其他各部门密切配合，同时也给川东地下党作了相应的布置。为了加强第一线的领导，中共把周力行的联络关系直接交给青年组联系，并在电力公司成立了地下临时指挥小组(有周力行、邓鑫丰等人参加)，在重庆二十梯张定[5]家里设立了秘密指挥部。这样，一场以电力公司工人为中心，得到全市工人和广大市民积极响应的群众性反特斗争，便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6]此时，“胡世合事件”由以电力公司工人自发“运动”向中共领导“运动”转变。

案发次日，中共领导的青年组迅即召开“据点”会议，对电力公司的惨案作了全面分析和讨论，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前途和意义作了估计，决定给电力公司全体职工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并立刻以全力使惨案的真相传布出去。首先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公司的产业工会召开了职工代表紧急会议，组织了“胡世合事件伸冤后援会”，推动工会理事杨秀蓁等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7]期间，杨提出要求四点：一是惩凶；二是惩办帮凶警察；三由中韩文化协会担负死者抚恤；四是保障工人生命

1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3-1204 页。
2梅生：《悼渝电工胡世合之死漫谈“不平”（工余随笔）》，《中国劳工》1945 年第 6 卷 3-4 期，第 11 页。
3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4 页。
4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 6 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618 页。
5 张定是燕京大学学生，“民青”成员，这时因要求工作来到重庆。在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参见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5 页。
6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5 页。
7同上。

安全。[1]同时，公司职工和受害人家属亦分别发出启事，恳请社会人士主持正义。[2]另外，青年组还帮助电力公司职工用通俗的文字写成一个向各业工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求援的宣言，并进一步提出八项最低要求。电力公司工人和受害者家属的血泪控诉和合理要求，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随后，《国民公报》、《商务日报》、《新民日报》和《大公报》等几种报纸，分别报道了有关消息。[3]

晚清以降，随着报刊等近代媒体的创立和发展，媒体在主导社会舆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促成了大规模公众舆论的形成。一旦某个（某类）人物和事件被媒体集中报道，就必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和热点。经历过晚清革命思想宣传的革命党、政治精英等深知制造社会舆论这一利器，故极重视社会舆论在形塑某种形象中的独特作用。因此，在“胡世合事件”发生后，中共深知舆论这一利器对国民党腐败形象的形塑作用尤为重要。因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定要抓住该事件狠狠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为“大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开辟道路”。[4]通过中共对该事件舆情分析及科学领导，加之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胡世合事件”真相迅速公开化。在短短几天内，胡世合惨案“成了重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谈话的中心题材”，严惩凶手，保障人权成了全市人民的一致要求。[5]

三、定性与控制：国、共两党围绕胡世合事件的对弈

实际上，“胡世合命案”一发生，当局反应亦并非迟钝，而是不动声色地责令警察局于当日以“秘二字未列号训令”调查“重庆电力公司电呈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私自接电线，不服取缔，枪伤工友胡世合致死，请秉公处理等情”况，并饬令警察局立即“查明核办” 。[6]次日，重庆市电力厂产业工会借民权路重庆电力总公司会议室招待新闻界报告斗殴经过详情，并拟请市政府准时派员出席指导。[7]当市政府得知该事件梗概后，便已于事发当日在重庆市召开之第 42 次党政联席会议之“党政意见交换”中指出:“关于中韩文化协会与电力公司工人纠纷案，被害人胡世合之尸身应早日安葬。本案之民事部分应提前移交法院判决，对于记者、家属并应善为安慰。”[8] 此时，当局委派警察局调查真相未出，故在应对时只能静待结果。

随后，警察局经多方严密侦查，唐毅称“已获真相”。其查明之“真相”如下：

缘邹容路变压器损坏，久未修复，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迫于需要，私行接电。电力公司于 19 日派工前往剪线曾发生纠纷，经警察局第二分局大阳沟分驻所调处寝事。20 日 9 时许，

1《关于招待新闻界报告枪杀胡世合经过上市政府的呈（附电力公司职工原启事）》，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042-000,1945 年 2 月 23。

2齐武著:《中国工人运动史 .第 5 卷 .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435 页。

3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5-1206 页。

4《走访张黎群记录》，黄淑君主编:《重庆工人运动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272 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73 页。

6《关于报送胡世合死亡处理经过的呈、指令》，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042-000，1945 年 2 月 24 日。

7《关于派员指导新闻界报告胡世合斗殴经过上市政府的呈》，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057-000，1945 年 2 月 21 日。

8《重庆市第四十二次党政联席会议记录》，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1-0002-00618-0000-073-000，1945 年 2 月 20 日。

电力公司复派员工前往拆除该会电表，又起冲突，互相殴击。该会什物多被损坏，并有田世贵（田凯）者前往查询被殴，其出枪示威，失火伤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即趁间逃逸。其时，警察局方在第一剧场举行纪念周，闻讯即派保安队驻往弹压。一面将双方当场肇事之吴汉治、吴汉民、曹庆康、刘振基、吴兴方等带局处理。一面将受伤之胡世合送医院救治，卒因伤重毙命。电力公司员工旋交由该公司张工程师保释，而该公司工人以胡世合伤亡群情愤激，复于 11 时许又蜂拥至中韩文化协会重加捣毁。其楼下商店亦被波及，附近民众因久无电灯颇多怨愤，经警察局职员亲往理喻，并宣示秉公处理办法，工人、民众始各散去。胡世合尸体当即派警看守，并请法院检察处派员相验。凶手田世贵既有关人犯吴汉治、吴汉民、曹庆康等，连同手枪、子弹、证章全卷併解。[1]

唐毅除奉令查明真相外，并将该案真相及处理经过情形具文呈复当局。期间，他认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应该迅速处理该案，并迅速了结此事件，然后将民事部分移送法院办理。[2]显然，警察局调查之真相与电力公司产业工会阐述之真相有很大差别。其调查之真相里并未提及警察局、保安队帮同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餐厅动手打人。从该调查结果来看，警察局妄图将其洗干净，并认为自己“有功无过”。同时，此“真相”明显有袒护涉事餐厅及杀人凶犯，故其在呈复当局该案真相及处理经过情形中强烈要求迅速了结此案。

随后，行政机关在公开发表谈话时，一面袒护田凯，一面压制群众的反抗情绪。更荒谬的是唐毅长曾替田凯出主意，叫他亲自去侦缉队自首，教他说是手枪走火，这样一来不过是“过失杀人”，且自首可以减刑二分之一，即由军法总监部判处，判处后即可保出，故田凯在打死胡世合以后，回到财政局第八稽征所，有人劝他躲避一时，他却说“我将去自首，决无问题 ”。唐毅在 2 月 22 日曾公开发表谈话称“有着米色中山服者前往查询，出枪示威，失火误伤该工友胡世合 ”。同时，国民党特务还唆使茶房纵火焚毁中韩餐厅，以加罪于电力公司工友，并在职工中声称“有异党活动，不要受人利用”，以及威胁该公司工会理事杨秀蓁，陈铁夫设法缩小事件，不许扩大。[3]此外，国民党当局亦利用媒体发出“呼吁社会主持公道”的启示，该启示称电力公司“挟嫌捣毁，移尸盘据”，又称有“异党活动”“目无法纪”“实为陪都治安殷忧，放任暴行，实堪痛恨”，[4]且背地里派出大量军警监视工人行动。[5]

面对国民党当局百般为杀人凶手开脱，并动员大批特务制造谣言，歪曲事实，妄图窒息群众反抗情绪的情况下，中共迅速采取行动，即利用《新华日报》发表通讯、社评等当即给予驳斥。2 月 22 日，《新华日报》即于第一、三版均刊载有关“胡世合惨案”的消息，第一版刊载了《重庆电力公司全体职工为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非法接电并公然聚众暴行，枪击本公司执行业务人员致死敬向社会人士吁请主持正义启事》，该“正义启事”之标题字体加粗

1《关于报送胡世合死亡处理经过的呈、指令》，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042-000，1945 年 2 月 24 日。
2《关于报送胡世合死亡处理经过的呈、指令》，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042-000，1945 年 2 月 24 日。
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1 页。
4琳琳：《放任特务横行，人权那得有保障，老百姓那得不痛恨》，《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27 日，第三版。
5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卷编纂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卷》（上），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出版，1990 年，第 278 页。

放大，将其放于头版，以达到醒目之效。第三版则刊载了《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特务统制一天不取消，人权就一天没有保障，邹容路惨案便是实例》一文进一步揭露“胡世合惨案”之真相。实际上，《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及通讯报道，其核心都是为“胡世合事件”定性，即国民党“特权阶级”利用特权知法犯法，违法乱纪，乱杀无辜，抹灭人权。所谓知法犯法、违法乱纪、抹灭人权的定性则有两层意思：一是责任问题，在国民党高唱“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和“取缔窃电”声中，特务公然行凶，枪杀奉命执行取缔违章用电的工人，工人们奋起要求枪毙凶手，抚恤受害者家属，保障人权，[1]这是合理的要求，当局应对该事件有一个公正的交代。二是事件的影响，因这场大规模群众斗争发生时，抗日战争虽已胜利在望，但毕竟还是大敌当前。在这种形势下，“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仍应“以不破裂合作抗日为条件”，[2]即是说只要当局满足工人提出的要求，该事件便到此为止，全体人民仍应以抗日大局为重。

随后，《新华日报》又于 2 月 24 日以《这场人命案》为题发表短评，指出唐毅的谈话妄图把肆意行凶的特务田凯说成是无从查考的“着米色中山服者”，把故意射击说成是“走火误伤”，并不是包庇偷电，肆意行凶。从而使“一场偷电行凶、击毙人命的大案，就此轻轻过去”。[3]该短评从侧面透露了当局对该事件的定性亦有二：一是事件的责任，称“走火误伤”，即凶犯无犯故意杀人罪，并不是包庇偷电，肆意行凶；二是事件的范围，称 “着米色中山服者”即是告知其人姓名、官衔无从考证，事件应该截止，不涉及政治（国民党）与其他机关（警察局、保安队）。因此，该短评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问题的实质，鲜明地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胡世合事件”的错误定性。

紧接着，《新华日报》又在同版发表社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该文深度挖掘了凶手田凯的底细，并控诉国民党“特权阶级”鱼肉后方民众，呼吁“谁也不能默尔而息”。该文除呼吁群众“运动起来”外，并阐述电力公司及电力工人在抗战中所做的巨大贡献，声称重庆电力公司是一家民营的业务机构，抗战八年来为后方的动力供应尽了很大的努力。而在重庆大轰炸中，电力公司员工“随炸随修”，将生死置之度外。随后又进一步披露国民党“特权阶级”如何浪费电力，不顾电力公司运营及战时动力供应之困难，控诉巨宅机关总是电炬彻夜通明，冬天则以电炉取暖，甚至连水缸都用电烧水，以致众多市民无电可用，工厂缺电停工，重庆不时停电。[4] 事实上，这一社论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利用舆论造势，揭露惨案真相，并对群众思想进行动员；二是通过舆论形塑国民党“特权阶级”的腐败与奢靡形象。此后，《新华日报》陆陆续续发表有关“胡世合事件”的通讯报道、特写及社评等约 39 篇，被国民党扣发的未计算在内。[5]

另外，中共还“鼓动”青年朋友通过通俗的鼓动文字，写了向各业工友及社会求援的宣言，并将 2000 余份的宣言以 7 种不同的油印版分发到重庆南岸、江北、小龙坎各主要工厂、

1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11 页。
2 同上。
3《新华日报》短评：《这场人命案》,《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24 日，第三版。
4《新华日报》社论：《不能忽视的一件惨案》,《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24 日，第三版。
5黄淑君：《中共南方局对胡世合事件的领导》,《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第 74 页。

学校及市民中。同时，通过电力公司中的积极分子把主要要求传播到公司职工中去。为了进一步推动斗争，中共组织了一个临时机构，以电力公司的积极分子为主，以便经常交换情况和决定对策和配合工作。这些积极分子推动了工会理事杨秀蓁出面招待新文界，并向社会发出油印启示。为了使斗争保持高潮，中共分别组织胡世合的道场，只要道师鼓锣一响，大批的挽联、花圈就陆续送去。另外，由地下党发动各厂工友和学生青年用行动来援助，以表同情。如募捐、送挽联、花圈等。其中，包括机械工人、纺织工人、印刷工人都发动他们去送了挽联，一部分工人甚至组织了援胡委员会。同时，他们经常供稿给新华、新民、大公报消息，以推动“胡世合事件”之持续报导，并动员青年朋友写通讯，寄发到成都和昆明去。此时，惨案真相已被迅速传播，报上舆论亦成功发动。[1]在此期间，向胡世合致吊者大概在 20 万人以上，其中以 2 月 26 日、27 日、28 日致吊者最多，三日共计约 19 万人。在出丧的途中，他们还动员了盟邦人士前去照相。[2]显然，南方局在领导这一事件中，特别注意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结合，尤其注重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掩护秘密活动，以达到斗争之目的。在发动和组织群众过程中，一方面积极运用中共在国统区的公开报纸－－《新华日报》及时报道事件真相，发表社论，刊登电力工人的呼吁书等大造舆论。同时，利用电力公司和公司工会等合法机构组织后援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呼吁声援；另一方面又设立秘密领导机构，建立指挥系统，通过地下党员和“据点”等秘密组织的骨干，把指令下达到基本群众。另外，以工会的名义和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基本条件，设立灵堂，举行公祭，悬挂义正辞严的挽联，公开指责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又用“做道场”、“超度亡灵”等封建迷信形式掩护反特斗争这个鲜明的政治内容，既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又符合一般的传统习惯。这样，既显示了力量又不暴露革命骨干，既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又免授敌以柄，既保证了斗争的胜利发展，又保存了革命力量。[3]

此时，唐毅想“一手遮天”“掩人耳目”包庇凶犯的计划流产了。随后，由市长贺耀祖、社会局局长包华国、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代替唐毅积极出面活动，采取的办法是“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其目的是在使影响不要扩大，所以坚持要把尸首搬到长安寺”。[4]期间，唐毅带着很大的希望向电力公司代总经理浦心雅交涉，主张和平解决该事件，浦氏介于该事件之复杂性，并未妥协。[5]此外，唐毅还在市政会议上提议逮捕杨秀蓁，称其为“鼓动者”。贺耀祖则认为不妥，恐事件更加扩大。杨听到消息后十分愤慨，对同事称其不怕逮捕，倘若“不达目的是决不低头的”。随后，杨等又用电力公司工会名义请求重庆总工会援助。总工会在群众情绪的逼迫下，以及在 CC 的怂恿下（此时 CC 想借此对抗警察局、卫戍部、市政府，因为当时他们正在重庆市党部改选竞选之中）也采取援助的姿态，并召集分会 40 余单位开会讨论声援办法，成立治丧委员会及后援会，开始以枪毙凶手为先决条件，甚至有二日不得解决，

1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4-135 页。
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6 页。
3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10 页。
4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2 页。
5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28 页。

则全市停电 20 分钟，四日不解决则每天做二、三小时工作的号召。[1]

此时，电力供应被用作谈判筹码。事实上，早在 1925 年 5 月 30 日，上海市警方开枪打死了一些抗议日本纺织厂虐待中国工人的示威者而引发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其被铭记为一场反帝爱国主义之劳工运动，此为中国历来发生之政治危机中以电力供应作为谈判筹码的首例。[2]可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又似乎不曾相似。 20 年后发生了同样以电力供应作为谈判筹码的事件，与 20 年前相比，20 年前的“五卅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而 20 年后的“胡世合运动”是为“打击国民党嚣张气焰”之“大后方民主运动”。彼时，在与当局谈判过程中，工人们始终坚持“枪毙田凯，杀人偿命”的基本要求，并一再表示，如不枪毙田凯，就将在全市停水停电，还用“小广播”的方式透露消息，让市民储水备用。[3]

此消息一出，当局受到极大威胁，[4]唯恐事件进一步扩大，遂与电力公司及电力工会代表进行谈判。包华国 既“奉谕代表处理市电力厂产业工会会员胡世合命案”，其根据被害当事人代表杨秀蓁、陈铁夫二人所提八项要求于当日下午三时请示上级。随即，国民政府当局根据包的请示另行修订解决办法 13 项，旋即召集杨、陈两代表与 22、23 日市电力厂产业工会会议推定之治丧、追悼、筹备会委员谭泽森等假会忠烈祠市总工会址开会。其称宣布时虽有少数工界代表以激於义愤，表示暂时不能移灵，须等凶手田凯依法处决后再行迁移。同时要求“唐毅更正 2 月 23 号所发表之谈话”。后经包一再详加解释，各代表才签字决定翌日移灵。此外，由市长专赠胡世合家属国币 10 万元，于解决后即着专人送交杨秀蓁制据代收。2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再由职员（包华国）亲往劝导胡氏家属，至 12 时半始能督率将胡世合尸棺既 14 悬挽对全部移至长安寺内停放。原中韩文协饮食部大门则立予闭封，不准任何人进入，以免发生另外枝节。[5]

事实上，因各工厂工人群起声援，胡世合悼祭便演变成了群众的示威行动。国民政府当局亦察觉该事件微妙之变化，恐有“异党”生事。随即，总工会的态度很快就转到缩小事件，并四处散布“防止异党活动”的信息。显然，此时总工会已经站在市政府、警局方面。[6]此外，市总工会认为“市长公正处置，并专赐厚仪，至为感戴”。其又“拟具书面新闻稿一纸，请代转呈，赐核发表”。市长包国华认为“以上所有奉派处理本案经过情形合理”，并附当局处理办法十三条：第一，依法严惩凶手田凯；第二，保安队员是否有帮凶情事，由市政府秉公查明严惩；第三，江德茂现已在押，应依法惩办；第四，关于本案，另由市长谈话；第五，丧葬费除由市政府责令中韩文协饮食部负责外，至民事赔偿部分应由审讯机关明核后，由市政府责令执行；第六，贺市长赠送 10 万元作为治丧补助费用，其余 10 万元由电力公司垫拨；第七，移灵时由包局长代表市政府送丧，开吊时由市长主祭，社会、警察两局局长陪祭；第

1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0-131 页。
2Ying Jia Tan:《Recharging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1882—1955》，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21 年，第 29 页。
3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7 页。
4同上。
5《关于检送胡世合案情及拨款抚恤的呈、公函、令（附解决办法）》，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3-00124-0000-001-000,1945 年 2 月 27 日。
6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1 页。

八，中韩文协饮食部即日封闭；第九，讣报不得登载启事，或变相说明，工人团体吊祭由总工会负责通知；第十，电力公司抚恤费仍由电力公司照抚恤办法办理；第十一，开吊于本月内举行；第十二，开吊时诵经 2 日；第十三，商定后由包局长代表市政府负责。[1]实际上，据刘光报告：“从搬尸体到枪毙一直到追悼胡世合出葬为止，这一阶段是人民和政府对立正尖锐的时候，也是统治者正难应付的时候，统治者在人民面前弄得手忙脚乱，被迫作迅速的让步，不得不牺牲一个特务来了结这一事件。”[2]显然，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力及事态演变之难以调和，迅即作出让步。此时，当局对“胡世合命案”已经有了较为公正的处理办法，此前包庇田凯的“特权阶级”深知事态的严重性，不得不“弃车保帅”，“牺牲”此“虾兵蟹将”以平民愤。

“胡世合事件” 影响之大，甚至惊动了当局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王缵绪于 2 月 25 号将案情呈报蒋时，蒋立即在上面批了枪毙二字，故 26 号早晨午前十时田凯被枪毙。此时，“胡世合事件”的影响随即缩小，不再扩大。随后，当局又进一步加紧缩小这一运动的影响。即把三天追悼会改为一天，禁止送葬，只准以汽车运走胡之尸体，在职工中间散布“谣言”，并加以恐吓称“如果再要扩大就是帮助共产党活动”等语。但是，由于工人们的坚持，追悼会仍然按“处理办法”举行了 2 天，并且由工人列队步行送葬。至 3 月 1 日出葬时，国民党就动员了大批特务和党部工作人员，称“要严格防止散布传单及叫喊口号，并且拒绝外厂工人和市民参加送葬”。送葬之路线是由小什字、民族路、都邮路、民生路、中一路、上清寺、国府路到大溪沟。然而，到了七星岗以后，当局以“再送就要发生乱子”之话语把送葬的人群遣散，先是遣散了民生机器厂送葬代表团 200 余人，随后又叫手举挽联的百余工人停止前进，要他们经过枣子岚垭走小路到大溪沟去，不准他们通过上清市等地。[3]实际上，当国民党被迫枪毙了田凯以后，中共便知这一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4]国、共两党的“舆论大战”亦随即谢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当局在处理“胡世合事件”中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得益于独立的民意力量[5]的支持，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偏向受害者一方。当然，其中最关键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当局妄图压制这些力量时，中共则利用合法手段竭力释放和引导这些力量。如调动电力公司职员和公司当局的积极作用，发挥统一战线的威力，并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利用国民党工会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坚持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6]期间，国民党当局亦敏锐地察觉到事件从工人自发“运动”演变成中共领导“运动”，唯恐事态进一步扩大，故对舆论进行严格管控。当局在“胡世合事件”之“解决办法”中就明确

1《关于检送胡世合案情及拨款抚恤的呈、公函、令（附解决办法）》，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3-00124-0000-001-000,1945 年 2 月 27 日。
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2 页。
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2-133 页。
4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5 页。
5主要是得到电力公司职工以及重庆各工厂工友与重庆市民和舆论界的声援和支持，参见刘光：《关于重庆电力公司反特斗争的总结(节录)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27 页。
6详见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9-1210 页。

规定 “讣报不得登载启事，或变相说明，工人团体吊祭由总工会负责通知”[1]。同时，扣发相关媒体有关胡世合事件之敏感报道。但是，《新华日报》还是以“智取”的方式避开当局的检查，告知读者国民党扣发和打压有关“胡世合惨案”舆论的消息。[2]另外，当局亦以“软硬兼施”的方式“胁迫”相关负责人尽快缩小事件影响。[3] 此外，中共在该事件中也十分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他们在斗争口号上不提“建立联合政府”等更高的主张，而是在“特务横行何处去，民主政治几时来”等挽联中，揭示出斗争鲜明的政治意义。这样，行动的口号就与宣传口号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也增加了胜利的可能性，在主要要求(枪毙凶手)上毫不妥协，次要问题上作了适当变通。鉴于国民党规定战时的罢工将以汉奸论处，故在斗争中只散布停电空气，甚至以此为条件和国民党当局谈判，但并不明确宣布罢工。在保证追悼会实际上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在移柩问题上则未予坚持。在基本实现了主要目标(枪毙了田凯)后，就乘胜收兵，对要求抬棺游行全城等意见进行了说服，特别是当送丧行列行至七星岗，部分挽联、祭幛等已开始遭到特务撕毁时，就赶紧劝阻群众，迅速收兵，从而保证了这次斗争胜利结束，而未损失一兵一卒。[4]

实际上，在国、共围绕“胡世合事件”对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胡是怎么死的细节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电力公司前去执行任务是合法的，而非法窃电者打死了合法执行任务的人。因此，中共在该事件的舆情引导中抓住主要矛盾，竭力释放民众、工人及国民党部分中下层人士压抑已久的怨愤。此时，这几股力量心照不宣的纽在一起，凝聚成一股足以震慑当局的威力。这股以“胡案”为导火索爆发的巨大力量仿佛找到了发泄内心怨愤的宣泄口，令当局宿寝难昧。尽管当局曾以“自我”的方式来处理该事件，试图压制和平息这股“悄然爆发”的怒火。然而，事态的演变却与当局的“打压”成反比。鉴于事态发展之严峻，当局深知必须做出一个令这股力量“满意的答卷”，否则难以平息“燎原之势”的怒火。当然，整个事件的过程中， 国、共双方均利用舆论，或者说在舆论当中发表他们自己的见解，对彼此进行有力的回击。但是，双方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坚持“斗而不破”之抗日统一战线。

四、余论：关于胡世合事件“含糊不清”的几个问题

“胡世合事件”之发生距今已 76 年之久，而关于该事件仍有几个“含糊不清”的问题，故笔者在查阅相关档案及耙梳相关文献后，对相关问题进行谨慎考证，以厘清相关研究之谬误。

首先，关于“胡世合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对“胡世合事件”的梳理和了解过程中，笔者发现目前学界对该事件发生之时间尚未有统一定论，故而其发生时间出现两个。一部分人认为该事件发生于 1945 年 3 月 20 日[5]，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该事件发生于 1945 年 2 月 20 日。

1《关于检送胡世合案情及拨款抚恤的呈、公函、令（附解决办法)》，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3-00124-0000-001-000,1945 年 2 月 27 日。

2《编辑部启事》,《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27 日，第三版。

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1-132 页。

4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11 页。

5以下著作均认为 “胡世合事件”发生于 1945 年 3 月 20 日。如吉林省长春市总工会文教工作委员会编：

[1]经过耙梳相关档案、报刊杂志等资料，相互比堪印证，该事件确为发生于 1945 年 2 月 20 日，其发生的前因及其经过已在前文述及，此不再赘述。

其次，胡世合家属究竟获得多少赔偿款。关于“胡世合事件”的赔偿问题，在相关著作及文献中仅记载贺耀祖代表当局送了 10 万元国币[2]给胡的家属作为抚恤金。另外，有期刊杂志声称，田凯被“明正典刑”——即被卫戍司令部判决执行枪决后，偷电的中韩文化协会的饮食部亦经勒令停业，胡世合的灵柩亦经过很隆重的祭奠仪式后安葬。他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则经市政府给予大笔的抚恤金，且仍由电力公司抚恤和向中韩饮食部要求 100 万元的损害赔偿。[3]那么，胡所遗留的寡妇孤儿究竟总的得到多少赔偿款呢？事实上，除了由贺市长赠送 10 万元作为治丧补助费用外，电力公司还要垫拨 10 万元。另外，市政府责令中韩文协饮食部负责部分丧葬费，至民事赔偿部分则由审讯机关明核后，由市政府责令执行。电力公司抚恤费仍由电力公司照抚恤办法办理。[4]田凯被“明正典刑”后，此案由王松懋、杨贤生等从中调解，取得双方代表同意，彼此谅解，并签订“和解文约”。由中韩文协餐厅代表吴汉治以私人名义付给胡世合遗族抚恤法币 25 万元整，立约之日一次付清，由胡世合家属代表胡世顺出具收据为凭。[5]综上可知，胡世合“遗族”前前后后总共获得赔偿款 45 万元。

最后，关于胡世合事件的后续。尽管田凯已经被枪毙，该事件亦在当局处理下平息下来，但是其后续还未完结。因此，重庆市电力公司产业工会理事长陈铁夫便于 1945 年 3 月 22 日呈函市政府称，其会会员胡世合因公惨遭暴徒枪杀致死一案，虽经市政府主持公正，一致声援将凶手田凯依法判处死刑，并将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查封。但是，他扼要提出三点疑问：其一，此案的主谋人江德茂未经拘押，仍逍遥法外；其二，中韩文化饮食部复又整修门面，定期复业；其三，此案移交法院审判，数月仍未得传讯，故其希望知晓以上三项具体细节。随后，市政府是日派员前往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查得该饮食部启封情形缘由：一是因本市近期成立青年军接待站，尚无地址办公，该站因奉唐局长面谕暂借封闭之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备作招待青年军入营之用。二是此次青年军押解来渝俘虏 30 余人需地关押在急，故将俘虏暂置于该饮食部，为免发生意外起见，特将该部门窗、桌凳修理，并经该站派员监修，以

《工会工作辞书》（吉林省新闻出版社,1988 年,第 513 页）；陈乐洋主编：《工会工作手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年,第 127 页）；本社编：《工会工作手册》（工人出版社,1986 年,第 173 页）；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年,第 445 页）；王虹生等主编：《工青妇大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400 页）；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下）（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1982 年,第 174 页）等。

1以下著作均认为 “胡世合事件”发生于 1945 年 2 月 20 日。如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 年）；齐武著：《中国工人运动史 .第 5 卷 .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 6 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等。

2关于“胡世合事件”的赔偿款问题，以下资料均有涉及。如刘光：《关于重庆电力公司反特斗争的总结(节录）》，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132 页）；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08 页）等。

3梅生：《悼渝电工胡世合之死漫谈“不平”(工余随笔）》，《中国劳工》1945 年第 6 卷 3-4 期 ，第 11 页。

4《关于检送胡世合案情及拨款抚恤的呈、公函、令（附解决办法）》，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3-00124-0000-001-000,1945 年 2 月 27 日。

5《关于检送胡世合案和解文约的呈、指令（附文约）》，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110-000,1945 年 5 月 30 日。

供青年军招待之用，并与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复干所呈全属误会。此外，江德茂未经拘押及全案移交法院仍未得传讯二项事关未了民事，市政府称“无法查办，除将第二项批示外，拟请将第一、三两项仍函请法院办理”。[1]

随后，法院亦对该事件后续作出回应。该案经王松懋、杨贤生等从中调解，取得双方代表[2]同意，彼此谅解，故此案业于 5 月 16 日当众签订和解文约 ，各执一份为凭。文约内容涵盖六点：（一）承王松懋、杨贤生因甲、乙双方友谊关系出面调停，已得双方谅解，彼此为息事计，彻底结束此案；（二）由乙方代表以私人名义付给胡世合遗族抚恤法币 25 万元整，立约之日一次付清，由甲方出具收据为凭；（三）甲乙双方一切诉讼共同具呈法院撤回，以后任何一方不得另生枝节；（四）同式缮正式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据；（五）由工会方面照式缮成副本分呈党政机关备查；（六）以上各项双方签字之日即生效力。[3]

事实上，当田凯被“明正典刑”后，电力工会继续要求当局彻底了结该事件，因为涉及该事件的主要对象江德茂[4]及中韩文化饮食部还未得到应有处置。因此，当局在电力工会的催促下亦呈函法院，鉴于该事件主要问题已经解决。抗日大局当前，中共亦未再利用该事件生事，其始终坚持“斗而不破”之原则，坚持“抗日统一战线”。[5]因此，该案才在王松懋、杨贤生等调解下顺利了结。胡的家属拿到相应赔偿后，双方一切诉讼共同具呈法院撤回，此后任何一方不得另生枝节。至此，该案由胡世合家属代表胡世顺，中韩文化饮食部代表吴汉治在“和解文约”上签字，此案宣告彻底结束。

1《关于胡世合遭暴徒枪杀疑点的呈、公函、指令》，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082-000,1945 年 3 月 22 日。

2立和解文约人为胡世合家属代表胡世顺与中韩文协餐厅代表吴汉治，分别为甲、乙方。

3《关于检送胡世合案和解文约的呈、指令（附文约）》，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53-0019-02962-0000-110-000,1945 年 5 月 30 日。

4此人为卫戍第一分区司令部谍报员，参见《特务横行越来越凶，偷了电还枪杀工人，特务统制一天不取消，人权就一天没有保障，邹容路惨案便是实例》,《新华日报》1945 年 2 月 22 日，第三版。

5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下）,重庆出版社,2017 年，第 1211 页。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建党纪念仪式与党的形象塑造

陈莉莉　王二亚[1]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举行了规模宏大的纪念仪式，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建党纪念仪式在建构历史记忆、凝聚思想共识、塑造政党形象、增进政治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随着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研究的兴起，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的研究就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确立、[2]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文本的考察[3]、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的价值[4]等，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纪念活动主要包括文本纪念和仪式纪念两大类，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在物资匮乏的革命根据地，由于组织大规模纪念仪式的人力物力消耗、安全隐患、成本收益等因素，大量纪念活动主要采取文本纪念的方式，在党报党刊发表社论、纪念文章，出版专刊、特辑，发表宣言、通告，发致敬电、贺电，发表纪念题词等等。“以文本为载体实施纪念，运作成本低、传播范围广，简便易行，是中共纪念活动运用最广泛的形式”[5]，因此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相关研究也主要挖掘中共文本纪念的史料进行论证。但资料显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仍然组织了大量规模宏大、群众广泛参与的周期性的建党纪念仪式。那么，为什么建党纪念活动除了文本纪念外，还有必要组织仪式纪念？这些纪念仪式是如何组织的？它与一般通过文本方式开展的纪念活动相较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这些问题还需要结合纪念活动史研究和政治仪式研究的推进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仪式的演进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重视通过“五一”、“三八”等国际性节日和“十月革命”、列宁逝世日等纪念日活动来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主张，组织和动员劳苦大众投身革命运动，

---

1 作者简介：陈莉莉（1981-），女，河南荥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王二亚（1998-），女，河南平顶山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编年史”（十三卷本）（20&ZD0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仪式研究”（19YJC710008）、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延安时期中共纪念仪式与政治认同研究”（2021GGJS039）的阶段性成果。

2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确立，代表性的成果有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陈金龙《中共建党纪念日的由来与确立》，郭辉《中国共产党诞辰的历史记忆与纪念》，徐元宫《中共诞辰为何定在 7 月 1 日》，项韬《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研究》等。

3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文本的考察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梁华奎《党员保持党性纯洁的历史借鉴——以延安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文本为视角》，席富群《从党史解读范式的变迁看中国共产党社会功能的自觉———以中共中央纪念建党的若干文本为考察对象》，俞祖华、程慧荣《百年以来中共“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以建党纪念文本为重点》，俞祖华在《中共建党纪念话语的百年变迁———以“七一”建党纪念文本为分析重点》，《一九五一年：建党 30 周年“文本纪念”活动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以对中共党史的宣传为叙述中心》等。

4 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价值和功能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陈金龙《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的社会功能———以新中国“七一”纪念活动为中心的考察》、赵宇《抗战时期中共建党纪念活动涵养培育的文化自信》、张天浩《建党纪念融入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价值意蕴和路径探索》，项韬《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活动的历史研究》等。

5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9.

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前尚未对自身建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组织纪念仪式。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宁都暴动等革命暴动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日等纪念日开始纳入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谱系，尤其是1933年6月中央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确定每年的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并在当年的8月1日进行史上首次“八一”建军节阅兵仪式，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发展过程中重大事件进行纪念的自觉意识不断加强，而纪念仪式因其在鼓舞民众革命热情、动员军民参军参战保卫边区工作中的积极功效，成为重大纪念日活动的重头戏。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后长征战略转移的过程中虽然暂时中断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纪念活动，但是随着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尤其是西安事变爆发后内战的结束以及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纪念活动再次活跃并不断开发新的纪念对象，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确立并走向常态化。

（一）中共建党纪念日的提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演讲，他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这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建党纪念日。但查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资料，各种新闻报道在讲到中共建党纪念时突出强调了“中共十七周年”，而没有明确建党纪念日的具体日期，显然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从提出到形成共识并最终变为人们的政治常识经历了一个过程。1938年6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的《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开篇讲道：“七月七日为我们抗战周年纪念日，同时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2]，但通篇并未明确7月1日就是中共建党纪念日。在陕甘宁边区机关报《新中华报》1938年6月25日的新闻稿《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抗大是怎么筹备的？》中，虽然述及“边区各界曾经筹备决定自七月一日起至七月七日止为纪念周。举行盛大的宣传动员”[3]，但通篇也未明确地将7月1日确定为中共建党纪念日。而6月30日刊载的文章《纪念“七一”“七七”与我们的任务》开篇第一句话讲道：“今天是抗日救国战争的一周年，同时也正巧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十七周年”[4]，将抗战周年纪念日和建党周年纪念日笼统并提，显然对建党纪念日具体日期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尚未成为政治常识。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延安市商会、延安农民会等各界各团体在致中共十七周年的贺信中，也只突出“十七”这个数字，如“中共十七年来的英勇斗争”、“共产党十七周年来的历史”[5]等，而未明确“七一”这个具体日期。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这一政治知识事实上是随着1938年7月1日延安大规模纪念仪式的举行而迅速获得广大群众的了解并成为常识。按照陕甘宁边区抗战一周年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0.
2 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N].新中华报，1938-6-15（3）.
3 谭平.从“七一”到“七七”纪念周抗大是怎么筹备的？[N].新中华报，1938-6-25（2）.
4 齐华.纪念“七一”“七七”与我们的任务[N].新中华报，1938-6-30（3）.
5 边区各界各团体致中共十七周年纪念的贺信[N].新中华报，1938-6-30（4）.

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周的筹备安排，“七月一日是工人日，同时是延安市各业工会总俱业部成立。上午十时在市工会举行工人大会，到印刷厂，工人合作社，缝衣工人，机器人，工人干部训练班，以及市工会所属各业工人共千余人”，但是“最轰动全城的是晚间的庆祝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的提灯大会”，在延安南门外公共体育场，“主席台的前面，高高地挂着：‘延安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几个字”，“大概全延安城二分之一以上的人们，都已汇流到这里来了”，参加纪念大会的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1]热烈隆重的纪念仪式不仅让参与群众对中共建党纪念日记忆犹新，而且经由口耳相传和报刊传播被更广大范围的群众所知晓。此后的陕甘宁边区机关报对中共建党纪念的报道开始凸显“七一”建党纪念日，如在介绍洛川“七一——七七”纪念周活动时，明确指出“在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日‘七七’降临之前，中共的诞辰——‘七一’来到了”[2]。1939 年中国共产党 18 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新中华报》于 6 月 30 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开篇第一句就明确指出：“‘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3]《新中华报》明确表述“七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直接影响了其他报刊的相关报道，新闻媒体对建党纪念日明确的宣传报道也进一步促使更广大范围的群众对“七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接受和认同。

“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之所以需要一个确立和达成共识的过程，主要源于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体召开日期的争议。中共一大 1921 年 7 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由于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相关档案资料的缺失，加之时隔十几年当事人记忆的模糊和回忆的不一致，中共“一大”的具体召开日期曾一度成为“历史之谜”。当 1938 年对中共建党纪念庆祝活动提上日程的时候，纪念日的确立就成为当务之急，最终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与董必武商讨决定“就用七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4]。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求证，相应地，“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从被提议到逐步接受直至达成广泛共识的过程。

（二）中共建党纪念仪式的常态化

1938-1941 年间，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仪式主要在陕甘宁边区举行，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辐射范围相对较小。1940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行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建党纪念社论《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使中共建党纪念的影响开始扩展到国统区。虽然这篇社论并未明确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具体日期，但在 7 月 1 日当天面向国统区民众公开发表纪念社论本身，就体现了对“七一”中共建党纪念日的认同，而社论强调“中共的产生，是表示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先锋的组织，是表示中国劳动群众有了团结的核心，是表示中国政治舞台上，添了一支新生的欣欣向荣的力量，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变，是中国民族和社会获得解放的因素”，[5]更是向国统区广大群众深刻阐发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历史意义和“七

1 活跃的延安动态[N].新中华报，1938-7-5（3）.
2 “七一”“七七”纪念在边区[N].新中华报，1938-7-20（2）.
3 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N].新中华报，1939-6-30（1）.
4 何俊华.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间的艰难求证[J].文史杂志，2011，(03)：4.
5 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N].新华日报，1940-7-1（2）.

一”中共建党纪念日的使命价值。1941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诞辰 2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做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强调：“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1]这是中共中央首次以指示的方式明确规定每年的 7 月 1 日为建党纪念日，由此，在各抗日根据地，“七一”建党节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念日谱系中至关重要且十分固定的组成部分。在国统区发行的《新华日报》也于 1941 年 7 月 1 日当天发表的建党纪念社论中明确提出“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节日，正当着世界发生惊人之巨变，这就有它严重的新的政治意义。”[2]虽然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在国统区举办建党纪念仪式受到诸多限制，但自 1941 至 1949 年间，每逢中共建党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各根据地通常都会举办纪念大会等一系列仪式活动，如《解放日报》就相继报道了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等举办“七一”纪念大会的盛况，建党纪念仪式逐渐实现常态化。

表 1：1938-1949 年间中共建党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发表纪念文章频数统计（单位：篇）

主题	年份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总计
纪念大会	1	1	5	2	3	10	1	9	8	7	4	11	62
纪念文章	0	2	4	6	2	8	3	2	3	2	1	3	36

资料统计来源：以 1938-1949 年间《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太岳版）、《人民日报》所刊发的“七一”纪念大会及纪念文章为依据。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建党纪念仪式的操演

自 1938 年中国共产党首次举行建党纪念仪式始，此后历年所举行的建党纪念仪式都经过详细的筹备策划，有着规范的流程，并在仪式之后持续巩固纪念效果，努力使广大群众在纪念仪式的广泛参与中了解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历史及目前的工作任务。

（一）纪念仪式的筹备

建党纪念仪式正式开始前通常会进行广泛的宣传和详细的筹备，通过制定宣传大纲、召开筹备会等来统一安排宣传事宜及注意事项，通过开展献礼活动和仪式空间的提前布置来渲染气氛吸引群众，以确保仪式能够顺利举行并达到预期效果。

1.制定宣传大纲

宣传大纲，是比较正式、官方的纲要性文字材料，其目的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时间的计划安排，动员群众，凝聚共识，从而实现党的政治主张。从 1938 年始，在每年“七一”到来前夕，中国共产党通常都制定宣传大纲，用简洁凝练的文字材料向民众传达此次纪念仪式的主题和当前的任务，为组织建党纪念仪式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宣传大纲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和任务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 2 册）[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61.

2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N].新华日报，1941-7-1(1).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提出了自身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并在建党纪念的宣传大纲中反复重申这一点。如 1938 年 6 月 12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通过的《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就首先阐明“中共是为马列主义所领导的最先进革命阶级的政党，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最后奋斗的目标。同时根据中国实际的情况，为中国人民利益的每一个进步事业而奋斗。”[1]6 月 24 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也在开篇即明确提出：“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的党。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它的历史使命”，“为了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中共的首先任务，就是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争取民主革命的澈底胜利，然后使中国革命走向共产主义去”。[2] 在宣传大纲中开明宗义点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使命和任务，并藉由建党纪念活动进行广泛宣传，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始终旗帜鲜明的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2）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及其正确性

回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而艰苦奋斗的历史进程和重大贡献，是建党纪念宣传大纲的重要内容。如 1938 年《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就明确指出：“中共过去的十七年即是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艰苦奋斗的十七年”，“它的基本主张的正确是为十七年来中国的革命史所证实了”。[3]1941 年《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也强调“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要“着重宣传我们的施政纲领，是能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方法，同时也是全国人民能够走向光明胜利的道路。”[4]1948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中也提出“应该简要的报告党的二十七年的历史，说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应该告诉全党：这个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和实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完全正确的；证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对于这个革命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5]。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及其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向广大群众呈现了一个为国为民没有私利的先进政党形象，从而有力地“号召广大民众拥护和信任共产党”[6]。

（3）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活动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服务于党的阶段性中心工作。在建党纪念宣传大纲中也十分重视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和阐释。如 1938 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的《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为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持久抗战主张，详细列举了“中日双方在战争中所具有的四个相反特点”，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坚决反对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要从持久抗战中去争取最后胜利，要抱定持

1 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N].新中华报，1938-6-15（3）.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1936-1938）[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1:524.
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1936-1938）[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1:524-525.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61.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N].新华日报，1948-07-01（1）.
6 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N].新中华报，1938-6-15（3）.

久抗战的决心与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1]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判断，能够推动广大群众在了解当前客观形势的基础上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4) 布置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

客观分析国内外形势，是为了更好的针对现实情况提出具体的工作任务，并号召广大群众来贯彻和执行。1938 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的《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不仅要求在共产党的会议中“具体指出中共现在的任务”，包括“努力参加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继续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党的组织，保持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对群众的亲密联系，加强党员干部马列主义的教育，发扬过去艰苦奋斗的作风，提高政治警觉性，严密防止汉奸反动分子在党内进行破坏工作”等，而且还从五个方面明确列出了“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及边区民众在今天纪念抗战周年与纪念中共十七周年中的任务”。[2]1948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发布的《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中，也要求各级党委“利用可能的时间，着重地组织党内干部对于中央的路线、政策的学习，特别是学习最近时期内党中央和中央同志所发表的各种重要文件，联系各地方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具体工作，展开讨论，提高觉悟，改进工作。”[3]布置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使全党能够统一思想，更坚决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任务的过程，也是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过程，从而使广大群众“更亲密的团结在共产党周围”[4]。

2.召开筹备会议

“七一”纪念仪式是非常隆重的政治性活动，为保证纪念仪式顺利开展并收到应有的效果，党、政、军各机关团体通常于中共诞辰前夕召开筹备会议，对仪式的整个过程进行周密的计划和部署。

表 2：1938-1949 年“七一”前夕召开筹备会议情况

主题	年份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1946	1947	1948	1949
筹备会议	√				√	√			√	√		√

资料统计来源：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太岳版）、《解放日报》所刊发的“七一”前夕召开筹备会议的文章为依据。（表格中√号表示查阅的该年份参考文献中有报道召开建党纪念大会筹备会议）

通过分析“七一”筹备会议的相关文献资料，1938-1949 年“七一”建党纪念筹备会议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筹备“七一”纪念日的纪念时间

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共建党纪念日的纪念常常采取将“七一”至“七七”这一周定为“宣传周”的方式进行，如 1938 年就将“七一”与“七七”合并纪念，组织“抗战一周年及中

1 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N].新中华报，1938-6-15（3）.
2 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N].新中华报，1938-6-15（3）.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N].新华日报，1948-07-01（1）.
4 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N].新中华报，1938-6-15（3）.

共十七周年纪念周”[1]。各地在组织纪念大会时也常将“七一”和“七七”并提，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合水县合并举行“七一”“七七”纪念大会，[2]1946 年太行区党委在筹备建党周年纪念时也提出：“党决定‘七一’到‘七七’为纪念周。”[3]“七一”与“七七”虽然纪念对象不同，但由于时间临近且都意义重大，尤其是全面抗战时期“七一”纪念的中心工作就是进行抗战动员，“七七”纪念也能够更充分的展示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所作的贡献，合并形成的“七一”——“七七”纪念周实现了两个重要纪念日的彼此强化，通过一系列仪式展演将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外群众中的影响力。

(2) 筹备“七一”纪念日的纪念方式

随着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的常态化，中共局部执政区域各机关团体通常于每年的7月1日建党纪念日当天放假，并在假日期间举行“七一”纪念大会。纪念大会相较其它纪念活动更显盛大庄重，也往往因获得更多关注而具有更佳的纪念效果，因此纪念大会的筹备工作是筹备会议的重要内容，纪念大会发言人的名单、大会宣言的内容、大会通电、纪念口号等都需要在筹备会议确定下来。纪念大会上发言人的报告为能调动整个会场的气氛，达到纪念大会召开的举办目的，发言内容主要围绕纪念大会的意义、有关党史的问题、整风学习、表扬先进批评落后等展开，给参会者呈现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形象。如1942年绥德在筹备纪念“七一”“七七”的会议中就明确提出纪念办法的第一项就是“‘七一’由特委召开党员会议，由袁政委作与整风学习有关之党史问题报告”[4]。除了召开纪念大会，纪念日当天还会安排会餐、娱乐活动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教育党员、引导群众的目的。如1942年绥德的“七一”“七七”纪念筹备会议就规划“青救会及学联共同组织部队青年与地方青年演讲比赛，及男女篮球赛”；1949年6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召开的“七一”“七七”纪念筹备会议也决定：“七一、七七分别召开纪念大会，介绍七一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党史等，并举行纪念晚会、座谈会及球类比赛。”[5]

(3) 筹备“七一”纪念日的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既可以向群众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等重要信息，也能起到舆论引导作用，推动相关纪念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也是筹备会议的重要议程。在筹备“七一”——“七七”宣传周中，筹委会通常会组织宣传小组、宣传队，深入群众作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通过贴标语、举办晚会、出版纪念特刊等宣传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历史及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伟大贡献。如1942年绥德在纪念“七一”“七七”的筹备会议中指出：“七月一日至七日间，由绥师及各小学组织五个宣传队，至各地宣传，由战斗剧社出演两个音乐晚会及民众剧团出演一个秦腔晚会。”[6]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活动的宣传中也注意“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选择不同的宣传内容和方式。如1942年山东、晋察冀等地在筹备纪念“七一”“七七”时“在老解放区对群众普遍推行政策教育，新解放

1 活跃的延安动态[N].新中华报，1938-7-5（3）.
2 各县纪念“七一”“七七”两个伟大的日子.新中华报[N].1940-7-26(3).
3 太行各机关紧张筹备 迎接“七一”“七七”[N].人民日报，1946-06-26（2）.
4 绥德筹备纪念七七 举行大会组织下乡宣传队[N].解放日报，1942-06-26（2）.
5 纪念“七一”“七七”，革大开筹备会[N].人民日报，1949-06-30（2）.
6 绥德筹备纪念七七 举行大会组织下乡宣传队[N].解放日报，1942-06-26（2）.

区从回忆翻身中树立依靠民主政府和共产党的观念。”[1]中国共产党从宣传方式、宣传对象、宣传内容等着手，对宣传工作进行了周密筹备，努力使“七一”纪念仪式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3.开展“七一”献礼活动

为保证七一纪念仪式的顺利开展，各地在召开筹备会商定“七一”纪念办法后，还通过开展各种“七一”献礼活动，逐步形成浓厚的纪念氛围。

（1）开展整风学习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并将建党纪念与开展整风学习相结合，促进党员在党的周年纪念活动中积极检视并提高自身。如 1943 年 6 月晋西北纪念“七一”“七七”的筹备会议指出：“‘七一’‘七七’纪念节将届……今年纪念这两个节日，应当与当前生产与整风两大任务配合起来。”[2]民主革命时期，深入贯彻整风运动，学习整风文件，形成优良的党风，使党员同志保持优良党性并带动党外群众严于律己，这便是为中共诞辰准备了献礼。

（2）开展生产竞赛

为迎接“七一”，各革命根据地的印刷厂、炸弹厂、造船厂、铁路职工等纷纷掀起竞赛革命。如 1946 年 6 月 7 日下午，冀鲁豫印刷局第一厂全体职工举行大会，各小组代表纷纷发言，表明自己的计划，掀起革命竞赛。伙夫也被卷入到竞赛热潮之中，表明自己今后的工作计划，从而为‘七一’中共二十五周年诞辰献礼，大会最后在高涨的情绪中宣告结束。[3]1947 年 6 月 15 日，军供炸弹厂的李工长在总结上半月工作后提出：“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七一’，大家再加点油把六月份生产数量再提高一步”。全场工友都热烈赞同，会后积极行动起来，天一亮吃了饭就上工，午觉也不睡，即便下工钟已响，大家还是不停地工作，用提高炸弹的生产数量来为七一献礼。[4]1949 年 5 月，“大连造船厂工友发起的生产竞赛，不但使五月份修船任务圆满完成，而且将六月份任务提前一个月于五月底完成。旅大行署工业厅所属造船公司之各场工友，也普遍掀起迎接七一、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竞赛，工友保证其计划于‘七一’前完成，以此作为对党的献礼。”[5]1949 年 6 月，“北平、长辛店、丰台各铁路职工暨北平邮政管理局、华北公路运输总局等四十余单位，纷纷掀起生产竞赛以迎接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诞辰。铁路职工积极响应，依据本单位的具体业务，制定了增产计划，普遍自动加班，以献工增产作为‘七一’献礼……”[6]通过开展生产竞赛，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的热情都被极大调动起来，纷纷给自己定生产计划,加班加点不计回报，用提高数量和质量来为“七一”献礼。

（3）开展表功运动

为了迎接七一，各地纷纷开展立功运动，群众加紧抗旱备荒立功，党员争取功上加功。

1 山东晋察冀等地筹备纪念“七一”“七七”[N].解放日报，1946-06-24（1）.
2 本市各界筹备 热烈纪念抗战六周年 晋西北筹备隆重纪念“七一”“七七”[N].解放日报，1943-06-30（1）.
3 冀鲁豫第一印刷厂 迎接七一发动竞赛[N].人民日报，1946-06-21（2）.
4 提高产量迎接“七一” 军供炸弹厂掀起增产热潮[N].人民日报，1947-06-30（2）.
5 旅大中苏合营工厂迎接七一，竞赛提前完成全年生产[N].人民日报，1949-06-08（1）.
6 北平丰台长辛店铁路职工加班竞赛迎接七一[N].人民日报，1949-06-19（2）.

如1947年6月，黎城县委号召“在‘七一’前每人要立一大功为党献礼，月底前举行党纪念‘七一’的会议，迅速报功表功评功”[1]。在左权县，“中共左权五区分委号召各村支部总结斗争历史，党员争取功上加功，祝贺党的二十六周年生日……到‘七一’时把功劳摆在党的面前。”[2]表功运动是群众性运动，模范评选是以生产、做群众工作为标准，民众在激励之下纷纷加入到表功运动行列，树立前进的方向。在表功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人物，如1947年7月，“为了纪念七一，太行军区政治部以十天时间，评选半年来的功臣模范。选出十五位功臣，当选头名功臣的炊事员吴有珍同志，在风箱旁整整八年，工作始终如一，天不明即起，一天要烧十二锅水。”[3]

除此之外，各根据地还通过 “加强党报发行”、“赶制七一纪念邮票”等方式为“七一”献礼，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生产热情，为“七一”纪念仪式的顺利开展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4.仪式空间的设计

纪念空间，即节日当天在特定的场所组织纪念仪式重演、再现党的历史的空间，这些固定性的空间是有别于其他日常空间的“仪式空间”。离开纪念仪式，纪念空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正是“仪式化”使得纪念空间真正具有了纪念意义。

“七一”纪念仪式于七月一日当天举行，大会的选址往往是大礼堂、运动场等与党的历史有关联的开阔场所，从而使与会人员置身于与过去有所勾连的“场域”之中，产生一种历史感。“七一”会场的布置与纪念主题相呼应，陈列着与党有关的物件，如党的领导人肖像、党徽、旗帜、标语等，且领导人肖像的空间位置排列也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会场周围贴满了红绿色的鲜明标语，正中央高悬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同志的巨幅画像”[4]。幕布的颜色、黑夜中的灯光、胜利的乐曲与领导人有关党的报告融为一体，给参会者营造一种容易产生情感共鸣的历史背景。如194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记党的生日》的报道描述到：“纪念大会在北平先农坛运动场举行。看台上、跑道上人山人海，这些人的眼光都朝着主席台上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像。主席台对面，高举马、恩、列、斯巨像，主席台右边的指挥台上，三大画像是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三同志。入夜，水银灯的强烈光芒照在这些巨像上，神彩（应为采——引者注）焕发。场中用数百盏电灯联成的大五角星，灿烂辉煌。”[5]“七一”中共建党纪念仪式的空间设计将参会者置身于旗帜、标语、口号、肖像、歌曲等象征性符号中，使其受到空前的视觉冲击、听觉冲击、心灵震撼，产生即时的情感共鸣、情绪渲染，建构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记忆之场。

（二）纪念仪式的操演流程

仪式操演流程，是指在特定的场所和时间，按照规范化、标准化的仪式程序，用各种象征性符号将大会主题传递给参会者的过程。中共纪念仪式的操演流程相对比较固定，参与者的言行往往都要以设定好的方式展现。

1 黎城县委号召党员 迎接“七一”加紧立功[N].人民日报，1947-06-26（2）.
2 黎城县委号召党员 迎接“七一”加紧立功[N].人民日报，1947-06-26（2）.
3 拿实际行动给“七一”献礼 涉县生产节约成绩大[N].人民日报，1947-07-13（2）.
4 区党委七一召开党员大会，隆重纪念党的诞辰 [N].新华日报（太岳版），1946-07-05（1）.
5 苏棣.记党的生日[N].人民日报，1949-07-02（1）.

1.宣布大会开始

七月一日当天的“七一”纪念大会仪式通常在歌声或致开幕词中宣布大会开始。1942年7月1日延安举行的“七一”纪念大会上，“国际歌高声齐唱，从第一排座位上的林伯渠同志起，都脱下帽子，起立为我党殉难同志静默致哀。”[1]大会伴随着庄严的国际歌曲正式开始，参会者高声齐唱国际歌，并纷纷脱下帽子，起立对党中央致敬，对殉难同志致哀，纪念大会正式开始。1944年7月1日太岳区举行的七一纪念大会，“首由主席赵守攻同志致开幕词，他首先对非党干部表示了很愉快的欢迎，继而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及在今天形势下纪念的意义……”[2]

2.成立主席团

主席团分为两类：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七一”纪念大会的参会者有党内同志、党外群众、国内民主人士以及国外人士等。如1943年7月在延安召开的“七一”晚会的参与者，“有党中央全体同志，各级党的干部和非党员干部，来延不久之日本共产党领导者冈野进同志及在延之苏联、美国人士，亦均列席。”[3]在1949年北平市“七一”纪念大会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董必武同志、薄一波同志、彭真同志等为大会主席团。”[4]纪念大会的实际主席团往往由党内同志构成，名誉主席团往往由党内领导同志组成，但名誉主席团也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和国际人士。邀请这些外国人士参加纪念大会并位列名誉主席团，是中共坚持统一战线的体现，团结一切可能的阶级和阶层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3.发表讲话

确立主席团之后，进入发表讲话环节，首先由党内同志进行发言，发言内容主要围绕中共艰苦奋斗的历史，下一阶段的任务等。如1943年7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七一”干部晚会上讲到：“党在过去干了三次大的革命运动，现在集中力量对付日寇。”[5]1943年7月北岳区“七一”纪念大会上潘自力在大会发言中“首先报告开会意义，略述中国共产党在这二十二年的艰苦奋斗中，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贡献。”[6]除了领导人讲话，还有其他诸如劳动英雄、民主派人士等的讲话。如1949年的北平市“七一”纪念大会上，沈钧儒讲到，“中国能取得当前的胜利，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并号召全国团结一致，迅速建设新中国。”[7]由党的领导人最先发表讲话，体现大会的重要性，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定下明朗的基调，允许其他民主派、农民群众、模范英雄等发表讲话，体现中国共产党善于倾听各阶层的心声，树立了党的民主形象。无论是党内同志还是党外群众进行发言，发言内容都是在赞扬党的光辉史绩，号召党与人民群众合作完成下一阶段任务，争取革命胜利。

4.高呼口号

发言结束之后，宣读致党中央和领导人的祝贺电文。发言人的讲话调动起与会人员的

1 庆祝党的二十一周年 本市各界分别举行纪念 林主席号召努力整风学习[N].解放日报,1942-07-02(1).
2 太岳区党委七一盛会 隆重庆祝中共诞辰[N].新华日报（太岳版），1944-07-07（3）.
3 七一干部晚会上 毛泽东同志总结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N].解放日报，1943-07-03（1）.
4 平市三万人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七一 毛主席亲临参加[N].人民日报，1949-07-02（1）.
5 七一干部晚会上毛泽东同志总结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N].解放日报，1943-07-03（1）.
6 北岳区盛大集会隆重纪念七一[N].解放日报，1943-07-10（3）.
7 平市三万人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七一，毛主席亲临参加[N].人民日报，1949-07-02（1）.

情绪，全场高呼着的口号声与发言人形成呼应，纪念大会最后在口号声中宣布结束。如 1938 年 7 月在洛川举行的七一纪念大会，“发言人报告结束之后，宣读了祝贺电文，大家一致赞成通过，大会是在傍晚时分结束，以震天的口号声为标志。”[1]“口号”以极其凝练的表达方式，将此次会议的主题传递给参会者，在会议结束时再次高呼口号，以激昂饱满的情绪来回应发言人与此次大会，使得会场的氛围更加活跃且具有感染力，从而使纪念大会的意义在参会者脑海里的记忆再次加深，收到极好的纪念效果。

（三）纪念仪式的效果巩固

1.举行示威游行

纪念大会结束后，群众还处于高昂地呼喊口号的集体氛围之中，这种兴奋感不会立即消散，大家意犹未尽，这个时候通常会举行示威游行。如 1946 年 7 月 1 日陇东分区的纪念大会“全市普遍庆祝，两侧墙壁和杨柳树上，张贴着反对内战标语，下午分区各机关部队群众千余人游行，并高呼口号，拥护共产党的和平主张，反对内战。”[2]由纪念大会的主会场延伸至大街小巷的各个分会场，参会者的会场情绪进一步被放大，在热情激昂的口号声的烘托下，街道上散落着的个体也不断地加入游行队伍中，游行队伍不断扩大，汇聚成一个目标相同的整体，游行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整个街道都被游行队伍所填满，都被口号声背后的纪念热情所笼罩，这种集体的纪念力量使得集体中的每一位成员对纪念大会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将其记于心、化于行，从而巩固了纪念仪式的效果。

2.举办会餐及晚会

相较于纪念大会这种程序性、严肃性、规范性的纪念方式，举办会餐及娱乐晚会这种娱乐性、开放性的纪念方式对广大群众更具有吸引力，因而也是纪念大会结束后巩固纪念效果时常常采取的一种方式。如 1947 年 7 月 1 日，中央局在驻村俱乐部召集的七一干部大会散会之后，“中央局并欢宴党与非党各种专门人才和各机关负责同志，表示党对他们关怀和敬意。边区人民文艺工作团、北大剧团亦共同组织晚会，进行热烈的庆祝。”[3]1949 年的建党节“娱乐晚会带给人们同样的兴奋……全场欢呼，掌声大作”[4]。会餐及晚会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中，群众能够以非常轻松随意的心态去谈论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从而理解并认可纪念大会的主题及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时刻遵守党的路线，坚持跟党走。由此，中国共产党在轻松愉悦中达到了教育、引导的目的，使得纪念仪式的效果得到巩固。

3.组织宣传工作

在“七一”到“七七”的宣传周中，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区域各机关单位往往利用节假日组织宣传小组至各地宣传，通过贴标语、举办晚会、演讲比赛、出版纪念特刊等进行宣传。如 1943 年 7 月 1 日起，晋西北“各剧团、各民运小组、各机关临时宣传队，同时出动，采用了种种新颖的方式，将‘七一’、‘七七’的伟大意义，向农村进行了广泛宣传”，宣传

1 七一七七纪念在边区[N].新中华报，1938-07-20（2）.
2 陇东分区纪念七一　拥护中共和平主张[N].解放日报，1946-07-09（2）.
3 中央局召集党与非党干部大会　盛大纪念党的生日[N].人民日报，1947-07-03（1）.
4 苏棣.记党的生日[N].人民日报，1949-07-02（1）.

小组“每日自带食粮，到附近村庄帮助群众夏收……早出晚归，帮助群众锄草，一面劳作，一面宣传”[1]。1946 年 7 月“冀鲁豫济宁市街道上贴满纪念标语，各路口均扎制牌坊，各宣传队揣大批宣传品，分赴各宣乡镇宣传”。[2]纪念大会的会场空间有限，无法容纳所有的群众，故参加纪念大会的只是一部分人。组织宣传工作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模拟纪念仪式空间的过程，标语、牌坊、刊物则是纪念大会上发言程序的物化符号，在整个宣传运动中，宣传队根据各地民众的实际情况采取具体的便于其接受的方式开展宣传，并在民众中收到强烈的反响。纪念大会的意义和要求被各地群众广泛地认可和接受，民众拥护党的热情高涨，从而巩固了纪念仪式的效果。

三、建党纪念仪式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

民主革命时期，逐步成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党的形象塑造非常重视，“七一”纪念仪式的开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党的光辉形象。

（一）塑造民族脊梁的政党形象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历史实践也充分证明“没有中共这一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不可能。”[3]中国共产党“七一”纪念大会仪式在大会讲话和象征符号中也反复强调这一主要任务和中共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在无形中塑造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脊梁的鲜明形象。

1947 年 7 月 1 日，中央局召集党与非党干部大会来纪念党的生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承志在纪念大会演讲时指出：我们党“已在全国人民面前被证明与被公认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华民族的救星。全世界甚至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公认中国共产党是足以抗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统治——蒋宋孔陈政权的唯一力量，也是足以粉碎这反动进攻的唯一力量。”[4]他的报告强调了中共是唯一能够抗击外敌、领导国人走向胜利的力量，只有中共才是中国的救星，只有中共才能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1947 年晋冀鲁豫边区武安县“七一”纪念大会上，县长张汉林报告中国共产党的英勇奋斗历史，指出“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时时刻刻给人民谋利益，谋幸福，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才有出路，中国才有了光明”[5]。“他的话未落音会场立即爆发出‘帮助蒋管区群众翻身！’的呼声”，体现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救星的观点的深刻认同。“为了更加密切党员与群众的联系，使群众直接监督党员的前进”，武安九区党代表张秀亮同志“公布九区十四个村共二十六个共产党员名字”，这时，“人人以羡慕的眼光瞻仰着共产党员，感到当一个共产党员无上光荣”。[6]当党员同志在主席台上发言时，“群众对于党员热爱的感情，实在抑止不住了”，有群众从人群中忽地站起来，走到主席台前，感动地诉说着党的伟大，认为党是救星，表示“共产党叫咱干啥咱就干啥”[7]。在建党纪念大会仪式上，每每讲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给中国带来光明的时候，群众都发出震天的掌声，看着台上的党员

1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晋西北各界热烈纪念“七一”[N].解放日报，1943-7-17（2）.
2 晋冀鲁豫各地热烈纪念“七一”[N].解放日报，1946-07-04（1）.
3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8.
4 中央局召集党与非党干部大会 盛大纪念党的生日[N].人民日报，1947-07-03（1）.
5 武安九区党员群众 欢欣庆祝我党生日[N].人民日报，1947-07-04（2）.
6 武安九区党员群众 欢欣庆祝我党生日[N].人民日报，1947-07-04（2）.
7 武安九区党员群众 欢欣庆祝我党生日[N].人民日报，1947-07-04（2）.

时，群众对他们的羡慕溢于言表。每一个参会者都激动兴奋，欢呼不已，表示着愿意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建党纪念大会仪式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突出贡献，也体现了党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在这样的会场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脊梁的政党形象。

（二）塑造为民务实的政党形象

“为民务实”包括两层含义，即“为了谁”和“做什么”。为民就是要围绕“人民”这个中心，将其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务实就是要真抓实干，不搞徒有其表的“面子工程”，实实在在用行动来说话。“七一”纪念大会上发表的系列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着力解决最受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塑造了为民务实的政党形象。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在建党纪念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反复宣传这一理念，让广大群众在仪式参与中了解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1947 年 7 月，廖承志在中央局召开的“七一”纪念大会上指出：“我们应更加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我们党千百万干部同志的工作，是去侍候人民，是去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千百万人民去侍候干部，为干部服务。”[1]在纪念大会发言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共产党员的工作是侍候人民、为人民服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的情感认同，与会人员高呼“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解放一切新收复区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2]等口号，久久不能停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并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和认同。1947 年 7 月涉县“七一”纪念大会上，县委总结了涉县党十年斗争的历史，“今天涉县党所以能得到群众的如此拥护，是因为十年中辛辛苦苦给群众办了事，今后还要领导大家做更多的工作，积极支援反攻。”[3]领导人发言结束之后，翻身农民上台讲话，表达对党的感谢，接着，妇女、学生等都纷纷上台说出自己对党的心里话。“讲话的人拥挤不断，都要争着把自己的话说给恩人——共产党。会场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喊声振动了四野，到会人的两双眼睛，注视着台上说话的人，兴奋得闭不住嘴唇”[4]。发言人的讲话激起了民众的共鸣，群众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是因为党的确给人民办了实事，受到了人民的敬仰、拥护。这样一种有所号召、有所回应的会场氛围，使得大会主旨不断被巩固，中国共产党为民务实的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塑造出来。

（三）塑造充满自信的政党形象

1938 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曾坚定地指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5]毛泽东这一回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事实上每逢国家和民族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呈现出高度自信的姿态给广大群众指明前进的方向，带领群众走出困境。民主革命时期建党纪念活动实现常态化后，每年的纪念仪式都在回首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历史的基础上，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努力和实力。1948 年 7 月 1 日在太岳区党政军各直属机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7 周年大会上，区党委王鹤峰同志在大会报告

1 中央局召集党与非党干部大会，盛大纪念党的生日[N].人民日报，1947-07-03（1）.
2 中央局召集党与非党干部大会，盛大纪念党的生日[N].人民日报，1947-07-03（1）.
3 涉县城关纪念“七一” 翻身农民争表知心话[N].人民日报，1947-07-08（2）.
4 涉县城关纪念“七一” 翻身农民争表知心话[N].人民日报，1947-07-08（2）.
5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42-443.

中指出：“我们党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强大（全党党员已超过三百万），目前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争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从战略上讲，今天已不是反攻了，而是在各方面都是进攻的。今天对形势的估计，应多从乐观方面去看，全国的胜利越来越近了！”[1]他的发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自信，自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必将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明前途。1943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在延安“七一”干部晚会上在比较了过去六年抗战与目前形势之后指出：“可以断定，过去我们所指出的光明前途，现在接近实现了。”[2]毛泽东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对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即将实现抗战胜利的自信，“当毛泽东同志及其他中央同志步入会场时，大家均在兴奋愉快的心情中用声震屋瓦之掌声表示欢迎”[3]，毛主席的报告不时地被笑声和掌声打断，也体现了纪念仪式现场广大群众对领袖讲话的高度认同。纪念大会现场是一个高度互动的场域，领导讲话环节并非简单走形式的安排，而是纪念大会主题的权威发布，而纪念仪式效果也有赖于现场群众的体验和反馈，事实上，只有在现场听众那里收到应有的反馈才能达到纪念大会的目的。党的领导人进入会场即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体现参会者对党的敬仰和拥护；纪念大会讲话过程中群众认真听讲并时有笑声，可以看出大会的氛围轻松愉悦；群众掌声多次打断领导人讲话，说明听众对发言内容的认可和支持，这也进一步表明“七一”纪念大会上的这些讲话并非不切实际的夸大，而是建立在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力量的理性判断。中共领导人在大会讲话中透露出的自信，在听众中收到了积极的回应、强烈的认可，“到会同志对于打垮日寇建设新中国的事业，充溢着胜利信心”[4]，从而自信勇敢地朝着夺取革命胜利的目标迈进，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自信的政党形象。

1 太岳党政军各直属机关隆重纪念“七一”[N].新华日报（太岳版），1948-07-05（1）.
2 七一干部晚会上 毛泽东同志总结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N].解放日报，1943-07-03（1）.
3 昨举行“七一”纪念晚会 毛泽东同志作报告[N].解放日报，1943-07-02（2）.
4 昨举行“七一”纪念晚会 毛泽东同志作报告[N].解放日报，1943-07-02（2）.

论述我党“双十二事变”后的“西安”情报与抗日统一战线

吴持生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工作领导人吴德峰同志亲属

（参加陕西省社科界第十五届（2021）学术年会分场：“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建设暨纪念西安事变85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依我母亲戚元德同志《忆往事浮想联翩》遗文第八章节“守护延安 西安情报”内容摘录编撰）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机场（吴德峰摄）

豪公总座周恩来“双十二”在西安

中央分管交通局的任弼时（中共“七大”书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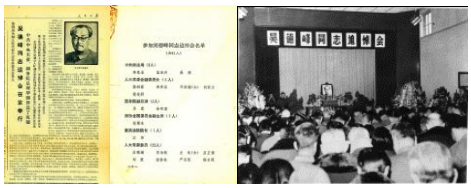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我们不但要有地上军，而且还要有地下军，使两支军队配合起来才能把敌人打垮。”党的隐蔽战线主要包括党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等组织机构，而中共创始并长期指挥、领导这一战场的统帅就是被该系统属员尊称谓之“豪公总座”的周恩来同志。我的父母亲吴德峰、戚元德同志长期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经常以各种角色去开展完成各类艰巨任务。

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合影（邓颖超同志摄影）

附吴德峰戚元德同志简况：

吴德峰，曾用名吴士崇、吴铁铮、吴铁峰、戚元道，1896年出生于湖北保康县石磐岭一户官僚地主大房产主家庭。1911年10月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曾任班长，1914年2月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并组织发动学潮，驱逐反动校长、面斥教育厅长等革命活动。1921年参加革命，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共产党，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书记；1925年夏经党决定加入国民党，先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军事部长、武汉国民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等职；1927年8月至1929年春先后任湖北省常委、军事部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鄂南及赣西南、赣北特委等职，参加组织领导了两省三地秋收起义暴动；1928年任中共中央交通委员会负责人及交通局局长；1932年至1936年先后任江西、湘赣、二方面军保卫局长，参加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西安情报系统”负责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秘书兼武汉执行组顾问，晋察冀边区中央局联络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兼阜平县委书记（纠偏），中共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兼任郑洛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解放后任武汉市长、国

务院政法办副主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政法学会会长等职。是中共七大、八大、全国一至四届人大代表和四届人大、三届政协常委。1976 年在京逝世。



1976 年 12 月 19 日《人民日报》讣告及中组部拟订的参会中央及国家领导人名单共 60 人：中央政治局（3 人）人大副委员长（5 人）国务院副总理（2 人）政协副主席（1 人）最高法院院长（1 人）人大常委（22 人）

华国锋、叶剑英、宋庆龄、刘伯承、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郭沫若、聂荣臻、陈云、张鼎臣、蔡畅等中共中央及国家领导人花圈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国务院、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与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员会与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中共保康县委员会与保康县革命委员会等花圈

汪东兴同志主持追悼会王震同志（左起）江华、王震、姚连蔚、邓颖超、徐向前、李先念、汪东兴、李井泉、胡厥文、于秋里、沈雁冰

戚元德，乳名戚慕贞、字惇允，1905 年 6 月 29 日（农历 5 月 27 日）出生于湖北省汉口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22 年考入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曾参加反帝，反封建等革命活动。1926 年参加革命，1928 年经陈潭秋、吴德峰介绍入党，曾先后任中央军委机要科长，二方面军保卫局党支部书记，参加长征。抗日、解放战争先后任西安情报党支部书记后改任组织委员、党校二部党支部书记、中共阜平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郑州市委委员，市妇联主席、中原局妇委书记、全国妇联执委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南妇委书记，武汉妇联主任，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长，中直机关党委书记等职。是一届全国妇代会执委、三届人大代表。1974 年在京逝世。

1974 年 11 月 10 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讣告，追悼会。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送了花圈。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生前好友余秋里、郭玉峰、肖克、罗青长、王铮、冯铉、李金德、王俊青、胡瑞国、马纯古、顾大椿、孔原、曾威、彭富九、彭海贵、康克清、陈琮英等，家属吴德峰等同志和有关单位的群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

2007年吴德峰和戚元德同志合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组织“老干字［2004］年33号” 批文

墓碑照片为1959年邓颖超同志在广州从化为吴德峰戚元德夫妇照的合影，碑上刻有董必武主席挽戚元德同志诗词：不枉妄为人活一场，工农结合斗生强，清风明月绕声色，马节坚持到晚芳。赵朴初书，王震、黄火青、肖克、郭述申、袁任远同志的题词：德峰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

1935 年 8 月 1 日长征途中，红军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中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我党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宣言中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深得民心，当时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推动和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把正在西安视查的蒋介石扣起来逼蒋抗日，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世界、著名的中国西安“双十二事变”，当日张、杨二将军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参加革命前后履历

年月至年月	在何地区何部门	任何职	证明人
	part of 参加会主持团参加革命后参加会主持		张[illegible]
1936年5月	在甘肃同红四方面军[illegible]调任中共西北局		
	担[illegible]部[illegible]长，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illegible]		潘[illegible]
	部对外联络[illegible]局局长		[illegible]
1936年12月—1940年5月	在西安做秘密情报工作		周恩来同志

1963 年吴德峰中央组织部《干部履历表》存件节选

“双十二事变”发生时，我父亲正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副主席即召集我父亲和李克农等同志开会研究形势、对策。依据当时国际、国内相应出现的各种情况，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分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派飞机轰炸西安，是唯恐天下不乱，推波助澜、扩大事态，趁机取代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的控制权力。如果何应钦这一阴谋实现，则对中国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更为不利。而英、美及亲英、美的四大家族代表宋子文、孔祥熙则急于化解事态、和谈解救蒋介石，这对我们争取国民党、团结全民族实现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和取得世界反法西斯国际战线的援助、支持是极为有利的。中共中央顾全大局，明确决定按“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接受张、杨二将军邀请，派周副主席率代表团去西安协商和平解决“事变”问题。

那天晚上我父亲开会回来即通知我母亲，周副主席命我父母带肖佛先同志（我父亲长征勤务员，解放战争及解放后历任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副政委、华北军政大学青年纵队大队政治处主任。中国科学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科技大学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及长征出生的三女儿岷生等人，立即出发赶赴延安飞机场随他同机去西安，时因张学良将军派到延安接周副主席的专机是一架小飞机，我父亲陪周副主席乘机先走了，我母亲带着岷生姐、肖佛先及周副主席的两位副官等改乘军用卡车到西安，时我父亲随周副主席去张将军官邸开会不在，由张学良的一位副官接待安排我母亲等住进了六国饭店。

蒋介石回南京后形势有变，蒋介石将送他回去的张学良将军当即扣押、软禁，不允许张将军返回西安东北军、也不允许任何人见张将军（这一点周副主席早有先知先觉，曾一再劝阻张将军不必亲自恭送蒋回南京，张为表示对蒋忠诚，不听劝阻私下陪同蒋回了南京），同时还发表了所谓“对张、杨训词”，说在西安答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停止内战等条件是他被“反动派”包围压力所为，并漫骂攻击我党和东北军、西北军及爱国民众。因此现有的和平局面可能再次被打破，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很快会卷土重来。周副主席根据毛主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精神，决定趁当时的混乱局面，指示我父亲留在西安负责组织、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守护延安大门，受周副主席直接领导（周副主席 1937 年组织领导成立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兼任主任。1939 年初，中共中央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我父母重新制装，从六国饭店搬进西安兴隆居住，周副主席到兴隆巷指示、指导工作时，再三对我父母强调，在西安搞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指出西安是守护陕甘宁边区，中央所在地延安的门户，也是设防敌人进攻我们的前哨，是斗争最尖锐的前沿，是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我们情报的及时、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和边区人民的安危，关系到战争胜负的决策。

红军联络处工作人员合影（左起）一排：吴志坚、XX、黄金友、X X

二排：XX、张文彬、陈有才、叶季壮、张云逸、曹根全、林青、龙飞虎

后排：曾威、XX、叶剑英、孔石泉、张经武、云广英、周恩来

此间我父亲长征时的警卫员曾威同志（解放后历任第 37 军 109 师政委、第 69 军副军长、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天津警备区政委等职，少将军衔），被周副主席调到身边专门负责保卫和周副主席与我父亲单线联系的两项任务（周副主席和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父亲训练出的保卫干部都非常信任，周副主席抗战在西安、重庆工作时专门把我父亲长征任二方军保局长时，身边工作的骨干特务员即警卫员和勤务员，曾威、彭海贵、颜太龙、吴志坚等同志调到他身边工作）。

当时党在西安的秘密机构除了党中央垂直领导、我父亲任负责人的秘密情报组织外，还有“陕西地下党省委”（后简称“陕西省委”），杨清同志（欧阳钦）任省委书记，公开的组织机构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简称“西安八办”），伍云甫、周子健同志先后任办事处主任，林老(伯渠) 、董老(必武) 先后任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三者任务分工明确、三足鼎立，是相辅相成、协作一体作战的。

1939 年董必武（右）、林伯渠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38 年吴德峰（右）、伍云甫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欧阳钦、蔡纫湘夫妇在西安

从此我父母再次由公开转入地下，开展秘密情报工作。我父亲化名吴铁铮，河南信阳人，以《工商日报》记者身份报了户口，肖佛先同志则以勤杂听差的远房穷亲戚身份与我父母同住，我母亲开始仍以家庭主妇太太的身份掩护驻守机关。

1938 年吴德峰在西安曹家巷

1938 年戚元德怀抱女儿岷生在西安

1938 年肖佛先在西安曹家巷

这期间来过兴隆巷商谈工作的还有叶剑英、李一氓、梁明德等同志。1937 年元旦后，邓颖超妈妈治疗肺结核病也到兴隆巷与我父母同住。

1938 年春叶剑英、伍伯生抱岷生在杜曲园摄影

“邓小超若有所思，1938 年恩来到南京未回时”吴德峰摄并注写

我父亲当时有一架德国造的蔡司摄相机，给相关领导战友同志照了不少照片。

吴德峰的德国造菜司摄相机（捐赠给保康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朱老总（前坐）后站：一排：谢觉哉 李伯钊；二排：吴德峰 林 彪 邓小平 杨尚昆

1940 年在西安八办（右起）伍云甫、朱光

1937 年邓颖超、危拱之、戚元德在西安

伍云甫 熊天荊夫妇

1938 年（左起）戚元德、蹇先润、先佛摄于莲湖公园

1938 年春叶剑英、危拱之、徐明、戚元德、吴志坚、张纯清、邓颖超、任泊生在北曲

戚元德危拱之新凤舞等在翠华山

1938 年邓妈妈抱岷生在七贤庄

1939 年夏，邓妈妈抱伍绍祖和持生在八办

童小鹏、吴志坚抱岷生

“三娘教子”（陈养山儿子调皮跪在喂弟弟奶的母亲旁）

1937 年岷生与小文拉等

随着工作开展需要，情报组织不断完善扩充，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等人员。我们搬到了曹家巷 12 号居住时，同住的有陈养山(化名陈鸣钧) 章素贞夫妇带着儿子建宇、

光宇、平宇(儿子名字吴持生记录可能有误)，陶斯咏夫妇带着女儿一捷，还有蹇先佛、罗青长(化名文子平)、于忠友（别名潘湘、化名曹吉仁)、肖佛先等同志，大家以亲朋关系相互称呼，住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

陈养山及夫人章素贞同志

陈养山同志一家因是江浙会稽人，年龄大，而且生活习惯也和大家不一样，所以另立门户单起炉灶，大家都尊称他为陈先生，称他夫人章素贞同志为陈大嫂。据我父亲讲陈养山叔叔原名叫程仰山，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上海时期曾在特科陈赓等同志领导下工作过，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工作经验，主要负责与宋绮云等其他国统区相关关系往来联络工作，解放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等职。

陶斯咏及夫人高英同志

陶斯咏和高英夫妇，东北人，也带着女儿一捷另立门户单过，跟罗青长拉上干亲关系，女儿一捷叫青长干爹。主要负责与“西安八办”联络。我父亲在西安负责情报期间，为避免以往秘密工作电台易暴露的问题，在情报组织内部从未设过专用电台，一是利用“西安八办”的合法身份设立的专用机密电台，二是利用策反敌人或外围社会关系拥有的电台，且我们严格遵守秘密工作规定，电报发出后文稿都当即销毁从未留存过只字片纸（这是情报工作绝不允许违反的大忌和铁的纪律）。陶斯咏叔叔解放后曾任过武汉市、成都市铁路局长和设计院长等职。高英阿姨文化程度不高，是一个典型的忠厚朴实的家庭妇女，在西安没有具体分工任务，但主动帮助大家做一些内勤、生活后勤、应付敌人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东奔西走的跟着陶叔叔干革命，解放后仍任劳任怨的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参加街道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默默无闻地一直在平凡岗位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受到同志们的尊重和热爱。

1938 年罗青长在西安

罗青长同志是四川人，口音与我父亲相近，扮成我父亲的表弟，我们兄妹一直称呼他为表叔。在西安情报组织开始时我母亲任党支部书记，后我父亲回避夫妻关系从工作出发建议支部改选，罗表叔当选党支部书记。罗表叔先后以杨虎城 38 军中尉书记官等身份协助我父亲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单线联系 38 军及安插在胡宗南身边工作的陈忠经、申健、戴中溶等重要关系和同志。罗表叔解放后，曾先后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支部改选后，我母亲改任支部组织委员，并以竞存中学教员等身份参与外勤收集情报等工作。熊向辉、姚警尘、成子慎、杨晓初、肖德、王昭贤等同志先后多由我父亲等直接联络。

蹇先佛

蹇先佛同志(肖克夫人)，湖南人，口音与我父亲也相近扮成他的三妹，我们小孩称她三姑。主要搞译电内勤工作。先佛阿姨解放后曾任水电部司长、副部长等职务。

于忠友

于忠友同志，是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有过在东北李范五同志手下工作的经历，有把标语贴到日寇鬼子屁股上的光荣历史，负责机要译电工作，对外充任《国风日报》校对，但只是应个名从未上过班，因国风日报的社长车相臣也是我们的人，如果有人查由他应对就行了。白天他几乎睡觉不出屋，晚上翻译电报经常通宵达旦特别辛苦，他工作非常认真仔细，很少出差错。我父亲为了工作的方便给他起的名字叫曹吉人，意寓他对付敌人要赛过曹操的奸雄，吉人天相工作顺利安全。于忠友叔叔解放后曾先后任军委油料部负责人、后勤学院海军教研室主任等职。后来接任于忠友译电工作的是岳良同志，解放后曾任丹麦大使等职。

张珍夫妇

在曹家巷时曾同住过的还曾有张珍夫妇，也另立门户单过，主搞外勤联络情报信息收集。

依工作需要搬到曹家巷后，我父亲又以国民党 38 军高参的身份出现，并通过关系安排我母亲到竞存学校任教员。我母亲重点利用教师身份，经常往来于教育界、军政界和社会上一些达官贵人的太太们之间，通过与学生、家长、社会名流、高级军官太太、小姐们的交往收集不少军、政官员的言行动态和军队的调防行动等各类情报信息。

在西安竞存学校任教的威元德(右穿白旗袍立者)

我父母住在曹家巷 12 号时，旁边 13 号宅院住的是位姓赵的先生，后来换成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特务机关住，得知这情况后，我父亲立即召集大家分析研究对策，有人认为与狼为邻总是危险的，主张立即搬迁，我父母、青长等同志则不主张马上搬家，我父亲以“灯下黑”的道理说服大家说，我们与国民党军政特务机关为邻居实际上多了一个保护伞，谁也想不到，也不会去想共产党的情报机关敢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安营扎塞，纵然要搬也要周旋一段时间寻找适当时机搬，否则他们一来我们就搬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和警觉。并嘱咐大家要注意决不可掉以轻心，今后讲话、做事行动都要特别谨慎，按分工各守其职演好、演像自己的角色。特别嘱咐于忠友、肖佛先躲飞机轰炸时必须两人同行不得吊单等防范措施。后来

我们确实靠“狐假虎威”借邻居这把保护伞避免了不少麻烦，一段时间，军警宪特上门捣乱的人几乎绝迹了。一天我父亲回来走到胡同口时发现有特务在后面盯梢，于是他采用借大狗吓小狗的办法索性进胡同，径直走向 13 号宅院大门，敲门寻问赵先生，与开门的人交谈，并递过一支香烟请开门的人抽。回头再看时小特务早已吓得跑的无影无踪了。

以家庭主妇身份的戚元德(回首者) 陶斯咏夫人(桌后立者)
肖佛先(背影)陈仰山夫人陈大嫂（右边者）同在院内忙家务

在西安做秘密工作时经费来源都很有限，在艰苦的环境中，同志们不分高低、彼此亲如一家，很多同志除要完成本职任务外，还要设法挣钱养家糊口，担负没有收入同志的开销，我母亲在竞存中学任教时挣的一份工资按规定都全部上交组织统一使用，当时他们每人每天只有三块钱津贴费，孩子们也是这样。我母亲送我岷生姐回武汉时，我奶奶和我二伯爷给她一笔钱，也全部交给组织公用了。

当时我父母派到西安工作时没有组织名称（后人称“西安情报”组织为“吴德峰情报系统”），更没有任何职务任命。陶斯咏叔叔曾讲他们在曹家巷十二号居住时，一次陶斯咏同志问我父亲，“我的职务是什么？”我父亲答：“共产党员!”陶又问：“您呢？”我父亲答：“负有一定责任的共产党员!”陶又问：“我们组织名称叫什么？”我父亲一字一句地答：“共—产—党!”就是因为“西安情报”没有机构名称、人员没有组织任命，加上我父亲坚持使用“西安八办”和利用掌控的敌人和外围关系电台，所以直到我父亲等撤回延安，敌人都未察觉、发现我们这个在西安隐蔽极深的共产党情报机构组织。

戚元德和朱琛燕（儿媳） 文革上交长征枪支子弹收条

我父亲常讲：“间谍！间谍！对共产党而言，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勇敢坚定者被敌人抓住必杀除之，贪生怕死出卖组织伤害同志罪大恶极的叛徒组织也定会处置决不轻饶！就是叛变为敌极尽效力，敌人也只视他为赖皮狗始用终弃，决不会有好下场。前车之鉴，罪大恶极的叛徒顾顺章就是被敌特利用完、视无价值后，判处极刑枪毙的。”所以从做秘密工作开始，他们就为实现崇高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做好随时为革命牺牲自己生命的准备。我父母就以身作则并做过最坏的打算。当时，在他们住房堂屋正面墙上有一个佛龛洞，他们就把“神”请出来，把从延安带来的长征用的两把 2 号、3 号毛瑟手枪，子弹压上膛放在里面，内用马粪纸隔挡，外面用神像纸糊死，一旦出现不得已紧急情况捅开神纸隔挡，随手就可取出枪射击自卫，并约定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自己的。那把长征时，贺龙同志送给我母亲的德式华尔特小手枪，在完成特别危险任务必要时她也会随身携带，此枪射程小，危险时只能近距离自卫或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自裁用。

我父亲在秘密工作中，对每个人的任务、职责分工明确，任何人不得越雷池半步，他平时要求、批评人非常严厉，连我母亲在内一样毫不留情。他经常讲，执行特殊任务就是提着脑壳干革命，任务执行过程只有原则，没有自我，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只能成功，没有侥幸，姑息养奸将害人、害己、危害革命，一旦铸成大错，后悔莫及。错了！就是错了！敌人绝不会因为你的失误、有理由而原谅、放了你、不砍你的脑壳！

陈忠经　熊向辉　申 健

我父亲在西安情报工作时，直接、间接领导或有工作关系往来的同志和民主人士、革命志士有（按姓氏笔画排）王昭贤(王应慈)、车向忱、申健(申振民)、成子慎、肖德（师应三)、刘抗、宋志远、宋绮云(杨虎成的秘书)、杜斌丞、李敷仁、李馥青(杨晓初夫人)、岳　良、杨晓初、杨明轩、陈建晨、韩卓如、候林斌、姚警尘、熊向辉、霍建台、戴中溶……等同志。

“双十二事变”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蒋介石被迫抗日，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总的环境形势是对我们联络、借助各方面力量，开展统战、秘密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在中央和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下，在“陕省委”和“西安八办”的大力协同配合下，我们西安情报队伍，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手段和策略，打进去或拉出来，启用或利用各种千丝万缕的老关系，派遣、安插、发展社会各阶层新关系，曾先后多次选派一些对党坚忠、家庭关系复杂、便于掩护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人的心脏要害部门。因此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宪等心脏要害部门和学校、交通、邮政、银行、报社等重要行业都安插有我们的党员或革命的同路、同情人。在胡宗南身边隐藏极深、著称我党情报“后三杰”的熊向辉：公开身份，侍从副官、机要秘书，胡宗南的亲信（解放后，历任驻英国代办、驻墨西哥大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陈忠经：公开身份，三青团首任西安市分团书记（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等职）；申健：公开身份，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西安的分支机构书记，并以该身份加入军统和中统特务机构（解放后，历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常务理事、古巴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印度大使等职）。以及（下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昭贤：公开身份，曾任胡宗南侍卫队分队长、杨虎城办公厅少尉等职务（解放后，历任归绥市(呼和浩特市)公安局长、建工部办公厅主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等职）；成子慎：公开身份，先后任过西北军的各级参谋、主任、处长等职，军衔升至少将（解放后在西安市文史研究馆任秘书主任等职，1954 年病逝，国家民政部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师应三（肖德）：公开身份，西安敌特侦缉队队长等职（解放后任西安公安局警察大队副队长，第一分局局长，临潼华清池党支部书记兼主任，临潼县副县长等职）；杨晓初：公开身份，38 军军长赵寿山(原 17 路军杨虎成旧部)派驻西安办事处任处长（解放后，历任西安市军管会副秘书长、西北军政委员会财委副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西北行政委员会财委秘书长、西安市副市长兼西安市计委主任等职）；李馥青（杨晓初夫人）：公开身份，曾任陕西妇女慰劳会常务主任等民主团体职务，协助杨晓初开展秘密情报工作；姚警尘：公开身份，先后任过 38 军办公室主任、第四集团军总部秘书、第六战区司令部机要科长、西北行营参议等职，军衔升至少将（曾任我党

西北局秘书、交际处处长等职，解放后，调任中央军委）；戴中溶：公开身份，胡宗南司令部总部任机要室副主任等职，胡宗南的亲信（解放后,历任军委通信部器材处处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局、三局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三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等职。1955 年 9 月授中校军衔。1958 年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理事）；霍建台：打入特务组织在西安“八办”摆个烟摊，明为监视“八办”眼线，实际上却成了保卫我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全的岗哨（解放后在长安县邮局工作）；……。可以说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他们的无私奉献、革命忠贞情操和及时的情报信息，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关键时刻，为打败战胜强大的敌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决策性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称赞熊向晖同志说的：“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这个事例概括了对我们西安情报很多鲜为人知的英烈们功绩的评价。下面我仅以我父母在“文革”中告诉我们家人，几例显为人知的典型战绩为例，充分显示表徵我们西安情报英烈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英明领导下，英勇奋战的丰功伟绩和大无畏、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

戴中溶、杜先玉夫妇与儿女

(左起)戴经慧、戴经安、戴经明

戴中溶同志在战胜胡宗南斗争中的作用和事迹，除组织和我父亲、罗青长、王金平等几人知情外，实鲜为人知。戴中溶同志是欧阳钦同志夫人黄葳同志的哥哥，是上海交通大学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后到天水第一师胡宗南部队，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和建立无线电通讯网，深得胡宗南信任，是胡的亲信。“双十二”事变后曾到复兴社头子康泽主持的庐山海会寺特训部任教官，该训练部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最高训练基地。按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内战部署意图，胡宗南的部队调防陕西包围陕甘宁边区伺机侵犯，这时的胡宗南部队由内战前的第一军升为十七军团、二十四集团军、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调戴中溶到其司令部总部任机要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当时主任是王微，实际常驻北平不在西安），机要室设有文书科（机要文件的收发、整理、保管）、无线电管理科、译电组等部均隶属他直接管辖。其爱国思想强烈，对蒋打内战、不抗战极度不满，有积极投入抗日，向往投奔延安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要求，欧阳钦同志从黄葳同志（原名戴中宸是戴中溶的胞妹，清华大学高材生，时还未与欧阳钦结婚）处得知该情况后立即通报我父亲，我父亲经调查考核后，认为戴的经历虽然复杂，但参加中共革命抗日斗争态度坚

黄葳清华毕业照

决，决定启用戴为革命工作，即请黄葳阿姨做工作说服戴继续留在胡宗南部队，利用其手中的权利和便利条件为我党工作。

戴中溶参加西安情报系统组织工作后，按垂直领导单线联系的严格保密制度规定，初始与他单线联系指导工作的是罗青长，他将胡宗南司令部总部电台密电码交由罗青长呈至送我党中央，便利了我党掌控直译收取敌方往来电报，甚至可以说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战略部署

命令，不仅用我们的交通、秘密电台，能在两小时到达我党的总指挥部中央所在地延安，甚至紧急时可用国民党电台将国民党内部的命令同时直发延安。

罗青长回延安后，由王金平继任与他单线联络，胡宗南进犯延安时，戴中溶又带着王金平掌管了胡宗南交通运输、机要通讯等核心部门，可直接监听战事通讯电话，更加对胡宗南部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主席站在宝塔山上，阅视胡宗南部队进延安后才泰然自若地离开，这一壮举有这些情报为保障，是理所当然的。

工作中戴中溶曾多次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父亲从大局考虑，通过黄葳、罗青长等人再三劝说他留在党外，留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工作作用更大、更有利，他不是共产党员，出了问题胡宗南要脱干系保护自己，必然会千方百计保护他。胡宗南与戴笠关系是穿一条裤子共享女人、人人皆知的事，他是胡宗南的亲信也是人人皆知，为了保胡宗南，戴笠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必须竭尽全力为戴中溶开脱。正如我父亲所分析，后来事实证明撑起胡宗南亲信这把保护伞确实是安全有效的。1940 年因黄葳生欧阳湘住在戴中溶家中，回来时八路军办事处用林老（林泊渠）的车子将其接走，被国民党特务看到怀疑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关系，并对戴提出怀疑，因戴中溶是胡宗南老一师的人深得胡宗南信任，且戴中溶的妹妹在延安一事在胡宗南部队早已公开不是秘密，包括胡宗南和王微都知道，特务报戴笠，戴笠不以为然；1947 年 9 月北平地下电台犯了秘密工作不可理喻的大忌，电报底稿违规存留未销毁，恰逢窃贼入室盗窃财物出事（我父亲曾认为,按常规、逻辑分折不是偶然遇贼偷盗那么简单的事？！），追根溯源涉及暴露了戴中溶、王金平被捕，押解到南京军统保卫局，未审问出任何问题，鉴于胡宗南的关系，最后避重就轻糊里糊涂给戴定了个“通匪”罪名，押解到杭州军人监狱关押，搁置未再继续追查深究。1949 年杭州解放时自然解放出狱。戴中溶解放后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姚警尘 成子慎

西安事变后，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乘机发动所谓的“全面军事行动营救蒋介石”，传递给孙蔚如的绝密件，由时任 38 军办公室主任的姚警尘经手时截获，及时交付成子慎（时任西安戒严司令部参谋处长），报告呈送周副主席几经周折斡旋，阻止、揭露了国民党内反动亲日派何应钦，籍所谓营救蒋介石为名，实为推波助澜破坏和谈要蒋介石的命、促使内战全面发动，达到其助日侵华阴谋篡权的罪恶目的。他们的情报在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实现全民族统战抗日的关键时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1940 年罗青长杜希健

同志在西安喜结连理

在国民党戴笠、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所领导的特务机关内部我们已安排了不少我们的特工同志。1938 年至 1940 年我“西安情报系统”借助国党内部党阀朱家骅与二陈争权夺利，朱取信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中央组织部长、调统局长等要职，主管掌控了党务大权。时朱家骅为自立门户、力排二陈，清洗各省市党部的 CC 份

子，为发展壮大自己势力急骤招兵买马，周副主席指令我父亲乘此机会组织领导、启动各种社会关系，大力派遣我方各类特工人员深入敌穴、打入敌要害部门。杜希健等一行人就是当时派遣的最后一批，于 1940 年 2 月左右乘卡车到达西安时，形势发生变化，二陈用美人计使朱家骅失势，免去了中执委秘书长等要职，二陈卷土重来，杜希健等人因此未能安插派出，留在西安调入我们情报系统任报务员，与罗青长同志相识、相恋、结为革命伴侣。

文革后1970年我父母与罗表叔婶在西苑合影

我父亲常讲，所谓情报其实就是信息，并不是只有偷来窃取的机密才是情报，偷来窃取的情报未必可靠全能使用，有时候还有可能陷入敌人设计的圈套。很多人把情报工作看成仅是潜入窃取等行径是不全面的，实际很多情报就存在于社会市井与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发生、演变都会伴生、遵循某种社会规律，留下诸多现象、有蛛丝马迹可寻。往往同一个情报来源、渠道不同而有信息差异，这就必须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仔细地分析综合，要用你平时掌握和搜索到的各种信息一一剖析映证，或有的放矢的去复查、核对、判断获取的情报信息的虚实，才能去伪存真、做到万无一失。否则就会变成“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结局，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既然很多情报往往隐匿于社会、市井之中，那么公开的报刊信息、社交舆论……，都是情报信息蛛丝马迹探索的线索和源泉。因此我父亲认为对社会的深入调查研究也是取得广泛可靠情报信息源泉的另一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是要求情报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而广识博学、溶于社会的能力，不是朝夕能炼就的，只有对各种信息的强识了解、广泛占有，才能具备反复思考调查、分析研究，获取得到广泛的情报信息和识别情报信息真伪的能力。

在西安情报工作中，我父亲就非常强调注重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类情况、信息进行认真、详尽地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曾组织我们情报系统对陕西省、西安市等地区的政府机构、社会各阶层人员状况做过详尽地调查研究，经过综合分析认真地研究和汇总认为，社会上“左”、“中”、“右”三种势力是两头小中间大呈枣核型，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和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的都只占少数，而中间派则占多数。这些材料报送毛主席后，毛主席非常重视，亲自找我父亲详谈，对这种调查和分析深表赞许。这次调查结果，为我们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等政策提供了决策性的参考。

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刁难我们“八路军”，更视我们“西安八办”为卡在喉咙中的一根毒刺，经常派遣形形色色的各种小特务在门口监视、跟踪、骚扰我们往来办事的人员，增加了我们常到“八办”联系工作的困难。我父亲就独出心裁地建议“八办”同志采用“以扰治扰”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小特务赶走、清除。仅举两个例子：一例是，在“八办”门前经常停着一个拉黄包车东北口音的小特务监视跟踪我们的人，我父亲就叫“八办”的同志准备了两箱装满了大石头的箱子抬上黄包车，押着跟着他走街穿巷不停地跑，直累得他跑不动叫苦求饶说了真话，讲他是东北沦亡到西安的逃难人，为混口饭吃才当了小特务这苦差事。在我们同志抗日救国大道理的教诲下，他表示认错再也不敢、也不愿干破坏团结抗日的事，再跟我们“八办”的先生添麻烦、捣乱了！二例是，在“八办”门口还经常有装成卖烟卷、

钉掌缝鞋的小特务轰都轰不走，我父亲就出主意叫“八办”的同志拿着没有胶卷的空像机，对着他们一个一个不停地拍照，吓得他们落荒而逃，再也不敢来了！

宣侠父烈士

1938 年“西安八办”高级参议宣侠父同志突然失踪被特务暗杀。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为人正派豪爽，坚持民主抗日，在政治见解上一直与蒋介石之流形成对垒直言不讳，他当时在国共两党和抗日盟军中威信、威望甚高，且在国民党各派系中交友甚广，被视为黄埔军校老大哥。为此在西安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时，为便于开展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董老建议中央调宣侠父委任“西安八办”高参。宣侠父同志到西安后，以其八路军少将高参身份，利用黄埔军校关系、与各方面的上层人物交往，确实在联络国民党各路军阀、派系统战方面做了不少出色的成就。当时 17 路军杨虎城将军的旧部，担任集团军司令的孙蔚如、高级将领赵寿山、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等都和宣侠父同志相交甚厚，时常与他交谈到深夜才分手。宣侠父和国民党驻西安的军政大员们也都很熟，他经常直闯西北行辕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处，为八路军争粮饷、要军备物资，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由于黄埔同学和诸暨同乡关系，蒋鼎文亦奈何他不得，还有当时拥有重兵的胡宗南以及国民党第一军军长董钊，都是黄埔第一期的同学，他也直闯这些人的办公室大谈国共合作统一抗战的道理，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胡宗南那些晚届黄埔出身的军长、师长们，见了宣侠父则多是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宣侠父曾被党派到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同盟军当过师长，在西北军里也很有威望，因此二战区阎锡山部的一些高级将领以及傅作义、邓宝珊等谋求抗日自保的将军也曾派人到西安找宣侠父搭桥联络打通和延安关系。加之宣侠父还经常接触民主人士、流亡青年和学生，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才极有煽动号召力，被蒋介石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如骨。

王应慈在胡宗南侍卫队时照片

在宣侠父同志失踪前一、两个月，我情报成员王昭贤同志就曾报告我父亲说，戴笠来西安对许守素(西安军统站的特务头子) 等布置过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任务的命令。王昭贤叔叔曾化名梁易坚，1939 年底回延安改名王应慈，原籍湖北出生于陕西省，1933 年入党。1936 年他以杨虎城办公厅副官身份打入国民党西安市“邮检所”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 年我父亲向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要人，昭贤叔叔调入我们情报机构，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父亲在杨虎城十七师赵寿山部给他弄了个穿军服配戴尉官军衔位置，1939 年通过关系打入胡宗南卫士队任分队长。1939 年底回延安，调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解放战争和解放后先后任石家庄市公安局、科长、副局长、局长，中共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常委、公安局长，中央建筑工程部办公厅主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等职。是著名的《虎穴追踪》电影的原著作者。

昭贤叔叔借助十七师尉官和胡宗南卫士队分队长等身份为掩护，经常出入于某些相关的国民党部队和敌特机关，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西安站基本情况，获取了多种情报。上述情报就是他利用与“复兴社”特务组织成员姚 X X 建立的“长期至友深交”特殊关系获知的，经我父亲进一步的调研核查综合分析确认后，立即报告、通知了中央、“八办”等有关部门有所警惕，采取了紧急防范等安全措施。“西安八办”本已决定宣侠父叔叔随董老等同志立即撤回延安，就在启程时又因特殊任务临时决定宣侠父同志暂留下来。宣侠父失踪后第二天，“西安八办”主任伍云甫同志就请我父亲、欧阳钦叔叔等到八办商量寻找宣侠父一事。伍云甫讲，宣侠父同志头天(1938 年 7 月 31 日)下午接蒋鼎文电话后骑脚踏车外出一夜未归，他们已向蒋鼎文、胡宗南以及某些与侠父平日往来关系密切的国民党高层人士等处打问过，都称不知其踪……。我们已上报中央，中央要我们“八办”通告吴德老(为与吴玉璋吴老区分，实际当时很多熟识老同志称我父亲为吴德老)和省委商量寻找办法。我父亲依据当时情况分析认为，宣侠父同志的失踪很可能与戴笠前来西安有关。宣侠父是我党派出做国民党高层将领、人士，是统战工作举足轻重的人物，实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心腹大患，按蒋介石的本性和宣侠父同志的个性，蒋介石必除之以绝后患，失踪意味已遇害。敢冒天下大不韪杀害宣侠父这样名人高参，必是蒋介石直接下命令指使所为，这是蒋介石历史上逼走、囚禁、杀害邓演达、吉鸿昌、张学良、杨虎城，杨杏佛、史量才等反对派及“对头”惯用的卑鄙伎俩和手段，建议八路军总部直接问蒋介石、蒋鼎文等要人……。在寻查宣侠父被害破案中，我情报组织通过打入国民党侦缉队、特务组织、胡宗南方面、蒋鼎文处、38 军等方方面面关系四处寻找，最后还是通过打入国民党侦缉队的师应三和与复兴社交往关系甚深的王昭贤两处报来的情报信息，证实宣侠父同志已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残害，并由侦缉队长师应三从特务内部矛盾暴露出的线索入手，查清了宣侠夫同志遇难的情况，确定宣侠父同志失踪的当天即遇害；综合情报信息印证是蒋介石下令，戴笠指挥西安中统特务头子许守素与蒋鼎文合谋用电话将宣侠父骗至其官邸谈话滞留深夜、派特务埋伏在他回“八办”住地必经之路行凶谋杀的……。鉴于当时秘密工作环境，避免蛛丝马迹引起敌人警觉、暴露我们潜伏敌内的组织和人员，所以涉及的人、事具体情况均未对外公开宣讲。中央最后决定，追查宣侠父同志失踪问题的措施，干脆由我们八路军总部直接出面，强词、据理力争坚持向大、小蒋要人，逼得蒋介石不得不避重就轻宣称“宣侠父是我的学生，背叛了我，是我下令杀掉的。”——掩盖其杀害八路军少将高参宣侠父将军是破坏团结抗日、统一战线之罪。事过数年后七大召开时，我党中央专门为宣侠父烈士举行了公祭、追悼会。解放后镇反时将杀害宣侠父同志的凶手抓获伏法，慰祭了宣将军在天英灵。

我父曾经常提醒告诫说，我党的隐蔽战线战斗在组建之初，就三令五申地绝对严禁采用无政府主义的暗杀和美、蒋等特务贯用的以“美色”、牺牲女性的肉体去换取情报的卑鄙、无耻、下三滥手段。熊向辉叔叔曾回忆讲，“侠父同志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的事情披露出来，宣侠父是当时他和很多进步青年非常敬仰的一个人物，他的遇害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当时传出是胡宗南派特务暗杀的。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父亲，如果真是胡干的，他就要把胡宗南干掉，为宣侠父报仇。他说：“我有手枪，也可以下毒药。”可是我父亲当即告诉他，“共产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能搞暗杀，你不但不能害胡宗南，还要保护他争取他为我所用。”这使他对自己工作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他明白，他在这里地位重要，处境危险，必须要取得胡的信任，同时也必须保证胡的安全，才能站得住脚，也才能执行好自己的“特殊任务”。

罗表叔曾回忆讲，1939 年夏，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积极部署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陕北中央首脑机关。正值周副主席由渝返延途经西安，我父亲将

他们调查、截获的胡宗南战斗序列部署，各部队的驻地、番号、长官姓名等详细材料交周副主席带回延安。我党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揭露蒋介石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捍卫了党中央，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在西安做秘密工作期间，我们情报组织经历、经手了不少重大事件和艰巨任务，紧张时经常不分昼夜连轴转地工作，把来自各方的情报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及时汇总、分析、确认后送达延安，内容包括国民党军队的调防、人事变动及军警特宪的联合行动、对策以及国民党上层腐败、内部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等无所不及。于忠友叔叔曾讲过，“吴老到西安后对社会各阶级做了详细地调研，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包括著名妓女到国民党军政、党棍、校级以上的头面人物，基本上都有调查。掌握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动态、生活习性以及社会关系情况，对敌情掌握得既准确又细致。从政界来说，国民党省党部上午开会讨论的事项，我们下午就能向延安发出电报；从军界来讲，程潜掌握的‘天水行营’一开会，用不了两天，我们就会向延安发出详细电报，如参加会议的人员、讨论的问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等等，搞得一清二楚。对敌人内部的腐败、勾心斗角也搞得清清楚楚。一次，在日本飞机轰炸过程中，将‘天水行营’的防空洞炸塌了，行营主任程潜被闷在洞里面，本来可以马上把洞挖开，而那些警卫小子们想发横财。故意拖延时间把他闷昏了再往外抬，抬时将他口袋内的值钱东西都掏走了。对当时西安存在的派别组织、特务机关、头面首脑人物我们都调查的一清二楚，细到他们的生活细节、珠丝马迹都不放过。比如蒋鼎文的全部情况，我们连他在莲湖后街嫖陕西土婊子的事都未放过。还有‘中央军官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有个特务班，毕业后要派到西安，人还没走我们就把名单发给了延安，随后这些人的简历、相片也经八路军办事处送至延安。”的确，我们共产党人完成这项特殊任务的同志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培训考查的，都是对党、对革命事业信仰、信念始终坚定、忠诚可靠的同志，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是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党内最勇敢、最坚定分子。他们都在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为保卫党中央和革命圣地延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延安枣园中社部旧址吴德峰情报系统展版（园圈内容摘录）

西安情报价值要以西安为最好

1940 年 4 月 25 日和 28 日，吴德峰回延安报告工作时，中央社会部部务会议的评语是：“西安工作成绩很大” “情报价值要以西安为最好”

1939 年“中特委”对吴德峰情报系统的评价：“除延安外，西安是情报工作最有成绩的地方”

他们在每次作战前，对我军的情况无不调查的十分清楚，然后针对我军情形决定作战计划来打击我们。我仔细研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何以调查

的军情形决定作战计划来打击我们。我仔细研究，他们对我们的情况何以调查的如此清楚，固然有许多地方是我们自己泄露机密，而主要是共军情报工作做的彻底。

——蒋介石

从中央来讲对吴德峰同志的工作确实是非常支持和信任的，每一次我父亲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同志都要专门找他谈话，反复了解研究问题。（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当我父母和罗表叔等同志的面表扬过西安秘密情报工作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的情报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要发勋章首先发给你们……。” 我父亲常说，“我们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领导关怀、指挥下取得的，是与‘陕西省委’、‘西安八办’的大力支持与协同配合分不开的，在人力物力上他们给我们开了很多绿灯、创造了不少好条件，特别是陕西省委欧阳钦同志向我们输送、推荐、介绍了不少好的干部和关系。这些成绩也是与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奋斗分不开的。”我父母经常告诉我们兄妹，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同志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情报组织，该组织是由许多的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进步人士参与支持的党的秘密组织团体，继任的西安情报组织领导除罗青长外还有曾三、王中、程之平、王世坚等。我们“西安情报系统”潜伏深入敌后情报工作，从 1936 年建立坚持至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从未间断，战绩累累均记入我党情报史册有据可查，是谁也不能否定、伪造、篡改、取代和磨灭的！功劳与成绩应属整个战斗集体而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单独自我标榜和吹虚的，对于牺牲的烈士我们是幸存者、对于永远不能公开暴露自己政治面目、真实姓名的无名英雄我们则是幸运者，我们和人民要永远怀念他们，纪念学习他们为党、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1939 年，国民党制造国共两党摩擦闹分裂活动越来越明显，提出防止异党活动，视共产党为异党、奸党，还拟定了一系列处理异党方案。据我父亲讲，“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相继出台。这些文件详细地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策略及实施办法，内容极其毒辣、卑鄙、反动无所不及。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及时向中央（延安）汇报，中央根据这些情况编写了《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了敌人的阴谋。随着国民党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露骨，我们这个组织的工作环境、任务也越来越艰巨、困难，为缩小目标，决定搬家分散活动。1939 年夏，陈养山、陶斯咏、曹吉仁等人分出去另居，我父母、肖佛先等人搬至教场巷居住，秘密环境要求非常严格，原工作住在一起的同志一旦调动或分开后是不允许有非工作相互往来、随意交谈的，即便在街上碰见也装着互不相识、互不打招呼的。

1938 年吴德峰同志因日理万机的工作，劳累过度患失眠症，头疼欲裂。这是带健脑器在曹家巷住所门前留影

我父亲由于过份的用脑和长时间工作过度疲劳，有一段时间经常头痛、头晕、呕吐、失

眠，患上严重神经衰弱症，但他不能也没有空闲休息，他头上几乎经常带着一个金属的健脑器坚持带病完成任务。

在西安工作期间也遇到过不少的麻烦。如：八路军办事处的收发员彭宗藩，被敌特务突击（即突然秘密抓去又突然放出做内奸）供出所谓“中共陕西省地下党省委书记吴铁铮”。国民党特务如临大敌，密令重金悬赏捉拿吴铁铮。此情况由我们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同志得知立即报告了我父亲，我们又马上对彭宗藩进行反突击秘密审讯，知道他没有见过我父亲并不知道吴铁铮是谁，而是一次偶然听到隔壁房间有人讲，今晚吴铁铮来办事处，后院警戒禁止闲杂人员进出，所以他猜想吴铁铮一定是陕西省重要人物，在敌人威逼下就想当然地编供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吴铁铮”。我父亲则让我们的内线将早已调查掌握的国民党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的同名教官吴铁铮举报送进监狱顶了岗，恰好该吴铁铮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大革命时代曾参加过革命与中共有过瓜葛。我们查此人历史并无罪恶无需让其代死，因此命令彭宗藩在特务让其指认时说，“晚上看不清楚，好像是，又好像个头矮了点……。”模棱两可的把死话说活，搅混了水，让特务机关和胡宗南军队发生矛盾、磨擦，慢慢地去审、去甄别。与此同时周副主席在重庆也得到国民党内部以重金悬赏捉拿吴铁铮的消息，为了我父亲的安全，叫我父亲立即撤离回延安，我父亲因此时正在参予运作借朱家骅上台招兵买马之际，派遣我大批秘密工作人员打入敌特机关要害部门的重大行动，弓已拉开，箭在弦上，工作不能中断换人。因此我父亲向中央报告，从我们打入敌人内部，掌握的情况分析，敌人暂时不會怀疑到他头上，且“特务”抓到了替身吴铁铮已关押在监狱，只要我们的人继续推波助澜，这笔糊涂帐国民党特务在短期内是理不清的，只要谨慎处置待任务完成后他再撤离也来得及，周副主席再三斟酌同意我父亲继续留在西安完成特殊任务。这位真吴铁铮替我父亲顶罪坐牢关押了很久，最后还是在胡宗南保释下才放出来。解放战争解放石家庄时，这位吴铁铮是国民党第三军副参谋长当了我军俘虏，我父亲时任晋察冀边区中央局联络部长兼敌工部部长，还专门提审了这个吴铁铮，问到他在西安被抓一事，他还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是做了我父亲的替身，演了一场‘假吴铁铮审真吴铁铮’的“双包”案，一时传为佳话。

1940 年 5 月初又发生一桩事。一天我父亲在大街上遇着了一个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公安局他手下工作过的人，那人走上前叫他吴局长，他立即正色用地道的陕西话回答说;“我（发音：ER）不是!”侧身离开。随后，立即叫我们的人跟踪调查这人的现时身份和其他情况，知其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并了解到他曾对同事讲:“真霉气，我今天看见一个人像是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市公安局长，结果一问是个陕西佬。”此情况报告中央后，为了我父亲安全以防万一，中央通知他立即回延安汇报工作，我父亲回延安后再度详细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面汇报了西安情报工作和调查了解到的西安军、政、特、宪及各党派民主人士新情况及西安情报今后的工作打算，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与重视，对西安的情报和我父亲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即决定他安全撤离西安回延安，此后至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中，相继续任我父亲领导西安情报系统工作的负责人除罗青长表叔外，按先后排序的还有曾三、王中、程之平、王石坚等，罗表叔是衔接负责坚持到 1941 年 4 月才调回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

1940 年 6 月吴德峰在西安八办给　　2004 年 6 月 5 日吴持生等随张志玲
张志玲和陈元元两小同志摄的像　　叔叔在我父亲住过的一号院门前合影

1940 年 6、7 月份我父亲以中央交通局长身份，亲自带肖佛先等人最后一次到西安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处理未了事宜和送了一批情报人员派谴各地，完成任务后同他一起回延安的除跟随的肖佛先外，还有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张志玲等同志。

1940 年 7 月 9-19 日吴德峰参加当前抗日
统一战线新形势、策略与工作会议记录影印件

1940 年 7 月 9-19 日我父亲参加了关于当前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势、策略与工作会议，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当前抗日统一战线新形势、策略与我们工作的高瞻远瞩的论谈。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的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并重点提出“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把内战变成了抗战。杨虎城是个民族主义者，是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宸。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前叙时我西安情报系统的成员大多都与三十八军有千丝万缕切不断的联系与关联，我们不少的同志当时就直接在三十八军任职，甚至职务升至高级将官不乏其人，充分体现了我党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安情报工作中的认真执行贯彻的作用威力和丰功伟绩。1945 年、1946 年，38 军之十七师和 55 师先后起义，组建了西北民主联军 38 军，成为我党革命的生力军更是我党统一战线英明决策和胜利成功的巨大呈现！对于长期与我党义无反顾合作的国民党 17 路军中的追求真理的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杨虎城、赵寿山、孔从洲、杜斌丞、宋绮云等诸多先辈英烈在抗日战争及反对蒋介石独裁的统一战线斗争中可歌可泣的大无畏奉献精神和英雄事迹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怀念，是我们中华民族两岸炎黄子孙应牢记、弘扬、学习的不朽榜样、楷模！

今天到会的诸多老师朋友多是社科界学术研究有成的专家老师，我虽年过八十又二岁，但第一次荣幸参加社科界学术讨论大会，加之学术研讨资历浅和水平有限，上述发言有请诸位专家老师朋友研究指导提高！谢谢大家！

附吴持生简介：曾用名：吴逢平，湖北保康人，中国共产党员，1939 年 2 月 28 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63 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高级工程师，曾任化工部党委委员、合成材料和化学建材两处处长，五矿复合材料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精细化工专业委员会特别顾问等职，曾荣获石化部先进工作者称号，荣获化工部国防化工科技成果奖，多次被评为五矿总公

司、经贸部优秀党员，被授予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石化部先进工作者

化工部国防化工科技成果奖

多次评为中国五矿进出口总公司和经贸部优秀党员，曾荣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员称号

论“双十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的活动

杨抗美

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同志亲属

今天，我有幸参加陕西省社科院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大后方建设暨纪念西安事变 85 周年》第 15 届 2021 年学术年会。我根据大会的要求，主要议题有以下方面；

一、西安事变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

二、西安事变相相关人物群体的研究。

三、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首先我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不是专职资深的研究人员。一生主要的职业是医务工作者。我为什么关心这个专题呢？是因为我的家庭与西安事变有割舍不断的关系，我的外祖父赵寿山是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他是杨虎城将军领导的 17 路军的军事总指挥。

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容及赵寿山西安事变时的行动活动。已有相关资料介绍，我这里不打算讲了，我只讲其中几个问题；

一、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为什么杨虎城将军将当天行动 17 路军总指挥的任务选择赵寿山将军承担。当时在 17 路军将领中职务比赵寿山高的将领有许多，赵寿山仅是一个 51 旅长。这里有几点要说明的；

（一）赵寿山的爱国思想、行为与杨虎城的爱国思想、行为一致；

赵寿山在 1930 年一 1935 年在汉中驻军时，就对日本侵略者侵略我东北三省，灭我中华，有强烈的亡国之恨，虽然是国民党晋绥汉中司令，但对汉中的学生爱国运动。表面上是反对，在下面又释放政治犯，吸收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士。中共陕南特委军事负责人常汉山。作为赵寿山的高参，常住赵寿山家里。并负责赵寿山儿女的教育。 该部还吸收了汉中抗日进步青年，陈玉峯，朱曼青等到该部队担任重要职务。同时又协助和支持了孙蔚如将军与红军建立巴山协议。但是因为我党的极左路线下，杨虎城部张汉明旅在执行护送红军过境任务时在兰田九间房遭到伏击，张汉民等 20 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赵寿山因此非常苦闷，中国的救国出路在哪里？35 年蒋介石又抽调该部前往陕北撵共。赵寿山当时以丧母守孝为理由向杨虎城告假出游全国各地。他曾想联系冯玉祥旧部宋哲云和韩复渠，推举冯玉祥主政抗日，但由于韩和宋怕冯主政后报复，这件事情没谈成也不愿参于。赵寿山在北平看到了中国满目沧桑山河破碎，内心焦虑，中国的抗日出路如何走？赵一直在寻找答案，哪一个政党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赵在上海又会见了共产党人杨明轩，杨晓初、赵葆华和李馥清，并在杨明轩的指导下阅读了马克思的三本书，一本是《社会发展史》，一本是《政治经济学》，另一本是《国家与革命》。最主要的是知道了什么是国家，要革命不但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更重要的还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见赵寿山将军一书 P371 页），他们经常讨论抗日局势，并提出共同的想法，扣蒋抗日，逼蒋抗日，赵寿山再次回到西安时就向杨虎城将军提出承签。在必要的时

候扣蒋抗日，逼蒋抗日，这个爱国思想与杨虎城将军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二）赵寿山将军与杨虎城将军对共产党的态度一致。

1、赵寿山将军和杨虎城将军的家庭成长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赵寿山的父亲是个雇农，因地主无故收回土地，一气病死。所以赵寿山念的私塾是靠乡里乡亲接济完成。而杨虎城将军也是因替父报仇，杀死李贞。他们天然都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基础。

2、赵寿山和杨虎城和共产党的许多人士早年就有联系。赵寿山 1924 年到杨虎城部队，1929 年到三边教导队，同去的有刘光甫共产党人，一直对赵有影响，并同时认识赵葆华共产党人。刘光甫在中山学校当教员，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杀害，赵寿山就把刘光甫的弟弟刘俊甫接在家中上学和安置，刘俊普后来也成为我党秘密战线上的情报人员。1930 年赵寿山在汉中认识了陕南特委军事负责人常汉山，1935 年在上海又认识了户县人共产党员杨明轩，杨明轩公开身份是教育家，并聘为该部的高参一直在赵寿山家前后居住 9 年，杨明轩的公开的身份是教育家，不仅从事学运，支前的群众组织以及民盟组织话动，还是中共周恩来领导下的社会部；吴德峰情报系统的秘密党的情报工作责页人，又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有着紧密的联系。（吴德峰情报系统在杨虎城部 38 军里的情报组织和话动，这个内容我后面根据现有的资料整理后专门讲）赵寿山接受共产党的思想，之所以能提出扣蒋抗日，逼蒋抗日，是在众多共产党人思想影响下提出的，这一点也和杨虎城的思想一致，因为杨虎城周围也有一大群共产党人。杨虎城的爱人谢宝珍，王炳南，南汉城等都是共产党人。

三、赵寿山将军有勇有谋，是杨虎城部队中一名儒将，也是杨虎城将军忠实有力支持者。赵寿山 1924 年到杨部，从基层做起，连、团、旅。无论是西安围城。还是山东剿匪。赵寿山的部队始终是排头兵，冲锋陷阵。所以杨对他的军事能力也是认可的。

四、赵寿山在西安事变前已经做了各种最坏的打算。

西安事变的发生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也可能部队被撤销，还有杀头的危险，赵寿山将军在给杨虎城将军送承签前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他将女儿托付给杨明轩。

讲第二个问题：

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贡献。

（一）赵寿山将军是杨虎城将军思想在该部忠实执行者和继承人，也是杨虎城精神思想在该部队的军事核心人物。（连国民党特务也这样认为）所以赵寿山将军讲，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他思想的转变点。赵寿山的思想在西安事变后的改变，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自己的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员竭尽全力的从各方面支持中共，该部队也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见赵寿山将军传 P347 一 P348）（范明回忆录：毛泽东批准赵寿山党龄从西安事变后算起。P347---348）该书陕西人民出版，范明口述，陕西省党史党史研究室整理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发文 1984（迪字 31 号）文件。

而实际上 赵寿山将军 47 年进入边区，因组织考虑多种政治原因，其主要原因是杨虎城

将军还在蒋介石的监狱里。赵寿山的党籍从 42 年算起。

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贡献。这个题目比较大， 我仅从一位赵寿山将军的后代，几代人都参与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就这个内容讲一下自己的认识，这些说法不一定准确，供学者们讨论商榷。

抗日统一战线不是一句政治口号，是我党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西安事变后陕西的抗日统一战线应该是全国开展最有效的，也是最成功的。

纵观历史，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我认为有这几方面。

（一）杨虎城部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部队在陕西，河北、山西，河南驻军期间，作为部队是有军事力量，她的军事力量，是在国统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力量。这里我没有专门去讲

因为我们还有专门的文章论述这方面内容，用陕西党史研究室的说法：
那 300 个字。

由于这支军事力量的存在，使中国没有成为亡国奴。在形式上是保卫了蒋介石政府的存在。而他又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支军队，从军长到士兵，有多层中共组织机构受中共领导和支持(后面我再讲他的组织机构)，杨虎城部队李兴中将军指挥的 96 军也有党的组织机构。他们拥护都接受中共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军事上又能以合法身份在国统区团结友军，团结国民党内坚持抗战的左派、孤立顽固派，从而形成的反抗外来侵略者统一战线，他们是抗日的中坚和中流砥柱。这种中原地区军事上的抗日统一战线，又于太行山八路军敌后游击区相呼应，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从北京的西山到河南的王屋山。从王屋山诃南到风陵渡）这里是中原地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战场，例如八路军领导的百团大战，杨虎城部队在中条山抗日战场上也积极配合；破坏敌军的铁路，在军事上牵制敌人。（接受彭德怀的指挥），杨虎城部队在黄河南岸的守防任务中，收复郑州，八路军同样也给予有力的支持配合。（因为有许多资料没有解密。我还不能展开去讲）

（二)这种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是中共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有力支柱，中共中央为什么把延安作为落脚点。除了延安有独特的自然条件，有刘志丹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外。还有一个重要条件。我们过去不愿意讲：西安事变后陕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中共成了合法组织（国共合作）当然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承认统一战线，蒋介石只承认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在抗战期间一有机会就进行围剿边区和清除共产党。这只在编制上是国统区国民党部队的合法军队，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中共合法活动的保护伞。这个内容过去我们不让讲,我认为到了今天应该把它讲出来。我举例用资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1）杨虎城部队在 30 年代张汉民旅被称为共产党人库，有 200 多共产党员。

这是因为冯玉祥清党，共产党人都留在杨虎城部队里保护起来。例如许全中、阎槐要、户品一，等都是原冯玉祥部队都是留在杨虎城部的将领。（见丹心素裹第一卷）

（2）抗日战争时期，1939 年阎锡山清理共产党。当时山西六县共产党人被保护在赵寿

山领导下的 38 军。一部分就成为 38 军的中共领导骨干，一部分人被护送回边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可以翻看山西平陆县县志。

（3）1941 年---1942 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又开始全面清理共产党。陕西地下党将一百名共产党人以 38 军教导队学员形式。保护在赵寿山领导的杨虎城部队里。（见《丹心素裹》第二册）又一方面学习军事知识。

（4）杨虎城部队的抗日统一战线典范作用。在军事上也是陕甘宁边区能够存在的桥头堡、或前哨阵地。我下面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1937 年西安事变后。中共和杨虎城部、张学良部三位一体的合作，由于东北军的内讧。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王一哲将军被少壮派杀害。东北军基本被蒋介石瓦解。而杨虎城部队。仍然坚持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例如：中共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挂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并接受杨虎城部队宪兵队的保护（时间 1937 初一 1937-8）国共合作开始，这个红军联络处也改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见照片内容）

这里我讲一个故事；1937 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陕西召开军事会议；要放弃西安，把陕西作为游击区，让日本侵略者进潼关后首先灭了延安根据地。这时中共中央也紧急动员各届人民.组织，妇救会、学生各团体，民先队支援抗日前线，保卫陕西、保卫西安。中共陕西地下党利用杨虎城部孙蔚如担任陕西主席的关系，向陕东地区、长安、三原派派遣多名共产党人县长，例如共产党张锋伯、常汉山、苏智深、韩兆鹗等进步人士。他们对支援前线抗日，做了大量的支前工作。

而杨虎城部队在中条山的守护这种军事力量是抗日战线上的中流砥柱，既保卫了陕西西安，也是保卫延安的军事屏障。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陕西地下党也在多方面支持关心这支部队的成长。派遣大量的干部，充实部队的骨干。例
如。派遣抗大学员和安吴青训班学员。派遣战地服务团和雪花剧团。这一内容可以参照（丹心素裹（Ⅰ一 4）有许多内容可以讲。

杨虎城部队的统一战线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是四万将士流血牺牲注释的，这个内容我现在还没讲透。虽然 1984 年有迪字 31 号文件给这支部队定性定位。但 2021 百年党史学习教育年，陕西省党史办编写的中共陕西党史这一章节。把中共一支隐蔽战线的这支部队等同意其他国民党部队，并抽取它的核心内容没有中共组织结构以及中共组织活动。这是对杨虎城部队内共产党人的不公，也是对几万流血牺牲的指战员不公。我们希望能够协助陕西省党史办，弥补这一段的党史。因为最鼎盛最典范的作用正是在西安事变后形成。如果全面抗战时期，杨虎城部队里抽去中共组织及中共党员的活动，那么就等于抽取了他核心内容。这支部队就等同于国民党部队抗日，这对杨虎城部队的广大党员和同路人及他们的后辈是不能容忍的，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中国成立 71 年，有中共党史机构也有 40 年，总不会历史又倒退回去。我们殷切的希望和等待。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社科联相关组织能够弥补杨虎城部队西安事变后这一段中共党组织机构和

党的活动。

再谈第三点 ： 杨虎城部队的中共组织结构和中共情报网。
杨虎城部队的中共组织机构。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 17 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38 军。1938-7 又恢复建制。孙蔚如率领的第 31 集团，下辖赵寿山军长的 38 军和李兴中军长的 96 军。38 年底有改为第 4 集团。杨虎城部队的中共组织机构在西安事前事变前。均为陕西特委组织。这个内容中共陕西省党史里有交代，我这里不展开讲，主要讲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 38 军的中共组织结构，
杨虎城部 38 军军长赵寿山，与中共中央毛泽东、前委朱德和彭总有电台直接联系，并不与下面基层发生任何组织关系。在赵寿山军长的司令部、有大批共产党人的高层统战人士和进步人士，他们来自于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领导的社会部，西安八办的秘密情报组织吴德峰情报系统，他们共同组成了 38 军高层统战活动。八办秘密情报情报组织吴德峰和罗青长也是杨虎城部队 38 军联络处高参和上卫。以便于在西安情报活动。杨虎城部 38 军里吴德峰情报组主要人员有座阵赵寿山家里的高参杨明轩、杜斌承、赵寿山的秘书姚警晨，来自中共北方局的孔淑贞，担任 38 军军事教官，中央军委派遣的崔仲远主要负责 38 军对外联络与重庆八办的联系工作。来自周总理南方局派来的温鹏久和柳乃夫……等等这些活动内容都可以在《丹心素裹》书里，老同志回忆文章里查阅。
有些内容仍未完全解密。

中共在赵寿山率领 38 军内 1939 又成立中共地下工委员会，书记由陕西省委任命蒙鼎军同志，还有范明和张西鼎两位页责人，主要做部队中下层兵运工作，受陕西省委和中央直接领导。

这多层机构均保持单线联系。有个别同志（蒙定均和范明、胡振家）上下贯通有双层关系。一般纵横不发生关系。
以保持中共组织的严密性和保密性。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 38 军成为统一战线的典范

杨新铁 杨抗美

原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同志亲属

前言

值建党 100 周年、西安事变 85 周年之际，回顾西安事变以后杨虎城部队在党中央关怀和帮助下，该部地下党员和指战员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团结、抗日、进步纲领，在和解放战争中创立功勋的故事这一段历史，特别那种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就是指杨虎城部队，特别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在非常时期亲自秘密领导的三十八军。

文中披露杨虎城部 38 军 17 师和 529 旅，在 38 年初的半年时间里，是隶属于 18 集团军配置的，也介绍了共产党中央及陕西省委和杨虎城及他的部队之间紧密联系的一些公开的秘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是怎样关心、帮助、教育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的？地下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怎样进行统战、党建、掌握部队实力和对敌斗争的？重点放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描述了如何在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杨虎城部队英勇杀敌,忍辱负重，在团结、抗日、进步的口号下改造部队，成为人民军队的过程。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部队已经成为共产党干部仓库

一、大革命时期，杨虎城的部队里就有魏野畴等著名共产党人开始活动

这里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魏野畴、李子洲、习仲勋、南汉宸、宣侠父、张文彬、汪锋、欧阳钦、杨明轩、阎揆要、杜斌丞、吴德峰、孙作宾、吕剑人、常黎夫、杨信、刘威诚、孔祥祯、崔仲远、蒙定军、范明、胡振家、张西鼎、杨晓初、梁励生、宋绮云、武志平、姚警尘、何寓初、常汉山、韩兆鹗……这个名单很长，无法完全写出，有些至今还不能写。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前就与杨虎城部队密切合作，192 年春，杨虎城驻榆林期间结识了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和共产党人魏野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后又结识共产党员李子洲,李帮助杨分析当时的全国和陕西形势，坚定了杨的革命思想。大革命时期，陕西的共产党员魏野畴、赵葆华、宋树藩等共产党人组成驱吴请愿团来到耀县杨虎城指挥部，要求他出兵“驱吴”。杨虎城部队于 1924 年底回师关中，1925 年初部队到达耀县,如约出兵，政权从此到了国民军的手中。共产党帮助杨虎城筹办军官学校: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含初、赵葆华、吕佑乾等为政治教官。并协助杨虎城防守西安城。

土地革命时期杨虎城通过与魏野畴等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建立了同中国共党亲密合作的关系。当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相继叛变革命，开始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杨虎城宁愿自己离开军队，也不能出卖朋友。在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初期，杨虎城通过杜斌丞、孙蔚如派出武志闵带着作战地图前往四方面军联络，和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的条约，并为红军开辟了红色交通线。

杨虎城一进陕西，就释放了在大革命时期被捕的共产党员蒲子政、吕剑人、赵伯平、潘自力等二十多人;杨虎城还秘密释放斗争中被俘的刘志丹。“从 1931 至 1936 年 12 月，杨虎城部队先后建立中共师的军委 3 个、团委三个、营委 3 个、特别支部 1 个，总支委员会 1 个，支部 50 多个。

参加暴动失败的共产党员王泰吉、许权中、张汉民等，都是杨虎城的“爱将”。陕西省政府警卫团由杨虎城的卫士营扩编而成，张汉民任营长，连长史唯然、李明轩、巍树林、王建三都是共产党员，警卫营扩编成警卫团后，相应建立了中共警卫团党委会，共产党员发展到 200 多人，后来警卫团又扩编成警三旅。杨虎城的第二位夫人谢葆真，年仅 14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经中共河南省委批准，与杨虎城结为夫妇，从此与杨虎城形影不离。在杨虎城主陕期间，谢葆真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实现杨将军“同共产党合作，团结东北军和一切反对内战的人共同抗日”的政治立场，做了大量的工作。

共产党人王泰吉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关押在南京监狱，经杨虎城营救出狱后，历任杨部参谋、新兵训练处处长，骑兵团团长等要职，1933 年 7 月 21 日，王泰吉在陕西耀县率骑兵团 2000 余官兵发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任总司令，失败后率残部退入照金革命根据地，部队改编成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成为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王菊人曾任杨虎城机要秘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杨虎城同乡。大革命期间虽然脱离中共，但是一直在党外默默为党工作。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他一直充当杨虎城的全权代表和中共代表谈判，为杨虎城和中共的合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如亢心栽(亢维烙)、米暂沉、刘威诚、曹受社、刘子潜等人，不仅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杨虎城的同乡，因此备受杨虎城的信任。在许多重要的决策中，都有他们的参与，这种同乡关系在杨虎城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影响力量。杨虎城和共产党的合作关系被张国焘破坏。后来又发生了“九间房事件”。情况是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军突围到了陕西蓝县葛牌镇一带，杨虎城令旅长是共产党员张汉民的警备第二旅前去做做样子，顺便给红军提供一些帮助。这支队伍大部分军官是共产党员，战斗力很强。张汉民率军到了蓝田后，本来和红二十五军约好打假仗，还每次都给红军留下了不少的枪械和粮食。但是一次在蓝田九间房，红二十五军突然失信，袭了警备第二旅，张汉民部碎不及防，全军覆没，连张汉民本人和被俘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全部遭到了误杀。1935 年“九间房事件”发生后，张汉民遇难，警三旅改编成特务二团，共产党员阎揺要担任团长，后来主要负责十七路军和红军的联系。

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共与杨虎城开辟了新的合作格局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 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重要会议，全面清算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1935 年秋，共产国际派与杨虎城有世家关系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回国做促使杨虎城与中共合

作的工作。王炳南向杨虎城分析了形势，1935 年 11 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南汉哀委托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处长申伯纯将《八一宣言》送给杨虎城。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派曾在杨虎城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汪锋持毛泽东的亲笔信去和杨虎城进行谈判，当时杨虎城和中共领导人从未接触过，不敢断定信件的真伪，后来杨虎城又致电南汉哀，向他说明这一情况。1936 年 2 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红军与十七路军抗日合作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与杨虎城于 4 月达成了四项协议

(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这项协议的签订，确立了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新的合作关系。这次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队中的统战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切都为抗体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5 年 11 月，毛泽东亲自写信给东北军的第 57 军军长董英斌，相约“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两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

193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表《致东北军将士书》，表示:“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同年 4 月 9 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的秘密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6 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叶剑英、边章伍、朱理治(兼秘书长)等。

1936 年 8 月，毛泽东亲笔致信杨虎城，其中说道:“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此后，双方关于联合事宜即进入具体磋商落实阶段，到 1936 年 12 月初，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战线才最终实现。

西安事变时期

华北事变后，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但是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杨二人多次对蒋介石进行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根本不听。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发表了对内民主、对外抗日的八大政治主张。

中共还发布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希望“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

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应邀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赴西安，具体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在周恩来领导下，党对西北军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

1、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对杨虎城的帮助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逐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分别于 1936 年 12 月 15 日和 19 日两次通电全国，对张、杨以政治上的支持，坚决反对亲日派借机发动内战。同时，中共还发布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希望“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同时中共中央还应邀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飞赴西安，具体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张学良认为全国的抗日要有蒋介石的领导，必须放蒋介石回去;杨虎城认为，蒋介石为人狡诈，毫无信义可言，不能轻易放他走。周恩来同意张学良提出的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走并拥护他为全国领袖的看法，并提出一方面要“保蒋安全”，另一方面在策略上要声明若南京方面进攻西安，蒋的安全就没有保证。张学良为之折服，第二天就对南京方面采取强硬态度，致电何应钦“委座南归，尚待商榷”。

18 日，周恩来与杨虎城交谈，他分析了国内形势，讲明了争取蒋介石抗日，蒋有可能抗日，最后必须放蒋走的道理，杨表示:“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既然他与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与张、杨的交谈，使他们之间减少了分歧。

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红军主力迅速南下。彭德怀、贺龙率部进驻三原、径阳一带，徐海东率部进驻蓝田一带，向西安靠陇，以便在讨伐军进攻时，配合张、杨的军事行动。同时，中央还指示红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制止内乱。叶剑英在随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专门协助张、杨主持军事。

2、杨虎城临出国前的嘱托

杨虎城反复对孙蔚如、赵寿山、孔从洲等人交待他的抗日愿望说：“双十二事变，扭转这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们这个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

并叮咛今后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以及咱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北边(指红军)是朋友，南边(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杨虎城的指示得到部下将领的支持和拥护，事实上，抗战八年这些将领也是按照这个嘱托，依靠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辉煌业绩。

1937 年 3 月，赵寿山任 17 师师长，他忠实执行杨虎城的嘱托，接受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多次与恩来、叶剑英等党的领导人接触，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示;他在 1936 年 12 月 19 日，赴三原上任渭北警备司令。在三原驻防期间，红军将领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几天时间和他交心解释顾大局的决策，合影留念间彭德怀对赵寿山开玩笑说：

“这下你把‘通匪’的证据留下了。”赵笑着回答说：“我不怕，我还要上山入伙呢。”此后不久，赵寿山先后将子侄辈中的赵铭锦（女）、赵元介（子）、罗少岚（儿媳）、张兴华（甥）、黎辉（张妻）等 7 人送入陕北抗日军政大学。1 人送入安吴青训班。在送行的汽车里不但装有表面上是成筐送给毛泽东、贺龙等的橘子，其实下面还有藏着的银元。其他为红军送粮食给养都是按照杨虎城布置的做的。

在赵的要求下，1937 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派申敬之任师特派员，与蒙定军、胡振家负责领导地下党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陕西省委又陆续派去一批共产党员，进一步加强了十七师党的力量。杨明轩、孔叔东、杨晓初、崔仲远、等同志陆续到 17 师上层开展统战工作。

4、西安事变后中共对原十七路军的工作

“西安事变”中，赵寿山和孔从洲、许权中受命指挥了西安方面的战斗，并任西安公安局长，维持社会秩序，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的帮助和教育。为准备对南京“讨伐军”作战，赵率部驻军三原、泾阳，与红军配合时，又与彭德怀、任弼时等多次会晤，曾合影留念，并提出入党要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缩编为三十八军，孙蔚如任军长，赵寿山任 17 师师长，李兴中任 177 师师长。

1937 年，在 38 军部队中的中共党员有 200 余人，到 1942 年，已发展到近 630 人，绝大部分是军官，几乎掌握了 38 军直属队和主力 17 师的大部分指挥权。这个过程是很典型的。

西安事变后，应赵寿山的请求，1937 年 11 月，17 师在中共的有力帮助下于山西碛口整军，在干部轮训班上，请中共党员南汉宸、崔仲远、孔祥祯等授课、作报告，主要内容是抗战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与中共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

1938 年 1 月，赵寿山秘密访问延安，“明确表示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毛主席给了密电码，答应派给干部，并且嘱咐要自己培养干部。

这时候在 17 师的共产党秘密工作者情况如下，西安事变前杨明轩和杨晓初等人曾经秘密在上海为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安排过《国家与革命》《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列著作的学习，所以杨明轩任命为参议，并住在赵家里。在杨晓初去北京采购军需过程中，北方局安子文又要求杨晓初把孔祥祯介绍到十七师担任参议，1937 年 4 月，经杨明轩、杨晓初介绍，崔仲远，也到十七师工作，1937 年 8 月底周恩来并且把崔仲远和党的关系告诉赵寿山师长。崔又介绍了申敬之来到部队，申敬之为该师党的特派员，蒙定军为党支部书记。赵寿山委任一批共产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掌握了部分实权。先后委任杨明轩、孔祥桢、崔仲远、吴德峰、何寓础、于海峰等为参议；还特别委任杨晓初为十七师军需处处长、西安办事处主任。常汉山为军法处长（后为崔仲远），张奎耀为副官处处长、胡振家为四十九旅参谋处长、牛子明为团副，黎子淦、呼品一、上官树德为营长。这些党员都成为赵寿山重要的政治军事骨干。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三十八军的共产党员，要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和战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十七师的共产党员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个指示，在团结巩固部队和对日作战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38 年初八路军从抗大派一批学员进入十七师，为十七师组建战地服务团，其中雪花剧团实在八路军中组建后派往十七师进行工作的，同时八路军总部又介绍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抗日同盟来到十七师作瓦解日军的工作，后陕西省委又从青吴青训班和学生中组织一批青年从三原进入该部在三原开办的教导队，38 年夏进入中条山。

(1)碛口整军

37 年底，17 师开往碛口，受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八路军脱下几百套棉衣送给十七师，战士深为感动南汉宸代表党中央、毛泽东来碛口慰问十七师官兵，给部队多次作形势报告，大大鼓舞了士气，坚定了抗日信心并帮助整顿了地下党组织。部队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帮助下，轮流抽调班以上干部，举办“五日整军训练班”，着重学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关政策，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失利的原因和争取胜利的条件。通过学习，很多官兵懂得了坚持长期抗战、全民抗战和改造部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问题的道理。十七师在碛口整训了 50 多天，办了五期军训班，部队思想基本稳定，抗战热情比较高涨，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赵寿山在我党的帮助下，根据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改造部队的原则，结合实际，颁布了“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三大禁令是：禁吸大烟、禁嫖、禁赌。四大口号是：自觉遵守纪律、自我教育、经济公开、人事公开。反对打骂士兵，要求官长以身作则，把士兵当人看，同甘苦、共生死；准许士兵有权管理自己的事情。同时整顿了纪律，撤换了腐化庸懦干部，提拔了进步勇敢的干部。

1938 年 1 月，17 师在山西债口整训后，移防山西洪洞。应赵寿山之邀，朱德给全师连以上干部讲话，主要讲述了抗战形势，坚持全面抗战，长期抗战和抗战必胜的道理，全师干部深受鼓舞和教育。

1938 年春和 1940 年底，李兴中先后下令印发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论持久战》，供所部官兵学习，对提高部队抗战必胜的信念和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中条山整军

1938 年 1 月，赵寿山秘密访问延安，“明确表示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培养干部、改造部队”④的指示，在中条山抗战的二年三个月期间，领导三十八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赵寿山明确提出，向共产党学习，向八路军学习，积极举办各种形式的干训班、教导队。

1938 年，在地下党的支持下，38 军教导队在陕西三原举办，陕西的安吴青训班立即派遣一大批同志到部队去，这里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郝克勇（范明）、刘宏、王友轩、姚杰等同志他们以后都成为 38 军的骨干。在 38 年夏，教导队由陕西三原进军山西，和坚守中条山的 38 军部队汇合。党组织介绍了温鹏久、柳乃夫等人来中条山，他们在教导队担任教官。

杨虎城部在党的支持下创办《战地》和《新军人》报。具体负责干部大部分是中共党

员，其中有开设的课程除军事课外政治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上地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群众工作等，并且采用的教材都是延安抗大的。地下党员宋琦云、八办派来的周岩等同志都担任编辑和领导办报。直到蒋介石特务抓捕宋琦云同志。

1940 年 3 月第四集团军也举办干训班及干训班学生大队，至 1944 年 4 月与三十八军教导队一起共培养革命干部 1000 多名，发展中共党员 500 多名，毕业的学生由中共 38 军下工委统一分配至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担任基层干部。

在中条山整军运动中，又将其列为重点教学内容，要求干部学员认真学习，“三人禁令”和“四大口号’的贯彻执行，

有力地推动了三十八军的改造和进步，就连国民党的《扫荡报》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禁令和口号，便是军中一种革新运动的基本原则，而被全体官兵忠实不苟地践行着，真正做到了一致，一个军队像一个人一样”。

债口整军和中条山整军运动，是原十七路路军接受中国共产党帮助和领导的标志性事件，也是该部得到改造、获得新生、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点。

(3)军事上的领导，1938 年初，三十八军 17 师和 177 师 529 旅编入 18 集团军序列

三十八军在组织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938 年初，三十八军 17 师和 177 师 529 旅编入 18 集团军序列（见中国人民解放军 19 军军史），直接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刚从延安归来不久的赵寿山异常兴奋，决心服从指挥，积极配合，协同作战，奋勇杀敌。赵寿山等对朱德、彭德怀十分敬重，对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命令都不折不扣地执行。凡总部召开的重要会议，赵寿山都积极参加，认真地聆听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八路军负责人的报告、讲话。深受教益和鼓舞。

八路军总部对 17 师和 529 旅也非常关心，彭德怀、左权、陆定一经常赴 17 师看望赵寿山，指导部队军事、政治工作，大大增强了两军的友谊和团结。在朱德、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17 师于 2 月至 4 月，多次以灵活机动的伏击战术，重创进犯山西高平等地的日军，赢得当地人民交口称赞，并立碑纪念。17 师和 529 旅直接受八路军领导指挥，尽管只有半年，但却从八路军中学到了许多游击战略战术经验和优良政治军事作风，对原 17 路军的改造和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力地促使了该部政治方向的转变。

1940 年 8 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此时原十七路军虽不受八路军直接指挥，但在朱德、彭德怀的特电要求下，仍大举配合。三十八军在同蒲路南段实施破袭，所部各团轮流出击，在运城、安邑、闻喜一带开展破袭战、游击战。九十六军派两个加强团出击临晋、椅氏以南和虞乡、解县以北地区，派一个加强营夜袭虞乡东站。出击各部队破坏日军铁路、公路、炸毁桥梁，有力地配合了百团大战的胜利开展。直接受八路军的指挥领导，是原十七路军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认真地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略战术原则。早在 1937 年 8 月保定战役前夕，赵寿山曾邀请周恩来给 17 师排以上千部讲话，周指出:对日军作战灵活机动，不要打死仗，拼消耗。这给赵寿山和全师将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8 军，视学习八路军游击战略战术为重要任务，在长达 6 年举办的各类干训班，教导队的教学中，游击战略战术必列为重点内容。

1938 年春，177 师主力在陕西合阳、韩城、朝邑一带固守河防。李兴中曾对九十六军视察组组长说:“我们的军队应学习八路军灵活的战略战术，打游击运动战，消灭敌人。”“要学人之长，补己之短。”②他们遂组织了沿河 7 县学生军事训练班，师参谋长中共党员许权中专门撰写了游击战的小册子，作为主要军事教材。

5 月，孙蔚如对 177 师血战山西吴王渡有较大伤亡深表不满和忧虑，指示该师参谋处长:“以后必须实行机动作战，竭力减少伤亡为要。”③不久，177 师组织游击队，渡河至晋南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主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也壮大了自己力量，以后发展为 96 军的一个团。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地下党和部队的将军忍辱负重，在团结，抗日，进步的口号下改造部队，成为人民军队过程由于受八路军的帮助、支持和影响，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在原十七路军中实施运用。1939 年 6 月，日军近两个师团，并配两个炮兵联队，S3 架飞机，共计 3 万余人全面进攻第四集团军中条山阵地，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被敌隔断，九十六军军部及所属 177 师、独立 47 旅和 S3 军独立 46 旅被压缩包围至平陆旧城谷地一带，形势极为险恶。危机时刻，孔从洲率独立 46 旅，以八路军为榜样，出其不意，向北突围，穿插敌后，运动作战，歼敌两个炮兵中队，打乱了日军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突围和反攻，并与三十八军胜利会合，为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杨虎城部队的共产党员和部队所作的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命令 17 师北上抗日，企图借日军之手消灭这支杂牌军。该师于 8 月 2 日到达保定,先后参加了新安镇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曾给日军以重创。10 月，扼守娘子关、争夺雪花山、夺取井泾车站。在坚守乏驴岭战斗中，日军两面夹击，炮火猛烈，飞机支援，17 师伤亡很大，从 13000 人锐减到 3000 余人。

11 月 8 日，太原失守后，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东南后退。中国共产党为争取 17 师这支抗日进步武装力量，建议其留在晋西，倾向进步的赵寿山师长接受了这一建议,从太原以南转移至离石县碛口一带,在肖劲光旅等八路军的帮助下完成整训。期间，该师地下党负责人蒙定军同志，曾向中央汇报地下党和部队的情况。罗瑞卿、刘向三等领导同志听取汇报，作了“地下党要协助部队大量培养青年干部，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和增强部队实力，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长期抗战”的指示。随后,蒙定军又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欧阳钦(杨青〉和汪锋同志做了汇报。

1938 年上半年，该师曾被编人 18 集团军(即八路军)序列，在八路军总部和东路军的指挥下,转战于山西洪洞及晋东南之长治、高平、晋城、阳城、垣曲等地。

陕西省省委书记欧阳钦将党员何寓初派往中条山 38 军 46 旅孔从周身边，他对派入 38 军的共产党员说:“这支军队.....是参加过“双一二”事变，受到我党政治影响的杂牌，现在又在抗日前线，是抗日部队。因此因此，你的任务大不同于在内战时期去做敌军工作，

不是去瓦解敌军，不是去搞兵变，而是要从各方面努力，增强其官兵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这支部队的抗日作战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和彭德怀在保定保卫战还没有拉开时赶到漕河车站，给 17 师讲话。所以这支部队的 38 军是在抗战中间一直保持着地下工委组织，并且培养了 600 多名党员，全军共一千名排长以上干部，大部分掌握在地下党手里。

（4）在陕西省后方战场开展的抗日民主运动

党的统一战线不仅在抗日前线开展，在后方也积极推进，杜斌丞，杨明轩，杨晓初，王菊仁等一批爱国志士，还有党推荐的十大抗日县长，都团结在抗日民主旗帜下，在后方组织支前，为抗日部队筹粮捐款，为抗战尽心尽力，到后期他们用民盟和西北抗日军人大同盟的名义，几乎团结了大部分的抗日爱国将领和指战员，所以蒋介石和军统对其核心人物非常仇恨，西安军统站站长张严佛回忆，他们认为杜斌丞是杨虎城的政治继承人，因而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最后下毒手将其杀害，而杨虎城和宋绮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也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被杀害。

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杨虎城部抗战中进行著名战役。

扼守娘子关

1937 年 10 月初，日军沿平汉线向南进犯，在攻击石家庄的同时，以一部兵力西进，企图夺取娘子关，与晋北南下之敌合击太原。17 师在国民党第 27 路军的编成内，担负娘子关外围防守任务，在雪花岭、乏驴岭一带构筑阵地，阻击日军的进攻。10 月 12 日晨，日军川岸文三郎第 20 师团向我发动进攻，17 师与敌激战两天一夜，使敌进攻受挫。雪花山是石头山，构筑阵地没有土，所以敌人炮击对我伤亡极大。

13 日晚，17 师以 1 个团的兵力，由师长赵寿山率领,分 3 路向井陉南关日军右侧背出击，官兵奋力冲杀，连下施水村、板桥、朱家川、南关车站，缴获敌大炮、机枪、骡马及其他战利品一批。

日寇全力向雪花山进攻，守备雪花山的部队由于团长张世俊疏忽，在此战中，共产党员、连长张登第率部坚守阵地，除了跳崖的士兵以外，没有一人生还。经过反复争夺，敌人不仅继续增兵，且以燃烧弹、毒气弹向我攻击，十七师伤亡惨重，不得已撤至乏驴岭阵地，继续坚持战斗。并抽出一部兵力，袭击日军侧后，支援第三军。敌人在压迫第三军的同时，又向磨河滩黄绍竑的指挥所突进，孙连仲的一个旅阵地亦被突破。这时，黄绍竑又令已经调来的三十八军教导团投入战斗。教导团与敌短兵相接，以刺刀、大刀展开拼杀，阵地经反复争夺七八次，终于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但全团 2000 余人，仅剩五六百人了，伤亡惨重。

14 日，日军继续向雪花山增兵。‘17 师伤亡较重,遂向乏驴岭转进。敌占领雪花山后，向乏驴岭阵地发起攻击。17 师与敌激战数昼夜，使敌未能前进一步。激战惨烈到什么程度？旅长耿子介在山上抱着石头往下砸，共产党员黎子淦营全营战至仅剩 10 余人,其余均壮烈殉国。上去的时候是黎子淦营长这个营里面有他的亲弟兄四人，回来的时候只有他和弟弟

是身负重伤，浑身是血，抬下来的，其余的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据说战场上找到一段胳膊，上面有青色的胎记，这是黎家人特有的记号！所以当这些勇士被抬下山的时候，山下守兵都向他们致敬。

由于 17 师坚守阵地有功，19 日，敌在炮兵和 20 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增兵 2 个联队，向 17 师阵地发起强攻。经殊死搏斗’终因敌众我寡，17 师奉命由娘子关正面转移到驴桥岭，与友邻部队一起抗击日军进攻。17 师与日军苦战 18 昼夜，全师由 1.3 万余人减员至 3000 余人，受到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黄绍竑“17 师此次攻守皆很尽力，损失奇重，殊堪嘉奖”的电报嘉奖。

八路军送来一个宣传剧团，命名雪花剧团，以纪念这次战斗的牺牲

我党和陕西各界人民对西安事变中有过卓越贡献的三十八军极为关怀，他们在部队被高度分割的情况下，不断了解情况，进行工作。西安进步报纸发表了赵寿山关于娘子关战斗给友人的一封信，以及《华北抗战实况》、《许权中将军会见记》、《三秦健儿一页抗日血战史》等稿件，向群众介绍了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唤起人们注意，蒋介石想在两面夹击中消灭这个部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529 旅忻口作战

10 月上旬，正当阎锡山感到晋绥军伤亡过重情绪不安的时候，正在太原的周恩来副主席和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等共同决定将五二九旅由河北调往忻口作战。这个旅是原十七路军中我党力量最强的部队。共产党员、抗日名将许权中就是这个旅旅长。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阎揆要任该旅一〇五七团团长。

部队由三原出发前，周恩来当面作了指示，后来又写信说，共产党员要在统一战线战斗中起模范作用。五二九旅遵照周恩来指示开到忻口，前线指挥陈长捷却把他们分割使用，经总指挥卫立煌纠正，才又集中起来。在进攻南怀花的战斗中，部队机智勇敢，连克几个山头，在用火力杀伤敌人的同时，还用刺刀、手榴弹拼杀，给敌很大打击。全旅 3000 多人，经过 14 个日夜的血战，伤亡 2/3 以上，剩下不到 1000 人了。

其中一〇五七团原有 210 名共产党员，也只剩下 60 余名了。周恩来说，这些党员尽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责任，牺牲的值得!此后，部队开赴离石交口镇整训。

大战高平关

我们都听说过日军在抗战初期朱德总司令遇险的故事吧，当时八路军总部在晋(中)五台山地区，日军为了消灭八路军总部，采用飞机侦查和轰炸的方式，他们扎了一个自认为和八路军总部很像的村庄以后就发电发报，说朱德已经被消灭。其实这个时候朱德彭德怀的八路军司令部已经向高平转移，因为那里驻扎着在平型关狠狠教训过日寇的 115 师，在路上期间，朱德得到了一个消息，日寇从 XX 一线向突然发动进攻，当时八路军的几个师都挺进敌后，做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工作，为了延滞日军进攻，朱德总司令，准备派警卫连去阻击日军进攻，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立即派了一个师加入 18 集团军序列，这个师就是 17 师（原 17 师两个团和 529 旅一个团）当时八路军的总部驻在屯留，高平是晋豫公路的要

冲，17 师进驻以后，17 师归八路军总部指挥，因而来往甚密。经常邀请朱德，彭德怀等负责同志到部队来讲话，并给部队作关于进行游击战的报告。

1938 年 2 月下旬，为粉碎的日军的九路围攻，康克清率八路军总部的部分人员来到高平北陈村，在短短的五天中，除宣传抗日、了解情况、召见地方党组织和牺盟会负责人外，还特意到康营村，会见了友军第十七师师长。

康克清向 17 师转达了八路军总部善于加强部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以及多打运动战，少打攻坚战等方面的意见。17 师坚决照办，并请康大姐转给周恩来副主席，表示坚决执行周副主席关于坚持敌后斗争，不要撤到河西的亲笔指示，与日军血战到底。最后，康克清与爷爷共同研究了十七师在高平的作战方案，确定了十七师与八路军总部的电台联络的密电码。以后 17 师和八路军总部始终保持着电台联系。

1938 年 3 月 3 日，日军第 14 师团黑石联队侵占沁水县城后，继续向高平县进犯。17 师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在高平关、搭鸡坡、虎头山、杨甲村一线构筑工事,严阵以待。8 日，战斗打响，阵地右翼搭鸡坡部队用火力向敌人拦腰进行射击,敌人无法前进；虎头山阵地独立营官兵把日军逼进两山夹一沟的死胡同，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痛歼日军。经 8 小时激战，打死日军 120 名，打伤 200 余名,击毁敌装甲车 12 辆，缴获钢炮 3 门，轻重机枪 15 挺，38 式带盖步枪 130 支，各种弹药 50 余箱。部队缴获满载食品的汽车和许多物资。把食品都分给了群众，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部队的电台没有汽油，群众就自觉设法弄来几桶油，并自动给部队筹集粮秣。游击战一直打了半年，敌人过高平时都非常胆怯，戒备很严，跑步前进，说是杨虎城的部队在这里。

到 1938 年 5 月，部队已先后收复了晋城，阳城，陵川、垣曲等 8 个县，与黄河以南的大后方已经打通。当时的《大公报》以大字标题登出了“我军晋南大捷” 的消息，但是，却不提哪一部分部队取得的胜利，因为 17 师这个部队不但是“杂牌”，而且还是属于 18 集团军序列。

1938 年 4 月中旬，17 师在长治外围袭击日军抢粮队，同时于长治以南阻击日伪军的“扫荡”，毙敌一部。4 月下旬，在长治川南马岭伏击战斗中，阻击日军 1000 余人,毙敌 200 余人。继而通过敌军内线关系，收复晋城，在界牌岭战斗中毙敌 200 余人，缴获战马 10 匹,军用品一部。17 师先后攻克晋城、长子、沁水、高平、壶关 5 座县城。

4 月下旬，日军以 108 师团为主,纠集约 10 个联队 2 万余人，分 9 路向我晋东南发起全面进犯。日军先后进犯长治、屯留、长子、髙平、晋城等地，经八路军与 17 师部队的不断打击,疲于奔命,饥饿不堪，于 4 月 27 日，108 师团主力由长治向商平、晋城撤退。撤退途中，遭 17 师协同徐海东部及决死 1 纵队一部在髙平、丹朱岭一带的伏击。经激战，毙敌 600 余人，击毁汽车、马车 200 余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 9 路围攻。

高平战斗胜利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扫荡报上和边区报纸均有报道，朱德和彭德怀的十八集团军给军委会的战报上讲，“我部赵师，杨旅，徐旅，扫荡日寇，斩获颇丰”，其中

赵师就是十七师，杨旅就是当时隶属于十七师的 529 旅，都是杨虎城的部队。

有战斗就会有牺牲，在每一次战斗中都有指战员流血牺牲，其中一个抗大来的干部，临死时候还希望见师长最后一面，但是战斗紧张，没有见上，赵寿山将军也很难过，又有一次战斗，一位战士在牺牲之前，赵寿山就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需要部队照顾的,这个年轻的战士说，死去倒不觉的什么,，遗憾的是也没有后人给我送烟，到了九泉边没有烟抽，难熬的很。赵师长含泪对这位年轻的战士说，你放心，我将来一定给你送烟。为了让死去的英灵得到安息，这个部队离开高平的时候在窑则头村买了墓园，把牺牲的每个战士的遗骨都移到这里，给每人都立了一块纪念碑，并立了一个大纪念碑纪念在这些在十八集团军序列战斗中间牺牲的英雄，这就是“陆军十七师抗日纪念碑”，直到今天，高平人民把这个纪念碑还一直保护得很好。赵寿山将军一直记着他给那位年轻战士的承诺。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还风尘仆仆，赶到这块纪念碑前，给当年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士默默送上祭奠的香烟。

浴血中条山，写进日军陆军教科书的夕阳河战役

38 年 6 月，十七师接到命令，从高平转战中条山，中间在中条山的东麓在卫立煌指挥下，又和日寇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十七师在垣曲劫了日军的后路，和其他部队一起把 2 万日军团团围在夕阳河谷，十几昼夜，天天用大炮往里打，晚上组织大刀队厮杀，战斗十分残酷，共产党员呼品一率领全营官兵英勇牺牲。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申敬之特派员身负重伤，抬下火线。共产党员范文英营长，壮烈的牺牲在破袭日寇的战斗中。

中国军队狠狠的教训了日军，失去给养的日军在十几天内，只好靠空投维持，后来日军又增兵一万五千，才解除围困。日军尽管摆脱了被围歼的命运，但是他们也领教了中国军队的顽强，后来日军把这次战斗列入“帝国路军教材”，以接受教训、

这次战斗可圈可点的是，十七师不仅是英雄的战斗队，还学会了八路军群众工作那一套，部队一到垣曲，就立即和当地的地下党一起建立地方政权，免除了原来抗日不力的自卫队领导，建立了新的自卫队组织。

血战永济

1938 年 5 月，一七七师(缺五二九旅)在许权中这样久经考验的抗日名将指挥下，由陕西郃阳夏阳渡河，与当地游击队密切配合，先后攻克了临晋、猗氏、虞乡、永济等县。6 月初，独立四十六旅由陕西朝邑大庆关渡过黄河，在永济地区的尧王台、东西姚温、东西文学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敌人，共产党员杨发震，张希文都牺牲在激烈的战斗中。

7 月间，三十一军团总部由风陵渡过河，到达芮城地区，教导团、骑兵团也渡河北上。曾在井陉、娘子关和十七师等部打过恶仗的敌二十师团乘三十一军团立足未稳之际，集中进攻，在永济展开争夺战，敌重占了永济、风陵渡等地。解县之敌越过二十里岭，企图进袭芮城。这些初进入晋南的部队三面受敌，战争较为激烈。这时，十七师赶到平陆、茅津渡地区，集中主力，突往中条山西端，占领了二十里岭，迎接三十一军团总部进入中条山区，开始新的布防，开展新的战斗。从这时起，直到 1940 年 10 月止，先后经过 11 次反扫

荡(其中规模大的有三次)，阻止了敌人渡河西进。三十八军官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向中原及西北地区的人民表达了爱国热忱。

3.29 战役

8 月 7 日，日军 20 师团分兵 4 路进犯中条山。中条山横贯晋南三角地带，是阻止日军西犯、保障陇海铁路的天然屏障，同时威胁着敌占区同蒲路南段,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7 师奉命转战于中条山后，这时又补充了兵员，称为 38 军，她首先集中兵力占领中条山西部二十里岭地区，加紧进行防御。在 4 路进攻的日军中,其中一路 2000 余人，直扑茅津渡。38 军在南村、太臣村、圣人涧一线展开阻击、侧击，配合友邻打退敌人的进攻。20 日，日军沿同蒲路南犯，38 军组织部队夜袭安邑援敌，日军首尾遭我重创后败退。9 月 13 日，日军牛岛师团约 5000 余人,分 2 路向中条山进犯，38 军主动出击，向敌发起猛攻，毙敌 400 余人,敌被迫撤退。11 月，日军集结 4000 余人,分 3 路“扫荡”中条山地区，38 军与敌激战一周，重创日军，迫敌缩回据点。12 月初，日军集结 1 万余人，向吕梁山进攻。38 军奉八路军彭德怀副总指挥命令,组织营、连分队，深人敌后，配合山西决死队破击敌交通线、袭击和伏击分散之敌，打退了日军的进犯。

1939 年 3 月，日军 4000 余人在空军的支援下，向太臣地区发起进攻，并向我阵地施放毒气。38 军为避免与敌正面硬拚，以 1 个团向敌翼侧闻喜出击,另一部向张店敌重要据点围攻，并精选数百名敢死队员，人手 1 把大刀，向敌发动猛烈进攻,先后与敌激战 6 天 6 夜，毙伤敌 600 多人。日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此战即为“三二九战役”。

6.6 战役

1 陈硕儒带领 177 师，孔从洲带领 46 旅突围跳出包围圈

1939 年 6 月 6 日，日军继“三二九战役”败北后,集结兵力，以 20 师团、37 师团 1 个旅团，配厲山炮、野炮各 1 个联队及飞机 38 架,兵分 9 路向中条山腹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迅速包围了 46 旅和 177 师，46 旅和 177 师损失严重，于是 177 师和 46 旅当机立断，突围跳出了日军包围。

跳黄河的故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属于学兵队的刚参军的年轻孩子和工兵部队的军人，被压缩在黄河岸边狭长的悬崖和河滩一带，他们宁死不屈，跳下悬崖，跳入滚滚的黄河，至今黄河沿岸的老百姓还传颂着他们的事迹，祭奠着他们不屈的英灵。

后死碑的故事

还有一批战士在战斗空隙中用刺刀刻写了一块碑石，称作后死碑，前面的战友已经牺牲疆场，还活着的留下自己的名字，准备在接着的战斗中牺牲。

日军对我战斗到死军人躯体致敬！对其所表示的民族气节表示敬佩！

柳乃夫

在 177 师突围的战斗牺牲的名单中，我只举一个例子，原来在 38 军教导队当教官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柳乃夫，1935 年初，留学日本东京学习和研究世界语，年底由钱俊瑞电召回

国。回国后，坚决响应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左联活动。

1938 年 6 月，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指派前往山西，到 38 军作政治工作。他和从德国回来的温鹏久一起在平陆县茅津镇加入我地下党按照毛主席指示主办的军队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主讲国际形势和日本侵华罪行等课程，鼓舞了军人们抗日斗志。为了更深入做些前敌具体工作，后经军部批准到 177 师挂职秘书，

1939 年 6 月 6 日突围中，柳乃夫顽强与敌苦战，深入重围，拒不做亡国奴，被日寇刺死，年仅 29 岁。日军从他流血的胸膛拿出笔记本和他在战火硝烟中撰成的《中条山下》《抗日政治工作》等著作初稿，知其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作家，向其躯体致敬，表示敬佩！我们的军人让自己的对手也不得不尊敬！

当年 12 月，柳乃夫为国捐躯的消息传到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沈钧儒、钱俊瑞、邹韬奋等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大家一起演唱了由沈钧儒作词、史亚璋作曲的哀悼歌曲。歌中唱道：“……我们的崇敬者，你背着一杆枪，横着一只笔，炽燃着文化人的心，流溢着‘武化人’的血，你是救亡者的前驱，也是火线上的斗卒一…我们把你深镌在我们每个朋友的心上……”

6，6 战役后期指挥

38 军战术灵活，指挥得当，损失较轻，他成功掩护第 4 集团军及 38 军等部队安全转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免去了第 4 集团军参谋长陈志坚的指挥权，命令赵寿山军长统一指挥第 4 集团军所属部队。赵寿山军长决心以中条山东段为依托,灵活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通过正面抗击与侧翼袭击、敌后奇袭,伏击敌运输线、破坏其交通线，使敌防不胜防，四处遭我打击，损失惨重。经过连续 10 余天的战斗,粉碎了日军“扫荡”。

1940 年 4 月，日军 20 师团主力及 37 师团一部,再次发动大规模进犯，先后侵占我平陆、茅津渡及东西延村、古王、稷王山等地。当日军兵力分敢后，17 师即组织主力部队实行各个击破。97 团在望垣山以东毛家山、庙凹山地区与日军激战 3 日。98 团 3 营在营长张治率领下，打退日军 8 次冲击,毙伤敌 500 余人,该营伤亡大半，张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25 日，日军撤退，我军恢复了原来的阵地,取得中条山第 11 次反“扫荡”的胜利。

4.17 望原战役

1 9 4 0 年 4 月，日军向中条山发动了新一轮大扫荡。而我 38 军给敌人早就布下了口袋等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日军诱至平陆东部的望原一带，设伏兵以击之。

日军的扫荡是从中条山中部突破，沿张茅大道直取茅津渡。这次的规模仅次于“六六战役”。

望原会战的主战场在望原、淹底两个山头（今运城市东南中条山内），两山之间有一道深沟，沟底是一条宽约 3 0 多米的小河——洗耳河。 4 月 1 9 日清晨，中条山下突然涌来一股巨大的寒流（俗称倒春寒），雨雪交加，狂风怒号，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赵寿山将军趁风雪之夜，调动前线各部兵力，分四路猛攻日军，一夜间将望原周围的鬼子打得狼狈逃窜，收复了大部分被日军占领的村落。

4 月 2 1 日，日军从望原以北的张店据点扑向李振西防守的望原高地。教导团李振西团长将一个炮兵营摆在半山腰，将 5 个步兵营排列在炮兵两侧，每隔三五步便有一挺重机枪，形成一条钢铁防线，在三日之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十次进攻

在战斗最危急时，铁血虎将李振西对一营营长殷义盛说：“鬼子来势汹汹，你马上给我抽出 1 0 0 名不怕死的后生，每人发一箱手榴弹，冲下山去，收拾＊＊＊！这边我用炮火掩护。”

殷义盛迅速挑出 1 0 0 名精壮后生。 1 0 0 条汉子齐声怒吼：“杀敌报国，在此一举!”在炮火的掩护下，殷营长奋勇当先， 1 0 0 条陕西汉子呐喊着冲下山去，趟过洗耳河，冲入敌阵，一排排手榴弹炸起漫天烟雾……日军全线溃退，而我百名敢死队员也多半阵亡……

2 5 日，38 军部队各路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条山东部的山头，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战马嘶鸣，刀光闪烁，望原会战打得昏天暗地，日军半数以上被击毙……望原会战持续数十日，以中国军队大捷而结束!

马勤动的父亲马吉普

这次战役很多将士牺牲在平陆土地上，马勤动是上千烈士的一个代表，当时我 38 军敌侧后进击。敌人恐其老巢被剿，于 25 日急急北撤。为了歼灭敌人，马勤动同志率领全排顶住日军的强大火力，用手榴弹、刺刀坚守窑斗阵地，寸步不让。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都被马勤动所在排击退了。最后经过反复拼杀，阵地肉搏，全排 30 多人全部壮烈殉国。

马勤动同志牺牲的噩耗传到了家乡，全家人悲痛欲绝。马吉甫老人以大局为重，把切肤之痛埋藏在心里，于是年 7 月 20 日给赵寿山军长写了一封信，对 38 军在中条山的胜利大加赞扬。并说：“小儿勤动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只问牺牲地点是否仍属我方占据。“欲来搬骨，以安伊母之愿。勤动牺牲后，马吉甫老人写了许多诗，以哀思、凭吊勤动之英灵。其中几句如下

…….

伊母焦思梦不成，镇日占卜问神明；

我来且向西窗下，无聊写诗泪已盈。

整装两次已登程，烽火连天未到平；

待看贼平胜利日，好收尔骨付先茔。

抗战本身最光荣，为报国仇不苟生；

人生自故谁无死，你今死比泰山重。

38 军赵寿山军长和党组织将这封信登在该军半月刊《新军人》上，大大鼓舞了部队的抗日情绪，全军上下对马勤动同志的壮烈牺牲无不起敬。对马吉甫老人的崇高品质无不敬佩。

赵寿山军长以尊敬的态度向老人复了信，叙述了马勤动烈士的光荣事迹和牺牲经过。还说明英躯已无法辨认，搬尸已不可能，仅分别予以掩埋，不能一一标志。要马老达观处之。朝邑地下党组织和各界人士为马勤动烈士开了追悼会，老人抑制了悲痛，继续为党工

作。只有搬骨一事，始终未能如愿。

1 9 8 2 年 1 1 月 7 日， 年已八旬的马吉甫老人风尘仆仆地从渭北来到成阳陕西省军区干体所，访问儿子生前的战友姚杰。老人十分激动地对姚杰说： “ 请你告诉我，勤动牺牲在什么地方?哪个山梁上?我要到那里去，在他牺牲的地方抓一把土回来也甘心了!”老人一句话说得姚杰泪涌鼻酸， 不知如何是好 他情不自禁地向老人叙述了马勤动烈士当年英勇抗战、壮烈牺牲的情景和老人的坚强表现对部队所起的激励作用。但不料老人年事已高，心情激动难抑， 竟然当即发生脑溢血，与世长辞，

为了完成老人遗愿，1988 年春，姚杰、李子含同志一起回中条山考察抗战旧址时，在中共平陆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同志陪同下，4 月 25 日，也就是马勤动排的同志们殉国四十八周年这一天，来到晴岚乡窑斗村烈士墓地。追念培土之后，敬马吉甫老人遗愿，在烈士的合塚上取了一包茔土，带回平陆县城。适逢县政协召开全会，将茔土迎在主席台上，盖上红布，举行了告别仪式。

吴仲六游击队

1937 年 9 月,吴仲六由陕西澄城秘密回乡。1938 年 3 月,平陆大部沦陷,日寇到处烧杀掠抢、奸淫妇女,平陆城乡血流成河,死尸遍野,幸存的妇孺饥寒交迫惨不忍睹。吴仲六,在冯卓村建立了“平陆人民抗日游击队”,自任队长。是年 5 月,吴仲六的游击队归编于平陆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抗日游击支队,列为十一中队,并迅速发展到 200 人。吴仲六游击队在同友军并肩战斗中,由于指挥得当,上下齐心,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在吴家嘴,他们果断回击国民党游击师的挑衅,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 200 人,活捉副师长徐鼓久交县民主政府处决。1938 年 7 月 19 日,在冯卓村战役中,吴仲六率部配合友军川军六十一团六连一个排,于冯卓桥居高临下,狙击日寇 200 人的进攻,激战 5 个小时,击退日寇 5 次进攻,歼灭日寇 400 人,受到嘉奖。

岑天古槐做成的烈士碑

望原的老乡说： “四·一七”反扫荡战役胜利后，38 军军长赵寿山和 17 师师长耿景惠，独 46 旅旅长孔丛周和 17 师地下党负责人李森等在吴仲六和当地民众的支持下，把冯卓村中一个合抱粗的槐树锯倒做成纪念碑，由任宏执笔，将中条山历次战役牺牲的战士和游击队员名单刻录碑上，立于本村黄家大院门前以做纪念。41 年中条山沦陷后，村民将碑埋于地下，解放初办小学缺乏木材，又将该碑改成课桌让小学生用了。望原的烈士鲜血换来了胜利，此次战役，历时半月。我军以伤亡 3000 余人之重大代价，日军死伤近四千，重庆《扫荡报》的记者金在镕以《苦守中条山的赵将军》为题做了报道：“敌人进攻中条山有 11 次了。每一次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这完全是我们坚守在中条山上的几十万大军的光荣功绩。卫立煌将军，他在几次中条山的恶战之后，送给赵寿山军长一个称号，称他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望原战役斩痛了日寇，大大的鼓舞了抗战军民的斗志。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一系列战斗中发挥的顽强精神,

赵寿山将军在“望原战役”战斗结束后，打电话与家中联系，正逢其小孙女出生。即

在电话中把小女命名‘望原’，以纪念这一战役的胜利。战后全国各大报纸电台以“我军在晋南又获大捷”为主题，作了报道。称“38 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八路军和朝鲜义勇军的崔永健同志

经中国共产党倡议，1938 年 7 月，朝鲜“民族战线”理事、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向蒋介石递交了成立朝鲜义勇队的方案，在武汉成立的朝鲜义勇军曾转战太行山区及华北各地，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由于许多朝鲜战士会说日语，在八路军对日本军队政治攻势、宣传工作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了纪念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朝鲜义勇军，河北涉县石门村修建了中国第一座朝鲜义勇军纪念馆，朝鲜义勇军在邯郸战斗事迹还被编入教科书.

特别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继而支持韩国光复军，并处处打压朝鲜义勇队。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对朝鲜人歧视态度，使这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的朝鲜青年极为愤慨。他们从生活实践中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朝鲜人民的真正朋友。他们决心和八路军并肩打击日本鬼子，以便将来打过鸭绿江，解放自己的祖国。

但是还没有多少朝鲜人知道，当年朝鲜义勇军被八路军总部派遣最先来到的部队是 38 军，而这个朝鲜义勇军的负责人就是后来的朝鲜委员长崔永健。

这些朝鲜义勇军的战士，到了 38 军以后，一部分人参加了雪花剧团，朝鲜族能歌善舞，在抗日宣传，鼓动民众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部分随 38 军部队行动，做瓦解敌军工作，

每当夜幕降临时，朝鲜义勇队就在夜色的掩护下，深入到最前线，用日语对敌军进行宣传瓦解：“你们的妻儿老小都在盼望你们早日回家团圆呢！”“将军们坐飞机，士兵们步行送命去，你们的父母抱白盒子痛哭。”“欢迎你们投诚，我们优待俘虏！”……。当时参加这种斗争的，除了朝鲜同志以外，还有日本解放同盟（由觉悟的日本战俘和投诚过来的日本士兵组成）。朝鲜同志和日本解放同盟的同志随八路军一起到“格子网”去活动时，充分利用他们的有利条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各种工作。他们用日本话或朝鲜话向日本鬼子的炮楼喊话，高唱瓦解敌军的歌曲，在墙壁上写朝鲜文或日文标语，给碉堡里的日本人、朝鲜人写信……

他们和 38 军将士结成了血的友谊，崔永健委员长 60 年代访问中国还一定要寻找当年给他站岗的警卫排长

这只朝鲜义勇军部队一直和参加杨虎城部队的作战，直到 38 军被逼着调出中条山，才回到八路军总部。

广武鏖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为了巩固在中国的占领区，同时压国民党屈服，于 1941 年 8 月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最后以失败告终。9 月又发动了湘北战役，未获胜返回原防。10 月 2 日，日军又以第十七、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一一〇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一部，二万余人，进攻郑州。国民党以九个军约 15 万人对付敌人，由于没有坚决抵抗，奉命增援之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根本没有认真接触，两日之内就放弃了郑州，敌人

来去自如，形同演习。三十八军虽受蒋介石的压迫谋害，仍然一面固守黄河河防，一面派十七师星夜驰援郑州。在须水、三官庙等地，初挫敌锋，阻止敌军西进，并在须水至荥泽，霸王城以西的荥阳、广武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称为广武战役。

10 月 3 日，我在荥泽西的田庄、孙庄、韩庄、谢洞等地，毙伤大量敌军。敌增援反扑，三十八军又与其在广武东北之南王村、大胡村至樊河寨之线展开血战，尤其在军岭峪、南王村一带反复肉搏冲杀，敌以飞机施放毒气，掩护反扑，先后占领该地。我军猛烈反击，毙伤敌军数百，将其击退。6 日敌又进行反扑，与我激战在纪信庙地区。

8 日，敌一高级指挥官率部数百人进占张沟，经我军两昼夜围击，敌除以直升飞机抢走指挥官、少数人夺路逃生外，余均被我歼灭。10 日晨，摩旗岭对岸之敌乘船南渡，被我击沉四只，余均逃回。11 日晚，我军攻占须水，毙伤敌军一部。15 日拂晓前，我军向大小胡村、军岭峪之敌进击，毙伤百余，攻克大胡村，并阻止了敌之反击。

21 日，敌 4000 余，附战车七辆，分三路围攻广武城，11 时占领该城及其东南之苏楼。23 日，又西犯荥阳之苏寨村，被我击退，毙伤 200 余，我军乘胜攻克广武城，敌退据董庄、苏楼。20 日晚，我十七师又袭攻旧荥泽县及霸王城附近顽抗之敌，毁敌工事铁丝网多处。

11 月 7 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广播讲演，指出：“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一定要保卫我们每一个抗日阵地，一定要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还严词告诫国民党当局，必须当机立断，迅速采取措施，改善抗战营垒中各方面的关系，加强团结，准备一切反攻条件，坚持抗战到底。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三十八军于 11 月上、中旬继续向黄河以南之敌发动攻势，陷敌于韩洞、大西沟以北至霸王城一带狭小地区。敌负隅顽抗，企图固守桥头阵地，十七师攻入大西沟，与敌巷战，毙伤数百。此时，敌另一部向陈洞绕袭，被我军截击，负创后撤。18 日，敌又反扑，我军与敌在韩洞、王洞、霸王城一带展开对抗战，往返冲杀，均无进展。11 月下旬，全国正面战场上，均无重大接触，只有这个地方与敌激烈鏖战。

12 月上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赵寿山奉命指挥九十六军的一七七师，孙桐萱第三集团军的八十一师及三十八军的第十七师，围攻敌桥头阵地。经战半个多月，大小战斗 30 余次，并调集民工在敌阵周围深挖壕沟数道，构成一个封围线。12 月下旬，只留三十八军长期监围，与敌对峙。

荥阳、广武、汜水以及巩县的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三十八军抗日，他们当向导，运送弹药粮秣，抬伤员，成千上万的群众挖工事，掘壕沟。有一次，十七师向敌进攻时，主动领路的八名青年农民，先后牺牲了七个，还继续协助部队作战，广大官兵深受感动。

中外记者团曾来广武阵地访问。他们说，赵军长筑造的阵地“敌人是攻不破的”。荥、广、汜、巩的人民，对三十八军“放心”、“指得住”。可是国民党的特务却向蒋介石报告说：三十八军多一半是共产党、赵寿山是杨虎城的“化身”。蒋介石与蒋鼎文合谋后，1942 年 10 月中旬突然下令，限三十八军于月底交防完毕，撤离郑州、广武前线，调巩县、偃师地区集中整训，桥头阵地交由八十五军接防，三十八军遂被汤恩伯的部队包围监视起来。

国民党在西安发动“清共运动”，11 月 16 日，任第四集团军参议的抗日名将许权中在眉县槐芽途中，被国民党派的 12 名狙击手突袭杀害。同行的三十八军任耕三团长和警卫员刘兴坤遇难。接着，调赵寿山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

血洒中原

张耀明调来代替赵寿山当军长，在 38 军猖狂叫嚷要共产党员自首，揭发共产党员升官，杀死共产党员有赏，尽管原工委主要领导同志离开部队，但是在 38 军的地下工作者坚持斗争，团结孙蔚如。孔从洲等一批将领抵制了张耀明。

1944 年 4 月上中旬，日军集中七万兵力，在中牟县分三路强渡黄河泛区，国民党军队在蒋鼎文、汤恩伯指挥下，以 40 万的兵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失地 40 县。

血战虎牢关

4 月 19 日，蒋鼎文电令第四集团军进入巩县以东国防主阵地，第四集团军令三十八军守备老饭沟至褚岭间阵地，九十六军守备褚岭至金沟间阵地，并守牛峪口、马峪沟河防。4 月 20 日晚，日军步骑战车联合向三十八军阵地进攻。21 日晨，又以空军掩护，继续进攻，同时派遣轻便部队千余人，绕道汜水河，侵入虎牢关隘路，企图偷袭夺关。一七七师守备虎牢关 400 余人，坚决还击，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敌人发动数次进攻，在火力配合下，我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反复拼杀，毙敌约 600，我 400 钢铁健儿血战疆场，牺牲只剩三人。增援部队赶到后，将敌击退，阵前敌尸累累，虎牢关安然无恙。23、24 日，步炮空联合之敌数千，又不断向虎牢关猛攻，九十六军亦不断增援逆袭，进行侧击，十七师暗袭敌后；第三十五师对敌伏击，虽伤亡较重，但虎牢关仍在我手。敌我激战五天，26 日晨，虎牢关阵地一部被敌突破。九十六军猛烈反击，至 27 日晚，将敌逐出阵地。27 日晨，十七师一个连绕至米河敌侧进行突袭，毙敌 50 余，缴获文件多种。

虎牢关血战八天，28 日午后陷落敌手。此时第四集团军仍在巩东主阵地坚持，各部队不断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穿插袭击，短兵相接，相持数日。5 月 7 日，敌又向主阵地发动进攻，各军英勇冲杀，敌未得逞。 张耀明故意让杨虎城部队硬拼消耗，借着日军的力量，消灭这支队伍。

统一战线的典范是在腥风血雨中炼成的

（一）国民党特务密报，姚警尘、孔祥桢多名同志在掩护下调换岗位

杨虎城部 38 这支队伍，抗战期间和日寇厮杀是正面战场，和蒋介石特务斗争是背后挤压，部队刚刚由中条山移防到河南，国民党反动派就以“异党嫌疑”多次追查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干部。事情很多，只说其中件事情，姚警尘、孔祥桢。

(二)镀金政策

国民党要求 38 军干部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军校毕业，38 军工委立刻研究选派一批同志进入国民党军校镀金，以备后来带兵掌权

(三)37 名“异党嫌疑”名单

1941 年春，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到洛阳找赵寿山同志谈话。何应钦当面拿出一张列有 37 名“异党嫌疑”名单，其中包括工委负责人和几名团长。何应钦说，蒋介石命令将这些人送往“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面对此一紧迫严重局面，赵寿山表示：“既然委员长、何总长对我不信任，我请求辞职!”弄得何应钦只好将此事推给卫立煌处理。与此同时，孙蔚如将军派孔从洲同志送卫立煌一信，说明三十八军中没有“异党”，望卫能从抗战大局考虑，不要将这些军官送“劳动营”。为了应付蒋介石，赵寿山写了具结书，以后只送了三人去西安劳动营受训。即陈居莘(营长、其岳父刘守中，国民党执委)、邵青山(连长，行伍出身，没有文化，非党)、魏洪涛(共产党员，被指明为军工委书记、军部参谋)，赵寿山估计他们三人不会出什么事。临走时给他们说：“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要回来。”随后，赵老就给 38 军驻西安办事处长杨晓初(共产党员)布置办理此事，杨晓初又给管钱和印件的刘顺明同志具体交代说“为了把送去的人放出来，要全力活动，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硬是把劳动营有关队长用钱买通，不久，即获释放，安全回到了部队。

(四)卫立煌要把蒋介石第二次抓起来

另一件事情是，卫立煌和 38 军的同志以及地下党多有交往，愤恨蒋介石消极抗日政策，他曾经想把蒋介石第二次抓起来，首先打电报给赵寿山联络，这件事情 38 军是做了应变准备的。就如同几次部队想把红旗打起来，有关方面都同意了，但是无论是毛主席来指示，还是彭德怀来通知，部队都能把发下去的动员令紧急收回，忍辱负重，坚持下去。

特别党员

从 1938 年到 1944 年。地下工委负责教导队连续办了五期，培养干部一千多人，发展五百多名党员，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取得党对 38 军的紧密领导，派工委委员张西鼎回陕西马栏和延安汇报，随后又派 38 军地下工委委员郝克勇前往马栏和延安汇报，对赵寿山的部队中设立的中共地下党的秘密电台。1942 年 11 月 7 日，毛泽东致赵寿山电文中明确，“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三字”，分别代表毛泽东、38 军中共地下工委和赵寿山。赵寿山委托郝向党中央再次申请入党，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他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同时将第 38 军中约 300 名党员的名单向他公开。

这里的特别党员，是指由党中央直接接收的党员。从党的二大到八大，党章均规定党中央有权直接接收个别同志入党。范明在《毛主席批准赵寿山入党》中写道：“毛主席指示说，‘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不公开’，入党时日从第一次申请入党时候算起。

回归

早在 1945 年年初，党中央毛主席就委派周仲英，张西鼎二人从延安来到西安，和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负责人一起商量、策划并组织了这次回归的行动。他们根据党的“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保存力量，站稳岗位，掌握部队，待机而动”的策略，在敌我斗争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稳定住军心，保存了实力，为起义回归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在 1945 年 7 月 17 日在国民党企图改编瓦解十七师之前，在刘威城，张复振同志的带领下，于河南

洛宁县发动起义，开启了回归之旅，紧接着就在上党战役建立功勋。1946 年 55 师在孔从洲带领下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但是这些革命火种，一部分回到解放区后面成立的 38 军西北民主联军，另一部分参加了解放战争的白区布点，以后 38 军西北民主联军在陈赓领导下开辟豫西根据地，夺取鄂北，参加淮海双堆集战役，以后和 12 旅合并成为解放军 19 军，进军陕南，其 57 师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转战玉门，新疆，青海，大庆和全国各地油田，把牺牲精神代入工业战线，55 上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毛主席夸奖打得好，至今还存在于野战部队，还有一部分打到云南，成为保卫边疆的骨干。

结论

毛主席指出：（杨虎城部 38 军）这支军队早就直接受党中央领导。三十八军在形式上是国民党编制，但实质上始终是按照党的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是正确的。这支部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热爱党的，是反蒋抗日的革命队伍，要把他们当做八路军一样的去做工作。

38 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这段指示，不仅是对过去流血牺牲的前辈的肯定，也是后人要继承的传统。

王志廉与西安八办秘密物资的运输和情报工作

王希红

原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王志廉同志亲属

我是辛亥革命陕西籍元老宋锡候的外孙女，杨虎城十七路军、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军衔不详）人员、中共隐蔽战线老情工人员王志廉的女儿王希红。很高兴受邀参加这次研讨会，与诸位共同学习进步。

2021 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重大纪念活动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在此回顾我党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大后方建设和在西安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胜利到达陕北，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已任。在各各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在今年，西安事变发生 85 周年纪念年，促进西安事变的深入研究，缅怀杨虎城、张学良二位将军等的丰功伟绩意义重大。

就研讨会第二议题《关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议题》第四项：西安事变相关人物、群体研究。我将展示：父亲王志廉和他战友们在中国共的党的直接领导从事中共地下隐蔽战线斗争的无名英雄的光辉事迹。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严密布控的西安白区，有一批活跃在隐蔽斗争前线的热血青年。他们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勇敢顽强地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父亲王志廉

父亲王志廉，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秘密活动联络站负责人，曾化名：王灿、王端、王飞。1910 年出生在陕西渭南，1925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临渭区八乡农民协会主席、农民自卫队队长。1928 年参加“渭华起义”，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同年，到河南南阳加入杨虎城部队汽车连，1930 年随军入陕在杨虎城公馆绥晋公署任汽车队队长。

1934 年，父亲为找党组织弃军从商，在西安府学巷成立“志通号”“志诚号”车行，掩护过中共陕西省委、西安市工委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如：潘自力、卫志毅等。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工作的需要，1943 年，车行更名为“春生永车行”，正式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安秘密情报站，以经商为掩护，为组织筹措活动经费。1947 年，为解决解放大西北后勤物资供应问题，父亲努力谋得“西安汽车工会总干事”一职，利用职务之便，向解放区运输物资补给。

“府学巷 20 号”的秘密

“府学巷 20 号”，坐落在古城西安南城门东侧的文昌门城墙下，孔庙的西临。这座宅院看起来非常普通，却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它是我地下组织情报人员的秘密联络点，往来延安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和进步青年，也在这里暂住。

宅院大门门头挂着醒目的牌匾——“春生永车行”。该车行是上海“孔氏洋行”在西北的总代理，经营范围包括：交通物资运输，经销汽车、汽车配件、钢材、染料等。院内房屋的壁柜、床头与地下暗室连通。暗室里存放着机密文件、军事地图、药品等重要物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集会、议事、交换情报。暗室外出口通往府学巷、安居巷、西安碑林博物馆和李家大院，在紧急情况下，父亲与战友们就从此出口撤离。

发展下线 实施策反

王玉珍是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西安市人，西安玫瑰女中青年进步学生，共产党员，早先隶属西安工委领导，经过父亲培养训练成为情报站机要员、地下交通员。在兰州执行任务时，被特务暗杀，光荣牺牲。

宋玉仙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我的生母），出生于陕西三原一大户人家，毕业于三原女中，家住三原鲁桥镇，离中共“安吴堡干部培训班”很近，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校期间是进步学生。外祖父宋锡候是李虎臣部队的旅长，抗日战争时期镇守西安南城门。与父亲结婚后，母亲也被父亲培养成机要员和交通员。

父亲的同乡李儒伯、梅永和、雷光斗，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也都加入到革命队伍。

李儒伯是“春生永车行”会计兼地下交通员。1938 年， 父亲派他在陕西宝鸡执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军粮押送 任务，被伪宝鸡国民党军统局抓捕后，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但他宁肯牺牲，绝不叛变。父亲花钱疏通关系，经多方努 力把他营救出狱，但其仍因受刑过重光荣牺牲。

梅永和曾是吉鸿昌将军的警卫员，双枪神枪手。父 亲安排他做我地下交通员，以赶马车为掩护，在西安城内 运送地下物资，收集各种情报。1947 年，他被“西情处” 机要科长王释奇出卖，被捕入狱后，敌人对他酷刑逼供， 他宁死不屈，最后光荣牺牲。

雷光斗，原在杨虎城部队做报务员，1942 年到西安 找到父亲，请父亲帮忙安排工作。父亲通过伪陕西省保安 司令部通讯处处长徐子财，将雷安排在伪保安处电台做报 务员。同年，“西安八办”领导下达任务，要求我情报骨 干想方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的电台为我们发报。 一天，雷光斗到父亲房间聊天，父亲利用这个机会问他：“用 你的电台给上海和延安大商人发电报可以吗？”雷光斗立 即答道：“行 ， 需要提供双方的呼号、波长、时间，约定好后， 按时叫通就能发报。”次日，父亲给雷光斗提供了双方的 呼号、波长、联系时间，又进一步用试探的口气问他 ：“这 可是给中国共产党延安发报，你敢不敢？ ”雷光斗高兴地 说 ：“我敢！我在‘渭华起义’时参加过中共组织。”父亲 看到雷光斗态度坚决，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从此，伪 陕西保安处通讯处电台，成为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敌人巢穴 内通往延安的中共秘密电台。

秦治安，陕西三原人，毕业于上海大学附中，学生 会领导人之一。1925 年参加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同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同乡关系，隐藏在南京伪审计部 任职，抗战期间回陕，与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利用关系 帮他找工作，先后到“永兴庆银号”“大华百货商店”“大 路百货商店”工作，后成为“春生永车行”地下交通员。 1948 年，他

得知老友屈伸回陕任“陕西第七补给区”司 令部办公室少将主任，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得 知后非常高兴，俩人经周密筹划后，由秦治安出面作屈伸 的策反工作。秦治安很快与屈伸取得联系，问他今后有何 打算，愿否做些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屈伸听后非常激动， 坚决要求秦治安介绍他去延安。秦治安对屈伸语重心长地 说 ：“干革命在哪里都一样，你现在为国民党干的差事极 其重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胡匪的军事行动，必定你 们先知道，如及时把情报发到解放区，对人民解放事业贡 献很大，希望你认真考虑。”屈伸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决 定服从秦治安的领导。秦治安给屈伸讲了组织纪律 ：一是 严守组织秘密，至亲厚友也不可泄露 ；二是认清反动派本 质，表态时却要坚决表明反共立场，做好自身保护工作 ； 三是谨慎交友，杜绝不必要的交友 ；四是单线联系，不与 任何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为了方便工作，父亲为屈伸取代 号为“老九”，屈遂开始着手搜集敌方情报。

从敌人心脏发出红色电波

父亲深知，为我所用的伪陕西保安处通讯处电台，就是一把插在敌人心脏的“尖刀”。为了确保密台的安全， 父亲拿出大笔资金打点相关国民党主要官员，如田益安（黄浦一期学员，在国民党内部很有威望）、徐子财（伪保安 处处长）、李培清（伪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梁国珍（伪保安司令部通讯器材少校组长）等。通过多方活动，雷光斗 升任为敌台台长。从此，发报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 西安白区与延安统帅部之间架起了一座红色桥梁。在父亲 和雷光斗的共同努力下，密台报务员被全部策反。1947 年， 伪保安司令部调防，雷光斗由西安调往咸阳、大荔、宝鸡， 父亲又与雷光斗一道，去上述三地疏通关系，以确保电台继续安全工作。

这部电台为我党的情报事业工作长达 7 年，向延安发送了很多重要情报，比如：1948 年初，解放军围攻宜川时守城迭电告急，情报员屈伸从补给区司令吉正铭处得悉，胡宗南密令刘戡率 29 军全力奔袭驰援，企图里应外合，与解放军主力决战。为防止泄密，胡匪弃用文电，改由高级幕僚亲自到各部传达。这一情报得到上级的高度评价，为西北战场瓦子街战役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类似重要情报还有数条。

国民党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的通讯处，在一直向延安发送着红色电波！西安城墙内钟楼下，就是我地下秘密组织长期活动的重要据点！

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们，长期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与敌斗智斗勇，最终取得隐蔽斗争的胜利。他们是我心中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值得我永远怀念。

以上所述，是我多年来收集大量的史料相互印证而写成的，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会出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王希红

2021 年 10 有 19 日

表里之间：抗战时期蒋介石日记所见之中共1

洪富忠[2]

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其日记自 2006 年 3 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开放以来，引起学界极大关注。近年来，涌现出以杨天石、陈红民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蒋介石日记颇深的学者，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3]《细品蒋介石：蒋介石日记阅读札记》[4]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蒋介石日记的著作，其它以蒋介石日记为材料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或著作更是不胜枚举。阮平、汪效驷等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共关系、政治冲突与事件、对日谋略、国际外交、人际网络、亲族情感、个人生活、蒋介石日记版本和史料价值等八个方面。[5]鉴于蒋介石日记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尽管相关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硕，但从不同角度考察，仍有大量可供研究的议题。如国共关系向来是抗战史研究的重点，也是蒋介石日记研究的重点，成果更是丰富，但从政党形象的视角研究蒋介石日记还颇为欠缺，尤其是蒋介石对战时中共的印象及其流变。中共作为战时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以中共为中心的自我叙事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计数，但战时中共不是孤立独悬一角，而是与战时各界有着充分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也留下大量“他者”视野下的中共镜像。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真正做到“知己”其实相当不易，既离不开自我审视，也尤须他者观察，在“我者”与“他者”的相互关照中或许能离“知己”更进一步，因而近年来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尤为提倡从“他者”视野观察中共，以期对中共能形成更为客观全面的认知，这也成为“新革命史”研究中倡导的一个重要方向，[6]学界也开始将相关议题设置为会议主题。[7]

有鉴于此，笔者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文本，首先分析关于中共内容记载在蒋介石日记中的体量，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蒋介石对战时中共与苏俄关系的界定、对中共党建的评价、看待中共的视角及对中共形象的审视视角等问题，从中管窥一个战时领导人视域下的中共形象，在“我者”与“他者”互动中丰富对战时中共的认识与研究。

在上述主题研讨之前，尤其需要交代说明几个问题，便于读者对于本文的阅读与理解。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形象塑造及历史经验研究”（项目号：17BDJ047）阶段性成果。

2洪富忠，男，（1977——），四川宜宾人，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抗战史、中共党史。

3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4陈红民：《细品蒋介石：蒋介石日记阅读札记》，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5阮平、汪效驷：《蒋介石日记研究述评》，《档案与建设》2019 年第 11 期。

6相关研究可参见李金铮：《寻觅“他者”镜像下的中共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11 期；李金铮：《“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江海学刊》2018 年第 2 期。

7有关最新的学术会议可参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主办，于 2020 年 11 月 6-9 日在珠海召开的“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旨特别指出：“长期以来，革命史、民国史两个学科逐渐形成各自的学科重点，二者边界判然，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打通学科壁垒，兼顾国共双方的史料与视野，全面考察两支对立政治力量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注意对手方的研究，可以避免自说自话，有助于全面观察互动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

一是因蒋介石长期以来的反共立场，其日记中关于中共有不少蔑称或评价，这既不符合当时的事实，在今日看来似乎不合时宜，但从史料的本真和学术研究而言，这也是其对中共述评的一部分，相信读者自能分辨，这也是从“他者”视野观察中共常见的问题。二是日记的私密性及其内容的丰富性，决定了其关于中共的述评具有片段性而非系统性，故本文仅就其记载较多的几个方面予以述评，从中分析其对中共的看法，因而文本各部分是以“并列式”方式呈现，与一般论文层层递进的逻辑结构略有不同。三是学界一般认为以某一日记作为主要文本会显得史料单薄，但蒋介石日记有其独特性，即时间连续，内容丰富，仅凭其日记，足以探讨诸多抗战史的重要问题，因而根据其日记探讨其对中共的评述，仍然具有相应的价值。

一、体量与地位：文本与现实的相悖

中共是蒋介石终其一生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全面抗战爆发前，解决中共问题就是蒋介石在国内应对的主要政治问题，卢沟桥事变后，尽管中日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争取抗日胜利是社会各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最主要诉求，但国共关系仍然是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蒋介石日记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

蒋介石日记内容丰富，体量庞大，有关中共的记载是其日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蒋介石作为战时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纷繁复杂，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家庭琐碎，在其日记中均有记载。全面抗战爆发后，如何应对日本的全面进攻，成为蒋介石思考的主要内容，一直到 1939 年底之前，从文本记载的频度而言，中共问题时常出现，但记述内容并不多，大都是“对共方针”“共党问题”“恩来谈话”等一句话的简短记载。自 1939 年晋西事变后，国共关系开始紧张，有关中共的记载内容有所增加。特别是 1940 年底至 1941 年 1 月国共双方围绕关于新四军北移问题争论颇多，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记载明显增多，如 1949 年 11 月 19 日、21 日、27 日、28 日等多日都有关于中共问题的记载。皖南事变爆发的 1941 年，从 1 月 13 日开始，几乎天天都有相关记载并有大段分析。此后的 1941 年 3 月，围绕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从 3 月 1 日至 9 日，天天均有记载。但凡在国共关系紧张之时，对中共的记载内容相应有所增加。国共关系缓和后，有关中共的记载就较少，如 1942 年的蒋介石日记中，中共出现的频度就较低，内容也较少。1943 年的日记中，9 月份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以及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两个会议上都有所谓处置中共的相关议案，故关于中共的内容较多；此外，1943 年杂录中，以 7 月 23 日及 8 月 25 日关于中共内容记载较多且篇幅较长，达千余字；[1]其余月份关于中共的记载内容并不多。1944 年日记中，也仅在外国记者要求赴延安考察及赫尔利赴延安谈判所在月份关于中共记载内容稍多。

单纯从体量来看，关于中共记载的内容在战时蒋介石日记中并不占据优势。以蒋介石所处之地位，需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太多，中共问题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比中共更棘手的问题时常涌现，让蒋介石应接不暇。如 1939 年到 1940 年，是重庆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时期，蒋介石日记中关于重庆大轰炸的记载特别丰富而翔实。每遇轰炸，飞机架次、死伤情

1参见《蒋介石日记》，1943 年 9 月 6 日、7 日、8 日、9 日、11 日、12 日；《蒋介石日记》，1943 年杂录；台湾抗战历史研究会 2015 年印行，下同。

况等在当日或次日日记中均有记载，所在星期反省录也有记载，在每月反省录及年度反省录或杂录中也有记录。不仅有记载，而且内容翔实，篇幅较长，数百字的记录屡见不鲜。对于中共的分析记载，间或也有内容相对较多的时候，但长篇大论的分析并不多见。

中共问题在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体量与中共问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实际分量并不匹配。记载内容较少，并不表示该问题在其考量中不重要。蒋介石在其日记中经常不经意地透露出二者之间相悖的情况。蒋介石在 1939 年回顾 1938 年工作时曾有一条，“四川虽未完全安定，然较上年以前稳定与进步则多矣。云南态度最近亦有进步，惟共党祸乱成性，叛迹日著，明年惟对此为最大问题之一，倭寇实已不能再为深患矣”。[1]实际上从日记记载来看，1938 年及 1939 年蒋介石日记中关于中共的记载并没有明显增加。蒋介石在 1940 年反省录中认为军事、外交、财政、经济、金融、交通、物价、粮食、中共、滇龙、川局，皆处于“最危急动荡之境地”，“而尤以俄国态度劣，中共到处煽惑，朱、彭部队明白抗令，袭击国军，且谣言中央与敌妥协”。[2]在如此众多事项中，中共地位是比较突出的。蒋介石曾在 1940 年初预期国内可能出现的所谓“变乱”包括“国内中共朱、毛部队，与叛逆石友三等部队以及云南四川军阀部队，偶一不慎，皆足以发生内乱，以召崩溃之或”，其中“尤以共匪叵测，为最足忧”。[3]实际上除 1940 年 11 月、12 月，蒋介石对中共记载比此前月份内容有所增加外，整体分量在其 1940 年内的日记中并不占优，但这并不妨碍中共问题在其心目中的重要地位。1941 年 12 月 21 日，蒋介石在其“注意”事项中记载了六个“对内最应研究者”，第一为新疆，第二为“共党”，第六为“东北共党之防备”。[4]1941 年 1 月及 3 月，蒋介石日记中关于中共内容相对较多，提及频度也较高，但与整个 1941 年日记相比，其分量并不算多。1942 年的蒋介石日记对中共提及的频度很低，如 2 月份提及中共相关者不过三条十余字，但 7 月 10 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认为中共问题“为内政惟一焦点”。[5]蒋介石于 1943 年 1 月拟定的当年工作中心任务十条，第八条即为“对共收服”；预想的危险状态十条中，第五条为所谓“共党作恶”；军事工作预定目标十条中，第五条为“共部受统制”；二十二条对内对外政策之要旨第八条为“对中共政策”。[6]虽然工作部署中中共分量不轻，但实际情况是 1943 年蒋介石关于中共内容的记载所占比例远不如在其拟定计划中的分量。包括 1944 年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后，蒋介石日记中相关评述也不多，但在其本年回忆与反省录中，蒋介石认为“本年之忧患与耻辱”，“最令人痛心难忘者，即其元首遭逢外族如此之逼迫污蔑，以及国内共匪如此之毁谤胁制”，在其所制定的 1944 年主要工作课目政策一项中，有十项任务，首要的就是“对共”。[7]1945 年大事表中，第三条即为“中共问题之解决”。[8]

之所以出现这种文本体量与实际分量不匹配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中共问题在蒋介石心目

1《蒋介石日记》，1938 年 12 月 31 日。
2《蒋介石日记》，1940 年反省录。
3《蒋介石日记》，1940 年反省录。
4《蒋介石日记》，1941 年 12 月 21 日。
5《蒋介石日记》，1942 年 7 月 10 日。
6《蒋介石日记》，1943 年 1 月。
7《蒋介石日记》，1944 年反省录。
8《蒋介石日记》，1945 年 1 月。

中是一个棘手问题，但同时也是个“常态”问题或老问题，即这一问题并不是只在抗战中遇到，此前围绕这一问题已经持续了十余年，并不是一个“新鲜”问题。相反，抗战期间蒋介石遇到太多此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如与日军大规模作战，与罗斯福、丘吉尔等领导人会晤，出访印度，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与运作，等等，可谓国内外、党政军等都涌现一大堆大事、要事、烦心事。从个体记日记的角度而言，自然对尚未遇到或更应急的问题有记载偏好，如重庆大轰炸，蒋介石第一次遇到如此大规模的空战，且时时威胁自己的生命，经常见到被轰炸的惨烈场面，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笔端多有流露，也是情理之中。从一般意义而言，日记记载的内容分量与其思考的重点具有正相关，即记载内容较多，表明作者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但作为后来者，实际研究过程中既要通过日记这一文本观察其未能观察到之问题，也要注意不要被日记所记之分量迷失了重点与方向。尤其是截取某一时段的日记研究，更要注意其前后的延续，不能仅仅局限在研究的时段就事论事，要有对所涉问题的整体建构和认知，在大视野下观察小问题，蒋介石日记中关于中共内容的记载体量与中共问题在其心目中的实际地位，就为我们提供了范本，研究者对此应有清晰的认识。

二、中共与苏俄：思想与行动一致的“共同体”

中共与苏俄（共产国际）因历史渊源，关系自是相当密切，抗战期间也不例外。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共与苏俄的关系更多表现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与苏俄的关系则体现为中共与联共（布）的关系，但在本质上，中共与共产国际、联共（布）、苏俄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实质区别不大。抗战期间，中共与苏俄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共的不少大政方针制定及国共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应对都与苏俄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中共在共产国际也派驻有代表，时常汇报中国国内形势。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苏俄是中国最大的外援来源国，不仅对国民政府有大量援助，对中共在武器、医疗、经费、电台，甚至印刷纸张等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俄自身也面临诸多困难，对中共的援助也相应减少，但双方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

正是因为中共与苏俄之间这种紧密关系，在蒋介石日记中，中共与苏俄关系被其塑造为思想行动一致的“共同体”。在蒋介石日记中有一个记载特点，即对中共的分析之后，紧随其后的就是对苏俄的分析，二者常被捆绑分析。1939 年 5 月 7 日，蒋介石在日记“注意”项中记载，“对倭预计，如共党降倭或受俄指使叛国，则处置方针当照预定计划，仍在内外挟攻中图存也”。[1]“受俄指使”的表述，表明在蒋介石眼中，苏俄与中共是典型的上下级关系，即苏俄指示，中共照办。1939 年 7 月 27 日蒋介石记载，“俄国不运军械之故，必为共党作梗”。[2]1939 年 12 月 30 日蒋介石记载，“昨夜接共匪朱德等有日通电，要求政府严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等，其乱迹已显。但其用意，仍在乘机扩充地盘，巩固边区，甚恐我军进剿也，此事应大事小做，不必重视，惟布置军队，准备实力而已；一面应对俄共说明中共捣乱实情，对共党应宽严兼施”，“下午与俄总顾问谈共党不法行为，使苏俄注意”。[3]类似

1《蒋介石日记》，1939 年 5 月 7 日。
2《蒋介石日记》，1939 年 7 月 27 日。
3《蒋介石日记》，1939 年 12 月 30 日。

这样的记载颇多，如 1940 年 2 月 3 日蒋介石记载，“共党动向与俄国态度似渐取缓和”；[1]3 月 1 日记载，“俄员又以共党问题不解决，俄国不能接济之间接表示为可痛”；[2]3 月 3 日记载“苏俄与中共之关系与态度，应切实研究，慎重处理”。[3]这些记载显示，只要苏俄在外交或军援上有所变化，蒋介石都将之视之为中共在从中作梗；如果中共方面有所行动，必是苏俄“指使”中共，苏俄与中共犹如连体人一般行动一致。

在 1941 年的杂录中，蒋介石有一段其关于所谓中共“乱国阴谋”的内容，堪称典型。其推导逻辑为：中共首先破坏美国对国民党的信心，国民党将挑起内乱；然后破坏中美关系；待英美与日本作战时，中国与英美分裂，不参加英美集团的对日作战；此时，中国抗战只能依赖俄国，而俄国凭借对华援助“以控制中央，任其中共发展”；待中共发展到相当程度，逼迫国民党不得不对日和平；此时“中共以中央降敌名义反对和平，乃起而代中央领导抗倭，夺取整个政权，推倒国民党，使中国完全受俄国统制，以达其赤化中国目的”。[4]蒋介石这一推理中，想象成分多于实际情形，中共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确实反对国民政府的英美政策，但中共的发展与国民党的所谓被迫对日妥协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除非国民党自己主动投降。认为中共的发展与国民党不得不对日和平，实质上是蒋介石视图将中共视之为头号敌人的思维在中日战争选择中的投射，而且推翻国民党，中国就“完全受俄国统制”，也不符合中共的战略，更多是蒋介石的想象。1943 年 5 月 22 日，苏俄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蒋介石欣喜若狂，但也清醒认识到“此为共产国际之改变方式，而事实上，决非真正解散”。[5]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中共与苏俄的分析仍然沿袭其以往思路，将中共与苏俄视之为思想行动一致的“共同体”。如其 1943 年杂录中对中共与苏俄关系概括为“中共为俄国在华之第五纵队”，中共“在国内之形态，不啻为俄国对我国态度之一寒暑表也”。[6]

蒋介石日记中对中共与苏俄的关系评判，看到了中共与苏俄静态不变的一面，但忽视了中共与苏俄动态变化的一面，或者对其变化评估严重失误。静态不变，是指在意识形态趋同、联系紧密等方面。中共的建立深受苏俄影响，因而在意识形态上，中共与苏俄高度趋同，中共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列宁式政党特征。同时，中共与苏俄的关系同以往一样保持密切联系，这一点在抗战期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更。除了不变的一面，我们更应注意到中共动态变化的一面。实际上，抗战期间中共成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越来越根据中国及中共的实际情况处理与苏俄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苏俄指示中共照办模式。无论从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还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并未响应苏俄要求中共大规模派兵援助的战略部署，都说明中共的不断成熟及与苏俄关系的变化。但在蒋介石眼中，并未意识到这种微妙的变化，自认为对中共与苏俄关系认识清晰，在 1940 年 10 月的星期反省录中记载其“对俄共之研究比较彻底”，

1《蒋介石日记》，1940 年 2 月 3 日。
2《蒋介石日记》，1940 年 3 月 1 日。
3《蒋介石日记》，1940 年 3 月 3 日。
4《蒋介石日记》，1940 年杂录。
5《蒋介石日记》，1943 年 5 月 24 日。
6《蒋介石日记》，1943 年杂录。

认为中共“无民族与其本身之自主，而一任其俄主之措置”。[1]即便蒋介石认为中共与俄关系有变化，但对变化的评估与实际相差甚远，如其 1943 年 8 月对苏俄派飞机赴延安接其医生与记者回国一事的评论：“可知俄国对中共毛泽东等所为之绝望，而其内部对俄之态度，双方冲突亦更明朗”，认为中共“内讧与自残之期，必不远矣”。[2]这种对中共与苏俄关系变化的评估，想象的成分或许更多。显然，蒋介石对中共与苏俄关系的认识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并不“彻底”，这种误判进而影响其内外政策的制定。

三、学习与借鉴：政党建设的成功者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成效显著，突出表现在党的各级组织恢复和发展，党员大量增加，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等方面。在抗日根据地，中共党的建设相对比较显性，如延安整风，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共大多处于秘密或地下状态，国民党方面对此并没有明显的感受。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共的这一工作有相当了解并在日记中以各种形式予以记载。

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蒋介石整体上是比较认可的，当然其认可的方式并非直接表达赞誉，而是以其他方式呈现。这从蒋介石阅读中共元老林育英（张浩）著作可以略见一二。林育英作为中共革命元老，1935 年化名张浩从苏联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八一宣言》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曾任八路军 129 师政委，后因身体原因回延安养病。在延安期间，林育英多次应邀到抗日军政大学讲课，写了数万字的讲义《党的建设》，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战略和策略的转变、怎样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这本《党的建设》几经作者修改，后由“抗大”用钢板刻印，成为当时党内广泛使用的一本理论与实际结合较好的优秀教材，并成为后来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本学习读物。该书在党内流通过程中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抄送至蒋介石处并颇受重视。1938 年 11 月 12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自本日起看共产党密件《党的建设》，小册，殊觉有益于我也”。[3]他还用红铅笔加注了一些眉批，“足资参考”，“所见甚是”，以及“吾人亦可采用”等。[4]11 月 18 日，蒋介石记载，“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读共党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5]19 日，“复看共党之党的建设”。[6]在 1938 年的回忆录中，蒋介石提及“今年看书不多，除家庭礼拜新约全书外，又看完土耳其革命史、黑格尔辩证法，与共党密件之党的建设一书，颇有心得也”。[7]一本中共的小书，多次被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并反复阅读，显示其对此书印象深刻，关注和思考较多。

蒋介石不仅反复阅读《党的建设》一书，还将其推荐给党内同僚阅读。1939 年 1 月 3

1《蒋介石日记》，1940 年星期反省录（10 月 6 日至 12 日）。
2《蒋介石日记》，1943 年星期反省录（7 月 26 日至 8 月 1 日）
3《蒋介石日记》，1938 年 11 月 12 日。
4散木：《中共党史上的“林家三兄弟”》，《同舟共济》2011 年第 6 期。
5《蒋介石日记》，1938 年 11 月 18 日。
6《蒋介石日记》，1938 年 11 月 19 日。
7《蒋介石日记》，1938 年回忆录。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分发党的建设一书”。[1]1 月 7 日，“对干部应看书籍之指定”的 11 本书中，就有《党的建设》一书。[2]直至 1945 年国民党六大期间，国民党方面还以此书为蓝本，撰成《党员调查工作须知》一书在国民党内发放。除此书外，蒋介石还阅读了林育英另一与《党的建设》内容有相通之处的小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1939 年 3 月 10 日，蒋介石评价该书“幼稚卑劣”，[3]但 3 月 12 日又预定“看中共策略与路线”，[4]在 3 月的反省录中，将该书与其所看《基层组织与政治组织》《县以下党政机构之修正案》等并列，认为“实为最大之收获”。[5]延安整风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1942 年 7 月 25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要求“共党整顿三风二十二种之学术文件，设法检呈研究”。[6]

对于中共的治党方法，蒋介石较为肯定并在其改革国民党党务中时有体现。1944 年 1 月，蒋介石在阅读徐佛观对中共的观察报告后，认为“共毛组织造成其独裁方式已有效果，其在陕北控制社会与生产亦见成效”。[7]1945 年 1 月的大事表中，蒋介石专门有一条记载“共党现阶段之作风”：“以党之组织力量贯彻党之政策，以党之组织力量巩固其核心，以局部之民主作风团结其内部社会，以党政力量控制社会，获得军事在空间之行动自由”。[8]在 1945 年年终的杂录中，蒋介石再次记载中共治党方法，在政策层面，“以同级之党或党团控置党员，以党员控置政策，以政策控置党权之活动”。在实行方面，“党团率其党员，尊重其政府之表面决定，且随党之组织深入社会，而党员之行动亦深入社会”。政策的实施方面，“每一政策之实施，政府则由上而下，党则由下而上，以联成一气”。[9]年初年末对中共治党均有大段记载，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日记中较为罕见，可见其对中共党团互动、上下联动颇为认同。同时，蒋介石对中共深入基层印象深刻，希望国民党也能如此。如 1942 年 10 月 14 日记载，“国民党应改为劳动国民党，凡党员家庭本身，必有劳农与军人为社会服役者，方能取得党员资格”，[10]要求“党员必须确定实行基层服务之期限（三年）”。[11]在 1942 年 11 月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关于革新国民党的改革意见中，就有“提倡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必须注重于基层”等内容。[12]

此外，蒋介石对中共七大特别注意，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作比较研究，以资改进。据唐纵记载，中共七大对革命队伍的界定及党章对党员权利的规定，党员与民众及上下级的联系，蒋介石批示“本党应切实仿效实施”，唐纵负责的“中共七全大会之研究与对策”报告，蒋

1《蒋介石日记》，1939 年 1 月 3 日。
2《蒋介石日记》，1939 年 1 月 7 日。
3《蒋介石日记》，1939 年 3 月 10 日。
4《蒋介石日记》，1939 年 3 月 12 日。
5《蒋介石日记》，1939 年 3 月反省录。
6《蒋介石日记》，1942 年 7 月 25 日。
7《蒋介石日记》，1944 年 1 月 20 日。
8《蒋介石日记》，1945 年 1 月。
9《蒋介石日记》，1945 年杂录。
10《蒋介石日记》，1942 年 10 月 14 日
11《蒋介石日记》，1942 年 11 月。
12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12 页。

介石嘱令“切实研究推行，必须办到，此为最重要”。[1]1945 年 7 月 16 日，蒋介石研究中共七大报告内容，对党章印象深刻，认为“党员与群众，及上级与下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2]7 月 24 日，他审阅中共七大内容及研究结果，“颇有益也”。[3]此外，他对中共的领导机关如何领导也有大段记载。[4]蒋介石不仅在 7 月 16 日记载，还在年终杂录中再次对中共党章新增内容摘抄述评长达 300 多字，且无其日记中对中共常见的尖酸刻薄及污名化评论，这在其日记中并不多见，一定程度上代表其对中共党的建设的认同。

从政党竞争的角度而言，中共无疑是国民党的最大竞争者。蒋介石对中共常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考量，但在无法消灭之时，他只能面对。在和中共的竞争中，蒋介石深感中共党的建设是其越挫越勇的重要因素，而对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其日记中有诸多的深刻批评。实际上，蒋介石在全面抗战之初即有感知。1938 年 2 月 14 日，蒋介石即注意到“各省党务无法进行，共党反能乘机活动”。[5]1939 年 3 月 2 日，蒋介石设置训练问答 11 题，其中第 6 题即与中共有关：“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6]从这一层面讲，蒋介石实际上承认中共的党的建设远比国民党强，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成功榜样。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强调要加强组织建设以对付中共，如其 1939 年 11 月 10 日所记，“党的活动要由组织为主”。[7]与之相映衬的是，他对中共军队本身战斗力并无太多评论，即便有，评价也不高，如其在 1940 年重要杂记中有一条关于中共军队的评论，中共兵力“约计卅万人数。但无战斗实力，其能集合攻击我要地者，最多不能过五万人之数”。[8]“无战斗实力”固然与中共实际情况不符，但中共兵力分散，装备落后，以游击战为主，军事实力在蒋介石眼中或许不是一个关键问题。让蒋介石更为忌惮的是中共的组织，没有严密的组织，也就无法建立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因此，蒋介石日记中对国民党的反省和批评中，反复强调组织、信仰、纪律等因素，这些正是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不断与中共对比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四、视角与需要：整体观察中的“上位者”

蒋介石作为战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当时得到包括中共在内的社会各界认同。正是如此，蒋介石在观察中共时处于一个“上位者”的观察视角。“上位者”不仅指蒋介石作为战时中国的领导人、国民党总裁等在党政军方面的行政地位或政治地位，也指蒋介石观察中共的心态和视角，即从未真正以平等的态度观察中共。由于国民党建党比中共早，且长期是执政党，实力较中共强，要蒋介石以平等态度看待中共确有难度，但缺少这种态度必然会带来

1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4、526 页。
2《蒋介石日记》，1945 年 7 月 16 日。
3《蒋介石日记》，1945 年 7 月 24 日。
4《蒋介石日记》，1945 年杂录。
5《蒋介石日记》，1938 年 2 月 14 日。
6《蒋介石日记》，1939 年 3 月 2 日。
7《蒋介石日记》，1939 年 11 月 10 日。
8《蒋介石日记》，1940 年杂记。

某种观察缺失。这种“上位者”的观察视角使蒋介石在观察中共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瞰，缺少平视，更谈不上仰视。就事物认识规律而言，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需要不同视角的观察才能对认识对象有相对客观全面的认知。蒋介石观察中共的视角虽不能说是单向度观察，但也不够全面。俯瞰看似整体全面，犹如从山顶固然可以看见森林的茂密，但茂密的森林下面其实还有更多未能发现的生态体系。因此，蒋介石观察中共的上位者视角是影响其对中共全面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介石的上位者视角不仅是基于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导致，更是蒋介石实现其政治抱负的需要。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就试图统一中国各派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故有二次北伐、东北易帜等军事政治行动。中共在国共分裂后，将重心转移到农村，建立多个根据地，对蒋介石及其政权形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消灭中共成为蒋介石国内政治问题的焦点和核心。正是其上位者的心态和试图消灭中共的目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中共塑造为“叛乱者”。在蒋介石日记中，1939 年以前对中共还多用“要胁”、“违约”等词描述，如 1937 年 8 月 12 日，“对共党要胁作难之处置”。[1]同年 9 月反省录中记载“共党乘机要胁，固其然也”。[2]至 1939 年及以后，“暴烈”“汹汹”“叛迹”等用语不断涌现，如 1939 年 1 月 16 日，“共党发展甚速，其势已浸凌日汹”，[3]1 月 17 日，“共党发展与暴烈”，[4]1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之跋扈与嚣张以后必甚，叛乱不远乎”。[5]1940 年 3 月 22 日，“半年来，共党形势汹汹，叛迹日著，而其跋扈嚣张，几乎不可向迩”。[6]1941 年 4 月的星期反省录记载，“中共形态，其反叛不能就范之势已成，此非我之不利也”。[7]1944 年的大事表中其预期危机四项，其一即为“共党反叛”；[8]1 月 21 日，蒋介石认为中共采取政治攻势，“以突变为全面之叛变”。[9]1944 年 12 月所构思之 1945 年中心工作为“军事第一，外交第二，而防中共突变全面叛乱第三”。[10]其它诸如“背叛政府”“破坏军令”“破坏统一”“变相军阀”“新式割据”等对中共的贬义用词甚至污名化更是屡见不鲜，不一而足。

蒋介石将中共塑造为“叛乱者”形象，既是其此前反共的延续，也是其试图消灭中共的需要。如前所述，抗战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反共的初衷，抗战胜利的同时也消灭中共是其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望。要反对并消灭中共，必须要有一个理由，而这个最好的理由就是将中共塑造为“叛乱者”。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游击战，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几块抗日根据地。中国一向有追求国家统一的历史传统，蒋介石将中共拥有武装和根据地视为所谓“叛乱”的证据，有利于其在社会舆论宣传中占据主动权，为其反共提供舆论支持。随着中共的壮大，必然会提出与其地位相适应的诉求，比如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参加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获得

1《蒋介石日记》，1937 年 8 月 12 日。
2《蒋介石日记》，1937 年 9 月反省录。
3《蒋介石日记》，1939 年 1 月 16 日。
4《蒋介石日记》，1939 年 1 月 17 日。
5《蒋介石日记》，1939 年 11 月 1 日。
6《蒋介石日记》，1940 件 3 月 22 日。
7《蒋介石日记》，1941 年星期反省录（3 月 30 日至 4 月 5 日）
8《蒋介石日记》，1944 年大事表（1 月）
9《蒋介石日记》，1944 年 1 月 21 日。
10《蒋介石日记》，1944 年星期反省录（12 月 24 日至 30 日）

更多军事援助，等等。但在蒋介石眼中，中共的壮大就是对自己的威胁，哪怕是对抗日有利，因而中共的任何诉求都是不合理的，应当反对，将很多不符合中共实际情况的事件转嫁于中共。如关于 1940 年的抢米风潮，蒋介石在 3 月 20 日的日记中记载，“共党阴谋成都暴动之奸谋甚险，幸此次能一网打尽”，[1]3 月 23 日又记载，“共党势力不讲理，其在成都抢米暴动，企图颠覆政府”。[2]1940 年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中共自身也遇到诸多困难，查阅这一时期的中共文件，并无任何指示要在大后方发动所谓“暴动”或推翻国民政府。四川重庆作为大后方的核心地带，蒋介石统治严密，在此时此地发动所谓“暴动”，于情于理都不符合中共的战略方针。蒋介石执意认为这是中共的所谓“阴谋”，一方面是转移社会危机，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刻意树立中共的“叛乱者”形象，为随时打击中共提供理由。实际上，蒋介石自己在 1940 年 3 月 6 日对八路军的评判中也认为中共没有“叛变”的理由，他认为，“甲、以理论言，以共党利害言，以革命整个局势言，皆无背叛革命与抗战之可能。乙、国际形势与外交关系言亦不可能。丙、共党宣言与国民革命成败论，更不可能”。如果“违反抗战，破坏革命，违反民族利益”，“此为自杀之道”。[3]蒋介石的分析也认为中共没有所谓“背叛”的理由，但蒋介石仍然执意为中共贴上“叛乱者”的标签，更多是出于限制中共发展，为消灭中共提供“想象”的依据，进而达到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自我认同。这一点与蒋介石战时一直寄希望苏俄与日本尽快开展的心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明知敌军实力已不足攻俄而尤望其冒险攻俄，此种主观心理实非军事家政治家之精神”。[4]蒋介石消灭中共的迫切意愿，让其在对中共的判断上往往与事实不相符合，中共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其视为“叛乱”的证据，主观的“想象”成分不少。

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对中共角色的定位是一贯且稳定的。自 1927 年国民党“清党”以后，消灭中共成为蒋介石孜孜以求的目标，即便是抗战时期，只是因为日本的大规模入侵而不得不暂停。尽管其日记中也经常有所谓对中共要“政治解决”“感化”“宽大”之语，如 1942 年 7 月 10 日的“解决共党问题用政治方法，此为内政惟一焦点，亦惟一之时机，但不宜过急”，[5]11 月讲演目录中的“对共政策，劝导感化而不刑戮”，[6]1943 年 5 月 9 日的“对共党员概取宽大政策”，[7]等等，但这并没有改变其蒋介石消灭中共的初衷，其“政治解决”也好，“宽大”也罢，均包含了所谓“政令统一”“军令统一”的前提，而其“统一”的实质就是中共交出军队与根据地，这显然又是中共不可能放弃的底线，最终回到中共“非武力不能解决”[8]的老路。从其日记可以看出，战时民族矛盾固然尖锐，但并没有掩盖和消灭国共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国共合作中蕴含了大量不稳定因素，预示着战后中国要迎来国内和平，并不容易，也为国共最终以疆场决定胜负的历史逻辑提供了一个注解。

1《蒋介石日记》，1940 年 3 月 20 日。
2《蒋介石日记》，1940 年 3 月 23 日。
3《蒋介石日记》，1940 年 3 月 6 日。
4高素兰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53 册，台北“国史馆”2011 年版，第 678 页。
5《蒋介石日记》，1942 年 7 月 10 日。
6《蒋介石日记》，1942 年星期预定工作课目（11 月 22 日至 29 日）。
7《蒋介石日记》，1943 年 5 月 9 日。
8《蒋介石日记》，1943 年星期反省录（8 月 2 日至 8 日）

余论

抗战时期蒋介石日记中的中共述评也是蒋介石视野中的中共形象，既有战前的延续，也有新的变化。透过其日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实实在在的壮大，中共在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无论蒋介石在其日记中以何种语言呈现，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较为肯定的态度，这从“他者”角度揭示了中共的成功之道；另一方面，我们也可看到蒋介石反共之“坚决”，甚至将中共视为比日寇更为严重的威胁，凸显中共问题在其心目中的超重分量。由此也反映出战时中共形象变迁可能遇到的一个“顽疾”，即在具有强烈对抗性的竞争者眼中，中共即便有正确的纲领政策，有大量推进战时民主的举措，也未必能改变如蒋介石等人对中共的根本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形塑良好政治形象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效，毕竟国民党内如蒋介石这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并长期坚持的人并不多，阅读同一时期其它国民党人士的日记或私人材料，有相当多的材料证明他们对中共的刻板印象在战时逐渐改变。同时，在强烈的反共心态下，加之蒋介石站在上位者的视野，看待中共更多是一种“俯视”，并不是将中共放在同一层次平等对待，导致其对中共的诸多变化并未深刻体察。正如周恩来对战时蒋介石基本思想与基本政策的评价：“1.联俄反共。2.联共溶共。3.要群众而统治群众”。同时，蒋介石“不愿意承认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根源，及其阶级教育，而只架空的承认其组织坚强、生活刻苦与工作努力”。[1]正是其认识的局限，使蒋介石未能在战时国共竞争中真正掌握主动，尽管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但也埋下了失败的危机。

需要注意的是，以政党形象的视域考察蒋介石日记对中共的述评与历史事实本身有相当的区别。中共的政党形象既取决于中共的所作所为，也受观察者自身思维习惯、所处地位、信息来源等影响，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蒋介石日记对中共述评也不例外。同时，日记的私密性也决定其在评价问题上的某种情绪性和即时性。这就需要我们走进日记体察历史场景的鲜活，也要跳出日记尽可能保持立场之客观。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日记以其独有的地位为我们观察战时中共提供了一面镜子，即从其日记中我们能够看到其在公开言论中难以呈现的对中共的评论，这些评论对其制定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是研究国共关系史的重要材料，这也是单独探讨蒋介石日记中关于中共述评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研究战时中共，既需要自我审视，也需要外部参照，在两相比较中，对中共自身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也在更加接近历史原状的道路上更进一步。正如 1942 年 3 月毛泽东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所论：“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我们要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要“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2]时过境迁，再来回味毛泽东这段文字，探讨蒋介石日记中的中共述评，其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1徐塞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重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1、84 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5、406 页。

抗战时期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

凌富亚

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和觉醒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进步期刊从理论阐释和事实展示的双重维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广泛传播，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本文重点探讨抗战时期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过程，具体分析其期刊类型、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并尝试探寻当前刊物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镜鉴。

一、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步期刊类型分析

抗战时期，各类期刊在抗日救国的浪潮中竞相出版。据《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1919-1949）》统计，此时发行的进步期刊多达 600 余种。[1]出版主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按照期刊的政治属性，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进步期刊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唤醒“中华民族”意识，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一系列受众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进步期刊。在这些期刊中，以《解放周刊》和《八路军军政杂志》最具代表性。《解放周刊》创刊于 1937 年 4 月 24 日，由延安解放社编辑，是战时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综合性政治刊物，载文以报道抗战动态、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为传播抗日思想、提振抗战信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于 1939 年 1 月 15 日，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由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郭化若、萧向荣组成编委会，萧向荣兼任主编。该刊以“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2]为办刊宗旨，在发表大量关于战略技术、作战理论文章的同时，也刊登了众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为促进民族团结、抵御日军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上述两种期刊外，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创办了《中国工人》《中国青年》《儿童生活》《鲁迅风》等期刊，针对不同群体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增强他们的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这些期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是中共引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舆论阵地，也是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媒介。

（二）亲共民主人士和团体创办的进步期刊

【作者简介】凌富亚（1988—），历史学博士，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1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时期红色报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1CDJ033）；贵州省 2021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战时期贵州进步报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1GZYB01）；安徽省 2019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皖籍报人与抗战舆论动员研究”（AHSKQ2019D131）阶段性成果。

[1] 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1919-1949）,1965.

[2] 毛泽东.发刊词.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1.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自觉肩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使命，率先提出了“民族战争”的口号，并在《八一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众多民主进步人士和团体的认可与支持。为了声援中共的抗日政策，他们纷纷创刊办刊，主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倡导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在这些进步期刊中，以《全民抗战》和《抗战文艺》影响较大。《全民抗战》原名《抗战》三日刊，1938 年 7 月后，与《全民》周刊合并，改名《全民抗战》，由邹韬奋、柳湜任主编。该刊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3]为己任，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刊发了大量宣传全民族抗战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战时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抗战文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1938 年 5 月在武汉创刊，同年 10 月迁往重庆继续出版。该刊秉持“强固自己营阵的团结，清扫内部一切纠纷和摩擦，小集团观念和门户之见，而把大家的视线一致集注于当前的民族大敌。”[4]的办刊理念，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全民族团结抗战，进步作家老舍、罗荪，以及中共知识分子冯乃超、叶以群等人都曾参与过该刊的编辑工作。除了这两种期刊之外，亲共民主人士和团体还创办了诸如《时论丛刊》《中苏文化杂志》《祖国呼声》等进步期刊，这些期刊主要由亲近中共的知识分子创办，办刊过程中亦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参与其中，对中共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认同感，是党外进步期刊中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力量。

（三）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进步期刊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群情激愤，立即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在抗战期间，新闻出版界的不少爱国知识分子先后创办了一系列进步期刊，以文字、照片、漫画作为武器，揭露日军罪行、宣传抗日战果、激发民族觉醒。例如：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汪子美、夏孙桂、谢冰莹等爱国知识分子便在上海创办《抗敌画报》，主要刊载中国将士奋勇杀敌的照片，鼓舞民族士气。值得一提的是，该刊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动态，先后刊载了《第八路军战士的特识》《毛泽东对部队训话》《民族统一战线在山西》等多篇介绍中国共产党抗战事迹的文章和照片，生动展现了中共维护民族团结，积极抗战的伟大形象。除了《抗敌画报》之外，《抵抗画报》《良友战事画刊》《中华》（上海）《民主与科学》等进步期刊也在如实记录中共抗战图景的同时，广泛宣传全民族团结抗战思想。总体而言，这些期刊虽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政治立场，努力克服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逆流，正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功绩，同情并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在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辅助作用。

二、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

抗战时期，进步期刊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阐释“中华民族”概念

[3] 邹韬奋.全民抗战的使命.全民抗战,1938:1.
[4] 发刊词.抗战文艺,1938:1(1).

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生、发展的基础。1902 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但并未对其进行释义。此后，各界人士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界定进行了长期争论。1923 年，孙中山提出了“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5]的理念，为科学释义“中华民族”的概念指明了方向。然而抗战期间，以蒋介石为首的政治集团出于利益驱使，不惜违背孙中山遗教，以“团结抗战”为名，炮制出所谓的“宗族论”，提出“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6]这种观点是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肆意曲解，其本质是鼓吹大汉族主义，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以实现国民党民族压迫和独裁统治的目的。

有鉴于此，阐释“中华民族”概念便成为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要任务。1931 年，《新亚细亚》发表《中华民族与汉族》一文，在阐释中华民族概念的基础上，强调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我国自民国以来号称‘五族共和’，而其实非只汉满蒙回藏五族而已！尚有苗、羅、果果等族。故鄙以为‘中华民族’四字，系代表全中国各民族之名称。”[7]在阐释中华民族概念的同时，一些进步期刊对国民党以“团结抗战”为名曲解中华民族概念的行径也予以驳斥，指出“‘团结’不是‘消减’，‘团结’是某些具有一定特征的民族之自由平等的结合，因此，‘团结’不但不应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并且应该扶助他们的独立自由之发展。”[8]这一表述强调了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份子，使人们明晰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促进了国人的自我身份认知。

（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强化祖国认同

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一种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抵御列强侵略的精神源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保障。抗战期间，内藤湖南、道叶岩吉等日本右翼知识分子抛出了诸如“中国人无爱国心”“中国只是一块需要强国来占领的，无组织的领土”“中国不能算是一个国家”等荒谬言论，企图淡化国人的爱国意识，为日军侵略行径提供理论依据。在此背景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便成为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1939 年 4 月，《时论丛刊》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一文，从历史传承、国土面积、疆域四至、人口数量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国情，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日军的种种荒谬言论，唤醒了国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与此同时，该刊强调，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只有“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精神，团结一致，结成牢不可破的、钢铁一般的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得到胜利。”[9]深刻阐述了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抗战救国的重要意义。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还体现在她为每个民族都培养了一批不惧生死、挺身救国的民族英雄。因此，在强调爱国重要性的同时，一些进步期刊还重点介绍了一大批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试图以英雄崇拜的方式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从 1932

[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总理重要宣言合刊,1929.
[6]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南京:中央训练团印行,1943(2).
[7] 中华民族与汉族.新亚细亚,1931:5(129).
[8]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苏文化杂志,1940:1(28).
[9] 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时论丛刊,1939:4(141).

年到 1944 年间，《中华》（上海）连续推出“民族英雄”专栏，先后刊登了蔡廷锴、佟麟阁（满族）、谢晋元、左权、马本斋（回族）等数十位抗日将领的照片，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抗日救亡的英雄事迹，以此激发读者保家卫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值得一提的是，进步期刊在宣传各民族抗日英雄的同时，时刻不忘强调其中华民族的身份，如《祖国呼声》在悼念回民英雄马本斋时强调：“我们的武装阵营陨坠一位才四十三岁的年青的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我们的回回同胞失去了一个可以依托，可以信赖的先进者！中华民族中消逝了一个可爱的英雄！”[10]只言片语便将马本斋作为爱国将领、回民领袖、中华民族英雄的身份有机结合在一起，在缅怀英雄的同时，也激发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抗日救国的决心。

（三）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增进中华民族认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各民族团结共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内在要求。然而历史时期，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局限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在中华民族交融聚合的过程中，民族内部的摩擦和矛盾也在所难免。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勾结汉奸和民族分裂分子进行民族分裂活动，大肆宣传“扶植回教”“蒙疆自治”“满洲独立”等分裂言论，妄图扩大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以实现其分裂中华民族的野心。对此，进步期刊一语道破其丑恶本质：“敌人征服中国其最初的阴谋，便是分化我国内各地民族间的感情，千方百计之挑拨离间，使我国内各民族间互相掀动干戈，而敌人呢？则坐享渔人之利。”[11]

针对日本侵略者妄图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各类进步期刊纷纷刊文予以回击。例如：1938 年 9 月，《抗战大学》在封面刊出一幅漫画，内容为五位分别身着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服饰的壮士挽臂前进，脚下踩着一名身着日本军服，手拿扩音喇叭的丑陋小人，同时配以“粉碎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的文字说明，将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华民族的野心展现的淋漓尽致。此外，为了使各民族深刻认识到敌人的民族分裂阴谋，一些进步期刊还披露了侵华日军残杀各族同胞、洗劫各族财产、毁坏各族宗教建筑的事实，以此揭露日本侵略者凶残伪善的本质。1938 年 10 月 23 日，日本侵略者为了恫吓回族同胞，派遣战机对西安城内的回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炸毁清真寺四座，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栽巍大厦，尽成瓦砾，尸体枕籍，血肉横飞，惨痛之状，令人目不忍睹”。事发次日，《解放周刊》随即发表《为暴敌惨炸回民区西安回民同胞告全世界伊斯兰弟兄书》一文，痛斥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深刻揭露敌人的虚伪性：“它所高唱的扶植回教等伪政策，只是用以掩蔽其屠杀中华民族组成的一份子伊斯兰弟兄，和毁灭真宰的朝堂麦斯之德（清真寺）的烟幕。”[12]这一时期的进步期刊正是通过如实报道战时少数民族悲惨遭遇的方式，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侵略者欲图吞并整个中华民族的野心，从而达到粉碎敌人分裂阴谋的宣传效果。

（四）激活共同历史记忆，增强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魂、民族凝聚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长的精神内核。

[10] 回回民族英雄、中华民族英雄马本斋同志.祖国呼声,1944:2(41).
[11] 马宣道.回汉民族团结与抗建前途.突崛,1940:2(4).
[12] 为暴敌惨炸回民区西安回民同胞告全世界伊斯兰弟兄书.解放周刊,1938:59(4).

在中华民族 5000 余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了无数灿烂文明，并在岁月的长河中渐渐将其沉淀为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是提振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向心力的精神纽带。然而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屈辱的渊薮，昔日辉煌的历史记忆逐渐被亡国失地的屈辱所湮没。与此同时，侵略者更是恶意编造出中国文化“东来说”（来自日本），企图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信心，削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鉴于此，激活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增强国人的文化认同感，便成为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诸如《中国青年》《抗战文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进步期刊刊登了不少历史科普文章，介绍中国古代在科技发明、文学艺术、思想哲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试图以“记忆重现”的方式提升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针对侵略者捏造的中国文化“东来说”，《中国文化》则以严谨的考古事实予以批驳，并强调了中华文明起源本土、多元融合的显著特征：“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受到外来民族的影响，民族的混合，以及民族文化的交流都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本上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来源有其独立和自别的特点。”[13]

此外，在中华民族生成生长的过程中，各民族创造并传承了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成为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时间符号”。抗战期间，进步期刊特别善用这些“时间符号”，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开斋节、晒佛节、成吉思汗纪念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并巧妙地将节日纪念与抗战救国结合在一起，以此增强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全民抗战意识。例如：1939 年，《边疆通信报》在纪念成吉思汗诞辰的文章中称：“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有抗日的遗志，现在我们抗战，如果大汗在天有知，当含笑预祝胜利……我们当誓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复兴中华民族。”[14]这一表述将节日纪念与全民抗战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张力。

（五）宣传抗日正确主张，建构中共政治认同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熟的关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屡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无法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导致民族复兴长期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吞并中国的步伐，全国各地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在 1935 年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民族、阶级、团体等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在此期间，进步期刊纷纷刊文，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例如：1937 年 5 月，《解放周刊》刊载《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一文，详细阐述了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缘由，指出在日军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下，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则下降为次要矛盾，因此“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

[13] 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文化,1940:5(22).
[14] 成吉思汗纪念.边疆通信报,1939:1(4).

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消除国内对立，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5]《战地动员半月刊》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含的对象进行了释义：“不论汉、满、蒙、回、藏、苗哪一民族，不论资本家、地主、农民、工人哪一阶级……我们的抗日，不是任何一种族一阶级组织起来的，而是全民族的。”[16]值得一提的是，进步期刊在传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深刻认识到少数民族的重要地位，指出要想使少数民族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要贯彻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政策，实现各个民族一律平等，所谓“一律平等，就是说这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汉、满、蒙、回、藏、苗、瑶、黎都一律受国家的保护，受国家的教育；一律能够管理政府，谁也不许欺侮谁。”[17]正是在进步期刊的广泛宣传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使各族人民能够客观、全面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日主张，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从而促进了中共政治认同的建构。

三、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及启示

抗战时期，进步期刊作为主要的大众媒介，为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独特的传播效果。深入分析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与效果，对于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进步期刊凭借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立场坚定等优势，成为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平台，取得了独特的传播效果。

其一，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泛传播。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要把这一意识形态广泛传播出去，必须要借助相关媒介。与图书、布告等传统传播媒介相比，期刊具有时效性强、发行量大、种类多样、读者面广的特点，其效用远比传统媒介更为迅速和广泛，是传播意识形态、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抗战时期，宣传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进步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无论是在国统区、抗日根据地还是沦陷区，几乎都能听到进步期刊发出的抗日呼声。这些进步期刊形式多样，彼此呼应，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纵横交错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网络，将中华民族的概念、爱国主义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传播到全国各地，推动中华民族觉醒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其二，促进了全民族抗战事业的顺利发展。20 世纪初，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军阀分裂割据，导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主体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松散，国家认同淡漠、民族认同衰微、文化认同弱化等问题层出不穷，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族的空前危机。在此背景下，进步期刊毅然肩负起宣传抗日思想，唤醒民族意识的重任，通过诠释“中华民族”概念、弘扬爱国主义、激活历史记忆、反对民族分裂、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式，重新唤起中华民族的祖国认

[15] 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解放周刊,1937:2(5).
[16] 术语释义：民族革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地动员半月刊,1938:3(16).
[17] 国内民族一律平等.边疆通信报,1939:11(1).

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正是在进步期刊的广泛宣传下，全面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从此全国各族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同仇敌忾，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极大地促进了全民抗战事业的发展。

（二）进步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抗战时期，进步期刊在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为当前各类刊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诸多启示。

首先，坚持党管媒体，掌握传播主导权。党管媒体，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宣传实践中形成的根本原则。抗战时期，进步期刊在日军奴化宣传和国民党新闻统制的复杂传播环境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信念，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传播。在新媒体时代，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更加复杂的传播环境，给各类期刊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如果放松党管媒体的原则，便会给各种破坏民族团结的信息提供可乘之机。因此，无论传播环境如何复杂，都必须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确保传播主导权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推动各类刊物为党发声、为民代言，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记录者和宣传者。

其次，拓展传播渠道，提升传播能力。抗战时期，针对自身传播平台缺乏的状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加强自身传播平台建设，创办了《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鲁迅风》等期刊，充当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十分善于借助具有亲共思想或政治中立的进步期刊，向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群众传播全民抗战意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就曾在《中苏文化杂志》《民主与科学》《时事丛刊》《中华》（上海）等进步期刊上发文，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有效拓展了传播渠道。因此，在当前各类刊物层出不穷的状况下，需要积极拓展传播渠道，促进各类刊物融合宣传，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内各个民族、各类群体间的有效传播。

最后，丰富传播内容，增强传播效果。丰富的传播内容，有利于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邃内涵。抗战时期，进步期刊不仅从学理层面科学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令人敬仰的民族英雄、世代相沿的传统节日，以及各民族团结抗战的事实等来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荣辱与共的现实图景，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收到了极佳的传播效果。在当下传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各类期刊需要广泛收集、积累素材，不断丰富传播内容，坚持理论阐释与事实展示相结合，实现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度认知、理解和认同。

立法程序正义与权力边界维护：以战时《省粮政局组织大纲》为中心*

王荣华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1941 年 7 月 1 日粮食部成立后，即着手建章立制、组建机构，对全国粮食进行全面强力管制，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4 日，《粮食部组织法》公布，中央粮食行政组织架构确立。当月下旬，履新未久的粮食部首任部长徐堪向行政院递交《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草案》，目的是一来为建立省级粮食行政机构提供法理依据，二来规划省粮政局组织架构，以促其早日走上正轨，尽快推行各项粮食新政。8 月 8 日，《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简称“大纲”）正式公布。但该大纲出台不久，农林部及陕、浙、闽三省政府等先后于 1941 年九十月间、1942 年三四月间提出质疑，并迫使粮食部在 1941 年 10 月、1942 年 6 月两度做出修正。1942 年 11 月，粮食部又主动提出修正大纲。大纲的出台与修正过程颇为曲折复杂，甚至成为各机构部门之间的权力博弈场，也是透视战时立法程序正义与权力边界维护、党治与法治的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过程中，以下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大纲出台后，农林部、陕西省政府提出的质疑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质疑，有无道理？其结果如何？二是浙、闽两省政府对大纲的质疑集中在什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三是面对不同的质疑与内容，粮食部分别是如何应对的？四是大纲出台与修正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关于此一问题，学界尚未有相关成果，[1]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予以解答。

一、大纲的出台与初次修正

粮食部的成立，标志着专门的中央粮食行政机构重新确立，同时也意味着强有力的粮政推行的开始。粮食部成立后，遂将省县粮政机构设立提上了日程，因为在粮食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田赋征实政策已然确立，而且四川省已确定将于 9 月 16 日开征，在短期内设立强有力的省县级粮食行政机构以推动“新政”，显得尤为迫切必要。7 月 29 日，徐堪向行政院提出机构改革方案，将各省原设粮食管理局、粮食调节处、粮食管理处等五花八门的机

*本文系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民政府粮食部研究”（项目号 19FZSB004）、201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经济抗战研究（1931－1945）”（项目号 17JJD770009）阶段性研究成果。

1现有研究成果多从地方史角度，对战时某省如广东（霍新宾《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管理探析》，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1 年）、四川（谭刚《抗战时期的四川粮食储运》，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年）、云南（田亚《抗战时期云南粮食储运研究（1941-1945）》，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0 年）某项粮政进行论述，偏重于具体粮食政策及其推行过程、成效，其中仅提及《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这一名称，或某省粮政局，如郑信芳《民国时期的广西粮政机构》（《广西粮食经济》1994 年第 3 期）对民国时期广西省粮政机构作了梳理，其中粮政局的组织架构有简要论述；谭刚《抗战时期四川的粮食运输管理》（《抗日战争研究》2012 年第 4 期）对战时四川粮运机构有所涉及；胡忆红《抗战时期湖南省粮食行政管理机构的嬗变与确立》（《民国档案》2013 年第 4 期）对湖南粮政系统作了详细梳理等。郝银侠《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运用政治制度史、经济学、博弈论等方法，从粮政机构与组织、粮食生产、粮食征集等方面探讨了国民政府的粮食政策。但对《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的出台经过、出台后各方反应、粮食部如何应对及其修正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并未见论及。

构统一改组为粮政局。成立粮政局的目的在于加强及确立粮政机构的政治地位，将粮政局与各省政府下辖的各厅置于同等地位，赋予同等职权，借以加重省主席的责任，利用省政府职权执行粮政法令，提高粮政效力。此前未成立省级粮政机构的，粮食部要求一律迅速组设，充实其组织，添设调查、统计人员，办理调查统计等项事务，这些举措首先在四川省予以实施。同时，徐拟具《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草案》，提请行政院讨论通过。同日，在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主持的第 525 次会议上，快速通过了该草案。[1]8 月 4 日，行政院训令各部会署、各省政府及四川省政府遵照执行。与此同时，原颁《省粮食管理局组织规程》予以废止。[2]

8 月 8 日，行政院正式公布大纲。大纲共 14 条，其中第 1 条规定：“各省省政府设粮政局，掌理本省粮食事宜。”第 2 条规定，各省粮政局设局长 1 人，综理局务，副局长 1 人或 2 人，辅佐局长处理局务，由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简派。第 3 条规定：“本局局长出席省务会议；关于本省粮食政令之发布，以省政府名义行之，局长副署；关于主管事务之处理，得发局令。”第 4-13 条主要对各科室设置、职掌、员额作了规定。粮政局下设秘书室、第一至第三科及会计室，秘书室掌理本局文书、人事、庶务，第一科掌理粮食调查、征购、管制，第二科掌理粮食增产、加工、仓储、运输，第三科掌理财务，会计室办理岁计、会计、统计。[3]大纲公布的同时，粮食部即电令各省政府，要求各省应根据组织大纲，妥拟组织细则，尽快建立本省粮政机构。12 月 22 日，广东省政府向粮食部呈送《广东省粮政局组织规程》备案，[4]其他各省也先后出台各自组织规程或组织细则。

粮食部责令各省设立粮政局，虽强调此举系其施政计划纲要重要组成部分，[5]实际上也不无汲取全国粮食管理局时期粮政管理机构职权不充分的教训。徐堪履职后，认为极有进一步加强省级粮政机构职权之必要，必要举措之一就是拟订《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草案》，提请行政院通过。大纲草案从提交到正式公布，为时仅 10 日，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显示出中央政府果决之意。不过，仓促制定的大纲从出台到公布，在立法程序、内容等方面却不无指摘之处，并遭致多方质疑，这是粮食部始料未及的。

大纲公布后，江西、绥远等绝大多数省份均表示“遵照办理”，[6]并未提出异议，而且根据大纲积极组建本省粮政机构。但大纲出台一个多月后，农林部首先提出质疑。农林部的

1粮食部：《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草案》（1941 年 7 月 29 日），台北，“国史馆”藏（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7-18 页。

2《省粮政局组织大纲及有关文书》（1941 年 8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内政部档案，档案号一二（6）－17475，第 2 页。

3粮食部：《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草案》（1941 年 7 月 29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9－20 页。需要指出的是，在粮食部 7 月 29 日提交的大纲草案中，第 3 条“本局局长出席省务会议”一句话旁标有“得列”及“政府委员”字样，其意似为“本局局长得列席省政府委员会议”，此处标注应为后来所加，但不知何人何时所做。而行政院公布的大纲中，第 3 条第一句为“本局局长出席省务会议”。参见《省粮政局组织大纲》，1941 年 8 月 8 日行政院饬遵，《交通公报》第 4 卷第 13 期，1941 年 9 月 16 日，第 1385 页。

4广东省政府：《呈缴修正本府粮政局组织规程请核备由》（1942 年 2 月 13 日），行政院档案，014－040503－0006，第 131 页。

5《省粮政局组织大纲及有关文书》（1941 年 8 月－1942 年 5 月），内政部档案，档案号一二（6）－17475，第 2－3 页。

6《奉颁省粮政局组织大纲令仰遵照等因呈复鉴核由》（1941 年 9 月 11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45-48 页。

质疑集中在粮食增产事项应归哪个部门主管的问题上，即大纲的第 7 条。[1]原大纲第 7 条规定：“第二科职掌粮食之增产、加工、仓储、运输等事项。”[2]对此条款，农林部部长陈济棠 9 月 23 日向行政院提出不同意见：“增加粮食生产，事属本部职掌范围，为推动此项工作，各省早经成立粮食增产机构，并联合各该地方农业改进机关集中力量负责专办，由本部督导进行，已见成效。如在同一地方另有机关各别办理，则职权重复，责任不专，深恐工作效率受重大之影响。即就人力、技术种种方面而论，亦以由现有增产机构负责，较易为功。可否准将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第七条予以修正，删去‘增产’二字，以一事权。”[3]农林部声称粮食增产事务为本部职掌范围，但国民政府 1940 年 5 月公布的《农林部组织法》中并未有“粮食增产”字样，该部所设五司一局职责中，亦无明确规定粮食增产由哪个部门掌管。1940 年冬，农林部提出筹设粮食增产委员会，1941 年 2 月制定《农林部暂设粮食增产委员会组织章程》呈请备案，11 日，行政院指令农林部“准予备案”，粮食增产委员会正式成立。粮食增产委员会第一项职责即为“统筹规划全国粮食增产事宜”，[4]在各省设立粮食增产总督导团，省主席或建设厅长兼总督导，农业机关主管人员为副总督导，农林部亦派员担任副总督导；各县设总指导团，县长兼任总指导，建设科长及农林场场长或农业推广所主任为副总指导，并有推广员若干人。[5]农林部的依据正在于此。

26 日，行政院将之交粮食部核复。10 月 14 日，粮食部回复称：“粮食增产原系农林部主管事务，惟战时粮食管理，开源与节约并重，于增产方面，本部有随时提出意见供农林部参考之必要。《省粮政局组织大纲》内规定‘增产’字样，仅为注意于粮食增产事项之策动与农业机构联系，使生产政策与管理政策可以密切配合而已，并不直接办理增产事务。现农林部既主张将该项组织大纲第七条删去‘增产’二字，以免关于粮食增产事项职权重复，责任不专，本部自可同意。”[6]25 日，行政院“准予修正，俟原组织大纲更有修正时，一并依法公布，并通饬周知”。27 日，行政院就此致函粮食部、农林部。[7]可见，粮食部在大纲中制定的粮食增产条款，其初衷虽为增加战时粮食产量，以为田赋征收、军粮征购提供更为充足的粮源，但却与农林部已设机构职权重叠，侵犯了农林部主管粮食增产事项的“权力界限”。占得先机的农林部以职权重复会影响增产工作效率为由，提出将大纲中规定的增产事务删去，“以一事权”。对于农林部的意见，行政院完全支持，粮食部亦无可辩驳，只能以加强粮食生产与管理之间的关系为借口，把“随时提出意见供农林部参考”作为台阶，作出退让。

1农林部成立于 1940 年 5 月，掌管全国农林行政事务，下设总务司、农事司、农村经济司、林业司、渔牧司及垦务总局等。参见《农林部组织法》，1940 年 5 月 11 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月报》第 9 卷第 7 号，1940 年 7 月，第 2679-2681 页。

2《省粮政局组织大纲》，1941 年 8 月 8 日行政院饬遵，《交通公报》第 4 卷第 13 期，1941 年 9 月 16 日，第 1385 页。

3《奉颁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第七条内第二科掌理粮食之增产二字似与各省现在粮食增产机构职权重复可否俯准修正以一事权》（1941 年 9 月 24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38 页。

4《粮食增产委员会组织章程》（1941 年），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15，第 3－6 页。

5《农林部粮食增产委员会概况》，《中华农学会通讯》第 23 号，1942 年 10 月，第 10-11 页。

6粮食部：《为复农林部请将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第七条删去“增产”二字本部自表赞同请查照由》（1941 年 10 月 24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41－42 页。

7《农林部请修正省粮政局组织大纲一案函达查照由》（1941 年 10 月 27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44 页。

之后，各省政府陆续收到令函，要求对大纲第 7 条有关粮食增产条款予以修正。

颇为有趣的是，10 月 14 日，行政院第 536 次会议在讨论重庆市政府呈送的《重庆市粮政局组织规程》时，特别留意其中有无“增产”字样，当看到第 7 条仍有“增产”二字时，当即决议“第七条‘增产’二字删去，余通过”。[1]10 月 17 日，在行政院公布的《重庆市粮政局组织规程》中，确实未有“增产”字样。[2]在农林部质疑后，粮食管理机构中“增产”成了敏感词。1942 年 1 月，广东省政府第九届委员会第 291 次会议通过《修正广东省政府粮政局组织规定》，将之修正为“关于粮食增产意见之提供事项”，其他省份也做了相应修正。[3]大纲的初次修正暂告一段落。

与农林部提出质疑的同时，陕西省政府亦制造了一个小插曲，对大纲条款中粮政局是否与省政府合署办公及与之连带的经济利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原大纲第 3 条规定：“本局局长得出席省务会议。关于本省粮食政令之发布，以省政府名义行之，局长副署。关于主管事务之处理，得发局令。”[4]陕西省粮政局局长张志俊向陕省府提出，“细绎”第 3 条规定内容，粮政局与省府其他各厅处“似含有合署办公之意义”，合署办公也就意味着作为主管全省粮政、“得发局令”的粮政局，其地位与其他各厅处“全然相同”，相应各种待遇也应一致。[5]

合署办公之议始于 1933 年 10 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修正地方行政机关组织案》，该提案要点之一为“确定省政府为整个的省行政机关，其各厅……不应为省政府之下级机关”。也就是说，各厅处应为省政府的组成机关，正如五院之于国民政府，各部、会、署之于五院。合署办公表面上是省政府委员会与各厅处合并同一处址办公，“以资便利而节糜费”，其实是对省政府与各厅处关系的重新界定。1934 年 1 月，各省陆续实行，战时各省均实现广义上的合署办公。1939 年，陕西与西康实行合署办公。[6]

对于张志俊的疑虑，陕省府主席熊斌 1941 年 10 月 24 日呈文行政院，呈请鉴核备案。[7]

1《为赍呈重庆市粮政局组织规程请鉴核备案令遵由》（1941 年 10 月 3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90 页。

2《重庆市粮政局组织规程》，1941 年 10 月 17 日行政院公布，《经济汇报》第 5 卷第 11 期，1942 年 6 月 1 日，第 209 页。

3《修正广东省粮政局组织规程》，《广东省政府公报》第 809 期，1942 年 2 月 12 日，第 14 页。各省组织规程出台时间各有先后，浙江省政府委员会于 1942 年 2 月 17 日通过《浙江省粮政局组织规程》，避免了修正粮食增产条款的尴尬。参见《浙江省粮政局组织规程》，1942 年 2 月 17 日省府委员会第 1247 次会议通过，《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356 期，1942 年 3 月 26 日，第 6 页。不过，有些省份对此问题仍未修正。江西省 1942 年 3 月提交至粮食部的《江西省粮政局组织细则》（相当于其他省的组织规程，1942 年 1 月 1 月 10 日制定的）中，该省粮政局第二科节约股职掌中仍有“关于粮食增产之协进事项”“其他有关粮食增产节约事项”的条款。参见《江西省粮政局组织细则》（1942 年 3 月 20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49-150 页。福建省 1942 年 4 月制定的“粮政局组织系统表”中，第二科仍设有增产股，其职掌为“办理粮食增产计划、宣传、督导，品种之选择、推广、栽培等方法之改良，水旱、病虫害之防止等事项”。参见《粮政局组织系统表》，1942 年 4 月，《统计副镌》第 43 号，1942 年 4 月 30 日，第 15 页。

4《省粮政局组织大纲》，1941 年 8 月 8 日行政院饬遵，《交通公报》第 4 卷第 13 期，1941 年 9 月 16 日，第 1385 页。

5陕西省政府：《奉颁粮政局组织大纲一三两条含有合署办公意义请核备案》（1941 年 10 月 24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49 页。

6施养成：《中国省行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13 页。

7陕西省政府：《奉颁粮政局组织大纲一三两条含有合署办公意义请核备案》（1941 年 10 月 24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49 页。

收到陕省府呈文后，行政院对此细节并未过多关注，只是训令粮食部准予备案，指令陕省粮政局与陕省府合署办公。[1]其实，张的疑虑多此一举，因为在粮食部设立粮政局时，对此已有考量，视粮政局与省政府其他厅处于同等地位以强力推行战时粮政，只不过未进一步明确是否合署办公。仔细究之，张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实有自己的小算盘，即粮政局拍发电报是否享受官电半价收费标准。根据《官军电报限制及收费划一办法》第 2 条第 4 款规定，“省政府及直隶行政院之市政府”所发电报为官电，如果粮政局“列入省政府本身部分，以与民、财、建、教各厅相同”，则可以享受半价；如果粮政局系省政府直属机关，即使因公，其“所发电报列作全价”。[2]对此，交通部也于 11 月上旬致函行政院，予以确认。行政院的答复是：“各省粮政局应视为省政府之本身部分，迭经本院解释有案。”[3]这一答复相当于确认了粮政局的身份。在此，陕省粮政局的出发点是自身的地位问题以及与之连带的些许经济利益，也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考量，有其合理性。

农林部的质疑聚焦于大纲第 7 条，证据确凿、言之有据，提出的修正意见也合情合理，获得了各方支持，有力地维护了自身的权力边界；陕西省的关切集中于第 3 条后段，主要是经济层面，在行政院的支持下也得以实现。陕省府的关切虽无伤大雅，但质疑与批评并未结束。

二、再次修正中的权力边界维护与博弈

1942 年三四月份，浙、闽省府的质疑接踵而至，对各方未予充分注意的第 3 条第一句话——“本局局长得出席省务会议”，[4]提出了质疑，大纲也面临再次修正的命运，而其中的权力维护与博弈更为激烈。

省务会议即省政府委员会议，南京国民政府 1928 年对此颁有成法，对会议种类、参加人员、会议程序、会议职权均有规定，尽管各省在常会与临时会、会议时间与时长、省政府秘书长参加会议的身份等稍有差别，但关键问题是一致的，如参加人员资格方面，规定“省府委员会议，由省政府委员组织之”，[5]也就是浙江省府认为的“省务会议即系本府委员会议”，[6]即只有省政府委员可以出席，其他人员为列席。“列席与出席之不同，一般言之，列席者仅能发表言论而不能参与表决”，亦即列席者对会议规定的 11 项职权无表决权。全面

1《据陕西省政府呈奉颁粮政局组织大纲一三两条似有合署办公意义请核备案令饬知照由》（1941 年 11 月 14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50 页。1941 年 12 月，安徽省政府训令该府各厅处、粮政局、驿运管理处等合署办公，可以看作是对此一事件的反应。参见《令本府各厅处、粮政局、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等：为奉院令抄发边疆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组织规程转行知照由》，《安徽省政府公报》第 118 期，1942 年 2 月 21 日，第 17 页。

2《官军电报限制及收费划一办法》，1940 年 6 月 22 日国民政府公布，《党讯》第 2 卷第 3 期，1940 年 9 月 15 日，第 5 页。

3《交通部请示粮政局隶属系统》（1941 年 11 月 11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85-86 页。

4《省粮政局组织大纲》，1941 年 8 月 8 日行政院饬遵，《交通公报》第 4 卷第 13 期，1941 年 9 月 16 日，第 1385 页。

5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6 页。

6浙江省政府：《为呈送浙江省粮政局组织规程请备案由》（1942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58 页。

抗战爆发后，各省政府附属单位屡有增加，但“此类附属单位之主管长官，遇有省政府委员会讨论与其业务有关之问题时，大都亦列席会议”。[1]“出席”与“列席”虽一字之差，但其规定的身份差异直指粮政局局长乃至省府主席的权力问题。

1942 年 3 月 5 日，浙江省府主席黄绍竑呈文行政院，提出大纲第 3 条粮政局局长的“出席”与“列席”问题。黄在呈文中指出：“省务会议即系本府委员会议，局长如非委员，似不得出席会议。”因此，黄拟将之“改为‘本局局长列席省政府委员会议’”，同时建议各省一律将此一文件以组织规程命名，以免歧乱。此处还有一个小细节，即黄不但改“出席”为“列席”，而且将大纲第 3 条中的“省务会议”改为“省政府委员会议”。[2]其实，省务会议或省政务会议这一名称，仅在 1925 年 7 月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使用，1926 年 11 修正《省政府组织法》时，创设省政府委员会，这一名词亦确定下来，其所召集之会议，称为“省政府委员会议”，成为定制。[3]这一名称的小小改动，既彰显出浙江省府用词的严谨细致，也衬托出粮食部的疏忽大意。25 日，行政院将《浙江省粮政局组织规程》交付粮食部核复。4 月 12 日，粮食部答复行政院：“现正汇案审核。”[4]

就在粮食部审核之际，4 月 16 日，闽省府主席刘建绪也呈文行政院，提出相同问题。刘坦言，本省委员会会议，除省政府委员与秘书长依法出席外，其他社会、合作、卫生各处处长及会计长、统计长、高等法院院长等均为列席。既然粮政局与上述各处“地位既属相同”，则不应如大纲所规定的，局长“得出席省务会议”，而应该是“列席”，即仅可陈述意见，不参加表决。如果大纲单独规定粮政局局长可以“出席”，并相应具有表决权，则不但与《省政府组织法》第 4 条相抵牾，也与其他各处处长仅为列席的身份不一致。因此，闽省府提出，既然“出席”者与“列席”者权力差别明显，即应以《省政府组织法》为基础，根据粮政局局长的定位，在大纲中明确规定，就像《省社会处组织大纲》对处长身份的规定一样，以免引起歧义，也就是粮食部应对大纲第 3 条第一句话予以修正，改“出席”为“列席”。[5]对于闽省意见，行政院非常重视与审慎，5 月 13 日，行政院指令法规委员会审议。法规委员会审查后，在 18 日的报告中指出：依据《省政府组织法》，省政府委员会议的出席人员以省政府委员为限，粮政局长并非省府委员，则当然与社会处长、卫生处长等一样，同为列席。即为列席，则无表决权。有鉴于此，法规委员会提出解决之道，或修改大纲，或修改组织法。若不修改《省政府组织法》，即应修改大纲，并建议修改大纲，因其修改较易。[6]19 日，行政院在第 564 次会议上就此进行讨论，议决“拟请比照《省社会处组织大纲》，将《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第三条予以修正”，即将“出席”改为“列席”。27 日，行政院院长蒋

1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下册，第 386-388 页。
2浙江省政府：《为呈送浙江省粮政局组织规程请备案由》（1942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58 页。
3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下册，第 382 页。
4粮食部：《准通知附送浙江省粮政局组织规程奉谕交核一案函复查照转陈由》（1942 年 4 月 12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60 页。
5福建省政府：《省粮政局长似未便出席省政府委员会议该局组织大纲第三条可否比照社会处组织大纲予以修正》（1942 年 4 月 16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51 页。
6《法规委员会审查报告》（1942 年 5 月 18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53 页。

介石呈文国防最高委员会（简称“国防会”）、国民政府，对此作了说明，要求按照行政院会议的决议，训令各部会署及各省政府。6 月 1 日，国防会第 85 次常务会议对行政院提出的“《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第三条‘本局局长出席省务会议’一句修正为‘本局局长得列席省政府委员会议’”“准予备案”。[1]3 日，国民政府指令行政院，准予备案，予以修正。6 日，行政院训令各部会署、各省政府对之进行修正。[2]随后，各省做出响应，分别对此予以修正，[3]大纲的再次修正暂告一段落。

就档案史料所见，各省之中提出“出席”与“列席”问题的只有浙、闽两省，其他省份对此只字未提，沿用“出席”一词，如宁夏 1942 年 1 月 29 日制定的规程即是，而广东省因粮食增产问题修正后的规程中，仍用的是“出席”。与此类似的还有陕西、江西、湖南、安徽等省，这些省份的粮政局局长及后来合并后的田粮处，处长均是由省府委员兼任的，这也为粮食部在战后提出这一问题提供了借鉴。[4]不过，浙江省已改为“列席”。[5]按理说，已经成立粮政局的省份，省政府在召开委员会议时都会面对粮政局局长以什么身份参加会议、是否具有表决权的问题，为什么只有浙、闽两省府质疑此一问题？因史料所限，不便妄自揣度。

尽管各省对“出席”“列席”问题答案不一，尽管行政院也已训令各省修正为“列席”，但此事并未画上句号，五个月后，大纲又面临第三次修正，而这一次提出修正的却是粮食部，而且也与“出席”“列席”问题有关。

三、第三次修正中的权力边界维护

如果说合署办公、电报价格等问题尚属大纲的“轻微伤”、“皮肉伤”的话，那“出席”与“列席”之别则毫无疑问属于“重伤”、“硬伤”，因其关乎省府权力分配及重要政策的表决与决策。大纲第 7 条与第 3 条接连被质疑，被迫做出修正，除了让把关不严的行政院比较难堪，给多数省份反复修正造成一定困扰外，也对粮食部带来了负面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程序正义无从保障，审核时间仓促，条款有欠严密。徐堪本人更是陷入被动境地，其行政能力受到严峻挑战与考验，似乎也预示着战时粮食管理并非易事，粮食部的粮食管理之路道阻且长。不过，徐堪很快借助主动修正大纲的机会，在试图挽回负面影响的同时，来维护粮食部与自己的权力边界。

11 月 25 日，粮食部呈文行政院，提出修正大纲的请求，理由有三：一是 1941 年所颁大纲因年来业务日趋繁复，原有组织颇难适合当前需要，粮食部内部职掌、员额均有重新分

1《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八十五次常务会议记录》（1942 年 6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 4 册，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86 页。
2行政院：《为修正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第三条文奉国府备案令仰知照由》（1941 年 6 月 6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61 页。
3《电知修正省粮政局组织大纲第三条前段》，《广东省政府公报》第 852 期，1942 年 7 月 16 日，第 17 页。
4《为实施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后关于田赋粮食之紧要措施一案业经大会商讨并就原案修正通过谨将修改重要各点签请鉴核施行》（1946 年 6 月 27 日），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 001－081313－00039-010，第 67 页。
5粮食部：《迭准通知单以广东、江西、浙江、宁夏等省粮政局组织规程奉交由本部核复各案并案复请查照转陈由》（1942 年 11 月 28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82、198、188 页。

配必要；二是 6 月召开的全国粮政会议亦曾有调整省粮政机构决议；三是关于各省粮食储运事宜，粮食部亦已拟订《省粮政局储运处组织通则》，并呈送行政院，而储运机构在原大纲中并未规定，实有做出修正必要。[1]从呈文中的修正理由可以看出，粮食部提出修正大纲的理由并非由于陕、浙、闽省府所指出的“硬伤”，而是因应粮食业务与机构调整之需。因此，徐堪所陈述的修正理由，并未将闽省府指出、已经行政院裁决的结果放在心上，在呈文中，徐堪虽未刻意回避“出席”与“列席”问题，承认“确系实情”，但很明显只是将其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从呈文内容可以看出，粮食部先就 6 月份召开的全国粮政会议拟调整各省粮政机构、分配员额、粮食储运等做了简要说明，然后笔锋一转，将设立粮食储运机构与此前的“出席”“列席”问题联系起来，并借各省粮政局局长之口，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战时粮政业务繁剧，粮政案件层出不穷，如每一案件均按照签呈主席—秘书处核转—提会讨论的程序处理，则会迟延时日，缓不济急，不利于案件处理与粮政推行；第二，各省政府委员会议开会讨论粮政问题时，因粮政局局长只能列席且无表决权，导致“政策决难把握，效力亦复大减”。对闽省府此前所提粮政局应与社会、卫生、合作等地位等同，仅能列席省政府委员会议的看法，徐堪在呈文中不无讥讽之语，谓其“实未能彻底了解目前粮政之特质”，并援引蒋介石近期对粮政工作所做的重要指示与“完善推行”粮政的期望，意在把蒋对粮政工作的有力支持引申至对粮食部、徐堪本人的有力支持，来压制以浙、闽省府为代表的质疑者。因此，徐堪提出，“仰见委座重视粮役两政之至意，为求达成粮食政策起见，省粮政局长似仍以出席省府委员会议为宜”。[2]在徐递交的《修正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草案》第 3 条中，仍将“本局局长出席省务会议”写入其中。此外，修正后的大纲将秘书室改为第四科，各科职掌、员额相应予以调整。[3]

徐堪之所以在此时底气十足地提出修正大纲，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年余来推行的粮政渐有起色，军粮可以提前足额交拨，[4]民食供应渐趋稳定，各项粮政获得蒋的大力支持，相关人员也被召见勖勉，正在向更高的期望迈进，这一点在呈文中已有体现。从浙、闽 1941 年度田赋征实、定价征购情况来看，已达到预期目标，并得到行政院的嘉奖。[5]浙、闽两省的粮食状况，经过一年时间，“谁都承认福建的粮食，是十分稳定……这当然不能不承认当局的擘画得当”，[6]这也说明粮食部一年来的各项政策措施是比较成功的，成效已经显现，而事实也是如此。二是为了达到更理想的粮政推行效果，确实需要更为坚强有力的省县

1粮食部：《为省粮政局组织大纲有应行修改之处谨拟具修正大纲及分等编制表草案呈请鉴核示遵》（1942 年 11 月 25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69-70 页。
2粮食部：《为省粮政局组织大纲有应行修改之处谨拟具修正大纲及分等编制表草案呈请鉴核示遵》（1942 年 11 月 25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70-71 页。
3粮食部：《为省粮政局组织大纲有应行修改之处谨拟具修正大纲及分等编制表草案呈请鉴核示遵》（1942 年 11 月 25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73 页。
4粮食部编印：《粮食部报告》（1941 年），1942 年，第 4 页；粮食部调查处第四科编印：《粮食部三十年度工作检讨报告》，1942 年，第 7 页。
5《令顺人字一五六 00 号令为嘉奖江西省粮政局局长胡嘉诏浙江省粮政局局长徐桴福建省粮政局局长林学渊广东省粮政局局长胡铭藻贵州省粮政局局长何玉书等由》，1942 年 8 月 11 日，《行政院公报》渝字第 5 卷第 9 号，1942 年 9 月 30 日，第 2 页。
6郑祖荫：《福建粮政局成立周年纪念感言》，《福建粮政》，第 1 卷第 2-3 期合刊，1942 年 12 月 5 日，第 12 页。

级粮政机构，来坚决贯彻落实粮食部的粮政。在徐堪看来，全国粮管局之所以对粮食危机应对乏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全国粮管局的“组织和权力还太小”，随着粮食问题日趋复杂，“必须加强粮政机关的组织，扩大粮政机关的权力，增高粮政机关的地位”，[1]才能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这也是徐堪任职以来特别看重与着重强调的。粮政局作为战时各省唯一主管粮食行政的最高机构，其地位承上启下，粮政局局长则是粮食部在地方粮政系统中的直接代理人，握有极大话语权，对于粮政决策、推行及目标达成至关重要。三是或许也与徐之为人性格较为强势有关。徐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后入财政部，协助孔祥熙进行法币改革，深得蒋、孔信任。关于徐之为人，虽然直接展现其个性之材料较少，但可从他人记载中窥得一二。抗战后期及战后担任粮食部简任督察兼督导处帮办陈开国忆述，徐“是科班出身，饱经风雨，既会做人，更会做官”。[2]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在日记中曾记有这样一件事：1941 年 1 月 2 日，翁文灏与张群谈话，张群言，“卢作孚在蓉时，言及政府处理物价近情，声唳泪下，极为慨息……从种种事实看来，徐堪心存与若干人为难。以彼著名污吏乃竟大胆欺凌正人，当局竟受其蒙蔽，可叹没过于此”。[3]在翁眼中，徐堪为一“著名污吏”，且好“欺凌正人”，在卢作孚声泪俱下地反思物价问题时，却遭致徐堪的存心为难，徐之所作所为颇有落井下石、逼卢下台之态势。翁之言词虽系个人感受乃至出于派系纷争，但徐倚仗资历较深及蒋、孔之信赖而表现出的强势应是无疑的，其实这也是徐得以出任粮食部首任部长的因素之一。因此，徐堪在此时提出修正大纲，时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对行政院来说，也是“修正”此前失误的良机。但行政院会接受徐的全部修正建议吗？

经过“增产”“出席”两次修正事件的尴尬之后，负有审核之责的行政院此次态度较为审慎，未立即批复，而是将修正草案交由秘书处详细审查。12 月 1 日，行政院秘书处对徐堪呈文及修正草案签注五项意见：一是粮政局局长仍“列席”而非“出席”省政府委员会议。秘书处认为，改“列席”为“出席”，虽可增加粮政局局长在会议中的表决权，加重其职权，“从粮政立场而言，固有理由”，但却仍与《省政府组织法》不无抵牾之处，如《省政府组织法》不修正，“仍以列席为宜”；二是秘书室可以改为第四科；三是局内员额增减亦无不可；四是省市粮政局分等编制表应在大纲决定后一起修正；五是省粮政局储运机构之设立，应呈请行政院核准，以防过多过滥。防止多而滥或许只是秘书处的借口，其真正目的不排除提醒粮食部再勿出现新设机构规章制度不周密，连带将行政院拖下水的同类情形。[4]在五条意见中，仍以第一条最为重要，秘书处签注字数也最多，但粮食部最不满意的也是这个结果。行政院以修正大纲草案与《省政府组织法》抵触为由，并未满足粮食部的全部诉求，

1徐堪：《中国战时的粮政》，《经济汇报》第 6 卷第 1－2 期合刊，1942 年 7 月 16 日，第 17 页。
2陈开国：《抗战时期西南粮政见闻》，政协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1985 年，第 24 页。
3翁文灏著，李学通、刘萍、翁心钧整理：《翁文灏日记》下，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606 页。
4《粮食部所送修正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草案核签意见》（1942 年 12 月 1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77-80 页。1942 年 7 月底，在粮食部向行政院提交审核《省粮政局储运处组织通则草案》时，行政院秘书处提出，“本案为妥慎起见，拟先送法规委员会审议后，再提请院会核定”。参见粮食部：《呈为拟具省粮政局储运处组织通则草案暨编制俸级两表赍请鉴核备案令遵由》（1942 年 7 月 31 日），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7，第 51 页。

大纲的修正最终落下了帷幕。

第三次修正与前两次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这次是由粮食部主动提出来的。既然是主动，那徐堪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徐堪此次呈文的目的，一方面在提请行政院对大纲按照粮食部的意见进行修正，尤其是“出席”与“列席”问题，欲使这一问题回到粮食部最初设计的轨道上来，即恢复粮政局局长“出席”省政府委员会议的资格；另一方面则可以看作是对浙、闽两省的有力反击，以挽回颜面，同时维护粮食部及自己的权力边界。毕竟按照《粮食部组织法》，全国粮食行政均由粮食部主管，各省粮政局“直隶”省政府之外，“并受粮食部之指挥监督”，其组织规程或组织细则也是由粮食部“饬局拟订”的。[1]但是，徐堪的主要目的未能实现，维护权力、挽回颜面的努力归于失败，这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行政院在大纲反复修正事件上对粮食部的态度，或许也是出于平衡各省政府尤其是浙闽省府与粮食部关系的考量。

1943 年 10 月，田赋、粮食机构合并为田赋粮食管理处，这一问题又被再度提起，行政院将之提交国防会裁决。1944 年 1 月 3 日，国防会第 127 次常务会议依照法制专门委员会与财政专门委员会审查意见，“各省田赋粮食管理处长似应准列席省务会议”，最终裁决：“照审查意见办理。”[2]也就是说，国防会采纳了法制、财政两专门委员会意见，仍准“列席”。随后，行政院训令浙江省政府：“前据财政、粮食两部会呈请准各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列席省务会议一案，经报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去后，兹奉国民政府三十三年一月十二日渝久字第一八号训令，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常务会议决议‘准予列席’饬即知照等因，奉此，除分令外，合行令仰知照。此令。”[3]

然而，粮食部的反击并未就此罢休，战后再次被粮食部提出。1946 年 6 月 6 日，财政部、粮食部召开“实施改订财政收支系统会议”，会议通过《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后关于田赋粮食之紧要措施案》，紧要措施案规定中央原设各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一律改隶省政府，受省主席指挥监督，这意味着田粮处与省政府内各厅地位相同。27 日，徐堪在呈送蒋介石的呈文中提出，各省田粮处自本年 7 月 1 日起一律改隶省政府后，但各省田粮处处长仍“于省府会议无出席资格”，对各项工作“不能直接指挥”，在省政府会议上“无权主张，往往发生困难，咸请以省府委员兼任，以利业务进行”。“咸请以省府委员兼任”的真正含义是“咸请兼任省府委员”，也就是由田粮处长兼任省府委员，与各厅居于同等地位，粮食部并援引陕、赣、粤、湘、皖等省田粮处长兼任省府委员的做法，认为兼任“对于征粮之进行确多裨助”。兼任与否说到底还是战前“出席”与“列席”之争，还是出于维护权力边界的考量。对此一提议，文官处 7 月 2 日认为“省委均有定额，不便随意增加”，建议还是先准列席，

1湖南省政府：《据本省粮政局呈赍组织规程及经费概算经核并提会修正通过赍诸鉴核令遵由》（1942 年 5 月 4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02 页；浙江省政府：《为呈送浙江省粮政局组织规程请备案由》（1942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158 页。

2《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常务会议纪录》（1944 年 1 月 3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纪录》第 6 册，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第 127-17 页。

3《各机关首长出席（列席）省务会议》（1944 年 4 月），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政府档案，档案号 L029-001-0215，第 6 页。

但“遇省委出缺尽先补任”，相当于是缓冲之策。蒋收到文官处的拟议后，批示：“如拟。”[1]3日，国防会第197次常务会议决议：“关于各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由省政府委员兼任一节，在未完成立法程序以前，得列席省政府会议。”[2]此后，再未见徐堪提出同类意见，之后的三任粮食部长也因粮食危机不断加剧而无暇顾及“出席”还是“列席”问题，此一事件遂彻底偃旗息鼓了。

大纲出台及修正，属于同一事情的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紧密相连，法规出台导致了后续接连围绕权力博弈的修正的发生，而修正则因出台的法规不严密而起，究其实质，则是战时立法程序正义被破坏，行政权越来越凌驾于立法院及其立法权之上，奉行一党专制的国民党自始至终无法摆脱“为党立法”的阴影，不能实现“为国立法”“为民立法”。

四、立法程序正义与权力边界维护

程序正义起源于13、14世纪英国的“自然正义”观念，自然正义的含义有三：一是被当作衡量法律内容正当性的标准，二是特指与管辖活动有关的自然法，三是特指程序正义。[3]程序正义的概念及其实践主要在指法律领域使用。此处借用“程序正义”的概念，并将之扩展为“立法程序正义”，意在指任何法律的制定、公布、施行应实现程序上的公正与正义，以保障其科学理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作为初始步骤，立法也应保证程序公正。其实，这也符合罗尔斯对公平正义原则及优点的阐释。[4]

粮食部从1941年7月成立至1949年3月裁撤，八年间出台、施行的管制、配拨、储运等各类《粮政法规》数量可观，亦曾专门汇编。作为部门法规，其重要性、广泛性虽不能与立法院专门审议通过的民法、刑法等社会法律等量齐观，但其对本部门及下属机构的指导意义却绝对不容低估，甚至是粮政机构与人员实际工作中的基本准绳与重要依据。《省粮政局组织大纲》就具有这一重要意义与价值。

大纲从公布后立即引发农林部的质疑，到陕省府表达自己的关切，再到后来闽省府的疑虑，以及前后两次修正，粮食部制定的新的规章制度引起利益方广泛关注，在所难免，也在情理之中。在各利益方中，陕省府的疑虑可以说无足轻重，因为电报价格与交通部关涉更多，并非粮食部所关心。农林部与闽省府有理有据的质疑显示出异曲同工之妙，“同工”意为均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需要，“异曲”则是关注的条款与内容各不相同，使得粮食部感受到的压力来自多个方面，既有中央政府部门，也有地方政府。这也是迫使粮食部不得不做出让步、修正大纲的最主要的原因，尽管这种关乎权力的妥协与让步是极不情愿的，何况对粮食部及徐堪本人的行政能力也是一种挑战与考验。尽管粮食部试图通过主动提出《修正省粮政局组织大纲草案》挽回颜面，但问题并不止于此。此一事件断断续续约有两年时间，涉及部门、

1《为实施改订财政收支系统后关于田赋粮食之紧要措施一案业经大会商讨并就原案修正通过谨将修改重要各点签请鉴核施行》（1946年6月27日），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01－081313－00039-010，第66-74页。
2《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百九十七次常务会议记录》（1946年7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8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页。
3徐亚文：《程序正义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4尹松波：《理性与正义：罗尔斯正义论管窥》，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机构除粮食部外，主要包括行政院，农林部，陕、浙、闽三省政府，仅五六人而已，但却折射出战时体制下农林部对自身权力的极力维护，以及闽省府与粮食部之间省部权力互相博弈的深层问题，

无论是农林部质疑的“粮食增产”问题，陕西省府关注的合署办公问题，还是浙闽省府提出的“出席”与“列席”问题，这些在农林部、浙闽省府看来不应该在立法过程中出现的明显错误，而且会牵涉相关机构的权力边界问题，为何会在短短的 14 条、不足 500 字的大纲中连续出现？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首先，就法定程序而言，行政院快速通过的大纲与《省政府组织法》中规定的机构不一致，立法程序正义被破坏。按照 1927 年制定的《省政府组织法》，其中并无粮政厅或粮政局这一机构。1930 年，国民政府对《省政府组织法》做了修正，“省政府之下，分设民政、财政、建设各厅，于必要时，得增设教育、农工、商业、土地等厅，分管省行政事务，各厅之设置废止，由国民政府决定行之”，[1]亦无粮政局这一机构。虽然此次修正规定厅级机构设置可由国民政府决定，但省政府机构有所变更时，其程序是应先修改组织法，然后再予以变更。在粮食部提出设立粮政局时，《省政府组织法》并未重新修订。然而，粮食危机日甚一日，田赋改征实物及军粮征购“为期甚迫”，省县粮政机构“尤须及早成立”，而且各项准备工作尚须时日，因此，设置粮政局无法按照正常程序进行。故而行政院提出，大纲提出设立粮政局，“系因适应实际需要，先予设置，将来修正省县组织法时，应请照案加入，以便完成立法程序”。对此，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8 月 19 日批复：“呈件均悉。《省粮政局组织大纲》准予备案。至所陈省粮政局及县政府粮政科，俟将来修正省县组织法时，应请照案加入一节，并已行知立法院矣。仰即知照。附件存。此令。”之后，国防会第 65 次常务会议决议，准予备案。[2]也就是说，从粮食部提出到行政院同意“先予设置”，再到国民政府“准予备案”，至个别省份粮政局率先设立，并未经过立法院立法程序，是不符合法定程序的“非常之举”。

非常之举或便宜之权在战时事机紧迫之际自有其必要，也无可非议，其他国家也有先例可循。但未经法律专家审议而通过的法条规章，不但其权威性、科学性、严谨性易被质疑，容易出现与其他法律条文互相抵触的现象，而且也极易为其他部门及省县地方政府“上行下效”，导致包括行政院在内的中央机构不停纠正各省政府不当“立法”，或省政府制止各县政府制定的“土法”。如战时禁酿问题，1938 年至 1939 年，闽、粤、豫、川、浙、湘、赣、皖、鄂九省因粮荒严重，先后私自制定禁酿或限酿政策，然而国民政府却反对各省禁酿，责令已禁省份解禁。[3]战时福建禁酿问题亦较突出，各方利益争夺非常激烈，就各县政府而言，

1《省政府组织法》，《江苏省政府公报》第 10 期，1927 年 11 月 17 日，第 2 页。

2《为省粮政局组织大纲并增设县粮政科一案业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准予备案令仰知照》（1941 年），行政院档案，档案号 014－040503－0006，第 27 页。

3四川省府 1938 年 1 月规定高粱可酿酒，禁止米、麦酿酒，参见《四川省府为非常时期节制消耗拟请核准暂许高粱烤酒不得再用米麦由致行政院代电》（1938 年 1 月 31 日），行政院档案，014-040505-0023-16—19；河南省禁酒规定，参见《河南省府拟订节用食粮办法致行政院秘书处电》（1939 年 12 月 20 日），行政院档案，014-040505-0025-1—25；广东省禁酿情形，参见张力《抗战时期广东省的禁酿节粮措施》，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华民族的抗争与复兴——第一、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

南平、连江、仙游三县分别擅自制定《南平县私酿酒类科处罚锾补充办法》《征求稽查员暂行办法》《仙游县禁止酿酒处罚暂行办法》等，但这些办法均未经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许可，为“非法之法”，先后被闽省府、财政部“严饬各县立予制止”。[1]以上禁酿领域中的“非法之法”仅为冰山一角，其他领域也层出不穷，这就对立法院的权威与权力构成了挑战。

立法院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其立法态度非常严谨审慎。以战前审议《粮食管理法草案》为例，1933 年 2 月初，内政部呈文行政院，提出在实业部之下设立中央粮食管理署，以便开展粮食管理事项，并将拟具的《粮食管理政策草案》一同呈览。[2]4 月，国民政府责令财政、交通、铁道、内政、实业各部会同拟订粮食管理法草案，各部草拟完成后，提交立法院进行审议。立法院对草案的态度非常审慎，将之交付法制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共同审查的同时，先后另外加派多名专家参与，并一度特意加派立法委员马寅初“加入审查”。[3]18 日，草案审查完竣，提交行政院、立法院审议。[4]立法院在第三届第 18 次会议审议《粮食管理法草案》时，认为“其中有事属可行者，有宜从缓举办者”，而设立中央粮食管理局、粮食划区管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粮食市场、政府制定粮食价格等，“此皆本案重要之点，事属创举，繁重难行。按之国内目前情形，似非所宜”。也就是说，立法院认为设立全国性粮食管理机构的条件并不成熟，[5]最终裁定“所拟《粮食管理法》此时尚无制定之必要”。[6]战前情形虽与战时迥异，但反映出立法院的审慎态度及行政权对立法权应有的尊重，各部门权力边界较为清晰。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战时体制日渐建立，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立法程序正义难以得到保障与实现，立法出现量多质低现象。

其次，战时行政权越来越凌驾于立法院及其立法权之上。战前五院地位相对较为平衡，尽管行政院院长的职权常因人而异，政随人转的现象也十分普遍，[7]但行政院对其他各院的权力侵夺与挤压现象并不明显。而战时体制下，行政院机构急速膨胀，新设、改隶部、署有农林部、卫生署、地政署 、全国粮食管理局、司法行政部等，1945 年抗战胜利前，行政院下辖机构增至 11 部三会一署，权力空前壮大，[8]事务更为繁剧，相应政策法规的审核工作存

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团结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9—204 页。

1《行政院为财政部呈报福建省各县征收禁酿罚金立予制止给财政部的训令》（1943 年 4 月 3 日），行政院档案，014-040505-0029-138—148。

2《内部请设粮食管理署，附设粮食管理委员会，办理调剂粮食等要项》，《新闻报京沪路外埠附刊》1933 年 2 月 6 日，无版次；《实部组粮食管理署》，《钱业月报》第 13 卷第 9 号，1933 年 9 月 15 日，第 11 页；《〈粮食管理政策草案〉内部向政院提案之全文并定日内召集各部审查》，《中央日报》1933 年 2 月 9 日，第 2 版。

3《中央粮食管理局》，《农业周报》第 2 卷第 27 期，1933 年 7 月 3 日，第 387 页；《加派马寅初审议粮食管理法草案由》，《立法院公报》第 49 期，1933 年 5 月，第 6 页。

4《粮食管理法审查完竣》，《民报》1933 年 4 月 19 日，第 3 版。

5《各部会商通过粮食管理草案》，《新闻报京沪路外埠附刊》1933 年 3 月 3 日，无版次；《立法院审议中之粮食管理法》，《盐政周刊》第 2 卷第 8 期，1933 年 5 月 13 日，第 13－15 页；《内政部建议请设粮食管理所，拟粮食管理法呈核，核定后即推行全国》，《人报》1933 年 2 月 6 日，第 2 版；《粮食管理法将由立法院通过》，《时报》1933 年 6 月 28 日，第 2 版。

6《粮食管理法草案审查报告》，《立法院公报》第 51 期，1933 年 7 月，“立法院各委员会审查报告”第 4－6 页；《呈国民政府粮食管理法草案经决议无制定之必要录案呈请鉴核由》，1933 年 7 月 17 日，《立法院公报》第 51 期，1933 年 7 月，“公牍”第 3－5 页。

7张瑞德、齐春风、刘维开等：《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第 11 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13 页。

811 部包括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财政部、粮食部、交通部、经济部、教育部、农林部、社会部、司

在漏洞。行政院在第 525 次会议对粮食部 7 月 29 日所提草案进行审议时，仅将“草案”二字删去，其余未作更动，大纲草案在提交当天即草率通过，并未按程序提交立法院审议，致使分属农、粮两部的机构职责重合，暴露了未经立法院履行立法程序的弊端，行政院亦应负失察之责，难辞其咎。此外，行政院对下属机构及其人员行政能力亦存在督察不严的情形，有些政策法规朝令夕改，如《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1941 年 8 月 4 日颁布，[1]但 9 月 22 日即予以修正，说明在制定此项条例之初即考虑不甚充分，[2]这既影响国民政府的威信与形象，也与立法的严肃性、立法程序正义相去甚远，更说不上体现人民性。

在战时背景下，出于实际需要的“非常之举”更为普遍。但就权力边界而言，战时体制下行政权无限膨胀，极大地挤压立法权，个人及行政机构受到的权力制约越来越小。个人权力层面来说，国防会委员长“复有不依平时程序为便宜之措施的紧急命令权”，而且此项命令可以变更法律，[3]即存在委员长将个人意志、派别利益上升为国家法律的极大可能性，事实上此类事件在抗战建国名义下层出不穷。抗战时期，国防会代行中政会一切职权，可以自行拟定法律全文，之后交由国民政府公布，如《县各级组织纲要》《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等均不曾经过立法院的审议程序，即使交由立法院审议，也只是事后“追认”。再如《非常时期农矿工商条例》，该条例由经济部呈送行政院，经行政院会议通过后，呈送国防会，国防会发交法制专门委员会审查，提出审查意见，然后由国防会通过，仅在公布前送交立法院审议，补走程序而已。[4]这种以行政命令代替立法程序的方式在战时非常普遍，就粮食部所制定的许多“大纲”“规程”“纲要”等规章而言，即是通过这一“简便”程序得以完成所谓“立法程序”，成为指导全国粮政的法律文件，《省粮政局组织大纲》即为显例。

面对立法权被极大弱化的状况，立法院自然不满，兹举一例。1945 年 7 月，有人致函行政院，质疑国家总动员会议下设经济检察队的“法律地位”及物价管制处、经济检察队组织规程的合法性，并提出经检队并无继续存在必要。行政院 28 日将之提交国防会，国防会第 164 次常务会议决议交由立法院审议。[5]立法院法制专门委员会将之作了合并审查，之后，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王世杰、副主任甘乃光呈文国防会，陈述了审查意见：“经予合并审查，认为综合推动物价管制政策，及检察违反管制法令之行为，物价管制处及经济检察队，在目

法行政部，三会包括侨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全国水利委员会，一署指善后救济总署。国民政府西迁后，行政部会调整频繁，并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原来直隶国民政府的机构渐次改隶行政院；二是部分不在行政院的机关如中央社会部、司法行政部亦陆续改隶行政院；三是行政部门日增，工作更为繁重；四是原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负担的行政事务，改隶行政院后，事实上仍由国民党党部监督指导，如社会部及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与电影检查所，分别由党部与中央宣传部通过政府主持其事。参见陈之迈：《中国政府》，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20-221 页。

1《粮食部组织法及一九四一年粮食库券条例》（1941 年 8 月－9 月），内政部档案，档案号十二－2214，第 14－19 页；《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训令直辖各机关通饬施行》（1941 年 8 月），台北，“国史馆”藏（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 001-012430-00009-020，第 70 页；《民国三十年八月份经济大事分类日志》，《中央银行月报》第 10 卷第 9 号，1941 年 9 月，第 1299 页。

2《修正粮食库券条例》，《银行周报》第 25 卷第 38 期，1941 年 9 月 30 日，第 3 页；《国民政府明令修正民国三十一年粮食库券条例训令直辖各机关通饬施行》（1941 年 9 月），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 001-012430-00009-024，第 77 页。

3陈之迈：《中国政府》，第 275-276 页。

4陈之迈：《中国政府》，第 275-276 页。

5《国民政府训令立法院为行政院物价管制处及经济检察队组织规程一案令仰遵照》（1945 年 8 月 9 日），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 001-012071-00305-027，第 84 页。

前物价问题严重情形之下，均不能谓无设置之必要。但此项机构之组织，似以仿照立法程序，送交立法院制定法律为宜。且检察队对于违反管制法令之案件，其所为之查封或没收，影响于人民之财产权甚大。此项处分尤应有法律上之根据。否则不免有滥行职权之嫌。该组织规程似宜将此种处分权明白规定。”[1]立法院所说“滥行职权”，表面上是针对经检队、物价管制处等而言，但其实却是影射国家总动员会议、行政院、国防会等对立法院的忽视及对其立法权的侵夺，立法院的不满情绪在字里行间流露无疑。

最后，国民党自始至终无法摆脱“为党立法”的阴影，不能实现“为国立法”“为民立法”，围绕大纲展开的权力边界维护，本质上维护的是国民党的党权而非民权。法律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西方的政党政治自 17 世纪下半叶出现以来，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党也逐渐成为政权的拥有者，相应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并且在一定时间空间内，同一政党执掌政权、立法权的几率大为增加，甚至完全相同。国民党完成北伐、建立政权后，实现了从军政到训政的过渡，掌握了国家立法权，政党、政权、立法权三者完全重合，意味着集权统治建立。

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一切建国工作的最高原则”和“立法方针”，[2]并且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提出社会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立法理论。[3]胡汉民被排挤之后，其立法理论便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步一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等，将“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制”确立下来，立法的党治原则随之确立。有学者指出，战前国民党立法体制的特点具有二元性、党化色彩、领袖制倾向及一定的开放性，其立法的权威性、稳定性本身就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4]而战时这些特点更为明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战时中央政治委员会、行政院、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非常之举”“便宜之权”既破坏了立法程序正义，削弱了立法院的权力，也意味着国民党党权、行政权高高凌驾于立法权之上，与“为国立法”“为民立法”渐行渐远甚至格格不入。正如战时曾任职行政院参事等职的陈之迈所指出的：“在十七年直至今日，我国始终在党治时期，而党治的原则下最高的立法机关仍为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它有议决‘立法原则’的最高权力”，而所谓“立法原则”其实就是国民党的政策。[5]也就是说，从立法院成立之日起，立法院的工作自始至终必须在国民党所确立的党治原则下“为党立法”，“对于政治会议所定之原则不得变更”，“只得为内容之审议”，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案在国民政府未公布前，中政会认为有修正必要时，“得以决议案发交立法院依据修正之”，[6]也即所谓的“浓重的党化色彩”。[7]战时国民

1《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函国民政府文官处为行政院物价管制处及经济检察队组织规程一案请查照转陈办理》（1945 年 7 月 31 日），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 001-012071-00305-026，第 77-83 页。
2胡汉民：《三民主义之立法精义与立法方针》，《胡汉民先生文集》第 4 册，武汉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85 页。
3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对一个执政党迅速衰败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剖析》，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21 页。
4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第 186-196 页。
5陈之迈：《中国政府》，第 275-276 页。
6陈之迈：《中国政府》，第 276 页。
7陈红民等：《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研究》，第 187 页。

党党权、行政权空前强化，这一色彩更为浓厚，战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党专制空前加强，党治泯灭了法治，而法治却背离了人民，国民党成了国民厌弃的党。反过来，民心向背促使人民做出了正确的历史性选择。

作者简介：

王荣华（1975－），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主持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国民政府粮食部研究》，项目编号 19FZSB004，经费 30 万元，在研；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项目编号 16FZS037，经费 20 万元，已结项，成果由商务印书馆 2019 年出版；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危机下的转机：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项目编号 10FZS021，经费 12 万元，已结项，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出版。

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近年来主要关注国民政府时期粮食问题。

联系方式：

邮箱：997157659@qq.com

手机：150 5851 6319

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老家属区 52－1－201，邮编 321004.

李济深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提纲）

谭备战

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济深（1885 年-1959 年），字任潮，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做过黄埔军校副校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领导人之一。李济深非常注意联合各个革命阶级进行斗争，实际上也是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感召。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为中国革命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李济深出生在晚清广西的一个小村庄，李济受家庭教育熏陶培养出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参加革命后，李济深跟随孙中山救国奋进。统一战线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萌芽。

1931 年局部抗战时期，蒋介石不仅专制独裁，实行“不抵抗”政策，还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的无稽之谈，李济深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开启了反蒋道路。但是抗战爆发后李济深的思想由反蒋转向了拥蒋，这是李济深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关键期。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李济深对于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赞同，并身体力行的拥护统一战线，李济深统一战线思想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起来的。

经过多年奋战，蒋介石执意发动反共行动，全面“剿”共，李济深发文抨击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呼吁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嘴脸，以及再次拥护统一战线，反蒋联共。李济深的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实现了质的飞跃，达到了成熟。

建国后，赓续发展统一战线思想，坚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李济深的统一战线思想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对坚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强大现实意义，来源于统一战线思想的与时俱进，不断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坚持统一战线思想，不断指导我们的现实实践，充分发挥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谭备战，历史学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

联系方式：

谭备战，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450046　　电话：15286800198（微信同）　　电子信箱：tanbeizhan1999@163.com

互证 求真：哈里森·福曼著作《北行漫记》考析

张发青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引言

国内外学术界对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1]的《北行漫记》有一定的研究，但多是简略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2]，或注重研究福曼对中共领导人的印象[3]，或探讨福曼眼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4]等。学者们在对《北行漫记》评价时多直接引用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Kenneth E.Shewmaker）的著作《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一书中的原话，即该书虽“象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袋甲封锁’”，是“一本权威性的记实文献”。但认为，福曼“以耸人听闻和忽略事实而闻名”，他“发出的电讯稿中，含有许多‘愚蠢而不准确’之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即《北行漫记》）中的一些陈述似乎可以证实这种说法。[5]针对休梅克在评述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时的这种评价，很少有学者探究他引用的材料是否准确？他的评价是否中肯？

过去，由于缺乏海外史料的佐证，休梅克对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的否定评价极大地影响了学者们的看法，使不少人忽视了福曼在报道中国抗战方面的作用及其著作《北行漫记》一书的史学价值。现有幸收集到福曼档案、《摩根索日记》、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等相关原始史料，并研读了国内出版的福曼同行者著作、当事人回忆录、抗战时期报刊资料等等，

---

1 哈里森·福曼（1904－1978），过去多译为哈里森·福尔曼。据作者的汉语名片和中华民国政府发给Forman的护照，其中文名字都为福曼，故本文采用福曼这一名字。参见哈里森·福曼：《地平线猎人》（Harrison Forman，Horizon Hunter），国家旅行俱乐部，1940年版，第85页。

2 如著作有：肯尼斯·休梅克，郑志宁等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潘世伟：《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张注洪：《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等.论文有：唐耐心：《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1980年；格雷戈里·托马斯·马基：《从国务院的角度看美国在中国（1941-1945）》（Gregory Thomas Markey，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1941-1944: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乔治城大学博士论文，1985年；李崇寒、哈里森·福尔曼(摄影)：《北行漫记》，《国家人文历史》，2019年第6期；孟红：《<西行漫记>的姊妹篇<北行漫记>》，《党史文苑》，2010年第13期；欧文·拉铁摩尔：《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大西洋月刊》，1945年第4期；埃德加·斯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纽约时报书评》，1945年第3期；小理查德·瓦茨：《内战》，《星期六文学评论，1945年第3期等。

3 孙大勋：《毛泽东与国际友人》，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丁晓平、方健康：《毛泽东印象》，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武原，曹爽：《外国人眼中的中共将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王利慧：《毛泽东与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共产党员》，2019年第6期；罗越红：《福尔曼与贺龙》，《百年潮》，2015年第10期；阿牛：《哈里森·福尔曼与毛泽东在延安》，《名人传记》，2012年第6期以及一些硕士论文中有所涉及。

4 魏宏运：《中外记者访问团眼中的抗日根据地》，《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李庆刚：《<北行漫记>里的陕甘宁边区》，《天津支部生活》，2019年第8期；黄正林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笔下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耿磊《忙而有序：另一视野下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以1944 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为中心》，《历史教学》，2015年第16期；殷萌、张小兵：《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认知》，《九江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等。

5 肯尼斯·休梅克，郑志宁等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发现休梅克在评述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时，所引材料存在张冠李戴之误，论述不够严谨，评价不够中肯。就这些史料而言，国内外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尤其是对福曼档案的研究极少，仅见的研究成果中只涉及到福曼日记（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公布的日记为准）。国内仅有一篇论文[1]提及福曼日记，国外学者则是在2010年后开始关注福曼日记[2]。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外学者要么单纯研究福曼的《北行漫记》，要么将《北行漫记》与其他著作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使用多重史料互证的方法，将福曼档案、《摩根索日记》、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以及相关人员著作、回忆录等史料，与休梅克在《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评价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时所引材料进行比对，考察休梅克使用的材料是否准确，进而考析《北行漫记》的史学价值。

一、《北行漫记》的写作背景

福曼的著作《北行漫记》虽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但《北行漫记》并没有像埃德加·斯诺的作品那样，为中国读者所广泛知晓，许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都只是听说过这本书，而没有读过它。因此，在研究《北行漫记》一书的史学价值时，有必要简要介绍其作者以及成书背景和内容。

福曼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也是一个喜好自由职业的人。他1930年来到中国后，曾代表美信洋行航空公司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推销飞机，两年后辞职开始他的冒险之旅——藏区考察。在斯诺凭借《西行漫记》一书成名后，福曼也决定前去考察中共驻地。当时，大多数外国记者选择延安作为目的地，但“热衷于到欧洲人或美国人鲜少踏足的区域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和丰富体验”[3]的福曼于1937年7月7日前夕考察了鲜有记者踏足的彭德怀部和贺龙部——陕西云阳和三原，并与贺龙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中国考察期间，福曼凭借敏锐的新闻观察力和不可思议的敏感度，亲眼见证并拍摄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血腥星期六”、花园口大决堤、河南大饥荒等重大历史事件。

毛泽东曾说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革命的最成功的两部著作之一”[4]，它吸引着更多的外国记者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报道中国革命真相。但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访问共产党所辖区域，因此当时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仍局限于《西行漫记》中的记述，对于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的活动情况，只得到一些间接的传闻。“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世外桃

1 张发青：《哈里森·福曼青海、甘南藏区之行及其影响（1932-1937）》，《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该文在考证福曼《穿越藏区禁地》一书的史料价值时，引用了福曼藏区考察的部分日记。

2 有关福曼日记的研究主要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博士生Limin Teh在其论文《1907-1945年抚顺煤矿的种族、中国劳工和日本殖民主义》（Mining for Differences Race, Chinese Labor, and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Fushun Coalmine, 1907-1945）中引用了福曼于1938年在伪满洲国考察时的日记；还有美国丹佛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娜·K·马图西亚克（Krystyna K. Matusiak）和艾瑞斯·谢（Iris Xie）合著的《探寻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以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哈里森·福曼拍摄的中国藏区照片和藏区日记为例，探索了图书馆在创造新的学术资料来源和支持再利用方面的新兴作用。

3 《哈里森·福曼先生》（Mr. Harrison Forman），《泰晤士报》（Times），1978年2月6日第14卷，第14页。

4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页。

源”。[1]美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目前无法获得有关共产党区域的情况。我们现在拥有的材料都是几年前过时的消息，其视角和可信度极其有限。”[2]而 1944 年的豫湘桂大溃败使人们对国民党倍感失望，美国等西方国家急需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的情况。

为了掌握日军在中国华北的情况，调查美军未来陆空行动的可能性，以便将来共产党军队配合美军反攻日本，罗斯福总统于 1944 年 2 月 9 日致信蒋介石，要求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等省份进行考察[3]。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也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请求赴共产党统治区进行考察。而周恩来作为共产党驻重庆的联络官，不断邀请使馆人员和新闻记者参加非正式的讨论会和每周的茶话会，诚挚邀请外国观察员前往边区进行考察[4]。董必武也明确表示，“记者们不仅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去他们任何想去的地方，包括敌后的前线。”[5]

迫于内外压力，蒋介石最终同意中外记者访问共产党区域。1944 年 5 月 17 日下午，福曼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以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的身份，离开重庆，赴西安、延安、晋绥边区等地进行考察。中外记者在西安考察时，胡宗南的参谋长罗泽闿[6]宣称，“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八路军从未抗击日军，反而攻击中央军”。[7]当时国民党方面公开宣称，“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8]，这些指责反而激起了外国记者对共产党人的兴趣。信奉“百闻不如一见”的福曼虽然不相信国民党对中共的上述攻击，但也迷惑不解，福曼认为，“从客观报道新闻的角度来说，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都需要回答，而且这些回答应基于观察和无可置辩的事实。”[9]为此，在历时 5 个月的考察中，福曼总是在不停地写写画画，记满了整整 6 个笔记本。在考察间隙，他还向所在的报社和通讯社发回了大量通讯，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抗战情况。但其电讯稿“80%的内容被重庆的审查官员删扣”[10]，被删减后的稿件几乎失去了作为当今学者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需的原始资料的价值。[11]为了把

---

1 费正清，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4 页。

2 FRUS: Diplomatic Papers.1943. China.Memorandum by the Third Secretary of Embassy in China (Service).
Temporarily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January 23, 1943:199.部分学者在引用 1943 年 8 月前谢伟思的材料时，经常标注为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实际应为三等秘书（1941 年夏——1943 年 8 月 5 日）。

3 FRUS: Diplomatic Papers, February 9, 1944, China, Volume VI.

4 FRUS: Diplomatic Papers, March 16, 1943, China, p.215.

5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沈苏儒、贾宗谊等译：《历史不应忘记 爱泼斯坦的抗战记忆》，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1 页。

6 据福曼日记，此处罗士恺应为罗泽闿。罗泽闿是胡宗南麾下较出色的参谋之一，但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路旦俊、陈敬译，湖南出版社，1993 年，第 11 页，错将罗泽闿译为罗士恺。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2 页，错将罗泽闿译为陆子凯。

7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1944 年 5 月—6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May-June.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FRUS: Diplomatic Papers.China.1944：p481.

8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5 页。

9 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亨利·霍尔特公司，1945 年，第 2 页。

10 《有关中国统一议题的空中辩论》，1945 年 2 月 24 日，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86，第 46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11 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6 页。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全面、客观地告诉全世界，福曼根据自己的考察日记整理出版了《北行漫记》一书，很快引起轰动。

二、《北行漫记》的主要内容

历时 5 月的西北之行，使福曼对国共两党有了清晰的认识。首先，通过考察，福曼发现国民党政府有关共产党的宣传都是虚假的。福曼在国统区满耳听到的是边区政府种植鸦片、八路军游而不击，避免与日本人作战，没有伤兵和俘虏以及中共使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等暴虐的极权主义手段统治人民等一类的宣传。为了一探究竟，他于 1944 年 5 月下旬“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1]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福曼都找不出什么证据，证明国民党的宣传确有所本。有关鸦片问题，福曼证实，“我在共产区游历了五个月找不到一点点任何形式的鸦片的痕迹。”[2]有关八路军避战、无伤兵无俘虏的说法，福曼在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近距离观战后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3]针对国民党红色极权主义的说法，福曼实地调查后发现，边区政府在人员组成上采取“三三制”原则，中国共产党政府诚实地遵照“三三制”原则，共产党人的代表确实只占三分之一，以防止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4]福曼考察边区之后得到的总印象，与国民党人所描绘的景象是截然相反的。

其次，福曼批评了国民党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和严密控制记者言行的行为，肯定了共产党在记者采访与行动方面实行的宽松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中宣部严格审查所有由外国记者拍发的新闻稿件，一旦有不利于国民党的新闻内容，立即予以扣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曾坦率地说，国民政府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彻底删除它所反对的东西。[5]据国民党宣传处记载，福曼、爱泼斯坦等记者从延安采访归来，拍发电讯 34 件，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但“这些电讯被大段删除，甚至全文检扣”。[6]如福曼的电讯稿中，就有高达“80%的内容被重庆的审查官员删扣”[7]。除严格检查新闻稿外，国民党政府还严密控制记者团的采访活动。福曼提到，外国记者在西安进行采访时，总是被便衣警察跟踪[8]，“像往常一样，又有三个骑自行车的人跟着我们”[9]。福曼发现，“我们的正式关

1 文一，《外国人笔下的红色中国丛书出版》，《人民日报》，2002 年 8 月 4 日第八版。
2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 页。
3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58 页。
4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6-100 页。
5 董显光：《发稿地：中国：中国与世界新闻关系的开端》（Hollington Kong，Dateline：China：the beginning of China's pres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罗科伯特出版社，1950 年，第 247-248 页。
6 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 30 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07 页。
7 《有关中国统一议题的空中辩论》，1945 年 2 月 24 日，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86，第 46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8 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亨利·霍尔特公司，1945 年，第 4 页。
9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5 月—6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系尽管什么都是笑嘻嘻和客客气气，西安官吏却严密监视着并且记录着我们的一言一行。”[1]福曼的观察表明，在国统区，外国记者的行动与采访均受到严密监控，根本没有自由。

在边区考察时，福曼发现，“此间无人考究礼节衣着及时间等事。一切开放自由，绝无政府限制，诸如活动，讨论，谈话，访问、摄影等等，都无限禁，自政府中最高官员，以至最低级之农民工人，莫不皆然。”[2]这既可以从清涧妇女大会上一名妇女的表现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劳动英雄吴满有在福曼再次拜访他时的惊异表情[3]看出，还可以从福曼对老兵进行的采访中看出。记者们途经清涧，恰逢妇女大会，一位正在发言的妇女看到福曼一行后，“吓得了不得，从讲坛上溜下来了。”福曼叹道，“看来，使这些女人完全接受解放思想，恐怕还得经过不少时候呢。”[4]福曼再次拜访吴满有时，吴又惊又喜，福曼很满意，“这么我才可以见到那种并非专为我来而特别预备的光荣”[5]。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时，正在接受军事与政治训练的第一大队的上校和少校们向记者们表示，“他们讨厌株守在菜园里，或者跟个女人似的纺织布。”[6]这些都说明外国记者在抗日根据地是可以随意走动、自由采访的[7]。他们可以在街上闲逛，和市场上的店主、商人、老百姓谈天[8]，即使是曾经的日军俘虏，福曼也可以自己去访问。因此，他“不仅接触了王震、聂荣臻、朱德、陈毅等众多的著名政治人物，而且将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战士、少先队员、儿童团员”[9]和新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小人物”，如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改造好了的“二流子”等等，还采访了外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洋医生马海德和由反战的日本士兵组成的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成员及他们对日军开展的心理战。由此可见，边区“一切地方都是开放的，没有人控制、限制他们（指外国记者）的出行、采访、参观或拍照”[10]。这些都表明，国统区的新闻管制和记者行动受限与共产党辖区新闻宽松和记者们采访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次，针对记者的走访调查，国民党官兵局促不安，根据地军民充满自信。在国统区考察时，福曼发现，无论是胡宗南司令部的官员还是训练营的学生都显得局促不安。“我们会见了三位长须的临时人民参政会的老代表。他们看来似乎非常之局缩——唯恐一不留意，说

Diary, China, May—June, 1944）.

1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

2 《福尔曼六月六日自延安拟发雪梨晨报电》，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91，第 84-86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3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6 月—7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China，June-July，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4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7-198 页。

5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1 页。

6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0 页。

7 FRUS：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pp.519-520.

8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6 月—7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China”，June-July，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哈里逊·福尔曼，熊建华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2 页。

9 《文艺信息》，《人民日报》，2002 年 8 月 4 日第 8 版。

10 安东尼·顾贝克：《远东是如何丢失的，美国政策与共产党中国的诞生（1941—1949 年）》（Dr. 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1941-1949），亨利勒涅里公司，1963 年，第 395 页。

出了他们不应该说的什么。”[1]胡宗南的参谋长罗泽闿将军甚至有一种隐藏的敌意。“虽然他款待我们是够热烈的，但我们却立即意识到一种潜在的敌视性，他似乎愤然于奉命优待这些好管闲事的外国人。”[2]在西安青年劳动营，当福曼走进一个教室时，“他们（女学生）慌张起来，一会儿就笔挺了，好像受过训练的好学生一样。我坐下去，打算和她们攀谈。他们带着犹豫的神气望着翻译员和我，然后答出含糊的不可捉摸的回答。”[3]即使是国民党当局挑选出的学生代表，“对于回答问题完全不关心”，福曼肯定地说，“真的，他们似乎怕受到访问。”[4]

到达边区后，福曼发现，上至中共领导人，下至普通民众，所有人都显的幸福、活泼和健壮。[5]考察结束后，平易近人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令外国记者钦佩的军事将领王震，骄傲地与牛合影的劳动英雄吴满有，打起仗来连日本人也觉得可怕的八路军战士以及艰苦环境中充分利用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民等等都给福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福曼不仅采访了中共领导人和军事将领，还考察了不少地方，走访了不少普通人。他发现边区“商店货物充足，人民显然很富有。”[6]曾接受福曼采访的边区“工人对于他们工作的酬报似乎都很满意。”他们“都非常热心于目前的工作状况。他们的工作时间缩短了，被人家作为人类看待了，又有自己的职工会，自己的俱乐室，并且他们对于处理事务也可以说话了。”福曼从工人们的言谈中看到了希望与自信。[7]可见，在国统区，尽管受访者提前做了充分的预演，但针对意料之外的采访，他们还是不敢随意接受，从中体现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民言论不自由。而在边区，福曼的所见所闻都让他感受到边区军民的积极向上、乐观自信。

最后，福曼客观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边区政府在人员组成上采取“三三制”原则，共产党人的代表只占三分之一。考察中，福曼不仅采访了边区参议会代表李鼎铭、谢觉哉、罗迈、刘景范、南汉宸等，了解到边区政府的选举制度和行政制度，还对前国民党员张敬斋、王德安、刘绍庭等人进行了访谈，福曼发现边区各级政权中存在不少前国民党员，如张敬斋既是女校校长，又是绥德县政府委员；前国民党保安处长高松章（Kao Swy-chang）既是商人，又是地方参政员。为考察边区的选举过程，福曼到延安某村庄参加了地方参议会的选举大会，聆听了各位候选人的发言后，福曼认为这次选举跟“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保护下的遍布华北和华中的15个抗日根据地的9000万人参加的选举一样。”[8]他进一步指出，“边区政治的进化，从内战时代的共产主义到代议的民主制度，也许是边区的历史最重要的特色。”[9]有关经济制度，福曼认为边区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的经济，包括变工队和合作社制度。为便于理解，他将边区变工制度与美国农民的收获团进行类比，指

1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2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3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 页。
4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 页。
5 哈里逊·福尔曼，熊建华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9 页。
6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9 页。
7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0 页。
8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6-100 页。
9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8 页。

出，这种组织形式是由若干乡邻自愿联合起来，交换劳动力，轮流为各家耕种、收获，最后进行分配[1]。有关合作社制度，福曼侧重介绍边区在工业方面取得的的成就。在共产党军队到达陕北前，这里完全没有工业，但是现在“纽扣、陶器、弹药、电花栓、电池、电线、皮鞋、牙刷和肥皂——都在那些不值得提名字的工厂中制造。”虽然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差别很大，“但是，就一个区域而言，这未来的增产可以说是巨大的，这是共产党努力的结果。”[2]此外，福曼还强调了他的重大发现，除人民进行生产劳动外，边区政府机关所有人员、八路军官兵都参与生产。“生产运动不限于人民，军队也参加的。这或者是八路军独有的特色。”[3]通过详细考察，仔细研究，福曼发现，边区实行的变工队和合作社制度，在反对日伪封锁、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使边区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在考察中，福曼还对共产党的文化宣传方式——“活报纸”极为赞赏。由于边区缺乏书刊报纸，共产党人采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秧歌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虽然，在战争期间，这种宣传伎俩已经司空见惯。”并且，“若以一流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业余的，就像落满灰尘的米饭一样乏味。但是，若以社会影响来衡量，他们可能比一百个南太平洋国家更有冲击力。”[4]通过考察，福曼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们不像苏联人那样赞成财产的集体所有权。”“他们是中国抗日斗争的英雄。”[5]

福曼的《北行漫记》不带偏见地记录了他对国共两党不同的观感，客观、详实地描写了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其领导下的军民抗战。通过考察，福曼“对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了具体的了解。”[6]

三、多重史料考证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

福曼的《北行漫记》一经出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美、英主要报刊争相推荐，该书一跃成为美国畅销书，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斯诺、史沫特莱、欧文·拉铁摩尔等人都给予其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也积极组织人员进行翻译，该书出版次年，中国国内就出现了中文译本，但该中译本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和禁售[7]。麦卡锡时

1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60 页。
2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4-75 页。
3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0 页。
4 罗斯，比利：《倾斜的马蹄铁》（Rose, Billy,“Pitching Horsehoes”），《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1949 年 6 月 20 日，第 6 页。
5 《哈里森·福曼的<北行漫记>》（“Report From Red China By Harrison Forman”），《晚星报》（Evening Star）. 1945 年 3 月 18 日，第 C-3 页。
6 Israel Epstein, I Visit Yenan（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3）, p.90.
7 重庆市图书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公会：《关于禁售<北行漫记>、<闻一多传>书刊给各图书会员的通知》，1947 年 11 月 7 日，重庆档案馆藏，宣传处档案，0085-0001-0037-2000-0039，第 84 页；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四川省政府：《关于查禁<向群众学习> <北行漫记>等书刊至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的代电、训令》，1947 年 12 月，重庆档案馆藏，宣传处档案，0055-0002-0038-2000-0159-000，第 159 页；北碚管理局、四川省政府：《关于查禁<向群众学习>、<北行漫记>、<学什么>书籍的训令》，1947 年 12 月，重庆档案馆藏，宣传处档案，0081-0004-0598-4000-0033-000，第 33-35 页等。

代，由于《北行漫记》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记录，福曼一度被指控为共产党人[1]。实际上，福曼“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2]，这正是福曼不同于同时期其他观察者的地方，也是其著作《北行漫记》的巨大价值所在。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的出版，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休梅克对《北行漫记》的评价，认为该书虽“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记实文献”。但“含有许多‘愚蠢而不准确’之处”[3]。过去，由于缺乏海外史料的佐证，休梅克对《北行漫记》的否定评价极大地影响了学者们的看法，使不少人忽视了福曼的作用和该书的史学价值。经过认真研读相关档案史料，发现在评述《北行漫记》时，休梅克所引材料存在张冠李戴之误，其对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的评价也有不少错误。

1、《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材料失当考析

肯尼斯·休梅克的著作《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是研究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必读著作，其流传颇广，影响颇大，引用的材料颇为丰富。经过查证福曼档案、《摩根索日记》、董显光著作、林迈可和谢伟思回忆录以及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发现肯尼斯·休梅克在评述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时，无论是所引用的材料还是发表的评论，都存在不当之处。

首先，休梅克所引用的批评福曼不注重事实的材料[4]中，存在“张冠李戴”之误。如他所引用的摩根索的评价，是对福曼藏区考察之后出版的《穿越藏区禁地》（*Through Forbidden Tibet*）一书进行的否定，而非《北行漫记》。《穿越藏区禁地》是福曼根据其30年代藏区考察经历成书的，对于该书，《摩根索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我（指摩根索）见到了他（指福曼）曾经居住过的那个传教士家庭，他们说他从来没有离开拉卜楞寺超过二、三十英里。他向外发出的一些材料中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他对正确的事实或者获得足够的背景知识去真正了解事情不感兴趣。”[5]据此，摩根索认为福曼不注重史料的准确性。很明显，《摩根索日记》中这一段记载是作者对福曼著作《穿越藏区禁地》一书进行的否定而非1945年出版的《北行漫记》，因此休梅克引用这段材料来评价《北行漫记》是不恰当的，这是休梅克在材料使用方面的“张冠李戴”。

再如休梅克在提及福曼的电讯稿和《北行漫记》一书中，含有许多“愚蠢而不准确”之处时，引用的材料是谢伟思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但据考证，谢伟思在评价福曼时原文如下，“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一个美国人公然承诺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其明智和谨慎态度方面都是值得怀疑的。”[6]显然，休梅克对谢伟思的证词理解有误，谢伟思的这

---

1 《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太平洋关系学会（第二部分）》（HRG-1951-SJS-0008，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art 2），1951年8月9日，第653—654页。

2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3 肯尼斯·休梅克，郑志宁等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4 肯尼斯·休梅克，郑志宁等译：《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53页。

5 亨利·摩根索：《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一卷（Morgenthau，Henry， Morgenthau Diary（China）V.1），美国政府出版局，1965年，第1330页。

6 《中国灾难的线索》，《委员会印刷品和其他出版物》（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Committee Prints and Other Publications，Vol.II.CMP-1970-SJS-0009），第2卷，1970年1月26日。

段发言是针对福曼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承诺美国将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大规模援助的说法，而非评价福曼电讯稿，更非评价其著作《北行漫记》，这是休梅克在论述方面的“张冠李戴”。1977年，谢伟思在接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口述历史中心采访时，称赞《北行漫记》是一部“激动人心的”[1]作品，进一步肯定了《北行漫记》的史学价值。

其次，休梅克在评价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时存在材料来源不明、查无实据的错误。休梅克在书中引用了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对福曼的否定评价，但并未标明材料出处，也未阐述林迈可说法的缘由。经多方查证林迈可夫妇的著作《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和《延安情》[2]以及林迈可发表的电讯报道，均未发现其中有对福曼的批评与否定。休梅克随意引用林迈可的话而不标明出处，经查证又查无实据，这是其治学不严谨的表现。但这种说法已经影响了不少学者对福曼及其著作的看法和态度，急需予以更正。

再次，休梅克在材料中引用了董显光的说法，“福曼经常写自己未看到或未感觉到的事情，不注重事实”[3]，这种说法缘何而来，董显光在书中并未给出理由。在仔细研读董显光回忆录《董显光自传：报人、外交家与传道者的传奇》及其著作《发稿地：中国》后，也未找到作者对福曼否定评价的依据。根据其他相关史料，董显光对福曼的看法可能受到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科科长沈剑虹的影响。沈剑虹曾认为福曼的《穿越藏区禁地》一书都是凭空捏造[4]，虽属夸大其词，但沈剑虹对福曼的第一印象自然影响了董显光。更重要的是，随着战事的推进，抗战后期的国民党受到越来越多外国驻华记者的批评，虽然福曼并不直接支持共产党，但在重庆的所见所闻使他开始反蒋。[5]《北行漫记》一书出版后，福曼不仅成为不受国民党政府欢迎的人，还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6]，其著作《北行漫记》也被国民党政府多次下令查禁和禁售。[7]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对福曼的看法显然受到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与美国记者交恶的影响，因此，董显光刻意否定《北行漫记》的史学价值。

---

1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口述史：罗斯玛丽·列文森1977—1978年采访，中国系列 》（John Stewart Service，oral history interview conducted by Rosemary Levenson in 1977-1978，China Series，BANC MSS 82/106 c.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口述历史中心。此处引文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口述历史中心的同意。

2 林迈可著，杨重光、郝平译：《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李效黎，肃宜译：《延安情：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可及其夫人李效黎的抗日传奇》，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版。

3 董显光：《发稿地：中国：中国与世界新闻关系的开端》（Hollington Kong，Dateline：China：the beginning of China’s pres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罗科伯特出版社，1950年，第245页。

4 哈里森·福曼：《穿越藏区禁地》（Harrison Forman，Through Forbidden Tibet），格林朗芒公司，1935年，第18页；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西藏，中国，1932年4月》（Harrison Forman Diary，Tibet，China，April，1932）；沈剑虹：《抗战后期重庆的外国记者》，《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5 保罗·法兰奇，张强译：《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83页。

6 查理斯·A·杨：《仅仅是避难所吗？》（Young，Charles A，“Only Asylums?”），《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3-1950)），1946年11月9日，第277页。

7 重庆市图书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公会：《关于禁售<北行漫记>、<闻一多传>书刊给各图书会员的通知》，1947年11月7日，重庆档案馆藏，宣传处档案，0085-0001-0037-2000-0039，第84页；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四川省政府：《关于查禁<向群众学习> <北行漫记>等书刊至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部的代电、训令》，1947年12月，重庆档案馆藏，宣传处档案，0055-0002-0038-2000-0159-000，第159页；北碚管理局、四川省政府：《关于查禁<向群众学习>、<北行漫记>、<学什么>书籍的训令》，1947年12月，重庆档案馆藏，宣传处档案，0081-0004-0598-4000-0033-000，第33-35页等。

通过查证肯尼斯·休梅克著作《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所引材料的出处，证实休梅克在《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评价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时问题颇多，其中尤其是材料引用方面，有些材料无据可查，有据可查的材料又多存在“张冠李戴”之误。因此，休梅克对福曼及其著作《北行漫记》的否定评论仅余董显光的材料支撑，极其单薄，加之董显光的立场，致使休梅克论据不够充实，论证不够严谨，因此据此无法否定《北行漫记》的史学价值。

既然休梅克在《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评价《北行漫记》时，所引用的材料无法否定《北行漫记》的史学价值。那么，福曼的《北行漫记》是否可以作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呢？《北行漫记》中所记述的内容是否真实客观呢？这不仅需要与福曼档案资料进行对照，还需要参考同行者著作、当事人回忆录等一系列史料进行对比分析。为了让被忽视多时的《北行漫记》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并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该书的史学价值，有必要运用多重史料考证《北行漫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

2、多重证据考察《北行漫记》的史料价值

部分学者之所以对福曼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存疑，多是由于福曼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出版的著作《穿越藏区禁地》一书。该书是根据福曼对中国青海、甘南藏区的三次考察成书的，书中记录了不少普通人无法理解的神秘的宗教仪式。当时，受种种条件所限，绝大多数人未曾踏足藏区，更谈不上对宗教仪式的了解，如沈剑虹就认为该书凭空捏造[1]，实际上这是沈剑虹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做出的评价，缺乏客观依据。将《穿越藏区禁地》书中内容与福曼日记、福曼发表的电讯报道相对照，发现有部分内容未在日记中记载，因此该书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可能存疑，但并不能据此全面否定福曼及其所有著作。《北行漫记》是福曼根据其 1944 年的考察日记整理成书的，为考证该书的史学价值，验证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特将福曼日记与《北行漫记》进行对比研究，以求证福曼《北行漫记》内容的真实性。

（1）《北行漫记》内容与 1944 年福曼日记对比研究

由于日记记录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事后的追忆，因此所记内容比较准确。福曼从考察藏区开始，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从 1932 年开始直到 1978 年去世，福曼留世的日记共有 62 本，其中有关中国的日记多达 21 本，除 2 本记录藏区考察的日记，1 本人物访谈笔记外，其余均为福曼在中国各地的考察日记。在 21 本有关中国的日记中，有 6 本是其 1944 年 5 月到 10 月西北之行的调查日记，总计 300 多页，详细记录了福曼对西安、克难坡、陕甘宁边区及晋绥边区的考察及其对主要人物的访谈。详见下表：

表一：福曼 1944 年 5 月到 10 月的西北考察日记[2]简要内容

1 哈里森·福曼：《穿越藏区禁地》（Harrison Forman，Through Forbidden Tibet），格林朗芒公司，1935 年，第 18 页；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西藏，中国，1932 年 4 月》（Harrison Forman Diary, Tibet, China, April, 1932）；沈剑虹：《抗战后期重庆的外国记者》，《重庆文史资料》（第 31 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 页。

2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5 月—6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May-June.1944）；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6 月—7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June-July.1944）；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6 月—8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June-August.1944）；哈里森·福曼：

考察时间	考察地点	访谈人物（按日记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整理）	备注
1944 年 5 月 17 日——6 月 13 日	宝鸡、西安、克难坡、延长油田、南泥湾、延安	罗泽闿、胡宗南、阎锡山、王震等；记者团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招待	
1944 年 6 月 14 日——7 月 13 日	杨家岭、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延安医学院等	李伟（Li Wei 音译）、吴满有、刘满（Lo Man 音译）、前日本间谍、林迈可、马海德、贺龙、叶剑英、李鼎铭等	
1944 年 6 月 24 日——8 月 16 日	杨家岭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毛泽东访谈录为打印版
1944 年 7 月 13 日——9 月 2 日	杨家岭、兴县	聂荣臻、陈毅、参议员代表、民兵英雄、吕正操、陈漫远	
1944 年 9 月 2 日——9 月 28 日	离石、马坊、汾阳、协和堡	王长江；伪军俘虏、日军俘虏；采访民兵英雄	记录战况以及八路军战术：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及其成就等
1944 年 9 月 23 日——10 月 10 日	娄烦、延安	采访娄烦之战中抓获的日军战俘；再次采访朱德	记录袭击娄烦战斗后返回延安

日记作为一手史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上表可以看出，1944 年的 6 本日记以时间为顺序，重点记述了中外记者西北调查团离开重庆后一路的采访观察：记者团于 1944 年 5 月 17 日下午 3 点从重庆乘飞机北上到达宝鸡，转乘火车抵达西安参观采访。5 月 21 日，福曼一行从西安经合阳、韩城、宜川东渡黄河，到达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驻地——山西吉县克难坡，在克难坡采访结束后，5 月 31 日，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沿途参观了南泥湾、三五九旅、延长县油田后，于 6 月 9 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1]，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参观采访。由于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使中外记者开始怀疑国民党报刊宣传的真实性，7

《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6 月—9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June-September.1944）；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September.1944）；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 月—10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September-October.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1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5—6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May-June，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月上旬，记者团领队谢保樵、邓友德要求全体记者撤离延安，返回重庆，遭到福曼等几名外国记者的反对。在谢保樵率领全部中国记者及夏南汗神父离延返渝后，福曼一行冒着生命危险东渡黄河，于 8 月 30 日抵达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山西兴县。9 月 6 日，从兴县出发，穿过日军封锁线，到达晋绥八分区所在地交城县，亲临抗战前线进行参观采访，先后在汾阳、静乐等地观摩了晋绥边区军民合作抗日的战斗实况。9 月 25 日离开交城，观摩了攻打娄烦镇据点的战斗后，经岚县、临县返回兴县[1]。10 月 2 日福曼等五名外国记者重返延安，并于 10 月 10 日采访了朱德[2]后于 10 月下旬返回重庆[3]，之后日记再无记载。

在福曼日记中，访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笔记最多，每位领导人访谈笔记多达十几二十页，如日记中 1944 年 8 月 16 日访问周恩来的记录达 14 页之多，福曼还于 1944 年 7 月 19 日，8 月 10 日两次采访了毛泽东。从福曼提交给毛泽东的问题清单来看，早在 1943 年 9 月，福曼就悉心整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督委员会上对中共的指责，清单中还包括陕西省政府官员祝绍周、罗泽闿对中共的非议，共计 9 条，福曼还就外界感兴趣的问题向毛泽东做了提问，如国民党政府代表人民意志吗？如何评价蒋介石、中共与苏共的关系等等。[4]除访谈领导人外，福曼还采访了各行各业的英雄，其中劳动英雄吴满有的记录最多，多达 10 页。日记中还描写了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成员开展的反战宣传活动以及边区的外国人马海德和林迈可等。福曼还参加了延安附近一个村庄的参政会联席会议，福曼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民主既不同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不同于前苏联的民主，中共通过“三三制”原则保障所有人参政议政的权利。日记中所记录的这些内容都被福曼在《北行漫记》一书中专章予以记叙与书写。

将《北行漫记》所述内容与 1944 年福曼的 6 本日记相对比后发现，《北行漫记》的内容与福曼日记所记日程高度吻合。为验证《北行漫记》具体内容与福曼日记是否相一致，特选取 1944 年 6 月 14 日——6 月 30 日福曼在延安的考察日记与《北行漫记》内容进行对比。在日记中，福曼对其考察地点、访谈人物做了详细记录，详见下表：

表二：福曼 1944 年 6 月 14 日——6 月 30 日延安考察日记[5]简要内容

日期	考察地点	访谈对象	备注
6 月 14 日	杨家岭	李伟（Li Wei 音译）、吴满有、	耗时两日，对吴满有

1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10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September-October，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2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September，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10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September-October,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3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September，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10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September-October,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4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6—8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June-August，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5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6—7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China，June-July，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刘满（Lo Man 音译）等劳动英雄	的采访极为详尽
6 月 16 日	杨家岭	日本间谍、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	
6 月 17 日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延安医学院	林迈可、马海德、王平（Wang Ping 音译）	王平为延安医学院院长
6 月 18 日	杨家岭	贺龙	
6 月 19 日	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电台	范元新（FanYuen-hsing）、董玉新（Tung Yu-hsin）	范元新发明了切纸机，董玉新为火夫英雄
6 月 20 日	兵工厂、军械库	郝希英（Hao Hsi-ying）、赵占辉（Chao Chan-hui）	
6 月 21 日	皮革厂、造纸厂		记录工厂基本情况，工人的一天
6 月 22 日	杨家岭	叶剑英	叶剑英作军事报告
6 月 23 日	杨家岭	李伯钊	李伯钊为杨尚昆妻子
6 月 24 日	文艺界	吴伯萧、艾青、王实味	延安文艺界代表
6 月 26 日	杨家岭	日本间谍、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	继续采访前日本间谍
6 月 27 日	杨家岭	高岗	回顾国共内战历史
6 月 28 日	杨家岭	马玉章、马海德	介绍两人情况
6 月 29 日	杨家岭	李鼎铭	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
6 月 30 日	吴满有家	吴满有	再次拜访吴满有

由上表可知，1944 年 6 月 14 日起，中外记者团陆续参观延安及附近的工厂、学校，访问有关机关及个人。上表中福曼的考察行程与《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根据陕西省档案馆原始史料整理出版）一书中中外记者团的行程记录相吻合。再将福曼 1944 年 5 月——6 月日记记录[1]与福曼著作《北行漫记》内容相对照，发现日记所记载的考察地点、会见的人物、采访对话与《北行漫记》第一章到第八章的内容是相吻合的。日记本上多处有红笔勾划的痕迹，意谓福曼在选材入书时有所删减。其中有一页被白纸覆盖，白纸上用红笔手写了几个人物名字来做掩饰。根据前页显示，覆盖内容可能是蒋纬国与中外记者喝酒的场面描述。因为蒋介石不允许军中饮酒，故此事未在《北行漫记》中体现，而福曼日记中的相关内容也被隐去。

经过多次对比分析，证实福曼在《北行漫记》一书中所记述的内容是根据福曼 1944 年

1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5—6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China，May-June，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

实地考察的日记记录整理成书的，而非凭空捏造。《北行漫记》一书中所有内容不仅可以在福曼日记中找到对应的记录，而且内容也是完全相同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日记作为一手史料，虽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在记录日记时，作者的主观思想会对日记的客观性造成影响。综观福曼日记，作者并未采用高谈阔论、抽象的说教来记录其考察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也未将主观认识记录在内，而是采用生动具体的事实、客观真实的数据以及采访对象的原话来说明外界关心的话题，从而保证了《北行漫记》所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但是，仅仅通过福曼日记查证福曼著作《北行漫记》内容的真实客观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查找福曼同行者的著作、当事人回忆录以及当时的报刊资料来进行比较研究。

（2）《北行漫记》与同行者著作的比对

不同于 20 世纪 30 年代福曼藏区考察多孤身一人的情形，1944 年的西北考察人数较多，从重庆出发时，中外记者团共计 21 人，这 21 人参观了国民党统治区，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所有中国记者和夏南汗神父返回重庆后，福曼和美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莫里斯·武道（Maurice Votaw)、苏联记者 N·普金科以及国民党随员张湖生又赴晋绥边区考察并近距离观战。

西北考察结束后，中国记者中只有“国统区新闻记者”身份的赵超构，站在“国民的公正观点”的立场上，出版了《延安一月》一书，该书被周恩来比作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赵超构对延安进行了一些“轮廓的报道”、“忠实的介绍”和“自由的批评”[1]。外国记者中出版的著作较多，福曼同行者冈瑟·斯坦（Guenther Stein）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详尽而公正地报道了“大半个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里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实践”，向人们揭示了二战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红色中国的政治发展决定着亚洲的未来，美国人民最后终将对红色中国的目标、斗争和成就表示赞赏。”[2]福曼同行者爱泼斯坦在考察途中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生动翔实的通讯报道，随后出版了《我访问延安：1944 年的通讯和家书》一书，成为中国抗战新闻传播史上重要的文献。而一向被国民党认为政治上可靠的武道，是福曼的另一位同行者，他在考察结束后发表了《我从陕北回来》一文。虽然囿于身份，武道只写了近两千字，但也客观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取得的成就。这些同行者出版的著作，由于作者考察的侧重点不同，因此成书时详略不一，但无一例外，他们都对国统区与共产党辖区做了真实的描写，并对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进行了客观而详实的报道。

第一，经过比较分析发现，除强烈反共的夏南汗神父和避而未谈国统区的武道外，其余三位美国记者斯坦、爱泼斯坦和福曼，对国共两党观感相同。当时，国民党当局认为外籍记者在边区若不久留，所见所闻都是虚伪的表演，“不能得共党措施之真认识”[3]。事实上，虚伪的表演不在边区而在国统区，记者们所经之处的乞丐预先被赶走，西安青年劳动营受访者

1 赵超构:《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页。
2 冈瑟·斯坦，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
3 《招待外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4），案卷号：291，第 58-61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提前接受培训，所到之处欢呼的人群、豪华的欢迎宴会等等都是虚伪的表演。早在中外记者西北调查团出发前，国民党当局就让西安青年劳动营“准备外记者往访时向各学员作自由谈话。”[1]记者们到达西安后提出要去参观劳动营时，“西安的官员嗫嚅支吾了两天才答应下来。”[2]，又经过两天的“精心准备”，记者们看到了劳动营青年们拙劣的表演。此外，在福曼及其同行者的报道中，夹道欢迎的人群、装样子的群众集会、愈来愈盛大的宴会是国统区每个城市接待记者们的标配。相反，在进入边区后，记者们感觉像到了新的天地。福曼说“我们一路经过了过分的庆祝和欢迎，现在从边门踏进了中国共产区是有点反常的。”[3]“中共知道实事求是的重要，有效率，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诸事毫无重复，亦丝毫未将时间浪费于举行民众大会，演说，或摇旗呐喊，张贴标语等欢迎之俗套。”[4]爱泼斯坦则重点描写了毛主席对记者们的招待，“我们和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吃的几顿饭，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一共不超过两三桌，交谈很方便，饭菜也简单。”[5]斯坦则发现，“害羞的、友好的微笑，陌生的握手以及简单得令人不能置信的招呼，是共产区对我们的欢迎。没有行通常的那种鞠躬礼，没有交换名片，也没有严肃的和含糊其词的客套。我们以前每经过一个地方。都有盛大的招待会、集会和欢呼的群众列队游行。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遇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此我们感到困惑，也感到轻松。”[6]从福曼及其同行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边区，招待外籍记者时虽略显冷清，但使人轻松；饭菜虽然简单，但营养可口。[7]“武道和福曼，他们在来这里之前不可能是赞成共产党的。”在边区考察时，他们看到，“这里没有‘演戏’和繁文缛节，只有说和做。无论是领导人还是人民，对我们都是开放的、直接的和友好的。领导人平易近人，军队和领导人之间并非从属关系，他们自由地混合在一起。”这里“没有重庆的跟踪、宪兵及讨好”，“没有乞丐、没有贫穷”、“没有失败情绪、畏战情绪，只有信心。”“到处强调民主”[8]。根据这些史料可知，在招待记者们时，国统区提前进行排练以备记者访问，而边区没有官场礼节，没有形式主义，只有实干。历时五个月的边区采访，福曼与同行者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确信无疑。

第二，福曼及其同行者都通过客观真实的叙述驳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虚假宣传。如无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各级政府，均诬陷边区种植罂粟，说“边区三分之一最好的土地上都种植着罂粟。”[9]经过考察，福曼证实“余等留居边区之时，从未见共党当局或私人有种植罂粟之嫌，乃至要之行踪或鸦片之贩卖，亦均未见有任何踪象。”[10]但该电讯稿在发往国外报刊时，

1 《招待外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4），案卷号：291，第58-61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2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4 《福尔曼八月三日自延安拟发纽约前锋论坛报电》，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93，第177-180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5 爱泼斯坦，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6 冈瑟·斯坦，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7 冈瑟·斯坦，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8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pp.519-520.
9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10 《福尔曼七月二十九日自延安拟发雪梨电闻报电》，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91，第109—110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福曼的这句话被国民党新闻检察官全部删掉。为此，福曼在其著作《北行漫记》中再次澄清，“可以肯定一点：在共产党地区旅行的 5 个月中，我没有看见一丝一毫鸦片的痕迹。”[1]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斯坦与爱泼斯坦的肯定，斯坦写道，“惟绝未发现丝毫罂粟之踪象。”（读到西安消息，“不胜讶异。此项消息完全无稽。宜川禁烟督察给余作为证明之共党鸦片出口正式单据，兹在此间证明纯为伪造者。”）[2]但这种声明又被国民党新闻检察官全部删掉。斯坦只能在其著作《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再次澄清，“我们从一个出乎中共意料之外的方向到了边区，因此通过了那些‘人迹罕到的地方’。在西安，据陕西省主席说，出产大量鸦片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每日每时都在寻找罂粟。王震一再向我们的国民党同事和我们提出，我们自己可以随便花多少时间，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找罂粟。没有人接受他的建议。无论如何，我们走过的地方已经够多了，我们来时也走过了山区——它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我们全团的人常常待在-一起，没有人看见过半棵罂粟。”[3]爱泼斯坦也肯定地说，“记者团走了一条谁也没指望他们会走的路线，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外国记者谁也没有看到一株罂粟，更不用说‘繁茂壮观’了，而且这些外国记者一分钟也未离开过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和官方成员。尽管记者团经过的许多地方都是西安和克难坡当局事前都向他们保证那里种有鸦片，可是记者团中没有一个中国成员在此地逗留时说过，他曾看见过种有罂粟。许多团员，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在谈话过程中说，他们未能找到罂粟，尽管全团人员因为原先听说的情况而对这件事十分注意，不会放过小小一点迹象。”“根据这些事实和考虑，本记者愿以本人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明白无误地声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国和国外谈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正在种鸦片的罪状都是无稽之谈。”[4]

再如，当时在国民党的官方舆论上，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没有伤兵、没有俘虏”[5]等言论充塞报刊。为了检验国民党政府的说法，福曼、爱泼斯坦和武道不仅考察了陕甘宁边区，而且亲赴抗战前线观战。考察结束后，外国记者们对中共取得的成就交口称赞，对八路军和人民之间的合作抗日惊叹不已。其中，福曼在《北行漫记》中专章介绍了共产党军队的战绩，“尽管八路军、新四军兵力不到全中国抗日兵力的 1/15，然而共产党军队却要与 49.5%的在华日军以及约 80 万伪军中的 90%作战（世间闻所未闻）。在 7 年抗战中，共产党军队作战 9.2 万次以上，日伪军死伤 110 万，15 万敌人被共产党军队俘获。”[6]《泰晤士报》也指出，“1944 年 3 月，64%的在华日军与共产党军队作战。”[7]这并

1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2 《史坦因七月二十八日自延安拟发伦敦新闻纪事报电》，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91，第 111-112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 冈瑟·斯坦，马飞海等译：《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 页。

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张扬等译：《我访问延安：1944 年的通讯和家书》，新星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9-71 页。

5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2009 年 3 月，第 535 页。

6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 China，September.1944），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学院图书馆馆藏；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亨利·霍尔特公司，1945 年，第 125 页；另穆欣著《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92 页和潘世伟著《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62 页中，中共抗击 45.9%的日军是错误的，根据哈里森·福曼原著，应为 49.5%。

7 《中国共产党观察》（“The Chinese Communist View”），《泰晤士报》（Times），1944 年 12 月 18 日，第

非福曼一人之言，经过实地考察，“差不多所有的美国观察家都接受了中共对他们自己战斗的看法。”[1]除了肯定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外，福曼还近距离观看了八路军袭击汾阳日军的斗争，“我们坐在城墙上……很清晰地听到枪声大作，看见城里的一片火光。随后，忽然一下子，大火窜了上来——那是火柴厂。火焰发出蓝、青、橘红各种颜色，因为化学品燃烧的原故。”[2]“他们杀光了据点里的日本守军，只带回来两个受伤的俘虏。”[3]福曼激动地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4] 与福曼同行的记者爱泼斯坦、武道也证实了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在发给《纽约时报》的通讯中，爱泼斯坦写道，“我们目睹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连续三个晚上攻击这个城市（汾阳）的郊区，烧毁了火车站、机场、房屋、电站和一家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一英里半处的一座碉堡（指协和堡），击毙十名日伪军，俘虏两名日军和几名伪军以及在这里藏身的伪镇公所全体人员。” [5]时任国民党宣处部顾问的武道在其发表的《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则写道，“关于十八集团军是否在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见了这样的战斗，看见了受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的敌军和伪军谈过话，就在他们刚刚被俘之后的几小时里。”[6] 武道不仅公开发文，而且私下对谢伟思说，“得到人民支持的共产党人在进行积极的抗日斗争，他们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共产党人是不可能被国民党打垮的。”[7]福曼及其同行者对边区的印象一致，与国民党人所描绘的景象截然相反。由于福曼等记者的宣传报道，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和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英勇斗争的事迹以及被武装的根据地人民奋起抵抗的情形。

第三，在边区考察时，美国观察者发现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早在《西行漫记》中，埃德加·斯诺就曾指出，“八路军和人民如鱼得水”[8]。在晋绥边区考察期间，福

---

5 版。这篇报道也是福曼所发，但根据叶剑英的报告，中共抗击了 64.5%日军。

1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Theodore H. White and Annalee Jacoby, Thunder out of China），威廉斯隆联合公司，1946 年，第 210 页。

2 《在遥远而又广泛的前线作战》（“Operations on a Far-Flung Front”），《泰晤士报》（Times），1945 年 1 月 25 日，第 5 页；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亨利·霍尔特公司，1945 年，第 232 页；《盟邦友人在汾阳前线》，《抗战日报》，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第四版。

3 哈里森·福曼：《哈里森·福曼日记，中国，1944 年 9 月》（Harrison Forman，Harrison Forman Dairy：China.September.1944）；《在遥远而又广泛的前线作战》（“Operations on a Far-Flung Front”），《泰晤士报》（Times），1945 年 1 月 25 日，第 5 页；《攻克协和堡之战》，《抗战日报》，1944 年 10 月 27 日第四版。

4 吕正操著，《吕正操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 8 月版，第 370 页；罗贵波：《革命回忆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年 4 月，第 204 页；尹均生主编，《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8 月，第 247 页。

5 《有关游击队战斗的延安报道》（“Yenan Reports on Guerrilla Warfare”），《每日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情报档案（Daily Report. FBIS-FRB-44-232 ），1944 年 9 月 26 日，第 ND5 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我访问延安》（Israel Epstein, I Visit Yenan），外文出版社，2003 年，第 94 页。

6 武道，《我从陕北回来》，齐文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大众书店，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第 19-20 页。

7 《美亚杂志：中国灾难的线索》，第 2 卷（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Vol. II），《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1970 年，第 1115 页。

8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纽约，1961 年，第 188 页。

曼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说法，“共产党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1]在抗战前线观战后，他撰写了《军民合作目击记》[2]的通讯稿发往《泰晤士报》，赞不绝口地说八路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3]福曼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同行人员爱泼斯坦和武道的证实，“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都密切配合”[4]，“如果敌人出动了，附近村子的人立刻从侦察员那里得到消息。他们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食藏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设好陷阱。日军活动的细节常常在他们还没实际行动之前就从据点里的厨子、挑水者甚至为八路军工作的伪军那里传递出来。”[5]武道在其《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写道，“老百姓用各种的方式和军队合作，帮助看护和撤退受伤的士兵。”[6]福曼、爱泼斯坦、武道三位记者的报道都表明了“前线的八路军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7]日本人也发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友好关系。“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8] “中共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敌人的武装力量并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层层的民兵和拥护者。”因此，“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9]

同行者的著作与报道和福曼的《北行漫记》内容上相互补充，相互佐证，进一步印证了福曼著作《北行漫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福曼著作及其同行者作品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是当时及后世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重要的文献资料。

（3）《北行漫记》与当事人回忆录的比较分析

福曼在西北考察中接触了很多人，既有国民党将领，也有共产党将领，还有一些翻译人员和普通群众。当时，国民党将领阎锡山、胡宗南、罗泽闿、蒋纬国等都与福曼一行有交集，他们四人中除罗泽闿外，都有日记或回忆录面世，但均未提及中外记者西北调查团。国民党方面派出领队两名：谢宝樵、邓友德，随行人员四名：魏景蒙、张湖生、杨西昆、陶启湘，他们均未留下回忆录；福曼考察中采访的共产党领导人多有记录。中共主要领导人年谱中均

1 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45年，第203页。

2 《中国游击队在战斗》（“Chinese Guerrilla War”），《泰晤士报》（Times），1945年1月26日，第5页。

3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Volume VI，p.717.

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我访问延安》（Israel Epstein, I Visit Yenan），外文出版社，2003年，第95-96页。

5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我访问延安》（Israel Epstein, I Visit Yenan），外文出版社，2003年，第86页；《盟邦友人在汾阳前线》，《抗战日报》，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第四版；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页。

6 武道，《我从陕北回来》，齐文编，《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大众书店，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第19页。

7 FRUS: Diplomatic Papers, 1944, China, p717.

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天津市政协编译组：《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80页。

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天津市政协编译组：《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84页。

写明了接待中外记者西北调查团和接受福曼采访的时间，这里不再一一赘述。除共产党领导人外，接待福曼一行的人员有陈家康、徐克立、浦化人、区棠亮、李绍棠、李曙森、柯伯年、凌青、金城等，其中只有凌青、金城有回忆录问世，李曙森出版了文集，简单提及福曼等人。根据中方相关人员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了《北行漫记》所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详见下表：

表三：当事人回忆录中有关中外记者西北调查团的记录情况

姓名	作品	出版社	出版年份	页码
王　震	《王震传》	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第 131-141 页
吕正操	《吕正操回忆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第 316-332 页
陈漫远	《陈漫远传》	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 年	第 215-221 页
罗贵波	《革命回忆录》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7 年	第 194-206 页
李曙森	《李曙森文集》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第 553 页
凌　青	《从延安到联合国》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第 21 页
金　城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	第 198-218 页

据上表可以看出，凌青和李曙森回忆录中关于福曼一行的记载较少，这是因为：凌青虽然在延安接待了外国记者，并随福曼一行考察敌后抗日前线，但他作为中共早期的外事人才，接待外国记者只是凌青对外事工作的初步接触。凌青在其回忆录《从延安到联合国》一书中指出，接待美国军事观察组是其外交生涯的开始，因此重点记述了接待美军观察组的情况，而对福曼等记者的西北之行一笔带过。与福曼没有过多交集的李曙森自然着墨也不多，而且李曙森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天津大学校长，侧重高等教育研究，因此只在回忆林枫的文章中简单提及福曼等记者的西北考察。其余相关人员都大篇幅记录了福曼一行的考察，这些记录与福曼在《北行漫记》中的内容是相一致的。以福曼对地雷战的描述为例，“地雷战术进行得如此成功，……据点四周是一片地雷阵地。当我们在围城的第三天中午赶到时，问村民要不要我们的军队帮助他们攻城。‘不，不，我们自己会干的。’10 天之后，我们听见了他们自己干的消息：他们攻进了被围的据点，警备队一半被杀死，还有一半投降了。”[1]以上内容不仅得到当事人的证实，相关记载还被存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情报档案中国卷中。此外，还有《抗战日报》上发表的《盟邦友人在汾阳前线》、《攻克协和堡之战》[2]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四天三夜胜利的战斗——记汾阳协和堡的歼灭战》[3]、《湖西新闻》上发表的《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4]等相关报道也可与《北行漫记》

1 《关于八路军的延安报道》（“Yenan Reports News on 8th Route Army”），《每日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情报档案(Daily Report. FBIS-FRB-44-230),1944 年 9 月 23 日,第 ND6 页;《泰晤士报》(Times），1945 年 1 月 26 日，第 5 页； 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45 年，第 220 页；吕正操著，《吕正操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 8 月版，第 353 页等。

2 《盟邦友人在汾阳前线》，《抗战日报》，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第四版；《攻克协和堡之战》，《抗战日报》，民国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第四版。

3 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45 年，第 233 页；《四天三夜胜利的战斗——记汾阳协和堡的歼灭战》，《解放日报》，1944 年 1 月 17 日。

4 《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湖西新闻》，1944 年 3 月 27 日，第 99 期。

的内容相印证。无论是中共领导人的年谱，抗战时期的报刊资料，还是相关人员的回忆录或传记，都可以证实福曼《北行漫记》的记录不仅真实客观，而且是一份有关中国共产党党史、抗战史的重要史料。

结 语

由于《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书在国内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因此，急需指出其材料失实、评述错误之处。经过多重史料的相互比较研究证实，《北行漫记》的真实性、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可以作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抗战史的重要史料来源。正如斯诺所言，《北行漫记》“具有相当大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1]。

福曼撰写的《北行漫记》是有关共产党中国，有关八路军的客观真实的报道，“书中既有拥有足够农产品的勤劳农民，也有积极热情支持政府的工人，还有在农业生产、工业生产、教育、艺术尤其是戏剧、音乐和文学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在福曼笔下，我们既能看到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也能看到战士们积极投身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被组织起来加入民兵队伍的生动场面，还能看到在抗击日伪军方面行之有效的军民行动。”[2]福曼“用鲜活、全面、生动的语言展现了中共领导下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景象”[3]，他的记述不仅为后世留下了“第一手资料”[4]，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行漫记》出版后，国统区不少市民、学校师生争相阅读，仅以湘东边区某师范学校为例，该校老师、学生，甚至学生家长都争着抢着要一睹为快。有学者将《北行漫记》誉为沙漠中的“一滴口水”，黑暗中的“一根火柴”，认为该书唤醒了国统区人民“昏眩麻木的灵魂”[5]。在美国，许多美国人正是从《北行漫记》一类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以及八路军的抗日实况[6]。当时在美国读中学的冀朝铸也是受福曼塑造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吸引而改变其人生目标，走上外交道路的。[7]意大利汉学家鲁索和克劳蒂亚夫妇也认为《北行漫记》是一本很不错的书。[8]史沫特莱甚至认为福曼的《北行漫记》“超出斯诺所有的作品”，“可以当做史料丰富的教本读，给研究现在中国内部纠纷的人一个清楚的轮廓。”[9]正如《泰晤士报》评价的那样，它是“共产党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

1 《国会记录合集》(Congressional Record Bound - Congressional Record)，https://congressional.proquest.com/congressional/docview.1951 年 1 月 8 日。

2 L.M.金：《远东》(L.M. King, “Far East”)，《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 23 卷，第 4 期，1947 年 10 月，第 609-610 页。

3 埃德加·斯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主义问题：共产党人》(Edgar Snow，“The Kuomintang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Communist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45 年 3 月 11 日，第 BR2 页。

4 哈里森·福曼：《在中国，谁和谁作战？》(Forman，Harrison，“Who’s Fighting Who in China?”)，《自由》(Liberty)，1945 年 5 月 19 日，第 17 页。

5 周费：《福尔曼<北行漫记>》，《大公報》(上海版)，1947 年 1 月 12 日，第 12 版。

6 罗斯·Y.凯恩 (Ross Y. Koen)，张晓贝、史达为等译：《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5-26 页。

7 冀朝铸：《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8 页。

8 哈里森·福尔曼，陶岱译：《北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 253 页。

9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新闻报道中的红色中国》，《新共和国》，1945 年 3 月 12 日，第 363-64 页；齐文：《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大众书店，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第 148-149 页。

[1]，它“拨开了国民党政府多年散布的层层迷雾，让大后方和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相”[2]。

由于《北行漫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出版次年，中国国内很快出现了三个中文译本：哈里森·福尔曼：《中国解放区印象记》，万歌、胡火等译，认识出版社，1946 年 4 月；哈里森·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朱进译，重庆学术社，1946 年 4 月（朱进译本还有另一版，哈里森·福尔曼：《中国解放区见闻》，山东新华出版社，1946 年 7 月）；以及陶岱译本，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北平燕赵出版社，1946 年 8 月。详见下表：

表四 目前收集的《北行漫记》的部分版本

作者	书名	译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45
Harrison Forman	*Report from Red China*		Robert Hale Limited	1946
Harrison Forman	*Ce que j'ai vu en Chine Rouge*		Paris : Seghers	1946
哈里森·福尔曼	《中国解放区印象记》	万歌、胡火等	认识出版社	1946 年 4 月
哈里森·福尔曼	《中国解放区见闻》	朱进	重庆学术社	1946 年 4 月
哈里森·福尔曼	《中国解放区见闻》	朱进	山东新华出版社	1946 年 7 月
哈里森·福尔曼	《北行漫记》	陶岱	北平燕赵出版社	1946 年 8 月
哈里森·福尔曼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熊建华	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
哈里森·福尔曼	《北行漫记》	陶岱	新华出版社	1988 年 1 月
哈里森·福尔曼	《北行漫记—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	路旦俊、陈敬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 年 4 月
哈里森·福尔曼	《北行漫记》	陶岱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6 月
哈里森·福尔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	熊建华	济南出版社	2006 年 12

1 《多种广告展示》(“Multiple Display Advertisements”),《泰晤士报》(Times), 1947 年 2 月 11 日，第 7 版。

2 高梁:《朱德同志和国际友人在一起》,《人民日报》, 1986 年 11 月 30 日，第 7 版。

曼	告》			月
哈里森·福尔曼	《中国解放区见闻》	朱进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3 月

由上表可知，改革开放以后，《北行漫记》再次受到关注和重视，先后有三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陶岱、朱进的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和湖南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熊建华和路旦俊、陈敬的新译本。五个中文版本中，万歌、胡火中译本虽出现最早，但由于受当时形势、环境的影响，读者甚少；朱进译本对原著删减过多，影响其史学价值，流传度远逊于陶岱译本；陶岱翻译的《北行漫记》内容较为完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引用率也最高，但语言偏生硬，而且文中错译之处颇多；两个新译本熊建华和路旦俊、陈敬版本内容都比较完整，但出版量均少，流传度不高。五个中文译本中，路旦俊、陈敬版本内容最完整，语言最流畅，译误也最少，有必要进行大力推广。

随着中译本的再版，该书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八路军新四军军史以及延安时期党群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来源。“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1]。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年福曼“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客观、公正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2]，使全世界人民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敌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不仅打破了国民党长期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而且展现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抗日的巨大潜力,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事业。

抗战时期，有不少外国记者记录了中国国共抗战的情况，福曼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对国共两党的观察细致入微，他对中共抗战的描述真实客观。不同于其他观察者，“福曼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周恩来语）[3]，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信念或兴趣。”（谢伟思语）[4]这不仅使福曼对中共抗战的记录更显客观，也使其对中共抗战的历史记录具有较大的史学价值。作为一名无政治倾向的观察者，他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事情的表面，基于旁观者的冷静，他还对所观察到的情况进行分析与批判。福曼清楚地认识到,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抗日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较大贡献。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缺乏先进武器装备的情况下不怕牺牲、顽强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与装备精良的侵略者斗智斗勇中展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才能。”[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牵制了大量日军，八路军“活动区域直逼日军占领城市之近郊,七年抗战之中,彼等以军事活动解放八千万中国人民于日军高压之下(此数略当中国总人口五分之一)，组成二百零十万之国民军，以及四十七万正规部队之八路军

1 管仲：《管子·形势第二》。
2 报道抗日战争的外国记者(三)：一笔客观、公正的历史史料，http://ihl.cankaoxiaoxi.com.shtml.2015 年 4 月 29 日。
3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1 页。
4 《中国灾难的线索》，《委员会印刷品和其他出版物》(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Committee Prints and Other Publications，Vol.II.CMP-1970-SJS-0009)，第 2 卷，1970 年 1 月 26 日。
5 《威尔明顿晨星报》(The Wilmington morning star)，1945 年 3 月 21 日，第 4 页。

与新四军，目下牵制全华日军百分之六十四（根据 1944 年 4 月统计），以及一百万伪军百分之九十，此种成绩，几皆以虏自日军之枪械完成之，因中央政府从未给予任何军事给养也。”[1]第二，中国未实现统一的责任在于国民党。抗战初期，福曼就曾预言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出路在于国共联合。[2]二战后期，“建立和平与合作，此于战后中国，殊为重要，因唯有如此，中国方能与战后民主世界协调前进也。”[3]当时，中共方面希望重庆派代表到延安进行详细考察并作全面的讨论与协商。[4]但国民党政府不仅对边区实施封锁，而且“企图破坏边区的抗日战争”[5]。因此，福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统一目标未完成是因为国民党的不妥协不退让的态度。[6]第三，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得到了人民强有力的支持”[7]。1944 年的西北之行使福曼清晰地认识到，“共产党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8]中国共产党是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的党，八路军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军队。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才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9 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美国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绥边区”（2019YJSB054）、山西省教育厅 2019 年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眼中的晋绥边区军民抗战 ”（2019W198）、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立项资助计划”项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镜头下的晋绥边区军民抗战”（5）的结题成果。

姓名：张发青

单位：南开大学博士

职称：副教授

电话号码：15935803841

电子邮箱：369987159@qq.com

1《福尔曼八月一日自延安拟发读者文摘电》，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93，第 146—156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 哈里森·福曼：《地平线猎人》（Harrison Forman，Horizon Hunter），美国国家旅行俱乐部，1940 年，第 183 页。

3《福尔曼八月一日自延安拟发读者文摘电》，国民党宣处部，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93，第 146—156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 《美国国会听证会记录，太平洋关系学会，第 7 部分》（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art 7，HRG-1952-SJS-0015），1952 年 1 月 31 日—2 月 2 日。

5 《威尔明顿晨星报》（The Wilmington morning star），1945 年 3 月 21 日，第 4 页。

6 《有关中国统一议题的空中辩论》，国民党宣处部，1945 年 2 月 24 日，全宗号：七一八（5），案卷号：86，第 46 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 弗雷德里克·怀特：《重庆抑或延安：在中国面前》（Frederick Whyte，“Chungking or Yenan：Before China”），

《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第 19 卷第 2 期，1946 年 6 月，第 199—202 页。

8 哈里森·福曼：《北行漫记》（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亨利·霍尔特公司，1945 年，第 213 页。

东北军将领的“各自为义”与分道扬镳：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探讨

罗正壮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引言

目前学界对于奉系、东北军和西安事变的研究，对于主要人物（如张作霖、张学良和王以哲等）及主要事件关注较多，研究成果也较为集中。[1]长期以来对具体历史人物的研究或被层层遮蔽而不易察觉，但对一个群体或集体的考察来说，不可否认对个体性挖掘存在着一定限度的“磨灭”和阻碍，但却能得“聚沙成塔”之效果，而能“俯瞰”其较为明显的变动轨迹，尤其是对本来不甚显露于记载中的人物，这或许是“中间理论”在此类群体研究的一个借用。在张学良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光环下，要了解次于其影响但为张所依仗的东北军将领，就不能忽略对该文官将领群体进行整体的钩沉，才能认识这支力量在西安事变以及之后的局势演变中的作用，方得窥其大概面貌。较为深入展现东北军内部主要将领和文官的复杂面貌，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视角去认识这一群体，有待于进一步的深究和拓展，本文之探索离不开学界先进的已有成果给予的启示，能起一抛砖引玉之目的便足矣。

在清末民初的鼎革之际，张作霖凭以在东北盘踞称霸的这支社会次生力量渐踞中国社会演进的重心，奉系不断扩张势力并逐渐进入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心，并获取和累计其政治势力的合法性。自九一八肇始丧失故土，东北军长期处于颠沛流离之中，从鄂豫皖到西北“剿匪”，再至东调安徽抗战，再从国共内战到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在中国这个“大国转身”2的同时，东北军这个在近代特殊的军队群体也发生了异于往昔的变化，而其主

1相关论著有：

杨中州编著.西安事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杜连庆,陆军.东北军述略[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5(02):85.

焦润明.东北讲武堂与奉系东北军的现代转型[J].军事历史研究,2014,28(02):71.

王春林. 阵线与前途:西安事变及其善后中的东北军于学忠部[J]. 军事历史研究,2018,32(02):54-63.

一叶. 西安事变中被枪杀的东北军将领王以哲[J]. 党史纵横,2017,(01):35-40.

王春林. 东北军的内争与西安事变:以少壮派为中心[J]. 抗日战争研究,2016,(04):29-42+159.

王莉. 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J]. 党史纵横,2015,(05):45-46.

王贞勤. 东北军将领于学忠发动“ 兰州事变 ”始末[J]. 文史春秋,2012,(12):30-34.

王春林.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01):61-65.

王惠宇.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J]. 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116-120.

2 参考罗志田《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该书書主要討論的是“中國的近代”，全書立足於文化眼光，借助曆史想象，觀察中國的近代，述說一個大國如何從曆史轉身。其在以往救亡图存的和屈辱的近代历史叙述之外，更加丰富了文化、精神层面的状态变化，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发展的认识。

要将领们在国家与个人观念方面却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多歧互渗”（借用罗志田先生关于近代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裂变”之特征之论）。

本文材料以东北军主要将领的文集、回忆录，以及后续东北地方编写的相关史料汇编为主，参考部分西安事变前后的国民党将领和共产党人的年谱、回忆录中的记述，尽力呈现东北军中上层文人武官对自身前途和国家民族忧患的考量，以及在重要历史节点上的抉择和分歧，又是怎样影响了局势的发展，其自身也在参与历史中有着转变，甚至是身灭。但受相关材料和个人学术能力限制不能完备该选题的初心，只求尽力去“移情”于当年东北军将领身处的历史情境之中，追溯自奉系时期存在于内部的矛盾，选取对东北军内部的分化产生极大刺激作用的西安事变和二二事变为主要论述参考，以事系人，展现东北军内部在整个事变前后的分歧和演变乃至分裂，以揭示无人不晓的“西安事变”背后东北军将领内部的复杂情况，从而更加清醒客观地认识在近代中国的所谓“传统”与所谓“现代化”的激荡之中，东北军将领之所以“各自为义”的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以及走向分道扬镳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从而以该例一窥近代社会变迁的复杂与艰难。

一、从关外回到关内的奉系

民初东北特殊的地缘政治下，张作霖的“绿林”武装逐渐坐大，使得其有能力与直系等力量相斗以争夺对于北方的控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得以短暂入主北京，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是北洋政府名义上的最后一任“国家元首”。直到南方的北伐军势如破竹，不断进逼北京城，才仓皇逃往关外的老地盘，不料却因在东北与日本关东军的不和而惨遭其暗算后身亡。东北的军政大权几经辗转到张学良的身上，尽管在此之前张学良已开始管理一些东北事务，但长期以来围绕张作霖形成的奉系将领以及智囊群体实际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权力，在军中也享有很高的地位。早在张学良继承其父之位时，奉系内部的矛盾冲突便不时凸显。在奉系高层将领中，因不同的学系出身、资历和地域主要分化为两个派别：高级将领多为保定军校毕业（除主要参谋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形成了奉系中的元老派；中下层军事干部，包括张学良为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又称士官派）。归根结底，新旧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包括地域和文武之争等都是次要的。尤其是当张学良身边日渐聚集起一帮青年军官和文人谋客，年轻的力量渴望晋升和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而跟随张作霖打拼的所谓东北老人们又怎么肯被人取代。

发生在张作霖掌权时期的郭松龄倒戈事件便暴露出新旧矛盾的严重性。张学良引荐的这位同出东北讲武学堂的同学，竟然调转枪口对内。据曾先后辅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戢翼翘回忆，郭借口“ ‘清君侧’，要驱杨宇霆”并通电“请张老将下野，以政权交张学良，声言要班师出关。”1不管郭的借口和“招牌”真假如何，能够成为其对外宣称的理由，便足以证明奉系内部的矛盾并非空穴来风。而当郭的军队进逼之时，“张汉卿（张学良）自己惹的祸

1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9、40 页。

要设法来消除。最初要他去安抚，他又怕被架走，不敢去。”1以及回忆中提到的张郭等人于天津的秘密会议，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学良参与了倒戈，但他对青年将领的影响和管束间接促成了事变的发生。而对郭松龄倒戈后的善后事宜，张作霖采取果断肃清主谋，其余人员一概不问，没有将郭松龄夫妇押到沈阳便就地枪决，以免牵连太广，其中有无避免牵连张学良的考虑令人怀疑。当张学良因父意外去世而开始主政东北，无论对于张学良还是整个奉系将领，宿怨未清而又不得不共同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

二、进入关外的东北军

面对日本对于东北的步步紧逼，没有能力和精力维持像张作霖时期一边与日本交涉谋利而一边与国民政府谈判以获利，遂不得不选择“一边倒”，张学良在 1928 年 12 月 29 日最终宣布易帜，使得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也使得张学良对日交涉有了国府这张“门面”。此时，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尚不稳固，奉系老人对于权力的掌控非一日可接替，而且因为继位、易帜等问题，奉系内部已分歧不断。在 1929 年 1 月 11 日，杨宇霆、常荫槐以阻挠易帜之罪名被枪杀于张学良官邸，究其原因，多年后张学良回忆道“杨宇霆和常荫槐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不听我指挥，企图反叛，他们的反叛只能让我的部下和老百姓吃苦。让别人怕我，骂我，我也只能这么做。”2而戢翼翘回忆杨宇霆“还是像他替张老将做事的时候一样，对许多事不肯放手，开会时对张汉卿也许不太客气”，又“有点倚老卖老，而且老将时代他独断专行成了习惯”3首先，张将原因归之于杨宇霆的反叛应是借口，在张学良已经正式继位后反叛并不是好的时机，而当张作霖死后群龙无首之时，“东北王”难产之际尚有变数可有一搏，因为杨宇霆那时正好在关外组织军队撤回关内。所以杨宇霆对于张学良掌控东北的阻碍才是事情的主要原因，恰逢在易帜讨论中杨曾明确表示反对意见，以阻扰统一之名义除去旧势力，可谓“义正言辞”。

掌权后的张学良对于新人的培养可谓用心良苦。此后担任张学良东北军文官，也是西安事变前后重要参与者之一的应德田,在 1929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后，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据他记述“东北大学第一期共毕业九个班，每班选送第一名学生公费出国留学，除俄文班不送之外，共选送八人，我是其中之一。留学生出国之前，要在东北政务委员会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及沈阳北陵张将军别墅里服务一个月。”4出洋留学前的服务惯例毫无疑问的对于进一步增强东北留学生群体对于张学良个人的向心力作用甚大。到后来东北沦陷之后，这些留学生群体的集体回国与此不可谓无关联作用，甚至在西安事变中少壮派始终坚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来，就不肯撤兵，而宁愿与国民党中央军一战，最终酿成坚持救张的少壮派杀害了坚持和平解决的部分高级将领的“二二事件”。

在这一阶段，正因为张学良对东北的掌控并不十分稳固，奉系老人们在杨常事件之后更

1 同上，第 41 页。

2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63 页。

3 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0 页。

4 应德田著 岳龙、王秦整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7 页。

是对这个后生（张学良）隔膜愈深，而张只能更加重视对东北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倚重。奉系的这次父死子继，并未消弭内部的矛盾，而是加重了内部的分化，并有了以暴力方式压制异己声音和力量的先例。（参与枪杀杨常的王以哲，在西安事变的善后中因与少壮派意见不和被枪杀）张学良在初步掌控了东北后，在随后的中原大战中审时度势，决定率军出关支持蒋介石，借以把地盘扩张到了华北。然而这次出关时，是以国民党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的身份，而非以往的东北地方草莽势力，出乎意料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除了留守东北并投降了日军的，关外大部分的东北军成为无家可回的特殊“流浪群体”，抗战胜利后又经历了国共内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陆续回到东北。

三、西安事变前后的东北军

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下，中国丧失了东北，东北军失去了故乡，而华北也是岌岌可危，华北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形同虚设，而东北军的生存空间也是大为压缩，只得屈从于国民政府的支配，东奔西跑参与“剿匪”，等待时机对日作战以打回东北。而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东北军的希望变得渺茫。此时，经过长征的跋涉而落脚西北的中共，积极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可谓率先响应并与之亲密接触，之后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更是对近代中国历史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万事未备”：联共抗日的肇始

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匪”接连受挫，将领们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愈加痛恨，东北军开始与中共有了接触和联系。在东北军中王以哲（在杨常事件后被提拔）的 67 军里被红军所俘虏的团长高福源受到中共优待俘虏政策和学习教育的影响，高在返回东北军后传递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消息。1936 年 2 月 25 日 ，王以哲同中共方面的李克农、钱之光等进行秘密会谈，并达成了东北军和红军的第一个停战互助协定。之后在王以哲的精心安排下，同年 4 月 9 日王陪同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著名的肤施（延安）会谈。

而与中共联络之后，不再消极等待蒋介石的抗日表态，而是开始积极整顿东北军，做好抗日的准备。经过蒋介石批准，以整军“剿共”的名义，在西安王曲镇设立长安军官训练团，团长为蒋介石，张学良为代团长，杨虎城副之。先成立干部连，王以哲任连长，前两期的教育长也由王充任。“王以哲在军训团任职期间，坚决按张学良的意图对军官进行联共抗日教育。提倡民族气节，颂扬史可法、文天祥和岳飞。”1而对于王的任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80 年代当年少壮派重要人物之一的应德田这样说道“王以哲将军任教育长，他所倡导的内容，都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的那些东西，如《大学》、《中庸》等，灌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守旧思想。他还酝酿拥王代张的空气，使大家对他很不满。” 还说“在更换教育长时，我曾问过张学良将军为什么要换掉王以哲将军。张学良将军说：‘王军长在团里好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沈阳文史资料二十二辑-西安事变与东北军将领------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1996 年版，第 42 页。

讲“大学之道”，这不是我的意思，他对抗日有些消极’”1两期之后改任黄显声为教育长，其原因并非应德田所编造的“拥王代张”的野心而被撤换，而是张对王另有要事所托，派他去辅助胡宗南部的“剿匪”任务，而实际上是以趁机给红军透露胡的作战计划以帮助红军三大主力顺利会师。也正因为如此，张也不便过多透露事情原委为王正名，所以才会传出那么多损害张学良与王以哲关系的流言蜚语。应德田对王以哲的诋毁无非是为其后来二二事件中的行为寻找合理依据而已，应德田的这本回忆也是矛盾之处颇多。而在 1985 年 6 月 6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 1985 年干审 460 号通知，正式承认“原东北军抗日将领王以哲将军生前为中共党员”。而作为东北军与中共联络的重要枢纽和牵线者，王的抗日决心毋庸置疑。

在抗日动员方面，创办了进步刊物《文化》周刊以宣传联共抗日。“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以及在 “军中教唱《流亡三部曲》，转变东北军士气”。2而为了将东北军内部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起来，以推进练功抗日工作的开展，在东北军中又筹建了抗日同志会，该会的活动之一，便是收容和训练沦陷区和国统区的流亡学生，主要是建立学兵队，以作抗日的有生力量。这个离西安事变几个月前刚成立的组织存在很多的不足和局限，据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回忆“由于是以张学良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切须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缺乏民主商议和集体决定……一旦失去了张学良这个中心的时候，抗日同志会的缺少集体领导、没有群众基础、战斗力不强等弱点便暴露无遗。”3虽然是后见之明，但该组织尚不完备是事实。应德田在谈到该会的不足中关键的一点是“存在时间很短，机构还不健全，所以实际上起不到领导核心的作用；基本上是以思想进步的中下级军政干部为主的，没有实际兵权。”4所以“当张学良离开西安时，应德田、孙铭九等假借抗日同志会的名义独断专行。”5“独断专行”有些夸大其词，但至少假借该组织的名义召集成员破坏西安事变后的和平撤兵倒是事实。

此外，应德田把抗日同志会成立的原因，说成是为了对付王以哲。与其说王以哲有野心，倒不如说暴露了应德田、孙铭九等的野心，至少是对筹建抗日同志会动机不纯。申伯纯称抗日同志会为少壮派，“因为掌握大权的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在东北军中的中共特派员朱理治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多次反映应德田、孙铭九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如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时，应、孙不同意吸收其他派别的群众参加。

另外，在 1936 年 10 月 26 日，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讲话，大论特论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滥调。蒋离开后东北军派敢说话的苗剑秋讲话，驳斥蒋的谬论，安定士兵情绪。孙铭九后来回忆其讲的大致内容“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

1 应德田著、岳龙、王秦整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9、8 页。

2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 1986 年版，第 82、4 页。

3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6、77 页。

4应德田著、岳龙、王秦整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02 页。

5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沈阳文史资料二十二辑-西安事变与东北军将领------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1996 年版，第 350 页。

多了，现在居然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后来苗被追究，在张的保护下送到北平避祸。总的来说，东北军内部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已经与中共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开展了一些联共抗日的工作，内部的矛盾暂时隐于一致对外的表层之下，但东北军还未达到万事俱备的程度。

（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从捉蒋到放蒋

张学良在数次面见蒋介石并陈情抗日无果后，最终选择了兵谏。尽管此时东北军内部思想情绪差别不小，思想松散无序。尤其是高级将领（包括何柱国、王以哲等）大多对“兵谏”持有谨慎态度，而张又缺乏详细规划和善后主张。在西安事变中被扣国民党中央大员之一的万耀煌对事变后张杨发出的通电有这样一段记述，“对于八项通电的署名问题，我们看了真是啼笑皆非，合东北军张部将领西北军杨部将领及中央被扣将领政要于一炉，欺谁乎。”1足见这时张学良等的政治素养和能力对解决兵谏后的难题尚显仓促和不足。整个东北军未准备就绪，但最好时机已经来了，蒋亲自来陕，而且随同中央将领众多。据万耀煌对事变前西安状况的回忆：“将星云集，西安多年未有之盛会也。”2情势所迫，张不得不立刻行事。而事变后万耀煌对张杨的评价同样值得深思，“杨虎城为绿林之贼，张杨共同发动事变，何异于绿林绑票行为，惟张始终为政治谋出路不忍一朝之愤而出于劫持领袖之举，其目的在于达到政治要求，最后亲送委员长会回京，初无伤害领袖之意，此所以为豪杰也。”3

兵谏的前期联络、准备以及善后的诸活动中多为高级将领参与，而兵谏的具体执行和保护人质等工作则依靠青年军官为主的先锋队、特务团、学兵队等。“在张汉卿左右的都是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人，没有经验，不能使汉卿对这种事多考虑，而汉卿像一般东北人一样，冲动，胆大妄为，轻举妄动，所以才做出这种糊涂的事。”4张学良固然不是冲动行事，但他兵谏所依靠的成员主要还是青年军官，在捉蒋布置的内外两线上，以内线人员安排青年军官孙铭九、白凤翔、刘桂五等，非奉系的杂牌军在外线负责接应。一方面固然是军队任务执行的常理，但也反映出张对不同层级军官的不同态度和顾虑。在这种情况下，高级将领在具体操作中的缺席、分歧，而青年军官在事先准备和善后的不在场，新旧之间的宿怨颇深，使得整个事变的前后不会太通畅和顺利，内部的一致性很难达成。

首先，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各部反应不一。曾参加西安事变的高崇民谈到“于学忠遵令完成任务，万福麟则按兵不动，黄永安竟拒绝受令，投降反动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叛张学良于洛阳。”5面对国民党中央军的进逼和南京方面派出的战斗机轰炸西安城，再加上国府方面对东北将领的威逼利诱，“杨虎城十七路军里面的冯钦哉被中央收买叛变了，东北军的

1 《万耀煌将军日记》（上册），第 322 页。

2 同上，第 310 页。

3 同上，第 332 页。

4 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5 页。

5 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 页。

檀自新部亦复不稳。”1而在西安城内，捉蒋后的形式不容乐观，杀蒋的呼声不得不使张学良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重新安置住所，以防不测。蒋从新城大楼转移到了张邸对门的高桂滋之住宅，而对于南京要员据万耀煌回忆，“原为米春霖等高级将领公馆，前日临时迁出，让我们住，以便保护。”2

关于放蒋问题，张学良对于两宋和蒋的口头协议和人格担保是信任的，但东北军的其他将领，包括新旧派别都对此抱有怀疑，对放蒋条件的争论不断。然而，1936 年 12 月 25 日下午，张学良未与西安三位一体战线的任何一方面商议便只身陪同蒋乘机离开，仅在机场临时写下了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3虎臣即指杨虎城，然而让杨代张职东北军内部显然就不太可能接受。孝候是当时东北军驻兰州的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于不是奉系出身，却得到张作霖、张学良的器重，在东北军中较有威望。这是张学良第二次将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于（第一次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 1933 年张学良被蒋介石所逼，下野出国“考察”）。于是一位主张积极抗日的将领，正是由于其在担任河北省主席时，对日的强硬态度和激烈的抗日行为，为蒋所顾忌，怕引起与日军进一步的冲突，而影响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何梅协定》之后，于被调至西北“剿共”，1935 年 11 月国民政府任命为甘肃省主席。在西安事变时，于应张学良之邀到西安，后又回去处理兰州发生的事变，直到西安事变的善后在东北军中发生严重分歧，于又被迫乘机再回西安。

(三)“各自为义”：救张的分歧和决裂

送蒋回到南京的张学良受到监禁，并在军法审判后遭到软禁不得自由。而在西安群龙无首的东北军，围绕着营救张学良以及与南京方面的谈判陷入了混乱。起初由于放人放机问题争吵不休，即在张学良送蒋回去后的当晚，西安的东北军接到署名张学良的电报：放回扣押的南京中央要员和飞机。王以哲、何柱国等高层将领认为出于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和诚意，再者蒋介石都已放回，放人放机是理所当然的。而应德田、孙铭九等坚持认为该电报很可能非张学良本意而是在受人胁迫下发出的，不能放走这些换回张学良的筹码，正如孙铭九所言“这是在争取张学良回来的问题上，东北军内部第一次意见分歧。”4应德田更是将南京方面对西安三位一体所采取的各种瓦解手段和日益严峻的局面都“是与放人放机有直接关系的”5。而且孙铭九的回忆文章里更是认为“事实已经完全证明，由于轻易地丢失了可以保证张学良将军回来的两个条件，致使西安局势大变，不仅张本人被长期囚禁，且杨虎城将军被杀害。更严重的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失去控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使西北的联合抗战的形式从此不复存在。”6显然应、孙二人是借放人放机问题为其主导的二二事变有所规避和

1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 1986 年版，第 73 页。

2 《万耀煌将军日记》（上册），第 324 页。

3 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04 页《离陕前给各军师长手谕》影印件。

4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6 页。

5 应德田著、岳龙、王秦整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01 页。

6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9 页。

遮掩。而在应德田等东北军的大多数青年军官的眼中，认为“最重要的是张学良将军不仅是东北军“联共抗日“政策的领导者，同时也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中心人物。”1这种对于张学良个人的执念到了“迷信”地步，使得终其一生，他们依靠的是张学良，但无法认识到张学良的一言一行背后是整个东北军对其的支撑。

特别是囚禁在南京的张学良在发往西安的电报中有“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诸如此类的话语，有限信息在东北军中所产生的歧义，是团结主和？还是团结主战？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东北军将领之间本来历史嫌隙已深，事变后的意见分歧更是难以契合，特别是中下层青年军官对高级将领的猜忌愈深。1937 年 1 月 16 日，中共代表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开会决议坚持和平方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提到“此间左派坚主战，态度强硬，但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2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东北军中的这些少壮派的真实状况。到了 1 月 19 日（或 20 日），“东北军一批青年军官向周恩来、博古等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3

西安方面在与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谈判后，本着和平解决的原则，协议东北军要先撤出西安，再行寻找机会救回张学良。而关于撤兵问题又掀起了一场波澜。表面上是关于救张的步骤和方式的路径差异，即策略之争，其本质上反映了东北军内部的极不协调和难以团结，东北军不能一致行动才是阻碍张学良回陕的重要条件之一。“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之少壮派主张武力争取张将军归来。高崇民、王以哲、何柱国则主张不应改变团结抗日之初衷，即为争取张将军归来，亦只有和平解决才有希望。”4所以在“东北军中就形成了上层主和、下层主战的局面；同时东北军内部又有新老之争。”5尽管西安事变善后即将完成，团结抗日的局面指日可待，然而东北军内部的形式却愈加严峻。

1 月 27 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在金家巷张公馆向周恩来请愿，表示“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要红军支持。周恩来说服无效。”更为严重的是“南汉宸报告说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6次日，周恩来、叶剑英返回三原云阴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商，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回电，表示“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在 2 月 1 日召开的红军、、第十七路军、东北军三方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应德田等人也参加了，会上“于、王、何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同意，应德田等人没有表示异议。”之后周又对青年军官做思想工作。然而次日发生了枪杀王以哲等人的事情，即“二二事件”。

---

1 应德田著、岳龙、王秦整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02 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89-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 1998 年版，第 352 页。

3 同上，第 353 页。

4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 1986 年版，第 7 页。

5 同上，第 74 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89-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 1998 年版，第 354 页。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应德田、孙铭九以及东北地方所编写了一些回忆录和文章，关于西安事变前后的叙述依然是各执一词，特别是应德田的书中“烟雾弹”颇多，如不深入了解很容易被迷惑。首先，关于“锄奸”想法的提出，应德田将自己与该事件的关系避而不谈，而把主谋之名归于同为青年军官中支持和平解决的何镜华。而在孙铭九的回忆中“二二事件中主要拿主意的是应德田，但我不能从大局出发、从各种相互关系中深刻认识问题，则容易产生感情冲动而不顾后果。”1后来当孙“看到何柱国发表在 1982 年 3 月 6 日《团结报》上一篇悼念何镜华的文章，才知道确实是何镜华事先通知了何柱国。”2正因何镜华的报信，何柱国才逃过一劫，王以哲因坚信事不至此而未能离家避险。应说是何镜华的“锄奸”想法当属无稽之谈。

还有一个细节是在 2 日上午事变前在孙家的集会，应德田在书中长篇大论坚持认为是“自发自愿”的聚集，应德田说“那时候东北军中几乎普遍公认孙铭九和我是东北军中联共抗日、忠于副司令的中心人物，他们在悲愤中来找我们是很自然的。”而后又说“可是说没有找就到了那么多的人，也似乎不可能，到底如何，很难判断，我只是凭自己的记忆如实地写出来。”3真的是很难判断吗？显然应的目的是将二二事件的发生归于东北军中拥护张学良的军官们的激愤 ，即合乎“情理”的行动，而非少数几个人的挑动和组织。 其次，书中应更是将事件的源头引向了对王以哲、何柱国的身上，应德田认为“假如说与王、何两将军有仇有恨，那么这仇和恨是王、何两将军自己种在大家心里的是他们再三做出出卖张学良将军的行为而凝聚成的。这不是私仇，这是公仇。”甚至进一步污蔑说“王以哲将军的野心突出地反映在弃张和企图控制东北军进而把东北军献给蒋介石，讨蒋欢心上”。4应的说辞始终将少壮派与大多数青年军官的“群情激愤”和行为作为事变发生的“根源”，一直担任文官而无实权的应想必是明白法不责众的缘故，却不提事件中起组织作用的自己。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等为了避免冲突扩大，将孙铭九等肇事者送往三原红军驻地，并亲率中共代表团成员抬着花圈赴王宅吊唁，有力的戳穿了关于少壮派受中共挑拨的谣言。4 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致电中分析目前形势认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5到了 6 日，东北军内部情况恶化，少壮派的所为激起了王以哲部下的报复，相互残杀再次发生。周恩来电告中共中“二二事变后，少壮派溃乱，高福源被杀，特务团、抗先队开邠州，沈克等师长投降南京，于学忠无力统一东北军。”6事变使得东北军内部严重分裂，且人人自危，更为严重的是导致红军、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三位一体战线难以为继。

---

1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2 页。

2 同上，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88 页。

3 应德田著、岳龙、王秦整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89 页。

4 同上，第 205、206 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89-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 1998 年版，第 357 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89-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 1998 年版，第 357 页。

这时西安的混乱局面使得南京方面在谈判中步步紧逼，蒋介石二二事变发生后在日记中幸灾乐祸的记述道“王为陕变主动最烈、容共最力之一人，今其受祸亦最先也。”[1]西安事变善后的方案从甲案到乙案，再到任人支配，形势越来越不利于三位一体的各方面。在 2 月 23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及该事件发生后“东北军中新的中心不易树起，目前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原则是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以谋较远的发展，许多事要准备重新做起。”2中共对东北军所做的统战工作等均受到沉重打击。西安方面不得不签署甲案后，蒋见此机会又逼迫执行乙案，“东北军自王以哲死后，重心已移到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身上，而缪一向是与何应钦相勾结的……他胁制了师长刘多荃，力主东北军东调。迨东北军东调以后，蒋介石又嗾使冯玉祥、刘峙等人对乙案之执行加以反对，最终使乙案未能实现。”31937 年 2 月 8 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次日 9 日，顾祝同进入西安行使西安行营主任职权。没有了张学良并撤出了西北的东北军，自此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可谓“树倒猢狲散”。在全面抗战中，于学忠等率领部分东北军英勇抗击日军，而二二事件的几位少壮派人物里“苗剑秋投靠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后来到日本仍坚持反共；应德田、孙铭九参加汪精卫的伪组织，做了汉奸官。”4

四、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东北军将领

时隔多年，改革开放后应、孙二人在各自的回忆录里也有些许的反思。应德田虽短暂留学国外，但骨子里仍是侵染着传统忠义观念，其以救张行事的最高准则，自己坦言“偏重于用救张的态度来衡量一切，形成一个难以动摇的标准……除此之外，还使我片面、简单地看待形势，过低地估计了我们的不利条件。”以及“过于注意张学良将军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了其他的积极因素。”5孙铭九也承认“没有把整个民族的命运与张将军个人的安危这两者的位置摆正，对整个大局、一致抗日的前途缺乏慎重周密的思考。”此外表示“为自己的幼稚、鲁莽，以致给当时已够复杂、艰难的西安局势雪上添霜而感内疚。”6

的确，从具体历史事件看，应、孙等人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且有些顽固不化和不识“大体”，而东北军的分裂也似乎是诸多偶然因素和外部压迫所导致。然而，从近代中国发展变迁的长时段看东北军群体的发展演化和最终分裂，看东北军的部分个体在参与时代历史和身处书写的历史之中时，其每个人更大的程度上也被“书写的历史”所“塑造”和影响。近代中国从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中走来，国家的未来在百年间不断经历着悲愤和绝望，而无论是奉系还是东北军都是整个社会变动下的伴生物，一边耳濡目染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和“忠君”思想，而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才渐渐萌芽于中华民族日益沉重的苦难和屈辱之中。

---

1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 年 2 月 3 日。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89-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 1998 年版，第 361 页。

3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 1986 年版，第 75 页。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沈阳文史资料二十二辑-西安事变与东北军将领------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1996 年版，第 369 页。

5 应德田著、岳龙、王秦整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08、209 页。

6 孙铭九：《西安事变的真相》，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2、195 页。

东北军作为民国诸多军阀中特殊的一支力量，前期同其他军阀一样割据一方，然而自从东北易帜及九一八之后，这支虽被收编但私属性质较强的武装被迫离开故土，迎接他的是在全国各政治势力角逐之中求生存。此外，奉系也经历了其他派系没有的代际交替，内部的新旧成员矛盾更加凸显，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节点时便点燃了内部的“火药桶”。有学人指出“东北军是由奉系军阀发展和演变而成的，由于军阀政治形态的不稳定性决定了东北军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东北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使得日本有了可乘之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以“军阀政治形态的不稳定性”解释军队内部的矛盾有些笼统和泛泛而谈了，而且并不一定适合于任何一支地方的军阀势力，应具体而论其原因更为贴合历史事实。此外，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更应考虑日本对华侵略的长期谋划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国际局势的演变。

少壮派明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但实际中始终无法放下“救张”这一问题，不能说他们不够爱国，只是从其成长、留学、入伍的人生重大环节，一直有来自张学良，这位“少帅”的资助和扶持，难以摆脱或可谓“忠君”观念，在他们的思想逻辑里，先要救回张学良，然后再张的率领下打回东北去，赶走故乡的侵略者。对于长期依赖于张学良的少壮青年，张不回来便“六神无主”，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所附带的畸形社会风气。而所谓的元老派，资格年龄较高的几位将领，从兵谏蒋介石的策划和谈判，大多都能支持张学良，善后中以团结抗日为要，暂时搁置“救张问题”，不可否认部分受到中共统一战线影响从而理清了轻重缓急，也有部分人是受到南京方面的收买，也不是说他们的爱国程度就一定高于少壮派，都是自有考量的，他们本身已经拥有自己统帅的军队，东北军中威望颇高，对张学良并无类似少壮派的依赖性，足够自立于东北军中。应该说东北军将领们各自秉持着不同的救国理念和人生信条，而在历史积怨和西安事变善后的分歧中坚持“各自为义”，内部又无协商沟通的渠道和氛围，在流血冲突中走向“分道扬镳”难以避免。

姑且将东北军的成长变化用“现代化”这个概念称之，有学人提出“东北讲武堂在促进奉系东北军的现代转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因为，促使一支军队发生现代转型的因素很多，诸如时代因素、国情因素、政治因素等。”2的确，在本文对东北军将领分化走向分裂的历史脉络梳理中，显示出近代军队要实现现代化是何等的艰难，只有洋枪洋炮算不上现代化，而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和近代的历史境遇决定了在一系列重大的牺牲、磨难之中，个人和群体才会逐渐转变旧观念，体悟到“军阀”、与“个人”之外的国家，回看中国的“大国转身”莫不是如此。

1 田晶：《论东北军内部纷争》，《黑河学刊》，2013 年第 1 期第 165 页。

2 焦润明：《东北讲武堂与奉系东北军的现代转型》，《军事历史研究》，2014 第 2 期第 71 页。

爱乡爱国：杨虎城主陕时期的行动逻辑

康欣平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事变距今85年了，它是对近代中国产生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纪念它非常有意义。作为发动西安事变的重要人物杨虎城，建国后毛泽东主席称其为“以身殉志，不亦伟乎”，与岳飞、文天祥等人并列。已有关于杨虎城的论著非常多，亦有不少深化细化之作。[1]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和分析杨虎城主陕时期的行动逻辑。

引言：何谓杨虎城主陕时期

所谓的杨虎城主陕时期，本文指1930年10月至1937年4月。1930年10月，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攻入陕西，占领西安。24 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决议。蒋介石之所以将陕西省交杨虎城管理，主要原因为有二。其一，中原大战后，蒋急需清理冯玉祥在西北势力，而杨虎城曾是冯玉祥的部将，“叛冯”入蒋，战功卓著，用他来对付冯在西北的残余力量比较合适。其二，杨虎城是陕西人，由于在陕征战多年，尤其因靖国军时期及西安守城的表现，在陕西民众中拥有很高声望。

1930年11月13日，蒋介石将原洛阳行营改名为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虎城为行营副主任。1932年1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撤销西北行营建制，决定设立西安绥靖公署，委任杨虎城为绥署主任，其仍兼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2月，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安新城正式成立；3月，在兰州设立西安绥署驻甘行署。西安绥靖公署所辖部队，除第十七路军外，还包括甘肃等地一些接受番号的地方部队。

1933年5月4日，蒋介石调邵力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免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对此任免，杨虎城在3日前（5月1日）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上讲，他系一军人，不愿负担政治责任，“现请中央选富有学识经验的人负政治责任，个人专治军事，以图抗日御侮”。[2]但据杨虎城属下李志刚回忆，杨当时对邵力子的任命“情绪是愤怒的”。[3]不过，杨虎城还任西安绥靖公署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对陕西事务拥有很大主导权。

1935年11月1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

1 以笔者目见，代表性的著作有：米暂沉：《杨虎城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米暂沉：《杨虎城将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杨瀚：《杨虎城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杨瀚：《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等等。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卢骅、刘洪亮：《关于〈杨虎城年表〉的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鹤鸣：《杨虎城将军重视陕西教育事业》，《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王玉福：《试论杨虎城的抗日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王有光：《论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韩真：《谈杨虎城将军关于抗日战争的思想》，《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3期；陈舜卿、陈琰：《杨虎城经济思想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罗玉明：《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张应超：《杨虎城将军在陕西靖国军斗争中的重要贡献》，《人文杂志》2005年第4期；张天社：《西安事变前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关系新探》，《唐都学刊》2013年第6期；靳怡：《社会关系网络与中共在杨虎城部的活动（1921—1935）》，《苏区研究》2021年第3期；王悦之：《蒋介石与杨虎城部关系述论》，《史学月刊》2021年第9期；等等。

2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3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良兼任副司令。在此前后，东北军及其家眷大批调入陕西、甘肃两省。东北军进入陕西后，西安出现了三种力量并存的局面：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张学良为首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邵力子为主席（兼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政府。从军事实力上讲，东北军要强于十七路军，然东北军主力部署在陕北、陇东的“剿共”前线，驻西安的仅是总部机关和少量警卫部队，而十七路军主力部署在西安城内与周边，故西安的军事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杨虎城手中。

1936 年 12 月 12 日，杨虎城联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1937 年 4 月，在蒋介石的重压下，杨虎城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等职务。

1930 年 10 月至 1937 年 4 月，杨虎城先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等职，对陕西事务拥有主导权，故本文称这一时间段为杨虎城主陕时期。

杨虎城主陕时期的行动逻辑，笔者将其概括为爱乡和爱国。

一、爱乡：陕西近代化的重要推动者

1930 年 10 月 31 日，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发布告称：“冯逆玉祥，为祸西北久矣。……同胞何辜，罹此惨劫！虎城年来驰驱豫鲁，每期吊故里之嗷鸿，西望乡关，无术除秦川之害马。兹者，中央兴师戡乱，讨伐叛逆。……虎城复奉命主持陕政，自惟庸愚，忝膺重寄。……此后，宜如何休养生息，抚绥灾黎；如何兴利除弊，力谋建设；如何涤旧布新，以促进社会之改良，增进同胞之福利。……务望我父老兄弟，同体斯旨，一致协助，共策进行。”[1]在陕西乡亲为杨虎城主陕举行的洗尘大会上，他答谢称：“今后怎样建设新陕西，这是各位父老和虎城共同的责任，希望大家都要责无旁贷，更不要把虎城当中央任命的官看待，要当自己的子弟看待，要站在父兄的立场上，尽量地指导才是。”[2]

1929 年，陕西发生极为严重的旱灾，即本省人所称的“民国十八年年馑”，当时陕西的饥民达五百万之多，旱灾给陕西带来极大破坏，城乡凋敝，饿殍遍野，一些地方的旱灾持续到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在西安东郊陕西省群众欢迎会上，杨虎城发表讲话时认为，关于陕省善后问题，第一要务是救济灾荒。[3]杨虎城决定将之前省政府加于民众的苛捐杂税，如粮户捐、斗捐、面粉捐、煤油特税、地丁四倍加征、百货保运费等，一律免除，以利于陕西民众的休养生息。[4]

1932 年 12 月 31 日，杨虎城跟《西安日报》记者谈话时说，“从政伊始，即孜孜努力于水利与交通。以期打破自然之支配，而冀增进农村之生产。”[5]杨虎城是陕西水利近代化的重要推动者，他首先推动的是泾惠渠修筑。杨虎城认为，该渠工程浩大，需款较多，应由省政府主持办理，“刻与华洋义赈会商定，分担款项，合力进行。一俟将款筹齐，即可依照计划，克日兴工”。[6]由上引文知，陕西省政府推进泾惠渠工程，需要与华洋义赈会的合作。1930 年 12 月 17 日，杨虎城在引泾工程大会上讲话时称：“刚才听各位先生说，引泾开渠，因兄弟赞助，方能够有今日开工。这话在兄弟觉得非常惭愧。因兴办陕西水利，是陕西省政府应负的责任。现省政府没有力量，转请华洋义赈会办理，真有一点说不过去。在过去陕西不是

1 《布告励精治陕》，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6 页。
2 《洗尘大会上的答词》，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9 页。
3 《在西安东郊十里铺群众欢迎会上的讲话》，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7 页。
4 《政见商榷书》，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54 页。
5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58 页。
6 《政见商榷书》，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54 页。

没有人，不过那些督军、主席，或者注意不到此点，或者竟忘了此点。兄弟是陕西人，对故乡是休戚与共的。”[1]此段话颇能展示杨虎城的人格特点，坦诚、直率、勇于担责，同时爱乡之情洋溢其间。杨虎城力邀水利专家李仪祉返陕，任命其为建设厅厅长，主持陕西水利和泾惠渠工程。修建泾惠渠的劳力，通过以工代赈解决，这亦是救灾一种方法。到 1934 年 12 月，泾惠渠一二期工程全部结束。泾惠渠修成后的第一年，1935 年夏灌溉农田达“六千余顷”。[2]泾惠渠是中国水利近代化的标志性工程，它由华洋义赈会和陕西省政府合作推动完成，亦离不开热心此项事业的中外人士以及渭北地方民众的广泛参与。作为当时主政陕西的杨虎城，是促成该项光辉的近代水利工程的“当之无愧的英雄”。[3]在泾惠渠还在修筑时，杨虎城又谋划引洛水灌溉工程。1933 年 2 月，杨虎城在水利工程人员陈靖、傅建等陪同下，在陕西澄城等地考察引洛工程。当他看到引洛工程可以灌溉“好大的同朝平原” 时，对陈靖说，“快报告李先生（指李仪祉）派队测量吧”。[4]1934 年 6 月，引洛工程动工，定名洛惠渠，计划灌溉五十万亩。杨虎城两次前往洛惠渠工地视察，解决工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杨虎城特别重视陕西交通的建设。1930 年 11 月，杨虎城在三原学界欢迎会上说，对于陕西赈灾，他积极对外宣传呼吁，“但因运输困难，遂致远水不能解救近渴”。[5]1931 年 3 月，杨虎城公布的陕西施政大纲中建设方面有五项，第一项为交通，需修建的公路有：西潼汽车路、西长汽车路、西凤汽车路、西榆汽车路、西榆汽车路北段、凤汉汽车路、西商汽车路。[6]1934 年 5 月，杨虎城动员十七路军官兵参加兵工筑路，修筑陕西的各段公路。他说，兵工筑路有九条好处：修筑道路，肃清匪源；修筑道路，增加生产；生产动员，应付大战；兵工生产，学习智能；兵工筑路，易著成效；兵工筑路，调剂生活；兵工筑路，以练习作业；兵工筑路，为民模范；兵工筑路，得民拥护。[7]8 月，十七路军派出六千余人修筑西兰公路干线；咸阳至榆林、汉中至白河两公路干线，分别由十七路军下属的四十二师、十七师派兵修筑，土工多已完成；其他支路有十余处，十七路军各地驻军正在修筑，成效显著。1932 年 1 月，陇海铁路由河南灵宝修至陕西潼关，1934 年 12 月该铁路由潼关延至西安，1937 年 3 月又由西安延至宝鸡。陇海铁路陕西段的成功修筑，是加速陕西近代化的重要外部推动力。[8]。陇海铁路陕西段的修筑，是在杨虎城主陕时期完成，他“曾给予钱宗泽以积极的支持，使工程（指陇海铁路）得以顺利进展”[9]。1935 年 11 月，杨虎城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西北经济建设案》，其中有《建筑咸韩铁路计划案》，主张加快咸阳至韩城的铁路。[10]

杨虎城对陕西教育十分重视。1932 年 2 月 16 日，杨虎城在省垣中学校长会上讲话。他说，“社会的一切病态，是应当用教育的方法去救济的。……我们西北地大物博，等着要开发的事业正多。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是需要认清时代，培养专门技术人才。” [11]该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准备在陕西正式建立

1 《在引泾工程开工大会上的讲话》，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62 页。
2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67 页。
3 康欣平：《渭北水利及其近代转型（1465-194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69-181 页。
4 陈靖：《杨虎城将军与陕西水利》，《回忆杨虎城将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8-179 页。
5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40 页。
6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95 页。
7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22-225 页。
8 谭刚：《陇海铁路与陕西城镇的兴衰（1932—194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9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第 83 页。
10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65 页。
11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70-171 页。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杨虎城被委任为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他积极推动了该校的建成。1934 年，杨虎城等在家乡蒲城县创办尧山中学，他在开学典礼上说：“过去的教育，有不少的缺陷，今后便应努力改正。社会不缺乏卒业生，社会上需要的只是有能力、能吃苦，能在农村从事建设的人。现在教育的两大目标，一生产教育，二民族教育，便是对症下药。”[1]为了让尧山中学学生有实习场所，杨虎城等购置约 3000 亩土地作为学校农场，还建成勿幕图书馆。

杨虎城对陕西实业建设非常重视。1935 年 11 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领衔提出《西北经济建设案》。该案涉及发展西北的重工业、化学工业、制药等，其中陕西是其中的重点。他认为，“宜于同官、韩城各设煤炭公司，同时进行采掘”；对于陕北油田，“自以进行大规模的钻探为宜”；在咸阳，宜设立棉籽制油厂，因为其地接泾惠渠产棉区；在西安设立制药厂。[2]1936 年 1 月 15 日，行政院令实业部等，分别从速核办杨虎城等所提的《西北经济建设案》。[3]

杨虎城对近代陕西医疗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主陕时期，杨虎城设立了省立医院，在十七路军军医处设立西北制药厂，请求南京政府在西安开办了助产学校，他还提倡私人开办医院、诊所等。杨虎城邀请陕西医学界前辈杨叔吉等回陕任职，促进陕西地方医学界的团结。1932 年夏，陕西发生霍乱，西安最严重时一天死亡 800 多人。此时，杨虎城兼任民政厅长，他亲自挂帅，动员全省医务人员进行抢救和隔离，逐渐遏止了霍乱的扩散。他果断决定从军政费拨出专款，购买了制造霍乱疫苗设备，并投入疫苗生产，进行预防注射，使这一严重传染病在陕西得到有效控制。[4]

二、爱国：言说和行动

1931 年 9 月 18 日深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东北方南满铁路的柳条湖段，炮轰东北军沈阳驻地北大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占我国东北地区。9 月 23 日，杨虎城通电全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素以强暴凭陵我国，甲午已还，侵略日亟，历数吾国痛史，率由日人构成，五卅之血迹犹存，万宝山之惨案又起，今竟乘我洪水浩劫之际，义昧恤邻，狠同下石。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无端称兵，侵占辽沈。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即迫眉睫，刀砧鱼肉宁无噍类。”他祈望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懔阅墙御侮之训，为安内攘外之图，亿兆戮力，挽救危亡，庶几戢强邻鲸之心，免神州陆沉之祸”。电末，他说：“虎城分属军人，职司卫国，枕戈待旦，志切死绥……”[5]10 月 7 日，杨虎城致电张学良，愿意紧随其后，反抗日本侵略，以救危亡。[6]10 月 10 日，在国庆纪念日，杨虎城对十七路军官兵发表讲话，称九一八“是我们国家目前的大难，是我们国民空前的奇耻大辱”，“我们要努力报复国仇，誓雪国耻。第一要排除私人意见，停止内争。……第二要充实我们的力量，拿我们十七路的武装同志来说，全体官兵要加紧训练，要准备随时可以和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本军十余年来，每次作战，多为打倒军阀，现在准备更进一步的工作，打倒帝国主义。”[7]

1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35 页。
2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50-264 页。
3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31 页。
4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第 83-85 页。
5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28 页。
6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30 页。
7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31-132 页。

1932 年 3 月 9 日，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成立，3 月 25 日，杨虎城通电声讨这一行径。在通电中，他认为赵欣伯、张景惠、臧式毅等诸逆“以炎黄胄裔，竟效张邦昌、李克用之所为，图利一时，贻害百世，丧心病狂”，应大张挞伐、一伸法纪；对于“暴日主动分割”我国东三省，他认可中央政府绝不承认的对外宣言，主张一致声讨，促其取消。通电最后，他说：“虎城分属军人，志切讨逆，枕戈待命，誓保国疆。”[1]9 月 3 日，杨虎城在检阅驻扎西安的第十七路军部分直属部队时，对官兵说：“时时刻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抱定‘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决心，来向前奋斗，挽救国家的危亡。”[2]1932 年 9 月 18 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周年，杨虎城在《西安日报》刊文《对官兵之训词》，其中道：“在这奇耻大辱沉痛悲愤的今日，我们军人职在卫国保民，对九一八事变意义应有彻底觉悟与认识，枕戈待命，时时为收复失地而准备。”针对十七路军责任，该文称：“本军驻守西北，值兹国难严重期间，民力凋敝之时，尤须彻底明了本身任务，团结一致，加紧训练，枕戈待命，为收复失地之准备。要知日寇一日不驱除，失地一日不收复，则我们的责任，一日不能完了。训练不精强，团结不一致，对日准备即不充分。”[3]

1932 年 10 月 2 日，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发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发表调查意见。10 月 14 日，杨虎城接见《西安日报》记者，发表对该报告书看法，认为报告书为“国人所失望”，“并未将暴日侵略行为及扰乱和平破坏公约作真实宣示，反以日本在东省有实在的经济利益为其暴行之掩饰”，“该报告书反迁就此已成之事实，主张在东三省另设自治政府及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原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总而言之，他认为国联调查报告书“不公平，不能不无遗憾”。[4]

1933 年 1 月 9 日，杨虎城在孙中山纪念周会上称，“须全国民众能有总动员的精神，一起奔赴国难”，“我们的武器虽不如帝国主义，但亦可和帝国主义拼命，得到最后的胜利。”[5]3 月，日军占领热河，进逼长城各关口。蒋介石到达石家庄指挥，杨虎城主动到石家庄谒见蒋，要求抗日。见蒋后，杨虎城对记者谈到：“此次谒见蒋委员长，首先请示抗日办法……参加抗日实于减轻陕省负担之外，藉尽军人天职也。但请示结果，仅允先派一部参加战役。”[6]陪同杨虎城去见蒋介石的李志刚回忆：对于杨虎城的抗日要求，蒋介石说：“现在抗日还用不着你的部队，你回去好好地训练部队，就好了。”[7]实则对杨虎城要求抗日反应冷淡。

1933 年春，日本间谍小泉浩太与美国人艾克佛、瑞典人多福寿，到西北地区从事秘密间谍活动，被杨虎城部发现，从他们所带物品中，搜出了私下绘制的青海、新疆、甘肃等地的地图，以及与少数民族勾结的信函及密码。杨虎城考虑到如将这三人交给南京政府，蒋介石可能对此事会不了了之，于是他将这三个外国间谍秘密处决后，才上报南京。[8]同年 5 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杨虎城通过曾是他的老部下、此时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十八师师长的许权中，向同盟军提供许多武器和其他援助，并派一

1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43 页。
2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50 页。
3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50-151 页。
4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26 页。
5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61 页。
6 杨瀚：《杨虎城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年，第 148 页。
7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年，第 78 页。
8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年，第 77-78 页。

批中下级军官充实许的实力。[1]

1933 年 8 月 3 日，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第二期毕业典礼上说：“各位学生应该知道，我们目前的大敌，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要国际安宁，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9 月 17 日，九一八国难二周年之际，杨虎城告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其中有：“我国现已危如累卵，舍统一御侮实不足以图存，如再有丧心病狂者，争权夺利企图内战，实即国家之蟊贼，人民之公敌，当共灭之。……本军驻守西北，于上述诸事外，国耻尤不容一刻忘怀，武力收回东北四省，才是我们的最大任务，失地一日未复，即我们的任务未了，国耻一日未雪，即我们之责任未完。”[3]此言论中，杨严厉批评企图发动内战者为“丧心病狂者”“国家之蟊贼”“人民之公敌”，强烈的爱国情怀洋溢其中。

1934 年 6 月 15 日，杨虎城对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第四期学员说：“目前的中国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一个时代，现代军人的使命是为民族争生存的，不是为个人谋权利的。军队的责任是为国家御外侮的，不是为人民倡内乱的。”[4]7 月 16 日，杨虎城参加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开学仪式，他说：“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等教训我们，要与帝国主义作战非全体动员不可，不只是靠着军人，而未受过国民教育的还不能负此巨大使命，这种责任当在小学教师的身上，复兴民族挽救国危上，希望各位努力讲习。”[5]在此，杨虎城指出，抗战是军人的责任，但还需要全体动员，“国民教育”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1935 年 9 月 2 日，杨虎城在中国童子军陕西干部暑期训练团团员毕业典礼上训话，其中有“天下不兴，青年有责”，“各团员受训期间，适值中国多难之时，责任之綦重更不容一丝放过”。[6]11 月 1 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在西安正式成立，张学良兼任副司令，杨虎城为第三路司令。当时杨虎城与张学良互相猜忌很深。11 月上旬，杨虎城与南汉宸的代表申伯纯密谈，申向杨提议与红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杨当时便表示可以接受这一提议。12 月 5 日，毛泽东、彭德怀致信杨虎城，愿意“联镳并进”，“共组抗日联军”。[7]12 月下旬，杨虎城与毛泽东的信使汪锋秘密会谈，双方消除了不少误会，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项协议。[8]

1936 年 1 月 1 日，杨虎城在《告十七路官兵书》中说：“国家的危难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了，我们军人应该立刻的觉悟，民族、国家的存亡，即是自己的存亡，我们的血应该为民族国家而流，我们的生命应该为民族国家一掷，要这样也不愧是革命的军人。”[9]1 月 20 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商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月，东北籍爱国抗日名士高崇民到达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会面，建议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杨虎城表示同意。2 月上旬，杨虎城邀请从北平来西安的东北大学赴西安代表团成员宋黎，给十七路军七百多名尉官以上军官讲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形。杨虎城在演讲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并振臂高呼：“抗日学生

1 杨瀚：《杨虎城大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年，第 149-150 页。
2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85 页。
3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87 页。
4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28 页。
5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29-230 页。
6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48 页。
7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24-325 页。
8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26-328、331-332 页。
9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69 页。

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当时，宋黎等遭到“西北剿总”闭门羹，宣传“一二·九运动”遭到陕西教育当局的阻碍。此事可见，杨虎城对爱国抗日宣传的鼎力支持。

1936 年 4 月，周恩来与张学良会面商谈，张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月，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回到陕西，其父王宝珊与杨虎城是好朋友，在三原东里堡杨虎城别墅里，他们密谈了两天。王炳南介绍了中共的政策，指出反共没有出路，唯一的出路是与共产党合作抗战；杨虎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中共的观点和建议。[2]实际上，此时中国共产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方形成了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共识的同盟。5 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南郊王曲成立军官训练团，调训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现任连至团长级军官。训练团内公开批判“攘外必先安内”主张。[3]张学良和杨虎城互相合作，关系逐渐密切。

1936 年 9 月上旬，杨虎城指示十七路军军需处处长王惟之，密印小册子《活路》。《活路》是宣传抗日的，由东北军方面的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成，主要内容为抗日联共和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活路》印好后，被送往东北军前线部队以及十七路军在陕北的前线部队，宣传作用很大。[4]

1936 年 12 月 12 日，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12 月 15 日，杨虎城对全国同胞发表了一个广播讲话，他说：“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目前了，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吗？”他还说：“只要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争得生存，为功为罪，虎城是不计较的……”[5]言语之间，杨虎城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热爱超越对个人得失的考虑。早在 1933 年，杨虎城就有对个人功名的反思，他在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上说：“（西安）解围以后，便有多数人来颂扬我的功绩，赞慕我以往的主张，我倒反觉得惭愧、痛心。因为为主义而牺牲了几万人，我反得了功名，真是如古诗上说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了。”[6]1937 年 12 月上旬，失去自由的杨虎城，对王根僧说：“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7]再次提到“一将功成万骨枯”，展现出对自己昔日所作所为的负责和坦荡。

四、结语

1949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电唁杨虎城家属，称赞他“有功于国家民族”，“杨将军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永远纪念”。[8]晚年的张学良曾言：“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9]此言强调了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中的关键作用，一改其之前的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起“陪衬”说。采访过杨虎城的英国记者贝特兰，称他是“一位正直而又忠诚的中国人”。[10]

---

1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32 页。
2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35-336 页。
3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38 页。
4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45-346 页。
5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284-285 页。
6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198-199 页。
7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364 页。
8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第 493 页。
9 参见杨天石：《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炎黄春秋》2002 年第 11 期，第 62 页。
10 转引自杨瀚：《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年，第 215 页。

书写这篇小文时，笔者想起了鲁迅一段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杨虎城主陕时期，其对家乡的热爱及所作所为中，就有埋头苦干、为民请命的因子；而他的抗日救国之言说和行动，体现了其拼命硬干和舍身求“法”的爱国精神。

杨虎城是一个赤诚的爱国爱乡之人，是一位“以身殉志”的民族英雄。

作者简介：康欣平（1973-），男，汉族，陕西岐山人，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1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2 页。

从“汉中密约”到“西安事变”：杨虎城对中共统战的特殊贡献

雷婷[1]

中共汉中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

杨虎城是一位名垂青史的爱国将军，为了抗击日本侵略，挽救国家危亡，从“汉中密约”的签订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杨虎城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宣言，积极行动，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鉴于学界研究突出表现在中共对杨虎城及其部队的统战工作，且将“汉中密约”和“西安事变”联系起来研究者不多，研究杨虎城对中共统战贡献者甚少，笔者试图站在客观立场把“汉中密约”与“西安事变”联系起来，从杨虎城对中共统战贡献角度梳理杨虎城将军的丰功伟绩，以此缅怀杨虎城将军，纪念西安事变。

一、积极筹划求联络，秘密安排签密约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东北沦陷，华北危急。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史称“一月宣言”。而被公认的国家最高领袖蒋介石正忙于调集大量兵力对苏区的红军展开全力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2年底进入川陕，迅速占领了南江、通江、巴山地区，并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1933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陆续成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并不断巩固扩大。

（一）进退两难寻出路，军内高参献良策

川陕苏区的建立巩固，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与恐慌。他立即电告大巴山以南川西平原为争夺地盘而酣战的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任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而在大巴山以北的杨虎城十七路军防区陕西汉中地区，习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调十七路军主力三十八军严加防守，与川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蒋介石调军在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绵延五六百里的大巴山南北设伏，对红军形成“弓形”包围态势。

接到命令后，杨虎城左右为难：“围剿”红军，违背其愿意，因为日帝的铁蹄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保存实力，团结抗日应为当前第一要务；此外，杨虎城对蒋介石专门调集其三十八军主力驻守汉中的用意心知肚明，想借“围剿”红军削弱十七路军实力。若不“围剿”红军，则会受到军事处罚。

进退两难之际，杨虎城的高参杜斌丞向其推荐了时任国民党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武志平向杨虎城进谏：“何不与红军秘密联络，互不侵犯？”。在杨虎城对武志平的建议犹豫不决时，杜斌丞提议在时局问题上，可以考虑武志平的建议。经过认真考虑后，杨虎城

1 作者简介：雷婷（1988—），女，陕西商洛人，中共汉中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的建设。

下定决心尽快寻求与红军联络，以早日完成其互不侵犯，保存实力，共同抗日之心愿。

（二）两次往返联络地，周密安排签协定

为早日与红军建立联系，杨虎城任命武志平为军使，出使川陕苏区，委托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代替自己执行这一秘密计划。

为了表示诚意，取得红军的信任，武志平除了携带孙蔚如代表杨虎城写的亲笔绢书，还私自秘密准备了军用地图、密电码、口令等。1933 年 5 月 13 日，武志平以红十字会调查员的身份前往川陕苏区。途中两遇土匪，因武志平机智果敢，都化险为夷，最终安全到达红军驻地。见到红四方面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武志平把孙蔚如军长写的亲笔绢书、川陕甘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国民党总参谋部的秘密信号、密电码、口令、兵种旗语、地对空联络标志等交给红军。张国焘对此事非常重视，设宴款待武志平。武志平向其说明了来意，表明了杨虎城十七路军互不侵犯，保存实力，抗日反蒋的态度。红军总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为特使，随杨虎城密使武志平赴汉中参加商谈。

1933 年 6 月 1 日上午，红军特使徐以新与杨虎城全权代表孙蔚如、杨虎城军使武志平、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部参议王宗山，在王宗山家中正式开始秘密会谈。会谈中，徐以新表示：只要你们遵守“一月宣言”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愿意同你们保持友好关系，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孙蔚如表示：希望红军去打胡宗南，他们可给一些帮助。多次商谈后，徐以新携带会谈结果返回苏区向红军首领汇报。

经过讨论研究，红军总部决定再次派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出使汉中继续商谈互不侵犯协定。6 月 24 日，徐以新和武志平一道再次前往汉中参加商谈。商谈中，徐以新表明：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赞同第一次会谈成果。双方协商后，签定如下协议：一、双方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相互配合，打击胡宗南；三、红军可以设立交通线，陕军可以提供一定的物资；四、红军可以在陕军前沿阵地设置秘密联络站，用隐蔽的方式购买日用品，并由武志平全权负责处理边界事务。至此，谈判圆满结束，“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汉中密约”诞生，又称“巴山协定”。鉴于形势严峻，为了保守秘密，协议内容没有文字记载。

二、“汉中密约”奠基础，“西安事变”扭时局

“汉中密约”的成功签订，促成了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十七路军两年左右的友好合作，达到了双方互不侵犯，保存实力的目的，为三年后“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下，国共两党逐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渐形成。

（一）“汉中密约”出成效，统战成功做示范

“汉中密约”签订后，出现了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期待的“巴山无战事”的良好局面。红四方面军和陕军不仅保存了实力，还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杨虎城将军的主动联络、周密部署，促成合作，为早期中共统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成为中共早期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

第一，红四方面军迅速壮大。由于“汉中密约”的签订，和平局面的出现，缓解了红四方面军因蒋介石军事围剿，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局面。红四方面军总人数由刚来时的 1 万余人迅速增长至 8 万余人，成为其军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支军队成为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一支劲旅，也是西路军征战，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第二，川陕红色交通线作用巨大。“汉中密约”下成立了 3 条红色交通线，在后期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交通线，红四方面军得到国民党军队的密电码，截获国民党电报，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打乱敌人追剿计划，为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川北提供了可靠信息。通过交通线，红四方面军急需的药品，擦枪油、大功率电池等物资等源源不断地送往苏区，确保了红四方面军的正常军事生活。

第三，川陕甘军用地图作用显著。为了表示诚意，促进“汉中密约”顺利签订，武志平特使将一副完整的川陕甘军用地图献给红四方面军，它记录详细，重达 20 公斤。这幅地图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围剿”顺利抵达陕北，为红军西征甘肃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提供了巨大帮助。

第四，多支国民党军加入共产党军队。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三十八军后期在蒋介石的竭力逼迫下，率先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随后多支国民党武装以他们为榜样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为夺取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胜利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汉中密约”奠基础，“西安事变”始发生

“汉中密约”的签订，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是“西安事变”的序曲。

第一，前者的主人公也是后者的主人公。前者的主人公杨虎城、共产党，在幕后的蒋介石；后者的主人公中也有杨虎城、共产党、蒋介石，还增加了张学良。“汉中密约”的签订使得红军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张学良“剿共”多次失败后，急于雪洗国耻，走向联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兵谏”。

第二，二者在同一个舞台唱同一台戏。前者虽在汉中成功签订，但为了掩人耳目促成协约达成的幕后指挥者杨虎城在西安；后者也发生在西安，二者唱的都是为抗日救国而同共产党合作的大戏。

第三，二者口号中都有“联共”“抗日”字眼。前者的口号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后者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蒋介石及其跟随者是团结的对象，由于其顽固坚守“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只能想方设法逼其抗日，因此主要口号是“联共逼蒋，共同抗日”。

第四，二者均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时局宣言。前者受中国共产党 1933 年发表的统战宣言“一月宣言”的影响，并以其为依据商谈签约；“西安事变”则由中共于 1935 年发表的号召全民抗战宣言书“八一宣言”促成。

第五，二者体现了“反蒋”方式的渐进式发展。考虑到双方实力悬殊，“汉中密约”中“反蒋”是隐蔽的；“西安事变”中由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共产党军队三者可构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共同“反蒋”，同时杨虎城通过“汉中密约”与中共合作丰

富了合作经验，壮大了陕军实力，因此，此时的“反蒋”是公开的、激烈的，以至于最终发展为“兵谏”。

东北沦陷、华北危急，民族危亡紧要关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却坚持高举“攘外必先安内”大旗，责令张学良、杨虎城率兵加紧“剿共”。张、杨二人受爱国心的驱使，不愿再打内战，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剿共”未果，趁蒋介石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再次“苦谏”、“哭谏”，最后被迫发展为“兵谏”，“西安事变”发生。

（三）“西安事变”扭时局，国共合作同抗日

为了促成举国上下全民抗日的局面，为了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参与领导抗日战争，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引起国内外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国内方面，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派重兵进攻西安；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地方领袖少数人完全支持张、杨，多数人赞成抗日，但由于担心张、杨的行为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因此不支持张、杨。国际方面，日本政府希望南京与西安武力对抗，扩大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之妄图；英国和美国主张国民政府可以和共产党联合共同抗日，但前提是维护蒋介石的统治，防止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政府；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判断失误，认为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面对严峻复杂的局势，事变爆发当夜，张、杨诚邀中共派代表赴西安共商解决良策。中共不但立即选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同时做了必要的军事准备保卫西安。中共代表团和南京代表团经过激烈的争论，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得到南京方面的基本同意，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对峙抗争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扭转时局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所谓的“时局”，指的是当时的政治局势，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的发生，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加剧，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标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二是中国政治局面发生了变化，西安事变之前，中国内战不断，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轮番上演，尽管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三省成立伪满州国，发动“一·二八”运动占领上海，发动“华北事变”占领华北，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继续“剿共”。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虽未马上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但内战却事实上暂时停下来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团结抗战局面逐步形成。

三、两次辛劳谋合作，赤胆忠心为爱国

从“汉中密约”签订，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互不侵犯，保存实力，为抗日救国储备力量；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大规模内战基本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期间，杨虎城将军付出了巨大心血与汗水，为中共统战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石家庄请战受挫，联共反蒋为抗日

1933 年 3 月，热河沦陷，日军向长城各口逼近。杨虎城亲自赶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要求带兵赴前线抗日保国。蒋介石不但冷淡拒绝了其要求，而且命令其专心剿共。杨虎城急得热泪盈眶，怏怏而归，对其部队说“日本人已占了大片国土，可他还要剿共，剿共就要亡国，要叫人骂祖先，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没有出路”[1]后来又说“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不能当卖国贼，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2]他亲自安排部署，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遵守中共“一月宣言”中提出的三个条件，于 1933 年 6 月圆满完成“汉中密约”的签订，实现了互不侵犯，为抗日保存实力的目的。

（二）委婉劝谏终不成，逼蒋抗日动“兵谏”

继东北沦陷后，华北又相继失陷，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但签约卖国，而且将东北军调往西北大举“剿共”，中国共产党则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在中共抗日统战宣言和全民抗日救国热潮的影响下，杨虎城明确指出“抗日，国家有出路……在抗日这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基础”[3]。1936 年 8 月，杨虎城同中共代表张文彬秘密达成抗日反将协议，经共产党暗中协调，杨虎城与同怀有家仇国恨的张学良联手准备抗日救国事宜。1936 年 12 月 4 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促他们“剿共”。杨虎城、张学良委婉劝蒋抗日，“哭谏”“诤谏”等相继失败后，蒋介石称“轻言抗日，就不是革命，就不是革命军人，对这种不忠不孝的人，一定要严厉制裁”[4]迫不得已，杨、张二人决定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同意抗战的主张。12 月 12 日凌晨，杨虎城对他的部下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东北军和我们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表面上要打共产党，实际是一箭双雕，也是消灭我们和东北军。张先生和我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实行捉蒋，逼他抗日。”[5]于是，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扭转了时局，制止了内战，促成了抗日。

（三）爱国热忱烈似火，与共合作迎光明

从“汉中密约”的签订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是杨虎城爱国思想的升华，杨虎城由一位普通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民族“千古功臣”。在杨虎城将军的辛勤努力之下，国共两党从秘密局部合作到公开全面合作共同抗日，走向光明前途。正如 1937 年 6 月下旬，杨虎城出国前对孔从洲等老部下所说：“双十二事变，扭转这十年内战的局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们这个烂摊子，纵然这一次摔掉了，也摔得值，摔得响！

[1] 米暂沉.杨虎城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2] 秦明.杨虎城与南汉宸的友谊[J].人物，1981（1）.
[3] 政协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4] 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事变资料选辑[Z].1979.
[5][6] 孔从洲.回忆杨虎城将军[J].革命英烈,1983(3).

要知道，蒋介石是集古今中外反动统治之大成的人物，中国军阀哪一个没有失败在他的手里？我自己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共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

从“汉中密约”成效显著到“西安事变”扭转时局，从杨虎城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合作到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这不仅是中共统战工作取得的巨大胜利，还是杨虎城将军对中共统战做出的特殊贡献。共产党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是主要原因，起重要作用，而杨虎城将军内心强烈爱国思想的驱使才是根本原因，起决定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怀，促使杨虎城将军一步步走向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不对称的角力: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博弈

王春林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力图重新恢复对陕甘的统治，而杨虎城则要求蒋兑现抗日等承诺，事实上延续了与国民政府对抗的局面。因而，从西安事变爆发到军事善后结束，杨虎城在国民政府高层的印象都极坏。但囿于 1 月初国民政府对杨“撤职留任”的命令以及陕甘善后的需要，又不便再加处置。因而在 1937 年 2—6 月间，蒋介石、杨虎城之间有过多番博弈，最终杨虎城在蒋的压迫下辞职出洋。既往研究对西安事变善后中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关系多局限于军事善后阶段，并且对其间蒋、杨关系的变化以及迫杨辞职出洋问题或者鲜有涉及，或者语焉不详。[1]因而本文拟尝试梳理西安事变善后期间蒋介石、杨虎城之间的博弈，探析双方的处境以及心思，进而展现这期间国民政府与杨虎城部关系的演变态势。

一、军事善后时期国民政府对杨虎城的恶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部分人士对杨虎城的态度仍感怀疑。12 月 27 日，周孝伯与翁文灏谈到“杨虎城仍不可靠”[2]。28 日，冯玉祥在中央党部遇于右任，“于先生主去杨。”[3]而在军事善后中，杨虎城又大力宣扬蒋接受“八项主张”的事实：“委员长大彻大悟，表示完全容纳。”[4]“蒋委员长以宽宏博大的襟怀，在完全明了了张副司令与虎城纯洁的真诚以后，对于我们的主张是完全采纳了。”[5]其后杨虎城还在公开电文中反复陈说此点。[6]这与蒋返京后国民政府的论调针锋相对，自然令蒋介石十分难堪。

12 月 30 日，杨虎城表示愿与张共担责任：“协同尚有虎城，论罪平情，城与诸将领均有应得之咎”[7]。此点蒋介石当会较为认同，但蒋为迅速解决陕甘问题，仅对杨处以“撤职留任”。《大公报》称颂国民政府“实属宽大逾恒。在中央始终成全，推诚倚畀，盖期地方早复原状，其用意可谓至极深挚。且也陕省主席畀之孙蔚如，”“孙为杨部师长，不啻由杨自兼”[8]。

1 参阅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杨瀚《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 2007 年版。

2 《翁文灏日记》第 102 页。

3 《冯玉祥日记》第 4 册第 866 页。

4 《函各县长述双十二事件之经过及解决情形并告以今后施政之方针》（1936 年 12 月 29 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第 293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年版。

5 《告民众书》（1937 年 1 月 1 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第 298 页。

6 参见《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1937 年 1 月 5 日）、《电诘蒋介石悔诺》（1937 年 1 月 14 日）、《致函蒋介石派员呈送解决陕事方案》（1937 年 1 月 16 日）、《和平宣言》（1937 年 2 月 4 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第 304—309、312—313 页。

7 《致张学良衷心承责共济》（1936 年 12 月 30 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第 295 页。

8 《陕甘善后》，天津《大公报》1937 年 1 月 6 日第 2 版。

此时杨虎城是陕甘方面的领袖，所以也是国府方面所瞩目者。1 月 5 日，杨虎城通电抗议南京审判张学良等做法。[1]南京方面颇为担心善后前途，其关注点主要集于杨：1 月 6 日，陈布雷“与敬之、培根通话，知杨虎城昨发表通电，抗命之意渐露”[2]。7 日，蒋鼎文认为杨“对中央善后处置表示不服，为此仍不免武力解决也。”[3]8 日，叶楚伧也认为“似此则政治解决恐非易事。”[4]

因为西安事变，蒋介石以下大员对杨就多有恶感。蒋原本对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已有些失望。1 月 8 日，蒋列出了致杨函的要点，即陈说此点：“以本党历史不可为不久，中央待汝不可为不厚，五年以来陕省之安定建设，不可谓不创造艰难，而今首受其害者，为汝最深，而苦痛最重者乃陕西同胞。吾知汝必不愿自撤本党之范篱也。”[5]同日，黄绍竑也提到“委座又谓杨虎城□为中央予以拔擢者，故深以为杨氏可靠，詎知不然，夫东北军之不稳早已知之，以为一到西安即可镇压，而未知杨氏如此态度，此乃初料所不及者。”[6]而被扣大员对杨印象更坏。1 月 10 日，钱大钧与陈继承、蒋鼎文、陈调元晤谈，“彼此均以为张汉卿虽可恶，犹有感情可言，而杨虎城则可恶已极，此被避各人可谓众口一辞者也。”[7]甚至整理蒋日记的陈布雷也有同感：11 日，陈“摘记委员长蒙难时期经过之要点于别册，”录毕深感“杨之阴狠”。[8]

而军事善后中，杨虎城也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要处心积虑应对的，其间也积累了不少怨恨。1 月 9 日，陈布雷“接杨虎城电，措辞尚和缓，但仍要求张回陕及中央军东撤。”“午刻承命拟杨虎城鱼电，剴切回告以须接受中央命令。”10 日，陈又“承命拟致杨虎城函稿，”但“尚不知杨虎城是何心理，深恐谆谆之劝，不易动其心也。”[9]当日，蒋也“认为对西北用兵共党必不协作，”东北军也“不成问题。所成问题者，只杨虎城而已。”[10]可见，此时杨已成为蒋解决西北问题的主要障碍。13 日《大公报》也将矛头直指杨虎城：“杨虎城被左右包围，决意向死路走。中央本宽大精神，仍期待着他能有最后的反省。但杨如终不彻悟，那么中央为赶快解除陕民痛苦及恢复地方秩序计，当然要负起戡乱的责任。”[11]而国民政府面对的还不止杨虎城一方。16 日，王子壮写道：“目前之可虑者，对中央素怀不满者至此亦有表示，如刘湘、李宗仁、白崇禧最近之公然电请中央对陕西务取政治解决，不应再起内战。是直认陕西与中央之对等，韩宋之间亦有若干之默契，均足为中央解决陕甘事变之阻力，中央之郑重迟回非无故也。”[12]

---

1 参见《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1937 年 1 月 5 日），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第 304—305 页。
2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 186 页。
3 钱世泽编《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 403 页，中华出版公司 2015 年版。
4 《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 403 页。
5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1 月 8 日。
6 《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 405 页。
7 《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 407 页。
8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 188 页。
9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 187—188 页。
10 《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 407 页。
11 《杨虎城不悔祸》，天津《大公报》1937 年 1 月 13 日第 4 版。
12 《王子壮日记》第 4 册第 17 页。

而蒋对杨也有些失去耐心。1 月 16 日，何应钦来电，“杨、于、孙已通电就职，”但“旁晚接杨、孙各一电，仍以张回陕为要求条件，即呈委员长阅之，不胜叹息。”[1]17 日，蒋叮嘱李志刚：“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2]以至张学良也认为西安“所提问题，多不合乎实际，余对陕局，殊抱悲观”。[3]1 月 22 日，蒋提到对杨虎城“尤以恩威并示。”[4]1 月底，蒋又得意道：“对杨虎城数函警告，恩威并济，甚有效益也。”[5]陈布雷对与杨的函电往来印象深刻，其间也折射了他的恶感：“其时陕局仍极动荡，张部要求释张回部，中枢不之许，几不免用兵，而杨虎城操纵其间，尤顽强不讲情理，蒋公手电数次并作长函二教导之。”[6]

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后撤，中央军逼近西安。杨虎城部杜锡勋旅也欲脱离杨，中央军将领对此颇有分歧：“墨三谓恐激怒杨虎城，只拟与该旅表面敷衍，”刘峙主张接受杜归顺中央，“以便将来解决西北封建势力，较易为功。”[7]2 月 7 日，“杨虎城突由西安赴三原，”“李志刚代表西安各界来潼欢迎顾主任入西安。”[8]这时部分杨部军队宣布脱离杨：“杨部警备第二旅旅长张鸿远，警备第三旅旅长孙友仁及孙蔚如师之第四师九旅旅长王毅武均已先率部与杨脱离关系。”[9]闻讯后，蒋欣慰道：“杨逆崩溃之势已成。”[10]而韩振声则谈到“虎城甚懊丧。”[11]但稍后杨对前途仍较乐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杨曾表示：“在这一事变中，我们得罪了一个人，可是振奋了千百万爱国人士，他们就会继续奋斗，实现抗日。”[12]

二、迫杨辞职

中央军进入西安后，如何处置杨虎城是国民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13]蒋对此有周密的指示：“与杨详商处理西北整个办法，详询其意见，且略示推重之意，要其先述办法，并探测其赤匪与张部之方针态度与其轻重之程度，最后探询其李志刚谓其自有进一步办法者，如何进行与实施？”“务使其与中央一致能切实办到。”“对虎城认其为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相待”[14]。为此，顾祝同起初对杨较为尊重。2 月 14 日，杨虎城“由三原乘汽车返西

1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 189 页。
2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344 页。
3 《张学良日记》，1937 年 1 月 18 日。
4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1 月 22 日。
5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1 月反省录。
6 《陈布雷回忆录》第 119 页。
7 《刘峙致蒋介石电》（1937 年 2 月 4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79-064。
8 《顾祝同即进驻西安》，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8 日第 3 版。杨母在二二事件后被投向国民政府的东北军檀自新部劫持，杨虎城往三原一为“迎母”，一为“视察部队”。其间蒋指示妥为照顾杨母，杨虎城事后曾去电感谢。参见《何应钦致阎锡山等电》（1937 年 2 月 17 日），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史料，档案号：116—010101—0115—158；《杨虎城致蒋介石电》（1937 年 2 月 13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300-00004-281。
9 《杨部三旅长已与杨脱离》，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8 日第 3 版。
10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2 月 7 日。
11 《徐永昌日记》第 4 册第 24 页。
12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424 页。
13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 165 页。
14 《蒋介石关于中央军进驻西安城后应注意各事项致顾祝同密电》（1937 年 2 月 7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

安，”“下车后当与顾祝同主任晤面，相谈甚欢。”[1]顾当“晚回拜杨虎城，”杨虎城 15 日又“至行营谒顾，对陕甘善后问题有所谈商”[2]。李志刚也证实：“二月间，蒋介石把杨部的一些人员，或与蒋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并且使顾祝同对杨尽量拉拢言欢，意在消灭对抗情绪。”[3]

同时，蒋也在考虑处置杨及该部问题：“杨、孙之处置。”[4]“对杨虎城之处置。”“陕中各逆部之策略：甲、先杨。乙、次张部。丙、最后共匪。”[5]11 日，蒋指示何应钦“对杨部分化工作可继续进行。”[6]中央军将领中也有根除杨部的意见，刘峙致函陈诚时表示：“顷在敬公部长处阅悉吾兄删未电，主张甚是，极佩卓见，此时虎城势力大见削减，实不能再听其恢复，以前坐大难制而为将来西北之梗，务希吾兄与墨三俊如诸兄妥商进行，如能使虎城将部队交出，从此悉直属于中央，最为上策，否则亦只能就其现有兵力，至多编为一师，庶免后患。”[7]

最初杨虎城似有辞职之意，但此时国民政府尚需借助杨推动善后。“经顾主任祝同敦劝，不致再有辞意，”顾且公开称“本人与杨主任连日晤谈，表示甚佳”[8]。20 日，杨表示“陕省军政各事，今后遵依中央意旨办理，十七路军亦决遵照中央命令指定地点驻防”。他还提到西安事变“违反国家纪纲，不敬领袖之处，私衷颇悔”[9]。这就与国民政府的论调相契合了。在杨虎城的协助下，顾祝同又与高桂滋接洽了陕北治安问题。高 24 日到西安，杨先与高“对陕北治安问题有所谈商，”当晚高“谒顾祝同，报告陕北近况”[10]。顾祝同 25 日“欢宴高桂滋，邀杨虎城等作陪，席间高对陕北近况有详细报告，并对陕北治安问题有所商洽”[11]。

十七路军改编问题，《大公报》认为较为简单：“数额本少，而冯钦哉军长自始坚持大义，不附西安之变，故现时十七路之善后问题更简。杨主任虎城最近决心遵令，”“一切更无问题。”[12]事实上相去不远，杨虎城“连日与顾主任商洽，已有结果，孙蔚如师三警备旅仍维持现状，其他特务团等改编一师”[13]。顾祝同向蒋详细报告了杨部从事变前到当下逐步缩减的情形，“以其余现存兵力，遵照钧座意旨，经费不得超过原有数目，为标准，与虎城商洽整编办法如下：（甲）西安绥署第十七路总部，第三十八军部仍旧，以教导营、特务营编一教导团，骑兵团缩编为营，炮兵营仍旧。（乙）第十七师全部九个团、独立旅三个团，合并编为二个

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211—212 页。

1 《杨虎城昨已返西安》，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15 日第 3 版。

2 《入陕各军相继复员》，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17 日第 3 版。

3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424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4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2 月 8 日。

5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2 月 11 日。

6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40 册第 124 页。

7 《刘峙致陈诚电》（1937 年 2 月 16 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202-00059-028。

8 《府令准张学良复权》，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18 日第 3 版。2 月 22 日，李志刚与冯玉祥谈及杨去职之意时，冯也说“可以不必。”参见《冯玉祥日记》第 5 册第 59 页。

9 《杨谈遵中央意旨办善后》，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

10 《于学忠等宴陕各界告别》，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25 日第 4 版。

11 《于学忠定期赴皖》，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27 日第 3 版。

12 《陕局解决以后》，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10 日第 2 版。

13 《杨虎城部着手改编》，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

整理师，共十个团。（丙）特务两个团、补充三个团新兵一个团，分别编入省警备三个旅，据此共九个团。”经费方面，除冯钦哉部由国民政府直接发给外，其他经费照旧，并请求原由省府承担的部分改由国民政府承担。[1]26 日，杨虎城“率机要科科长周梵伯前往三原召集所部训话，告以中央德意及蒋委员长仁恕之精神，以及连日与顾主任晤谈处理陕省军政经过”[2]。至 3 月 9 日，杨虎城谈“陕事和平解决后，本人曾先后赴三原两次，编制部队，经两周余，诸凡就绪，”“所属三十八军业经编为两师，同时撤销十七路总指挥部。”[3]其间，顾祝同“容纳了杨虎城的意见的。”“由赵寿山和李兴中各领一个师。”李兴中“与十七路军的历史关系不深，又不是陕西人。”然而“杨虎城当时也没有更适当的人选”[4]。

但陈诚对扩编杨虎城部的做法表示不满。[5]在 2 月底，蒋的“去杨”想法也有所流露。2 月 25 日，蒋询孙蔚如“虎城近时感想，彼谓深知对不起委座，又谓自顾主任到后一切已恢复旧状云云。委座谓对余毫无关系，不过对地方实在对不起也。虎城为陕人，子子孙孙均不能离陕地，在本地作了此种事，何以对父老”[6]。这已暗示了蒋有“去杨”之意了。在 2 月反省录里，蒋对杨母为东北军绑胁感慨道：“天网恢恢，害人者自害，何其报之速也。”[7]其间也反映了他对杨的怨恨。

进入 3 月后，蒋“去杨”的念头日益强烈。3 月 1 日，蒋与陈诚谈到张学良“对革命原无历史，此种叛变行为尚有情可原，而杨虎城真是禽兽不如。”[8]3 日，蒋“对杨仍极主（张）解决”[9]。4 日，马占山也对钱大钧表示：“杨虎城居心不良，欲一手把持西北，封建思想浓厚，此人不去，终为后患。”[10]于是蒋辗转示意杨来见他。李志刚写道：“三月间，蒋屡次吹来温暖空气，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这话起先由宋子文告诉我，我说给了杨，杨对宋的话，不甚注意。后来顾祝同也告诉他这样的话，杨才觉着这就是‘命令’，才决意与蒋见面。经过联系，蒋遂规定日期电邀见面。”[11]

杨 3 月 9 日曾谈到“拟日内赴京”[12]。《大公报》随即称赞“杨氏此时入京，很有意义，而且必要。”“杨氏此时亲到首都看看中央的一切，当能更明了中央意旨，秉此意旨，处理陕省善后，西北军政当可望更迅速的步入常轨。”[13]但杨虎城迟迟不见行动。3 月 25 日，蒋向顾祝同询问道：“闻孝侯兄已到陕，何日来京。虎城兄如有暇，望其亦来一叙。”[14]

---

1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 年 2 月 19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79-090。
2 《孙蔚如定明日赴沪谒孔宋》，天津《大公报》1937 年 2 月 28 日第 3 版。
3 《东北军大部已开拔》，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10 日第 3 版。
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 212 页。
5 参见《陈诚先生日记》第 1 册第 115 页，1937 年 2 月 17 日。
6 《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 429 页。
7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2 月反省录。
8 《陈诚先生日记》第 1 册第 120—121 页。
9 《陈诚先生日记》第 1 册第 121 页。
10 《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 435 页。
11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424—425 页。
12 《杨虎城告记者拟日内晋京》，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10 日第 3 版。
13 《杨虎城拟入京》，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10 日第 4 版。
14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37 年 3 月 25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01—016142—00042—024。

3 月 28 日，杨方前往，且提及“此来系奉蒋委员长电召赴杭晋谒，”而杨书面谈话则称“此次南来专为晋谒蒋委员长”。[1]《大公报》对杨此行仍寄予厚望：“现在西北政治上军事上，可说已无问题。但是还有如救济灾荒，整理财政，都不失为目前重大问题，而交通建设，关系更大。这些工作，必须地方当局秉承中央意旨加紧推进。”[2]显然，该报认为杨虎城应在陕西善后以及建设中承担更多工作，但这绝非蒋所乐见。这期间，蒋仍在处心积虑地筹划如何处置杨及其所部：“调杨部出陕。”[3]“对陕杨方针：调该部离陕，抑劝杨离陕，辞职出洋。”[4]3 月 29 日，钱大钧也“签呈一报告，曰杨虎城已离陕来杭，此人不除，终为西北之害，似宜利用此机会，或由西北民众呈请政府羁留南京，或由政府明令免职，不使返陕，或用秘密方法处置。”[5]

3 月 29 日，杨虎城、于学忠来杭州谒蒋。蒋记道：“对杨仍宜宽宥，不加谴责，惟劝其离陕辞职”[6]。当日，蒋“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踏张汉卿先生，”“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在蒋介石这一场讲话中，杨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表示极简单几句话，说：‘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私下里，“杨以为蒋的这次谈话不过是表示宽大，不记旧怨，目的在解除人们对他的戒备。杨对自己的人们说：‘蒋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7]3 月 30 日，蒋认为“对杨应先令其自动离陕，勿调其部队为妥。”当日仅记“下午会客”[8]。而《大公报》则报道：杨虎城 30 日上午“复奉蒋委员长召赴行辕”。据周梵伯称：“今日杨再度谒蒋委员长，情形甚佳，委员长对杨部改编及移防经过，询问甚详”[9]。

3 月 31 日，蒋又“详告其个人之利害与以后之出处，调其自辞离陕，以诚待彼，谅彼亦无可奈何也。”[10]但暗示杨辞职，恐怕不能称为“诚”。据孔从洲转述：蒋询问“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没等杨回答，他又接着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杨当面答应了。事后杨先生说，他当面只好答应；蒋的这一手，他是早就预料到的。”[11]蒋的言辞称为“威逼”更合适，但他却自认为已很宽大：“讽使自辞，令其仍回西安，不追其既往，并训导其利害与是非，到此地步，虽彼不服亦服矣。召来使之复去，示以宽大，实为统一之

1 《于学忠杨虎城抵沪》《于杨过京对记者谈现已无所谓西北问题》，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29 日第 3 版。
2 《于杨南下聆训》，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29 日第 4 版。
3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3 月 23 日。
4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3 月 27 日下周预定表。
5 《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第 441 页。
6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3 月 29 日。
7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425—426 页，
8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3 月 30 日。
9 《杨虎城日内离杭过沪飞西安》，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31 日第 3 版。
10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3 月 31 日。据事略稿本，“调”应为“讽”。参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40 册第 321 页。
11 《孔从洲回忆录》第 202—203 页。

张本。”[1]杨虎城对此有些不满，戴笠报告称：“据邓宝珊密告，宗南同志云，杨虎城在杭闻钧座有令其解职出洋之意后，颇表不满，竟有再行乱干之表示，至沪经邓再三劝解，意气始稍平，现杨准备一个月后出国”。[2]

其间，杨虎城与国府官员间的往来如同往时。3 月 29 日，陈布雷写道：“虎城等来访，未及晤谈”。当日下午回访，“杨、邓均不在，留片而出。”[3]30 日，杨“偕李志刚、邓宝珊等先后赴省府、省党部、市府、保安处拜访，三时往大华饭店访邵力子”[4]。杨虎城 31 日晚赴沪。“杨虎城一日分访宋子文、孔祥熙、于右任等”[5]。4 月 2 日，杨虎城“离沪飞返陕，宋子文、杨虎、俞鸿钧均到机场送行。”到西安后，“孙蔚如及省府重要人员均到机场欢迎，杨虎城下机后，当返新城休息，并接见孙蔚如等，详谈南行经过”[6]。经过西安事变以及军事善后中的对抗，杨仍安于其位，是蒋难以忍受的。

其后蒋就满心考虑对杨的下一步处理：“杨虎城以后之行动。”[7]“电顾，催杨速辞。”[8]“催杨虎城离陕。”[9]关于促杨出国之动机，顾祝同指出：杨“思想顽固，旧军阀观念较重，如杨仍留国内，对西北军的整编，势必增多困难”。其间，顾“多次婉言劝说，并嘱李志刚、米春霖从旁疏导，杨始应允。”[10]《大公报》“社评”也指出了十七路军国军化的方向：“过去组织习惯欠佳，军队外表去现代式若不甚远，而组织与训练方面，似仍未脱除中古封建性之遗传。故陕军应由中央指导督责，整理训练，使之彻底国军化与近代化”[11]。事实上，杨虎城仍然意图留在陕西，“据王劲哉密报称，杨虎城仍怀有绝大野心，孙蔚如唯杨之命是听，虽表示忠诚，断不可信，杨孙实力，除正式军队与警卫各旅外，现仍竭力培养地方民团，及其他民间武力，引为己用，似有植根蒂固之象，必为继患”。刘峙认为“王劲哉随杨最久，所言杨孙之意志及其内情，似甚确实可信，现杨虽奉钧座谕令出洋，孙仍为其替身，且其兵力及地方武力仍旧存在，不无可虑，似宜乘杨出国之后，将其原有各部队调离陕西，彻底整理，并乘机将孙更换，另派妥员，将其培植之地方武力，彻底铲除”[12]。

因此，杨虎城并不立即照办，而是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邓宝珊云，蒋、杨晤面时“虎城辞意尚不决。”[13]16 日，冯钦哉也谈到“虎城电蒋先生，拟以绥靖主任资格出洋考察”[14]。事实上，杨虎城对辞职出洋以及陕省人事仍有所要求。据顾祝同报告：“近与虎城洽谈结果，彼所希望如下：一、彼决心辞职出国，”“惟为保存颜面，及在社会上立足起见，望钧座在杭

1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3 月反省录。
2 《戴笠致蒋介石电》（1937 年 4 月 9 日），台北“国史馆”藏，戴笠史料，档案号：144-010114-0002-038。
3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第 205 页。
4 《杨虎城日内离杭过沪飞西安》，天津《大公报》1937 年 3 月 31 日第 3 版。
5 《杨虎城即返陕》，天津《大公报》1937 年 4 月 2 日第 3 版。
6 《杨虎城昨日飞陕》，天津《大公报》1937 年 4 月 3 日第 3 版。
7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4 月 3 日。
8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4 月 5 日。
9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4 月 23 日。
10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 166 页。
11 《陕甘善后亟应推进》，天津《大公报》1937 年 4 月 9 日第 2 版。
12 《刘峙致蒋介石电》（1937 年 4 月 15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00481-066。
13 《徐永昌日记》第 4 册第 42 页，1937 年 4 月 8 日。
14 《徐永昌日记》第 4 册第 45 页。

时对渠所说，于辞准绥靖主任后，同时发表一国府委员名义；二、望钧座给渠出洋费三十万元；三、孙蔚如对渠离职后，将发生不安状态，如钧座对孙不使之负省府责任，则可于此时明白告其辞职，由中央另委人接替。如钧座仍令孙负省府责任，则请明白告其安心供职；四、绥靖公署如不取消，拟保孙蔚如继任，若决取消，可否恢复第十七路名义，以孙蔚如充任，或绥署总指挥均不存在，可否扩充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之军部，以容纳绥署大部份官佐。职对第三项，已告其转致蔚如安心负省政责，积极做去，勿存他念。”但蒋只满足了他的部分要求：“在杭时，以其辞职后，拟委军事委员等职名义出洋，但并未言及国府委员，”“如虎城辞职，则待其出洋时可设法予其军事委员护照，”但“不能于辞职照准时发表”；“虎城辞职出洋，则政府当给其十万元；”“绥署与十七路名义皆应撤消，卅八军军部亦不宜扩充，如其要安插人员，则可由行营设法安置。”蒋还转告杨“不应提任何要求条件，”“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望其能于本月内来沪”[1]。稍后，杨仍要求增加出国费，“虎城决遵钧旨，月底赴杭晋谒钧座，准备出国，惟仍深望钧座能增给彼出国费十万元，”蒋批示杨到沪后可酌加“五万，倘其出洋后，不能敷足，可再稍助也。”[2]

关于辞职出洋，4 月 23 日“杨召所部官佐训话时已宣布，但尚未确定行期”。24 日，孙蔚如、赵寿山等“有联名电向中央陈情”[3]。24 日，邵力子报告称：“接西安来电，杨虎城已准备离陕出洋，号日派李志刚赴沪，筹备手续，惟是否完全真诚，尚难断定。又闻孙蔚如甚希望杨出洋。”[4]可见，此事备受关注。4 月 27 日，杨虎城终于电蒋辞陕西省绥靖主任。杨的电文仍包含很多内容，一方面他仍在申明兵谏之良善意图：“去岁西安之事，因虑民族之沦胥，遽昧行为之操切。”一方面则遵从蒋的意思：“顾念纪纲，惩前毖后，”“自解于袍泽。”[5]有趣的是，同日蒋还在叮嘱顾祝同继续劝杨并安抚孙蔚如等：“李维城来沪向子文，以蔚如寿山等之意，表示挽留虎城之意。请转告蔚如兄等，虎城出洋，不惟于私为最有益，而且于公亦惟此一法，否则以私害公，未有不误也。中为成全旧日所部与同志之外，再无所求。并告虎城兄，勿再为细言所误，务盼于月内到沪相晤。”[6]而当日顾祝同也电蒋介绍其安抚工作并分析孙蔚如等人心理：“一面开导不可摇动虎城已定出国之决心，更应了解钧座对杨之殊恩，及爱护三十八军厚意，一面细察该等此举之真象，约有三点：一、该等对虎城历史关系，于情面上不能不作此一举；二、藉此请求中央对于虎城待遇上，稍求优厚；三、深恐虎城去后，三十八军不易存在。”并建议蒋复电时“稍加宣谕慰勉，以安其众，使彼无可藉口，则行期自难再延。”[7]其间蒋也很慎重。他指示顾祝同：“虎城未离西安期间，在西安城内外各

1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 年 4 月 13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00481-056。
2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 年 4 月 19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481-093。
3 《杨虎城出洋》，天津《大公报》1937 年 4 月 27 日第 3 版。
4 《邵力子致蒋介石电》（1937 年 4 月 24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90300-00006-123。“号日”指 20 日。
5 《致电蒋介石请辞本职》（1937 年 4 月 27 日），《杨虎城文集》第 319 页。
6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37 年 4 月 27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案号：001—016142—00042—083。
7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 年 4 月 27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00481-113。

部队应严密防范布置，以备万一，夜间尤为紧要，并备巷战，但切勿声张。”[1]中共对此事也有反应，但并不激烈。4 月 26、27 日，周恩来“鉴于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解决办法。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并公开发文章对南京政府逼杨出国，裁撤西安绥靖公署表示不满。”[2]

三、杨虎城的延宕出洋

在杨虎城辞职后，蒋介石等人的关注点立即转到促其出洋上来。蒋执意促杨早行。“问杨虎城何日来沪。”“力促杨虎城出洋。”[3]“杨虎城出洋离陕。”[4]顾祝同报告道：“虎城预定五月二日，至迟鱼日飞沪，在此期间当谨慎戒备，职现每日均与之见面，尚未发现有何异动模样。”[5]蒋 30 日复电准杨辞职，但他当日曾为此回复两电，其一云“所请照准，并派兄出洋考察军事”；其二除前电内容外，又云“尚希即日摒挡，早赴事功为盼”[6]。从电文之频繁与内容，可见蒋“去杨”之急切心理。

而十七路军也有一部分人希望杨“早日离开，以便于他们行使职权。”[7]《大公报》也不时放出杨出洋的消息：杨“现定二十九日由陕飞沪，晋谒蒋委员长，请示一切后，来京谒各当局，并准备下月中即放洋。”[8]杨“六日可离陕赴沪，办理出国手续”[9]。该报还着力宣扬杨出国的好处：“现陕局大定，军政渐复常轨，杨氏乘此机会外游，于公于私，可谓都有裨益。”“杨氏在陕奋斗有年，部下也是有光荣历史的军队。此次出洋，更得增益知识，归国以后，必能对国家有切实的贡献。”[10]

杨虎城也开始向各方辞行。4 月 29 日，杨“宴请陕籍在野名流，表示惜别之意”。5 月 1 日，杨又“设宴招待西安各界首领话别，”“希望秦中父老兄弟同心协力，注意各项建设事业”[11]。其间，杨不再提蒋许诺等事，仅称“去岁西安之事，虽以蒋委员长精诚感召及各方努力，终得和平解决”[12]。数日后，顾祝同则转报了樊崧甫的报告：杨部“十七师近日派员在三原附近及富平、仁济、仁和两乡强迫壮丁入伍，遇有商客行旅任意搜检攫夺财帛”“红军在庄襄镇开会，并举行阅兵及各种游艺，赵李两师均派（？）员参加。”两部“往还甚密”。[13]这只会更坚定蒋的“去杨”之心。

---

1 《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37 年 4 月 26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00277-088。
2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 371 页。
3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4 月 28 日。
4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5 月 1 日下周预定表。
5 《顾祝同复蒋介石电》（1937 年 4 月 28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00277-088。
6 《杨虎城辞职照准》，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 日第 3 版。
7 《往事：杨虎城之子回忆》第 138 页。
8 《杨虎城预定明日飞上海》，天津《大公报》1937 年 4 月 28 日第 3 版。
9 《杨虎城定下周赴沪》，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1 日第 3 版。
10 《杨虎城辞职照准》，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 日第 4 版。
11 《蒋委员长派杨出洋考察军事》，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 日第 3 版。
12 《于学忠定今日入京》，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3 日第 3 版。
13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 年 5 月 6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300-00139-209。

杨虎城原定 5 月 6 日“乘欧亚机离陕南行，”“本月下旬即可放洋”[1]。但在行前，杨虎城等突然退票，因杨“患流行性感冒”[2]。据称“杨虎城因前数日酬酢过忙，四日起患感冒，五日六日两日热度均甚高，闻已至三十九度余，近由省立医院外科主任于明江、内科主任迟仲阳诊治”[3]。外界对此不免有些怀疑。其中，尤以蒋最为焦躁，他连日关注此事：“杨虎城迟不离陕之原因。”[4]“电问杨病。”[5]5 月 7 日，刘峙在南京澄清道：“杨虎城延期离陕，闻确属有病，并无他种原因。”[6]

杨虎城的生病颇为蹊跷，其感冒发烧或者属实，但其后的一些操作却似乎有意布置：杨虎城 6 日电沪友，“谓患感冒甚重，喉部红肿，热度甚高，望着李志刚延陆仲安乘欧亚七日班机往诊治，因电到过晚，陆李未赶及搭机飞陕”。7 日，“杨之秘书周梵百电沪，请陆李乘车往”[7]。8 日，周梵百又电沪称，杨“有渐愈之望，陆仲安医师可暂缓来陕。”医师迟仲阳也称杨体温“已恢复常态，惟喉病尚待治疗，约再休养数日，精神体力当可完全复元”[8]。10 日，杨又电沪友，“定十三日乘欧亚机飞沪”[9]。但稍后又“改定十六日乘欧亚班飞机启行。”邓宝珊 13 日也称杨“喉管炎症亦较前减轻大半，再有数日之休养，即可恢复健康。”[10]恰在此时，杨第三子“十三日病故，杨甚悲痛，孙蔚如十四日曾往慰问，据谈杨主任悲悼之余，精神不佳，赴沪之期现尚未定。”[11]15 日，陕西省党部的韩光琦又电沪称，“杨虎城七岁子故后，杨母伤痛过甚，昏厥数次，杨遭此人间惨变，赴沪期展缓”[12]。其后又有 20 日赴沪之说，“嗣以体力终觉不支，”医生“认为系心脏病发，劝其静养，杨太夫人亦嘱以医言为重，遂决定展缓行期。”[13]这些说辞本身就有些牵强，而又出自邓宝珊、孙蔚如、周梵百等杨的部属，加之接连改期，自然令人生疑。

但蒋介石即便看破杨的伎俩，也未便说破，还要假意安慰。5 月 8 日，蒋电顾祝同转杨虎城，“闻兄喉病甚念，未知今日有否痊可，望悉心调治，未知西安有无良医，请详示病状，此间可派专医来陕，倘无大碍，则请兄乘车来沪诊治亦可”[14]。9 日，顾祝同报告道：“职顷晤虎城，体温已如常人，只喉痛未复原，再静养数日，即可全愈，渠现定元日仍乘飞机赴沪。”[15]同日，冯玉祥见李维城时却触及了杨接连推迟的原因：李“谈杨虎城进退为难之情形，并

1 《于学忠定今日入京》，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3 日第 3 版。
2 《杨虎城展期飞沪》《杨患流行性感冒未痊》，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6 日第 4 版。
3 《刘尚清抵皖杨虎城展期南行》，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7 日第 3 版。
4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5 月 5 日。
5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5 月 6 日。
6 《刘峙昨晨到京请示》，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
7 《东北军将着手整理》，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8 日第 3 版。
8 《蒋委员长嘱杨虎城安心疗养》，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9 日第 3 版。
9 《何应钦昨到沪杨虎城即离陕》，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11 日第 3 版。
10 《何应钦赴沪杨虎城即离陕》，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14 日第 3 版。
11 《待何部长今日返京即可商决》，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15 日第 3 版。
12 《何应钦昨晚由沪返京》，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16 日第 3 版。
13 《刘峙王树常昨离京赴汴》，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0 日第 3 版。
14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40 册第 372 页。
15 《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7 年 5 月 9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90300-00005-079。“元日”指 13 日。

言见介石所得之印象，介石要其走开也。李找宋子文说无效。”[1]李维城也提到宋子文认为“这个请求没有什么好处，只有赶快来沪准备放洋，如果有病来上海医治也比西安强些。”即便向蒋进言，“他也决不会采纳，你最好不要去见他，增加对他的刺激。”[2]可见，杨公开拖延不成，只能借故拖延。但蒋已经很不耐烦了：“杨逆犹未离陕也。”拟“促杨虎城出洋。”[3]

事实上，杨虎城的病有虚有实。5 月 14 日，戴笠报告称：“据西安站元电称，杨虎城鱼日经医生检查，患肾脏炎，现已愈十分之八九，绥署已撤销，编遣亦已就绪，新城由三十八军接收，其左右有劝其勿离陕者，并制造谣言，谓恐杨到沪后，中央不令出国，甚或将其监视等语，以耸听闻。”[4]杨拯民也回忆称：“父亲在西安事变期间精神高度紧张，极端劳累，事变和平解决后，身心暂时松弛了下来，可又面临着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十分困惑，因而病倒了，患了心脏病。”“家里由蕙兰娘照顾父亲，不幸的是拯人弟这时也病了，由于家里人都忙着父亲的病，未能及时把拯人弟送医院治疗。”最后杨拯人病逝，这对杨妻是个巨大的打击。“这时，南京当局一再催促父亲赴沪出国，父亲丧子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5]可见，杨虎城的生病与丧子都属实，但杨的真意却是等待抗战的早日爆发：“杨先生回陕以后，仍在注视华北的紧张局势，他以为经过此次事变，蒋介石已经挡不住人民的抗日热潮了。”“一旦抗日爆发，他就不再出国而参加抗战了，他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他到上海住宋子文家准备出国前夕还没有放弃。”[6]

5 月 22 日，李志刚抵京，“代表杨虎城有所陈述，在京稍事接洽，即代杨办理出国手续，至杨虎城来京期尚未定。”[7]李的说法是“杨虎城因心脏病未愈，离陕期将展至下月”[8]。但很快《大公报》就宣称“杨虎城病愈，精神日渐复原，定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乘欧亚班机飞沪转京，杨二十五日派员向欧亚公司西安站定就座位，购票九张”[9]。此数日间，杨当受到南京方面很大的压力，因而改变决定。《大公报》却宣称杨“出国考察心切，决力疾成行”[10]。杨虎城 27 日飞沪，“西安各界前往欢送者达二万余人，盛况空前”[11]。获悉消息后，蒋终于放心：“杨虎城已离陕到沪矣。”[12]然而，“除宋子文、杨虎、戴笠等和几位陕西同乡常来看他外，一些相熟的高级官员来沪者，多避嫌不敢来看。”[13]

本来杨“出国期须俟谒蒋委员长后确定。”[14]28 日，蒋致电宋子文并转杨虎城称：“虎兄既决心出国考察，似应早日成行，未知何日有船，若船期急促，则不必来庐，以免跋涉误期，

1 《冯玉祥日记》第 5 册，第 159—160 页。
2 李维城《西安事变的片断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178—179 页。
3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5 月 15 日本周反省录、下周预定表。
4 《戴笠致蒋介石电》（1937 年 5 月 14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00492—055。“元、鱼”指 13 日和 6 日。
5 杨拯民《往事：杨虎城之子回忆》第 138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年版。
6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427 页。
7 《杨虎城离陕期尚未定》，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3 日第 3 版。
8 《杨虎城将展至下月离陕》，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4 日第 3 版。
9 《杨虎城明日飞沪》，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6 日第 3 版。
10 《李志刚赴沪候杨虎城》，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7 日第 3 版。
11 《杨虎城昨飞沪日内晋京》，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28 日第 3 版。
12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5 月 27 日。
13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427—428 页。
14 《蒋院长呈中央销假》，天津《大公报》1937 年 5 月 30 日第 3 版。

一切托文兄代为照顾”。“如船期尚有余暇，则月初再约会期”[1]。显然，蒋仍希望杨尽早出国。5 月 29 日蒋在本周反省录写道：“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2]6 月 4 日，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等人飞往庐山，“除报告绥署结束经过外，并对出国考察事有所请示”[3]。6 月 5 日，蒋“下午约虎城等吃饭。”[4]杨 7 日“飞沪，准备行装”。[5]为安抚杨，蒋还建议宋子文“如有暇，请与其同来何如。”[6]

杨虎城到沪后，“因酬应繁忙，心脏病复发，正延医诊治，”但行期“不致变更”[7]。李志刚 17 日至外交部谒王宠惠，“并领杨之出国护照”[8]。

其间，蒋还曾收到关于杨虎城和孙蔚如的一些负面消息。[9]但杨出国在即，蒋自然不会轻举妄动。20 日，赵寿山、孔从洲等飞沪为杨虎城送行。[10]其间，杨虎城谈到“这次事变，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扣了蒋介石，使他没脸，也不可能再打内战了，所谓‘停止内战’一点，大体做到了。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战’，我能不能亲身参加很难说，主要依靠你们了。”[11]可见，杨尽管有些官样文章的表态，但对发动事变并不后悔。

6 月 29 日，杨虎城一行 6 人出洋，杨向记者谈到“此次奉命出国考察军事，在个人方面尚拟对于实业及农业等多加考察，藉作将来开发故乡之准备，”“为期当在一年以上。”[12]但私下里杨的设想是“一旦抗日实现，我就回来。”“我看抗战爆发，不会很远了，我准备到外国走马观花，快去快回。”如时间稍长，“多找些朋友，了解些各国社会情况和人民的生活，尽量揭露日寇的侵略，争取各国人士对我们的同情”[13]。

四、结语

西安事变善后中，国民政府对杨虎城的处置包含了较浓的“惩罚”色彩，但又不便对杨进行公开审判，所以蒋介石只能劝说、压迫其辞职、出洋。其间，蒋、杨矛盾越积越深，国民党高层、中共以及杨部的建言都无济于事。对杨虎城的处置事实上主要出自蒋，这符合蒋以及被扣大员的意愿，也符合国民政府维护纲纪、掌握西北的目标。顾祝同也提到杨出国后“西北军从此亦完全纳入国军体系。”[14]可见，杨虎城留在国内对西安行营乃至国民政府确有

1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 40 册第 394 页。
2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5 月 29 日本周反省录。
3 《杨虎城昨抵庐山》《宋子文邓宝珊昨日亦到牯岭》，天津《大公报》1937 年 6 月 5 日第 3 版。
4 《蒋介石日记》，1937 年 6 月 5 日。
5 《杨虎城昨飞沪预定月内出国》，天津《大公报》1937 年 6 月 8 日第 3 版。
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37 年 6 月 1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80200-00279-001。
7 《冯副委长过芜赴赣谒蒋院长》，天津《大公报》1937 年 6 月 16 日第 3 版。
8 《刘湘促何部长入川盼军整会早日成立》，天津《大公报》1937 年 6 月 18 日第 3 版。
9 参见《赵清廉致蒋介石电》（1937 年 6 月 19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90300-00006-129。
10 《筹备庐山训练》，天津《大公报》1937 年 6 月 21 日第 3 版。
11 孔从洲《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后》，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169 页。
12 《杨虎城出国考察》，天津《大公报》1937 年 6 月 30 日第 3 版。
13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第 428 页。
14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第 166 页。

很大压力。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力图迫使蒋践行诺言，因而继续扮演了“恶人”的角色。中央军进入西安后，杨一方面协助善后，服从改编；另一方面则希望留在陕西任上或国内，推动或参与抗战工作。但这是蒋决不能容忍的。杨与蒋的明争暗斗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在蒋及南京国民政府强势掌控下，杨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反而加深了与蒋的矛盾，并强化了蒋日后彻底解决的决心。

王春林，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与西安事变关系之探讨

张万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简称核心组成员)是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学良亲自指定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核心，负责东北抗日救亡工作。代表性人物有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人。他们关注张学良的思想动态与东北军的发展，参与张学良的重大决策,为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促使西安事变的爆发等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在西安事变研究中，有关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与西安事变关系之探讨①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试图以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主线,通过梳理其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战略思想及开展的一系列救亡实践活动，探析他们对西安事变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从而对他们与西安事变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也对东北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评价。

一、“张学良核心组会议”为张学良和东北军指明前途和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爱国人士基于民族义愤，在北平自发组建了东北第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们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吸引了全国各党各派的爱国人士。鉴于救国会领导层复杂，张学良指定“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10 人组成核心组，实际负责救国会的领导。而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 6 人为核心组中的“核心”，因为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从年轻时代就一直追随张学良，东北沦陷后一直以张学良和东北军为核心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而其他 4 人，后来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了这个核心组。有的被青年党暗杀，有的追随国民党，有的中途执行其他任务。只有他们 6 人团结一致，一直以张学良核心组名义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工作，是张学良的智囊团和重要参议。如杜重远活跃在抗日文化战线，在《生活周刊》被查封后，将其改为《新生周刊》，自任总编和发行人。1935 年 5 月，因日本方面认为该刊登载《闲话皇帝》一文有辱日本天皇，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杜重远因此被判刑，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一时间海内外声援杜重远的呼声此起彼伏。高崇民执着于抗日救亡，对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的“四维学会”十分抵触，在“四维学会”理事会上因批评蒋介石不抗日与蒋方发生争执，以“侮辱领袖”罪名被国民党方面通缉，被迫流亡上海。阎宝航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就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力图赋予新生活运动以抗日救国的内容，支援和掩护东北救亡人士。王卓然和王化一作为流亡中的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的校长，在艰难的岁月中，竭力维护这两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开展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不遗余力。

张学良从欧洲归国后，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东北军到鄂豫皖进行“剿共”。1935 年 9 月，东北军又被派到西北的“剿共”前线与红军进行内战，在战场上

屡屡受挫。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此忧心如焚。经高崇民联络，10 月 11 日，核心组成员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齐聚杜重远被关押的上海漕河泾狱中，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张学良核心组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就是探讨东北军的前途问题。他们认为在日本侵略加深的情况下，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东北军走上“剿共”内战是中了蒋介石一石二鸟的阴谋，是没有前途的。如果东北军执意与红军作战，不久就会被红军消灭，东北流亡军民再无打回老家去的实力。大家一致认为，若要收复东北，必须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存实力。杜重远提出东北军的前途应该是联合西北军、红军，共同形成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个设想得到了核心组人员的高度认可。大家推荐高、阎二人起草，写信表达这个想法。杜重远推荐高崇民向张学良面陈利害，同时写信给杨虎城、杜斌丞等人向其介绍好友高崇民。

11 月，高崇民持信到达西安。此时，张学良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借此机会赴沪密晤好友杜重远，将心中的苦闷告之。杜重远将“核心组会议”内容向其传达，杜重远成为“最初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1]140。回到西安后，张学良从高崇民那里见到了核心组成员给他的建议书。经过核心组成员的直言劝谏，张学良确切感受到他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逆历史潮流、走不通的死路，这使张学良在苦闷彷徨中见到了曙光，联共抗日的思想在内心萌动。核心组会议给张学良指明了前途和方向，坚定了张学良不打内战、坚决抗日的决心，开始寻找共产党，为东北军寻找新的出路。他委托 67 军军长王以哲从前线、李杜从上海方面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不久，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自愿担当红军与东北军联络的使者。在其联络下，1936 年 4 月，张学良和中共方面举行了肤施会谈。东北军与红军建立起友好关系，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二、力促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

西北大联合，即东北军联共、联西北军、联苏共同抗日的策略。杜重远是公认的西北大联合的总设计师，高崇民是进行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实践者。西北大联合计划实施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35 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各党派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5 年 11 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启发下，狱中的杜重远在为张学良指明东北军的前途时，还向张学良谏言西北大联合设想：“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2]18。张学良对此深表赞许，开始酝酿西北大联合事宜。

高崇民抵达西安后，张学良告之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存有误会，之前经人调解无果，希望他能够做一些工作，沟通双方关系。高崇民接受这个重任，主动拜访杨虎城。他坦诚地向杨虎城说明张学良的良苦用心，“打回老家去”才是张学良的唯一目标。经过几次与杨虎

城推心置腹的交谈，高崇民给杨虎城留下了很好印象，对张学良的误会也逐渐消除，他表示西北军愿意在张学良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在杨虎城和杜斌丞介绍下，高崇民还与孙蔚如、赵寿山、申伯纯等几位西北军高级将领结识，召开联席会探讨合作问题。高崇民住的西安双仁府 8 号成了双方开展联系活动的据点。杨虎城也委托申伯纯处长负责与东北军的联络。1936 年 4 月，在高崇民陪同下，杨虎城来到东北军驻地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面。因为有了高崇民之前的工作，张、杨会谈气氛良好。双方决定不打内战、与红军进行三方合作，确定“在防地安排上，在警备区分上，在巡逻放卡上，在军需采购上各个方面”[3]247 的合作等。张与杨两人形成了兄弟般的情谊，东北军与西北军上层人士间也日趋亲密起来。

核心组成员还将西北大联合的思想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进行宣传，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高崇民与中共地下党员孙达生、栗又文合写了一个小册子《活路》，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西北大联合的的战略思想，力劝东北军只有联共、联西北军才能有前途、有活路，在两军中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士兵们思想开始动摇，不再愿意从事“剿共”内战。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下令逮捕有关参与人员，史称“活路事件”。高崇民再次被国民党方面通缉，在张学良的暗中保护下离开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 20 年后，曾做过国民党内政部长、CC 派的彭昭贤对与东北军与西北军能进行合作还是非常不解[4]11。依彭昭贤看法，杨虎城将地盘观念看得非常重，是不可能与东北军进行合作的。其实，彭昭贤的疑惑早已有了答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的境遇促使他们都在考虑如何生存和自保问题。因为有杜重远、高崇民等东北爱国人士的穿针引线，相互沟通，终于促成他们之间的合作。1936 年 9 月左右，西北的军事大联合已经建立起来。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张学良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前提条件。

三、西安事变前坚定张学良采取“扣蒋”行动的决心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关注张学良的思想动态，前往西安共献抗日大计，其爱国主张坚定了张学良采取“扣蒋”行动的决心与勇气。同时，王化一从武昌发来的华密电报是促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6 年 10 月，刚刚刑满释放的杜重远应邀前往西安。他劝谏张、杨与红军加紧合作，还要继续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人员加强联系，推动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他的影响下，张学良早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就与救国会建立起联系，曾捐助救国会二三千元[5]99。 他曾自述“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6]对他思想影响很大，他们劝其要破釜沉舟，向蒋介石谏言抗日。11 月 23 日，救国会领袖因宣传抗日救亡被捕入狱。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摧残爱国人士，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在他苦谏、哭谏无效后，七君子事件成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导火索之一。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之一就有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杜重远的建议对张学良抗日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因“活路事件”被通缉的高崇民被张学良派人秘密接回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的卢广绩、陈先舟、刘多荃、胡圣一与西北军方面的申伯纯、王炳南、王菊人和中共驻西北军的代表张文彬等一些重要人士经常前来拜访。他们经常交换意见，商讨如何逼蒋抗日等问题。高崇民加紧做两军的联合工作。1936 年 11 月 4 日，朱理治给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决定 G 同志推动杨。G 是写《活路》的，被蒋介石查出后通缉。现始回来，是张、杨的中间人。G 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7]25(G，即高崇民)可见，通过高崇民的努力，已经使张、杨两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最初的相互猜疑，变成了最后的肝胆相照的朋友。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一个月，核心组部分成员又聚集西安，和张学良商谈联共抗日等重大问题。11 月初，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之名到达西安，他向张学良建议，联共抗日是大势所趋，希望张学良能尽快转变思想，带领东北军早日打回老家去。以阎宝航来西安为契机，张学良将核心组王卓然、王化一召集到西安，一起商谈抗日复土计划。11 月 14 日，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应邀到金家巷公馆会谈一日，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张希望他们分别去和高崇民商议，将会议精神传达与他。这次部分核心组成员会议无疑让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更为坚定，为发动西安事变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不久，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离开西安。在王卓然临行前，张学良向他表明了态度：“第一，抗日救国是他的唯一宗旨，虽刀锯斧钺加之，绝不变更，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第二，在抗日救国的大原则下，绝不做亲者痛心，仇者快意的事，意思是自己一向不主张内战，故自己决不内战。第三，为自己要领东北军到最前线，故要积极地健全本身，充实自己，刷新东北军的内部。”[8]162

在西安事变前，王化一的一份密电是促使张学良发动事变的一个导火索。张学良从武昌行营移驻西安后，将王化一以四维学会及东北中学校长的名义留在武昌。1936 年 12 月 1 日晚，王化一应邀参加湖北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的招待会，散席后何告诉王化一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要把东北军先调至苏、皖，然后再调入闽，使之与十七路军、红军隔离。何与张学良私交甚厚，何得知此事非同小可，故告知王化一，让张学良有所准备。王化一立即给张学良发了密电，即“华密”电报。“华密”电报是张学良与王化一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张学良接到“华密”电报后，意识到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自己必须有所抉择了。后来张学良对王化一说，“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这才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发生意外，因之临时决定。”[9]265 可见，王化一所发的“华密”电报对张学良采取行动起到了促进性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夜，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参与策划西安事变。1936 年 12 月 11 日夜，张学良将核心组高崇民、卢广绩及洪钫和黎天才接到新城。张学良明确向他们表明要实施“扣蒋”行动，要他们草拟一个通电稿，并问询该如何表述此举动的名称。高崇民予以典故，认为起名“兵谏”为宜。高崇民、卢广绩等 4 人参与起草通电，表明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高崇民等参与起草的电文，后来经过征询东北军、西北军政人员的意见修改后，就

是 12 月 13 日对外发出的《对时局通电》。对于这次“兵谏”，高崇民、卢广绩等人加紧做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配合工作，筹备兵谏事宜。

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西安事变发生时，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在西安，核心组其他成员在异地。不管身居何处，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客观分析时局，力图和平解决，这成为推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方面因素。

核心组成员从抗日救国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杜重远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从全民族救国大业出发，主张应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遂联络各党派、各团体知名人士，希望他们团结起来，打破成见，共同应对。他给国民政府有影响的冯玉祥、孔祥熙致电，认为营救蒋介石为当今第一要务，希望他们力持镇静。他还致信给社会知名人士杜月笙、黄炎培，希望他们共救危舟，否则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将步西班牙之后尘。国民党当局认定杜重远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臧启芳建议陈果夫，“杜重远不能摆在张学良身边，否则影响太大;摆在外边也会出乱子，因此宁可将把他押起来”[10]141。于是陈致电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命其将杜扣押。熊式辉马上以共商解决西安事变一事的名义电邀杜重远火速赶赴南京，将其扣押。直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杜才恢复自由。杜重远在中共还未形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之前就能有此种远见和主张，确属难能可贵。

核心组成员还做国民党官员的思想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核心组成员卢广绩受张学良委托，做被押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的思想和联络工作。卢广绩是周恩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的同窗。周恩来到西安后，专门探望了老同学卢广绩，将中共的政策告知，希望他能做一些和平解决的工作。肩负着张学良和周恩来两方面的重托，卢广绩抓紧做被俘的国民党官员的思想工作。他首先去慰问扣押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蒋百里，做其思想工作。蒋百里劝说蒋写信给南京当局，暂停轰炸 3 天，建议派蒋鼎文到南京与何应钦商议解决办法。卢广绩还做了“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的思想工作。曾扩情表示愿意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自己的责任。他以“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的身份，向全国人民进行广播，声明西安事变只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进行协商将很快得以解决。还致函南京方面和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上书蒋介石，替张杨辩解。这些因素也对蒋介石产生了一定影响。

核心组成员拥护中共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推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路线。高崇民是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召集人，还是中共和平路线的积极推行者。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确定后，尤其是经周恩来精辟的分析后，高崇民思想发生转变，认为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能真正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他主张和平解决的前提是“有条件放蒋”，多次主持设计委员会议，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最后确定蒋介石只有做出“三项保证”，才能释放。张学良执意要陪蒋介石到南京，不料却被长期扣押。东北军内部群情激愤，誓与南京方面决战。这时，高崇民的主和作用便显现出来，对于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竭力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东北军主战派一致要求释放张学良，准备与中央军决战。中央军对西北进行了军事部署，内战一触即发。为了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避免东北军的内乱，核心组成员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先后受国民党和张学良两方面的委托，前去西安做和谈工作。他们劝说东北军将领团结一致，避免与南京方面发生冲突。西安的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两人从大局出发，全力维护东北军的团结。他们遵从张学良的指示，为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不遗余力。

鉴于核心组成员在东北的威望和地位，加之与张学良的亲密关系，他们自然成为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解决善后问题的首要人选。阎宝航是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持有张的亲笔信最早抵达西安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东北方面人士。宋子文、宋美龄向阎做出保证，承诺释放张学良，委托其前往西安，希望杨虎城放回被扣的 50 多架战斗机和 500 名空勤人员。阎宝航接受了这个任务，12 月 29 日飞抵西安。西安方面作出了让步，但张学良被蒋介石交军法审判的消息不久传来，给了阎宝航当头一棒。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拍案而起，联名发表“歌电”，要求释放张学良，否则不惜一战。他们分函给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委托阎宝航带回。阎宝航返回南京，向南京方面讨要说法未果，让其处于尴尬境地。

张学良被长期监禁的消息激起了西安方面的强烈愤慨，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形下，戴笠找到了核心组成员王化一，希望王化一、吴翰涛持有张学良、蒋介石的亲笔函，阻止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何应钦也做出军事行动停止后张学良便可回西安的保证。于是王、吴前往西安谋求和平解决，将张学良“主和”的意见转达给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军政人员，但一些东北军主战派还是要求武力解决。为此，他与西安的高崇民彻夜长谈，均认为东北军的团结是张学良恢复自由的前提。王化一访米春霖、鲍文樾、马占山及主战派孙铭九等人，请其维护东北军的工作。杨虎城还是认真听取了他的劝谏，决心停止军事行动。1937 年 1 月 10 日午后，洛阳前方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军事行动的停止标志着王化一此行任务的基本完成。1 月 11 日，王化一与吴翰涛返回南京。

王化一离开西安后，蒋介石提出甲乙两个方案，要求西北方面选择其一。西北方面“和”“战”之争 愈演愈烈。身在西安的高崇民、卢广绩都对此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希望核心组成员能聚在一起探讨，在东北军最无助的时刻作出决策，共同担当，帮助东北军度过危局。当阎宝航、王化一带着张学良的嘱托 前来时，他们表示绝对服从张学良的“主和”意见。杨虎城对主和的高崇民产生不满，高得知后，于 1 月 28 日到渭南前线的刘多荃处暂居。2 月 2 日上午，高崇民约卢广绩、陈先舟一起商讨如何维护东北军 团结问题。但还没等他们前来，就传来了王以哲被东北军少壮派枪杀的噩耗。刘多荃为王以哲报仇，派 兵向西安取攻势。高崇民从大局出发，劝诫刘多荃不可出兵，但可以回兵临潼，让主战派冷静下来。

核心组成员卢广绩准备应高崇民之约前往渭南时，“二二事件”发生了，东北军的内乱即将发生。2 月 3 日，卢广绩受中共周恩来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委托，去询问孙铭九等人如何打算。周恩来命刘鼎在 2 月 4 日下午带孙铭九等人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 缪澂流、刘多荃对中共、杨虎城两方面非常不满，主动采取攻势，给驻三原的十七路军造成威胁。为解除双方的误会，2 月 5 日，杨虎城委托卢广 绩去高陵做解释说服工作。卢广绩将中共的态度与杨虎城的立场告之，解除了双方的误会，避免了东 北军的内乱。在这种情形下，劝说东北军执行甲方案，成为高崇民和卢广绩的共同心愿。其实在“二二 事件”发生之前，东北军将领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执行甲方案。但由于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内部发生动摇，东北军高级将领从各自利益出发，不愿意再执行甲方案，所以在思想上希望东调。东北军 准备执行乙方案后，高、卢觉得东北军已经无望，于 2 月底离开东北军。

核心组成员王卓然在“二二事件”后，也被国民党方面派往西安处理善后工作。王卓然和何柱国被 允许去奉化探望张学良，张学良要求他们转告东北军将领，不要为争取他个人的自由而与南京方面发 生冲突，要争取枪口一致对外。 王卓然和何柱国火速飞往西安，历访各将领，传达张学良的旨意。 王卓 然还把自己的著作《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委托西安大公报分馆代为发行 8000 册。王卓然见到了中 共代表团周恩来，周恩来认为大家唯有尽最大努力，才能使张学良的主张得以实现，共产党方面会责 无旁贷。对此，王卓然深受感动。在西安，王卓然虽然按照张学良的指示劝说东北军各将领，争取和平 善后，无奈此时东北军各将领都为自己的前途与利益打算，没有按照张学良预期的“一致对外向南京 坚持”。王卓然深知无法挽救危局，只能离开西安。

结语

核心组成员作为张学良的幕僚好友、东北军的高级参议，虽不能力挽狂澜，拯救民族危亡于水火，但其思想与实践在西安事变期间产生了重要影响。概括来说，他们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忠实谏言者，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直接推动者、西北大联合的积极联络者和组织者，西安事变的积极策划者、参与者和支持者，西安事变后的全力维护者。

核心组成员在西安事变期间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是西安事变爆发的最核心因素，其中与核心组成员的劝谏密不可分。第二，核心组成员酝酿和策划的西北大联合思想，早于中共在 1936 年初制定的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们力促而形成的西北大联合，奠定了西安事变发动的基础。第三，西安事变前王化一的“华密”电报、核心组成员对张学良的劝谏虽然不是事变爆发的最直接因素，但成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促进性因素之一。第四，西安事变后，在中共还未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之前，核心组成员杜重远等人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对于时局的发展和对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核心组成员是在张学良被扣押后处理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最合适人选，他们在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几方面斡旋，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对于时局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也产生了影响。

核心组成员是一个特殊的爱国群体，他们大多与国民党方面、中共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 其对中共的好感与日俱增。如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在国民党内担任一定职务，张学良被扣押后被当 作国民党方面的特使去西安调停。杜重远、高崇民则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对国民党有了质的认识，开始 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成为“左”倾爱国人士。“张学良核心组会议”确定联共抗日的方针后，他们更加关注中共的政策，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西安事变后，一直对中共有着崇敬之情和敬仰 之意的核心组成员，开始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努力，高崇民、卢广绩等人也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对周恩来更是赞赏不已。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非常尊重这个爱 国群体，对其予以高度赞许。如在西安事变后各方商讨成立联合政府时，周恩来提议将杜重远与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名流一起，入选行政院。面对“二二事件”发生后的危局，周恩来认为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都不能成为领导核心，他想和高崇民、卢广绩研究，另组领导核心，团结东北军，反对分 裂[11]115。可见，高崇民、卢广绩都是被中共方面当作东北军的智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安事变期间，也是核心组成员被中共认知和认可的过程，为他们在全面抗战中开展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注释： ①有关的研究成果有：1.张万杰：《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 年。 2.王连捷：《东北救亡七杰》，白山出版社，1992 年。3.张万杰：《拨开迷雾见通途——1935 年张学良幕僚的核心组会议》， 载《湖北社会科学》，2013 年第 4 期。

参考文献：

[1]胡愈之.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79.

[3]张政枋. 张学良到西北后在政治上的一些措施[C]//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5）.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4]右军. 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M].台湾：春秋出版社，1971.

[5]周天度. 孙彩霞. 救国会史[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8. [6]张学良. 西安事变忏悔录[J].民报月刊，1968（9）.

[7]朱理治写给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的信（1936 年 11 月 4 日）[C]//张文杰，等.纪念朱理治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 版社，1993.

[8]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C]//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王卓然史料集.沈阳：辽宁大学出 版社，1992.

[9]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C]//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北京：光明 日报出版社，1991.

[10]齐世英口述自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11]丘琴，白竟凡，高凌.高崇民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